

目 录

- 一、《2017年，起来中国》简体版 （1--448页）
- 二、制作说明
- 三、高智晟律师致胡温的三封公开信

臺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 出版
美國對華援助協會

2017年，起來中國 酷刑下的維權律師高智晟自述

高智晟 著



2017年，起來中國
酷刑下的維權律師高智晟自述

作者	高智晟
美術設計	Arabel Chern
出版	臺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 10051 臺北市青島東路3-2號5樓 Tel.: 02-2660-9646 Email: tachr2011@gmail.com Website: http://tachr.blogspot.tw/ Facebook 專頁 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
出版日期	2016年6月初版 2016年6月初版二刷 2016年7月初版三刷
定價	精裝 600 元 平裝 480 元

如有破損缺頁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請勿以任何形式轉載、複製、
重製、變更、轉印、出版、散布或傳播。

目 录

推荐序	何俊仁律师序	1
推荐序	杨宪宏序：他心中所存藏的山河与日月	8
推荐序	傅希秋牧师序：出版者的话	10
绪言		13
自序	中国共产党将在2017年败亡！	15
第壹部	真相：绑架、囚禁、酷刑	27
第一章	2004年11月份左右的首次暴力绑架	29
第二章	2006年8月15日后的几次绑架	35
第三章	2009年2月3日的绑架	60
第四章	2009年9月25日的绑架	82
第五章	2010年4月8日的绑架及其后的酷刑和囚禁	126
第六章	走向挂牌地狱	224
第贰部	神的普遍启示和特别见证	317
第一章	神对共产主义政权，在中国寿命的启示见证	318
第二章	神赐予我及我家庭的特别引导和看见	322
第三章	我领受的其他部分美好见证	330
第参部	2017年后对中国的展望	349
第一章	在当破当立中蹒跚起步	350
后记：	罢笔后意犹未尽的漫谈	388
致谢		399
写书中和写书后的漫谈		400
附录：	作者手写原稿	447

推荐序

何俊仁律师序

何俊仁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

当我读着此书的初稿时，我感受到中共黑恶势力长期施加在高智晟律师身上的残酷迫害折磨，感到无限悲伤和愤慨！

作者承受身心痛楚，冷对施虐者，顽强地拒绝屈服。他在酷刑中听到自己的凄厉叫声，仿如来自另个人。政治迫害没法停止作者及其代表，和所见所闻之「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控诉！

中共始终要明白，他们可以打击受虐者的身心，但不能令有信念者失去意志。

高智晟不肯离开大陆，我没有回乡权，因此我们至今缘慳一面，我们只通过电话。

2005年，他协助太石村村民。太石村村民抗议村民委员会贪污，被数千警力镇压，几十名村民被捕，最后迫使村委会改选。他和另一位维权人士郭飞雄先后被捕。

在2006年初的第一次电话后，我和他展开了一场两地的漫长绝食运动。他每星期六，我则每星期三绝食24小时。他于当年年底被中共绑架，从此陷入了五年的非法禁锢和三年的正式囚犯生涯。我则持续了八年维权绝食，直至2014年10月，他出狱为止。

高智晟的家人不断受到滋扰恐吓，甚至毒打。他们被迫在2009年出走至美国。我亲赴纽约，协助其安顿，并与友人成立了高智晟基金会。

高智晟告诉我，曾有国企以巨额利诱他当其独家代表律师，其条件是不得参与义务律师的维权工作。当时他一家生活坎坷，但他断然拒绝。

高智晟在2001年被司法部评为十大律师之一，他本可以名成利就，过着安逸的生活。但他不忍看到法轮功修炼者受迫害而不顾，三次公开上书中共领导人申

诉，从此走上不归之路。他不单受尽毒打、电刑、单独囚禁，还要忍受家人受其牵连之苦。

其家人（其妻、小儿、小女共三人）在纽约安顿期间，我曾带他们到百老汇看著名舞台剧「狮子王」。其年仅六岁的稚子虽然不太懂美语，在看到狮子王临终向小狮子嘱咐时，不期然流下眼泪。翌日，我们到动物园参观时，他的小儿在草地上一边奔跑一边叫着爸爸！

高律师家人居美期间，无间断地为营救高律师而四出奔波，感动到不少人士。在此，我要感谢傅希秋牧师（总部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对华援助协会创建人）的协助，和美国曼克顿维尔书院生物系教授杨锦霞女士对其家人的关顾。

我本身也是律师，在我与高律师同步绝食的几个月期间，我认识到应该成立支持国内维权律师的关注组。「维权律师关注组」在2007年成立，关注对象从开始的十多位法律工作者扩展到百多位维护人权、法治的关注联系网络。

但不幸地，中共竟把这群争取公义和有公信力的维权人士看成眼中钉，更把他们打成黑五类之首。

他们包括早期的高智晟（律师）、郑恩宠（律师）、陈光诚（法律工作者）、郭飞雄（法律工作者）、滕彪（律师及法学博士）、许志永（法学博士），到江天勇（律师）、唐吉田（律师）、倪玉兰（法学学士）、唐荆陵（律师）、浦志强（律师），至去年709大抓捕王宇（律师）、周世锋（律师）、李和平（律师）、王全璋（律师）等。（2015年7月9日凌晨，中国当局逮捕了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宇，随后，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近三百名律师和民间人士被警方强制约谈、非法逮捕、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此即709大抓捕。）

他们进行着英勇的抗争，不少人现今仍然被羁留或在狱。在此无法一一尽录，但我会对他们所有人铭记在心，并永怀尊敬。

在内地不断升级的黑色打压和白色恐怖里，我看到青年维权律师不断地加入，使我看到良心和勇气的火炬在漆黑中发出光芒，为未来带来希望。高智晟律师应感到先行者的安慰。

高智晟的新书详尽地记载了他受到中共「黑暗力量」的迫害。他在其八年短暂的律师执业里，从协助国内法轮法修学者和上访人士及下岗职工中，认识到「中国黑恶势力」。他由于「无力放弃对上述苦难群体的关注，也终于成了他们中的一个具体被打压者。」在这个特殊角色过程中，他「认识了神，成了基督徒。」本书以具体的例子，证明了中共不单对践踏人权，更以变态手段侵犯个人尊严。

他同时揭示中共武警如何成为各自官僚的亲兵、下层士兵如何不被当做人的看待「双规部队」如何超越法制成为现代的「东西厂」（明朝宦官执掌的特权监察时的恐怖情治机构）。他解释了中共必亡之路。但这是一本交织着深刻和痛苦感受和立体地描述真实的书，需要读者耐心地阅读。

生死在天

作者在书中忆念其童年，其父亲一吐血，母亲便会跑到碱畔大叫「闰会，快回来，你大又不行了。」

作者从2004年、2006年、2009年多次被中共国家人员暴力绑架的过程中，涉事打手多次冲着他叫嚣：「弄死你跟弄死一只蚂蚁一样的简单。」

这些绑架的决策者是周永康。

在2011年，周永康打发人来见问他：「老高，这环境还能顶多久？」作者答曰：「我能活九十四岁，希望你告诉周永康，看看谁笑到最后，如果他足够幸运的话，他会死在监狱里！」

作者从中得到启示，人的生死岂是一个完全偶然的过程？

被抄家

作者的家被搜查了多次。国家工作人员的关注点，「首先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受迫害者及其亲人的来信，上访群众的来信等，约二、三十公斤重。其次是有价值的有形物，包括十几个『袁大头』，一万多元美钞，几个计算机笔记本，八、九台电脑，所有的储蓄、有价证券等」，其真正意义是导致作者家贫如洗。抄家期间其妻子和女儿被殴打。

寻人启示

作者被蓄意安排到新疆，是为了精神上摧毁其家人。

当局的这一次绑架是完全殊于往常。那一段时间，乌鲁木齐每天都会有汉族人失踪，几乎每天都会有汉族人的尸体招认告示，你只须留心一下当时报纸骑缝

里的「寻人启示」及「尸体认领启事」就能感觉到那段时间一个人失踪不再是什么罕见的事。这在后来的施刑人员口里，可以得出这种判断。绑架的所有参与者都是穿便衣的维吾尔人。

他们「热情真诚」地全天陪着我的岳父，寻踪觅迹，遍贴寻人启示，奔波于太平间认领尸体。他们的「热情」摧毁着我的家人最后一丝希望。中共当局为了在精神上最后摧毁我的家人。

人物

作者对中共体制下的国家工作人员有深刻的描绘，一类是愚昧可观，典型的专制动物：

「美国人他妈的真奇怪，怎么尽喜欢汉奸、卖国的东西？老高，你多少看过点书，历史上，汉奸、卖国的东西有几个有过好下场？当汉奸、卖国贼是不是上瘾啦？要不然怎么打都打不醒？我告诉你，党和政府在捍卫国家最高利益的问题上是从来没有含糊过的，手段也舍得用，对汉奸、卖国贼是绝不会手软。要是在美国，你早死了多少遍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于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人，几乎都是秘密做掉（指杀死），这方面的电影电视你难道没有看过？那可是美国人自己拍出来的，哪能有假？」

第二类是人性的一面，

而这里特别值得我记念的是「一郎」的副哨。我原不打算在这里念及他，担心因着他的善给他带来伤害，但终于还是想把他的善记录在此。因为对人性善的光辉的记录是最有价值的，尤以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代。

每次在酷刑阶段，我每天只能吃到冰冷的饭菜和一点冰冷的水。虽则是四月底了，但我依然每天冷得发抖，终于还不能完全不喝水。但第二天，我从他的手里接过来一瓶热水，无疑，他是刻意把那瓶水设法热好带进来的。从这天开始，他总会有办法在悄无声息中让我喝到热水，即使别人已送进来的凉水，他也会在他进来时不经意地给我换上热水。

警察与我交流一经发现,即会立即调离,而且给予一个不良记录让他们背着,士兵与我交流,一经发现,处理方法高效且简单:立即被拉出去暴打一顿,士兵为此挨打的可谓数不胜数。』

士兵中间很快就有一部分人知道了我是谁,他们中间有不少上网高手,能突破封锁获知很多外面的信息。他们能咬着牙告诉我很多信息,当然也有人因此被多次殴打过。

作者被送去看医生后,「站在一旁的哨兵见我回来,就很关心地悄悄询问我外出几个小时的遭遇,说:『很多士兵都关心你的下落。』」

二手烟的惩罚

密封式的小房间里关押,除酷刑外另一个绵绵不绝的苦楚就是这种环境里秘密警察绵绵不绝的吸烟,由于他们(监视人员)进入囚室时不允许看书报,不允许看电视接电话,夜里也不许睡觉,只能坐在我面前看着我,不停的吸烟,房间又是完全封闭的,有时是几个月、几十个月闷在烟雾中。对于一个不吸烟的人而言,那是一种灾难,十年过去后,我发现我说话的声音已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的声音,且迄今不能改变复原。

让步,不让步,这是一个问题。

作者想到,「家中老人奔走在各太平间之间,哭而抚尸辨认的残酷(是新疆警察告诉作者的实情)现实,心犹如锥刺之痛,违心的说些虚假的话,同意了狱方要求,写了一些在关押期间待作者很好的话。」

作者与一个老警察的交谈到这一现象,「2007年9月21日那次酷刑后,作者作出让步,让当局认为酷刑对作者有用。因为政治犯他看管了许多,你若从一开始就不作任何让步的话,在肉体上他们一般不用酷刑。说对刘晓波就不会有酷刑,因为他从不让步。」

酷刑

「阿巨兄」掀起我靠在墙根,然后从容的将叼在嘴上的五根烟点着,我已完全清楚他要做什么,他慢慢的弯下腰蹲下来,左手一把抓住我的头发,使劲往低

压，然后将右手里的五支烟移至我的眼下开始熏。他突然用膝盖向上猛击我的胸部，我能听到一个陌生的惨叫声，我可以肯定，那惨叫声与意识是没有关系的，十层以内都能听到那种惨叫。

他一脚踩在我的肩上，电击器爆出来剧烈的响声，他一把将电击器抵在我的下巴上，我听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声音，无疑，那是我发出的。但这次的电击时间和2007年9月份比起来，可谓小儿科，前后时间持续不到半小时，而且也没有电击生殖器。

楼道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但那死寂是极其短暂的，我听到一种极其微小的呻吟声，我开始感觉到了地上的冰冷，我提醒自己什么都不要去想，因为这里所有的过程都不用你操心，你就跟着走吧。我也提醒自己，你正走在一段极困难的路上，无论如何，你必须走下去，后退、旁骛都是死途。

出狱

2014年8月7日，当是形式上我的刑满释放日，我知道我不能像其他犯人一样正常的走出监狱。凌晨四点钟我起了床开始拆洗被褥。这是我入狱的第一天即决定了的事。我入狱时，他们发给我的褥子脏污不堪，其中一面竟有一个极醒目的人形污迹，我提醒自己，这就是你当下的生存环境，你是无力改变的，你唯一能做的是在出狱前把被褥洗干净了，不要让下一位接受他们的人面临你正在经受的烦恼。我把被褥洗完后开始打扫禁闭室卫生，这是我三年来从不改变的习惯，每天把禁闭室打扫的可谓一尘不染，连厕所的坑每天早晚各一次的认真擦洗，从不苟且，这是我精神经营的日常组成。

亲情

父亲去逝后，他（我的大哥）以石头般的诚实独肩肩起一家人生存的苦难重担，当二哥、我、四弟，我们长大了，终于可与他分担着生活的重负时，我们都心里生出了外出寻找希望的想法。

2009年6月28日，「失踪」半年后的我突然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出现在他的院子里，他赶紧跑过来，一看大夏天的，我还穿着冬天的服装，他竟像孩子般呜咽

起来，回到母亲住过的窑洞里依然痛哭不止，惹得我也热泪汨汨。

2012年3月份，在沙雅监狱囚犯会见大厅里，隔着玻璃他看见我被人押过来，他和我的岳父两个白发人，又痛哭失声。而为了这半个小时的会见，他三上北京，两去新疆，受尽了中共恶徒的欺辱。

2014年8月26日，我被新疆警方押出机场向榆林警方办理交接时，我听到大哥的声音在叫「老三」。我寻声望去，见大哥与四弟、表哥站在远处望着我，而大哥是叫了一声「老三」后又在那儿泪流满面。他后来说他一眼看到我成了那样，他当时难过的差点背过气去。但他不知道，这已经是我体重增加了近二十斤以后的情形。

境外媒体的作用

作者非常感谢海外记者的关注和访问。

正是由于他们，才使得全世界的正义力量与作者在困难时期的信心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作者生命安全保障的最后力量，构成中国和平改变的力量，负起中国和平趋向自由、民主宪政的重轭。

后记

由于作者的特殊经历。此事涉及中共的多个方面：高层（周永康）、维稳办、双规部队，是了解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始资料。高书在2017年补，有一个重要的小段，与香港目前的政局有点参考价值。

曾有士官讲：说中共「国保」内养着一批特殊的干部，安插于全国各地「国保」部门中，人数有数万之巨。这批特殊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各大网络上盯寻热点事件及敏感事件，并根据指令跟帖表达「民意」。说这样做有个目的，一是群起而搅混水；二是群起而制造「主流民意」；三是群起而围攻说真话者；四是不遗死角地监视网情。

这是认识现今中国的一本重要的书，当中有大量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我全意推荐这本书。

2016年5月16日

推荐序

杨宪宏序：他心中所存藏的山河与日月

杨宪宏
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创会理事长

从2005年起，在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应当时的总统陈水扁的邀请，开了一个对中国广播的短波中波共构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原始构想是向中国传播人权自由理念，并关怀在中国被中共迫害的良心犯。这个每天都打电话进中国，访问受中共迫害者的节目一直做到现在，超过十一年了，跨越了马英九的八年执政，到2016年民进党又重新轮替回来。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节目见证了很多在中国对抗中共，而被关押迫害的「硬颈人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被抓捕之前，这个节目访问过他35次；另一位更常接受访问，批评中共最烈的是维权律师高智晟，他在被捕之前，接受台湾央广的访问55次。

在他被捕前的最后几次访问，常常是中共的国保公安跟在他的周围不远的地方，有一回他还带着女儿格格，在访谈中，我从没有听说过他有露出过一点恐惧。他真是顶天立地的汉子。

高智晟2004年至2005年多次抗议中共当局暴力镇压民众和迫害法轮功成员，其后屡遭北京警方软禁及殴打。他在2006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2009年1月，高智晟失踪，2010年3月才再次出现，但很快又失去踪影。后来中共媒体报导高智晟「违反假释条件」，外界才知道他2012年1月被送进新疆监狱服刑。

2015年9月24日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报导，中国维权人士高智晟打破沉默表示，被中共当局拘押期间曾遭酷刑虐待，被电击棒殴打、关在单人牢房三年。高智晟还说，狱方在他的牢房装设扩音器，连续68周播放宣传广播。

但他说，「只要从监狱活着出来，就是打败对手」。

高智晟现年52岁，曾被中国司法部评为「中国十佳律师」之一，被誉为「中国良心」。法学学者滕彪称他为「中国维权律师的领军人物和先行者」。

高智晟在2014年8月刑满获释，他的律师当时说，高智晟因营养不良而牙齿脱落。高智晟获释后身心状况令人担忧，几年冤狱与酷刑使他记忆和语言能力受到影响。不过，他通过大量的写作回忆疗愈自己，目前的身心情况不差。

虽然高智晟的妻儿已在美国定居，但高智晟说他没想过流亡到美国，还说留在中国是上天赋予他的「使命」。

高律师目前还被中共监视，可是他不妥协，还表示，他判断，2017年应是中共垮台的时间。不离开中国，就是要见证这么一天到来。也的确有这么一种气氛，中共内部分崩离析，还有内部人士从新疆官方媒体在网络上贴文，要习近平下台。更不要说，大内有人借古讽今，以「清明上河图」的内容，将习近平比为亡国之君的宋徽宗。还有更加不可思议的，新华网的所谓「笔误」，直称习近平为「中国最后领导人」。

中共是不是在2017年要倒台，不是重点，核心的是，中共这种邪恶不义搞「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流氓政权，不可能长久，而如高智晟律师这样的人，应该是中共倒台之后，未来新中国的国家中坚。

台湾在2016年5月20日，回到台湾本土政权的执政，应要对广大中国还有像高律师一样的仁人志士表达关怀，并且适时的给予庇护与协助。这是台湾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价值同盟的扩大，蔡英文总统说，台湾要「维持现状」，并且拿这个「现状」与中国交往，现状是什么？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是中共头子习近平诈骗集团脑子里没有的，但是高智晟律师不但有，而且还在努力要让中国走向与台湾一样的「见状」。

高律师选择台湾出版他的新书，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他授权给傅希秋牧师与我，共同为他安排台湾出书事宜，我感受到他心中所收藏的山河与日月。借着他的书在台湾出版，写下此序祝福，这本书的出版，算是他心中的「新中国」走向实现的第一步。

推荐序

傅希秋牧师序：出版者的话

傅希秋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

高智晟是当代中国最为杰出的人权律师。毫无疑问，他也是数十年来中国大陆维权运动的先行者。

高智晟律师出生在极其贫穷的中国陕北乡村，经历过毛时代亿万底层民众所经历过的一切苦难。1996年，通过自学考试成为执业律师以后，他就一直努力地为弱者维权，为公义发声。他是最早为法轮功学员作无罪辩护的律师之一，并在2004年底开始多次上书中共最高领导人，要求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还为遭逼迫的中国家庭教会和基督徒作无罪辩护，为许多合法财产及产业遭政府掠夺的民营企业维权。他的这些举动招致了党国政权的震怒，导致从2005年到今天，从未间断地对他的国家暴力和严重迫害：律师所被关闭、律师执照被吊销、经历被绑架、被失踪和惨无人道的酷刑，家人受严重的骚扰被迫流亡海外，后来他被判刑、被长期单独关押。

从2005年起「对华援助协会」就开始关注并帮助遭到党国政权迫害的高智晟律师一家。在他频繁被绑架、被失踪、被酷刑的同时，家人也遭到严重的侵犯骚扰，两个孩子无法正常生活和读书。「对华援助协会」参与了对耿和及两个孩子的营救工作。我当时紧急地赶赴泰国，夜以继日地与国际社会和美国政府协调，感谢主，高律师的爱人和两个孩子能顺利来到美国。在高律师长达十余年的被迫害过程中，「对华援助协会」从没有停止过以各种方式呼吁高智晟的无罪释放。我们建立了「自由高智晟」的网站，并在2009年成功征集了十五万个要求释放高智晟的签名。

在2014年8月7号，高智晟律师「刑满释放」后，外界无法得知他的真实下落，我们也知道他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我们在国内数名同工一直努力地寻找他的下落。终于在历经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后，在某一个深夜，我的两个同工在陕北黄土高原他老家的窑洞里见到了他。他在出狱后依然被严密监视和看管，没有

自由。但他在家没日没夜地写，写对党国政权即将在2017年崩溃的他，得到的特别看见和引导；写他十年间秘密关押过程中，那些他遭受的不为外界所知的、难以想象的酷刑和虐待经历；写他对未来民主中国的制度设想。我们的同工数次深夜行走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把高律师的书稿一次次带出来。再由其他同工用电脑打印，再想法传输到海外。这个过程其实很不简单，因为高智晟律师是党国政权的第一号政治犯，这个过程对于参与者而言，是冒了极大风险的。我在这儿要感谢许多的「无名」同工，没有你们的努力，高智晟律师的这本书是无法出版的。

高智晟2005年11月宣告认信成为基督徒，并与妻子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在高律师的书中，他很多次分享了在极其苦难的时候，上帝以各种方式刚强了他，给他特别的恩赐，甚至使他能够成功剥离开肉体与灵魂的痛苦，让他得到内心的平静和喜乐，在黑暗中像新约圣经里使徒保罗一样发出夜间的歌唱。并让他能藐视专制极权的不可一世。高智晟讲过：「今天我要是败了，就再没人会相信天理了！所以掌握天理的祂不会袖手旁观！所以上帝在和我们并肩作战！」

作为一名牧师，我为有高智晟律师这样的弟兄感到自豪。虽然他和我对未来中国政权的认知领受不一定一致，但是他无畏地以一己之力挑战极权，像二战末期挑战希特勒的德国认信教会朋霍菲尔牧师（潘霍华）一样，战胜了那些难以置信的对他的酷刑和折磨，他对未来抱有无比坚定的信心。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基督徒是如何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走向各地，效法并活出基督的样式。读高智晟弟兄这本书，我们从中能分享到许多美好的见证。

本书从手稿惊险的运出高家，到秘密打字、校对工作，许多同工、朋友和同仁都付出许多辛劳。寻找合作出版商的过程本身也颇富戏剧性和反映党国海外「红手」威胁巨大。苦苦寻找接触多个出版社，因着香港「铜锣湾」书商被大陆当局绑架事件的寒蝉效用，出版商也被迫换了几个。我要特别谢谢我的老朋友好弟兄也是本书的出版者之一「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先生和邱龄瑶秘书长鼎力相助。也感谢出版人贝岭先生和他帮助联系的一校对者凤珠女士。当然还有许多无名英雄为出版此书甚至冒了极大风险，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祝愿高智晟一家能早日团圆。祝愿高智晟弟兄努力追求的一个充满了爱和公义的新中国早日到来。我不禁想起圣经《阿摩司书》5:24所言：「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写于2016年5月美国得克萨斯州美德兰市

绪言

中国共产党将在2017年败亡，这将是上帝在这个新千年里向世人显示的第一个使全人类瞩目的、将产生深远历史意义的神迹。届时，中共立党为九十六年，其掌政时间是六十八年。

天道昭彰；天道终得昭彰时！

其时，这个变态暴虐了中国人民九十六年之久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恶政权，迄今仍天天蛮横嚣叫着要「永远坚定不移……」「永远继续高举……」，「永远不走改旗易帜邪路」的犯罪集团，将作为这多灾多难民族的恐怖记忆，作为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最不名誉的纪录；同时，亦作为一个不轻松的笑柄被荡人历史的尘积。恶政权来去匆匆，而中国人民将永存！

仅从人的认识层面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即始终伴随人类对恶的抛弃而对善的趋就，他与主义、族群无涉，这是人类普遍的本能表显。全球共产主义政权灭亡进入了最后倒计时，这个倒计时时间实际上从1980年代开始，而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灭亡的倒计时则须从1989年开始只二十八年止，即其大限在2017年。

对于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个星球上的存在，神命定了其一百年期限，即1917年至2017年。1917年，共产主义幽灵落体实体政权肇始，人类以自己的愚昧与狂热，为这个世界里的一半生命，铺就了一条史无前例苦路，时至今日，仍有人类五分之一的生命爬行在这苦路上，中国成了这苦路上爬行大阵中的主力和恶榜样。这是我们的耻辱，也是人类文明的不名誉。

人类文明前行的路上，曾有过无数次勇敢的尝试、带血的实验，这是由人类本身的局限性决定的。俄国在1917年的尝试本身是不当指责的，但当共产主义制度鬼相显露无遗后，依然利用这种制度中成功发酵的恶能量，遮覆了人民的自由和感情，裹胁全体人民向全人类推广这种恶，这是俄罗斯民族在上个世纪七十余年的时间里最不名誉的纪录。

共产主义制度的邪恶极其恐怖纪录不是我本篇文章想涉及的，也不是一两篇文章能够囊括了的。他的邪恶最著名的两大标志即是：在和平年代里造成国内无辜人民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和对人类基本自由的仇视和反动。共产主义邪灵显化

为人类实体政权迄今已有九十八年的时间，前三十多年是其邪恶生命的蓬勃扩张时期，从「匈牙利事件」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是其生命的维持时期。暴力与谎言，是其这一阶段维持生命的始终之全部条件。1956年，苏共坦克耀威布达佩斯街头即足证：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的维持手段也不能例外。甚至当谎言破产时，共产邪恶政权在国际上推行其意志与其在国内的维持手段一样：唯暴力一途！第三个三十多年则是其速死期。其大面积坏死的时间是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不到十年的时间里。

纵向看共产主义运动的全球发展史及兼横向看共产主义政权败亡的历史纪录大略上也可以看出上帝意图的脉络：一是所有共产主义政权都在国内公民的和平反抗中败亡，即全部亡于国家内部发生的非暴力过程，就像他们一律以暴力夺取政权一样；二是全球没有一个共产主义政权通过对自身改造获得新生。上帝的终极意图至为明显，共产党政权作为撒旦意志的人间表象，其下场唯有一死。就整个人类文明的前景而言，共产主义问题已不再是全球性问题，仅遗亚洲一隅，实际上则仅遗中共问题。中共一旦崩亡，其他几个共产妖孽政权归于死途也仅遗技术问题。中共恶政权一死，未来民意政权执掌者即使再昏昧，也绝不会任由北韩这个当今最残虐人权的政权继续暴虐下去。

可能又会有「有识之士」盯眭訾议我蔑视国际法则，保卫人权、保卫人类良知是人间最高的法则。如果既有法则成了暴虐政权的避风屏障，那就只有将其踏倒一途。2017年以后，基于对上帝和人类文明的共同理念，中国将融入人类普世文明，并与之和谐共生。随着自由和民主个人时代的到来，饱受人权政治压迫苦楚的中国人民将历史性地成为人类文明向上发展道路上的生力军和建设性力量，绝不会再干出像当下阻止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通过关于朝鲜人权法案这般邪恶勾当。

自序

中国共产党将在2017年败亡！

中国共产党将于2017年崩亡，这是在未来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必将发生的历史事件。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最庞大的犯罪集团，已不可逆转地进入其罪恶生命死亡的倒计时。

对于这即将到来的历史事实，当今人类中有三个群体迄今不自知：其一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黑恶势力群体的中、基层官员；二是被谎言和恐怖致脑残及灵性残疾的群体；三是被眼前利益障蔽了视力的国际政客群体，尤以西方个别政客为甚。

上述三个群体的不自知或者不肯自知，终于不会阻却中国巨变的到来，但这死至眼前的不肯自知并非全无历史意义，至少他饰增了历史过程的娱乐价值，给这沉闷已久的人间添些笑料。而这笑柄中，有些是将要成就的，有些则是已经成就了的，而这已经成就了的的笑柄里的个别事件还就现实地与我发生着关系。

我在中共公开的及不公开的地狱被监禁了近七年。在这近七年时间里，始终有两个人形妖兽主导着我的苦楚，一人是「中央领导同志」周永康，另一人是新疆司法行政系统的「领导同志」谢晖。这俩贪官今天都已成「落马贪官」。我曾预言他们将在不远的将来被刑囚的话，在不同阶段成了一些人讥诮我的笑柄。笑柄不假，只是这被讥诮的逻辑倒了个儿。

2009年的一个秘密囚禁地，一位「蒙面领导同志」，代表「中央领导同志」来与我谈话，谈话终于因不大投机而在紧张的气氛中收场。那「领导同志」在迈出囚室之际又站定背对着我，说今天这机会是罕有的难得，「如果你有什么话给大领导，我马上就能带到」。我说你告诉周永康，他会死在监狱里。

他猛地掉头一脸错愕曰：「老高你是不是吃错药啦？说个不当的话，人家那叫九王爷，九王爷你懂吗？你的话你自个儿信吗？」

「他一定会受到审判，我绝不怀疑。」我回敬他。

「脑子被关傻啦！」他边说边气呼呼地甩门而去。

在新疆的司法行政系统，「领导同志」谢晖的名字，就像「中央领导同志」周永康的名字在中共政法系统一样响亮。这是我在中共挂牌地狱囚禁期间专门给我

苦楚的一个名字。前几天有报导称他成了落马贪官。这个黑暗制度又成就了一起具体的悲剧。我从未见过谢本人，或竟见过却不认识。我被秘密押经乌鲁木齐时，眼前曾有不少大器物晃悠过，谢出现其中的可能性极大。这几年来，我目睹了许多他签署的，于宪法、基本法律及人类文明相抵牾的管制罪犯文件。他的名字，使得黑暗在那里合理化。

谢作为个体，其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使我憎恶他。作为新疆监狱系统的主管者，他的面目足够狰狞。在那里，罪犯们的人权、人格、善恶像法律一样，被恣意践踏地灭绝了声息。

2012年6月初，就当局用高音喇叭，持续对我以精神骚扰之事与有关负责人反复交涉中，由于不能给出合理合法的理由，而我的逼问不辍，终于，他们告诉说是「谢厅长亲自安排的，谁也改不了的」。

我告诉他们：「谢的反人类罪行必将在几年之内受到审判，若足够幸运的话，他将会在监狱里安度余年。」

那位副科长一脸不屑，说：「你说这个和说太阳从西边出来没有什么不同，说这种话没意思，只能让别人低看你。」

我说：「我无意就此与你打赌，但请你记住我给谢晖命运下过的这个结论。」

周永康、谢晖两位「领导同志」，被中共系统内比他们更有力量的黑暗势力给打倒，却不在我的预料之中。他们将因反人类罪而受到审判是我所时指。中共对他们的「审判」，断不会涉及他们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罪。而恰是这方面的冷酷及凶残表现，才成就了他们各自的高位。实际上，我的语言还未兑现。

恶政必亡，便是从俗世的认知角度，历史也是有着他可被认知的脚步的。

普列汉诺夫为苏俄马列主义之父，是列宁的导师。他于苏俄「十月革命」后不到半年时间写下遗嘱，八十一年后才被发现，这份遗嘱，今天的人们既可以惊心动魄，亦可以平心静气待之，这取决于你持有怎样的哲学观。在这里，我想抄来几段与读者分享：

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成领袖专政。

而建立在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真相大白，就会立刻土崩瓦解。

三、布尔什维克将依次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崩溃危机，最后政权土崩瓦解。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十年，但这个结局谁也无法改变。

四、国家的伟大并不在于他的领土甚至他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和公民生活水准。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动荡，直至崩溃。

（引自「焦雨亭主」〈惊天遗嘱〉文）

这份遗嘱写于1918年5月，其时共产主义邪灵附体人类实体政权刚半年时间左右，在人类历史上造就空前人道灾祸的全球共产主义运动才刚刚开始。这是人类对历史步伐事前准确认知的一个确证。

1898年，在北京菜市口，当谭嗣同等人的血雾上喷而人头落地时，中国和平改良的历史机遇为反动势力的大刀砍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改革势力成了一时的胜利者，但仅仅三年以后的1901年，他们被迫在中国开始推行三年前被他们用血浇灭了的改良计划；公费送出国留学，各地建立新军、设立各级咨政会议。但为时晚矣，这些力量最终成了摧毁反动统治的本身。反动势力在政治泥淖中越是力图自拔，结果反而陷得越深，终于无可挽回地败亡。

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时发现，赫然在目的是历史自己的步伐，他纤毫不以一群败类的意志为转移。

我这算是在给本书写序，这是辗转颇多周章后又给到我手里的苦活。一贯性喜信马由缰的脾气又占了上风，提笔便一路写了开去，写下上述文字后才虑及到当顾及本篇文章与本书的关系。

为本书写序从不在我意料中：一则，我与外界的联系实在是困难得可以；二则，关注我命运的朋友中文字大家颇不少，由他们写来是我及读者们的光荣。文字能力方面我是外行得客观，唯可写出一些既储于记忆中的东西。这一安排使记忆的「反刍」又成了现实的必须，于是就又搜刮出了记忆中的上述「积压物」。

我有近十年的非人间经历，身受了许多传说中是冥界地狱里才能有的苦楚。我在短暂的律师执业中见证了这个体制制造的太多血腥与苦难：国企下岗职工的无助与绝望，以及他们中间和平抗争者遭致中国黑恶势力冷酷打压的悲惨命运；野蛮强拆造成的大批大批的失居居民及失地农民的悲苦与绝望；上访人员无助的眼神；「法轮功」修学者遭受的血腥压迫情形；反动司法体制下呼天唤地怨民的哭

诉……。我从未获得忘却了他们的能力，这大致上可以算得上是我感情世界里的不幸，但这究竟还是一个旁观者感情。由于无力放弃对上述苦难群体的关注，也终于成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具体被打压者。

在这个特殊角色过程中，我认识了神，成了基督徒，感恩神的特别恩予，得以使我成为2017年中国命运改变奇妙启示的见证人。仅此，无论如何评估我的幸运亦不为过。记述神的奇妙启示引导和领受是本书的第一价值，更是本书无与伦比的光荣。

这十年的特殊经历，我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数述不尽的公权力的凶悍及冷酷，中共秘密警察世界无法无天的恐怖与血腥；中共军队里令人目瞪口呆的颓败现状；中共监狱系统对人道、人权的冷血践踏……。记述这些目睹、这些经历的文字，是病态中国社会的一个病理截面，将之赫然展现在国人眼前，实在不是为了诉述所受到的苦难。一个没有宪政政治的社会，无法无天的权力究竟会对人权、人道及人类文明造成怎样惨烈的祸害！他究竟有多么凶残、多么恐怖，非是亲身经历，很难使人信以为真。在记述这些文字时，我痛感文字功能本身的限度——相较权力真实的狰狞面目。这样局面的继续维持，是继续着一个民族不名誉的历史；继续着我们每个正常人屈辱的纪录；同时，他无疑将继续着我们每个个体的苦难和现实的危险。而必须远离这黑暗政治，是我们彻底根绝这些苦难和危险的唯一出路；不再相信谎言，坚决捍卫个体的人格尊严及人身权利，不再主动做恶势力的帮凶，理解他人的痛苦、予受迫害者以能给的帮助，是我这本书的一点愿望。

公诸这些文字的另一个意思或是一厢美愿。有对那些誓死不肯睁眼自己看世界的人扶救奢愿。这里并未巴望他们加入到和平抗争者行列而一同受苦的意思。中国的改变大势浩浩汤汤而来，已汇成巨变在即的态势，这是已逝去的或正在经历牺牲的人们的成绩。时至今日，缺了任何个体，任何一群人，都不会使这种空前巨变不到来。我只是想，最大限度地减少这巨变中的牺牲者。

以最小牺牲规模的代价完成巨变才是这民族的光荣和成绩。每个人，便是那些利令智昏的贪官污吏们，他们同样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他们同样有自己爱着的及爱着他们的亲人。如果说抗争者的内心还能有着尊严的话，全人类的鄙视，党内凶残的权斗倾轧，在这种野蛮制度下，贪官污吏们是表里如一地失去了人本当有的尊严，把选择的契机指给每一个人，是本书的另一个愿望。

两书脱稿后，又发生了许多的事，中国黑恶势力又有了许多的进步——邪恶的进步。权力更加蛮横、冷酷日趋疯狂，久积了的社会戾气与日俱增。庆安恶警枪杀访民事件；「超级低俗屠夫」被构罪事件；广州「三君子」被「审判」事件；大规模拆毁「十字架」暴行；而最令全人类刮目相看的是最近发生在全国范围内的、恐怖打压维权律师的反法治暴行。二百五十多名维权律师，或被刑谳，或被鞫讯，或被失踪。邪恶气魄与「文革」比肩，在这些丑恶事件中，各色丑类昂扬登场显身，相率卑鄙，竞相无耻，尽以丑恶骄人。「文革」后换了面相的妖魅鬼蜮终于纷纷摘下挂相，在惊喜与亢奋中大显丑恶身手。暴力成了秩序，丧德成了资本。黑暗势力们又得了大成绩，将数百个无辜的家庭推人愤怒无助及悲苦的深渊，把人类群体最愚蠢的纪录提到新的高度。

他们已不再掩饰地把掩盖丑闻和罪恶当作是保护国家安全。现实实在已昭然，整个体制上下已心照不宣地达成了有目共睹的共识——丑闻和罪恶成了国家安全本身。

托克维尔说「律师作为一个整体，如果不能算是平衡民主的唯一力量，也是平衡民主的最强力量」。

美国《独立宣言》的五十二位签署者中有二十五位是律师。

中共反法治势力，如此仇视律师制度，决心永远把中国留在黑暗的嘴脸昭然。

独裁统治群体，总是一国中最愚昧、最堕落的人群聚集，他们不能在历史演绎中吸取点显而易见的东西。人类追求美好，亘古如斯，焉能靠硬暴力阻绝之？！

许多不远的历史显例历历在目。东德共产主义政权曾不知疲倦地向民众宣传，东德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一边却建起柏林墙。他们视国民为潜在的敌人，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其功能却是针对着国内的人民，为全国三分之一的公民建立了秘密档案。历史已昭然的事实是，东德政府主要的精力用在对公民的监控上，其可耻下场已是众所周知。

任何企图用暴力和谎言消灭人性的做法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古今中外历史已格外清楚地示教了我们。洗脑可得一时之效，但不能长久。在恐怖的压力下，人性可以麻木，可以扭曲，甚而至于被打折，但人类独有的人性不会被改变，广泛弥漫在今日中国各个阶层的贪婪及无底线堕落，正是被历史压抑了的人性本能的反弹。

仅仅在一年前，共产党又要依法治国了，于是乎，「学者」文人们摇头晃脑，漂亮口号铺天盖地，这种自吹自擂的丑剧又一次不光彩地收场了。这让人想起前苏联在1936年发布的，全新的、精心构思的宪法，国内和国外都欢呼了一阵子，但历史已证明，宪法的公布成了冷酷大整肃的开端，凡参加这部宪法起草者后来都被处决，这部宪法从不实施也从不废止。

2014年，中共最高法院又发布了《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国内那些无脑「学者」及「媒体」人士又竞相海吹了一阵子。其实，略加注意，仅过去十几年里，这种司法改革文件让人眼花缭乱，人们尽可看看我们今天拥有着怎样反动的司法现状。更令人饭喷的是，回观中共几十年里最高法的所有院长，不是法盲者仅为三人。司法改革，与解放思想不过是一次次演给愚民看的闹剧，从来都还没有真正开始就已经黯然结束。

中国的和平改变力量，在这民族的今天与明天之际，在凶悍、冷酷的压迫与无耻的谣咏诬谤中长大。这凶残的打压是不能避免的，在今后两年左右的时间里还会发生。这是中国邪恶势力败亡的必然路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这里，我要寄语被这次人祸殃及的同胞们，不要悲观消解眼前的具体困厄。反动当局这种全无人理的疯狂，是他们仍然坚定走在死亡之途的一个确证，也是这个民族反抗着一个确证。这当是我们欣慰的理由，就像分娩要承受疼痛一样，是后来大痛快、大奇妙的必有路径，我的心和你们在一起承受。

在此，我要正告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反动势力，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而是开始。你们没有胜利，我们也没有失败，中国，光明与黑暗的最后较量处在过程中，衔泪笑在最后的必是我们。我们，我们亲人们的困厄挫辱局面，是这个民族终于站起来的赎价。2008年底，当我的孩子不能再上学的局面临到时，我们夫妇心中的痛是何其惊心动魄，我们终于是站立着承受了这些压迫。

在此，我还想特别提及的是，参与今天迫害的所有人员，除在2016年8月1日前公开脱离中共恶势力、公开知悉的真相并公开道歉与忏悔者外，都将在2017年后，以从重的刑罚原则下接受追诉，包括那些恶记者们，正是这些最底层的人员的认真真作恶，才成全了他们背后主子的所做欲为。我们没有仇恨，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轻看正义。一个没有分明爱憎的民族是没有明天的。

中国黑恶势力显然是认为他们在这样的过程中又取得了完胜。这种自认为的胜利再增他们邪恶及愚蠢的高度。我已十几年不看中共电视剧了，绝非情绪化

语言，便是简单瞥一眼中共党媒的标题，看看他们中间的妖气弥漫至何等昏暗无度。什么「吓傻欧盟」咧，什么「咱不怕战争」咧，什么「美国式的民主困境」咧，什么「中国军演威震欧美」咧，什么「低保制度老人挥泪称满意」咧……。这直予人的印象是，他们这伙人的世界已是美好及强大至全天候使人坐卧不安了。其实，那是极不自信、极度不安的必然反应。我太了解他们，几句真话、一个真相，常让他们上下震骇，惶惶然犹如失家犬，失措若惊弓雀，沦为人类的笑柄却自以为是钦羡之笑。

最近看了一条信息说，习近平又要去白宫访问了，其同伙说「这次访问美国是一路亮点」。习这次访问白宫将是怎样地「一路亮」开去不大清楚，但奥巴马先生及其僚属的脸上被光照，甚而至于有亮点闪耀是可以定下来的。究竟，习身上有着难以数尽的「世界之最」：世界最大的独裁政党的党魁；不是世界最有钱，但最可随心所欲撒钱的独裁者；世界最大奴隶群体的总管；具有世界最凶残、最冷酷个性的独裁者……。热捧他是有道理的，说「一路亮点」是罕有的谦虚，白宫将大荣耀矣！

我理解，美国需要在亚太同盟战略与对华战略之间谨慎地维持平衡的难度，理解与这无赖政权保持接触的必要及无奈，但全然忽视中国被压迫者的感受及认识能力的做法，是非明智的，也是非道德的。

我想再次提醒各方的是，大家的智商究竟不是天地之殊。一些西方政客与暴政集团的苟合目的我们心知肚明。一些主要大国，把人权对话当成获取利益的工具，在这样的回合里，人类的伦理、良知都有了具体的卖价。中国箴言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果这些文字于你们有不便，就闭上你们高贵的眼睛，想想无数在酷刑里惨叫着的中国人感受吧！

思想至此，让我想起那位代表「中央领导同志」周永康来与我谈话者的一段话。大意是：你就死了心吧，美国不是你们的靠山，如果说旷日持久的人权对话开始时，中国还有些不安的话，现在则完全没有了这种不安。说我们各自都知道对方想要什么，说每次对话，双方从一开始就知道结果了。

「美中之间的分歧不会影响两国关系。」据于泓源说，这是美前国务卿希拉里说的。他说这是奥巴马政府给中共吃的定心丸，是明确了：你们干你们的，我们说我们的，咱们还是好哥们。

我清楚，西方同样有一群忌惮说真话的人，我也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以及说出来必使一些人觉得不舒服的后果，可终于还是要说的。我常不大注意周遭对我

说些什么，但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因为说真话而换来的各种困难局面我也都面对过，但终于积习难改。

我称中共为「黑帮」，有些绅士雅人可能会认为我是情绪化，你们去体验一番这种经历，在这样的过程中，除了语言和人形外，你再不能看到纤毫人类群体的痕迹，更别说是政府。想象中的地狱成了活的现实，他们总能有效切断与活人世界的一切联系。那些「国家工作人员」，衷心地执行着那些反人性的制度要求，人都成了兽心人、人形兽，没有比这更恰切的说法了。

在这里，我还想再刺激那些迄今热烈媚捧中国黑暗势力的西方政客，对于本书平静述说的那些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暴行，你们是窃喜又得了向黑帮集团勒索利益的机会？还是人性深处的骇然及作为客观纵恶者的难堪与不安？对当下厚覆中国黑暗现实而言，无论他是前者还是后者。

本书脱稿后，中国的「进步」真是不少，不仅日新月异，且多不胜数，兴致所至，随手翻晾一二。

陕西旬邑县的昏官宣布：要将多年来无理缠访者的名字写入地方志，「让这些访民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他们遗臭万年」。「多年『无理』缠访」，是这恶政府多年不作为的确证，丑貌被自己证明得格外清楚，被钉在历史耻辱柱者究竟是谁？

陕西延安宣布：为了应对严峻的经济下滑形势，政府机关将周六上班。这群蝗虫，一周五日的上班是这社会五日的公害，他们虽不创造锱铢价值，却耗噬着天价的官帑，他们没有文明制度下政府机构承担服务社会的作用。一周多祸害一天，「办公」费、交通费、吃喝耗费，使官帑支出陡增百分之二十，使「严峻下滑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爱国青年」侯聚森的崛起，就颇使挺他的中国非「阴暗势力」们自豪至摇头晃脑而嘶叫不止。这是他们的大成绩，非「阴暗势力」们的前途无忧矣。

「爱国青年」侯聚森，以及宝爱着侯而智商和德性绝不在侯之上的中国非「阴暗势力」们，他们极像狼狈搭档，组成了这个世界最蔚为大观的「爱国」巨阵，这巨阵中的聚类们，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些许爱国的细行，而是因为他们厘定并分配着爱国的标准。

这些类聚了的狐鼠类，相互热烈标榜，各自在共同组成的阴影里摇唇鼓舌，相率以无耻骄人。「爱国青年」侯聚森的崛起及中国非「阴暗势力」对他的疯捧，是中国社会病着的证据。他们的言行将各自的丑貌画得格外地清楚。他们公然掬

扬的丑恶与无耻，帮助我们看清了今日中国「爱国」者无底线祸国的嘴脸，看清了他们是怎样地倒置人类基本廉耻与公认的人类德性的。

「爱国青年被围殴」将所有的卑鄙、下作及反道德丑行，都假托了爱国面相。他们总在所有的罪孽周围造种种虚假得格外真的高尚氛围，而越发显得他们的卑鄙及愚蠢。「爱国青年」侯聚森及他背后非「阴暗势力」的言行，再次向文明世界展示了他们从肉体到灵魂的陷落高度。爱国爱到了失智商、丢人格、弃底线，一片人面傀儡中才能成就这世间空前的丑景。

这数个月里，中国大地上蓬勃着的另一个大罪恶，即是浙江各地官员亲自指挥野蛮拆毁上千个「十字架」和教堂的暴行。所有行为安排都表现出明显的末世心态的最后特征。

黑格尔有一段关于中国的话，今天读来更加令人感慨。他说：「中国，道德、宗教的存在是无本之木，因为道德和宗教都以意志的自由为他们必要的条件和基础。而专制政治却相反，那种最专横的、邪恶的、堕落的、专制的横行无忌，却是以普遍的缺乏道德和宗教为条件和基础的。」

霍尔盖特著《黑格尔哲学导论》中指出：「只有在宗教里，一个民族、一个个人才能把握到对自己来说是终极的真理。」他认为：「哲学和宗教当是国家和社会中所有自由和伦理当然的根基。」

查尔斯·兰姆说，失去幻想能力的人民是要灭亡的。一个如此对待宗教信仰的群体是没有明天的。那些今天可以无法无天的官民，你们个人的涉罪暴行将在2017年以后得到具体的追惩。

本当结束这篇乱象毕显的文字，隔壁又传来侄媳打孩子的声音。打声、骂声、嘶叫声，声声入耳，何其使人不安！什么问题？中国的问题——黑暗教育制度的成绩。

昨晚，饭后院里散步时与侄媳谈到不当打孩子的话题，孩子们已经是受害者了。结果她满怀冤情，而似乎全在理。她说现在老师权力太大，家长只有低眉顺眼的份。说老师几乎个个都是铁石心肠，且出奇地懒。「某某课文，给我回去抄三十遍！」说每次听得人头皮都发木，说每次给你递来一沓学题时，同时给你一纸答案，顺便命令道：「家长监督着，背会了答案，考试就不会出大差。」接下来，就是家长与孩子同愁共苦。她完全是在诉自己的苦，大意是：现在的教育内容与方式不能使孩子得到一点获取新知识的乐趣，说孩子完全被看成是死的机器，成了必须听老师话的工具，不允许有一点好奇心。他们只拿考试成绩来评价

一个孩子的优劣，一堆一堆的孩子成了他们认为的坏孩子。说家长只能顺着老师指的道苦逼孩子，稍有松懈，老师就会说你的孩子开始变坏了，家长苦不堪言却又无能为力。

去年冬天我就找来的两册小学教材仍放在桌面上。在一个正常人的社会，教材中的所有东西，都应当是使人进一步思考、进一步索证的起点。我们的教材里多是些不再需要思考、不再需要怀疑的结论，这是极不利于孩子思想能力的培育的。

中共的洗脑教育，已导致全民族思想停滞和人群理性衰退的现实，已为全人类共知。终于教育出了个死的世界及远离了创造和活力的世界，也是有目共睹的。当下中国随处可见的反道德、反理性现象，就是这邪恶教育制度的成绩。

凯恩斯认为，某种思想垄断后，对未成年人从开始认知世界与自身时，就进行灌输，让所有的人成年后自然而然受其控制不去怀疑。这之后，社会再进步的过程就会很痛苦。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是结束这一切非人间现象的时候了。这关乎我们每个中国人孩子的福祉，历史性地彻底解放辗转于考试之苦的中国孩子，将童年的及获取知识的乐趣还给孩子们！

最后，我还是要向将要「一路亮」到美国去的习近平先生喊上几声，请你接受一个无人能改变了的存在：世界是大家的！不当总抱持早成人世笑柄的、你死我活的对敌斗争思维。「我们要么是共同的自由，要么是全体的不自由」，只是黑格尔伟大的哲学洞见之一。表面上，你们还足够强大，正是这表面的强大保障了你们对黑暗的固守及对异见和良知的冷酷镇压，但同时你们有着有目共睹的虚弱，这虚弱中让所有人看清，中共不仅无法领导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还在这种虚弱中看清了中共显而易见的死相。

中共来去匆匆，而中国人民将永存！没有了共产党的新中国，将成为人类文明的和谐力量！

藉此机会，特别感谢何俊仁先生及他维权律师关注组的同仁，感谢他们多年坚持予我全家的关怀及实质性帮助！

特别感谢多年来坚持关注及帮助我全家的中外朋友、法轮功学员，特别是自由媒体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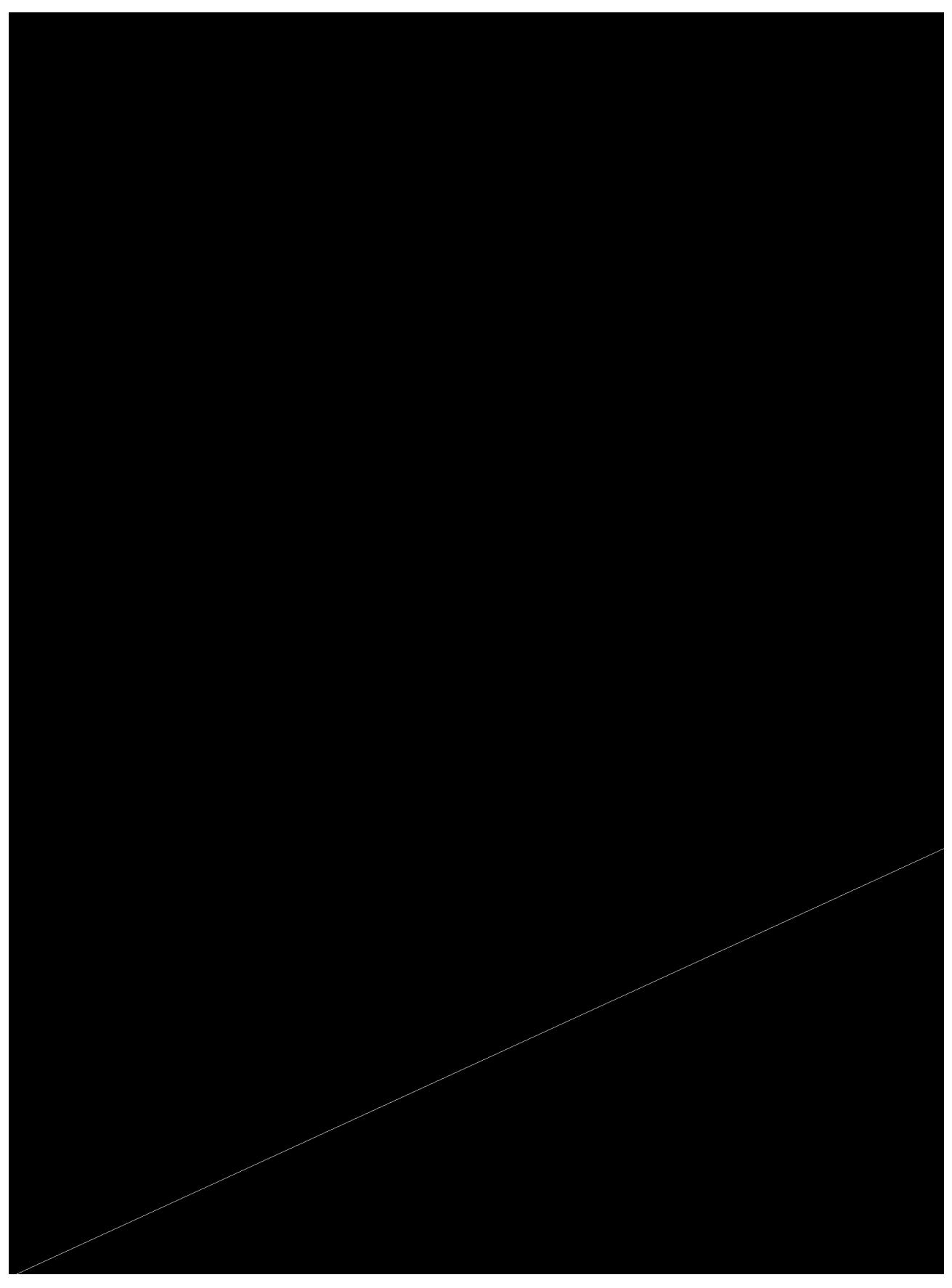
特别感谢多年以来一直关注中国文明进步命运的全球华人朋友、外国朋友们！
在此，也特别感谢傅希秋牧师（BobFu）以及今天尚不便提及姓名的朋友们，
是他（她）们的劬劳，方使本书得以面世！

愿上帝保佑中国人民！

2015年8月7日于母亲生前所居窑洞

作者高智晟

1964年生于陕西。家贫失学。通过自学，30岁成为律师。2000年，到北京成立事务所。他经常为穷人弱势免费打官司，成为著名的人权律师，也因此触犯中共当局的禁忌，而开始遭到打压。在2006年8月遭绑架，从此失去自由。被判刑三年，缓刑五年，缓刑期间屡遭绑架失踪酷刑，缓刑期满前，又被撤销缓刑入狱，三年届满，仍被监控在榆林老家。他的妻子与两个儿女都在友人的协助下逃离中国，高律师则在困厄中继续坚持正道。



第壹部

真相：

綁架、囚禁、酷刑

引言

在拓通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满是先行者和他们亲人们的血和泪。今天，没完没了的暴力绑架，弃绝人伦的电击酷刑，背弃人道的野蛮囚禁，仍然是这条道路上的全部风景！十年来，绑架、囚禁、酷刑、再绑架、再囚禁、再酷刑成了我的生活，成了我这些年来经历的全部，这样的生活还有一年多就结束了。

我的经历并不偶然，是中华民族从1949年以来漫无边际苦难的一部分，也是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凶残政权「伟绩」的一部分。一经获得可能，即将之公诸于众是我这些年里从未改变过的想法。我现在仍处在半囚禁状态，说他是半囚禁，亦仅止于在我的村里而言，我可以在村子里走动走动，可以把自己关在窑洞里独处。但相对于村子以外的世界而言，我仍被囚禁，只是空间大了许多。我从监狱被押回老家村里已有五个多月，当局迄今蛮横地阻挠我外出去治牙病。仅回来至今，我又有四颗牙齿弃我而去。前阶段去城里四弟家一趟，榆林市公安局的秘密警察头子闯到四弟的院子里骚扰，双方冲突再起，为了减少家人的担忧，我再次选择了退让。回至村里，结果他们又到村里我住的窑洞扑了一趟，终于因为我朝里面将门关死而退却。

这样的日子仍在继续。对于我这些年里的情形，许多人仍关心着，虽然我得不到任何外部消息，但我这个判断是不会错的。但对于大家关心的，这些年里被绑架的次数及相关的绝大多数细节，我已无法全部记述清楚。本篇文章也只能就记忆中几次主要的绑架真相公诸于世，以飨那些一直以来关心着我的命运的同胞和朋友们，并藉此机会，对同胞和朋友的关心表达起自内心深处的感谢和敬意！你们的持续关注，是我在困难中的坚持乃至信念的一部分，尤其是境外媒体朋友的倾力关注，是使中国黑暗势力终于不敢置我于死地的因素中，除神的保全之外最宝贵的因素，这在2009年9月份那次暴力绑架后，一直至终于不得不使我活着出来面世过程中，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

第一章

2004年11月份左右的首次暴力绑架

一、绑架理由纯粹是个幌子

2004年，大约是11月份左右，也可能是10月底，具体时间我已记不确切，中共秘密警察对我实施了首次绑架。首先，因为那是第一次，来得非常突然，当时对于谁是源头这点是完全的不明就里，再加上绑架过程中营造出的暴力当量，直至暴徒亮明身分之前，我是完全没有想到那是政府所为。因为那时我自己也基本还属于中国无脑大阵中的一员，虽然常有面对面地讲述着大盖帽们的凶残与冷酷的苦主哭诉，但我终于还是常疑思那些凶残和冷酷是具体真实的。总觉得明明白白地损人而不利己的事，只有疯子才会去做。我还不大有从制度层面去联系思考这些现象，这也说明我是一个平庸之人的证据。但在这点上，中共黑恶势力一路替我释疑过来，对于他的邪恶，你在哪一点上还有不大愿意确信的冲动，他必会使你在头破血流的苦楚中终于确信，是一路干干脆脆的邪恶，干干脆脆地教育了我。

这次绑架是没有任何迹象的，地点选在了北京以外的地方，又由陕西秘密警察施行，名义上是说我参与了西北国棉一厂下岗职工的和平抗议（我记不确切了），但从被绑架三天的内容看，这纯粹是个幌子，而本身以这个理由绑架我即是无源水、无本木。此前我与该厂的下岗职工没有过任何牵涉，只是经朋友介绍，说大批职工无端下岗，那些下岗职工聚集在厂大门外和平抗议，遭到秘密警察的迫害，职工处境非常危险，希望我能去那里一趟，给那些走投无路的职工一些帮助。说心里话，我不大认同这种帮助的实质意义，因为这样的苦难实在多得令人绝望。

中国下岗职工的灾难，不敢说是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绝后，却也是这个时代的全世界独有的灾难现象，是江泽民、朱镕基及胡、温主政期间造成的反人道恶果，是与镇压「法轮功」、强制拆迁及凶残迫害上访公民比肩著名的极冷酷灾难之一。增加就业、扶助失业者，是全世界所有政府的法定责任，而在中国，下岗

职工的灾难恰就是这被称为「政府」的团伙直接策动造成的。什么产业结构有问题、什么效率低下问题、什么经营观念滞后问题，哪样问题是由于那些职工造成的？谁都心知肚明，这些都是昏官无能加无良而导致的直接结果。中共政府在对下岗职工方面的凶残及冷酷，是由其一贯的邪恶本质决定的，是江泽民、朱镕基及胡、温之流在这个时代制造的，深刻而广泛的历史性灾难之一。通知你下岗你就得下岗，不允许你有任何不满的表达。许多和平表达者和他们的同情者，都遭到了野蛮的打压，中共对我的这一次暴力绑架，就是这种野蛮打压的一个具体事例。

二、几位山寨爷，要钱还是要命？

那天，我一出咸阳机场，就有招揽活的人贴上来，一上来就热切地问：「不到咸阳？」

咸阳机场我常路经，却从未去过咸阳市里。经简单交涉，我同意坐他们的车。到了车上，竟有两人已坐在车上了，副驾位及后座各坐了一人，我颇诧异，那司机立即腆上笑脸说都是去咸阳市的，为了多挣点钱，希望我能将就。我没有想那么多就上了车，但不一会就觉得有些异样，车不走大路而抄小道。小路上原本没有路灯，而汽车却关着灯行使，我正欲问其故，猛地，那两位客人突然向我袭击，一人控制我的双手，一人将一个头套套在了我的头上，就在同时，车被猛地刹住，有人用双手抓住我的头猛力前压。因我坐在中间，头被压低至两膝盖之间，我的两臂已被反制至背后，已不能给自己提供任何辅助性保护。我被压得憋屈着，呼吸非常吃力，能听见其他几个人此时正快速地翻我的包。后来证明，他们实际上是在核实我的身分。

大约几分钟后汽车又开始前行。由于事发突然，加之过程又制造出许多苦楚，所以我还无暇恐慌，注意力全集中在应对眼前苦楚上。汽车恢复行驶后，前排负责压迫我头颅的人歇了手，我得以稍直起一点腰来（**还有两旁各一只手压在我的肩上**），我的注意力开始考虑眼下已发生的事，考虑我的处境，我突然一句：

「几位山寨爷，要钱还是要命？」

车里静得出奇，几秒钟后终于有一生物接茬：「咋呼个球？要你怂命干球。」

我又来了一句：「不够刺激。」

汽车缓缓前行，我感到车到了市区，有明显的光亮掠动。又走了十几分钟，

感到车进入了一个黑暗处，车停了下来，有人走了下去，我被人拉下来，手依然被人在后面控制着。我刚站稳直起腰来，有人猛地拔去我头上的黑头套，后面被人猛踹一脚，我被迫前趋猛扑几步站稳。汽车猛地起步开走，我本能地回头一看，竟发现我的包也放在了地上。「有道盗。」我心里默念着。直至此时，我仍未想到这些贼喽啰是政府人员。

我发现我身处于一黑暗的小道上，两头都与大街相通。我稳定了一下情绪提起了包，准备走至明亮处再做处置。刚走了几步即又发现有些不同俗常，那邻街口的地方有几个黑衣人堵在出口上看着我，我依然继续向前，心里觉得：「今天怎么这般奇怪，这抢劫已足够的蹊跷，怎么……」

正想着，那几个黑衣人走过来截住我：「高智晟，你涉嫌扰乱社会秩序，我们现在宣布对你采取强制措施，现在就跟着我们走。」

这真是跌宕起伏，却让人哭笑不得，我这才明白前面那些贼喽啰抢劫的蹊跷所在，他们显然目睹了刚才我「下车」的那一幕。

「既然是公职人员，就当按程序来，表明你们的身分。」我提醒了他们。

「啰嗦个球，再啰嗦捶死你个锤子，到了咱陕西就有咱陕西的规矩，你个律师算个锤子。」一名大个子黑衣人竟怒而叫骂。

再与他们交代法律等于对牛弹琴，我只好被他们几个夹在中间往前走。我被带进一个很旧的大楼过道里，楼道很暗，我已完全不能自己，有两人控制着我，一人纠缠头发使劲往墙上推，脸被强迫贴在墙上。这时，我听见一个人在距我大约十米左右的地方打电话，只「东西已到手」一句，然后听到他又走了过来，我被一把扭得转过身来，应该是那人指挥的结果。

「低头，看个锤子，压低锤子的头。」那人命令道。

我被两人压至弯腰九十度。

「把皮带给抽了，把这锤子手给绑上。」

我的脸与地面平行着，可能是血液低涌之故，眼球胀得很难受。有人过来解下我的皮带，然后朝后捆住了我的手。这时，我听到一群人走进楼道。

「戴上，押着上中间那辆商务舱。」我听到来说。

一个黑头套套了上来，听到一串车的双蹦灯嘟响，我被押上车。车开始上了路，车的警示灯继续嘟叫着。

车上，我被两个人夹在中间，一左一右各用一手压在我的肩上，头一直被压得低至两膝中间。大约半个小时后，车队停了下来，我被人架下了车，然后架着

走进一个有门的地方，七拐八转地终于进了一个房间，我被推到一处站定。房间里很安静，能感觉到是在等待人。大约二十分钟后，听到有几个人走进来，有人走了出去。我的头套被抓掉，我扫视了房间，跟前站了几个人，看那种神态应是几个做官的，正阴沉着脸盯着我。那里，应该是一个宾馆的房间，里面的东西已全部搬空，这点做法上与北京秘密警察完全一致。有一个肥矬子背着手走近我，猛地一把抓住我的领带使劲地勒，我被勒得难受异常。房间里只能听到我和那肥矬子两人的、在地上紧张的脚步顿踏声。我的内心震惊异常，我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肥矬子的情绪显然开始失控，他疯狂地勒紧我的脖子，在那不大的房间地上拚命地往来折腾。

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们俩都大汗淋漓，他停止了脚下的腾挪闪跃，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他的喘气声。

这时，那肥矬子突然大喊：「把椅子搬进来一把。」

门开了，有人送进来一把椅子放在了墙角上，他拉着我的领带走到椅子跟前。

「站在椅子上去。」他凶狠地命令道。

我这时已精疲力竭，更多的是哀伤、愤怒和震惊所致。我直到此时仍不知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疯狂地肆虐。我没有听从呵斥，那肥矬子腾出右手，握拳朝着我的下巴猛地向上击打，边打边喊：

「上不上去？上不上去？」

看我不理会他，他显然愤怒不能自制，猛地用膝盖顶击我的小腹。正在这时，门被打开，又走进来四个人，带头的那人显然是那个场合位阶最高的头目，背着手站定后扬了一下下巴，那肥矬子立即退到一边旁立。那头目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的眼睛，房间里静得出奇，这时我才发现，与肥矬子一同进来的那几个人已不在房间里。

三、在中国，大领导最好当

当天夜里，我的房间进来一群人，为首的正是那在昨天疯狂折磨我的肥矬子。其中两个人走过来一前一后将我周身搜拍了一遍，然后架着我就往外走。一出门，发现天还没有亮。

我被押上了一辆车，驾驶座及副驾位上已坐了两名警察，前面一辆警车，后

面一普通轿车，三辆车上了路开始行驶。后来才察觉，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神经战大剧。剧情颇跌宕起伏。从后来剧情发展看，设计者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这是他们还了解我。如果了解我，他们大概即会失去这种设计的兴趣。我这里无意说有多少特别的能耐，但我有一个绝对的能力，那就是在灾难实实在在地发生时迅速屏蔽自己的思维运动，将自己放置在一个纯生物的状态当中，使自己有痛无苦。每至此，我必提醒自己灾难已经发生，任何灾难都必将是一个过程，他必然会结束而成为过去，这期间最科学的做法即是停止思维活动，使自己的精神不受一丝损害。因为有些过程完全是冲着精神伤害来的，一个脑瘫状态让他们败得一塌糊涂。事实证明，这种遇灾难即变傻的做法，在这近十年来的地狱经历中起到的作用可以用「神奇」二字来评价。他成功地使我几无精神痛苦地走过了神为我预备的这十二年灾难的前面十年。

车队在警车的引导下前行，我一上车不一会即昏昏呈睡状，不动脑是迅速人睡的最佳路径。不知走了多久，车停了下来，一看天早已大亮，我坐的车正对着前面挂着的一块牌子「陕西省干县看守所」。除了一左一右控制着我的两人外，几辆车上的人都下了车，在看守所与车辆之间穿梭奔忙，你头脑再简单也能得出他们是在办理某种手续。

大约二十多分钟后所有的人又都上了车，那肥矬子上了车疑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办完了，这几天先跟着我们，还有些事要找他。」

车队又掉头他往，车刚行了一会儿，那肥矬子打电话给当地公安部门，说中央政法委来人啦，想参观唐皇陵，车已到了干县，希望公安部门给提供方便。

他挂断了电话，冲着我说：「老高你现在就是中央政法委领导，他们肯定会来些小官员来陪着咱，你不说话他们没有人敢主动跟你说话。这里有好多好看的地方，门票都很贵，我安排这一招，不但不要买门票，而且全天还会有人陪着给你讲解，中午饭都会给安排得好好的，你就不说话就行了，在中国，大领导最好当。」

他这一招果然见效，不一会，当地公安局副局长、当地文化馆副馆长合股急急赶来。那一天，我就被一群滥权的秘密警察簇拥着「参观」唐皇家陵苑，其间在干陵武则天墓参观时间最长。她的无字碑证明着她的思想能力及思想深度，这足使一千三百多年后，在这片国土正鼓噪喧嚣着的「重要思想」无地自容。

有人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个历史笑话，那是矮化历史。其何曾取得「历史笑话」的资格？孵养他的「重要思想」家身还未死，而这「重要思想」则早已

入粪土；他充其量只取得其时「坊间笑料」的资格。有人指责这种「重要思想」家足够无耻，那是他矮化了「无耻」的高度；他充其量也仅取得「愚蠢的无耻」这种次等无耻资格。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天，秘密警察中，总有人不时有意地蹭在我身边，眼睛旁顾着却偷偷地与我讲话。其中，有人给我讲了李建国书记下乡检查计划生育落实情况时的一个故事。说李书记指明要看如何烧毁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户的住房，他说咸阳市领导不愿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就由政府掏钱盖了几处民房，并添置了一切应有的生活用具，李书记来检查时，再安排人住进去扮计划生育违法户。李书记在大批警察保卫下，亲眼目睹「烧民房」过程。

我感谢那位警察并偷偷向他致敬。我理解他的用意，基层政府有时的暴虐实在是被逼而为之。而咸阳市的这种规避之法也实属偶然，就在这种难得偶然中，现实而具体的生灵涂炭得以偶然避免；而正因为他是偶然的，现实而具体的残暴才会是普遍的。他说许多警察自己就是老百姓，也不愿做坏事，但有时实在是躲不开的。

四、对付老高就用陕西的办法

这天的中午，当地的招待结束我又被押回咸阳市，正式被交到咸阳市公安局一个负责「国保」的姓高的副局长手里。接下来两天，我被关押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外形像宾馆，却整个二楼就住了我和看管警察两个人，我不得出门，二十四小时有人陪着。在两天里，不停地换新的面孔与我谈话，其中一张面孔的官阶应该在高副局长之上。「不得插手下岗职工闹事的问题」、「不得插手『法轮功』问题」、「不得插手强制拆迁问题」、「不得插手上访群体的事」，于第四天将我释放。我刚被释放后的一个多月，就「法轮功」被中共政治迫害问题向当局写了一封公开信，公开质疑当局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的凶残、冷酷及非法。据私下的信息，江泽民怒怒异常，不仅是那篇文字揭露的真相本身，最让他惊恐的是，竟然有人敢在中国国土上挑战他们的「核心关切」。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共文武鹰犬组成了壮观的扰攘大阵，有时竟排着队找我谈话，其中有一个下午，那些蒙面鹰犬（**不介绍单位，不出示身份证件**）竟找了我三次。

第二章

2006年8月15日后的几次绑架

一、绑架的决策者及参与人员

这次绑架已为外界广泛知晓，但有些细节仍有写出来的必要。诸如绑架过程本身的细节。因为在此后，我又被中国恶势力多次绑架，除了一次是由陕西榆林方面和一次由新疆乌鲁木齐的秘密警察实施外，其余均由北京警方施行绑架，而在山东这次绑架过程具有样板意义，因为后面我还有不少文字要涉及一些绑架，而所有的绑架过程乃至施行绑架的人员都是固定不变的。这里将在山东姐姐家的这一次绑架过程，及绑架的参与人员写出来，使外界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恶势力行为的暴虐和嚣张。

这次绑架及后续事件的发展至2006年12月22日算是一个结束时间，而绑架的决策者是「领导同志」周永康，绑架的组织者是北京国保头子于泓源，绑架行为的具体操作者，我只能叫出张雪一个人的名字，因为张雪在我这几年的秘密囚禁生涯中是颇值得提及的一张面孔，我后面会专门提及他。而其他近二百多名参与人员，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的面孔无法清晰。

中共这一次对我绑架颇经历了一个酝酿的阶段，主要是评估对我实施绑架后可能出现的局面，特别是侧重考虑国际因素，「而国内我们不怕，我们有力量准备」（于泓源语）。而实际上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名义绑架我，是他们迫不得已的一个选择。

二、这他妈意外找出你这么一号完人

在2006年8月15日前，中共黑恶势力组织了三个专门的小组，分别负责调查我在原律师事务所的有无偷逃税问题，在全部当事人中去调查有没有乱收费问题及男女关系问题。目的是尽一切可能不用「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不管有多么地牵强附会都在所不惜。但他们三个小组都失败了，用于泓源开玩笑的话说是：

「这他妈意外找出你这么一号完人。」关于这些方面的信息，我是在2008年全家被逼离开北京到新疆后才听说了的。而由中共警察在男女关系方面替我寻找罪名的事也是这次回到老家时才听说的，他们竟然查询我三十年内的人际交往情况，对我在十八团当兵期间的详情，有关情形及关联人员查了个底朝天。在部队审查的过程接触了什么人我不清楚，而对二十多年前我在新疆喀什拉丝厂打工期间情况审查则至为详细，其中被强制传讯了三次以上的人有周国良原厂长，及胡长文、曹根旺。

对于这些事实，中共在2006年6月15日后专门负责审讯我的警察佟中华也向我当面提起过，他说他承认：「凡是了解过的人都说你是好人，说你爱看书、人很善良。」

而2007年4月份，当局押着我「旅囚」时（**林牧先生语**）曾到过喀什市，上面提到的周国良、胡长文、曹根旺均证实了他们多次被喀什市的秘密警察传讯的事，其中曹根旺被讯问的次数最多，因为他是我的初中同学、当兵时的战友、打工时的同事。但由于我身边有秘密警察盯着，他们也不好说什么，只是以开玩笑的口气说：「没想到几十年前和你一起干了几天活还惹了这么大的麻烦。」（**胡长文语**）甚至于我在乌鲁木齐工作生活期间与我交往过的朋友、同事，都受到中共秘密警察盘问。最倒霉的则是我原来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同事们，其中原律所的主人高鹰律师竟被新疆公安厅软禁四天之久。律师张良、王惠民，律师事务所会计杨新娟等都遭到强制传讯，话题就一个：交代高智晟在律师事务所期间的偷税、逃税的犯罪事实。没有这样的事也得想办法找，找不到编个事实也行。其中，有人当面向律师事务所领导保证，只要同意作证说高智晟有偷税、逃税的犯罪事实，律师事务所要什么好处都可以满足，今后律师事务所不管出了什么样的差错，都保证不处罚，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任务，不能完成也得完成。

我感谢我过去的那些律师同行们，尤其是高鹰先生，他面对着被无限期软禁的威胁，一直不愿昧灭良心，这在当下的中国，是何等地弥足珍贵！我也感谢我自己，以素常的简单、热情，赢来了以往同事坚定的尊重。而在威胁利诱我过去的当事人污蔑栽赃的事情上，中共黑恶势力也颇费了些心思和功夫，但终于未能如其所愿。我在全国的当事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穷人，我没有刻意地要感动他们，但在与他们打交道过程中，我时时、处处地体谅和尊重他们的感受，我坚信他们都是善良的人。事实证明了我的坚信，他们没有任何人在威逼和利诱面前背离良知，其中辽宁的当事人还对那些威逼他们说：「你们一定弄错了，高律

师他真的是好人。」这些都让我感到欣慰。这种高贵的操守，是我们民族尚可高贵起来的保证。但已对人间良知没有了一丝触动的中共黑恶势力，绝对不会对他们为时八九个月、在全国范围内、不惜代价罗织我罪名之努力的失败有任何触动。给我罗织罪名是当局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来对我实施绑架成了当局最后一途。对于是否对我施以毒手的问题，中国黑暗势力的决策也颇困难。

三、为了千家万户的幸福

最后下决心的时间是2006年8月14日夜。于泓源在一次的谈话中无意透露了若干内幕消息。

那次谈话谈到了吸烟，他来了一句：「我这吸上烟还是因为你。」

我说这是又一个欲加之罪，他说是真的。

「对你动手北京局是动不了的，公安部也不敢单独做主，我们只等上面决策，等来等去，等来的是让我们北京局自己决定抓与不抓，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我只能说上面的大领导比以前更聪明了，抓捕还是不捕，交给我和另外一个人来决定。好家伙，8月14日我俩一夜没有合一眼，两个不吸烟的人，一夜竟吸了好几包烟。别以为我们抓你就那么轻松，比他妈干仨月活都累。」

8月15日凌晨，已待命一夜的车队接到了到山东东营实施绑架的命令，扑到山东东营，与一直负责贴身跟踪的秘密警察会合，准备寻机实施秘密绑架。那段时间是我姐夫生命的最后阶段，我带着女儿从北京赶至山东东营市，准备陪姐姐度过这人生最困难的阶段，并拟协助姐姐做善后处理。中国黑恶势力派了三辆无牌车与我一起组成一个车队赶到东营，并与东营市警方轮流守候在姐姐家楼下。

秘密警察对我的盯踪真相我已有过记述文字，一般情形下是十二人，二十四小时一换班，敏感时日会增至二、三十人。我开车，他们开车跟；我骑车，他们骑车跟；我步行，他们也步行跟着。我的习惯是不管在哪里，我都会把自己的日常活动导入一个规律，从不违时，目的是督促自己勤勉而不致在日常的懈弛中变得慵懒。跟踪人对我的生活规律有极严密的记录，并且掌握得非常清楚。所以，他们在东营市对我的秘密绑架易若翻掌。因为到了东营市的一周多时间里，我每天上午九点半至十一点半都会在医院里陪姐夫两小时。每天九点十分准时下楼赶往医院，十一点五十分准时返回姐姐家住，除了这两个多小时外，就全天待在房

子里看书，而姐姐则在三个时间回家给我做饭吃。

今天回过头看，完全可以肯定是我的神挫败了他们当天在我去医院的路上秘密实施绑架的企图。我每次去医院前一般先关房间窗户，那天却发现黑帮人员增加了几十倍。待转身下楼时突然肚子痛，我的胃没有毛病，此前也没有过这种经历，也就没有在意。结果，刚要出门，肚子痛得很厉害，想拉肚子。如此这般反覆了两次，不到二十分钟拉了两次肚子，且还是痛，我只好打电话给姐姐说明了情况，那天上午就没有去成医院。若那天像往常一样下楼，则百分之百地会在去医院的路途中被秘密绑架。

既然去不了医院，我只好待在房子里看书。中午，姐姐回来给我做饭，到了家门，她发现平时在楼下蹲守的那群人和许多新面孔，都挤在一楼至五楼的楼梯和过道里，有男女几十人。她刚把钥匙插入锁孔，围在她家门口的中共特务突然猛扑向她，其中一人捂死了她的嘴，另外几人同时用脚猛踹门。门被踹开时我正躺在卧室里看书，一声巨响惊得我放下了书。这时，一群人一起向卧室扑来，那架势极似有悍匪在后追杀而拚命奔逃之状，结果出现了极滑稽、极丑的一幕：最先的三人竟卡死在门框上进退不能，卡在中间的即我前面提到的张雪。终于，外面有人猛推一把，三个人被推了进房，结果被推的各自转了个圈脸都朝外，与目标南辕北辙。然后，那身子被挤转了一圈的英雄们又各自转过身扑过来。我冷眼坐在床上观赏了这一幕丑剧。张雪一步跳上床将我扑倒，一只手捂死我的嘴，另外几人也都同时扑过来，他们把我翻转身，面朝下压在床上，有人抓住我的头发使劲往床铺上摁，有人在后脑勺、颈部压着。

我头脑出奇地冷静清晰，在体验着整个过程。我得出的最清晰判断是：那群人很紧张，且是异常地紧张，是紧张得不能自持，以致手脚出现乱麻般的错乱；而这种莫名的紧张，使他们在这样的过程中的表现是乱套得一塌糊涂，可以说是毫无尊严。我在路上想过，如果当时不捂死我的嘴，我一定会用语言去引导他们，绝不是夸口，这里有一个他们不明白的关系症结，即完全不把这样过程中的我的人格尊严当回事，所以整个过程中他们的人格尊严也是七零八落一地鸡毛。

2009年6月份，我曾就这个话题问过当班看管我的张雪，问他：「你们一、二百人抓我一个人，为什么紧张到那种程度？你们为什么不能做得使你们自己的尊严得到能有的照顾呢？」

他的回答牛头不对马嘴：「为了千家万户的幸福呗。」

这其实是一种心理深度不安的传导性外溢，是整个统治集团决策层心理不安

的传导。他们每天有多如牛毛的具体抓捕、绑架，并不至于总是这般紧张，这种群体性莫名其妙的紧张正是整个统治集团整体紧张的外溢表现。从技术角度，抓捕我，是一个极简单也完全能是一个极平和的过程，却终于被他们的无力自持的卑鄙和不安弄得一团糟。

可能终于有大器物稍冷静下来，下令：「拖地上，拖地上，抓紧勒！」

我被几个人拖下床，被强制跪在地上，那过程终于渐渐严密起来：一个人使劲扳住我的头发往后摁，摁得我只能仰面看着房板，一个人负责踩住我的两只脚，一人从背后给我戴上了手铐，而另外有两人则用黄色胶带先封住了我的嘴，然后连缠了几圈，在完全无后顾之忧后又如此炮制在我的眼睛上绕了几圈，然后又给戴上了头套。由于我是在室内，只穿着短裤，光着腿跪在地上，而脚上又有一个人踩着，至少有四个人死死地控制着我，估计他们是在搜查我姐的房子，我的膝盖跪在地板砖上，那个过程实在是痛苦得可以，我是一动也动不了，包括嘴巴。过了好一阵子，我被架了起来，腿钻心地疼，好在走路有人架着。我被架下楼又上了一辆车，坐下后两边各有一个人将一只手放在我肩上，我基本能够判断那是一辆商务车（大概是别克）。因为天气很热，车一直发动着，周围应该有很多车，且都是在发动着，直到上路之前，我一直以为旁边是停着一架直升机，那阵阵马达的轰鸣声绝不亚于直升机引擎的轰鸣声。

四、我的名字成了「815」

这次绑架后的真正苦楚是在路上，不到五百公里路跑了有八、九个小时，不仅因为整个过程我是在黑暗中度过，更因为左右两人将我控制得一动也动不了，而他们控制我的人却过一会换下来休息一阵子，那八、九个小时的生理难受感觉真够可以。在整个路途，听到唯一的一句人话是：「乱动就捶死他。」大约晚上八、九点车到了目的地，我被架下车时几乎无法站立。我被人架着进了四道铁门后进到了一个去处，被人强行压制得蹲在地上，不一会听到一声：「头套胶带去了。」这场绑架过程到此结束。这是他们每次在室内绑架我的基本套路，在外面绑架则略有不同。但不论在哪里绑架，有一点绝对一致，那就是迅速捂死我的嘴和眼。

我的眼睛再次能看见时，人已置身北京市看守所大厅里，黑压压的一片大盖帽，为首的是一位身高一米九以上的大盖帽，大略有不少于五、六架照相机对着

我猛烈「开火」，还有几架录像机，我那副尊容可足够靓仔得可以：我只穿着短裤、背心，光足被他们塞上了一双拖鞋。我像大熊猫般立在中央，被拍够后，又被带至一个房间里扒光了衣服，供众大盖帽们饱览，然后被带入监舍关押。晚上睡下不到一分钟，刺耳的铁门声轰响，另一个声音砸了进来：「815提审。」被禁锢在特制铁椅的阶段性生活开始，从这一天开始，我的名字成了「815」，不容许任何人打听我的名字。

关于我在看守所的经历，2007年4月6日，我曾有一封致胡佳先生的信，在那封信里谈到了一些大概的情形，这里仅就那封信没有谈及的一些关键性过程再做概略性的提及。因为许多琐屑的细节实在无法也没有必要一一罗列。

关于我予胡佳的那封信中提到的，用特制铁椅长时间强制对人的禁锢以及强光照射是变相酷刑的问题，孙获2007年7月份在安富大厦一楼大厅的一次谈话中说：

「那不算酷刑，因为对每个犯人都那样……」

其次，他谈到那封信里的几个「五百九十小时」，说加起来都超过了在看守所的总羁押时间，因此是不实的。其实，我在予胡佳先生信里，在「那几个五百九十小时」的后面专门在括号里注明他们的重迭关系：如在铁椅上的五百九十小时，与强光照射的五百九十小时的重迭等等。

那次，孙获还说了一段颇有意昧的话：「老高，你写了也没人信，谁会信政府能那样做呢？我们就做外人绝对不敢相信的事，你们同伙的人不也公开表示不相信吗（指余杰先生的文章。至于他以什么标准将我与余先生扫入一丘，则不得而知）？」

五、看「大跃进」泪水潸然

在看守所，当终于得知家里所有合法财产被当局洗劫殆尽，耿和她们娘仨只留下了三百元钱的生活费（后来回到家中才知道，实际情形比他们传给我的更加惨烈，当局安排了一群流氓秘密警察竟二十四小时入住在我家里，耿和她们娘仨根本就无法正常生活），而生活堕入绝境时，我承认我完全低估了对手无底线的邪恶。

我决定在这一回合中妥协。她们娘仨身陷困境，这是我没有力量接受的。如果需要，我会果决地替她们去死。另一方面，我认为妥协的价值应当被我认同，

虽然我清楚，中共素常是只有诡计而没有妥协，不管他们背后的手段是如何弃绝人性的卑劣，但究竟在形式上他终于还是想以妥协的形式结束这一回合的冲突，我应当鼓励他，让他读懂妥协的好处。但他们在我同意就妥协进行协商时，为了向上面邀功，在程序上陡添了许多麻烦，但要价最后仅落实成三个技术性问题：一是程序彻底重新来一遍，表明我一开始就真诚认罪，愿意悔罪，并写一封悔罪书（在这方面我附一个条件：**立即从扣押我们的钱数中给耿和她们娘仨支付五千元生活费**）；二是不再批评党和政府；三是就我曾公开发表的《九评共产党》的作者署名「郑贻春」的文字，再写一遍给法院（**这些谈话从不记录，更不录音、录影**）。

我同意了这三个技术性条件，选择了后退一步。在重新开始的程序里，他们给我播放了大量的政治性洗脑影视内容。从他们的动机角度，说粗一点，那对我洗脑的努力是对牛抚琴。但有些内容播放时及播放后我流下了泪，例如「大跃进」终于导致了全国性大面积饥荒，「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党员、干部和工人返回农村」。我面对那些大批同胞返乡画面悲从心中起，禁不住泪水潸然，感觉到这个古老而多难的民族，自周秦以降三千年的时间里，人民普遍的、由权力造成的苦难几无断辍过，人民被驱不若鸡豕，所谓：「国无宁日，岁无宁日。」权力的刀锋所向披靡，迄今不能有质的改变，而人民无奈被驱的奔突被当成美德，被当成制度优越性去褒扬。我是一边看一边流泪，那是我的真情，但被当局利用，说那是我悔罪的泪水，许多人因此立功还「戴了大红花」（于泓源语）。

六、搜刮•盯踪•殴打

一应的议定程序进行完后，2006年的12月22日，当局在法庭上走了个过程，于当天下午将我「释放」，实际上是交给了北京市秘密警察当局，直接由孙荻和王胖子接管了我。在回家的路上，孙荻向我宣布了一连串的「不准」，我意识到这次释放不过是换了一个关押场所而已。孙荻同时宣布了上面的决定，决定三天之内，我和我的全家必须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具体去向暂时不能说。我提出孩子还在上学怎么能离开。

「必须服从大局，格格学校的事由我们来交涉。我现在要特别给你强调，从现在起你得完全听我们的安排，绝不允许与任何人接触，特别是胡佳。另外还要

给你说清楚，耿和、格格在这个月也受了点委屈，回去肯定要给你诉苦，你可不要再蹦起来。你家楼下、楼道里、门口的那些人（指秘密警察），人家也是在听上面的安排，是在工作，不能跟人家老冲突。家门口摆了张床，进出是不方便了一点，但这环境只能靠和政府合作慢慢改变，硬碰是没用的。」

我立即回答：一个星期后可以离开北京，但只是我一个人，不要逼我再次选择入狱。结果，孙不再说什么。一回家，刚换完了衣服就被带到了小关派出所。到了小关派出所，那里又一群人等着我，又是一串令人眩目的「不准」，不仅不准见任何人，连看什么书都得向派出所报告。

孙获说：「你回来啦，领导决定警察从你家里撤出，你家门口、楼道、楼下小房间里的干部继续待着，不准和人家发生冲突。」

又回到了家，现实的惨不忍睹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力。虽然秘密警察从家里面撤了出去，但从距离上，他们的撤离不足二十公分，仅是从门里面撤到了门外面，也就只隔了一个门的厚度。他们在我家门口过道摆了一张钢丝床，上下楼、进出门都必须侧身挪移。这种做法既卑鄙又下贱，你无法不用这些词来描述他们。而我家门口的上半层楼道里也摆了一张床，每张床上两个「干部」全天候坐在那里。后来几经激烈地交涉，他们同意将我家门口的床移至下楼的下半层平台上，一家人进出门终于恢复了正常。但下楼仍很不方便，仍须侧身而行。

回到家才得知，他们在山东绑架我的同一时间，孙获带领一支庞大的「干部」队伍来到我的家里。这群黑帮当天的任务分了三项：大批的黑帮成员负责对我家外围的围堵及警戒性监控；另一批数人敲开了我家对面邻居家的门，一进门猛地将邻居家的男主人扑倒在沙发上，其中有一只手死死地捂住了他的嘴巴，另两人将他妻子摁坐在地上，然后有数名不明身份人员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就住在他们家里，将他们一家控制了三天，全家人不管有什么理由都不得踏出家门一步。做了我的邻居真是一个意外的不幸，这是我实在要抱歉的。2007年，这家邻居实在不堪扰攘，干脆把房子低价卖掉而离开了那里。我的邻居男主人叫赖新型，女主人叫周颖，是两个正直的好人。

而孙获本人则率领一群男女秘密警察进驻到了我的家里，对一家妇孺进行全天候寸步不离的监控。从后来回过头来看他们的所为，那种过程设计的绵密与恶辣，以及执行起来的坚韧与一丝不苟，不由使人心生叹服。仅对我家里的搜查过程即不止辍地进行了几天几夜。其实，我家并无多少东西可供他们这般投入。但有几样东西将他们的注意力攫住：首先是全国各地「法轮功」受迫害者及他们的亲

人的来信；同样丰裕的是上访群众的来信，有二、三十公斤重；另外，是我的书籍，据说他们不厌其烦地一页页、一封封查看，巴望着能从这些纸张里，能从具体的字里行间有「危害国家安全」证据的重大发现。我的许多好书从此明珠暗投落到这群黑帮手里。这十年里，我有万余元的书经他们的手永远地堕入了黑暗。仅2010年4月20日那一次，又有价值九百多元的书落入贼手（其中有价值八百多元的一套《资治通鉴》以及若干陈寅恪、傅斯年的著作），而郭飞雄先生存放在律师事务所的数百册书籍亦遭致了同样的命运。这次「搜查」真正意义上是致我们家落贫如洗。有些值点钱的有形物都如此不翼而「飞」，包括十几个「袁大头」、一万多元美钞，几个计算机笔记本，八、九台电脑，所有的储蓄、有价证券等，除了其中的储蓄及有价证券极少数追讨回来一部分外，其余的迄今悬而不决。

期间最使我不愿宽恕他们的是，这些黑帮成员对我妻子耿和的暴力殴打以及多次对我女儿格格的殴打。可以把任何酷烈的暴虐加在我的身上，因为我在做着使你们感到愤怒和不安的事，耿和和孩子有什么错？她们善良得甚至连蝼蚁尚不肯伤害，仅仅因为跟我的身分关系，竟遭到如此令人不齿的暴虐，耿和的一个手指被暴打致残，永远不能伸直。她并不给我讲，是我发现追问下格格才讲给我。而女儿格格被暴打竟成了家常便饭，而孩子极似我的个性，更是加增她被暴打的频率。

每天有不低于六名的男女特务跟在孩子身边进行骚扰，连孩子在学校上课时，几名特务竟无耻地打开教室门，搬来凳子就坐在教室门口，连孩子进个厕所都有两名女特务贴身盯踪。而当时只有三岁的儿子，只要一出门，就会有四至六名的特务跟着孩子。耿和每天出门，则更是会有不低于八至十名的男女特务贴身盯踪。每次进幼儿园去接高天昱，跟着她的黑衣大阵煞是可观。因为她们娘仨加上我岳母，分别为不同的特务包干盯踪，我被绑架后，岳母从乌鲁木齐赶来，却不允许她进我家，说必须由「大领导」批准后方可。老人来的当天晚上就开始由六名特务负责盯踪，当晚老人就只好在外面住下。耿和说有一次她们在家里憋闷，决定在小区旁一家小餐馆去吃顿饭。到了餐馆，跟踪她们四人的特务紧随而至。那些特务完全可以守在餐馆外面，可这不符合他们的行事风格。他们的人进去还不到一半，小餐馆已挤得水泄不通。那餐馆老板娘不明白耿和她们几人吃碗汤面竟带着几十名保镖摆谱，就出面求耿和体谅做小本生意的难处，她们终于只好放弃。

对中共盯踪我家人的特务之凶悍，外人真的是难以置信。我被「释放」后也

多次遭遇特务耍横，从纯生物人的角度，你只有无助及无奈的悲哀。有一次，在我家旁边的「晓林」餐馆外面，那是个星期天，由于一些特务故意捣乱，屡屡踩我们的脚后跟，实在使人愤怒难抑，但我担心吓着了孩子，故努力隐忍着。不料，那平时最坏的「娘娘腔」得寸进尺，走一步踩一次耿和的脚后跟。我被一种巨大的羞辱压抑着，后悔今天出门。虽然每天一出门就要被他们羞辱，可孩子实在不能总关在屋子里，我想他们应在我们一再忍让面前有所收敛，但终于事与愿违。忍无可忍的耿和停下来希望「娘娘腔」不要这样，提醒他路人正在围观。没想到他竟然像泼妇般发动了他的「娘娘腔」，不仅大骂而且还要扑上去打耿和。另外几名特务立即过来将我控制住，一名围观者立即上来隔开耿和，那「娘娘腔」竟一时狂怒难抑至狂扑不已。作为个体，我们并无仇怨，他们的那种狂怒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在路人的保护下，我们一家只好放弃了外出返回。后来听说这次冲突被路人发到了网上。

另一次是2007年6月3日，又是一个「敏感日」将至，做贼心虚的黑恶势力集团，数倍地增加了在我家周围的黑暗力量以资警戒。殴打过耿和的特务也出现在其中（后来耿和又不能确定是不是他），我走过去问他为什么打人，不料他猛地站起来用双拳发疯般击打我的头部，我被打得抱着头蹲在地上，他仍猛击不止，直打得我看到天地摇摆旋转、呕吐不止。好在耿和和孩子都不在跟前，没有让她们目睹这暴虐的一幕。我回到家里本来不打算讲，无奈因为一直呕吐被耿和发现，最后在医院进行了检查。

七、你们的政权是纸糊的

前面提到在「释放」回家的路上，孙荻宣布拟将我们全家带离北京，中辍孩子的学习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加之据说胡佳先生在网上的揭露，反动当局在这一问题上暂时地收了手，过了几天后只将我一人带离北京，路线可以由我选择，我显然先选择去山东看望姐姐。王胖子和孙荻另加一群人押着我离开了北京，他们开去了两辆车，其中一辆是中巴车，有男有女，阵容足够壮观。到了山东东营姐姐家，王胖子和孙荻竟跟进了姐姐家，姐姐只能握着我的手流泪，什么话也不说。最后，他们下到楼下，姐姐才告诉我一些我不曾知悉的细节。

首先，姐夫已在我被绑架十几天后长逝。没想到8月14日与他的见面竟成了永别。那些暴徒那天在姐姐开门时朝后捂住了她的嘴，其中有人猛地一脚踢开了

门，等一群人扑进去后，后面的几个人把她推进了门内摁倒在了沙发上，一只手始终使劲捂住了她的嘴，她的两只手被人死死地控制着。等我被架下楼后，有六、七个人在她们家搜查了两个多小时。姐姐说：「真不知他们要找什么？」然后由东营市公安局人员把她绑架至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关了两天。两天时间里，连上洗手间都被人盯着，晚上她睡觉时，一面床头坐着一名警察盯着她。她被关的头一天，东营市公安局局长与她进行了既有趣又无聊的对话，其中几句话值得引述在此，以资与朋友们分享。

那警察头子问：「你为什么还要和你弟弟在一起？」

答：「你已经有答案，你知道他是我弟弟。」

问：「你知道你弟弟是什么人吗？」

答：「你已经有答案了，他是我弟弟。」

问：「你的弟弟已经严重地威胁到国家的安全，为什么还是要和他在一起？」

答：「一个赤手空拳的个人能严重地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只能证明你们的政权是纸糊的。至于你问为什么还要与他在一起，你有答案，因为他是我弟弟。他威胁国家安全，你们怕他，我不怕他。」

问：「说你不识字，怎么能讲出这样明白的道理？」

答：「这些简单道理除了当官的人以外，三岁小孩都懂。」

问：「不跟你胡搅蛮缠了。」

答：「是你找我谈话，我从来没打算要找你。」

姐姐讲完这些对话，姐弟俩都带着眼泪笑了。

东营市公安局局长是个恶主儿，在这里对他的恶有必要予以记述。首先，我们不怕他，就像我们不怕他一样，这种记述并不是为了未来的报复，他只是应当被记述的真相。这几年与他们零距离接触的一个收获即是，我发现他们身上有着常人难以置信的两个扭曲现象，即：一是作恶时像邪灵附体般不管不顾，二是作恶后像邪灵附体般惧怕丑行被揭露。我这几年曾多次在当局针对我施暴前提醒过他们不作恶才是最大的安全，最实在的安全，但他们像邪灵附体般不管不顾，终于作恶后又开始惧怕败露。

最近十年里，我的家人所在地的公安部门，只要上面没有特别安排，他们一般不主动来迫害骚扰我的亲人，但山东东营是个例外。2006年8月15日前，那个局长似曾制造车祸杀死我，并说：「弄死他很容易，就多一次车祸而已，上面领导都是胆小鬼。」这是公安让知道内情的好人讲给我们的。从2006年迄今，每到

逢年过节以及中共的敏感日，东营市公安局从不例外地会监控我的姐姐，每次都会威胁她，常年勒令我姐姐不得去探望我，离开东营市必须向他们报告。2014年8月份，我出来的前后，东营市公安局多次找我姐姐谈话，威胁她不得去看我。真无法理解他们究竟在想着什么，何以会如此地不可理喻！怎么可以把作恶本身当成目的？而这些做法并不是来自上面的交代。去年8月出监前，中共公安部一局局长来谈话时，我就东营市公安局的恶行提出交涉，他当面表示，这不是上面安排的，并承诺将制止之。

八、陕北与新疆之行

在姐姐家待的几天时间，北京跟踪而到的人员盯踪如常。在这般严密的监控下，竟然在我刚到东营的第三个早晨，就在我的车上发现了与收购二手车广告一模一样的，呈名片式的特别给我传递信息的纸片：一是安慰、问候我；二是随时愿给我以帮助，尤其是经济方面，并指明了需要帮助时的信号表达方式。当局也发现了这一信息，可以说，我比他们还震惊。我刚离开北京一天多的时间，被控制得如此密不透风，竟然在山东东营有人以这种方式关注我，这是怎样的一种力量网络！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力量网络其实长期存在于我身边，于2007年4月份、2009年9月份都出现过。这给了我一家人极大的精神安慰，虽然我们并不肯通过这种方式收取钱财，但他的价值是无以估量的，这在格格不能上学后，终于逃离中国的整个过程中，这个我迄今没有看见过的力量网络发挥了令人惊讶的能量。时至今日，这种力量仍在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

离开姐姐家后，我与姐姐一道在大批秘密警察的「保护」下回到陕北，期间在我们路过的山西太原看望了另一位姐姐。

回到老家，五十多岁的大哥泣不成声，述说了他们四个多月地狱般的经历：「省上的（指**陕西省公安厅**）、榆林的、佳县的，一堆人围了我们几个月，他们想干啥就干啥，想骂谁就骂谁，多次把我抓到县里，把我的三个儿子都关起来，这咋就无法无天呢？我们做啥犯法的事情啦？」

哭归哭，跟着我的那群秘密警察都被大哥给拉进窑洞里「羊肉饴铬管饱吃」，包括孙获、王胖子、张雪等一群秘密警察对羊肉饴铬的可口赞词不绝。

由于我暂时还不能待在北京，否则「严重威胁国家安全」。陕北之行结束后，我又从北京将耿和她们娘仨接到山东姐姐家过春节，还是孙获、王胖子、

张雪等十几名北京的秘密警察守着我在东营过完了2007年春节（应该这次有女警察，上次没有，因为确切的这两次只有其中一次有女的）。春节过完，将耿和她们娘仨送回北京后，国家又觉得不安全起来，我还得尽快离开北京。因为上次绑架风波也波及了在新疆的一家人，退了休的老岳父都被带着红袖标的两人二十四小时在楼下看着，到新疆去安慰一下一家人正是我心里想着的。

我赶回了乌鲁木齐，听了家人的哭诉，给了他们一些安慰话。由于在来新疆的路途上，那群秘密警察中有人几次三番建议我去喀什一趟。

「因为大家伙都想去喀什看一看，只有你去了我们才能跟去一趟。」他们这样说。

我着实不想去喀什，一则，我曾在那里待了近十年；另则，被一群中共缇骑整天簇拥着，加之才刚刚身卸缙绅，实在没有那般雅致。最后，拗不过他们一再地要求，我提出去喀什实在不是我愿意的，我去喀什的费用必须由他们承担。没想到他们说这要求太小儿科了，满口答应。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又硬着头皮被他们裹着去了一趟喀什。

九 、 摆脱绝境的唯一路径即是揭露

到了三月底我们被允许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我们全家继续被全天候严密控制着，但有一个问题致双方动辄冲突起来，那就是我们一家人日渐枯竭的生活费用问题。他们给出的解决之道是我不愿意的。

「要官给官，要钱给钱。要钱别小里小气的，政府不差钱。」

他们总是这句话与你交涉。而我要求工作由我自己找，政府不得干涉，他们总不肯同意，因为期间在我车窗上又发现了类似在东营市时的那种纸片。有人愿意以年薪五十万元聘我做文字方面的工作，同时说若需要钱，则在晚上将我车的右后窗玻璃留下二指宽的空隙。然而，这种情报也被他们截获，他们绝不让步，不同意我接受通过这种管道的工作，他们留下的唯一通道就是接受他们的工作或金钱。摆在我面前的明确现实就是只能是要么饿死，要么听他们的安排。而摆脱绝境的唯一路径即是揭露他们，每次临绝地时的铤而走险之举，都能迫使他们在技术上做些让步，示外部以表面的平静，而这种表面的平静对他们很重要，且能维持一天算一天。

我一直寻机揭露他们。2007年4月6日那次致胡先生的信，就是在这种背景

下生成。当然，我为此又付出了颇可观的代价。黑恶势力于当天晚上将我绑架到派出所，并于第二天交到孙荻和张雪这二位于泓源最得意的悍将手上。他们在深夜将我绑架到密云山区的一处禁林里边，一路上又玩起了他们惯用的神经战，前来引导的警车换了好几次，而每次都在道旁做好一阵子鸦雀无声的神秘等待。我被押至目的地后，已是夜里十二点钟以后了。我清楚，我又要置身一个困难的过程中。当天夜里，由于泓源出面找我谈话。于一见面说了一段很有趣的话，说他正在西安开会：

「得到了高老板（指我）又发飙的消息（指我予胡先生的信），大领导（是周永康）跟我急了，下死命令让我赶紧回北京处理这事。一查，没有机票，只好开车往回赶，十三个小时啊。」

但接下来在那山区的关押中，过程比较温和，经过六天的纠缠，双方都有让步。我的让步永远是技术性的，他们磨来磨去就是让我写一份文字，说政府对我很好，只是我误读了政府的好意才一时「冲动」给胡先生写了那封信。如果写了，即可结束关押。也终于同意我出去找工作，但条件是由他们给推荐国内的私企。我知道耿和和家人又着急得不得了，加之我只是要维持生活，过多的细节纠缠起来没有实质性意义。我接受了他们的条件，这次关押于4月12日夜结束。

果然，如我所想，耿和着急满嘴起泡。我后来在北京一家私企找了一份工作，我每天有三辆车十二人跟着我上下班。我上楼上班，那些秘密警察就在一楼大厅外面盯守。我试着与外界建立联系，但很快被他们发现；据之可以断定，在我办公室外的大厅里，至少有一到两人假扮员工身分的秘密警察。但只要能出来工作，就一定能设法与外界的朋友建立起联系，因为正有不少人也在不惜力量地找我。例如：有一次，我一进电梯就有两位上访人员（女士）在电梯里等我，我记得其中有一位好像是四川的一位教师，她们说已找了我很久，并观察了我每天的出行规律，得出了在电梯里找我最保险的结论，并问有什么忙需要她们帮；这也就是那封「致美国会公开信」得以面世背景。

然而，我一直怀疑公司予我的四十八万元年薪有中共背后做手脚，有一次公司老板与我聊天时说了一句话，更增加了我的怀疑，他说：「你在我这里我也不吃亏，没有人敢找我们的麻烦，而且你还能给我们处理不少法律事务。」可惜这次谈话后十几天我又被绑架，再没有机会和他澄清这个问题。此外，我认为若不是他们限制，我年薪一百万也并非梦话。2003年，河北曲阳曾有一位律师找我，他让我帮他写一篇「代理词」，愿付酬两万元。虽然我没有接他这单活，但这给

了我一个启示，当我不能做律师时，我可以专门向全国同行提供这方面的服务。但中共当局坚决阻挠，绝不同意我与任何律师个人或律师业务保持联系，用他们的荒唐说法是：我一见不公平的事就容易发飙冲动。而因为写了「致美国会公开信」，终于与中共黑暗势力的冲突再次公开化。

十、酷刑过程留下的终身纪念

2007年9月21日晚八点钟左右，因此前王胖子通知说于泓源要找我谈话，结果对我实施暴力绑架，并于当夜至10月12日期间对我施行了邪恶当量及暴力当量都足够可观的酷刑。

这次绑架是在室外实施的，室外绑架的程序略与室内不同，先是扑上来在你的后颈部猛击一肘，在你倒地的一瞬间，立即会有一人扑上来骑到你的背上，用一只胳膊迅速勒住你的脖子，另有一人会扑过来解下你的裤带，然后踩住你的后背，以皮带当绞继绑住你的手，而前面则会有一人迅速将很厚的黑头套套在你头上，一应程序完成后会架起你疾步跑向等在旁边的车。只是每次绑架后在车上的那个过程实在难受得可以：上了车，不管路程有多远，他们从不肯有一丝地把你看成一个人来对待，左右各一人压住你的背，使你的头压低至两腿中间，因为前面没有任何支撑，那种难受真是无以言说。有时路上要颠簸几个小时，加之黑头套太厚致严重缺氧，每次都是浑身大汗类似蒸洗桑拿，一般会在一个多小时后半身即已全然麻木。

第一次这种过程中，下半身全然麻木时我还暗自庆幸，觉得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使得下半身不再有痛苦，但很快我就为此尝到了苦头。因为到了目的地，我的下半身全然不听我的调度——没有了感觉。他们硬说我要赖不愿意下车，每次必临到一顿暴打，而我的嘴上又绷着胶带无法申辩。即便能申辩，人的语言、人间的理在我们中间不起任何作用，人性在那样的过程中是没有一点点力量的，不会有任何人会在乎人性。

从2007年9月21日迄今，我经历了三次酷刑（不含北京看守所的坐特制铁椅）。而2007年9月21日至10月12日（时间记得不一定确切）这次酷刑，在这三次酷刑中，就过程而言颇有标本意义，因此，我想把记录那次酷刑的文字（即〈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收入本书中。至于其他两次酷刑，将在后面的文字中只做相关过程的记述，而不再详述。

事实上，这次长达二十多天的酷刑经历，实在是可以单独写出一本书来，但这不是我的追求。第一次酷刑的开始，确实是有些恐惧，那种凶残、那种冷酷的无底线，使人持续地震惊不已。这是一个自称「政府」的一群人在干这样的事，不身临这种场面，绝不敢相信他们会如此地自暴自弃，对一个和平公民施以如此野蛮的暴行！而且，每次施行酷刑，他们都会包下整个一座宾馆，出动一长串车，一大群人穿梭来往，花钱的气魄与施暴一样的是无遮无拦。这些钱都是由纳税人消化，这是怎样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反动现状？！

在这次的酷刑过程中留下一些终身忘不掉的纪念，他们并不是能靠着刻意的意志即可屏蔽得了的东西……。诸如，在那次酷刑后的四年时间里，不论我走到哪里，在什么时间上床，只要一熄灯，那些酷刑画面百分之百会出现在脑海中，他从不是自觉的，却从不例外。另外，我常听说英雄人物在面对酷刑时是如何地坚强，如何地一声不吭，我可以断定这是虚假的、不可能的。2010年4月28日的酷刑过程，我的惨叫声可能让旁人听得毛骨悚然。我不清楚那栋建筑是什么样的结构，但敢肯定，即便五、六层楼以上也可以听得清清楚楚，而那种我自己发出的声音是我此前从未听到过的，他与自觉无关，更不是能够控制得了的。

我在三次酷刑经历中，都曾刻意去体验过一些过程，得出的结论是：与个人的意志无关。例如，一般在酷刑进行到第三天时，我体验到，人始终能听到一种呻吟声，无疑那是我自己发出的呻吟声。在第二次、第三次酷刑时，我试图控制过这种在旁人听来是呻吟的声音，结果徒劳。你能感到身上的每一个毛细孔都在发出呻吟，却又像并不是任何一个毛细孔在具体呻吟，那时你真的就像是一个旁人。那种疼痛感觉也是有类似的效果，你感到没有一处不在疼痛，却又实在不知他具体在哪里疼痛。

十一、杀人一千，折己八百

2007年9月21日夜开始的酷刑不知进行了多长时间，好像是一夜一天的时间，他们在黑夜里又玩了一次神经战，先前的过程很神秘：进来些陌生面孔穿梭往来，一会与这个耳语，一会给那个招手，故意营造着极神秘的气氛。我这时已实在疲劳得可以，坐尚且困难，而长时间得不到休息，一天只给一碗冰冷的苞谷面糊糊，而精神对生理能力的支持实在也无法做到无限或无条件。到那天夜里，出现了不能自持的精神委顿，终于艰于起坐，我一丝不挂地被两个人架在一个没

有靠背的硬面凳子上，那两人就站在我身后，其中一人抓着头发扼使我的脸朝上与天花板平行。终于又被人架了起来，恍惚中我觉得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却又好像一切都在围绕着我交涉。

刚被架起来，就听到有人说：「妈的X，丫的低头。」

好像觉得这是冲我骂的，可这抬头或者低头，这终于不再是我的事，架着我的人立即将我的头压下去，我的腰被压至小于九十度，脸又开始与地面平行。

「都就绪了，押上车。」刚才那骂人的声音又道。

前面出现两只脚，一个黑头套套在了我的头上，我被两人压着弯腰前行。

猛地听到：「跑步，别让丫的磨磨蹭蹭。」

终于又跑了起来，我觉得，押着我跑步的人也得弯着腰跑，我脑子里突然想到一个词：「杀人一千，折己八百。」而这念头还好一阵子挥之不去。终于，在漆黑的世界里，我听到有一大阵的车蹦灯在轰鸣，那大阵势一定很可观。我被架上了一辆车，在所有半夜转移的经历中，这次的痛苦最少，因为上了车不一会又犯迷糊，只觉得路上时间很长，还上、下了一次高速路收费口。浑浑噩噩不知过了多久，我又被架下了车。不幸的是我的双腿又没了感觉，又被视为耍赖，跪在地上被一阵狂踢；有幸的是我的双腿没了感觉，但那踢可真够狠，半个月后，我的身上就像煤层一般。终于，我被两人拖着进了一个门，又拖了一阵子进了一个房间。

我被拖进去后有人说：「让丫的蹲在墙根。」

可终于又事与愿违，我的腿已回到了知觉，痛得实在可以，无法蹲，只有被两个人强制压着蹲下。我的头触到了墙，我知道我是面对墙，这是这种环境中我一律的待遇，或面墙而蹲或面墙而跪，他们一定能实现了这点意志的。我被人压着蹲在地上，不知过多久，我被拖着调转了头，被压着跪在地上。

「给丫的套去了。」

有人一把抓掉了黑头套，我的前面不远处放了两张桌子，桌子后面一排坐了四个人，正是专门负责对我施暴的那几个人，全部盯着我，一言不发，桌子上放了个硬质纸盒，里面放着三根电击器，我清楚他们又要开始「工作」了……

十二、美觀背后的凶殘和惡

对我施暴的四个人中，有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实在是令人哀伤，他的凶残

及他凶残的主动都令我惊异，与他俊秀的面容形成太令人惊悚的反差，他带着一副很秀气的眼镜看上去像个大学生。他要不是在那种场合，坐在那里即可滋养异性的审美情趣，真能给人一种静的、无声的美好。那段时间，我常看着他遐思，人真是复杂，一种美好和一种邪恶可以如此被同一个人拥有，且从他那里看不出任何冲突。我有时幻想着他能是一个有审美能力的人，他若镜视自己后，应该能增加些他心里对美的认识和信念，或许美感能多少柔化他的人性，在他的生命里培蓄并生长起美，而生成起明亮的心理，进而生成起人性的善，我甚至有过与他谈谈的冲动，可他的美好仅止于外表。

有一天，是星期天，他可能要出去，他换了一身黑西服，皮鞋锃光亮闪，头上饰了亮黑的润发物，一进门，使人眼睛豁亮，他这一身全盘西化，加上他的面容、眼睛，三样一体，动、静中都显出了美的和谐与和谐了的美。我就在想，他若站在那个公共汽车站，在静中等候，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那美靓人相的背后包裹着凶残和恶。我一直替他哀伤，我从未恨过他，只是觉得惋惜，年纪轻轻干着这样糟践人性的工作。他若是那个有审美能力的人，那反而是个大不幸，可以肯定他是个俗主儿。捌飭得「全盘西化」的那一次，他临走时几拳打得我眼睛、嘴里流了不少血，眼睛十几天后才能看清东西。第二天他一见我劈头一句：「眼睛怎么伤的？」

2010年4月28日至5月1日，上次对我施加酷刑的原班人员再次执行了于泓源下达的酷刑指令，但其中没有了他，然而我仍能回忆起他。一个年轻人，人生道路尚长，对于他人的感受不再能产生人当有的感情联系，这实在是他的一种不幸。我真侥幸期望他是由于产生了些许人性的自觉而去弃了这种「工作」，而不是正在别一个酷刑场所劬劳。人生当有一个具体的精神完善目标，否则，就成了一个完全的平面人，那是怎样的一种无趣！

十三、官帑彷彿直比黄土般广多

这次酷刑于泓源们是默认了目标的，即彻底将我压服，「成为利益共同体」。二十多天里，折冲计算都在他们单方面进行。

我从不像外界赞助的那么英雄，却也不会「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多年来，在与中共黑暗势力办理的交涉过程中，在技术性环节上我一直在打「太极」；在为，但不力为。有粗有细，粗的方面可有摆幅，

细的方面，纵驱千军万马压逼亦不可退让半步。只要我的生理躯壳还能给精神以些许支持，就会有一个邪恶势力必不能撼动的障碍站立着，这是十年来的无数次交涉示教了当局的。

当局有时在技术环节上会产生一种愚蠢的错觉，觉得我有时是软绵绵的没有赫然的棱角，却没有看清多年来我是在软绵绵中坚守着一个不可破毁的硬底线。外界无法凭着个人丰富的想象力，来将我当与当局十年零距离「厮守」时情况的复杂性弄清楚。

例如，这些年来，我被裹挟着做了无数次「旅囚」行，每次都是在绑架后的秘密囚禁结束时，而这种旅游只是为了犒赏那群看管了我许久的秘密警察的功劳。这群人常年负责对我的看管，带着我这个移动的目标，打着我的名号花钱，那种花钱的气概叫人惊心动魄，仿佛那官帑直比黄土般广多，而且是全以我的名义。每到一地，都要入住最好的酒店，食最上好的酒馐，餍足了肥甘后扑入都市夜生活，而留一人看住我。而我身上常无分文，客观上造成我花他们钱的局面。

例如2009年6月28日，一般很难下泪的四弟看见我这时候仍穿着冬季的衣服竟大哭；我实在不愿让我的亲人看见这种令他们痛心不已的局面，但这种过程中我实在无能为力，因为他们绑架我时是冬季，家人看见的究竟只是一时，而我身上一直就穿着绑架时穿着的冬装。到了乌鲁木齐，我实在不愿让我的岳父母看到我仍穿着冬装，就只好用他们的钱买了一套夏装，这钱迄今没有机会还他们。夏天着冬装还实在不算最难受的，而冬天着夏装才实在难熬得可以，这样的经历这几年屡屡临到我。我亲眼看到过，又一次我实在燥热难耐，让他们掏钱八十元买了一件T恤，结果他们一下买了八件（跟踪的有七人）！毫无疑问，这是记在我头上的。

还有些环节在这里边是不能说的，不愿伤害他们中间的一些具体的个人。玩乐飧食，纵情恣肆，挥霍官帑，气魄雄大，真的不堪以言，你不能从他们那里看见一丝丝与自己纳税人的感情联系的自觉。常觉得这种现状的维持，既是维持着一部分人人性的堕毁，也维持着一个民族的痛与病态！

十四、黑头套、粗铁镣的厚和重

中共黑恶势力有着许多外人看不清、看不透的东西，表面看上去，他在许多环节上与文明体制的做法并无二致。例如，黑头套的功能，他是缘着司法文明及

司法技术无障碍运作的产物，他的技术功能是保护嫌疑人、被告人与罪犯，在公共视线中的人格尊严和个体对隐私的顾忌心理，以及在刑事追诉过程的保密需要；而在中共政法干部那里，他的功能则变异成纯粹地整人：一则，在形式上，他不考虑你视线的功能，不留眼孔，而且很厚，常使人憋屈难忍；二则，他们在押解你的全程中，在专车里、在黑夜里、在卫生间里，甚至去沙雅监狱的监舍楼道里都给你套上黑头套。甚至有时，他们嫌那本已足够厚的黑头套太薄，他们干脆用一件保暖内衣套在你头上。有一次，从河北至北京，几个小时下来，憋得人脸肿了好几天。

我们从美军押运「基地组织」成员的画面上看，那脚镜的粗度不及我们日常用的筷子粗。脚镜的功能就是一个纯约束功能。不知有多少中国人面对中共政权使用的脚镜做过人道的思考？相当长的时间里，我自己就属于这麻木大阵的一员，直到后来我自己戴上了那原始而气魄十足脚镜时，我才感到了不堪言状的苦楚。我在北京戴的铁镜比新疆的轻三分之一，但仍然痛苦得可观。在路途转押时，那实在叫人痛苦难耐，每动一步，脚踝上下实在痛得可以。2008年「两会」，全国木偶大聚会期间，我在延安「旅囚」，看到延安杨家岭门前的大铜牌上写着一段当局标榜历史伟绩的话，这段话说杨家岭上下几处院落原系国民党的一个中将花了六百个大洋购置而建，「后被我党没收」。我后来给他们写了一段颇辛辣的批评文字，其中提到：

这个地球上石头都在进化，而变化独与你们无关。

由于你们长期拒绝、仇视批评，致你们丧失了最基本的是非判断能力，而这种

基本判断能力是人所以为人的标志。

中国人的祖先早在西周时即有「和实生物，同则不济」的哲思，你们几千万的党员规模，聚集的只是愚昧的规模耳。

黑头套、粗铁镜的「厚」和「重」，折射出这个政权组成人员在人性、人权及人类基本感情方面的薄和轻。不当有斤两的地方，他们厚重得使人绝望，而当有斤两的地方，他们确是虚玄缥缈。尤其这种铁镜，他本身就是原始肉刑的一类。

十五、这是咱系统能办得了的小事

2008年，中共当局声称要不惜一切代价改变我，目标即是于泓源多次提到的

三个利益层面，即：利益共同体、利益攸关者和利益对立者。

「我们不可能永远悬而不决。」于有一次在谈话中肃然以道。

「我这里从来不存在悬而不决的问题，悬只在你们那里。只要我一家还能有基本的生活空间，孩子们也还能正常地去上学，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我愿意为他们苟活着。你若非要改变现状，而朝着你期望的方向的改变是没有零以外的概率的。我清楚你在想什么。」我也接口肃然道（此前于多次向我提到过，说我若完全依循着他的设计，他的官会越做越大，到时我们会拥有很多资源，「我们合作吧」）。

他们提出具体的几样利益：一是要把大哥家的一个儿子安排在公安系统；二是给我们批一个煤矿（那时段我的表弟想在北京活动批受煤矿开发，引起给批个煤矿之说）；三是孩子在北京上最好的学校，将来工作安排全由政府操办，可立即把全家户口转至北京（于曾不止一次说过「这是咱系统能办得了的小事」）。但前提是接受孙获的说法，叫「填个表改变身分」。孙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往往会说一句「愿做官的话，警衔远在我和老于之上」，且死盯着我的眼睛。

我每次也提醒他：「共产党政权在过去六十多年里，作为一个庞大而现实的存在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组成他庞大系统的无疑都是中国人。作为个体，我不认为人人都无耻，个个都不光彩，但那里面绝不能有我，至少已经成了今天的我。」

然而，由于于泓源个人邀功之激情难抑，终于逼我在全有或全无中做出选择，而拦在我面前最现实的问题即是女儿上高中的问题。

（我曾在与周永康派的人谈话中说过我自己是十分能吃，十二分能睡，这是真的。那些对我施加酷刑者曾见过我这「十二分能睡」的境界：精疲力衰的打手们喘息之间，我鼾声骤起，这也是真的。但昨夜我失眠了，就缘着昨日我得了一个确实的消息，刘霞正处在无底线的被迫害中，刘霞还在人祸里受苦。刘霞我没有见过，她是谁的夫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实在在人祸中受苦，这是我数年来仅有的一次辗转反侧而终于不能寐的纪录。听说刘霞头发全刮光了，不管谁刮的，结果是刘霞光着头。纵使她自己刮光的，那是她仍在抗争着的证据。今天，我在凌晨两点十四分起床，这也是很久以来的第一次。起来做什么？终于于刘霞的苦难处境无益；但我还是忖度着为刘霞的无辜蒙难做点什么，而终于又不能做什么。因为我目下处境绝不比刘霞好在哪一阶，可究竟又无能力对她的苦难无动于衷。外面，迫害刘霞的那些人们的同伙正犬视着我进出的门。终于就剩了写下这

些字一途。在乎刘霞的苦难是我作为人的正当情感反应，并属于我究竟还是人的证据。刘霞们无辜被迫害，我们对此有痛，有愤怒，并有着起自内心的谴责和抗议。我声援她，谴责对她的野蛮的、有损人类名誉的暴行。这既是我们的感情，又是我们的立场。爬起来，写下这些文字，纾解一下一个庸常人的胸淤。）

两个孩子必须能够正常上学，这是我终于愿意苟安下来的理由，也是我的最后底线。然而，周永康及其打手于泓源、孙荻们却认为这是终于可以迫我俯伏在地的软肋。他们曾公开在我跟前调侃过：

「老高有着他不同阶段的『七寸』，过去是老太太（指我母亲），现在是俩孩子。」

他们利用这个被每一个家庭都当成的关键时期，不断施以一些极其愚昧的举动，企图据此实现在他们的美好。在这个问题上，我多次强调过：如果你们不从中作梗，我有条件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虽然其中也有许多具体的困难（在北京有孩子上学的父母都知这苦的沉重，这是黑暗政治制造出的一个大苦）。他们提出：不许我自己解决，是「绝不」允许我自己解决，只能由政府来解决。说要将我的问题打包解决，如果我愿意的话，他们会下文件专门解决，给俩孩子安排最好的学校。说白了，还是逼我入伙，成为「利益共同体」。我心里清楚，凭着周永康、于泓源、孙荻等人的智商（我几年来和他们零距离相处），他们会死攥住这条绳子不放，所以我们之间的再次冲突也只遗时间了。

他们多次来讲：「老高，政府的正式文件都准备好了，你们附近的最好中学是十七中学，只要你一句话，不光他们的上学，今后的工作安排政府都全包。」

十六、一大批善良的眼睛忧虑着

2008年7月28日，我们全家被押上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我头上悬着的剑掉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为了不使耿和担心，当局关于孩子上学问题上的舞剑蠢动我从不向耿和提及，知道终于是瞒不住的，但只是觉得能让她少知道一天亦可。头上悬着的剑终于还是无可挽回地落下：格格上不了学。孩子上学的问题岂能小觑，更哪堪儿戏？女儿以各种方式向我们抗议，孩子究竟没有错，上学在父母面前也是她的必当保有的基本权利。她们娘仨已于8月底回到北京，而我还是被滞阻在乌鲁木齐。孩子上不了学，对方已越过了最后的底线，我立即动身回程北京，好在新疆警方巴不得我早日离去（每次回到新疆，当地警察看管我时，竟

公开讲：你逃离新疆我们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我们还会派人悄悄盯着你，只能回北京，不能逃出境）。

回到北京又能如何？中共黑暗势力是完全游离在法律之外的。一个文明的社会里，独立的司法救济途径，是为所有寻求他救助者准备的安全可靠的救济力量，但在野蛮的政治下，司法却沦为任凭秘密警察搏捏的玩物。我突破所有的「不准」，寻找能尽快解决孩子上学的途径。为了不愿与他们过于激烈地冲突，我避开了「不准孩子在北京上学」这一途，忍辱在大批秘密警察的跟踪下，与陕北绥德县、河北邢台市、北京顺义、山东烟台外国语学校联系（这是孩子一个人去的）。而到河北邢台市碰壁后，实在没有了办法，就在邢台市打电话向朋友求救，滕彪博士当时是我求救的伟人之一。

结果，孙荻也打来电话，说：「不要去外地折腾了，没有用的，回来吧，还是我们帮你解决吧，而且是一定能够解决的。」

到外地寻梦的期望破灭后，孩子对我们的不满升格，当局对我的不满也在升格。令我们没齿难忘的是，对格格上不了学的事还有一大批善良的眼睛忧虑着，这些善良眼睛从来就在我们的周围。

有一天夜里，我外出到藏医院附近打公用电话（我们的电话全被控制，打求助电话又刺激黑恶势力已脆弱不堪的神经），结果一辆摩托车突然停靠在我跟前，我认出其中一位是我曾经帮过的北京市民（暂不具名），他们用极快的语速说格格不让上学的事他们都知道，大家正在全力想办法，许多「法轮功」学员正在运作准备接格格到境外去上学，让我们准备好随时走，并给我一个电话。等跟踪人员反应过来时，摩托车已绝尘消逝。我长舒一口气：这岂非神意？当即决定罢止一切奔突，相信他们的帮助会是具体而实在的。

作为一种默契，我后来经常晚饭后下楼溜达，而大批跟踪人员中，从一开始、死心塌地的坏种只是极少数，而其余大多数只是把这当成一个技术活或者是个挣饭钱的活，更有极少数人则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一家。尽管当局下死令贴身跟踪，可实实在在贴身跟踪的始终只是其中那几个人。他们上班的人员配置规律我了如指掌，什么时候出去、有多少空间可利用，我基本心里有数。

有一次，我骑车去幼儿园接天昱，几名跟踪人员也骑车而随。到了幼儿园门口，一个小伙子利用门口大批家长的身影掩护走过来给我说了一句话：

「老高，我们的人对你是尊敬的，只要是咱们哥儿几个的班，我们的跟踪是拉开距离的，但这是不符合上面要求的。」

耿和她们娘仨逃离中国时，就有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功劳。有人曾实实在在地给我当面说过：

「大姐她们娘仨走之前我就知道了。」

终于，有一个消息达到我，说格格可以走了。在看不见的力量的帮助下，格格迅速甩掉跟踪者秘密离开北京赶到指定地点。结果，第二天夜里孩子又回到家里。问明就里，因是用一个「法轮功」学员家的同龄孩子做身分掩护，会给那孩子及其亲人招致毁灭性的灾难，她因此跑了回来。这些善良的不曾相识的人愿冒一切危险帮助我们，却是我们不能接受的。结果，这一途出国努力终辍。

十七、耿和娘仨成功逃离

终于，我们又于2009年1月7日获得了一可靠信息，让我们于1月9日上北京至昆明的客列，一路上会有人指引她们娘仨前行。终于历经了些周章后，她们娘仨成功逃离中国大陆，成了「盛世中国」的乱离人。

2009年1月9日早晨，按此前绸缪，我要离开家引开楼下的「眼睛」。全家人拥抱在一起做最后的告别。除天昱外，全部都默默地流着眼泪，然而格格却哭出了声，继而是耿和。「悲莫悲兮生离，痛莫痛兮死别」，悠悠岁月，百年身世，唯有此情苦。苦，谁最苦？是我的妻子耿和。她们娘仨离家，大的懵懂，小的不懂，去离故土而又亲情不能别！

我常不忍想象耿和最后离别那个家时胸中的那种痛。我不仅不能送别她们，而且她们还得去一个很大的家俱卖场，设法甩掉跟踪者后从地下停车场乘车奔向火车站（这是策画好的细节。但实际上如何摆脱跟踪而成功逃离的过程，我迄今不清楚，也不忍心问耿和），我无法想象她是怎样地带着至苦的心与这一切周旋的。而真正密集与苦难交涉的时间则更在后面等着她。她在逃离中国边境时、在泰国时，以及一直至美国初期，遭遇的苦难多不胜数，可她从不给我讲，仅女儿偷偷地给我讲过一点，害怕我知道了她受的那些苦影响我的心情。

她们的逃离，境内所有的作用是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轮功」学员筹谋和发挥的；离境后，由于需要更具规模的说明力量，故而由「基督教对华援助协会」全面接受，该协会负责人在第一时间飞抵泰国，始实施具体的帮助运作。

实际上，对于耿和她们娘仨在外面的困难遭遇，中共黑恶势力也不时给我讲一些，意在动摇我的坚持。于泓源（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又升官了。作为黑

恶势力在北京最凶残的打手之一，他被拔擢当了管律师的司法局局长，我对此没有一丝丝惊讶。那种凶残恶辣及冷酷正是中共恶势力在中国生命得以残存的理由和最后的保障，在凶残打压异见者的问题上，周永康或者是习近平者流是没有区别的）至少有过两次或多次给我讲过她们娘仨去外面的困难遭遇。例如，2010年底他来到军队的秘密囚禁地找我谈话，用他的说法是「再给你一次活路的机会」。

于告诉我：「据军方传来的确切情报，耿和她们在外面的日子很不好过，大子儿（指钱）没有收到几文，而且已搬了至少三次家了。其实，我们都有自己的情报收集管道，你老婆跟前就有我的人，我不怕你知道。机会不会无限期地等着你，执迷不悟死路一条。只要共产党还在，活着走出这个门？你想都别想。真他妈贱！要钱，我们给，大手笔，偏要跑他妈外面去收些小子儿（指我们出国是为了到外国去收敛钱财）。」

还有一次，于又找我谈话：「再给你一次机会，让耿和她们娘仨到中国驻美使馆去，到时我们出一笔大的安家费，我亲自到外面去接人。」

又说：「她们都快困死啦，不要再造孽啦，让老婆、孩子回来吧。」

终于，耿和她们娘仨还是成功地逃离。当天下午我回到家里，一开门，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袭来，我坐在沙发上一连数小时纹丝未动，受领着那种凄苦。当天夜里我没有吃饭，把她们娘仨各自的拖鞋摆放在往常摆放的位置上。我整夜不愿进到卧室，在沙发上坐了一晚上。此后几天，当局负责盯踪她们娘仨的王胖子每天打电话问她们娘仨怎么几天不见了，是不是有什么名堂。我说家里准备搞装修，她们在家里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后来，追问得紧了，我说：「其实，我前几天是骗了你们的，那天她们甩掉跟踪实际上是去外地玩去了，因为刚好有一个战友一家要外出玩，她们也就去了。」

待她们娘仨终于到了泰国后，我清楚自己很快又要被抓了，我于第二天的凌晨四点便驱车赶回了老家。到了老家继续骗他们说她们马上就会回到陕北来同我一起过年，但终于他们不再相信。

第三章

2009年2月3日的绑架

一、一群未脱离野蛮的生物人

2009年2月3日前，我回到佳县老家后，北京方面将对我的看管任务交给当地公安部门执行。当地负责看管我的程序是，每天按规定在不同的时间里在他们认为方便的地方拍些我的照片。即每天我一露面，有关负责拍照的人就会抓紧抢着拍照。据可靠消息，他们每天须在不同的几个指定时间里向陕西公安厅汇报我的行踪，并提供相应的当日拍的照片。几天以后，由于他们发现耿和她们娘仨并没有如我所说来到陕北，应当是向北京方面进行了汇报，2月3日晚九点至十点钟，榆林市公安方面及佳县公安方面一大群警察突然闯进我住的窑洞，进来就问耿和和孩子在什么地方。

我说：「这纯粹是私权利，关涉当局什么事？」

结果，佳县公安局人员大声问我四弟：「正义，你嫂子和孩子在哪里?！」

四弟说到新疆去了。他们中间几个人走了出去，显然是在向北京方面进行汇报。中国黑恶势力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是在作恶方面表现出令人咋舌的高效，不出五分钟即扑进来，说根据北京方面的指令，「现在对你实施抓捕」。我们一家人都已经睡下，我被抓走后，大哥、四弟拚命地跟在后面追赶，一直追到下面公路上仍跟在车后奔跑，他们在绝望中看到几辆警车远去。

到了县城，一群警察将我押至一窑洞招待所里，然后，那一群警察开始打牌，另一群开始看电视。中共警察的生活方式，我常思忖，你会觉得他们不是一群社会人，只是一群未脱离野蛮的生物人。仿佛这人类文明进步独与他们无涉。半个小时以后，窑洞里烟雾弥漫至「但闻人语，终不见人」的境界。十几平方米的窑洞里，八、九个人吸烟。的确，看见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我就苦愁。我常觉得他们群体生活在一起，只是在相互苦害对方——人人吸烟，人大声喧哗，无论杯子脏得多么不堪人目，端起来仰着脖子就喝，而且是一群人共同一个杯子。上完洗手间至少有一半人不冲水，这是我最头痛的，但在这方面创下最大奇迹的

是新疆的警察。对我而言，噪音不大能影响我的睡觉，但在满房间都是被烟雾填满的环境里，我只好用衣服蒙着头睡。然而，这种蒙着头睡觉的待遇也只有在佳县才可享受，在北京和在部队及在新疆的关押中是绝不允许的。

二、你给我们制造了一步死棋

天不亮，我被人推醒，孙荻、张雪等五名秘密警察赶到。

究竟是来自首善之区北京的黑帮悍将，一来就表现出不一样的素质：进来就将我压倒床上，两个人从头到脚捏拍了一遍，然后把我给架起站着，强制脱了我的鞋和袜子让我站在冰凉的地上，煞有介事地与那一目了然的鞋、袜子办理起了交涉，反复地勘验、检查，然后压我坐下，将一件足够厚的保暖内衣当头套套到了我的头上。

孙荻开始跟我谈话：「老高，你把耿和她们娘仨送出国，政府的棋局完全成了一目了然的死棋了。你给我们制造了一步死棋，你逼我们再次出手，咱回北京再慢慢解决问题。」

「置死地而后生，在孩子上学的问题上，我此前五个月里不也身置死局吗？」我回答他。

后来我才得知，就是与孙谈话时，另一帮人赶到大哥家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大哥家被翻得鸡飞蛋打。而大哥和四弟则在天不亮时即赶到县城到处找我，终于劳而无得。至天亮，两人找到了公安部门。佳县乃蕞尔小城，是个熟人的社会，兄弟俩找到了公安部门的熟人，祈愿能见上我一面。虽终于为孙荻拒绝，究竟还是知道了我被关押的处所。大门里不让进，兄弟俩就一直守在大门外，巴望着能在押离时透过车窗再看上我一眼。但他们不能知道的是，押运我的车从来都是用的深墨色玻璃窗，且在车里挂覆着黑帘，而我会被套上黑头套。后来，听佳县公安上的人讲，当押运我的车离开时，大哥、四弟各守在大门的一面，终于绝望得像孩子一样大哭。

汽车不知开了多长时间，到了一处高速路服务点，我的头套被取掉，歇在那里，他们开始吃东西，一吃完又上了路。车至河北界，孙荻又将保暖内衣给我套在头上，而我在北京的秘密关押地从来都是在北京山区，穿越北京城后仍需两到三小时，由于保暖内衣太厚致严重缺氧，五、六个小时里，我的头痛难耐。由于我的头夹在两膝之间，感到双眼向外暴胀迸挤，我规律性地屏蔽了思维，但那生

理痛苦也实在难熬得可以。每次遭遇绑架，在运往囚禁地过程的煎熬，足算得上是一场不小的灾难。我必告诫自己：老兔子（我属兔子，孩子们给我起的绰号「高智兔」。大部分情形下，姐弟俩就叫我「高老兔」），又一个困难的过程实在已开始，既是个过程，就会有结束的时候，你当感谢神，感恩他给你的是个困难过程而不是灾难结果。

三、蓬莱翁的高论

终于到了秘密囚禁地，又是规律性的下半身麻木的不听调度，但这次他们没有因此殴打我。我被人架着，我感觉到应该是上了有三层楼，然后又被架入一个后来关押了两个多月的房间。我被人压着双肩坐在凳子上，然后静静地等待着不确定的下一回合。但这时由于直起了腰，呼吸感受已比在车上好了许多。可能是缺氧所致，发呕得翻江倾海，我力抑之，使自己保持了表面的平静。在死寂的静默里，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左右，听到有人开门进来，然后是拉桌、凳的声音，大略是归置就绪，又复归于死寂。

「把头套取了。」终于听到了人话。

我的头套被取了下来，眼睛颇模糊，而手仍被缙继拘缚，不能对眼睛以赞助。但面前的人我已认了出来，就在刚刚的黑暗死寂中，人马已完全换成了另一群人，为首的正是第一次揭露酷刑的文字里提到的那位「蓬莱翁」。

他们的酷刑流转程序大致上是：周永康只做方向性指示，具体的决策者是于泓源，而酷刑的技术策画人则是由孙获、张雪、「蓬莱翁」，主力打手就是上次文字中提到的那位王姓处长，而酷刑现场还有两个幕后指挥者就是这「蓬莱翁」和孙获。孙获在具体的酷刑阶段是从不露面的，而这「蓬莱翁」则在酷刑的间隙，打手需要休息的时候出面审讯我。这是我经过了几次苦楚后得来的经验。

我的眼睛渐渐恢复了能力，看清了这「蓬莱翁」正笑眯眯地翘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他的背后摆了一张桌子，腋下挟着一本案卷，正盯着我。我扫视了一眼房间，有六、七平方米左右大小，地上铺着很厚的毯，我座位的左右备置单人床一张，东向墙上有一直径约为0.8或0.6米的圆形窗，窗上封堵了块厚约十二公分左右的沙发垫，显然这是临时拼上去的，是专门为我添置的待遇。那小房间当是别墅顶端的一个小角房，其功能或以储物，或是佣人居室类，因为房顶呈尖形而两端却很低矮。

我也看着「蓬莱翁」，他开始了他的高论：「英雄，大英雄，奥巴马什么时间来接你呀？」

见我不回答，他又开了腔：「大英雄，怎么不说话呀？据我们的情报，你的美国主子肯定会来接你的，开着所有的航母。」他的话一停，房子里又死寂复出。

「美国人他妈的真奇怪，怎么尽喜欢汉奸、卖国的东西？老高，你多少看过点书，历史上，汉奸、卖国的东西有几个有过好下场？当汉奸、卖国贼是不是上瘾啦？要不然怎么打都打不醒？我告诉你，党和政府在捍卫国家最高利益的问题上是从来没有含糊过的，手段也舍得用，对汉奸、卖国贼是绝不会手软。要是在美国，你早死了多少遍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于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人，几乎都是秘密做掉（指杀死），这方面的电影、电视你难道没有看过？那可是美国人自己拍出来的，哪能有假？」

他又声色俱厉地说了一阵。

「实在愚昧得可观，一个典型的专制动物。」我心里默念着。

我依崇美国价值，敬爱美国人民，这与汉奸、卖国贼不大能发生交涉。民主个人主义，保障人类几乎所有自由的美国价值，时至今日，十三亿中国人仍只有巴望依崇的份，当局在这方面已是足够的无耻，还常一脸沉重地虚蹈道德高步，手舞汉奸、卖国贼大棒，丧失了基本的廉耻本能，成了全人类唾骂的对象而不肯自知。失耻丧德，人类迄今空前绝后，这是一个民族的大不幸。

但我终于还是没有开口说话。

四、大眼睛的威胁

过了一会，又进来一位「大眼睛」（他们从不介绍姓名、身分，我每凭第一次直观视觉赐其以绰号）。这是我与他的第二次见面，这家伙颇具人的平面优势，但就德性而言，可谓「金玉其表，败絮其中」，有着一一种无底线的卑鄙龌龊。他单独与我谈话，照着规定是不允许的，足见他被于泓源信任的程度。谈话实际上只是他们谈而我被迫地听。「大眼睛」一来，「蓬莱翁」便起身离去。他便眉飞色舞地开始拿我的两个孩子威胁我，说别以为逃出去就万事大吉了。

「你也太小瞧共产党了。你不管逃到哪里，我们照样能找你事，说明了，没有我们的拳头够不到的地方。在国内，你们在我们手心上；在美国，她们同样在我们的手心上。你那俩孩子在国内，我们的手段只是小打小闹，说白了也就只是

恶心恶心你们；你别以为到了美国就安全了，老高我明确地提醒你，你的两个孩子在美国能不能安全的事，我们很快就会让你知道我们的手段。我可以再给你明确一步，这俩孩子在国内，我们是不会要他们的命的，到了美国，我们不排除进一步的考虑。」（这是大致内容，因为他滔滔不绝一个多小时）

然而，在一个小时里，他谈的中心内容就是他们要伤害我的两个孩子，且实现起来易如翻手，而避免这祸事的唯一途径就是「成为我们或成为我们的朋友」。

看我至终不复一言，他又问：「怎么不说话呀？连儿女都不在乎，就是你们这种人的德性。连儿女都不管的人就不配做人。」

在他一再催促下，我只好回答他：「你们要施行伤害我俩孩子的壮举，我的表态并不是必经程序，听你的口气是易如翻手，也就是说你们不大会需要技术支援。我的确本不打算跟你说什么，不是因为我有何高大，实在是因为你太卑下。其实，你给我喋喋不休讲了半天，如果我的俩孩子活在这世间，与你们政权的美好有碍，除掉他们就是了；而把除掉孩子的事非要事先说与他们的父亲，不管有多高尚的裹饰，究竟还是脱离不了卑鄙一途。」

我的话可能很使他惊异，他竟一脸诧异地盯着我，足有两三分钟。但无论如何，我的新一轮秘密囚禁生涯是实实在在地开始了。

五、吸烟、咳嗽、打喷嚏

我是从2004年的第一次绑架开始接触到中国黑暗势力私设牢狱的关押模式：先是在蒙蔽着你的眼睛的情况下押至他们的私设牢狱，然后开始漫长的压迫性关押。一般情形下，关押的房间低矮而不透风，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一个无靠背的硬质木凳子外，别无一物。你被关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但这狭小的空间却并不完全属于你，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不属于你。你只能坐在一个无靠背的硬凳子上，而且必须按他们要求的坐姿，要不按着他们的要求怎么办。

里面还有两个被关着的人——哨兵或秘密警察，只不过这些哨兵被关的时间比我要短得多。他们一般采用的是所谓的「五包一」，即由五组包看一个「目标」（我在关押期间是不准外泄姓名的，被唤为「目标」），而每组两名哨兵或秘密警察，轮流循环式转换。所以，每个人一天被关在「目标」室的时间是四个小时左右（进到「目标」室两次）。他们在里面的主要任务是保证「目标」的坐姿符合宣布的要求，并制止「目标」打瞌睡或本能地活动腿脚、身体，最主要

的功能实则是心理压迫功能，给你制造一种：关押将是无限期的，而且是很痛苦的，而你却欲死也不能。两个人一左一右站立在你跟前，距离只有七十五公分，而在双方气氛紧张的时期，他们就是紧紧挤挨着你的身体。如果是士兵还稍好一些，而秘密警察的看管是很糟糕的：他们也坐着，一前一后，前面的人两腿与「目标」的两腿呈犬牙交错状，那种状态的设计动机只可以「邪恶」来形容，那看管者的人格尊严也荡然不存。这种看管状态还真能制造些苦楚，最主要的是在那种情形下，双方如此近距离地呼吸是极不卫生的，忘记了对个体人的最基本的尊重。前面的人的呼吸有节奏地吹拂着你的下巴，而后面的人呼吸则让你的后脑勺湿热不堪。

最可怕的是他们不停地吸烟。在北京及新疆，看管者进囚室都可以领到一包香烟，他们好像觉着不抽完这包烟自己吃了大亏似的。有些恶劣人性者，他吸烟时就一口一口地往你脸上吹。你一动，他说你违反规定，给你制造不尽的麻烦。你要上卫生间，他让你喊「报告」。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一脸不高兴地一左一右夹着你上厕所；你坐在马桶上，他们紧挨着你，百分之百地会赶紧点燃一根烟，解一次大手，烟灰落你一身。仅有极个别情形下，一些不大通人性的人坚决不许你在他的班上解大手；我曾就此向有关领导交涉过，得到的回答是：「哨兵有绝对的处置权。」可这人的生命运动规律并不与哨兵进行交涉，这种情形下，人是又痛苦又无助。因为「哨兵有绝对处置权」，他们可以硬暴力制止你。在物理层面上，你永远不能是他们的对手。

最苦的是他们咳嗽、打喷嚏。个别人咳嗽、打喷嚏，那叫「萧洒加气魄」，恣恣肆肆，喷你个满脸。在那种场合里，所有的卑鄙和反人道行为畅行无碍，那里是人性的荒场，所有的卑鄙、恶劣都成了堂而皇之的工作。人，作为一种存在，在那里是得不到应有的承认，人性、人的感情得不到一丝承认。

六、解完大手不冲水者被拔擢

这种对异见人士设计的看管方式，执行得最恶劣、最背弃人道的是在北京。这些年，我在北京、山西、陕西、新疆及武警部队，多次地在这种不挂牌的地狱里被关押，论邪恶当量，绝对要数得上是北京最恶。据说，北京一直在向全国各地推广这种囚禁方式，但究竟各地是赝品，无法保有在北京的那种原汁原味的邪恶。几年来，相比之下，最不恶劣的囚禁竟是在陕北榆林，看管者最起码能与你保有基本的距离，而不像在北京时是专门把侵蚀这种应有的距离作为对你刻意压

迫、搅扰的一部分。在新疆、山西、陕西的秘密囚禁，囚禁室里有卫生间，他们是允许我用的；而北京在这方面的恶劣是你难以想象的，有卫生间他们不让你用，却给你提供一只破旧塑料桶，还常年不许你洗那个桶，用哨兵的话叫「整人绝不留死角」。

那种场所一切都是反常规的，一般生活中电门铃的呼钮安装在外面，而这里却安装在里面，因为看管人员进来后，外面的监控人员就从外面锁上了铁锁，里面看管人员需要解手或遇有紧急情况时按钮呼叫外面的监控人员进来临时替换。

我的这一次在秘密囚禁地关押，就环境而言，其恶劣程度仅次于第二年起的、在北京武警部队关押的二十一个月。相较而言，这次关押是在三楼而非地下室，空气要比地下室稍好一些，尽管其密封如闷罐。最主要的是室内的卫生间也允许用，但也有了另一种常人不能置信的烦恼，即他们至少相近有一半人上完厕所不冲水，在这次秘密囚禁的五个月中，这方面颇成了我挥之不去的烦恼。因为那房间，我二十四小时在里面，我又是个颇爱在卫生方面多些讲究的人，而卫生间又不让你进去打扫，他们更是从不打扫。最让你痛苦不堪的是，有极个别人解完大手后不冲水，这的确使人难以启齿，却又是真真实实的。只有在那霸气十足的气味满溢时，他们才允许我赶紧进去打扫了。在新疆时要稍好一些，即他们一解完手就允许你进去打扫。这不需要他们催，我会立即动手打扫。北京则是不到臭得不堪是绝不允许你去打扫的。那是一些常人本不当有的烦忧。

这次的秘密囚禁，解完大手不冲水的人也就张雪一人。一提起这事，他们其他警察同事就撇嘴。他们中间有一个警察，人也很好，我在他的班上我可以跟他说说话，甚至可以站起来活动活动；也就是从他的班上开始，逐步逐步地在其他人班上也可以站起来活动一下。然而，在张雪及一个姓贾的和自称曾在2006年8月15日后在我家里住了一段时间的一个大个子，他们几个人的班上是不允许活动的；尤其在张雪及姓贾的班上，即便坐姿不合要求也立即制止。

我上面特别提到那位警察，是因为我曾经和他打了个赌。当时，在那里看管我的秘密警察有十几个人，有往地毯上吐痰的，有往地毯上磕烟灰、扔烟蒂的，最恶劣不堪的即是往墙上擤鼻涕、抹鼻屎的，以及上完厕所不冲水的。这位警察是这十多年来我见到过的唯一一位不吸烟的秘密警察，人也很讲究，尤其卫生方面，他对我上面提到的那些现象也很头疼，一提起即蹙额摇头。

一次他跟我聊天，说：「你看问题挺准的，这里面十几个人，你认为谁最可能在一年或两年内能被提拔当领导？」

我脱口回答他是张雪，他笑嘻嘻地看着我，问：「凭什么？」

我说：「若这里面再有一位解完了大手不冲水的人，我就断乎不敢这么肯定地说是他了。按目前共产党拔擢领导干部的一般规律，在这里的这十几个人中，在坏素质方面目前没有任何人可与他匹比。」

他说我说得太极端，我愿就此与他打赌。这个赌终于是我打赢了。

一年以后，于泓源来陕西北部沙漠的一个秘密囚禁地找我谈话时，像以往每次外出必带着张雪一样，这次又带着张雪。

一进囚室，于泓源就介绍说：「小张现在也当领导了，丰台派出所副所长，提拔了半年啦，我舍不得让他走，提拔后继续借调在我身边工作。」

事实上，我与那位警察打赌后不到一个月，张雪已得到重用。

七、洗澡问题的答复

他们将每一个秘密囚禁处称为「点」。与于谈话后没几天，张雪即成了那次囚禁我的点上负责人。他的提拔对我而言实在不算是一件坏事，因为他不再进来具体看管我了，自被指定成点上负责人后，他的那种跋扈实在昂扬得可以。他自己才三十岁出头，而那里有些人员已是五十多岁，他那种颐指气使，真让人替他扼腕。我亲眼见过他呵斥、辱骂他的同事有过两次，一次是在这个点上，一位海军前团级军官，比他大十几岁，因为囚禁室里积的烟实在是太多啦，那位前海军军官偷偷地将门打开不足两公分的一条缝，意在让烟往外跑散一些，竟被他发现，来了就训斥人家。其实，整个楼都被他们包了下来，即便把门全打开了，向外看到的也只能是他们那些秘密警察。那种蛮横的训斥，我作为旁观者都感到窘迫。

他们要求门密封得不透风的目的是给我制造煎迫的氛围，而囚室的空气实在是污浊、闷憋得可以，他们的人不停地在吸烟，包括那位嫌空气太污浊的前海军军官。而每班每人一包免费香烟，则使他们原本不低的吸烟热情大炽。有一位东北籍的公安大学毕业的大个儿，进来一小时竟吸了七支烟，我送其绰号为「七爷」。

在这个点上的囚禁将近三个月（2月4日至4月28日），其中有几样困难的过程颇不能使人很快释怀：一是囚室内二十四小时烟雾缭绕颇不堪其苦；二是头套套头之苦：从老家押回北京，一进河北界即又将保暖内衣套在了头上，五、六个

小时后，我的眼睛、脸部肿胀欲裂崩，在此后的半个月里都不堪其苦；三是路途时间太长，造成两只胳膊肿胀疼痛了半个多月，许多天胳膊竟不能下垂；四是洗澡问题。

起初关押不允许洗澡，多经交涉仍得不到允许，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到了第十八天，来了两位颇有风度的服装「全盘西化」的上级「领导同志」，看上去干练、洒脱，来找我谈话的过程印证了我的第一印象颇准——不到一分钟时间，那种效率差点使人歆羡。

那年纪较轻的一位一脸肃然道：「老高，关于你要洗澡的事，上级领导非常重视，今天专门派我们俩来给你答复，正在逐级上报协调，再绷上一段时间，再绷一绷，啊。」

不是亲身经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抬手拧开水龙头就能实现的一件小事，十八天后，竟专门派了两个人从北京市内赶来做了这样一个极具娱乐性的回复。

八、白菜帮子数日子

另一个令人难忘的困难就是那几个月一律的水煮白菜帮子。我常叹服，那种青色白菜帮子有两个超乎寻常：一是那种菜在菜市场上能捡到却买不到，咬一口，一绺一绺的筋；另一个是那种煮工独到，青帮菜的颜色煮过后竟不发生任何变化。最让人感到苦楚的是，一日两餐煮白菜雷打不动，一口气竟吃了几个月（后来在沙雅这座挂牌地狱，水煮菜一口气竟吃了三年），多次抗议不果。那菜的质量、那菜的煮法，若没有特别交代，在这个地球上，目前欲吃到那样的菜、那样煮的菜还颇不易。

值得一提的是，前述那两位外表干练的几近无可挑剔的干部，到被关押十八天时就洗澡问题回复我，我说「举手即可实现的目标，十八天后竟予这般荒诞的回复」时，其中一位颇惊讶地反问道：

「你怎么知道过了十八天啦？」

我答曰：「你们的人吃了七十二餐饭，我接到了三十六盒煮白菜，据此得知。」他俩面无表情离去。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这是小题大做。不亲身经历，很难理解其中的苦楚，有时竟盼着哪怕能弄上一碗粥喝也足算得上是一次大改善。至少，我是觉得那一律不变的煮白菜的苦楚，绝不亚于囚禁本身所带来的苦。我有时竟馋得「坐卧不宁」

（这是用语的习惯，那里并无坐卧随意的自由），这也是我作为俗常人的一个证据。

九、「坐」成名至实归的老兔子

那次囚禁的另一个著名的苦，即是几个月里一律的坐。一天被迫坐至十八个小时左右，那种苦楚真是绵绵不绝而痛苦不堪，人的生物性的一面是实实在在的，终于无法回避。每日早晨五点半准时被叫醒起来坐定，至夜里十点五十方可上床睡觉。我每天就盼着那一时刻，因为十点五十分刚好是他们进来换班，可他们有些人不能给你以一个人的理解，你一天从早到晚坐着的事实对他们不大能触动，进来后一屁股坐下投入地开始了与游戏机的交涉。他们无法理解我这时的巴望与绝望，因为他们不下达睡觉的指令，你是不能动的，他们可以随时违反规定而你却是绝对不可以。当然，这只是极个别的人，绝大多数监管人员还是通情达理的，一进门即忙不迭地来一句：「老高睡吧，赶紧睡吧。」每到这时，人觉得那种坚持已至极限，一坐十七、八个小时，那种艰于起坐的状况实在无以言述。

在那段时间，我时常想，我在那里每至睡觉前的起坐、行走那种艰难情状，任何一个画面若被我的任何一个亲人看在眼里，他们都会哀伤得昏厥扑地；要说那里有时还有点安慰的话，那就是我的亲人看不见这种艰于起坐及行走的惨状。我常在猫着腰洗漱时，心里跟自己调侃：「老兔子，终于名至实归地成了老兔子了。」

而这种困难的另一个绝对的帮凶即是不准活动。后来，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不是基于人道而是基于「我党」形象。每至晚上，我行走尚须以手撑膝，终于哪天还得释放我，这种形象回家，恐怕对党的形象有碍！后来，终于同意每天上午、下午各许在原地活动十五分钟，只有极个别人班上不允许活动，而有些人的班上则一次活动二十甚至三十分。只要他们低头不语，我就会继续活动，这是在这种环境里尽一切可能自救自保的冲动使然。运动，对于经营生理生命的重要价值，只在那种环境才能获得最干脆的认识（但我究竟不主张国人为了得到这种干脆的知识，竟相率强烈要求被秘密囚禁）。

十、拧下去，苦的只能是你自个儿

人，人生，真是非常复杂的！我曾作为律师在监狱、看守所会见死刑犯时，常能听到：「唉，谢天谢地能得到个死缓判决就好啦。」这成了一种最奢的追求。我每在那样的关押中，盼着能被早日转人挂牌的牢狱，则成了甚奢的大愿。实际上，设计、实施这种囚禁者也非常了解被囚禁者的这种心理。

有一次，有一位痞气恣肆外溢的「领导」来找我谈话。这家伙，每次见到他，他的上衣只穿着一只袖子，另一半衣服就吊在身体的一侧，我身边的那些看管人员私下都叫他「瘦猴」。我向他提出要求，要求他们至少应该以法律的名义囚禁我，希望能送我到挂牌的羁押场外而不是在黑牢里。

那「瘦猴」君回答得干脆且意味深幽：「想入狱？做梦！美死你。我这就告诉你，只要共产党在，坐牢这种美事轮不到你！再说啦，坐牢又怎么样？我们的人同样可以跟着到牢里去，到牢里照样可以收拾你。」（一年以后，在部队的秘密囚禁中，另一位我予绰号为「绝顶君」的谈话人员同样提到上述言论）

于泓源也在「瘦猴」光顾不久后来谈话一次，也提到：「别想着换押到牢房里的美事，牢房里太便宜你了，一步一步来，没准就会让你一辈子生不如死。我们嫌费神，我们换成现役兵看管行不行？交给部队收拾你行不行？有更好改变处境的途径你不选择，却梦想着到监狱。到监狱怎么啦，我们的人不也能跟着进去弄你吗？别想着那些不靠谱的事。」

2009年4月28日上午，孙获突然间进入囚禁室，来了就问：「老高，吃了这几个月苦头有没有点改变？利害关系有关部门、人员都谈了不少啦，好汉不吃眼前亏，听我的安排吧，你就听了我的安排，皆大欢喜。你被关着，这群警察不也跟着被关着吗？他们也有家有亲人，几个月不能回家，你自己忍心吗？拧下去，苦的只能是你自个儿。听我给你安排啦行不行？」

「这几个月不就是你亲自安排的结果吗？你突然重视起我的意见来了，让我云里雾里。」我回答了他。

孙获站了起来撂下句：「好吧，再给他换个地方。」说完就走了出去。

孙刚出门，张雪拎着黑头套就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三个人。张将黑头套套在我头上，说：

「再套个枕头套吧。」又一个枕套套在了上面。

「再加一个。」张雪又说。

我感到又一件东西加套在我头上，我开始被人架着走出了那间被关了几个月的小囚室。

这是第一次发生在白天的秘密转移。在黑暗中，我被两个人架着下了楼，上了一辆车。车上，两个人依着老例将我的头压下，每人一手压着我的肩，另一只手控制着我的胳膊。车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停了下来。我被架下了车，不知为什么，下了车竟还走了很长一截的路。我在阳光下的黑暗里，腰被压至小于九十度，两个人压制我往前趋扑，一路小跑。

我非常哀伤，为这多难的终于直不起腰来的民族，痛感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这曾经有着「四大发明」的智慧民族仍以这样原始的手段解决着内部的分歧，这是怎样的一种愚昧和野蛮啊？我流下了眼泪。另一个令你沉重的是，执行着这愚昧和野蛮的人们明显的是很亢奋。在中国，总有一群一群的这种人在亢奋中施行着这愚昧的野蛮。总有一群这样的人在背对着自己的公民，在背对着外部文明世界的地方，不知疲倦地干着这种有损人类声誉、弃毁着民族文明前途的事。你能清楚地感觉到，在颠预顽固的当今统治者眼里，一个不愿附声附和者的危险性当远在「基地组织」的人员之上。即便是一个顶级的恐怖分子，他们对付的手段也不过如此罢啦！

我不止一次当面向他们提醒过，我不过是希望中国和平实现政治现代化，亦即制度现代化，只要不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是绝不会反对中国制度现代化的。这是这庞大且古老的民族再鲜明不过的根本利益及唯一的出路。便是制度现代化是不美好的，动用极其恐怖的手段去压制这种声音，实在是令人痛心的，实在是没有必要的，这实在不是有力量的表现，这实在是完全没有实力及没有自信的蠢行。仅从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而言，这种做法纯粹是损人更损己的愚昧之举。多次对我实施这样的野蛮过程，终于也没有改变什么，结果已规律性地明摆着。这实际上就只剩下了一点技术目的——在生理上制造点痛苦耳。终于到了目的地，终于也就只是换了一个关押地点而已，尽管过程颇让具体的执行者热情澎湃，却也仅止于热情澎湃而已。

十一、上下一个体系都围着你这一位大爷转

新地点的关押开始了，关押点的负责人仍是张雪，而具体在囚禁室内执行看管任务的人员却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倍，成了两班人马，轮换着看管我，说

为的是体现人性化管理。他们在物质领域，对这些具体的监管者已是足够地「人性化」了，他们一日三餐均是自己点菜吃，每人每班一包香烟，各种水果量足供应，各种饮料和各种零食，连掏耳朵用的棉签棒、防蚊虫用的清凉油，可谓凡所应有则尽有。而且，每次选点，都在很豪华的高档别墅区，据说还有篮球场、网球场等设施。

新点关押没有几天，于泓源又赶来要「再给你一次机会」。这次谈话的大致内容不会忘了，只是其言论的顺序及细节未必能记得与当时一致。于那一次很兴奋，其兴奋虽知，而何以兴奋则不知。于作为一个平面人，尤其是平面男人外形则几无挑剔之处，近一米九的个子「明眸皓齿」未必不能描述作为男人的他。不开口说话，你会觉得他不大像个庸常人；一开口说话，你绝不愿意认为他是庸中的佼佼者。他和我的所有较量回合，失败结果铁定归了他，这绝不是因为我有多能，而实在是因他的无能。

每次失败后，在进入下个更愚蠢的精心设计的较量回合之先，他与我的谈话中必有以下内容：「邪了他妈的门啦，要说我他妈的智商在你之下，你打死我也不信呢，我的智商连你都比不上，这有人信吗？你信吗？三十二岁，三十二岁就是他妈的正局级，全国也独一份呢。」

我每必笑眯眯地看着这位可怜的「于局」。

这次来与我谈话是他最得意的一次，也是最愚蠢的一次。他显然很兴奋，一进门就哈哈大笑：

「你给我写的东西我早就看到了，这种关的过程是忒惨，我敢承认，是忒惨，怪谁？我前次见你我就说过，你把耿和和孩子送出国，这意味着什么？你给了党和政府一步死棋。是的，压迫性关押惨，不好受，这是你造成的。谁让你把她们娘仨送出国的？有好路你不愿走，现在的共产党和以前不一样啦，做到利益共同体，不但给出路，给大好出路。我们愿意给你条件，那是什么条件？就连给共产党立了大功的，共产党的功臣、英雄，也连想都不敢想。人类争过来争过去，最终的落脚点是什么？说白了，还不都是个利益问题，利益不最后也就是钱的问题。真让人不明白，你到底想干什么？要什么？要共产党的权？可能交给你们这种人吗？共产党的江山怎么来的？我们不会轻易把权力交出来的。这在零六年时小佟（指预审警察）就明明白白告诉过你，在你的问题上，很奇特，作为绝对弱小的一方却反而掌握着主动权，是完全主动权；合不合作，什么时候开始合作，以什么形式合作？这主动权都完全在弱者一方的手上，没有一样在我们手上。现在的共产党，在全球范围内，没有我们摆不平的事，美国怎么样？一样的给丫的摆平了？

为什么？反对中国，给中国施压不是他们的目的，掌握住火候大家都有利。公开给你说了，希拉里这一次来啦，来啦要什么？她们比我们更清楚，也可以说在利益面前更实际，一见面就要人权，要谈你的问题，还想要一万个亿。谁他妈的胡涂？人权问题、高智晟的问题，尽扯淡，咱统统不接她的茬，摔手就给了她八千亿，妥啦，那女人见钱一到手，人权问题、高智晟问题，再提都不提一个字。怎么样？摆平啦，有钱！就这么有钱！谁让我们这么有钱（这小官吏说到此，那种勃然的土财主的激情竟不能遏抑，啪的一响拍了掌大腿部，竟气昂昂地站了起来，而又气昂昂地在我面前迈开大步，做昂然来回踱步状，嘴里继续念念有词）？有钱！就是这么有钱，谁让我们这么有钱？！希拉里国务卿公开说啦，说美、中两国间存在的分歧不会影响两国的关系。说得多明白！这不等于明白告诉中方：结果是结果，过程是过程，在人权问题上，你们干你们的，我们说我们的，咱们还是好哥儿俩。听出来没有？连结果都告诉中方啦。八千亿，人权问题、高智晟问题，值几个大子儿（指钱）？跟共产党龃牙，行吗？要钱，我们乌洋乌洋的，要人，我们乌洋乌洋的，你行吗？死了心吧，老高，那狗屁人权能做什么？就算他是个好东西，能要来吗？好的东西多了去啦，你能得到几样？美国人想什么我们清楚，我们做什么美国人清楚，只要中国政府头脑清楚地把握住这两个『清楚』，戏就是两个大国的，你们连夹在中间的资格都没有！客气一点懒得动你，招惹火了就踩死你！你们能干什么？最多是有机会嚷嚷几句，还是没有用。希拉里不是说了吗？不会影响中美关系。不但没有用，而且很危险，这点你最清楚。即便是美国真的关心中国的人权，那又怎么样？我们踩你，他不干着急？现在的中国政府强大了，五、六零年代中国政府那么穷、那么弱，干了那么多事（指坏事），美国人不也拿中国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吗？我们愿意始终把手伸向你，什么情况下你都可以抓住这只手，代价我们不计较，不差钱。我不说你也明白，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三天两头跟你谈，为什么？摆平你的话很值得。能把高智晟给摆平了，还有什么事中国政府摆不平的？所以，上天堂还是人地狱都在于你这一念，我们希望你不再犯迷糊。在这关的时间也不短了，今年六十大庆，你是必须出北京的，这不是北京局能决定的事，我们能做的只是你出了北京的安排。来跟你商量，老这样关着，二、三十个人就窝在你跟前，这是你能看到的，还有你看不到的，上下一个体系都围着你这一位大爷转。目前初步给你设计了两个去处：一个就是去成都，到了成都，我们给你安排工作，收入保你满意，

但必须由我们租房间，和我的人住在一起，对外就说你有自由，我们没有控制你。另一条路是到新疆，也就是乌鲁木齐，还是得和我们的人住在一起，但房租是你的事，我们不管。你见任何人都必须有我们的人在场，包括你的岳父母。到乌鲁木齐也得答应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找份工作；二是对外说你有自由、没有人控制你，对外联系只限于耿和一人。你不一定要今天回答我，但不要拖得太久。」

他一口气讲了有近一个小时，我能记住的就是以上这些。我当即告诉他，我选择回新疆。我清楚，这无论如何比继续关押要强一些，至少让家人的心能安些。但我提出两点：一是每周我需要去看望岳父母，警察不得进岳父母家里；第二是我找份工作，跟踪人员不得跟至工作的场所。于说：第二个条件可以有点弹性，比如，你在楼上上班，我的人就在楼下等着，你在楼下上班，我的人可以拉开一些距离守着。

「明说了，你哪天抽身跑了，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见你岳父母，必须由政府批准，全程必须由政府人员陪着，这都是上面给的口，决定留不留这口的人，别说是我，我的上级也连面都见不了。上面没有松口，我就给不了你这个口，但我认为这是你的一次机会，总比关下去要强得多吧？实说了，我们一回来就向外放了话，说你回北京的第二天就回了北京的家了，我们一直在观察外界的反应，也就是说你现在死活都与我们无关了。你是个聪明人，我这么一说你什么都明白了，有机会就该抓住了。」

但终于，因为在第一个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而没有谈拢。后来，实际上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又是玩了个圈套。

十二、你是全国唯一在夏天里穿冬装的人

6月21日，孙荻和王胖子又来了。

孙一进门就说：「好消息，就照你说的，明天回新疆。」

我接了他一句：「这种好消息这几年我是常有的，在地狱的门上撬开点缝隙就当成是好消息。」

「那也比没有那条缝强。」孙又说道。

我说我加一个要求，出去第一时去陕北老家给母亲上坟，这是必须的。

孙说：「明天来接你走，就是上面答应了这个要求，如果上面答应不了，明天就走不了啦。」

第二天，即2009年6月28日，早晨五点钟左右，囚禁室进来两个人，手里拎着黑头套，我知道至少也是要离开这里了。我的东西也从外面给提了过来，这是我带到老家准备换洗用的衣服。看到那些衣服的惨象着实令人哀伤，那都是些好衣服，不仅表面皱皱巴巴不堪入目，由于潮湿，衣服上出现了许多绿霉斑，散发着浓烈的霉味。我心里忙不迭地重复着：「老兔子莫哀伤，你落难了，你落难了，损害是仅止于外物，仅止于外物呀。」

黑头套套了上来，我又被架着离开了那又被囚禁了两个月的房间。上了车，不知行了多久，我的头套被抓了下去，看到车是行驶在机场高速路上。到了机场，又有两个人与我们会合，一人是于泓源的司机，另一名是一个我曾提到过的姓贾的秘密警察。我被他们拉着去了几个地方，办理的是押运犯人的手续程序，我清楚这只不过是想在心理上给我制造点苦楚。飞机在榆林降落后，由榆林市公安局、佳县公安局各出动两辆车来接上我们。

在通往佳县的路上，从那驾驶车辆的警察两次接电话的内容得知，中共公安部、中共陕西省公安厅也有人已经先于我抵达榆林，以负责我在陕北停留期间的有关事宜。到了佳县后的事实证明了他那电话内容的确实，我看见了陕西省公安厅的一位大员来到他们中间，但公安部的大人物始终没有在我的视线内露面。车队停在县城唯一的一个小十字路口，等了许久，我并不能知道他们在等待什么。

不一会，佳县公安局局长杜某率众赶到（**杜某与我打上八竿子算还是个亲戚，但从从不往来，彼此认识**），不知他们一群在那里扯什么。终于都上了车，这次是开进了我们村。下了车我才发现只来了两辆车，七名秘密警察带着我走进了大哥家。

看到我的突然出现，大哥一脸惊愕，赶紧问我，回来能住几天？而我终于无法回答他的问题。

紧挨着我的王胖子（**体重二百多斤重的王胖子，这时已是名不副其实了。他是专门负责监控耿和她们娘仨的。她们外逃后，中共当局将他也关了一个月禁闭，这一个月竟瘦了六十多斤**）向大哥说：「在家住不了，这不是我们能做主的，就回来给老人烧个纸，烧完了就得离开返回榆林。」

大哥流泪啦，责怨他们太不近人情，又提出要求能让我与家人一起吃顿饭再走。王胖子提议先去烧纸，关于留下与家人吃饭的事他们再向上面请示。七名跟踪人员外加我们一家人，一大群人向我的祖莹山上进发。得悉我回家消息的四弟急急赶到大哥家，当看到盛夏酷热时节我还穿着冬天被绑架时的冬装，从不

轻易流泪的四弟竟哀伤地哭。在一大群秘密警察的鼻子底下，我们一家给母亲上完坟。关于家人要求与我单独在一起吃饭的事，得到的回复是：烧完纸全部人员立即撤离小石板村，我也必须被带离，与家人一起吃一顿饭只能安排在第二天早晨，只能是在警察在场的情况下在一起吃一顿，吃完立即撤离。家里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当天夜里，我们一群人并没有住在县城，而是住在了县城南向十里的一个叫「谭家坪」的村里。

第二天早晨，七、八个人与我一同赶到了大哥家，大哥也给他们准备了同样的饭菜，吃完就立即离开，没有让我的亲人与我单独在一起待一分钟。我们于当天飞抵西安，陕西方面出动数辆警车到机场迎接，于6月30日飞抵乌鲁木齐市。期间，我一再交涉，要求从扣押我的钱款中支一部分给我，以资我替换夏装，给岳父、岳母置办点礼物，却一直得不到答复。一到乌鲁木齐机场，新疆警方来接我们，其中的卡子湾派出所所长王开兵是我认识的，我被直接拉到了卡子湾派出所。

这王开兵一进办公室就喋喋不休地开始给我列出一串的「不准」和「必须」，而办公室始终坐着几位不动声色的神秘旁听者，其中一位后来得知是乌鲁木齐市或新疆的「国保」头目任小林（音）。王开兵宣布的一大堆，我只记了个大概，其中一条是每天必须到派出所来报到两次，上、下午各一次；至于到了派出所需要待多长时间、做什么，那都是派出所的事，只有老老实实接受的份而无权拒绝，至少每次到了派出所后汇报个人全部行踪，包括吃了什么也要汇报。另一条是：必须在白天每个小时给派出所打一个电话，汇报行踪。打电话时的处位、与谁在一起、脑子在想什么等，问什么就汇报什么；除了见我妻子家的人外，见任何人都得事先给派出所打报告，经批准后才能见，离开卡子湾也必须打报告。

我打断了王开兵的慷慨激昂，我提醒他，北京跟来几个人，二十四小时与我吃住在一起，你要求的都是他们实际在执行的，派出所的这些要求干脆就是为了整人，我断然拒绝。

在派出所听王开兵的那一番宣布的时候，几个北京来的人都在场，见我拒绝接受，就起身带我离开后住进了宾馆。

我的所有合法财产都被扣押，包括小关的一套房子都被小关派出所接管，我身无分文，回到乌市后打工糊口成了我唯一的出路，这实际上也正是当局精心设计的结果。他们需要造成一个我已经完全自由的氛围，以舒缓外面的质疑和压力。而他们又对我出来找工作这个事实可以用怕得要死来结论，实在不可思议，

他却是真实的情形。但他们的有些心理反应显示出在这一问题的现实操作方面，他们的神经出了严重的错乱。

他们有几个人已提前赶到乌鲁木齐，而根据以往的规律，此前百分之百地已经有人早早来过新疆做过具体的部署，终于搏捏出这个被王开兵宣布了的监管方案。一个是极不情愿，一个是不可思议地怕，是这个方案最清晰的两个特征。而从技术角度而言，这个方案最大的特征是完全脱离了现实，使得人根本无法出去打工。事情终于僵到了那里，有关人员屡屡给我谈，说唯一的出路就是我止步，政府不可能让步，说因为下面做不了主，这是最上面定的调（**实际指周永康**）。

7月4日，我又被拉到卡子湾派出所谈话，显然此前北京来人与新疆方面进行了磋商，认识到这种监管方案与让我出去打工释放有自由的信息目的无法统一，给我做工作，要求我将原来宣布的方案口头答应下来（**有录像**），并在宣布笔录上签字，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可以灵活变通，但至少每天给派出所王开兵打一次电话，不一定要汇报什么，打个电话就行。

考虑到回乌鲁木齐已五天的时间仍不能跟家里人见面，家人的不安是可以想像的，加上具体操作层面上已做了较大的让步，我就答应了下来。然而，我一直要求他们给我的财产解除冻结，终于被他们拒绝，说现在先可以由他们提供经费，数额不限，若不愿接受将来可以还他们。在这种情形下，由他们垫钱给我换上了夏装。

在北京时，那些看管我的人老说：「你是全国唯一在夏天里穿冬装的人。」

那天，在乌鲁木齐换装时，我说：「我是中国今年最后一位换下冬装的人。」

期间，我先后几次从他们手上拿了六千元钱，但迄今没有还他们，在乌市干了两个月活就又被绑架，绑架当月的工资也没有领。

十三、「七五」事件迄今远未结束

关于名动全世界的「七五」事件，期间我正在乌鲁木齐。该事件看似偶然，却有其必然性的一面。事发当晚，我们从王乐泉的电视讲话中，即可读出这种必然。王乐泉在讲话中提到，说动乱分子曾在暴力行为发生之前有过两次在自治区广场的聚集，「都被我武警部队冲散」，随后即发生暴力行为。这愚蠢的东西无意间向世界揭露了，那些暴力行为是在两次和平表达不能的情形发生的。这是1949年以来类似事件的一贯逻辑：要么悄无声息，要么暴力表达，和平表达是断然

不能，和平表达必然被野蛮的暴力扑灭；中共政府从未与人民和平地、平等、理性地对话的习惯，人民或死寂无声地做奴隶，或铤而走险做暴民。

一定意义上，「七五」事件的施暴者和被施暴者，都是高压政治的受害者。本次事件中，对这个邪恶政权而言是毫发无害，而对许多具体的家庭而言，他们临到的祸难是毁灭性的：不论是施暴者，还是该事件暴力伤害了的无辜死伤者。人需要表达乃天经地义，高压政治禁绝表达亦「天经地义」。和平表达与暴力表达招致的结果是一律的，即一味的暴力扑灭，在简单认识的背景下，暴力表达可能成为优先选项，他似乎更主动积极。「七五」事件造成的具体伤害令人痛心疾首，这并不止于事件本身造成的伤害。

「七五」事件迄今远未结束，今天，新疆，乃至中国其他地方的涉疆暴力事件就是证据，仇恨和危险都在那里或在更大的范围扩大着。「七五」事件后，你能看到许多使这种扩大成为必然的东西，那就是这个愚昧政权无处不在的仇恨煽动。一时使人觉得仿佛「文革」一夜之间又回到这似人间又非人间的地方，到处是流动的高音喇叭，口口声声的「犯罪分子」，连法院的发言人也是一连口的「犯罪分子」——没有经过审判确认，任何人不得被确定为「犯罪分子」，这已是一个最普通的法律常识，更当作为一种法制的思想深入到每个社会人的生命里，更别说是公职人。

另一方面，媒体喋喋不休地、几近歇斯底里地宣扬着政府的无辜。作为一个无法无天现象的强势存在，你真的就那么无辜吗？你真的就敢那么气壮如疯牛地说自己完全的无辜吗？那需要着怎样的无耻底气！一个社会，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即便是一个具体的社会成员，谁敢说自己是绝对地无辜？整个社会，全部媒体，或视或听的，没有面对真问题的。所有罪过一律地指向「犯罪分子」，仿佛我们社会就两种人组成，一种圣哲贤人，另一种就是突然跳将出来的「犯罪分子」，而在没有跳出来之前，这个社会就一种人：完全无辜的圣哲贤人。

「七五」事件发生半个月左右时，我的房间里闯进了一群男女，递上一份「外来人口管控登记表」，毫无疑问，这不是特别针对我的，是针对一切「外来人口」的。为首的是一位二十几岁的汉族姑娘，那蛮横的口气引起了我的反感，冲突骤起。那敲门的过程即让人知道是来了一群野蛮人，声大且急促。打开门，八、九个人，没有一句语言交涉，更不用说礼貌用语，势不可挡地走进房，我被逼闪立一旁。

「政府的，把这张表填了，必须现在就填。」

「为什么一沾政府背景，说话的语气就这么强硬呢？」我正色问道。

这下不得了啦，好似这八、九人都突然被人揭了皮肉般咆哮起来：「不立即填写就马上采取强行措施，非常时期，任何人只有老老实实地配合政府，否则就是自我残废！」

政府背景及人多势众都不是我怕的理由，我断然拒绝填写，说：「等采取强制措施以后再填写，冲突开始，我告诉他们，你们本可以顺利达到目的，像人一样地做事而不是恐吓，因为你们只是具体的执行者。我一看你们表格名称里的『管控』二字，就断定你们会遇到具体的反感，至少碰着我就如此，今天绝不填写。」

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的，同我「非法同居」着的北京警察赶紧出面劝阻，保证下午之前把表填了，交到楼下门卫室，平息了冲突。但北京警察让我填表也被我拒绝，我提出我在北京是被当作外来人口赶回新疆的，到了新疆却成了要被「管控」的外来人口，我究竟属于哪里人口？最后，终于没有填写那页「管控」表。

从「七五」时间迄今，你留心大大小小的各种形式的党媒，你能从他们自己的表达中找到这种事件频频发生的另一方面的主要原因，从中你也能读出中共政权做贼心虚的一面。在这些媒体所有有关这些方面的报导中，有一句话使用的频率是最高的，即：「要理直气壮地长期保持高压态势，同时要抓紧落实一批紧急需要落实的民生项目。」这种话里首先是不安的表达，其次是等于实际上承认了民生艰困与骚乱频发的内在联系。而政治高压与民生艰困是新疆骚乱频仍的结构性导因。当局不得不在技术上「抓紧落实一批紧急需要落实的民生项目」，而在政治上，他也就只剩下了「要理直气壮地长期保持高压态势」。高压与反抗，终于成了互为诱因及相互强化着的因果态势。因此，极权专制中国、新疆的社会安定无日矣。

十四、王开兵只是个「邪恶的平庸者」

「七五」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我终于被「批准」回去看望岳母，那「回家」后的场面实在令人痛心。两位北京的秘密警察与我一道走进了岳母的家，一进门，岳母笑着朝我点了个头后开始悄悄地流泪。我坐在沙发上，另外两人分置两旁。我问候老人，与老人说话，却看见老人只是点头或是摇头并不说话，很觉得不正常。我顺手拿起老人的固话机筒给大姐耿清拨了个电话问个究竟。

从电话得知，我今天回家看岳母的事，北京当局已提前一天通知了新疆相关部门，而卡子湾派出所所长王开兵则为此忙得不可言状，他将我的岳父、岳母、大姐等，分别传唤到派出所单独进行恐吓（也许王开兵不同意用「恐吓」一词，这既是我们作为人的根本不同，却是又一个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而我的亲人到了派出所的谈话内容也实在没水平得可以。

一进办公室，即遇到王开兵的大声呵斥：「知不知道高智晟是什么人？」

大姐立即给顶了回去，两位老人则都被问得目瞪口呆。

王开兵告诉我的家人：「高智晟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你们必须听政府的，对他实施严厉的监管。」

后来我详细了解了岳母不说话的原因：老人一生循规蹈矩，却也是这个国家群体性恐惧大阵中的具体组成。她后来说王开兵把她叫到派出所训了三次，让她必须配合政府监管高智晟，让她仔细留心观察高智晟的一言一行，并在第一时间向政府汇报。

「高智晟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包括每天吃了什么都必须汇报，必须每天来派出所汇报一次。」

王开兵是个法盲是定下来的，他当了中共派出所所长就是个证据。这几年我与王开兵近距离打交道不少，我一回乌鲁木齐，他就会被当局「重用」一回，被重用的期限与我的乌鲁木齐停留期限一致。我并不怨愤开兵君，是表里如一地未出现过愤怨。每次相见，我都是笑嘻嘻地前去跟他握手，然后被他跟踪。是他不该被怨愤吗？当然不是，是他的不配，是他的愚蠢颠预。我每次都以一种娱乐的心态与他办理交涉。我不大认为他的那些行为是上级机关绸缪的结果，那是一种自觉，是基于对体制既了解又不了解而生成的一种中国特色的自觉，其类似于阿伦特笔下的、极权体制中的「邪恶的平庸者」。他恹恹中窃喜这是向上邀宠纳忠的机会，而迷离中窃以为其本身即已置身大用中；迷离恹恹中终于不能自持而错乱招百出，两天之内传唤我的岳母三次就是一个证据：我更不大认为据此去结论他的人性有多恶劣。他只是这种体制下，多如牛毛的、不假思索地去做无头脑的事的一个具体例证而已。

十五、那咱就这样耗着

由于我身无分文，我多次要求当局解封我的财产。大略是「七五」事件半个

月左右，于泓源来到乌鲁木齐，同意先支付我五千元，但拒绝解冻我的财产，谈到理由时竟壮怀激烈。我们的谈话不知为什么一会换了两个场所，我不大考虑其背后可能的殚精竭虑的算计。地点是在新疆公安厅办的一座气派的宾馆里。

「老高气色很好啊。」于一见面来了一句。

「你却相反，目光呆滞，面带菜色。」我答道。

「还不是你给禽的，每次准备见你，提前两天就睡不着，见大人物是不是都这样？」他说。

「不全是，我昨晚就睡得很好，言归正传吧。」我说。

「老高，在你面前咱不拐弯抹角，财产解封的事都汇报到我这了，不能解封。因为你正在给外界玩失踪，跟我们使花样，所以解封时机还不成熟。」于言归了正传。

我正色道：「老于，这几年我失踪的次数还少吗？哪次是被我玩出来的？你的人至今与我吃住在一起，全天候被控制得几近窒息，连与自己的老人见个面你的人都在左右倚坐。表面上我可以上班工作，可连与工作单位的老板见面，你的人都赫然旁坐，我不认为我有自由。关于财产，那是我的合法财产，否则，法院判决时定会做出处置结论。法院判决只字不提，你就这样非法扣着，于法于理都是相悖的。我上次在北京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贪官污吏对国家财产的饕餮吞攫已到了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地步。新疆高级法院一次性外逃审判员六名，在外逃前，他们往外转移的贪墨所得，最少的也有五千多万元，你们不管，我自己的这点劳动所得却被你们常年给扣着！仅此一点，我何来自由可言？我无法欺骗外界说我已有了自由。」

「那咱就这样耗着，看谁耗不过谁。至于说贪官的事，我管不了，我就管得了你，你要求解冻财产，下面汇报说你的用词很难听啊。」于说道。

终于，财产仍将被无限期地冻结下去。

第四章

2009年9月25日的绑架

一、硬暴力是他们信仰的全部

在新疆的两个月时间里，由于他们要求我对外宣布说我已完全自由，而被我拒绝，加之有关财产解冻问题、秘密跟踪我的家人被我发现的问题，双方的关系紧张至一触即发，被再次绑架只是个时间问题，但这只有我才能感知的危险氛围又不便给亲人讲。

2009年9月25日，晚饭后，我记得是个星期五，因为我一天还得三餐饭自己做，还得时常留心着去超市购置些生活用品，加之考虑到下周又是「十一」这个国殇日的放假，我就决定去附近的超市多采购一些东西，以为放假期间腾挪一些看书的时间。下了楼觉得情形较寻常不大相同，平日对我的跟踪特务中从未有过着警服的，那天不但有，而且沿途每隔五、六十米就站一位警察。因为他们对我的活动规律了如指掌，晚饭后如果下楼则必定是去超市，加之北京方面的人每天都与我在一起，周围特务人员的骤增骤减常不能引起我的反应。从硬的层面，我永远处于绝对的被动局面，这与他们在软的层面上处于绝对的被动局面形成明显的对照。常在我面前抖擞抖擞那点硬力量，是当局唯一能做的，那实际上是一种极不安的表现，我常当成娱乐滑稽剧看。

我进超市从不闲逛，直扑目标，买完就走。那天购置了不少东西，拟未来十天不再去超市，我拎着一堆东西走在这返回的路上，超市离居所足在一千米左右。终于快到楼下，手痛胳膊酸，心里想着在楼下大广场的公共铁椅上休歇一会儿。突然，跟踪我的人都消失在我的视线外，我听到急促的跑步声迫近，正准备回顾，一个大汉已跑到我跟前，然后变成倒退着小跑状与我并列前行。很快，我身边另一侧也出现相同的情形。我被两名维吾尔族大汉倒退着夹在中间继续前进，后面的跑步声也大震，应有一大群人。这时，在我左右倒退着与我并进的那两名维吾尔人同时将我胳膊抓住，后面又上来一人抱住了我的腰，我已经被迫站住。

很明显，从后面上来的那一位欲一举将我摔倒在地，但我那天在急促间不知

道哪里聚攢来那么大的力量，他猛地尝试了两次都归于失败。就在这种角力进行的同时，一个黑头套套在了我的头上，一只脏手捂住了我的嘴。我终于被压迫地弯下了腰，双手拎的大包小袋早给打落在地。我被人压推着躬身向前趋跑，我听到周围有许多人，呼吸都很紧促，我感到被拖进一辆车。

一上车，我的双手被背铐了起来，车开始了行进。大概是刚才两次试图将我摔倒在地上的失败被激怒，汽车刚出发，我的后面有人用拳猛击我的脑枕部，打了三拳后停顿了五、六秒，从后面有一条臂勾住了我的下巴，开始了令人不解的折腾。后来我终于明白，那还是在发泄前面欲摔倒而不能的不满，这是在向我显示他是很有力量的。硬暴力是他们信仰的全部，只是这种折腾实在难以理喻。他坐在我的后排，他企图从后面拽着我的头将我拖到后排，大致上是因为车厢内狭窄，不是理想的力量展现场所，结果这一折腾竟足耗时六、七分钟，我被折腾得大汗淋漓，我想他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终于成功了，可另一个尴尬临到了他，我虽被强行拽得翻过了座椅脊梁，我感到我的双脚尖已踢触到车顶篷，我只能应着他的用力后倾，结果把他挤压在座位间动弹不得。车椅之间本来窄狭得可以，我感到我的后背挤压着他的胸部，我的两条腿朝上，我的身体屈在他与前排座椅之间，能感觉到他已完全被卡死。这时，我感到其他人开始帮助他，才终于使得我跌落在后排座位上，我旁边这位气喘如牛。

二、又是挂牌的黑帮绑架

车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停了下来。车外发生了争吵，门卫不允许开车进去，而这头则说车上有「要犯」，必须进至楼前，那头则说：「能让你们进去就已经给你们面子了。」显然，我们要进去的去处也是底气十足的牛气单位。终于，车被迫只停在外边，我被人架下车，然后突然被人推着拚命前奔。终于，脚步慢了下来，我感到进了一个门，开始上楼梯，进了三楼的通道后进了一个房间。

他们一进门就开扒我的衣服，这是每次绑架到目的地后的第一道程序。上衣因着得了双手被铐的好处而终于没能脱下来，鞋、袜被扒掉时听到有人用维吾尔语骂了一句脏话，并说让把鞋给扔了，这是我从绑架到这时听到的第一句人话（**除了骂人的维吾尔用语，或极个别短语外，全然不懂**）。我的裤子被拔掉后，被猛地压得坐立在一硬凳子上，屋子里变得全然死寂，我就这样光着下身坐着。当终于静下来的时候，另一个规律亦悄然而至，在路途时被击打的部位及在车上

的那一阵子折腾所致的肢体挫伤开始疼痛，但最不能忍之痛是被背铐着的两腕。由于刚才那阵折腾，手铐勒得越来越紧，这正是设计者给手铐的一种功能，你越动他越紧。

我实在疼痛难忍，就大喊：「手铐太紧，血脉不畅，请放松手铐！」

我的声音一落，周围依然死寂一片，那痛把我的注意力死死攫住，终于痛不能自禁竟站了起来。我听到有人绕到我身后，有手在手铐上摸了一下就快步走了出去。不到半分钟，我听到有人走了进来，还不知道用维吾尔语说着什么，手铐被打开，一只手一把抓掉了头套，我发现我在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房间里摆了两张床，窗帘遮得严严实实，四名维吾尔人站立在我的周围。我低头摩擦胳膊，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赶紧给我打开手铐。原来，我的两只手及手腕部周围颜色都成了乌紫色，手腕与铐子接触之处，几乎整圈的皮肤都已脱掉，水血混合物外溢。这时，我发现我的裤子就在我的脚跟前，我忍着痛把裤子穿上，没有人阻止我，这算是个例外。穿好裤子后，我想在房间里寻找我的鞋，被两人制止，指着我刚坐着的那凳子，意思是坐着别动。

我知道，基本套路与北京一致，新一轮秘密囚禁开始了。

后来的事态表明，当局的这一次绑架是完全殊于往常，首先在绑架选择的时机上就耐人寻味。那一段时间，乌鲁木齐每天都会有汉族人失踪，几乎每天都有汉族人的尸体招认告示，你只须留心一下当时报纸骑缝里的「寻人启事」及「尸体认领启事」，就能感觉到那段时间一个人失踪不再是什么罕见的事。当局对我绑架时绝对是考虑进去了这一背景因素的，这在后来的酷刑折磨过程中施刑人员口无遮拦地骂骂咧咧里，完全可以得出这种判断。而从绑架实施的过程看，也能看见当局的这种心理。绑架的所有参与者都是穿便衣的维吾尔人。但这种安排只能欺骗外界，却无法欺骗得了我。首先，我周围特务成群，若不是当局的绑架，他们绝对不会泰然旁视的，我的安全就是他们的饭碗。在当今中国，为保饭碗，人们是不惜勇力的；另外，他们一使用手铐，我就清楚这又是挂牌的黑帮绑架。但是，用这种过程跟我打心理战也完全枉然，并非是我有着特殊的勇气，而是从不相信我的生命会在一个偶然的过程中寂灭，这种信念的坚定臻至神奇之境。但每次遭暴力绑架后，又将经历一段极困难的日子是我无力避免的。

三、袜子：世间最环保的手纸

这次绑架后的特殊困难就接踵而来，有些立现，有些则是后来才发现。首先是，他们有人用汉语告诉我，你准备吃苦头吧，那人还「善意」地提醒了我一句：

「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减少痛苦，把自己当成牲口就没有痛苦。」

在这种场合被人举手殴打、辱骂是极寻常的事，没有任何一个个体有能力与他们计较。我没有说话，但困难确是一件件临到：首先是那两天我拉肚子，进到卫生间没有卫生纸。我每次在被囚禁期间，上卫生间时则由两人分立在马桶两侧，已没有了常人的窘迫，而这不给我手纸的事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但以前的解决办法是用自己的袜子，这一次是我连鞋都没有了。但在这种环境里，我从不着急，我在心里跟自己调侃着：「老兔子，甭着急，人类没有手纸的历史远远长过有手纸的历史，再说啦，现在结构性的矛盾是解大手，而手纸的有无则是主要矛盾解决之后的事。」但手解完啦，可我还是无解决之法。但我没有绝望，心想有用袜子的经历，就可以有用身上其他外物的分经历，只是身边站立了两活物不大方便。以往的经验是用袜子，用完即洗，晾干下次再用，可以说这为世间最环保的方式。这次没有了袜子可用，我想等一等看身边两位活物的反应；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脱下裤头用。常人不太有这种经历，我却常有。人到这时候，羞愧、难为情统统旁置。虽然这些东西是人类的基本感情特征之一，但这究竟是需要正常的人群中才能被承认、被尊重；在这种过程中，只有自己，用一切反常识手段来维持生理生命继续之所必须。

有一位终于发话啦：「你平时用什么擦？」

「用卫生纸。」我说。

「用纸，傻子不知道你平时用纸吗？我是问你平时被关的时候用什么擦？」他又问。

「用袜子。」我说。

他扭头便走，我心想：「有戏，再等等。」果然，他又回来了，脚下踢进来一物，正是刚被拔去的我的袜子，我的问题又得以解决。

终于熬到允许上床睡觉的时间，又有一问题临到：没有洗漱工具。但这要比前一个问题好解决得多——用双手，以前关押有时几个月都是这样。到了晚上，又有人从外面踢进来一双拖鞋，又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当天夜里，有一位监管偷偷问我为什么要被抓，我说我过去写文字批评共产

党的极权专制。

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用生硬的汉语说：「你不是个简单人，他们说你是个『法轮功』破坏分子。」

第三天，他又来上班，他说：「我们已经知道你是谁了，大人物，名人，怎会被关到新疆来呢？」

我笑了笑没有回话，因为这时我已经绝食超过四十几个小时了，实在不想多说话。但这次绝食让我付出了些代价。就在这天下午开始，当局从新疆其他地方抽调了三人，对我实施酷刑折磨。

四、牛二暴虐踹打•鸚鵡学舌骂阵•好人静默

这次为期两天的酷刑折磨，确实是给我吃了些苦楚，我也被迫放弃了绝食，但这次酷刑过程，乃至这次的被看管过程，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首先是这次酷刑执行人员就很奇特，他们三个人是当局从各处精心挑选的，可其中有两个人的表现颇出乎人的意料，至少应出乎当局的意料。三人中间，其中一位，至少在那两天里，用我的眼光判定，他是个好人。

他们三人并不是负责看管我的警察。9月28日，他们来了，从囚禁室将我带走，带至一处很大的套间里把门关上，一进门，一位黑矮子，以下姑称之为「牛二」，转身用拳狠击我的下巴。后来整个过程证明，这家伙的心要比他的肤色黑不知多少倍，他心狠手辣，是那三人当中唯一的一位坏种；他左右开弓击打我的下巴两侧，然后猛地掐住我的脖子，逼使我快速地倒退着，「嗤」的一声，我整个身体背部撞在房间的墙上，他掐着我颈部的手猛地用力往上顶。我当时觉得有一种人将立死的感觉，只一小会儿，我感到胸闷脑胀，眼睛胀得欲裂，看东西出现了模糊，我感到我的腿已不能再支持我的体重。果然，他一放手，我稀里糊涂地贴着墙坐在了地上。

「畜生，在我跟前来耍赖，你就是找死。」他终于开口说话。

他打人很内行，他在我的左脚踝上两下踢得我本能地叫喊开来。人身上存在着许多我们完全陌生的东西，我刚才被他掐得痛苦至如坠深渊，稀里糊涂坐在地上，却被他在脚踝上踢了的两脚给解脱出来，先前的痛苦竟然荡然无存，所有的痛苦骤然间全集中在左脚踝上。

「畜生，你站不站起来了？你跟我耍赖，知道爷爷是干什么的吗？」

我这时已什么也顾不了啦，再说我也站不起来了。

「畜牲，问你呢，知不知道爷爷是干什么的？」

「嘞」的一脚，又踢在我的左脚踝上。

「畜生的爷爷，牠顶到头也只是个老畜生。」我回了他一句。

我清楚我回骂一句，将引爆新一轮的歇斯底里的折磨，但并非少骂一句即可避免折磨的继续。他像发疯了似的，几近跳起来踢我的小腿外部、大腿外侧、左右脚踝，不到几分钟，我的两条腿已完全动不了啦。他一边狠踢，一边骂不绝口。

「畜生，我告诉你，爷爷是反恐的。」

他踢一脚说一声「反恐的」，再踢一脚再说一声，不停地踢，不停地重复着。踢累了，他坐到了沙发上，这时我才发现，刚才同他一起进来的另外两人已不在房间，房间里就剩下了我们两人，他坐下后仍大骂不止。不一会儿，另外两人又出现了。

我发现了一个我完全不解的生理现象，我的双腿抖动不止，虽然已不听指挥，却狂抖不停。「有识之士」可能会以为那是恐惧的缘故，但那种抖动却实在与恐惧无关，因为他只是两条腿在抖动，上身并不发抖。而对于恐惧，那时还确实无暇顾及了。对于酷刑，我也有自己冷峻的思想准备，恐惧无论如何都无法使酷刑有所减弱，更不可能使酷刑停止，而徒使自己在这种过程中尊严溃塌。在这样的过程，能使尊严挺立不倒的唯有不恐惧一途，这是我吃了许多苦楚后终于得来的经验。

牛二继续骂着，另外一人也加入了骂阵。我前面说过，这次酷刑有两个颇异样的现象：一是两天的酷刑没有使用电击器，这与北京酷刑第一天都必以电击为主的做法颇不一样。而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局在新疆范围内挑来的三名施行酷刑人员，却有两人是从头到尾没有动手的，没有触过我一指头。其中一人只是加入骂阵，而绝不动手打我。牛二一累就坐下来骂，那人立即加入，唾沫横飞，恣恣肆肆而骂不绝口。而另一位则从始至末，打骂均不参与。从一开始，他的眼睛里满溢的是善意，两天的酷刑，他连脸都没有拉下过。

另一个主要特点是，每至牛二暴虐开始，他俩就会离开那个施暴的房间，里面的惨叫声被骂声换下时，他们就会再进来。但我感到在这件事上，他们不施暴的做法是应当肯定的，但他们是仅止于此。这并非是我贪多，我是希望他们在场，因我发现那牛二胸襟实在狭窄得出众，动辄即可以臻至疯狂而全然不顾及他个人的颜面。我的两天几近是与他共处，我虽然一直处于他失态的暴虐之下，仍

努力使自己多出一丝旁观者的心态看他，毕竟这种过程并不可多得。他的自尊特别敏感，可以说是变态的敏感，这可能是这种过程中他处于一种极不尊严状态的一种本能反应，一个平常的眼神能使他歇斯底里几十分钟，至少是我得出的感觉。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与我一道受刑，他是精神或是说心理受刑（**但这与他的良知无涉**），而我则是肉体受刑。他常稀里糊涂地踏上一个心理台阶却终于不能下来，然后以各种凶残手段逼你给他台阶下；你若懈怠或者竟不给他这个台阶下，他那种凶残的癫狂和癫狂的凶残表现，每必致他精疲力竭，终于还兀立在他一直折腾着想下来的「台阶」上。

这牛二第二天来了即完全忘了头一天终于没有下来的「台阶」，一进来就让我给他跪下。我清楚，一天的折磨又要开始了，无论如何是不能避免的，这是上级差他们来这里的任务。见我终于无动于衷，他又开始稀里糊涂地攀爬那下不了的「台阶」，他一步步逼自己上这样的「台阶」。

「畜生，你今天要不给我下跪，信不信我弄死你？」他指戳着我的头激烈地吼着。

他说要弄死我的话，在那样的过程中是个外行话。在那种场合，死亡是最不具威胁的名词，如果死亡能立至，即是怎样的一种意外幸运。他见我没有给死亡威胁应有的礼待，瞬间即至烈怒，他一把将我搬转身而成面壁状，后猛踢我的脚踝。经昨天一整天的折磨，我的两个脚踝已红肿得让人触目惊心，他这一阵猛踢，直让我感到一种无法名状的剧烈疼痛，脚踝及其周围明显不堪支撑体重，腿部又剧烈地抖动不止。紧接着，他双拳猛击我的后脑勺，我终于稀里糊涂地委坐在了地上。他又一阵狂踢我的膝盖，嘴里不断地重复着：「跪不跪？跪不跪？」他可能发现我有点犯迷糊，他开始费力拉我企图使我呈跪状，但实际上这已是完全的不能。我的膝刚才给他踢得锥心地烈痛，他拉了几次终于失败后，显然恼怒至极，一把拔出手枪对准我的前额。

我努力给了他一个笑意，看他张着口喘着气，终于没能扣击扳机，我说：「你应当像男人一样雄起一次，让枪响了，否则，你终于还是侏儒。」

他像疯了一样扑进卧室，我还以为这种猛扑后面会有什么骇俗大举，没想到他只是拿了一块枕巾将手枪给裹包起来，然后猛击我的头部，嘴里骂不绝口：

「上面那些屁玩意都是他妈的胆小鬼，只要有人敢批示一下，我立即给你这畜生一粒花生米（**指子弹**）。畜生，知不知道反恐是做什么？就是抓住皮帽子（**指维吾尔人**）往死里操，操死了他妈的算自杀。上面那些狗东西（**指上级领导**）

敢批，但只要让我来伺候你，我就一定要让你一辈子忘不了我，我这辈子最恨汉奸、卖国贼。要由着我说，汉奸、卖国贼，只要一露头就把狗日的给掐死，连他的娘老子、老婆孩子都给狗日的一块掐了。」

折腾近一个小时后，他又开始坐在沙发上骂了起来，不到两分钟，不知何时离开的另外两位也走了进来，而其中一位则实时地加入到骂阵中。

对于此后的各种酷刑过程我不再费损笔墨，因着至终就没有什么新花样。对于他们骂我的话语，实际上也就是牛二的骂词，因为另一位好似完全不愿创新发明，全是鹦鹉学舌，跟着牛二的词抄袭，终于在骂上，牛二仍不可置疑地占居主角地位。对于牛二的写词的内容，我记不清楚的也只是些细节或顺序。

我最近发现我的记忆力还不算坏：一是，我记朋友的电话号码从不倚用笔记等有形物；二是，十年的与世隔绝后，过去朋友的电话仍完全能准确记得起。这实在算得上是一个颇使人鼓舞的发现。所以，对牛二骂我话内容的记录，大致上不会出现结构性缺错，知识产权权益当归于他，我也无替之添枝加叶的冲动。我在所有本书的文字记录过程中，凡能用真人名的则绝不回避，意在指出这些历史过程中可供追蹊的参照物，以使真相自由的年代终于来到时，可资人们去证实。

五、全世界都要向我们学习呢

牛二辱骂的过程中，我正躺在地上发抖，这是每次酷刑止辍或中辍时的不二规律，但这种抖动是纯生理过程，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常常认为那是生理自身对暴虐的一种机械反应。因为他无论如何都在发抖，但我不能检索到他与恐惧的联系，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牛二」这个称谓并无贬损他人格的冲动，由于这几年里的特殊经历，凡与我见面者均不报上姓名，我常常戏谑说他们是「蒙面执法者」（诸如北京对我施刑最凶残的一位侧貌酷似朱元璋者，我赐其雅绰为「重八君」）。较长篇宏论地予我教训的过程是第二天的第一阶段酷刑间隙。他坐了下来，伸手从茶几上取了个梨子在手掌上搓了几下即开吃。他吃得奇快，能看出他的心里不平静。

「畜生，能不能谈？唉，畜生？」他连问几遍，又一个梨子被他啃得仅剩内核。

「能不能谈，畜生？唉？」他猛地梨子核砸到了我的脸上。

「只有你降卑了，我们之间才能谈。」我说了一句。

「什么意思，畜生？」

「只有你降卑成畜牲，我们才能谈，人和畜生不大能沟通。」我回答他。

他愣了一下，然后开骂：「你妈X，你就是个贱人，给你脸不要。」

「如果你代表了高贵的话，我宁死也不愿去像你一样高贵。」我说。

「畜生，你知不知道中国人最恨谁？汉奸、卖国贼。你知道不知道，你写的那些东西，给党和国家的形象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损害？」他说。

「我很想提醒你一个简单的常识，究竟是被我写出去的那些罪恶本身损毁了你们的形象，还是揭露罪恶的文字损害了你们的形象？」我反问他。

「你他妈就是个傻逼，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是不是中国长大的？家丑不可外扬，就是逼大的中国人都知道的。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妈卖X当婊子，你是不是会挨家挨户地敲门给别人讲。你挨家挨户讲完了，你家里的人是不是还会把你当英雄？就他妈盯着家丑，找机会往外弄。美国没有丑闻吗？伊拉克虐囚不是美国人干的吗？」他越说越激烈。

「是的，哪里都会有丑闻，量的不同是一个方面，本质的区别在于，美国的媒体、美国的政府会在第一时间将自己的丑闻公诸于世界。而你们的政府会怎样对待丑闻的？绑架、电击酷刑、监禁、制造更大丑闻来掩饰丑闻。你这两天针对我做了些什么？他本身就是骇人听闻的丑闻，而你们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掩饰丑闻。也许你们并不这样想，可事实不是如此吗？」我说。

他又开骂：「你他妈就是个傻X，家里不听话的孩子，家长打他，不也是为了他好、为了家里好？实话给你讲畜生，你这几年被关傻了，成了真的傻X啦，最近几年你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吗？变化大得不得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知道吗？全世界都倒啦，老美（**指美国**）都跌了个狗吃屎，只有中国屁事都没有。老美怎么样啦？再也牛X不起来了，见了咱胡主席，只有摇尾巴的份。傻X，你知道老美这几年全国上下都做什么吗？在研究我们的制度呢，要向我们学习呢，已经定下来啦，老美全国已经内部传达过啦，要向我们学习（**他看我在笑，又认真地继续道**）。真的傻X，这是真的，我们内部都传达过，所有干部都传达过啦，不光老美，全世界都要向我们学习呢，现在全世界领导人都来中国取经。中国现在是什么？老毛子（**指俄罗斯**）我们现在是哄着他，心里根本不鸟他。现在跟老美平起平坐是看得起他，用不了十年，不出十年，老美他妈的给中国提鞋都懒得理他。中国要是成了世界的老大，像你这种垃圾，我们是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

拾。因为像你这种人，生来就是汉奸的料子，跟正常人是不同的。究竟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现在再也不是个问题了，社会主义发展一年，资本主义十年都跟不上。伊斯坦布尔去过没有？畜生，有机会去一趟伊斯坦布尔吧，那里要修一座大桥，利国利民，可是议会不批，几十年了修不起来。要在中国，吵什么？只要对人民有利，修就是啦。至于说老美的民主政治，他只能骗得了像你这种傻X，他们批评我们一党专政，其实，他们才是不折不扣的一党专政。我以前也不明白这个，这次学习完，我他妈的全明白了。表面上，他们搞的是民主选举的那一套，实际上是每次大选一结束，民主党胜了民主党专政，共和党胜了共和党专政，是干干净净的一次专政，还不是跟我们一样。这是咱们国家搞的理论突破，这个突破太重要了，以前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在这个问题上犯糊涂，总以为老美玩的就是民主政治，是多党制，这次终于突破性地搞清楚啦，老美玩的才是真正的一党专政。」

我靠着墙根半躺着静静地听着，无论如何，他比拳打脚踢过程要少些野蛮。

见我不说话，他扬了下巴，说：「畜生，你说我说的对吗？你说说，我给你机会。」

我仍不作声，我太了解他们，即使是在这种完全封闭的场所，一点不顺耳的话语，都会招致来变态的折磨。

「畜生，你说呀，你不是挺能说的吗？你说我上面说得对不对？」

他一直盯着我，我说：「你说的话对不对不应该是个问题，只要共产党不倒，你们说的话就永远对。但是，如果刚才那番话真的是你从你开会的体系中学习来的，那么这场金融危机将加速你们崩溃，他已预先打倒了你们。至少已经麻醉了你们，或者说你们又多找到了一个麻醉下去的理由。我对于金融危机是外行，但我可以肯定，金融危机不是自由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的问题，也不是资本主义即自由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自由经济的发展技术问题。中国之所以幸免于难，只能说明中国经济并未纳入全球自由经济秩序中，有极权体制下的技术性效率及技术性掌控因素。因此，愚昧地认为全世界都来效法你们的制度，历史将很快地证明这是个大笑话。老美也罢，全世界也罢，对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只能是技术的，而绝不能是结构性地去改变自由经济制度本身。你们讳病忌医，这与行将就木之人忌悼棺木没有区别。忌讳批评是所有极权政权的通病，因忌讳批评而终于灭亡是所有极权政权的又一个通病。人类社会政治制度是没有完美的，完美属于上帝。上帝给人类的唯一完美礼物就是人类的不完美。正是这种不完美，提

掣了人类生命和社会运动向好及向美发展的活力及生生不息。如果上帝从一开始就给了人类完美，那么，我们的生命运动就只剩下一个方向，最终归向就只有是猪。由于你们从来就坚持认为你们是完美的，而向着美好发展的方向即被堵死，你们只能走向死途。全球共产主义政权无不如是，你们已完全丧失了镜鉴的机会...」

我还正说着，他突然怒不可遏，跳起来大骂，并将他所吃残剩的梨子核疯狂地塞进我的嘴里，说我的脑子「灌进去狗屎了」，说「费了半天劲竟没有一点触动」。他又开始新一轮对我的折磨……

当又一轮的折磨终于使他精疲力竭时，他又坐下来，上身脱得精光，又开始「教训」我，还是去铺陈外国人如何蜂拥而来中国「取经」的盛况。

实际上，我们之间的语言早已成了多余。尽管与这人间的隔绝已经有些时日，但我已然不大相信在中国大地上，到处排列着从世界各地来取经的高鼻深目大阵，这边学习如何箝制思想，学习如何控制言论，学习如何贪污腐败、撒谎包二奶，学习如何刑讯逼供、如何制造冤案！那边学习如何暴力拆迁、如何血腥镇压自由信仰、如何用黑牢关押上访喊冤公民！民间也如火如荼，执情传授如何为食品下毒、如何加工地沟油、如何坑蒙拐骗、如何为领导下跪、如何为奴！「爱国学者们」则更是爱国情大炽，忙不迭办班教授如何献媚、如何颂圣、如何愚民、如何篡改历史、如何爬行及如何邀宠、如何丧德！我不大相信外部世界，尤其这老美，突然对全民腐败、全民堕落发生了不能自制的爱情，终于情不自禁地想步这苦难民族的后尘，想在和平年代弄出几千万公民非正常死亡的光荣来。我终于不大相信这人间会发生这种变化，尽管牛二口手并用做了两天的功，终于无果而终。

六、「关爱」之例既开追效者众

在新疆的这次酷刑经历终于黯然收场，却也不能说是全无成果，由于后脑勺肿痛，致半个月里不能仰面而眠，我的身上，二十几天后仍「煤层」遍布。

又回到了看不见尽头的囚禁，这次囚禁过程中有些一时不能忘怀的东西。新疆人有他们的粗糙一面，诸如，囚禁室没有监控器，这是几年里唯一的一次例外，这种例外为我认识了解中共秘密警察提供了一个角度。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善良的人性，恻隐之心，关心时弊，痛恨不公。我在每个

地方关押，监控器、窃听器密布，而秘密警察则多人一面，不敢与你说一句话，更不敢轻易向你表达善意。我在新疆公安厅、看守所、招待所的这次关押，是所有这些年里的关押中得到关爱最多的一次，也是与秘密警察个人面对面交流频率最高的一次。

然而，对于来自他们的帮助，我称其为「关爱」之事，在常人眼里是小得可以忽略不计，而对于一个被捆住手脚，且被示为中共政权「头号敌对分子」（这是中共当局自己与我谈话中的用语）而言，这些关怀、帮助来自当局精心挑选的秘密警察群体，颇改变了一些此前我对这个群体的看法。他们原先给我的印象是冷酷、愚昧及不近人情。这段无监控、无监听的囚禁经历证明，在没有眼睛盯着的情形下，他们一样有自己的棱角、个性和人情味。如果这次囚禁是在有监控、有监听的环境中，将会大大增加我的苦楚。我的鞋袜被当局给没收，当天夜里就有人踢进来一双拖鞋，没有那双拖鞋，不难想象冬天无鞋的滋味。尤其那双袜子，在那种不提供手纸的环境下，他不再是袜子本身，而成了满足生存的一个人道大端。

实际上，至第五天，来自克孜勒苏柯尔克孜州的曹先生就买了两包卫生纸悄悄放在了我的房间。这例既开追效者众，不几天时间，有人给买了牙刷、牙膏（买的牙膏比他们自己用的还好），还有的悄悄买来洗脸毛巾放在卫生间里。伊利的小严（音）在中秋八月十五买来了五个月饼、几斤梨子放在了我的床头；没想到，此事后的第二天，他就再也没有露面，再也没有见到他。新疆维吾尔族警察几次悄悄买了小吃放在我的床头，用眼示意我吃了。后来，我的日用品就再也没有缺过。

七、值得永远纪念的交流

他们个人有什么苦恼也常与我交流，有几个人的名字我不便讲：孩子患病、家庭困难、两地分居的苦恼，对社会不公、单位里的不公、单位领导的蛮横霸道……。例如，一个乌鲁木齐警察讲，他们局的副局长一个人霸占着一辆越野、一辆小轿车，两辆车绝对地被他人独用，单位有再急的事也不能动用他那两辆车，全单位几百警察都心知肚明，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因为那副局长上边有人。

又如，一名维吾尔警察向我抱怨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从他们的角度，使我对

中共宗教政策的反动性有了更具体、更现实的了解。他向我谈到，对于穆斯林、伊斯兰教信徒，他（她）一生下来当然地取得了信徒身分，是以一个穆斯林世界的礼仪仪式来到这个人世上的。亦即，他们首先是穆斯林，然后才成了共产党的干部，他说不让穆斯林信徒有宗教信仰是完全不现实的，人们只能明明白白地说谎装假。他认为，你当了共产党的干部，不管你信誓旦旦至怎样以假乱真的程度，但你一下班就得回到穆斯林的世界、穆斯林的家庭里。以前我完全不了解，他说穆斯林家庭的用餐、睡觉，包括洗漱，都有特定的及习以为常的，却人人都必须遵守的宗教仪式。

他说，百分百的党员及干部，回到家中即必须遵守这些仪式，用他戏谑说法是：「下了班共产党员身分关在门外，上了班穆斯林身分关在家里。」

后来，他又开玩笑说：「一退休，共产党员的身分也退休了。」

他说，这种政策只能让当上干部的穆斯林说谎，在穆斯林的时间里，不遵守教俗习惯，死了都没办法埋你。他跟我一样，对这种政策不解及反感。

他说，一个党员与信徒身分是完全可以集结于一身的：「全世界都是这样，为啥非要给人制造太多的麻烦，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这种交流都在三个人中间展开（**他们每班两个人**）。他们中间还有一位不便于公开姓名者，他人很善良，我遭遇酷刑折磨后，他多次进来安慰我，并每次当着我的面谴责这种暴行。

有次，我被折磨后，当天夜里他进来说：「别看他们对外尽讲人话，干出了这种连畜生都不干的事。」

不知是什么原因，前一批看管人员在关押近一个月时突然全部被换走了，但他们却永远被我记念。他们是伊利的小严、克州的小曹、艾山江、阿克陶县的居马洪、喀什葛尔的老沙、和田的老常、乌鲁木齐的余根龙。

接替他们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及米东区公安局的国保人员。这一批人来了确实也给我添了不少苦楚，这种苦楚并非是因着他们的恶意，而是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还近乎野蛮的生活习惯一一又出现了一个上厕所不冲水的人（**不知是否已经得到了提拔**），这最使我苦恼连连。另一个刻骨铭心的苦楚是他们吸烟，那实在叫一个「气魄」，且人人奋力，天天不例外。

八、各种足够气魄的苦楚

在此，我情不自禁地还想重复叙述一遍我的苦楚感受：那种生活方式几近野蛮，一个人一晚上可以吸去两包烟。两个人一夜攒积下来的烟蒂能撮掏两大把。晚上是不允许熄灯的，厚实的烟云竟致房间呈灰暗状。便是今天想起来仍使人心存余悸。他们吸完，烟蒂全用水泡在一次性的纸杯里，那种死烟气味实在让人很头痛。有两位还爱磕瓜子，一夜下来，那瓜子壳桌子上、地毯上到处都撒得是。计算机游戏打麻将，近六十的人，他可以坐一整夜不挪地，梦中都有不绝于耳的游戏机声。

然而，新疆比北京好的一点是，后来这批人，他们进来就自顾自玩，从不管你，大致情同陌路，你只要不出门即可。睡觉时竟还允许用毛巾遮脸，以避烟难，这在北京是断不允许的。

我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地打扫房子的卫生，他们从不打扫，却也从不要我打扫，但那种窝囊的视觉局面，我连一分钟也不愿意维持；而在白天的时段，我至少维持着三次的、规律性的打扫频率。然而，个别人的口臭、脚臭也足够霸气，虽则是小事，却构成了那个特殊时段我挥之不去的苦楚。我常常想，若与他们其中的一位一起生活一辈子，那是怎样的一种苦境，可他们人人都有家。

那段时间另一个足够气魄的苦楚是隆冬季里着单衣。由于绑架时间是9月份，新疆的气候至10月份即开始冷。我身上只穿着一件长袖T恤、一条单裤子，又没有袜子（后来有了袜子），我只好绝大部分时间钻进被窝里。

九、干脆点说，你已经死啦！

其实，在秘密囚禁期间的几次谈话中，我能够看出中共当局在我的问题上的矛盾和混乱。有一次的谈话，具体的是用死亡来威胁我。他们与我谈话是从不介绍身分，更不介绍姓名的。

某天，进来两个人并不坐下，开口即问我：「老高怎么样？」

我回答：「你有答案，何必要问？」

「有没有什么想法？」

「凡属人当有的想法我都有。」我答。

「对政府有什么想法说出来。」为首者又问我。

我答：「我不认为还有政府，只有地狱的开发者和管理者。承认并遵守纪律是一切政府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法律既是一个政权统治秩序的保障和基础，同时，是一个政府区别于黑帮的标志。对我，你们做了些什么，你们是很清楚的。」

「对你做什么啦？我们并没有做什么，我们没有把你当犯人对待。」他又说。

我说：「你别告诉我说针对我的凶残的酷刑你不知道，你有一句话说得是真的，即你们没有把我当成犯人看待，但你们对我的囚禁又算什么？政府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唯一方式就是法律程序，绝不能有例外，不仅世间的所有政府无不如是，而且中国法律也没有例外性地规定，而对公民的自由的法律剥夺的第一个标志就是通知我的家人。」

「我听说啦，我听说有人打你啦，那不是我们干的，那可能是外地人干的。我们不会的，我们不允许用酷刑，这是有明确规定的。明令禁止的东西，谁敢？肯定不是我们干的（这番话与后来的国保头目任小林的言论几乎如出一辙，**也是说外地警察打的，其实就是他安排的**）。话说到这里，我也就懒得跟你闲扯。老高，你目前的处境很困难你知道吗？可以说是死亡就在眼前了，或者干脆点说，你已经死啦！我们正在观察外面的反应。我实话告诉你，对外面来讲，你已经死啦，对于政府来讲，你的死已经不再是疑问了，是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灭你的问题。你对新疆目前的局面也了解，听说你以前就在乌鲁木齐做过事，乌鲁木齐现在每天都有汉族人失踪，别人能失踪你就能失踪。失踪人员哪里去了？我过几天给你带几份报纸看看，现在和平渠每天都有尸体打捞上来，报上每天都有招认尸体的广告。现在出现了一个对政府异常有利的因素，就是你的家人也认为你死啦，是被维族人给杀啦。你岳父每天步走几十里路到处贴寻人启事，这就等于帮了我们一个大忙，这个举动向外面证明，连你们家人都不认为你在我们手里。实际上，弄死你已不算什么，死啦，外面也得接受这个现实，喊叫上一阵子他们自己都不再喊了。共产党弄死的人，比你牛的有多少，不都什么事也没有吗？就上面那些怂货是胆小鬼，这事要交给下面办，哪有那么多的麻烦？当然，这棋局主动权还是有一部分在你手上。向政府低头，我今天不是和你谈判的，你的处境很危险其实你自己也知道。」那头目又说。

我实在懒得与他瞎扯，不再说话。

他却盯着我说：「怎么不说话啦？没准你的说话机会是越来越少啦，有话就说出来。」

「我本不想再说什么，既然你还想听，我就再有针对性说几句。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来找我谈是基于什么想法的，但继续用死亡威胁这点倒是你们一直保持下来的直率，却也是一直保持下来的犯糊涂：其一，在这种环境中谈死亡那不是威吓，那是在报喜。其二，无论死亡是什么，这几年屡屡在我眼前捌飭，起过点作用吗？这跟什么勇气呀、什么英雄呀，都八竿子打不着，真正的八竿子打不着的是死亡与我的距离。今天你这番话本身即给了我一个简单明确的信号：死亡离我很遥远，原因是『上面那些怂货是胆小鬼』。其三，我想提醒你，我从不认为我的生命是个偶然的存在，绝不会在一个悄无声息的偶然过程中没入黑暗。更多关于生命广阔辽远的东西我也懒得与你扯。至于你谈到针对我两天的酷刑不是你们所为，是外地人所为，则更提醒我跟你谈话是多么地不必要。这是什么地方你比我更清楚，你今天进到这里来一定也是要费些周章的。我的身分我和你都清楚，当今中国，或者在当今世界，有几个人能随意接近我？更何况是施以暴力？」

没几天，乌鲁木齐国保头子任小林来谈话，所谈内容几无区别，不予赘记。

十、一件短大衣救急难

2009年11月27日，任小林携数人又来找我谈话，说北京决定把我送回陕北老家去，但有人偷偷告诉我说：

「任小林骗了你，只是转押陕北。」

当天夜里，看管人员比平时增加了三倍。由于我仍穿着夏装，途中无御寒手段，便提出要求从我的家人那里给我取几件衣服，但被拒绝。

他们说：「政府现在并不承认你在我们手上，对于你们的家人而言，你已经死啦，外面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你也就将就点，你现在活着就是一种侥幸，还要求那么多干嘛？你的死只在等上面的一句话，上面只要放一句话，立即做了你。」

第二天凌晨五点钟左右，一大群人早已来到，用他们的话说是「大人物出行，规格不比总理低」。有位姓崔的空军副旅长，进来给我递上一件短大衣。

「我就不相信给你加一件衣服就能让天下大乱。」他笑着说。

他是个好人。他们这次安排看管我的人员很复杂，有空军副旅长，有地方武装部部长（姓贾），有企业干部（与我岳父同一单位且还认识，但从不与我说

一句话，一进囚室即只与香烟和游戏机办理交涉，近六十岁的人，可以十几个小时不挪窝），这些人只在晚上值班（晚八点至第二天早九点）。这副旅长崔先生与其他人员比，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绅士（形不似），礼貌、有涵养且不吸烟、不玩游戏，是新疆所有看管人员中唯一的一个例外。他的那件短大衣救了我的急难，我高智晟在这里再次谢过。而他给我短大衣的时候，乌市国保头子任小林、新疆公安厅负责人、陕西省公安厅人员、北京市公安局及中共公安部人员都在门外看着不说话。

一群人下了楼，这是我这两个月第一次迈出门坎，竟没有给我戴头套，又是一次意外。送行队伍可谓「浩大壮观」，仅出行人员即足够庞大。我印象中，北京方面三人，陕西方面两人，新疆公安厅及乌市公安局各两人。大约七点多飞机起飞，飞向另一个不确定的囚禁地，新疆的秘密囚禁生活至此画上了句号。

十一、寻人启事·认尸

新疆之行正好为五个月，其中一半时间是在半软禁中，一半时间是在秘密囚禁。期间的经历，直使人怀疑是在这人间。我极不愿意让我的亲人目睹我的困难处境，尤不愿使我的岳父母两位老人目睹这一切，可这一切终究还是在那几个月里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了他们身边，这给我造成了极大的痛，而更给他们造成了几近毁灭性的痛。

高智晟失踪了，可能已经被害死。老人们的单纯善良，中国黑暗势力的诡诈、冷酷，两项交融激荡，终于衍生出高智晟是被维吾尔人绑架了，而又被杀死了，只是死尸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而已，这样一个既成局面。不是亲身经历，不是老人们后来面对面地讲述，很难使人相信这是一个政府的勾当。他们假戏真唱，煞有介事地、心细如丝地、一脸真诚地扑灭着我亲人心里的任何一点希望。

最令人不耻的卑鄙是，北京负责全天候监控我的几名秘密警察，他们亲眼目睹了我被野蛮绑架的全过程（**而且就是他们策画的**），却根据于泓源的指令，从我「失踪」的第二天起，他们「热情真诚」地全天陪着我的岳父，寻踪觅迹，遍贴寻人启事，奔波于太平间认领尸体。他们的「热情」摧毁着我的家人最后一丝希望，因为我的亲人全认识他们，都清楚他们二十四小时和我一起，现在是连他们也在到处找我。此举造成了我全家几近最后的绝望。

可怜天下父母心，从我「失踪」的第二天起，我的岳父制作了寻人启事，每

天步行几十公里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张贴，并在我居住区周围的超市、书店、药店、报摊、饭馆拿着照片打听消息，晚上回到家里就开始在报纸上查询尸体认领启事。数百份寻人启事贴完之后，老人每天就奔走在各医院的太平间去认领尸体，稍有时间，就会到和平渠附近转悠，以期侥幸发现我的「尸体」。

中共当局为了在精神上最后摧毁我的家人，一直派人在我的岳父身边跟踪他，并在一次岳父正在一个太平间认领尸体时，精心在我岳父及两个妹妹面前演了一场逼真的闹剧。后来岳父慢声慢语地给我讲了这场丑剧的全过程，我听得泣不成声。由于中共特务一直在跟踪着老人，对他的行踪掌握得很清楚，那次老人循着「招认尸体启事」到一家医院太平间去认尸，由于该尸体身長一米八，除面容破损无法辨认外，其余特征与我极其相似，终于老人无法做出确切的判断却又无法排除疑似点，就打电话叫三妹及四妹来辨认。就在太平间等待期间，当局精心策画的丑剧在他面前开演了。

十二、当局演了一场丑剧

一辆「依维克」警车停至太平间门口，一群衣冠楚楚的顶国徽的警察走下车，吆五喝六地让太平间里面的人出来，说「警察执行公务」。

岳父说：「一看人家很专业，很正式，个个戴着白手套、白口罩，照相机、录像机、软硬尺各种工具一应俱全。」勘验检查的便是岳父刚看认的那具尸体。

「他们检验得很认真，又提取指甲，又提取头发的，折腾了半个小时。」

检验结束，一群大盖帽从太平间出来，其中两位站得离岳父很近的警察摘下了口罩，叼上了烟。

其中一位吸了一口烟抬起头说：「可以肯定不是高智晟。」

另一位说：「跑到哪里去了，害得我们每天跑太平间。」

这两句「无意间」的话，在老人听来如崩雷轰顶，因为一家人心里还存着那么一丝侥幸，认为我可能是被警察绑架去了，而眼前的现实是，警方每天也在「寻找我的尸体」。老人说他听完后浑身颤抖不止，双腿无力支撑身体，本能地扶着墙勉强地站立着，思维突然出现模糊状态。他说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来做什么，以致三妹赶到他身边时，他竟不认识自己的女儿。

「叫了三声爸爸，他像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一样没搭理我。」三妹后来说。

他说，那天两个孩子怎么将他送回家的，他迄今回忆不起来，回到家，坐了

几个小时又恢复了正常，又回到了痛苦中。两个月后，老人对我的生存再不抱幻想。他说，他开始流着泪整理我留下的「遗物」，给姐妹们讲：

「高智晟留下的所有的东西，哪怕是一双袜子、一支笔都必须给包裹好，保存起来，将来交给格格和天昱，这是他们的父亲最后留在人世的東西。要告诉他们，爸爸是个好爸爸。」

（我在记述这段文字时，多次站起，多次举头，以转移注意力，但仍数次因眼泪而顿止。我自己又极度重亲情，我欠下亲人的感情太多矣！而终于无力将自己完全属于他们，我虽大痛，而他们的痛远远超过我，因我常无与这痛交涉的时间而又终无痛矣！痛终于尽悉归于他们，高智晟在这里给你们说对不起了。）

老人告诉我，由于他哀伤过度，一度出现食量下降、睡眠不足的状况。至2010年初的一天早晨，临起床时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两个不认识的人走进他的卧室，站在他床前告诉他：

「高智晟没有死，他仍活在此世，现在被关押在陕西，你不要担心。」

他说他刚想问一下详细情况，结果就醒了。老人说这个梦又让他的内心有了死灰复燃的盼望。

「现在看来，那个梦中人说的全是对的。」老人见到我后说。

十三、飞往榆林

经过数小时的空中飞行，我们一群人到了陕西咸阳机场，我在飞机上及机场进出场所颇能吸引些眼球，是因着我发型。在新疆关押期间，两个多月里没有理发，没有洗澡，没有洗头，你尽可想象身上，尤其头上，那种脏的程度（本来有一次一位监管者让我在他的班上偷着洗一次澡，可喷出来水的颜色始终是酱红色而终于放弃）。而遭绑架前本来就到了该理发的时间啦，关押期间我多次要求理发，但他们每次回复说：

「给你理发，新疆公安厅都做不了主，报告打上去了一直没有回复。」

然而，我的头发就一路地长下去。因着长期不能洗，头发太长实在难受，我找了点上的负责人（他是个好人，人很善，原本是个教师，通过考试当上了警察）。最后，他出了个主意，说我们不敢给你理，我们给你找把剪刀你自己剪。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我自己摸着把头发给剪了。考虑到在这次剪头的机会极不易，加之他们经常换人，后面能不能再有剪刀在手的机会还很难料，我就最大限

度地将头发剪得尽可能地短。原本就是个外行，加之自己摸着剪，不仅不易，而且剪得实在是惨不忍睹，大起大落且沟壑纵横。在那不人不鬼的秘密囚室里是绝不显特别的，而在公共人群中则极显异样。

一出机场，一串「别克」商务车在一辆警车的前导下驶离机场，目的地是一家宾馆。进入宾馆后，我被带入一个房间，由乌鲁木齐警方将我交给了榆林武警部队的一位被称为「韩队」的中年人，与韩队一直在一起的是榆林国保的一位警察。与我交涉了几个月的新疆警方即此抽身，陕西警察群体登场。宾馆待了不到两小时，原班车辆又驶向机场，大致上是又要出发了。进了候机大厅后耗了数小时又被带出来押上车，说榆林机场大雾不能降落，飞机只能明天飞，我歪打正着地又得以在地狱以外多待上一夜。本来航班延后，当由航空公司提供食宿，但由于我的身分特殊，又被押至一个不知名的宾馆，又专门从西安抽调来一批人员，与我住同一房间彻夜不睡地看着我。可能有特别的交代（**陕西省国保的头子一直在我身边**），所以看管人员当夜对我礼敬有加，数人在一起，却保持了很安静的局面，保证了我的睡眠，给我留下了颇好的印象。

一行人于第二天一大早即飞往榆林市。榆林一下飞机又给了我一个颇好的印象，陕西国保那位负责人通过别人，将一件仿羽绒服递给我，可以肯定他心很细，与新疆及北京的野蛮和冷酷对比的明显。

陕西国保这位负责人与我是「老相识」，2006年，他给我留下极恶劣的印象：一是他在2006年4月份率领一群流氓在陕北大哥家院子里、家里折腾捣乱的情形全无人理，使一家人昼夜不得一会儿安宁，尤其大哥的孙子刚出生才十几天，并野蛮殴打文都先生、毁损我的车，大白天在家门口冲着我的家人撒尿，半夜用手电筒多次往有女人睡觉的窑里照，以及在其后我与文都先生路经西安期间的无底线捣乱，在火车站站台上殴打文都先生等恶行。但这一次情形颇不一样，凡是陕西方面能够自主的领域，他们都做得不像新疆那样愚昧和冷酷。出机场戴黑头套时，数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很客气地告知说：「我们必须这样做，请你配合。」而路途上没有出现像北京、新疆那样，始终将你的头压制在你的两膝之间的暴行。到了关押地，竟破天荒地在囚室里给我准备好了两套秋衣裤、两套保暖内衣裤、两件棉上衣、卫生间里卫生纸及洗漱用具俱全，但囚室的选择及囚禁方式的决定都是北京来人安排好的。

十四、最「文明」的一次囚禁

囚室很小，约七平方米左右，却还用漆线规划出警戒区。两张床占地四平方米，我的活动区域只限在两床之间约两个平方米的地方，实际上只能原地活动。两台很精致的监视器，据说监控室在隔壁，而另一个我看不见的监控室直接设在北京，听那些士兵讲，囚室内的一切，北京看得清清楚楚。囚室内还是采用压迫式看管，每班室内由一个士兵和一个警察组成；门口由一个人在室外把守，以防止外人进入囚室；另一人则守在门口，负责对进入室内的值班哨进行检查，以防手机等违禁品带入室内，对进入室内的饭菜、水等进行登记及安全检查，负责随时替换室内哨兵上洗手间；隔壁的监控室负责对整个囚室内外进行监控。另外，军、地各有一名值班干部全天候值守。每日有四个班轮流，每班里外六人（**不含北京的监控**），另有两人做饭，点上全天候值守人员当在二十五人以上。

然而，这次的囚禁，是所有我被囚经历中最「文明」也是唯一「文明」的一次：首先是，哨兵不用我室内的卫生间；最主要的是，他们从未在囚室内吸过烟，这是最不易的事，实属罕见；另外一个极明显的特征是，他们在室内从不说话，从不看书及玩手机，比北京的士兵及警察要礼貌得多；而在饭菜上，也是所有囚禁生涯中比较好的一次，能吃饱，每日中午必有肉；在那里三个月的囚禁，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里还给了几本闲书看，这是秘密囚禁中空前绝后的例外，虽然有些书只有鬼才肯看，诸如「十七大」文件汇编类，但对我这个几年不接触人间文字者而言，究竟还是有点意义的，去熟悉许多早已陌疏了的文字。而那内容，并非我情绪化，只有无脑加无灵性了，才能为之激动。内容千人一面：在建党一百周年时，全国人民幸福得叽哩叽哩咧；在建党一百五周年时，全国人民幸福得咕噜咕噜咧；在建党二百周年时，全国人民幸福得叽哩咕噜咧。这些妖魅鬼蜮物，人间败类，仍作着让这个恶党永远祸乱这民族的酣梦，你尽可想象他们腔子里装的是些什么东西。

在榆林的秘密囚禁两周时，终于洗了三个月来的第一次澡。此后每两周被允许洗一次澡。那个秘密囚禁点我凭直觉应在横山县境内，四周应该是沙漠，因为哨兵每日进来鞋底下踩的都是铁青色的沙粒。那外面应该很冷，因为门口哨兵穿的军大衣，戴皮帽子，腿上还外套着皮护膝。每次看到他们的模样，我的心里特别难受，零下二十度左右的夜晚，站在外面，那滋味一定不好受；一个恶政权的维持，每时每刻耗去多少普通人的苦难啊。

我的囚禁生活，每至一个新地点，即很快将自己的一天导入一个自定的规律中，思想、活动、休息，无不循着固定的规律，虽然没有条件知道时间，但误差一般不会超过两分钟，最多不超过五分钟。无论在哪里羁押，一段时间以后，看管人员对这种规律及依循时间的准确程度都大为惊异。实则无他，这只是特定环境下人固有生物能力的启动。

十五、你现在就给老大写个纸条

很快，时间到了2010年的春节。大年初一，他们做了一件低水平的事，虽则是小事。大年初一早晨，饭吃得很晚，听士兵说是包饺子，我心里美滋滋的。不料，到开饭时他们给我端进来了三个凉馒头。考虑到大过节，都是一群不能回家过节的人，说了影响别人的情绪，我默默地吃了一个凉馒头后开始看《成吉思汗》。

后来有人告诉我：「关于大年初一给不给你吃饺子，省厅都不敢做主。北京专门有电话过来，我们也没办法。」

我记得那年春节是2月14日过的。大约是3月24左右，榆林市公安方面有人找我，说：

「你大哥老要去北京闹事，上面让我们弄他（指关押），绝对不能让他去北京。我们也不想弄他，你们（指北京方面）咋不弄？叫我们弄。你的事跟我们就没有关系，让我们看着你，我可以肯定，在中国没有一个省愿意接手你的事。让全世界人骂，到现在没有给我们拨过一分钱。老大（指大哥）到北京去闹，无非是想知道你的死活。我们不管那么多，关着人又不承认，你现在就给老大写个纸条，就说你还活着，在政府手里，不要说具体的事，我们转给老大，不要去北京闹，不要让政府弄他。」

我不加思想地立即同意，我还活在人世，这个消息对我的亲人而言是怎样的大喜讯！因为这个无赖政权一直否认我在他们手里，为了「证实」他们没有说假话，真是煞费心机，北京警方负责监管我的人员陪着我的亲人到处「找我」。新疆警方一边在对我施加酷刑，一转身即在我的亲人面前「验尸」，以「证明」我并不在政府手中。对于我的亲人而言，尤其对亲手将我的「遗物」包裹收藏起来的岳父母一家人而言，这是怎样的一个意外收获！

我立即写好了纸条交到他们手里。但我担心这事只是地方公安当局的想法，

只要他们向上报告，即会出现阻碍。我常说他们像邪灵附体一样不假思索地去作恶，一旦做完恶则又像邪灵附体一般怕被暴露，常会以更加恶劣的手段，不惜犯更大的罪恶去遮掩前恶，但地方此举至少会刺激当局：不能对我的「失踪」久拖不决。

十六、你们政权的存在是多么地偶然

3月26日，关押点负责人进来说北京来人谈话。其出去几分钟，于泓源一脸肃然大步走了进来，示意两名哨兵出去。

「怎么样，老高？」他边坐边问。

「活着，且快乐着。」我接了一句。

「真的快乐吗？要这快乐，那我告诉你，快乐不了几天啦，我们不会无限期拖下去的。我们刚办了刘晓波，十一年，不服，要上诉，顶用吗？踏踏实实地在牢里待着去吧。关大连，刘霞一个月去看一次。挑战共产党，脑子他妈犯昏啦，上面也不谋而合。我还就敢给你明说了，关于解决你问题的会议刚刚结束，整个政法系统的大领导全部到会。我的级别也不算太低吧，但在那个会上，坐最后一排、最边角落里。会上气氛很严肃，我们不怕你，我们敢面对任何挑战。会议一完，我就到你这里来，有十一个同志陪我来啦，未来几天都准备跟你接触接触。我今天就给说多点，有人在外鼓噪给你搞诺贝尔和平奖，嚷嚷了几年啦，有用吗？那些鼓噪者头脑太简单了，不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啦。现在的共产党是什么？会上一致的共识是，过去的共产党都那样，不也没有把诺贝尔和平奖给中国人吗？现在？现在他们敢？挪威弹丸小国，看看美国敢不敢？我们不用说什么，看看他们敢把诺贝尔奖给中国人？敢吗？」

我不作声，静静地看着他，他也盯着我。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理？」他看着我问。

「我实在不想跟你扯什么，咱俩面对面也扯了几年啦。既然你问，我不妨说几句，反正我也又有几个月没有说话啦。首先说刘晓波，他做什么啦？你们竟判人家十一年，他不过提出在中国应当实行民主宪政，要求中国制度现代化。我想不客气地提醒你，你们的判决使他成了一个有力量的人，他原本不是一个行动者，他甚至一年都不大下楼。你们目前对诺贝尔和平奖的心态，将必使未来六年左右的时间里，会有两位中国公民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将在今、明两年里

获得该奖。即便是我，也还常觉得不可理喻，一个武装到骨髓的政权，为什么会
对刘晓波的一篇文章做出如此令人不解的强烈反应？他实在有那么可怕？关于我的
事，我不大认为胡锦涛愿意再次启动我的问题，再次给我加刑。他能走得最远
的也无非是把我投入监狱，执行原判刑罚，把我的问题拖给他的下任。因为你来
了扯了半天，也扯到了那个规格高、规模大的关于我的问题的会议，终于却没有
说怎么处理我。几年时间里我也多少了解了一些你，你还是实在一点好，这样可
能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我回答道。

他定了一会儿，点上了一支烟，双眼看着地面约三、四分钟，房子里静得出
奇。抽完烟，他掐灭了烟把说：

「你说未来六年之内诺贝尔和平奖会给中国的两个人，这是瞎掰，这我敢跟
你打一百个赌，对于外面的事，我们的说法不是空口无凭。我们是做什么的？我
们用情报说话，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不跟你一样瞎嚷嚷。退后一步讲，如果真的
不可避免，那么，刘晓波能得奖也比你得了强一百倍，胡佳我们也不怕。他们在
社会上的经历要比你简单得多，可以说没有成功的经历，只要不是奖给你就行，
我们会尽一切可能在这方面压死你。咱们是私下聊，老高，你的成功经历反证了
你有很多令人不安的活动能力，尽管你头脑很简单。就算我瞎说，我们目前视线
里的所有对手，历史将证明，他们对我们党不会构成大的危险，但如果不幸有的
话，那一定会是你。所以，我们这样对付你，你也不要觉着心里不平。共产党强
大不强大不是个问题，看一个人的能耐，先看他的对手有什么能耐。共产党这样
认真地对付你，可不是为了撑大你的面子，恰恰相反，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你
不要觉得委屈。你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危害！还真就奇了怪了，突然就冒出你
这一号。蔡卓华案件中有人就提醒过我，小心高智晟和那一圈人走在一起，真就
他妈的撞见鬼啦，还就是这个案子里你和他们黏在了一起，还掰不开了呢！这是
你的不幸，当然对政府也确实不是什么好事。听说小佟（指负责在2006年8月15
日后审讯我的人）也跟你说过，当时你和郭飞雄我们并不怕，就怕你们和范亚
峰走到一起。你们三人中，我们真正怕的是范亚峰，体制内人都说他是『小诸葛』，
可偏偏没几年你们仨就走到一起。至于你说刘晓波威胁不了我们，我们不比你清
楚？跳出来我们就敢摁死你，判十一年，到监狱里凉快着去吧。听说刘霞现在每
天喝酒，活该，早干什么去了？但他那篇文章对国家构成了威胁，不摁死他，
没准还真就被他给掀翻了（指政府）。你对政府处理问题的猜测可以说是胡言乱
语，总书记并不具体管你的事，大方向瞒不了你，须得给他汇报了，但具体怎么

搞你，我就可以说了算，你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

他说完我就接上：「老于，我对你今天的话题颇感兴趣。首先，我想说的是，一篇文字就有可能把你们掀翻了，一方面，使人觉得，你们政权的存在是多么地偶然，你们每存在一天，这需要多少偶然的条件来成就？有多少偶然支撑着你们的存在，就同样会有多少偶然在骤间使你们灰飞烟灭；另一方面，你们的逻辑让我信心大增，掀翻你们的政权，每分每秒都存在着巨大的可能。至于你对我的评价，『头脑简单』这一条现在立即可以承接，至于说以共产党的强大和认真对付我，来反推说我有了异于常人的能耐，用你的话说那是瞎掰，说这话我没有谦虚一下的冲动，我并不是没有认真忖度过自己，我在庸常人中间并不出类。倒是你的话提醒了我，不该精神委顿，应该抖擞起来去适应角色，虽然这未必是你的本意」

十七、我的监狱就是共产党本身

上午的谈话无果而终，于起身离开。中午开饭时间到，囚室门被打开，几个士兵搬进来个吃饭桌子，搬进来了三把椅子，然后频繁地进出。桌子上一会摆满了菜、水饺、红酒后，士兵退出，于又走了进来，乐笑满面，脸上也有了些血丝，像换了个人似的，后面跟着他最喜欢的奴子，彪形大汉张雪。

「老高，听说丫的过年连饺子都没有让你吃，这像什么话？这小地方可真够呛，我听说了，心里很不爽，中午这顿饭算我的，专门就要饺子吃。」于一进来就说。

「过年吃不上饺子问题并不出在小地方，小地方究竟也没用那种高屋建瓴的大才。中午你关照不关照倒也无关痛痒，这里还没有克扣过我的中午饭。当然，能吃上饺子倒不算个坏事。我不想那么多，他终于就是一顿饭而已，吃。」

我坐下来就吃。很显然，于的心思不在这顿饭上。上午的谈话终于也没什么结果，他来一趟显然不是为一次不咸不淡的谈话。

刚吃了几口于又开说了：「你看老高，上午也没有聊出个结果，你不能老待在这里呀，你这出路怎么弄？」

「一、没有聊出个结果这本身就是个结果；二、我从不认为我应该待在这里，更不认为我会老待在这里；三、我从不认为我的出路应该与你讨论。我今年四十六岁，前四十六年从未跟你讨论过我的出路问题就是一个证据。」我立即回

答他上述三点。

「长话短说嘞，老高，我干脆决定这次带你回北京，全交给我来办吧，要钱给钱，要工作给工作，工作、报酬都随你说，不设任何前提，回了北京就给自由，你说怎么样？」他边说边看着我。

「对我而言，你的『不设任何前提』是有前提的，交给你来办，钱、工作得要一样就是你的前提。你好像没有听清我刚才的话，我从不需要跟你讨论我的出路，但无论如何你的到来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嘴里正在咀嚼着的水饺就是一个证据。回北京放人，如果觉得放人你又吃了大亏，那就继续关着。我的监狱就是共产党本身，只要他在，我的监狱就在，我不大愿意扯得太远。」我边吃边回答他着他。

「这事不好办，你回北京不靠政府，那必然就会回到原来的圈子，要不了几天不就又要进去了吗？」他摆出关心我的面孔。

「不靠政府就得进监狱，这是一种什么逻辑？不好办就不办，第一我没有请你来办，第二你大没有必要为难自个儿。」我说。

「这不为你好吗？」他说。

我没有再接他的话茬。一顿饭又不欢而散，但我是吃饱了，是水饺。

十八、走活这步棋是个技术问题

下午吃完饭，于又走了进来，还想跟我聊聊，说：

「由于不知你的死活，你大哥老要去北京闹，当地公安要采取强制措施，政府是不愿意看到这一节的。老高，咱做人不能太自私了，不能只顾自个儿。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需要你注意，就是不管基于什么前提，腾挪一步使自个儿家里人知道你还活着，这比任何狗屁原则都重要。我再退一步，回北京，给自由，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费用，要不要工作，但你也退一步给政府个台阶，配合政府演个戏，这个戏我们已策画好。现在对双方而言都是一步死棋，用你的话说是技术问题不同于原则问题，现在走活这步棋是个技术问题。我们的想法是：说你去年9月25日的失踪与政府无关，是你自己出走到山西五台山想静养几个月。这点对你而言可能会联系到你的狗屁原则，可以想一想，事态就这样僵持下去，受害最深的还是你和你的家人。听说老爷子（指我岳父）为你的事都糊涂啦，你大哥经常像孩子一样地大哭，咱也替他们想想。我常说我不认为你的智商在我之上，

可有一点我现在承认，凡我能想到的你一定也能想到，让你家里亲人知道你还活着是个大事，这点你肯定同意。有些问题不便说得太明了，暂退一步，赢得空间有什么不好？何必要一举解开所有的疙瘩呢？你说我说的是不是个理儿？」

我立即接住他的话：「我同意你的建议，但不要玩手段，否则我伸手即可撕破假象。」

「行，老高，有两个安排：一个是你现在就动手给你大哥写封信。就说你苦于这几年的遭遇，痛定思索，最后选择了去年9月25日的出走山西五台山，说经过在五台山的几个月静思，决定归复一个人的正常生活，请家里人放心。另一件是为了把戏演得真实，咱们28日回北京，回去就是个正月十五，让你家来人跟你见个面，我找个和尚陪在你身边，是被我们打击处理过的一个和尚，我们找他，他会老实地配合的。有和尚在你身边，你家的人就更相信你是刚从五台山回来的。让家人来的时候坐飞机，要快。」于又说。

「我家人配合你们演戏这来回折腾的费用必须你们承担，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我提醒他。

于同意了费用由他们来承担。27日晚饭后，于又进来，说他明天与其他一起来的人坐飞机回北京，今天晚上已有两辆车从北京出发，赶明天天亮前赶到榆林接你回北京。我看他满脸冰霜就调侃了一句，说他脸上愁云惨淡。

这一触激发了他淤积在胸中的不满：「还说呢，还不丫的为了你的事。这他妈的都颠倒过来了，我们好歹也是代表部里来的。来的时候，给丫的地方局领导带来了两箱『二锅头』，那都是国家领导人赠送外国元首的酒，一万多元钱一箱，竟然没有一个人来接，让人目瞪口呆，连个他妈的小兵都没有来。这酒就没有送出去。这明天就要走啦，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低个头，没有什么，没想到这一低头还低出个更恶心的事。我让小张（张雪）跑前跑后忙乎了半个下午，在他们这最好的宾馆定了两桌菜，当地领导竟一个都没有来，又连个小兵都没露面，这他妈的真恶心的。这小地方的人做事真叫一个『绝』，这他妈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哎，你还不用说，在新疆的同志好，不光热情接送，吃、喝、玩，每天都有人陪着。」

我说：「说得露骨究竟比不上做得露骨，你们终于就是一群利合之徒。你代表公安部来，帽子虽大却于榆林地方无益，公安部决定不了他们的任何利益，如果是陕西公安厅来人，那就不大一样了。而新疆同志好恰是他们愚昧或都是不狡猾的证据，你们把对我的关押说得神圣高尚且天花乱坠，而经费却截留在你们北

京局的手里，除新疆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愿意接手我的事，谁都清楚你们在做什么。」

「保卫国家安全，谁在台上都会这么做，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好啦，咱不扯这个啦……」于又接着说。

十九、一场演给外面看的戏

2010年2月28日，早饭刚过，孙荻、张雪走进囚室，后面跟着两名警察。孙荻一个眼神，那两人走过来将一个黑头套套在我的头上，然后将我架上了车。

我能听到前面有警车开道，一路喝令：「前面的社会车辆靠边，前面的社会车辆靠边。」

而后面又有警车殿后，一路喝令：「社会车辆不得靠近车队，社会车辆不得靠近车队。」

我听到车过了高速路收费口，听他们说：「停一下，让地方警车撤回。」

过了高速路，头套被人抓下，我一看，车辆由张雪驾驶，车里有孙荻及一个不认识的人。

我最担心张雪驾车。由于于泓源的赏识，致他大脑常处于亢奋状态中。这绝非偏见，其亢奋之态显溢于言行。他开车飙高速常险象迭生。这次上了高速，不到一小时即出现了两次惊心动魄的危情：一次是差点与一三轮车相撞。第二次是他正奋力超一辆大客车，一声巨响，尘烟犹龙卷风般飘起，车内瞬间黑暗充塞，能见度为零，骤生骤死尽在转瞬间。一个猛刹车，身体扑撞在前椅背上，只两三秒钟，车内外亮了起来，原来那辆大客车爆胎，正在我们面前像醉汉似地摇晃前行，等看清情形后，我们的车辆停在了路边上，张雪自己提出来说不敢开了，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若继续由他开着，我一路上精神将无宁矣！

到了北京天已经黑了下来。我发现车并未朝着我家的方向行驶，因问其故。

孙荻说：「先到一个地方歇一歇，等与你家人见面后再回家。」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我想他说的是有点道理的，但他们的出尔反尔是极寻常的，我提醒自己，先让家人得到我活着的消息再做计较。

当天夜里，我被押至一个山区，关在一个七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有几名警察轮流看守着。房间里除了两张床外什么都没有，可以看出来，那是一间客房，

而电视机却被搬走了。第二天一大早，孙荻进来说有人找我谈话，并将我带到一间类小型会议室的房间，一位颇肥硕的和尚坐在里面沙发上，旁边坐着于于泓源。

我坐下后，于向我介绍说：「这是位五台山的师父，从现在起就陪着你。你弟弟下午的飞机，（昨天在路上，孙荻递给我一部电话机，说：『通知老四，让他明天下午飞到北京来，今天是来不及了，就说你现在正从五台山往北京赶着呢，其余什么也不要说。』）始终有我的人贴身陪着你，由我的人给你开车，你和和尚师父一起到机场去接，你弟弟来回的费用、晚上的住宿由我派人负责，你给他介绍就说他们是你的朋友。你接上以后只能在一起简单地吃顿饭，由和尚师父和我安排的人以你朋友的名义陪着，吃完饭后你就说你有急事要离开，然后你们就分开了，你回到这里来，我的人以你朋友的名义给你弟弟安排吃住。」

我清楚这场戏根本不是演给我家人看的，只是演给外面看的。我没有说什么，不管怎么说，先让家里人看见了我还活着，这比什么都重要。当天下午五点多钟，我们见到了弟弟，然后直接赶到一个专供佛门人士饮食的饭店，草草与弟弟吃了一顿饭，由于于泓源的人始终以我的朋友、司机身分「亲密」相随，兄弟俩只能用眼睛交流感情。我从不愿让我的家人了解我的危险处境，吃完饭我就匆匆离开。

车穿行于北京市区，一年多来第一次看到窗外夜景，灯火阑珊中溢动着形式上的人间气息，总觉得似在梦中，总怀疑是身在这人间，虽身在其中，仍恍若隔世。因为我清楚，我只是路过「其中」，回到秘密囚禁点我的世界里，才是车辆飞驰的目的。但我也有我的准备，我担心他们再次假戏真唱，因为这场表演有一个很明显的功能——我现在并不在政府手里，这是他们的核心目的。然而，我却完全被扼控在他们的手里。他们的目的是想让外界相信我并不在他们手里；而我的目的则是让家里人知道我还活着，并且设法让家里人知道我一直就在他们手里，现在正在演戏。我「成功」地达到了我的目的，并使双方的局面再次紧张到极点。

二十、官在我眼里犹若敝屣

第二天吃完早饭，于泓源又找我谈话，可以说他又邪灵附体、脑子被驴踢了似的。谈话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

「按你在榆林时的当面承诺，昨天我就无条件回到家里，还谈什么话？」我先

问他。

于说：「你回到家也还全天候在我的人手里，再在这休息几天吧。」

「没有任何地方能比家里的休息更理想，你不要拐弯抹角，你究竟想干什么？」我问他。

「老高，你玩不过我们，我在两天的时间里很轻松地导演了一场大戏，你都是主角，演什么？演你不在我们手里，过去几个月不在，现在也不在。你的亲人也亲眼看到了你不在我们手里，不客气地说，你的处境比前阶段更危险了。因为前阶段还有一种可能，你可能在我们手里，老多次来北京要人，就说明了他们认为你可能在我们手上；这次情况是不大相同啦，大前天你写信给家里人说自己出走五台山，昨天你又亲自让家人看到了你是自由的，而且不在我们手里，你现在在死活都跟这政府没有关系了。希望你认真地考虑一下你的处境，别终于来个鸡飞蛋打，你说是不是老高？」于说得眉飞色舞。

「客观情形就真如你说的一样，又能怎样？」我问道。

「哎，老高，跟你沟通是不困难的，人很直，脑瓜儿也不怎么笨。别斗了，没有前途的。换身分，只须换个身分，而且是秘密地换个身分，换了身分后两条路：一条是留在国内，你继续做你的英雄，继续嚷嚷下去，骂共产党，继续待在原来的圈子里，我的人会定期或不定期地，以别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和你接触；我们给你建立一个账号，设国内还是国外由你定，保障你有足够的钱用。另一条是改变了身分到国外，我们以强制扭送出境的名义把你送到泰国，然后你肯定有办法到美国；在外边给你设个账号，我们会定期把钱打入你的账户，可以具体确定个数字，对于解决你的问题代价，上面是有个授权范围的。每月小几十万美元的杠杠我这就答应，太狮子大张口的标准我只能向上争取，但钱不是个问题，因为你是个大家伙，值得花大价钱，我会定期派人跟你接触。老高，活得现实一点，现在很多人都在给我们干，我是说在国外。今天就咱俩，改变身分的事就咱俩知道，连我的娘老子都不会让他们知道的，往境外送的具体过程我是外行，这方面的负责人我也带来了。老高，这次我可没有给你留后路，而且我可以给你说明了，我连自己的后路也没有留下，我是给上面大领导打了保票的。」

于一口气说了有四十多分钟。他看着我，在点烟的过程中都抬眼继续看着。

我说：「老于你不应当用一个赌徒的心理来处理并不属于你我个人之间的事，你别说我说得难听；官在我眼里犹若敝屣，却被你宝爱如命。你总以为我的命控扼在你的手里，就会成了你手里的玩偶。这几年你常有这种得意，而且每次

稳操胜算的得意忘形于色，终于时至今日你还是处在像以往一样的筹算过程中，总以为设个不大智商的局，即可以所向披靡。实在是大谬不然，这次也不会例外，你还是会以失败告终。而我，未想着这种过程中我会是个胜利者，但我仍会保住一些东西的，比如我再次会活着回到亲人中间，这一点你改变不了，你背靠的政权也改变不了。这么多年了，你迄今痴心不改，总不肯放弃不切合实际的幻想。结果如何？结果是一次次给我制造了些困难的过程，而你却一次次得到了失败的结果。你应该不会忘记，2007年7、8月份的一个夜里，你们将我绑架到昌平，你说了什么？你当时说你『用陕西同志的办法』（指酷刑）一定能使我乖乖地就范。结果怎么样？」

我还正说着，他突然暴怒难抑，一掌拍在茶几上，大喝一声：「别说啦，别他妈的扯远啦！那次在昌平怎么啦，说了用陕西的办法操丫的，我失言了吗？不也操得丫的求饶吗？不是写出去了吗？有用了吗？有人怕这个吗？我不不在这操着你的小命吗？这次还是这话，不服再操丫的，操死啦，我担着。」

「老于你别发火，那不力量，也没人怕这个。这么多年，多少次你动辄即暴怒狂骂，可因此而改变了什么？我从不认为我是英雄，在你们施暴过程中确实求饶过，那是因为我的天真，以为施暴者还有人性。这次在新疆的酷刑，可有人给你汇报说我求饶过？倒不是说我终于成了英雄，只是不再像以前一样糊涂啦。你用死来威胁我，死，大致上不是什么好事，兴高采烈追求死的人则更是少见，至少，我不是，也绝不愿死，但绝不会为了免死即放弃任何东西，更何况，我从不认为我的命会终结在你们的手上。他绝不是个偶然的过程，终于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我说。

「老高，我现在还用得着威胁你吗，局面你现在应该是反应过来啦。在新疆是，我们没有做了你（指害死），那是因为毕竟没法抖得那么干净。你陕北一大家坚持你还是在咱们手上，今天完全反了个儿，老四不亲眼看见了吗？刚从五台山回来，身边还有和尚陪着，你们家自己会向全世界证明你早就不在政府手里啦，你就等着看热闹吧。谈不拢了就干脆操死丫的，绝不再拖泥带水，你这几年也一路看着过来啦，我什么时间婆婆妈妈过？给你几天，你自己掂量去。」于激动地说。

「老于我现在就给你个结果吧，不过你听了别火，发火是无力量的本能反射。你觉得一手导演的欺瞒世人的闹剧是严丝合缝，可那天吃完了饭，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雪，一出门，我便对寸步不离的『司机』不经意地说了一声：『下得太大

了，你去把车开过来吧。』他立答：『好了您哪。』后拔腿便跑向停车场，中间有三、四分钟的时间我给老四讲了一些与剧情无关的信息，我现在只能想起两句：『我们都在演戏，从去年9月25日失踪到今天，我一直就是在他们手里关押，今天我们周围的人，包括你周围的那些人，都是共产党特务，回去立即告诉家里实情。』」我接着他的话说。

「王八蛋！言而无信的东西，丫的不明摆着玩我们吗？我都向大领导打过保票了，是你把我往绝路上逼，要么改变身分皆大欢喜，要么鱼死网破，我他妈的要灰头土脸了，谁也别想好过了！还是那句话，给你几天考虑时间，希望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于说完站起来就走。

二十一、蚕食了天道的份，焉可长久？

于泓源一离开，孙荻、张雪走进来，一左一右架着我就走。我被关在一间约七、八平方米的房间里，里面摆了两张床，使室内显得异常狭窄。警察每二十四小时换一批，二十四小时里他们实际上也是被关在里面。由于房间完全封闭，加之那些秘密警察人人吸烟，室内空气污浊不堪。开饭时间会有人将饭递进来。

又关了一个星期后，孙荻来找我谈话，说：「你真是一点都不为自个儿考虑啦，于局给了你时间，你考虑得怎么样啦？我们不来找你，你就打算搁这儿过一辈子呀？我就百思不得其解，老高脑子怎也会糊涂到这份上？一次一次给你好路不理茬，非要往死路上扎。说点心里话，老高你是不是自暴自弃？这几年是惨了一点，但也不至于完全不负责任，不为自个儿和家人的将来考虑呀。说说，今儿咱聊聊，想什么，说出来，咱一块儿想办法。说说老高，不能老这样儿呀？」他说完了就看着我。

我说：「你说我一点都不为自个儿考虑，那是你的臆断。我是个俗常人，我还就每时每刻都在为自个儿考虑，只是没有按你们画定的道走。更不是什么自暴自弃，恰恰相反，这是对自己未来认真即有自信心的结果，不愿意稀里糊涂瞎活着的结果。毫无疑问，从物质层面上，中国人民还需要面对几年无奈，我则更是如此，属于我必须经历承受的困难过程是躲不开的，但绝不会像你说的是一辈子。既然是个过程就一定要有结束的时候，且为时不会很远，我的寿命要比共产党剩下的时日不知要长多少，这点我不再怀疑。之所以有这种近乎神奇的直觉，是缘于对天道的自信——你们对无罪的人长期非法囚禁，屡屡施以摧毁人类声誉

的暴虐，这是对天道的野蛮践踏，是蚕食了天道的份，你们焉可长久？除非天道本身也自暴自弃，或着是无能为力或竟本无天道。但是，人类历史已无数次示教过我们，天道的存在及其浩荡力量从不是个或然关系。我坚信，共产党政权的无法无天，终于到了个天道彰明的时候了，因为这里还有个天道的『声誉问题』。」

「老高你丫的是不是几年给关傻啦，你扯哪儿去了？你扯那些有屁用吗？让天道来放你回家？这不睁眼说瞎话吗？就扯自个儿屁股底下的事，别整那云里雾里的事，怎么想现实一点使自个儿回家去，而不是想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于局给你几天的时间让你想，你尽扯这个，这不睁眼往悬崖下跳，这不明摆着把自个儿往火坑里送吗？别抱幻想啦，我们没有时间跟你扯这些没用的东西，你就干脆给个明确的回话吧。」孙荻显得有些不耐烦。

我不再说话。

「说你呢老高，痛快点给个话，于局还等着我回话呢。」孙又催促道。

我想我在原则问题上的态度无须再说什么，所以继续选择了沉默。

「老高，丑话咱先说了，咱们打了几年交道啦，政府的手腕你不是没有领教过，不需要说得太明白了，何必自找苦吃呢？我们没有对你提出过高的要求，你说呢？」孙荻站了起来盯着我说。

我终于不再说话，孙荻气呼呼地离开并使劲摔门。孙荻离去了，囚禁终于还在继续。

二十二、想在你脖子上套个绳子牵着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又是孙荻打开了门进来。

「老高怎么样？考虑得怎么样啦？」

「答案从来就有，也没有过模糊不清。」我回了一句。

「走，于局又来找你谈话。」

他说完转身就走，我蹑踪而往。进了谈话室，于与「瘦猴」坐在正面的沙发上，于脸上挂满了笑。

「嗯，老高，气色还不算坏，怎么样？」他问了一句。

「气色，实为心色，是心情的外溢指标。你满脸挂着笑，却气色灰暗，一定心情不佳。」我边坐边回了一句。

「高大爷，高局，我现在见你比见大领导还要紧张，被你给看出来了，你的

事悬在那儿，心情就没有好过，能好吗？替你着急呀，在你跟前是吃力不讨好，今天咱们聊聊，得往前迈一步呀。老高从五台山回来啦，回来怎么又悄无声息啦，这不正常呀，所以咱们一起想个办法，先把这一步走出去，也给你创造一点宽松环境，让我也有个回旋余地。都让一步，用你的话是在技术上都让一步，你看怎么样老高？」他又满脸堆笑地说。

「我从不反对谈，谈本身并不决定着什么，但有分歧，用谈的方式探寻解决之道是一种应当肯定的文明。当然，我这并不是说你们已经具备这种文明能力，谈话不是你们的诚意，而事实一再证明，谈只是你们的手段和诡计，事实也一再证明了手段和诡计从来没有能给过你们一点实质性的好处。恕我之言，希望你们能记得以前的过程，我不止一次在你跟前提到过，人和人的智商差别有时不是特别大的。你既跑百十公里来找我，肯定有自己的成熟想法，你就直接说出来，大不了还是原地踏步罢了。」我谈了我的观点。

「呀高局，不愧做过大律师，直接为谈话定下了基调：留下了可能通道，堵死了该堵死的，痛快。我琢磨出一个新想法，我知道，大局的主动权从来就不在我们手里，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结构性的主动权从来都在绝对的弱者一边。合作与不合作、如何合作、何时何种程度合作都反而是弱者一方说了算，作为绝对强者的一方反而完全被动。我们的主动只能是技术方面采取措施，为什么跟你扯这个？因为你对这一切是心知肚明，这么多年来是政府一直围着你转。眼下的问题是设法往前迈一步，不谈改变身分的事，只能谈改变现状，使双方都走出这个僵局，你说呢老高？」他侃侃而谈。

「老于我提醒你一下，你刚刚谈到了『绝对弱小』和『绝对强大』两个词，实一个观点的不同表述。核心是你们头脑中根深柢固的所谓『当局绝对强大』的误念，你刚才的表达证明了你并未禅悟透了强大与弱小的相对及相应转化关系，认识的错误即导致行动的谬以千里。你们拉开架势跟我缠斗了五年，手段无不用尽其极，结果怎么样啦？我希望你们能吸取一些东西，哪怕是在技术过程中。至于你刚提到的『双方僵持』，我不大认同，僵局从来不属于我，一个一个的僵局从来都属于你们，且都是你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直接说出你的想法吧。」我回答他。

「好，跟他妈的律师谈话还真得处处小心。是这样的，咱们对外说是你自己失踪的，从五台山回来了，可这回来后又没声没息的，外面有很多质疑声，政府也顶着压力，现在先解套。这次关着，又受了些罪，你出去还会写的，我算计得

清清楚楚。明说了，我们手头必须捏个东西，不捏个东西，你把那些东西写出去了，又把大伙儿搞得很难堪。你现在给政府写下个东西，就说这几个月政府对你很好，你很感激政府，不但很感激，而且将来回归社会后，还愿意在政府的关怀下做些有益的工作，做一个正常的社会人，让我们给上面的大领导也有个交代。说白了，想在你脖子上套个绳子牵着，而套这个绳子对你绝对有好处，要不然，我太清楚你啦，出去了就写，写了就被抓。兜底说了，如果连这点都不让步，就只能无限期地关下去了，怎么说，继续关着的压力要比你把新疆受了点委屈（指酷刑）那点事写出去要小得多。我就跟你全说了，因为没有你琢磨不透的事，你自己选择。如果愿意，一个月内放人；如果不答应，就移交给义务兵看管，在部队慢慢待着去，我们也不愿意再和你纠缠。说心里话，如果由我个人决定，我更愿意让你长期关在部队，如果放你回去了，北京局能安省得了吗？还不是折腾我们的人。你现在回去了，还不是等于又回到了问题原点啦，而且会比以前更疯了呢！耿和她们娘仨不在中国啦，老太太又死啦，谁还能管得住你呢？五年多啦，政府投进去多少人，钱花得海啦。现在回头看，放你回去等于一切功夫都白花啦。行啦吧老高，自己也应该有个正常生活啦。但现在有一点，就是我让你给政府写的东西一定得写得肉麻了，越肉麻越好。这是我们最后的台阶，能让我们下了这个台阶对大家都有好处，否则，就立即拉开距离，你待在部队去实现你的伟大抱负去，我们也还有自己的事要做。两天之内小孙来取你写的东西，今天就谈到这里。从今天起可以给你点书看，也可以看看电视，但遥控器得掌握在看管人员手里。」他一口气讲了半个多小时，我能记住的也就这些。

于泓源与瘦猴君离开后，孙荻把我送回囚禁室，一进门，递上一沓稿纸和一支笔，说：

「记住，一定要写得肉麻些，越肉麻越好。」

我并没有接住，他立呈目瞪口呆状。

「刚才不说得好好的吗？」他说。

「说得好好的？是谁说得好好的？说得好好和答应得好好的是两码事。」我回答。

「你不答应刚才为什么不当着于局说清楚？你现在这样，领导不又怪我无能吗？你不害我吗？」孙荻显然生气啦。

「我断无这般无聊。」我答。

孙继续在那里嚷嚷着，我不再说话，终于他生气而离开。

二十三、近距离观察富二代

对我的囚禁从来都是黑帮式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什么样的黑暗过程、什么样的野蛮场面都经历过啦，若没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没有一定的消化那种苦楚的能力，那些过程真还可以使人面目全非。

密封式的小房间里关押，除酷刑外另一个绵绵不绝的苦楚，就是这种环境里秘密警察绵绵不绝地吸烟。由于他们进入囚室时不允许看书报，不允许看电视、接电话，夜里也不许睡觉，只能坐在我面前看着我，我感觉他们是一律的心里空域不甚大，都没有什么信仰。人人吸烟且是不停地吸，房间又是完全封闭的，满屋浓烟塞得满满实实。他们换了班后可得以换个大空间，可我却全天候地，有时是几个月、几十个月就持续地闷在烟雾中。毫不夸张，身上任一个毛细孔散发出的都是死烟气味，对于我一个不吸烟的人而言，那是一种灾难，一种无论如何都不能摆脱的灾难。十年过去后，我发现我说话的声音已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陌生人的声音，且迄今不能改变复原。

这次的看管人员中有一位山东大汉，他应该是刚走出大学校门，身高一百八十多公分，膀大腰肥，从后背看像个五十多岁肥硕男性的体型。其他人悄悄告诉我，说他的父亲是山东某地级市的地税局局长，说是富二代，钱很多，北京的房子买了一套又一套。这家伙爱穿双球鞋，大略是人年轻火气大，每次一进囚室把鞋、袜都脱了，那脚臭得足够气魄，绝不夸张，那段时间他那双臭脚给我的苦楚是空前绝后且永无能力忘掉。他倒没有让你酣畅淋漓地呕吐，却维持着让你欲吐不能的持久状态。当然他的到来也有积极的方面，他使得我有近距离观察富二代的光荣。他吃鸡蛋不吃蛋黄，吃包子不吃皮。蛋黄、包子皮都当垃圾倒了，而无一点难为情。他的同事，那些老警察老在他背后冲着我伸舌头。他很少说话，但说出一句，即能让你感到富二代的气魄和干脆。例如，有一次和他一起值守的警察提到中国没有一份敢讲真话的报纸，相比之下《南方周末》还能讲点真话，没料到这家伙劈头来了一句：「《南方周末》是哪的报纸？给丫的关了！」一次有人说起上访人员阻拦三号首长的车，他爆出一句：「给丫的腿打断了！」逗得老警察直耸肩。

二十四、为老人我愿说违心虚假的话

终于又耗到三月下旬，一天，孙获又来找我谈话，还是关于写一份「政府待我好，我心怀感激且终不能自持」的事。这是一种典型的做贼心理，心里不存有一点的坦然、自信，总是设想掇取点虚假的东西以遮障这种不坦然、不自信。对我而言，这究竟还是个技术问题。技术环节上的挪腾，妥协从来不是我反对的，但于的要求是命令式的，且一定要写得肉麻，这种蛮横常使他在本不该失败的环节上失败得灰头土脸，但他们从不吸取教训。从2006年开始迄今，凡属非结构性、非原则性的问题，凡有妥协余地，我都做妥协选择；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是我犯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并非妥协本身，而是对象的不能，即我的对象是只有诡计没有妥协。我的妥协换来的是一些灾难性的苦楚。我总以为对方有妥协的意识是个好事，我们当鼓励这妥协，有时哪怕牺牲一些实质的东西亦有价值。但妥协遭遇了诡计。

我曾与一个老警察谈到这一现象。他说你屡遭酷刑的一个结构性导因是「法轮功」问题，说其实那次酷刑（指2007年9月21日那次）完了，你写出去正符合当局的意思，说你那次酷刑写出了，正好起到威吓作用，「法轮功」问题是绝对的高压线，谁碰谁死，连高智晟都敢整，谁还敢再碰？他说你屡遭酷刑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老愿意在一些过程中做出让步，他们不懂得妥协，他们百分之百地会认为这是你的软弱，认为酷刑对你有用。因为政治犯他看管了许多，你若从一开始就不做任何让步的话，在肉体上他们一般不用酷刑。说对刘晓波就不会有酷刑，因为他从不让步。他说其实他们在一旁观察的人最清楚，明摆着你有让步的方面，也有死不让步的方面，可他们想不到这点，总以为酷刑起到了作用。说妥协是好事，但绝不是对一群从不懂得妥协价值的人。

在他说了这番话的时候，我依然认为，即使对当局，在不毁大局的情形下，当把妥协作为一些技术性环节上的选项；但今天我已不再这样坚持，这是我吃了许多苦楚后终于得来的经验。

写一篇说他们在关押期间对我「恩重如山」的文字，避免这种已延续了十四个月的地狱般的囚禁，从精神上舒缓一下我亲人的压力，对我的感情而言是有价值的。我一想到老人数月里奔走在各太平间之间，哭而抚尸辨认的残酷（是新疆警察告诉我的实情）现实，我的心犹如锥刺之痛。我愿为老人做出任何牺牲，违心地说些虚假的话。我最终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写了一篇说他们在关押期间待

我很好，我很受感动，愿意回归社会，过「正常」生活的文字。

其实，关于写这篇东西，几位看管警察私下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认为应当写，认为所有当局这次的囚禁，分分秒秒都有许多眼睛在场，不应当为这点坚持而继续被囚禁。我写了几页夸他们经济上取得的成就、秘密囚禁期间待我犹如上宾的文字，结果孙荻一看不满意，说一点都不肉麻，得重新写，被我拒绝。想要肉麻的感觉在我这里是做不到的，终于这事也就只能如此了。

二十五、网上发现了「我的电话」号码

至3月28日，我又在北京密云山区被关押了一个月。这天一大早，孙荻、张雪将我带到谈话室，于泓源已坐在那里，脸色十分阴沉，双眼下视地皮。

我进去坐下，于继续盯着地皮说：「老高怎么样？」

「有话直说吧，被非法囚禁着，你认为应该怎么样？」我也不看他便回了一句。

于立即把目光转向我：「什么意思？你还不高兴呢，我他妈招谁惹谁啦，到处他妈地撞灰，不都是为了你的事？在榆林的事真他妈恶心，打着公安部的名，送酒没人来收，摆桌子没人来吃。按有关领导的布置，准备在山西给你找个地方待上一段时间，我代表公安部负责具体联系，联系他妈的好几天啦，他们丫的根本不理你的茬。昨天我真他妈火啦，给丫的来了个最后通牒，让他们在五台山找出个独院来，夜里十二点钟前必须落实并回话，否则后果自负。这他妈都到今天早晨啦，他们丫的到现在都不理你，还没变天呀，这他妈的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本来安排好啦，我就可以不过去，北京还有多少事需要去办，害得我还得亲自过去。你不高兴，我们高兴吗？多少人一天围着你转？还有你看不到的呢，没心情跟你瞎掰了。今天转移地儿，不要问为什么，我们也是棋子儿。本来还想跟你聊些事，一看你那样儿，算了，带回去吧，吃完饭了出发，我带两车先走，你们天黑赶到就成（后面这话显然是给孙荻、张雪说的）。」

我又被带回关押室。这天中午时分，我被两人挟架下楼，外面停了两辆「别克」商务车。我被押上车后，车子一路开向山西，至日暮时到达山西五台山上。

于泓源未能如他所愿在山西五台山上要来一处独院，山西方面只差一个当地县公安局副局长出面应付，既落实不了独院关押场所，更说抽不出警力来接手关押我的事。于气急难抑而终于无可奈何，最后终于住进了宾馆。而按要求，凡是

我住进去的宾馆、饭店，当局必须将整座宾馆给包下来，绝不允许其他人人住。然而，五台山的宾馆价格高得令人咋舌，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到了五台山的第三日，天不亮我就被押上车，离开了五台山。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台上的头一天时间里，于突然进了我的房间递上一部电话，说我们发了你在五台山的消息，并在网上公布了你的电话，说就是你的手里这部，你对外就说你在五台山待了几个月，过几天就要回北京了，就说你是自己在去年来五台山的，现在是自由的，只有用这部电话与外界通上几天话才能放你出去。反正你家人也已知道了真实情况，你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这就是外界突然在网上发现了「我的电话」号码，并与我恢复了电话联系的真相。但这种恢复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情形让当局大为惊恐。于一日数次到我的房间里，说现在还有这么多的电话联系你，太出乎意料了，说这等于政府这几年的工作白做了，说本以为堵上几年外面就把你给忘了，「这点上我们是失算了」。那几天电话真的多得令人恐慌，有时接一个电话完了，就会显示几十个未接来电，专门就有几个特务在我跟前掌握我接电话的情况。

他们的监听手段还应当是颇先进的，他们可以同步地在我接话的现场监听。因为我刚与范亚峰博士通话结束，于就推门进来，对范刚在电话里的言论骂骂咧咧。而对我通讯的监听手段，他们在2008年即获得一种新技术，即不再与具体的电话号码发生联系，而是通过声音监听，即只要我通过通讯工具讲话，都能囊括在他们的监听之下。

然而，关于第三天天不亮就突然急急离开五台山，肯定有什么被他们掌握了的情报迫使他们如此选择。

因为于说：「想让高平静下来千难万难啊，有人不愿看到这点，要撵到这里来找你。」

二十六、忻州遇道士

一路上尽是些大山深沟，公路延伸在逶迤连绵的群山间，几个小时后车队到了山西忻州，不知为什么，一群人并不住在市里，而是颇费周章找到一个村里的农家乐旅游点，那去处倒也豪华气派，但听着看管警察透露，说只在这住大半天，晚上就会搬到市里一个五星级酒店去住。果不然，刚吃完晚饭，我又被押上车，车由张雪开着，由一个穆姓的年轻人指引路。慌乱中，那小警察说错了路，

张雪破口大骂，那蛮横和跋扈的程度实在可观。他并无任何职务身分，和那小警察只是同单位同事，但他却有一种特别能耐，就是讨得于泓源喜欢。他对于泓源是言听计从，而于也常对其耳提面命，凡于外出，必带他而行。

那小穆这次出来是有特别任务的，否则，他作为非北京籍警察，外出是绝不能轮到他的。也许这不是刻意安排的结果，却在客观结果上是个不二的规律。即凡是外出陪我旅囚，百分之百是北京籍警察。这些年来，我外出旅囚次数以数十次计，从无例外。至少在我的印象中，很多北京籍警察，在媚上及凶残方面不仅超群且毫无底线。每次对我的酷刑百分之百都是北京籍警察。第一次酷刑时倒是安排了一个外地籍警察，结果他的表现实在是「不尽如人意」，他从头到尾没有动我一根指头。在前几年对我家人的贴身跟踪中，多次对我一家殴打及人格侮辱者，跟踪过程中有最泼皮无赖恶行的，百分之百是北京籍警察。这几年的秘密囚禁中，给我制造困难及百般羞辱的，全是北京籍警察，每次对我实施绑架的也无不如是。这不是一种偏见，只是对一种客观存在的记录。何以如此？我不大愿意浪费笔墨去揣度之，但这究竟是个客观现实。

车终于在张雪的暴戾中停在了当地最豪华的宾馆门前。我们在那里住了三天，那房价及饭菜价实在高得可以。在那里，他们对我的管制开始有所放松，早饭后及晚饭后各允许在外面散步一小时。第二天早饭后我下了楼，这是半年多来我第一次在阳光下不戴头套的散步。有趣的是，一出宾馆大楼，四名「保安」两翼随行，不舍寸步，引起了周边正覬觐机会的江湖术士的注目，其中一装扮道家的人物连连冲我作揖。我并不与他交涉，因为我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且是数月来的第一次。但是，他显然觉得我是他的一次机会，边喋喋不休夸他自己的前知后算能力，边倒退着表扬我的「大富大贵」福运。我心说：「你真是瞎眼加倒楣，我自己也几个月没有见过一分钱的面，今天更是囊空族一员。」他却纠缠不清，我的「呆镖」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我一句话摆脱了他，也逼笑了几位冷脸「保镖」。

「我说你既然有百千年的前知能耐，你就算一算我眼下接不接你这一单生意，若算不出来，请你旁立，不要再纠缠了。」

他听了立即目瞪口呆立在一旁目送我们离去。但今天我却用这段文字纪念他，究竟他也是半年多来第一位在阳光下与我交涉的，中共警察以外的不知内情的人。

在忻州住了三天，在外散了六圈步后，我们于第四天赶往山西大同市，又是天不亮转移。

二十七、警察「和尚」陪着回老家扫墓

到了大同，我才悟出了他们押着我故作神秘状到处转移的真实目的。他们这样做旨在欺瞒上级，实际上是假情报糊弄上级，而以高频率转移关押地来达到游览名胜古迹的目的。上午他们带着我去了悬空寺，在那里让我大开眼界的是军车大阵、警车大阵的蔚为壮观。其中，一阵空军六辆「别克」商务车车队就停在我们旁边，车上下来的却是一群妇孺和老耄之人，大略是几个家庭。我指出他们这都是违规用公交车旅游，结果看管警察说我事多，说别人都想不到，就你长着歪心眼。我未再说什么，我知道与他们谈这些无异于对牛抚琴，何况，我们的车队不也正在公费私游吗？但下午他们就吸取了上午的教训，为了不再让我看见「负面信息」，下午他们赴云岗石窟时就留下一人看着我，说让我好好歇着。

他们在大同尽兴后，作为向外欺骗的一部分，他们突然提出让我回一趟老家，但有二个条件：一是我必须穿着和尚的服装；二是由小穆装扮成和尚陪伴着我（就是在忻州被张雪大骂，我提到他有特别任务的那个穆姓警察），到了老家后还必须由「和尚」二十四小时形影不离地陪着我。但被我断然拒绝，回家看看亲人、给父母扫扫墓对我是太有吸引力了。这不是简单的几个月生离，而是几个月的「死别」。我的「死而复活」对我的亲人而言，是集莫大的幸运与莫大的悲伤于一体，一家人渴望着能看到我，我也渴望着能回到他们身边给他们些许安慰，但绝不能是无底线地被任意搏捏。这样，一群人就僵在了大同市。最后，双方都做了些让步。对我而言，没有警察陪着回家，这连可能性都没有，这十多年来是没有例外的，这次不过是装扮成出家人「和尚」而已。终于达成的结果是：我不穿「和尚」服回家，而由警察扮成和尚，二十四小时形影不离地陪着我。

2010年4月3日夜，我在「和尚」的陪同下突然回到家，一家人喜极而泣下。大哥竟像孩子似地呜咽起来，我知道那呜咽声里埋着道不尽的委屈与无助。

大哥走过来抓住我的手，边哭边说：

「老三，再哪里都不要去了，中国太危险了，他们不是人（指政府），完全不讲道理，即便是别人家里的猪、羊，你能不能随便抓走？抓走别人家的一个狗娃子你还得给主人打声招呼，我们的一口子人，啥时想抓啥时抓，连个招呼都不

给你打，每次抓了过上几个月就不承认啦，天底下还能有这种政府？大哥求你啦，就待在村里，我们养活你，不要再去受罪了。」

看苍苍白发的、像孩子般哭着的大哥，我自己也早已泪水滚面。我知道我的亲人这几年所受的常人难以感到的伤害，这常让我犹历锥心痛，但我实在不能获得久伏于苟安的能力。我为了亲人，不止一次地尝试过，而终于都归于无效，因为让我目睹颠倒黑白、颠倒是非而不开口，比让我立死都难受。那种对心灵的煎迫、痛苦憋屈，绝不比遭囚禁时好受，这与什么高尚、勇气绝无交涉。这是人性中固有的东西，至少是个性中我无力遏抑的东西。

我不止一次对当局谈话对象说过，要让我对明明白白的罪恶无动于衷，唯有硬暴力堵嘴一途。只要有条件，我就会大着声说出我看到的罪恶。一部分人无法无天的罪恶为什么能在化日下畅行无阻，就是因为受害者和旁观者一律的闭嘴。这种一律闭嘴实际上成全了罪恶，成全了这民族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苦难与不名誉。有些人对当局花惊人的力量规模来扼控我，感到惊讶不已。我却认为这是这个恶政权少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之一，他们太了解我了，也知道我太了解他们了，他们是最善于利益计算的，打压我「一年要花费上千万元」（于泓源语），划不来的事他们是绝对不会干的。

就在我和大哥泪水滚面之际，那「和尚」一手掌竖立，一手快捻佛珠，双目紧闭而口中则念念有词，一副蹙额苦容状。若不明究竟者，必以为那是因着大哥的哭诉所致；那浩渺幽深的权力罪恶，正与「出家人」胸怀的善办理着激烈的交涉。但真正让这「出家人」窘蹙的是大哥接他儿子打来一个电话时的一句话。侄子打来电话，大哥来不及擦把眼泪即下意识地告诉侄子：「你三叔回来了。」大概是侄子问了一句：「就三叔一个人吗？」

大哥脱口而说：「哪能是他一个人，还跟了一个假和尚。」

和尚听得一愣，大哥却看了出来，说：「你不要愣，共产党能比家里人更瞭解你吗？你的性格，怎么可能为了自己悄无声息地出去又半年不给家里人来一个电话呢？怎么可能带着个『和尚』回家呢？连咱家里三岁孩子都骗不了。」

那「和尚」停止了「法事」而低头不语。

这次回家适逢清明节，我和全家在「和尚」的陪伴下去给父母扫墓，全程在家待了不到两天时间。4月5日中午后，我与「和尚」一同打车赶至榆林宾馆与在那里的「和尚」的领导们会合，并于第二天即4月6日傍晚，回到已别去了十四个月的小关家里。

二十八、与美联社记者会面，链接全世界的关爱

家，是一个极丰富的概念。那个家从来没有像那样凄凉过，他们娘仨成就了那个家温暖和欢乐的全部。她们的离去，使家成了一个空壳。

暂时没有了家，却不是没有了人「关心」我，不仅夜里有人在门外面值守，就是身边也有政府无微不至的关照。他们颇似羞惭满容地将一个数码录音笔塞进我的兜里，说便是睡觉也要放在枕头旁，说政府这是为了你好，为了保护你，不允许关掉，他们每天夜里有人来调适一次。其实，他们也只是一种侥幸心理，对我是否服从心里没有底。我一进门就把他给关了。

第二天一大早，孙荻、张雪就来找我，孙荻一来就问录音笔放在哪里，想看看录音效果。我从厨房找出来递给他，他一看录音笔是关着的即大为不悦，问为什么把录音笔关了，我回答他因为昨晚我是这录音笔的主人。

孙荻一下急了，说：「这怎么能行，这东西不能关了。」

我说：「昨天关的时候并没有发生危险，如果你觉得开着他很重要，最保险的方式就是带在你身上。」

他不再说话。过一会儿，他说：「你一会去见美联社记者时必须打开，否则今天的见面就取消。」我立即答应。

我心里有数，届时开关这死物的权力还不是操在我手里！他走时一脸疑惑，却也唯能如此。

吃过早饭，我按约定与美联社四位记者在一茶馆见面，虽然这是当局策画演戏的一部分，却仍有大批特务游荡在我的周围，由孙荻担负现场指挥。在外围大批特务的拱卫下，我完成了与美联社记者的见面，其中汉茨乐是老相识了。这是我近五年来第一次与媒体朋友见面，我关了录音笔，与他们谈了我这几年不能被外界所知悉的真实处境，谈完后我打开了录音笔接受了「采访」。

我非常感谢他们及所有持续关注我这些年来际遇的记者朋友，他们清一色属于境外媒体，正是由于他们，才使得全世界的关爱、关注即正义力量，与我在困难时期的信心坚韧地连结在一起，正是他们坚韧地追寻、追问，构成了我生命安全保障的最后力量。他们，是中国和平反抗力量不可或缺的组成；他们，是构成中国和平改变力量的结构性一环，在拓通中国和平改变路途上有他们醒目的身影。我常能见证他们对中国非正义现状关注的焦虑、坚持和无畏。而这种焦虑、坚持和无畏，将与中国和平抗争力量一道，负起中国和平趋向自由、民主宪政的重轭。

他们是永被我记念的，无论何时何地。

·
·
·
·

第五章

2010年4月8日的绑架及其后的酷刑和囚禁

一、回来让你平静比登天都难

我刚与美联社的记者朋友分手回到家，不到一分钟，孙荻和张雪就蹑踪而至。一来就索要录音笔，说于局急着要听。

我说：「物理是最诚实的，当然他还会发生诚实的技术故障。」把录音笔递给他们。

孙突然接了个电话，起身就走，我知道这是外面瞭望哨发现了新情况。孙刚走，有几位外国朋友来看我，他们带来了真挚的关怀和问候。真的，这绝不是倾向性的认识，他们的眼睛澄澈如水，真诚是表里如一的。那种眼神与人工藻饰无涉，那是长期在真爱和信仰的环境才能成就的。那两天时间里，看望我的来访者百分之九十九是外国朋友，大都是美、英、德及加拿大的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见到我喜极而泣，有些人从头至尾泪水滚面，但这些往来的人群及其频率引起了当局的恐慌。

第二天下午，几位外国朋友刚走的间隙，孙荻和张雪又来交涉。说回来让你平静比登天都难；说外面观察记录，与我往来人员情况的并非只他们一个系统的，分属不同的系统；说你就这样不拒绝与外界往来，若一直保持着，「连三天都用不了你就又会被抓。希望你从现在起不要再见外人，有人敲门你也不要开。」孙说，我拒绝了孙。果然，在我回到家的第四十八小时，当局再次将我绑架。

这次回家，虽然只有两天的时间，却接触到了十几批、几十名中外朋友，这对我朋友都是弥足珍贵的。但也有令我惋惜的方面，就是绑架来得太仓促突然，以致留下五年多的「后顾之忧」。

由于先前被囚禁，我长期见不着太阳，原本拟回到家收拾两天卫生后好好晒两天太阳，总不相信他们会这么快就下手。那两天，我白天一边拾掇着家务一边

接待一批又一批的朋友，晚上则直扑超市购买了为数不少的东西，没有腾出一分钟时间专门与那久违了的阳光进行交涉。那些从超市买来的大量东西，也成了被抓后我长期的心里隐忧。因为回陕北后，家人给了些生活费济助，我两个晚上出去买了上千元的物品。迄今已五年了，东西过期废去还是其次，成箱的牛奶、鸡蛋，还有剩饭储积在冰箱里，电早已用完，这些物品在冰箱里早已爆破变质而不堪收拾了。而当晚的饭锅也未来得及洗却被泡着，这一泡就是五年多了，家里的许多东西都未来得及归置，其糟糕情形不堪想象。

由于孙获等一大群秘密警察昼夜就蛰伏在我的楼下，我的家里、家门口都有他们安装的针孔录像（这是可以肯定的，2006年我被关押期间，他们给我出示了很多我家来访者的照片，但我无法找到这些录像器在哪里），他们对我的会客情况掌握得非常清楚。当天夜里，我的最后一批来访者里四位北京律师，与他们聊的时间颇不短。等他们一走，即又有人来敲门。因为这几天来访者非常密集，我也没有想那么多。一开门，孙获和张雪就钻进来，说有点急事让我出去一下。我说这么晚了能有我的什么急事，我问一会要回不来的话我把家里拾掇一下再走。他们不同意，说事很急，必须现在就走。我说稍等一下让我拿几件换洗的衣服，但被拒绝，这氛围已再明显不过了，我将再次被抓捕。

二、关押是为了让你反思自己的错误

我下了楼后一辆车门被打开，我刚探身进去，一只手已捂住我的嘴。一进入车里，嘴巴、眼睛就被缠住，好像是一件衣服搭在了我的头上，左右两个人每人抓住我的一只胳膊，把我紧紧夹在中间，汽车启动。大约两个小时后，我被人架下了车，架着上了两层楼，行进在一个楼道里，楼道里铺着很厚的地毯，那楼道很长。终于，我感到是进了一房间，我被压制着坐下，是一只硬木凳子，两只手就一只压在我的肩上，周遭死一般寂静。我未去揣度他们在等待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至少是在打精神战，这种把戏常有，对我意义不大。倒不是说我有多少异于常人的勇气，而是我从不与怯懦办理交涉，因为在这里，怯懦从不会增加或减少任何东西。每至此时，我是完全关闭思维、感情，从不给怯懦、恐惧和愁苦予一点空子，这是我的经验，你宁死不理他们，他们对你也无能为力。大约过了四、五十分钟，压在肩上的两只手终于「高抬」，我头上的「行头」被取下后，外面又进来两人，一看是我熟悉的看管警察，他俩笑容可掬地看着我。

我来了一句「缘分呢」，他俩大笑，说：「打死都没想到又是你，没想到这么快又进来了。」

我又开始了被关押生活，一间八、九平方米的小房间，两张床，两张椅子，一张桌子，房间被塞得满满实实。

第二天，吃完早饭刚坐下，孙荻、张雪走了进来说要谈话，将看管人员打发出去。

孙荻说：「没有料到你老高会失败得这么快，这就又进来了。」

我说这未必是消极的，我说我回到家里两个晚上都没有休息好，而昨天夜里睡得却非常好。

他问：「为什么回了家反而睡不好？」

我说：「很简单，在这里人只需要一种能力即可做圣人，即使自己头脑简单起来的能力，调适到位，人可以无忧无虑；回到家可不行，现实立即压迫你去做庸常人。回到家的当天夜里，我列出了十几种需要缴的费用单，没有十天跑不完，这一抓，全解决了，全不再成为我的烦恼了。」

他说：「你这心态就不正常，政府每次把你弄到这种环境里，是为了让你反思自己的错误，你却干脆什么都不去想，政府不白费劲吗？」

我说：「没有白费劲，这让我没有了俗常人的烦恼就很有积极意义。」

我说：「我坚信每个人都常需要反思，但我绝不会与你们期望的反思交涉。中国再添不添个奴子无关紧要，但对我而言这却是人伦的大端。」

他说：「行了，不要讲大道理啦。」

我说：「你错了，这只是我的声明，我清楚我所处的是一个不需要道理的环境中。」

孙说「有个事跟你说一下」，说「你这次回去两天搞得上面大领导紧张得不得了」。

孙说：「你不停地去和外国人见面，不仅没有照顾政府的一点感受，这简直就是公开挑衅政府，是逼政府下手。」

又说：「一大群人围着你转了一年多，连让人家回家休息几天的时间都不给，这是人做的事吗？」

我说：「我不想与你们去捌飭这些荒诞逻辑，正是这些荒诞逻辑驱策你们壮怀激烈地实施着一个又一个令文明人类耻笑的荒诞举动，这是这种制度下必有的逻辑。」

他打断我，说：「别跟我们扯这些，难道全国人都荒诞，都糊涂，就你老高一个人正确？这种认识才是真正的荒诞呢。咱都别扯远了，政府有个意思，这刚放两天就被抓，搞得大家都挺没面子的。政府的意思，如果你同意继续用电话与外面保持联系，就是说你自己太累了，想在郊区散散心，不要透露说你又被抓，政府可以让你每天看看书，看看电视，每天上、下午各一次可以到外面散散步，也可以保证月底前让你回到新疆看望你的岳父母一家。」

我答应了，因为回新疆看看两位老人，这对我非常重要。去年的突然「失踪」，对两位老人造成的伤害几近毁灭性的，去看望老人，当面去安抚两位老人一直是我强烈的愿望，这情甚炽且与日俱增。尤其耿和娘仁又逃离中国，但得可能即去看望老人，这乃人生伦常大端。我不想太远太多，只要能去看望老人，其余不去顾及。所以，4月8日再次被抓后，我对外一直没有透露，其实我与外界的联系也仅接听过耿和的电话。

三、中共特务的「三板斧」

关至4月14日，我们一群人飞抵乌鲁木齐。这几天的关押较以前相比，环境宽松了不少，最主要的是每天上、下午各一次可以在封闭的大环境里散散步，每天可以看看书，尽管是些闲书，而中国的电视我是从不看的，那几天饭菜也不错。虽然散步时四名看管人员与我组成一个移动的小方阵，但对我的心理不大能造成影响，与历次的秘密囚禁相比，这次算是在一个好地狱里待了几天。

这个邪恶政权已没有了成就一件好事的能力。我回到乌鲁木齐才知道，这次所谓的「探亲」，根本就是当局为释缓压力而仓促安排的一次公关表演。对于探亲应有的实质内容没予丝毫的顾及。当局分两批人围绕我的「探亲」展开行动。先我们到达的一批，已对我回家期间的一切「安保」工作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由孙荻、张雪等人把我送到卡子湾水泥厂大门口，我一下车，王开兵即精神抖擞地率领一群黑衣人等在那里，并迅速围了上来。若不明究竟的旁观者，还以为这是接着了久别的朋友，他们采用完全的泼皮无赖的方式以迫近贴身的方式进行跟踪。我开始有些后悔回来，因为我的岳父母一家人都是些循规蹈矩的人，他们所处的又是在国有企业那种熟人的环境中，这种阵势对我则早已习以为常，但对他们一家人而言则实在是有些触目惊心的。因为一些流氓警察是没有底线的，惊吓了两位老人实在不是我能接受的。然而，这箭在弦上，离两位老人已是近在

家门，我想我回到老人那里去不要出门，就在家陪老人几天，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事。但我无法想象，我无法理解，只能说他们是邪灵附体、被黑暗力量辖制下才能做出那样不可理喻的安排。

他们在我上了楼以后，就把一辆车堵在单位的进出口，一群黑衣人围在那里，不仅给进出那个单位门的人造成许多不便，也听家人说引来不少人围观，我明显感到了家人的窘促和不安。第二天，家人说周围几栋楼的人都在议论，说那群人昨夜一整夜都在那里。然而，家人对待这种现象的应对态度与我完全不同——我不去看他们时，他们是不存在的，与我在房间里的一切并无交涉，但家人看他们一眼后却使他们「驻进心里」。这种现象在北京的时候就有，这是缘着我而给耿和带来的心理伤害。

2005年12月下旬，中共当局开始与我打神经战，每天夜里，一辆「依维克」警车开在我的窗户下面，长时间的警灯闪烁。由于我家在二楼，那闪烁的警灯可以说是完全钻进我的家里，有时一连几个小时的闪晃。这种做法对我还真没有多大作用，我清楚他们在想什么；再说，一本书完全可以攫住我的注意力，他们那一套做法实在是「落花有情而流水无意」。

然而，这些做法在开始的两个月里，在耿和那里却起到了意外的作用，她被搅得心神难安。每天晚饭后，我规律性地会在卧室看书，她的注意力却被闪烁的灯光攫住。她有时一个小时会进来好几次，一脸不安地向我转述那警火闪烁的情况。我清楚，她的心里出现了严重的不安，作为妻子，作为母亲，这种不安是正常的。夫妻的心是相通的，她的心里不安，我心焉能安然！有一次，她不到一个小时进来「报告」了三次，我笑着安慰她，她还是站在一边局促不安。我跟她开玩笑，说书本里没有闪烁的警灯，你的劬劳使得闪烁的警灯钻进了书本。她终于哭了起来，说她断定中共特务很快就会闯进来把我拉走。这是她担心的全部。终于有一天，她告诉我，那警灯使她整夜整夜不能入睡。惭愧，我是十二分地能睡，竟对此全然不觉。最后只好商议着让她和天昱回乌鲁木齐躲一躲。

这次我回到乌鲁木齐后，楼下的中共特务又开始玩弄他们几年来惯用的「三板斧」。他们也清楚这种粉拳对我不大有用，却可以在我的亲人中间营造出一种形于色的不安，这是他们在利用我把亲情看得太重这一「弱点」。

第二天中午，吃完了饭，岳母要去菜市场买些菜。因为当时家里就我和老人在，所以我就陪她去买菜。期间，发生了让人难以接受的流氓式跟踪过程，因为在国企内部，他实际上是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流言蜚语的威力与传

播速度一样地惊人，因为那种阵势毕竟在寻常人的生活经验中并不多见。一个普通的买菜全过程，一群警察裹挟在周围不间断地捣乱，仅从视觉角度亦颇具刺激效果。终于，我和老人不得不中断买菜的计划，在一路不可理喻的冲撞中匆匆「逃」回了家。

这种「探亲」现状实在是不能继续下去了。我笑着说我该走了，说回来原本计划看看就走，然而老人却哭了。不一会，全家都赶了回来，而又都哭了，那哭声充满了无助、绝望。我的离开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尽管亲人都极不情愿，但究竟一家人还得在那里生活下去，一家人在哭声中接受了这个现实。作为我的亲人是极难的，面对这个庞大政权无底线的打搅，他们满怀不安和绝望，而我们又心痛我的处境，又终于无力改变我。这次究竟还是见着两位老人，真恍若隔世，我总是怀疑自己是在这人间，可这究竟是实在的。

四、这是一个正在走向美好生活的过程

这次回去见到岳父母，因我的行踪常常掌控在当局手里，而他们又极喜营造神秘氛围，所以我回去得很是突然。那时，岳父人正在外边，听说我回家立即一路小跑着回来，又一口气奔上楼。

他一到家门口就大声说：「智晟回来了，太好了，青山在，青山在就好。只要你活着，一切就都在。你一辈子常有奇迹发生在你的身上，智晟，你从来没有失败过，你现在的处境仍不是个结果，是个过程。你活着，我们全家的信心就都活着。」

他直至坐下后，仍不停地说着。

那一天下午，全家人就围在一起嘘长问短，老人之后说了我「失踪」后他们所经历的非常遭遇。他说为了寻找我（实际上是寻找尸体），他几个月来所有白天的日子里，除了奔走在各医院的太平间外，其余时间就会胡里胡涂地徘徊在和平渠两边。

「人都变傻了，脑子里再也没有别的事了，就想到找你，让两个大家庭得到最后的消息，给格格、天昱有个交代。我每天不知道我要去那里，但头脑稍清醒的时候一定会发现自己就在那两个地方（和平渠或太平间）。」老人抹着眼泪说。

岳父有一段话，他讲得很平静，而我的内心犹崩雷般震撼。他说他每次识认完一具尸体后，都会跪在地上，从形到心，都是很动情地对尸体磕三个头。他

说，一方面是认领过程打扰了他（指尸体）的平静；另一方面是同病相怜，觉得他及他的亲人的不幸，觉得死亡已是人莫大的不幸，而死后还落到尸体与亲人不能相聚的悲哀境地。他说，他每次都在心里默念：「你的亲人和智晟的亲人一样地苦，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亲人，我这个老亲人给你磕上几个头你就安息吧！」

老人说：「那段时间，我每次去认领尸体前，都必先到市场去买两斤上好的新鲜葡萄，每次认领后磕完头就恭恭敬敬把葡萄献上，希望在亲人还没有找到他以前慰藉他的灵魂。」

因为当局不能理喻的失态做法，我只好决定离开。临别上车时，我动情地拥抱了老人，我轻拍着他的后背说：

「谢谢你老人家了。你说过，我从来没有失败过，这就应是我们全部信心所在。请全家坚信，我的生命绝不会在一个偶然的过程悄然熄灭。请你老人家记住，神给了我们一家人的是个灾难的过程，而不是个灾难的结果。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局面，都要坚信这是一个正在走向美好生活的过程。」

我上了出租车后流泪了。是的，我们一家人是处在一个非常的过程中，「人间重别情」，可究竟也不当重至这种程度，我的心里默念着。生「死」相隔半年多，回来看望老人竟一天即这般黯然收场，亲人内心的痛是不言自明的。

我突然离家来到宾馆，似乎并不出乎孙荻等人预料。对于这个局面，他显得非常平静，只是说：「情况我都知道，我每天上午都到公安厅通过保密电话向于局汇报着呢，家里没法子待，就在宾馆歇着吧，因为这返程机票是订在二十号的（当天是十五号）。」一周的探亲时间竟只用去一天。他们留下一人在宾馆看着我，其余人就去吐鲁番等地旅游去了。

在宾馆的几天里，岳父是每天必来看我的，殷殷之情每溢于言表！4月19日，岳父与大姐又一起来看我。我不忍心告诉他们将要到来的真实情况，我只是暗示他们，如果明天飞机起飞后，十二小时内我没有电话给你们，就肯定是被抓了。正如于泓源所说，许多情形下「主动权」确实在我一边，有些局面，终止与否可以说尽在我这一边，但他绝不是机械的和偶然的，所有导因必是当局的邪恶之举。

就在这一天，岳父他们还没有到来之前，孙荻找我谈话，说：「上面希望下阶段在山西找个地方待上一段时间，大约一两月后再回北京，让你继续可以接听家里人的电话，对外不要透漏你在政府手里。」我断然拒绝了。

我问他：「你们是否为下阶段的想法做过努力？有没有一个人想过说纵有天

大的仇恨也憋上几天，既然放他回家，就让他和家人一起待上几天？你们的行为完全是失控的，完全超出了人理。回北京，要么放人，要么干干净净地关人，别既想吃羊肉却又忌惮腥膻味。新疆警方在我回家期间的丑行，表明即便是一个半人半鬼的局面，你们都没有能力维持，终于还是选择了做鬼，恢复你们本来的面目吧。」

「不用说啦，什么人呀鬼呀，给你明说了，让你回家的事，政府内部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就有不愿意让你回去的声音，能让你回去一趟，你就知足吧。继续保持着和外边的联系，换一个宽松的关押环境，对大家都有利。如果不愿意，硬和政府死磕，结果会怎样，你比谁都清楚，这不是为你好吗？到时候没人能救得了你。」孙荻又说。

「天塌不下来，终于要塌下来，死的也不会是我。」我来了一句。

其后，岳父和大姐来与我见了一面，没想到这一别竟会是近五年的「阴阳两隔」。更多的痛是属于我的亲人们，因为我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是无暇与这痛办理交涉的。家人提出到机场送我的请求被我拒绝，因为我清楚我身边有一群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们绝不会接受人间的人之常情。

最后，在淅淅沥沥的冷雨中，我最后与岳父、大姐在宾馆别过。

五、作恶效率高、不食言

2010年4月20日下午，我们乘坐的客机在北京机场降落。

一下飞机，孙荻说：「给你家里打个电话，就说安全到家。」被我拒绝，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安全到家。

「如果不配合后果自负。」他又来了一句。

我说：「那都是正确的废话了。」

「老高，我再说一遍，死拧下去，后果你是清楚的，你是个聪明人，就不用我再说了。」孙荻脸色阴沉地又说了一遍。

出了机场上车，孙荻再次让我给家人打电话说平安到家，被我再次拒绝。汽车又驶向密云山区的关押点，到了目的地，我被带到此前多次关押过的那个房间，由两个人看管起来。

大约一小时后，孙荻和张雪走进来，示意看管人员回避，然后坐下来说：

「老高，长话短说，我们再给你几天时间，这时间一过，就换一批人看管你（指的是施酷刑的那批人），你的头脑没有问题，你能听懂我的意思。」

连接话的必要都没有了，房间里出现了死寂。孙又坐了几分钟，见我一言不发，站起就走。因为这几年里，双方的交手频率早已数不胜数，大略上对对方的脾气及不同情况下的选择套路可以说已臻至知彼知己。一般情形下，技术层面上的冲突，会导致极冷酷无限期的囚禁，而这还是比较「幸运」的一面，比较黑暗的局面即是凶残的酷刑。而这一次，酷刑的临到是不应有悬念的，孙获说的话我不仅是能听懂，而且是非常准确地懂。他们有些规律是绝对的，诸如在作恶方面，一是效率高，二是不食言。酷刑会在未来几天内临到已是铁板钉钉子的事，这是双方都已清楚了。而另一个双方大致上也可以清楚的局面是，酷刑不会改变什么，他唯一的意义就在于酷刑本身所代表的冷酷逻辑，即一种纳粹原始的恼怒的报复性宣泄。

他们一些看管警察也替我担心即将到来的困难局面，有一次，他们中间有一位突然问我：「你能不能想到他们这段时间在做什么（指孙获他们）？」

我告诉他们：「他们在找个合适的地方，这个地方既能隐蔽地实施酷刑，又能长期关押。」

他们听得一脸茫然，后来的事实完全印证了我的判断。

六、又见「重八君」

2010年4月28日一整天，我的右眼狂跳不止，我清楚，极困难的过程就在今天，当局「厉兵秣马」的工作完结（于泓源语）。我无须说大话，我的心若平镜，心里未掠过一丝对将要到来的酷刑的瞻念。感谢神，怕，全然不再有，我的对手实在没有能使我怕起的资格。从规模上看，他有些丰富的东西，但那正是让他自己终将归于死途的东西；漫无边际的凶残、卑鄙的无良和冷酷，是一种最后的自暴自弃，是终于无可奈何、束手无策的表现，是世间最无力量者的一种愚昧表现。

我曾经给一个朋友一条信息：

罪恶的总量与承受的总量两样东西将终于拓通中国改变之途。

历史将很快示教世人，是共产党自己的罪恶拓通他的死途。所谓「积羽沉舟」，而多如牛毛的罪恶，对应着多如牛毛的承受，多一个具体的承受就可能生出一个清醒的认识。共产党的蛮横、冷酷及绝不动摇的愚昧终于历史地置自身于末路，他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笑柄。

由于酷刑都是在夜里实施（这是北京的规律），4月28日一吃完晚饭，约七点钟左右，我赶紧收拾我从乌鲁木齐带回北京的东西，有一箱是价值九百元的书，但另一箱衣服杂物却不在我身边（这些东西迄今没有归还我），我要求警察去搬这些东西，但终于毫无反应，他们完全无动于衷。

我刚把东西整理停当，突然进来四个人，正是在2007年9月21日后实施酷刑的原班人员。第一个扑进来的正是那身高超过一米九、施暴时最凶残的、我予之绰号「重八君」的大汉。他的个头在我跟前有绝对的优势，他扑上来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就往下压，嘴里还说了一句：

「小子，又落到几位爷手里了，又该哥儿几个来好好伺候你了。」

就在「重八君」压弯我的腰的同时，一个黑头套被另一个人套到了我头上，又一个人从后边将我的双手背铐了起来。「重八君」仍使劲向下按着我的头，他大喊：

「再给丫的头上加两个枕头套，光头套便宜了丫的，大人物的待遇不能太低了，哥儿几个。」

又两个枕头套使劲套在了我的头上，我的身体被压成九十度状，两个人在背后摧压着我突然向前扑跑，一个直转角，该是下楼了。压在背上的手又抓住我的衣服，我依然是向下扑跑着，人在没有眼睛的情况下反而没有了瞻顾，背上抓压着我的手，实际成了我的眼睛，扑跑的速度、姿势以及扑跑的方向之信息都由他来传导。到了外边狂风劲呼，他们开始架着我上车，整个节奏类抢劫般急促。可欲速不达，两次上车都没能成功。

「妈的，傻逼呀，你丫的不会迈左腿吗？」

我的后脖子被猛击一拳，全无人理可言，我的头上是黑头套外加了两层枕头套。终于上了车，还是老规矩，我的左右各坐了一个人，其中一人负责压着我的头，将头压在我的两膝之间。他们用来绑架人的车可能是特制的，类似救护车的布置但又不完全一致，这种车在最后边装了一排横向座位，左右边上各竖着装一排座位。他们把人的身体压成钩状，两只手又被铐在背后，前面全无依托，那种难受程度实在是够可以的。那是每次被绑架后必须煎熬的一个过程，从纯生理的角度而言，那种痛苦几近极限。我常怀疑他们故意兜圈子，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刻骨铭心难熬的长时间。那种难受真的是无法名状，我甚至怀疑这种过程也是精心

设计的，属于程序化的整人过程，我这近十年来是无数次体验这种过程。那种被压迫姿势的难受，只是这种无以名状的痛苦之一，另一个更著名的痛苦是被那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头套捂闷得大汗淋漓，以及头套里缺氧相煎熬。汗水持续地流淌，人都快虚脱了，而缺氧让人觉得眼球胀鼓欲裂，呼吸急促的频率已使整个身体出现夸张的起伏，而压制你的人还骂骂咧咧地说你不老实。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下体胯以下进入麻木状态，使下体暂时脱离了痛苦，也因为这麻木，下车时招致了一顿暴打。首先是，我没有看的条件，加之双手又被铐在背后，下体麻木至完全不听调度。那些押解我的人，破口大骂说我耍赖。他们将我拖出了车，可我的下肢像木头，刚下到地上就轰然倒地。那一群人几乎没有了理智，其中有人喊：

「往死里捶丫的，敢跟大爷们耍赖！」

不低于四个人参与了那一阵短促的暴打，我全无能力保护自己，连地上打滚的能力都没有了。一阵冷酷的猛踢以后，我终于还是「耍赖」，不能站立。

「抬丫的！」有声音喊道。

大约是四个人抬起了我猛跑开来，速度减缓，好像进了个门，开始下楼梯，依然是跑着下，下完楼梯，那楼道颇不短。跑了一阵子，我突然被扔在地上，听到有数人走了过来，无人说话，又有几个脚步从我身边离开。

七、王处长上菜

「套给丫的揪了！」

一只手猛地揪下了我头上的枕套和头套，我侧躺在地上，我看见我跟前三个人的脚。我扫视了一下，发现我是躺在一条看不见尽头的楼道里。我没有去看那些人的脸，楼道里光线很暗。

「哥几个，看丫的这死狗样子。畜生，看看眼前站的这几位大爷是谁？你又到了你这几位大爷手上了，你丫的也真够他妈倒霉的。」有个声音从高处往下。

我并不看他们，一双很大的脚，穿着毛面皮鞋，猛地在我的小腹上踢了几脚。他一弯腰，一把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揪得半坐起，我被揪得仰起了脸。

「先看看你的这几位大爷是谁？」

我跟前站的正是2007年9月21日后施加酷刑的全班人马，包括既是主力打手，又是现场指挥的王姓处长（他在那次施刑过程中自己的介绍词）。我看着

他，他一手握着一根六、七十公分长的电击器，一手正往嘴里送烟。

「你看你丫那汉奸样子，畜生，看到你这几位大爷，就不用哥几个再说什么啦啊。不用急，这一次几位大爷好好伺候丫的几十天，让丫的好好见识见识。」

揪着的头发松开，我又倒下，王走过来踩住我的脸。

「总统，民选总统，配吗？丫的配吗？你现在就是一条死狗。说实话，你现在比不上丫的一条狗。」

他一边骂一边开始使劲踩住我的脸，用的力越来越大。他猛地抬起脚，一脚踢在我的嘴上（后来发现有十之七八的牙齿松动了）。

「先给丫的上点菜！」

他大喊一声，三个人一阵疯狂地猛踢。我没有任何躲开的可能，也没有任何躲的必要。他们的情绪完全失控，这种宣泄持续了二十分钟左右，零零落落地停了下来，他们三个人气喘得很急促。很奇特，我并没有感到有多剧烈的疼痛，但暴虐间隙，我发现身体狂抖不止。我冷峻地去体验他，发现这种抖动是纯生理性的，因为当时心里确实没有恐惧，至少是无暇惧怕。他们三个人仍在一旁立着喘气，几乎是同一时间，每人点上一支烟。现场完全地静了下来，有三分分钟左右，很奇特，好似骤然间换了一个空间，静得出奇。

终于，王处长发话啦：「狗屎，感觉怎么样，几位大爷给丫的上的菜合不合口味？不急，时间长着呢，你又落到你这几位大爷手上，算丫的倒了血楣。不过，几位大爷觉得你还有点胆量，你的这几位大爷吃这口（指施酷刑）也有点年头啦，敢写出去的真还没有撞着，你写了，嗯？给丫的操死的也不是没有过，敢吗？死啦，死啦白死，悄悄地自己丫的埋了，不是没有。你写了，写了倒没有什么，怕这个吗？现在丫的像狗一样爬在哥几个的跟前，你什么都明白了，写了有用吗？哥几个年底还戴了大红花呢，写出去不是坏事，让丫的们看看，不老老实实就操丫的。」

就在王说话的时候，那位我心里赐其绰号「阿巨兄」的锉子（这家伙身高直抵一米五几，与一米九左右的「重八君」形影不离，呈颇滑稽的景致），揪起我靠在墙根，然后从容地将叼在嘴上的五根烟点着。我已完全清楚他要做什么，前次酷刑时，每至间隙，他必点着几支烟，面无表情地熏着我的眼睛。他慢慢地弯下腰蹲下来，左手一把抓住我的头发，使劲往低压，然后将右手里的五支烟移至我的眼下开始熏。那边王处长继续骂着，大部分骂词已不能记得很清楚了，只能回忆起大致轮廓：

「今天晚上就在楼道里待着，丫的听清楚了，可不是让丫的安安稳稳地待着，美死你！由哥几个伺候着丫的，解决一个问题，把上次写的东西给抹了。怎么抹？你再写个东西上去，怎么写我们几位大爷是外行。要么生不如死，要么赶紧写了。不写的事不要去想，上面挑了哥几个来伺候你，自有里面的道理。现在就说‘写还是不写？」

我只是稀里糊涂地听着，每至这种场合，我几近全部掐熄了自己的思维活动，努力使痛苦尽悉游离在生物层面上，这对减低痛苦当量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丫的让臭狗屎站起来，丫的写还是不写？」

我被「阿巨兄」揪得站立起来，那「重八君」走到我的右侧，双手猛地抓住我双肩上的衣服，将我压弯了腰，问我：「写不写？」见我没有回答，他突然用膝盖向上猛击我的胸部，问一句顶一膝，问一句顶一膝。到后来他干脆不再问，就在那里用膝盖继续撞击我的胸部。我能听到一个陌生的惨叫声，我可以肯定，那惨叫声与意识是没有关系的。我的眼睛已经模糊得什么也看不清，我感到一种翻江倒海的大震荡，我的思维几乎完全停止，不是由于击打而是我自窒灭了思维的全部活动，但仍能听，证明着思维仍保有本能的能力。我不清楚那栋楼有几层，但可以肯定，十层以内都能听到那种惨叫。渐渐地，我已不再有站立的力量，那「重八君」力气真够大，实际上到后面已完全地被他给提着。再后来，我听到的不再是惨叫声，而是一种极类似夸张性呕吐时发出的声音。终于，那家伙可能体力不支放了手，我砉然倒地，我的前额撞到地上。「啊，啊，啊」，我像剧烈地呕吐一样一口一口往外空吐着，只有不多的黏状液体吐出。我的半侧脸贴着地上的瓷砖，手一直背靠在后面，身上已没有能力调适身体的姿势。刚才的击打过程，使人有一种昏天黑地的混乱感觉。慢慢地我又清醒起来，那地板很冰凉，清楚地感觉到半面脸下压着的都是黏状物。他们又开始都点上了烟。我继续侧倒在那里，「啊啊啊」地吐着气。

他们抽完了烟，王走近了我的肩前。

「你哥俩歇一会。」他说。

然后，他一脚踩在我的肩上，电击器爆出来剧烈的响声。他一把将电击器抵在我的下巴上，我彻底闭住了我的眼睛，我听到了另一个陌生的声音，无疑，那是我发出的。我实在找不到更恰切的描述，那声音，几近完全像，就是狗被主人用力踩住尾巴时发出的那种嚎叫声，有时又类似小狗被揪着尾巴倒提着时发出的那种声音。楼道里，那种声音与电击器的声音并扬。那种声音你是无力控抑的，

他只在发出，你能听见，却没有能力止息他。我感到自己的筋骨正在被生生地碾断着，那种生理痛苦真的不是普通人的文字能够述说清楚的。就那种痛的震撼而言，我后来思考过，即便文艺也会尽显无力和干瘪。但这次的电击时间和2007年9月份比起来，可谓「小儿科」，前后时间持续不到半小时，而且始终仅王一个人实施，也没有电击生殖器。

不到半小时，王停止了电击，我听到他进了一个房间，电击器好像扔到一张桌子上的声音（**他进的房间在我头顶那头，我无法看见**）。不到一分钟，另外两人也都走了进去，听到门被关上的声音，楼道里又进入了死寂。

楼道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但那死寂是极其短暂的，我听到一种极其微小的呻吟声，我开始感觉到了地上的冰冷。我提醒自己什么都不要去想，因为这里所有的过程都不用你操心，你就跟着走吧。我也提醒自己，你正走在一段极困难的路上，无论如何，你必须走下去，后退、旁骛都是死途。他们会带着你走下去的，根本不用你操心。我突然想起来耿和她们娘仨的极清晰的面孔，思维异常地清醒起来。我想着，这是思想出现了「管涌」，想着刚才这几幕若是发生在她们面前会是一种怎样令人哀伤的情形，我很快止息了思维活动。然而，这种「管涌」却屡现频出，尤其在施暴间隙。

他们可能是在那里商议着什么，门开啦，听到他们走了出来。

八、你丫的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把丫的拉起来，怪舒服的哎。」是王的声音。

我被人拉起来，我居然感到腿部、腰部依然挺拔有力，大略站立姿势是昂然而立的，但那的确不是有意而为之，却惹怒了王处长。

「抡丫的，你个狗汉奸也配在几位大爷面前做出一副大义凛然的状态？」

那「重八君」扑过来左右开弓搥打我的两脸。我像木桩一样站立着，并不躲闪，因为躲闪反招耻笑，并不能使打击不达或停止。二、三十巴掌搥过去，他换成了握拳，在我左右下巴上击打，已没有了疼痛，只在大脑里感到一下一下地木木的震动。打了一会他自己停了下来，大略他那拳头也会痛。王在一旁，提起电击器触在我的下巴上，然后间歇地按动电钮。我依然不躲，那与勇气、骨气都无干涉，那时也无暇去想那么多，那只是吃过许多苦楚后得来的经验。躲，徒添笑柄，终于还是会被折磨。我的不躲避激怒了王处长。

「你妈X，你丫的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个狗汉奸的脑子进水了吗？」

另外两个人也都扑上来，三人六臂的猛击，我连怎么倒在地上也一点都记不清啦，只在开始的时候感到一种钝器击打头部。我意识到自己已倒在地上时，就像突然做了一个短梦似的，又是一阵疯狂的脚步，其间我又听到了惨叫声。到他们开始点上烟休息时，我觉得自己处在一种很奇特的感觉状态中，说不清、道不明的，但究竟还是知道自己在地上躺着，旁边的几个人是折磨我的人。不过，这时人的具体痛苦若即若离，反而不大清楚。我不知道在生理上这是一种什么现象：我这时浑身大汗不止，身上的力量开始渐渐地减少，好像是随附在汗水里流去了。

他们从房里搬来了椅子坐下，继续抽着烟，我的大汗淋漓也在继续着。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王处长又发话了。

「哎，畜生，怎么样了，凉快了没有，这还才开始。你看到的是三位大爷是不？这次来了好几位大爷，慢慢陪着你玩。知道你刚才挨操的原因了吗？我他妈最看不惯就是你一个狗汉奸，竟他妈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丫的是不是吃错药了？配吗？我给你说，你丫的别自找苦吃，在你这几位大爷面前，把你的汉奸尾巴夹起来。还有个事，刚进来时几位大爷让你把以前写出去的那些东西给抹了，你不是不答应吗？几位大爷就给你上点凉快的，这会儿你满意了吧？本来写出去倒没有什么，让丫的那些吃里扒外的汉奸们看看也是好事，让他们知道反对共产党都是他妈的找死。本来是不需要你写什么的，但随意说了这么一嘴，你竟然敢他妈不配合，这不他妈的找死吗？几位大爷今儿个也累啦，但既然把话说出来了，就得办。现在懒得跟你啰嗦啦，不用你写了，就当着几位大爷的面吱一声就成。就说一声，说2007年你写的那次酷刑的事是假的。没有录音、录像，其实说不说都无所谓，只是几位大爷气不顺，拧在这茬儿上，你就说一声拉倒了啦。」

他这么一说，我的头脑又完全清楚起来，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这是在找台阶下。他们也是的确是累啦，但我继续不说话，我想无非又多一次暴虐过程而已。我这时候已完全没有了具体的疼痛，虽然感到有漫无边际的疼痛。规律是铁定了的，违背了他们的意愿那是有后果的。一个是施加酷刑的秘密警察，一个是监狱里的警察，他们的自尊是变态地敏感，一触即溃。那真是一种不幸，容忍，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能力，在于他们已是完全丧失，变异成了一种变态的暴虐。有时你并不做什么，只须不说话，他们即会把裹挟着烈怒的暴虐倾泻至你的头上。

「我再问你一次，说还是不说？」

我的心里默念着：「又要开始了。」应该是三个人同时猛地离开了坐着的椅子，我又听到了惨叫声及混乱的踢打声、踏步声。我老是觉得自己稀里糊涂，却又不完全是。突然楼道里响起了吼叫声，是他们的吼叫声，那声音很大，原来是骂我畜生，应该是只有一个人在吼叫，正在踢我的应该是一群人。终于，楼道里稍微安静了一些，只有呻吟的声音，但不很响。楼道里又亮了一下，他们又吸上烟了。「停了，又停了。」我的心里默念着，脸又开始感觉到地砖的冰凉。「都到这种状态了，又施加了一轮暴虐，这需要多么可观的无良勇气。」我依然胡乱的默念着。有人站起来了，应该是吸完烟了。猛地，有人抓住了我的双肩，我被别人提着坐了起来，一个黑头套套在了头上，我不再关心一切可能的局面。两个人把我架了起来，腿部感到还颇有力量，骨头当没有损伤，他们架着我开始走动，我觉得行走还没有问题。他们架着我走了有六、七十米，后来了个三百六十度转弯，又开始行走，又走了几十米后进了一个房间。刚才走了这一圈，实际上是在楼道里来回转了一圈，应该是他们惯用的神经战伎俩。

一进房间，我的头套被抓掉，应该是一间宾馆的普通客房，但床已被搬走，房间里除了一张桌子外别无他物。桌子上放了一个硬质的服装袋，袋里装着两支比袋子高出三分之一的电击器。这情形是他们实行酷刑时一目了然的特征。头套取下后，由于我又昂然而立，这实际上是我的习惯，与情绪没有涉牵，但可能又犯了他们的什么大忌，或者是撩拨了这种场合下他们特有的敏感神经，又是王处长，破口大骂，说「一个狗汉奸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就是向他们几位大爷挑衅示威。三人像突然中风似的，又对我实施一轮歇斯底里的暴打。那房间约十到十二平方米左右，与前几小时在外面的逼仄比则宽敞了许多，所以这场殴打的暴力当量与前几个回合相比更加惊心动魄。不过，进入房间的第一轮暴打过程中我始终没有倒地，但因为双手被背铐，我没有任何条件对自己以一点本能的保护。里面有灯光，大概是在灯光下，我的神情更能为他们看清楚。我不惧怕他们，内心蓬勃着的鄙视大略能从眼神里读出来，这是他们最忌讳的。那姓王的处长到房间里面的近一个小时，就跟着我的神态干上了。他是绝不允许狗汉奸摆出大义凛然的样子，那真是他的局限及变态神经的产物。我并未刻意要弄出一个「大义凛然」形，也更不是什么勇气之类的形显，那只是一种气的质显。说心里话，我当时及现在都是这样想。当时，若是我的手不被束缚，我的反抗将是毫不犹豫的，横竖是被无底线地折磨，如果当时我的手不被背铐，我会瞅准时机扑扼其中一名凶徒的咽喉，除非砍断我的手，不然我将力扼至死之，绝不含糊。

理性是什么？不错，理性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一种无上的力量，却绝不能成为无底线容忍一切野蛮的理由。我当时就想，野蛮成了畅行无碍的力量，而理性价值的呵护成本也不能全无边缘。我反对暴力，但绝不无底线地迁就暴力，当尊严正在经历野蛮的无底线暴虐时，只要有条件，就绝不放弃自卫。当然，对于有限的自卫，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的冲动针对的都是暴力正在发生之时。当他们停止施暴时，我内心从未有过这种冲动。

九、他们只是专制权力的鹰犬

我绝不仇恨他们，却也谈不上怜悯，只是可怜他们，确实是常替他们哀伤，觉得这是怎样的一种不名誉的角色，成了这种角色是怎样的一种不幸啊！在今日中国，罪行和可恶的是邪恶专制权力，他们只是专制权力的鹰犬，即便是他们中间的个别人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的。他们三人中的「阿巨兄」就与另外两人有些不同，从2007年到2010年的4月，他又一个绝对的规律，即绝不与我的眼神发生碰接，只要我在场，他百分百地两眼下垂，他对我的殴打，与「重八君」是有着极明显区别的，我闭住眼睛就能分别开来。2007年的那次酷刑，真正的属于「上面领导专门挑选」的是四位，其中三位，即「重八君」、王处长及我曾叙述说过的那位亲仔，他们三个人的施暴可谓凶残、冷酷和实实在在的，而「阿巨兄」的出手明显是有些分寸的。

实际上，对于施暴，如果有条件避免，他们中间一些人会选择放弃，新疆的那次酷刑就是个证据。当时厅里挑了三个人，分别来自不同的地方，三人中，在两天的酷刑过程中，其中两人始终没有与我发生任何身体接触，其中一人只是每必加入骂阵却绝不动手，而另一人则是不仅连骂都没有，而且在两天里，没有给过一个恶意的眼神，而且眼里始终释放着善意。

对这种现象我颇诧异，后来就此现象我与新疆的看管人员讨论过，他们的分析使我信服。他们的区别就出在人员来自不同的地方，而又互不统属。说这三个人若是来自同一单位，而又由自己的领导带队，那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说这三个人之间，既无同事间的竞争，又不需要向领导表现，而这次抽调的工作又是打人，而且又是打你这样的人，所以只要有可能，有些人就会选择放弃，说谁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个现象极值得研究，这表明了许多酷刑的实施者，其核心动机就是无底线的个人私念。

十、老高你都他妈神啦！

从进了房间开始，王处长就是不依不饶地与他认为的「大义凛然」发生上交涉。为这茬儿，他们又开始折腾我有一个多小时。而后又转入跪下与绝不跪下的没完没了的冲撞，其间多次发生他们在我背后猛击，而我几乎是直身倒下且头撞地板的情形。由于双手不能发挥一点缓冲作用。背后遇袭后，人全无遮拦地扑倒。那些「有识之士」可能会笑我，指我迷信或事后对号入座。这种多次直身扑倒撞击地板砖而脑部丝毫无损，神的保护是显而易见的。就拿他们用膝盖猛击我的胸部这点而言，如果那是发生在纯生物间的碰撞，那种丧失理智的击撞，是百分百地会造成胸腔、心肺气血功能毁灭性的损伤，那结果实在是个奇迹。我的胸腔及相关脏器丝毫无损，直至2011年11月15日夜，一个秘密警察头子谈到这个过程时仍睁大眼睛说：

「老高，你他妈身体真好，都他妈神啦！」

这一次进来后，由于他们宁死不愿接受一个狗汉奸的大义凛然，而我实在又是去「大义凛然」不能，「重八君」再次凶残地对我施以猛烈的膝盖顶击胸部的暴虐。我听到了那种极陌生的惨叫，直撞得口吐黏液，两眼模糊看不清东西，但依然能看清楚每个人的轮廓。出现了个有趣的环节，那「重八君」显然的是丧失了理智，越顶越猛，竟然是王处长扑过来用电击器给我拦开，把「重八君」堵到一边。我从中读出：第一，上面有底线性指示，即不能打死；第二，王处长头脑冷静，他看出「重八君」情绪完全失控了。关于跪与不跪的对抗性终于还是没有结果，因为用暴力来维持的下跪终于是虚假的，他们只要松手，我就会站起来，非我不再有可以站起来的能力。

未来读到这段文字的亲爱的读者朋友，我提醒你们，切不可把这过程看成是一个人的勇敢，我最有权威结论之。整个过程，我从未有过一丝的要与勇敢来办理交涉的冲动。在那种黑暗的环境里，使出些豪气、搬出些勇敢的架势，我觉得不大符合人性。我自己觉得应当只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一落到心底的怯弱，一种是近乎倔强的不屈，两种情形都符合人性，都应得到理解。我是属于后一种情形。我当时就坚持想着，爷爷就是个人，只要我还有一点冲动的能力，还有着一点表现这种冲动的能力，爷爷释放出的就会是一个人的反抗。当然从「有识之士」的角度看，这种表达是毫无实际意义的，但我并不这样认为。硬暴力终于不能是畅行无阻、所向披靡的。有人会认为抗争付出的代价太大（他们的看管警察中，

有不少人与我讨论过这一话题，几乎都认为抗争的代价太过于惨重）；
那是个外行观点，如果你选择了怯弱，你付出的代价则更是无边沿的惨重。

中共从2006年迄今，对我数次施以酷刑，企图使我妥协，答应他们的要求：
第一，必须改变身分，哪怕是形式上的；第二，抹灭关于酷刑的文字；第三，最后一次地强迫下跪。最后哪一点能使他们得以遂愿？

他们的一位正团级干部给我谈及我付出的代价时说：「我们看得是心惊肉跳，那付出的代价太吓人了。」

他跟我谈到这种代价与中国进步事业前景的关系时（**现在不便特别清晰地说出他的身分，担心给他造成伤害**），我说我认为，我的这种坚持并无多少宏大愿景及价值的支持，也算是我的一点倔强吧，大家都是人，凭什么我就必须俯伏在你的价值之下？是你持有的价值本身？还是你的德性和才能？靠着电击器，靠着凶残来聚拢并维持「支持」，那本身即是一种自我否定。只要我还活着，就是你野蛮强权逾越不了的障碍。这不是口号，这是我们冲突十年的结果。强权使遍浑身解数，没有改变我，作为他们认为的障碍，我还存在着，不客气地说，还依然有着力量。当局迄今不舍昼夜地动用大量人员，围在我的周围就是个证据。而这是最后一次的肉体酷刑过程，从他们向上面汇报的画面上看，我肯定是「下跪」来的，但美中不足的是，「重八君」压着我的双肩，而「阿巨兄」则踩在我的两只小腿胫上，除非「领导同志」脑子灌进了猪尿，否则，瞄上一眼，即可以看出那外力作用之下下跪的虚假。

十一、在顽强的酷刑干扰中睡得五迷六倒

回到房间，王处长又旧帐重翻，还是让我口头说一遍2007年那个文字记述的酷刑是虚假的，但终于还是没有实现这一大愿望，虽然为此又颇下了些野蛮的功夫，我在惨叫声中他们气喘吁吁，结果还是不那么完美。王处长等三人累了，已经是深夜了，当天夜里的酷刑，就目的而言是个无果而终的结果。他们有一个人走了出去，不一会又进来两个新的面孔。

王处长走出了门，「重八君」来了一句：「孙子，你这几位大爷累啦，回去休息，由别的大爷陪你玩，慢慢儿熬着吧，孙子。」然后也走出了门。

前面王处长说过是来了多位大爷来伺候我，因为这时我是躺在床上的，我并未抬头看来人。由于我是切断了思维活动中，这最大的好处即是但得间隙即会有

睡意强势光顾。我听到有人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我的头跟前，我睁眼一看，一只穿着皮鞋的脚就搁在我的鼻子跟前，不到两分钟，我就睡得稀里糊涂，大约是那扯鼾声太没有顾忌场合，头上被人踢了两脚。用力倒不大，随即骂声赐下：

「妈的X，你丫的真的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东西，连这环境你都能这么快就睡着？」

实在不敢恭维，那声音绝对是娘娘腔。我这里绝无性别不敬的意思，女性的声音是女性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但那美的女声若为一个男人的拥有，那实在别扭得可观。迷迷糊糊，不到两分钟，我又酣然入睡，我又被踢醒，娘娘腔又把骂声赐下：

「高智晟，你丫的傻逼呀，你丫的真的没肝没肺呀，今儿是什么动静，你居然能睡着？你丫的不是傻逼是啥？」

显然，这娘娘腔跟我的睡觉干上了，骂声还是在继续：

「这什么场合？丫的都能睡着？大爷们在隔壁听了，大概几天都睡不好，说你畜生畜生的，你丫的真不是人呀？」

他说着说着，我的鼾声又吼了起来。其实，我平时睡觉很少打呼噜的，只有仰面朝上姿势，且不枕枕头时才会鼾声大作。那天，王他们离开时，将我的手铐在了前面，并用我的腰带将我的两只手绑在小腹处，我仰面一趟即鼾声骤作。

我有若干种迅速入睡的本领，这是我在前面几年的律师生涯中历练出来的。有时庭审休息十分钟，我即可成功地睡上六、七分钟，这实际上是我在学着控制自己情绪时的一个意外收获。我控制情绪的方法即是用意念间断情绪，将之骤然用意识凝固，颇成功，可出现了别一个收获，即不出两分钟，即会意识混沌，稍作纵驰既可立即入睡。这点意外的收获，在这十年里使我大受其益。便是在酷刑间隙，打手们休息一会，我就能获得实质性的休息。不论什么过程中，只要眼前出现了一点可供休息的时间，我会立即利用起来。

因为这十年的经历太特殊，我的所有时间都成了中共特务的支配物。许多特殊过程中，没有任何规律及经验可循，最明智的做法即是见缝插针，有时间「到手」即立即入睡。因为像2007年时曾有整夜整夜不准你入睡的情形，他们两小时一轮换地坐你面前不准你睡觉，这种事，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不是今天回头才意识到，即便在当时，我已经觉察到，当对方不能改变我的身分时，他们会把眼光投向我的身体健康，干预人的健康，若不藉外力来实现，诸如药物、细菌等，剩下的只有食、睡两样关键的过程。而他们能掌持的则只有食一样东西。而食对

于人的健康影响的功能有限，除非他们刻意地量控，像在2007年9月时的故意饿你；否则，食物质量对人健康影响效果完全取决于精神因素，实际上就是人的心情。

我曾与当局谈话人提到过，想用饭菜质量达到损害我健康的目的，无异于拿着牙签刺激太平洋，是在做滑稽的无用功。这几年我获得一个很有价值的宝贵经验，那就是在任何困难的过程中，或者是应对任何困难，你需要的就是持续地培养自己的精神规模及质量，使精神无限强大起来。强大的精神几近能给处在物质极度困乏过程的人提供无限的支持。我这十年的经历可完全现实地证实这一结论的正确。当局这十年来，在对我的囚禁及食用计算上，可谓用心至其极，尤以部队的二十一个月囚禁及沙雅监狱的三年囚禁为甚，一口气禁闭式囚禁三年，一口气吃三年的煮白菜，除减少了三十多斤体重外，当局一无所获（**有趣的是，从沙雅监狱出来被当局押回家仍被软禁着，不到四十天的时间即增加了三十多斤的体重，不知研究对付我的专家有何感想了**）。

我的睡觉不仅迅捷，而且颇坚韧，一般的捣乱效果不彰。根据我的经验，施行酷刑的人休息后换进来的人就是看管人员，但一般酷刑期间安排的看管人员都坏得可以。那晚剩下的几个小时里，我就顽强地在顽强的干扰中睡得五迷六倒，那实在是太累了。

正如所料，接下来的几天里，疾风暴雨式的肉体酷刑已经停止，换来的是近乎和风细雨的以疲劳肉体为目的手段。那种设计过程也足够绵密毒辣，也足够地难熬。他们分为三班看管我，每班两个人，所谓的「三包一」模式，即有三个班车轮式轮流地看管同一个目标。那绝对是一种蓄意的安排，每个班上都由一个绝色的坏种负责。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用领导具体安排，能够自觉能动地作恶且不知疲倦。接下来的几天由他们看管真给我制造了些苦楚。对于这些苦楚我不打算在这里细述，加上我在那几天里思维基本上处于一种混沌状态。首先是我基本不自觉地启动思维，使思维呈自然的休眠状态，使人的所有痛苦额限在生理方面，即使是在生理方面，这种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稀释了痛苦的被注意程度。经历过酷刑的人都当记忆尤深，酷刑创制的真正痛苦除了电击外，当在酷刑停止后的五天内，尤以前三天为甚。那是所有生理痛苦的集中聚拢时段，分散注意力是减轻痛苦的不二途径，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看，莫过于遏制思维运动。而对思维的着力扼制的一个显著收获是没完没了的睡意。

我整天处在昏睡或半昏睡状态中，绝不是夸张。便是在强制站立阶段，我亦可迅速地进入迷糊乃至酣睡境。美中常有不足，每至酣睡境，膝盖就会猛地打屈，招致看管人员的几脚猛踹，终于不能阻绝那更强悍的睡意，这实际上也不当全然归责于我，实在是因为那近乎理想的足使人昏睡的环境。切断思维是一个方面，另外两个利睡的绝好因素是近乎死寂的安静，和大白天在房间里给你戴个黑头套。那个过程，睡能让人幸福得昏昏沉沉、浑浑噩噩。三个绝好的睡眠条件他们就给了两个，你是不想幸福也不行。

十二、「娘娘腔」不允许解大手

三个班的看管负责人中，他们是竞相卑鄙，而有时又相率冷酷。他们三人中的两个人，都长得膀大腰圆，皮肤黝黑，脖子、脑袋一律粗，腰、臀无区界。这两人最一致的特点并不仅止于体型，还有一个一致的特点是心黑手毒，他们俩后来给我制造了不少苦楚。他们的冷酷及法盲使人记忆尤深。而另一个使人记忆尤深的特征是，两人有着共同的雅趣——通体黑西装而脚蹬白袜子、白球鞋。我送他俩的绰号也顾及了他们俩的共同之处：「黑煞一郎」和「黑煞同一郎」。

这白天看管时给我戴黑头套应当是「黑煞一郎」的能动发明，当不是上面的安排。因为开始时只在这「一郎」的班上才有，后来才被「同一郎」效法。「一郎」那小子可冷酷得可以，我的手在白天是被背铐着的，所以手不能给主人一点帮助，完全听人摆布。「一郎」一上班，他就会把黑头套给我套上，然后从后领上将我揪扯至他认为合适的地方。有一次，他换班之前抓下黑头套时，我才发现，整个三小时都是被他强制面壁。

「一郎」还每一次都会说：「我的班上你站在那里不要动，我就不会没完没了地折磨你。」

人一站就是三个小时一动不动，这很难做到，更何况我大部分情形下是睡得稀里糊涂，因为站着而动摇，他们为此给我吃了不少苦头。三个负责人之一的另一个即是那「娘娘腔」，他给我留下的痛苦记忆尤为难忘。

记得，「娘娘腔」在白天第一个班时就指戳着我说：

「高智晟，在我的班上，你可别拿自个儿当人，你丫的要是还记着自己是个个人，就有你丫的苦吃。」

我在那里被骂是太家常便饭了，也是我唯不在意一途。你不可能与他们堕为一类而对骂，低下的咒骂对我而言不发生损害，所以我像寻常一样没有在意。但当后来我要上厕所时，才意识到他的恶意并不简单止于骂。

肉体酷刑停下的第二天，到了我规律性地解大手时间，而正好是他的班，我提出要解大手。

「娘娘腔」眼睛一瞪，骂开来：「我说过啥来着，你丫的把自个儿当人啦？上厕所？忍着，在我的班上，你丫的别想这个，美死你，解手？解手那是人的事，你是人吗？」

「不允许解大手的事还从没有发生过，便是畜生牠也得排泄，这只和生命有关而与政治无关涉，你不允许我上厕所，不应该创下这种反人道纪录，这对你个人也绝不是个光辉的纪录。」我提出了抗议。

「你妈X，你是什么臭狗屎？你丫配来教训我？我他妈就清楚地告诉你，在我的班上，忍着，别丫的自找苦吃。什么人道？你配吗？」他骂道。

「可便是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他终于还是要解手的，你不正用人类语言而不是畜类呼叫与我对话吗？」我说。

「大爷我懒得与丫的瞎掰逼，不让你去就是不让你去，再他妈嚷嚷抽丫的！」他大怒道。

他的决定已完全超出人理，再与他争论已全无意义。但这做法是十分恶劣的，他作为个体，已昧却了基本的灵性。这个政权的确邪恶，可几年来究竟上厕所的需要基本还是承认的。上个厕所，当是寻常小事，因为他在人类群体中解决起来就是像寻常小事一样容易；但当他不能得到解决时，就成了极不寻常的大事。这从不使人瞩目的寻常小事，从未像在那段时间一样让我那般地刻骨铭心地在乎过。

我无能为力，房间是从外面锁上的，加之我的手又背铐着，「厕所」又只是在门口外的一只「废旧塑料桶」。而在他们三个组管制期间，他们实在不愿让我在马桶里解手。故每到解手时，他们会把我的手铐换成前铐，把黑头套套在头上，两个人把你架到二楼的厕所。他们把你架到目的地后，你的脚成了「眼睛」，探触着脚下情形，以便能实现目的。他们站在旁边则无一例外地骂骂咧咧，嫌你解得太慢。其实，那只是特殊环境里他们本能的习惯，因为我的大解便是在寻常环境下也从不超过两分钟，可每次都遭致他们不停地辱骂。那的确是一个非常荒诞不经的过程。

排泄功能及其过程，是组成人类生命的基本特征，而他当是一个私秘的过程，这是人类文明的最基本组成，他全程展示在他们的注目下，除非个人行为能力的丧失，否则，他是令人难堪及令人作呕的。这种不寻常过程，是中国权力反动及肮脏的一部分。这种过程的设计初始动机是羞辱中国权力的反对者，但客观上带来对具体监管人员伤害的后果。在那之前，我从未那么刻骨铭心地在乎这正常人每日必须交涉的过程。在那里囚禁的二十一个月中，这始终是我及监管人员颇苦恼的事。他原本不当是个负担，可他终于成了一个负担，因为他不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事，而是牵涉到一群人利益的复杂过程。因为在此后被部队接管以后，解手过程被设计得异常隆重复杂，以致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现实负担。好在，不知过了几天后，他们将对我的看管移至交给了部队后，在上厕所的事上虽一直别扭不断，但究竟还不至于像「娘娘腔」一样，干脆就不让你去。

十三、人一生最大的不幸是生命不再善良

这「娘娘腔」整人的花样颇多，他应该是每天刻意琢磨着这些事。对于我的饭，谁值班谁负责打饭，一至「娘娘腔」的班上常让人苦恼连连，他总能琢磨出整你的手段。例如，有一次他煞有介事地端来一摞三个饭盒，每至吃饭时，他们按规定将我的手铐前铐。「娘娘腔」他总是刁难你，他有时候假装把这茬给忘了，等上一个小时或更长时，他才故作顿悟状给你打开。这次三个一摞饭盒颇使我惊讶，因他打的饭我从来只能吃个半饱。我被锁着的双手极不容易地打开了第一个饭盒：空的；打开第二个，空的；我不再去打开第三个饭盒。他竟笑得差点背过气去，我实在觉得这里面未有丝毫娱乐性可言。他是纯北京腔，长得是白白净净，他的这种日常品行颇使人替他哀伤。一个人行事如此卑下而不自知，这实在是一种大不幸，这不幸首先是属于他自己，其次才是别人。

我们人类群体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底线，那就是对个体生命本身的不附任何条件的敬重。对生命个体不附条件的敬重，当是人类生命中当有的一种天然的默契，或者说是存在于人类生命群体的天然契约。不论何时何地，持有何种主义，对他人生命的敬畏是不可逾越的底线，这是人类生命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必须谨守，甚而至于用生命捍卫的原则。这是一个人游南逛北、交际各色人等的人身及心理安全常识性保障，越过这个底线，地上行走的不再是一个个美丽的生命，而是一个个危险的堡垒。

那段时间，我常面对他而慨叹，人一生最大的不幸是生命不再善良，善是生命无限快乐的因。他一见我，就成就了他的不快乐，这是怎样的一种愚昧及不幸；而这种体制下，这种人实在是多得可观，构成这个社会时代下的大不幸。因为你不能企图与他们做任何理性的交流，他们抱着一种激进的自我正确意识，并且推定了你的不正确且不可改变。你若指出他的错，且是常识性的错，他反应的剧烈程度实在是不可理喻，轻则破口大骂，或动辄拳脚并用。越是常识性的错误，他的反应越是激烈，似乎他不激烈地表达这错就成不了真理。我这十年来，为了这方面的原因，在他们面前实在是没有少碰壁。

十四、「同一郎」的副哨逮到机会表现

每一次的秘密囚禁，无论他们如何地刻意营造与世隔绝的气氛，但一般情形下我不会混淆具有的时日。大约是到了这次施加的酷刑点上的第四天下午，几名施加酷刑的人员进来给我戴上了头套，架着我就往外走。我的习惯是不去揣度将要到什么地方以及可能的遭遇，即只能是身体被迫跟着而心则不随。结果我被架到四十米外的另一个房间里，被按得坐在一个没有靠背的硬木凳子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能听到旁边的两张床上有人辗转反侧声。我趁机就是几个小时的酣睡，因为此前半天站立得人腿部都没有了感觉。

当被人再次架起来时，我依然在昏睡中，又进了一个房间，头套被抓去。房子里一片黑衣人，房子也大变了样，地上铺上了八、九块拼在一起的脏地毯，摆上了两个摞在一起的床垫，地下室朝着过道原本整天关着的窗户已被密封，与其他墙壁一样，贴上了有两公分厚的高弹塑模板。

又过了一天的上午，进来一大群黑衣人，施加酷刑的人员退了出去，「黑煞同一郎」走了进来，说：

「换一批干部来看管你，现在已交接完毕。」

我被一丝不挂地交到武警部队的几位领导手上。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支专供中共中央纪委驱策的部队，用以在「双规」过程的抓捕、秘密囚禁看管等差使，他们常密集地执行对贪官的押管任务。他们开始以为我也是个贪官，所以态度非常恶劣。至此，我开始了为期二十一个月的部队看管生活。

王处长他们并未撤离，武警士兵称他们为「贵宾」，继续住在那个点上。而「娘娘腔」则不再负责对我的监管，「娘娘腔」与我就此「别过」。他是这些年来奋

力阻止我排泄的唯一一位党国悍将，所以今天颇用了些文字来记述他，但我并不记恨他，因着他的门面实在是太小啦。而那「黑煞一郎」则与我颇有些情缘，有关的交涉后面专门提及。

事实上，这次负责看管我的秘密警察共有六位，其他三位迄今在我的纪念文字里悄无声息。这很有趣，前面屡屡被提及的三位却是因为他们的恶行。他们进来囚禁室监管的两个人里有一位是主哨，大略上是与地位相关联；其他三位几近没无闻，但也不是全无作为，例如「同一郎」的副哨就抓住过一次表现机会。

那次，我的两腿实在麻木得可以，我要求原地活动几分钟，主哨同意。我第一次获准活动一会儿，有一种如释重负感，结果令人不能置信的是，那位几天没有说过一句话的副哨，在我活动了还不到一分钟时却发话制止：

「行啦，你也真够自觉的，活动一下就行啦，真拿自个儿当根葱啦。」

我还想继续活动，而被他立即制止。其实，他们坐在椅子上，我在原地活动并不折损他毫发。常人难以想象那种环境里，几天才能争得到一次活动机会，竟被他这样轻易地给阻止了，我真无法理解他终于会有这样一个冲动。而「娘娘腔」的副哨则几近今天中国人的公共面孔，旁人死活都不能触动他，他懒得多看你一眼，但也不主动去作恶，每天来去若无旁人。

十五、幽冥里的星星之火

这里特别值得我记述的是「一郎」的副哨。我原不打算在这里念及他，担心因着他的善给他带来伤害，但终于还是想把他的善记录在此。因为对人性善的光辉记录是最有价值的，尤其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代，更由于是在对那种完全揶揄邪恶人性的特殊过程中。

每次在酷刑阶段，我每天只能吃到冰冷的饭菜和一点冰冷的水。这次，每天向我提供的水只有一瓶二百五十克的（或是二百六十克的）小瓶装纯净水。虽则是4月底了，我依然每天冷得发抖，终于还不能完全不喝水。但第二天，我从他手里接过来一瓶热水，瓶盖是原装封闭的。无疑，他是刻意把那瓶水设法热好带进来的。他把那瓶水递给我，因着是渴望得到的热水，我的眼睛一亮，一双温和的眼睛正看着我，我只能用眼神递上我的谢意！从这天开始，他总会有办法在悄无声息中让我喝到热水。即使别人已送进来的凉水，他也会在他进来时不经意地给我换上热水。

我感到他的心很细，他们班上的饭百分百都是由他打进来的。那段时间能吃上热饭、能吃饱饭一定是在他的班上。虽然他能发挥的作用也少得可怜，处处受到了主哨「一郎」的节制或掣肘，而且在那样的环境中，善的表达是很危险的，他不是一个美的人性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他仍小心翼翼地在那幽冥里，用善意点亮人性的星星之火。我记念他，在那样黑暗狂腾的环境，依然让我看到光明，那是怎样顽强的善！

十六、两个「绝对不允许」

我赤条条地站在中间接受着两伙干部交接。两伙都很蛮横，却都是对准我，那武警领头的是一位大队长（**后来得知其身分**）。身高直抵一米六一脸躁急的表

情，行动也颇不拖泥带水。交接中需要由我签字环节，我的签字速度触动了他的不耐烦，一步跨至我的身后，一把抓住我的手就开始签名，嘴里还骂骂咧咧。

「同一郎」退出。

那大队长向我宣布了由武警部队奉命接管对我的看押任务，要求：（一）在被看押期间须绝对服从哨兵的指挥和命令，违反规定，哨兵有权采取断然处置措施；（二）每天只能站起来在原地活动四次，每次时间在十至十五分钟之间，具体时间由哨兵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掌控。说到此，他又补充说：「这就是说你每天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只能坐着。」（三）除了上厕所和必须的事外，看管期间不允许你说话。据此，中共对我的秘密囚禁完全交由军队实施阶段。

我的监禁室里装有针孔录像器，并在三处装有有线监听器。监控室里有两个「绝对不允许」：一是绝对不允许我与士兵讲话，二是绝对不允许士兵之间说话。

第一个「绝对不允许」他们落实得干净利落。实际上，不允许我开口讲话实在是在每个囚禁阶段的要求，即便在监禁室内有交流，也只能是咬着牙，嘴唇不动，由舌头在牙后面挤压空气来进行交流，因为这不是一个怕与不怕的问题。你可以不怕，却无法不顾忌与你交流者必须的瞻顾。这些年来，几乎是铁定规律，警察与我交流一经发现，即会立即调离，而且给予一个不良纪录让他们背着；士兵与我交流，一经发现，处理方法高效且简单：立即被拉出去暴打一顿，士兵为此挨打的可谓数不胜数。这多年来的不让说话导致了个严重后果，我的说话声音改变得惊人，至今日终于无多改变，尤其在大声说话时，声音变得让人很陌生。

而第二个「绝对不允许」，即「士兵之间绝对不允许讲话」。然而，这一点却

从未得到有效地执行，尽管有很多人因此挨打、挨整。在坚韧的打压下，他们之间仍坚韧地以那里特有的方式「讲」着，其间不乏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的画面。开始时对囚室内讲话现象的打压非常冷酷、高效，尽管如此，关于这次换由部队看押过程的一些相关情况，没有几天我就全部知道了。

十七、金字塔状的安保布局

这次长期的非法监禁，使我近距离地了解到了中共现行体制中两个结构性的黑暗方面：一个是中共纪委的无法无天，以及他们对人权、中国法制前途的摧毁性破坏；第二个是中共武警部队超乎外人想象的内核溃烂，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这是神让我在这样过程的特别收获，我将在后面述及之。

这次在与中共武警部队先后两个中队近二百人的接触，一个被精心藻饰了的忠诚且有力量的面孔背后，长期不被我了解的世界，在我的眼前崛起。说不客气一点，即使有时他们让你看到了一些生机勃勃，那也是在猪圈里的生机。在那精心捌飭的忠诚模样背后，维持着人类生活的最黑暗面。那是一个人权、人性的洪荒地带；暴力，成了维持那局面得以苟延的唯一力量也是最后的力量。常有人说，中共今天在大陆局面的维持依赖两样东西，即谎言和暴力。这个判断在部队就只剩下了暴力，对士兵没完没了地进行洗脑的局面已完全依赖暴力来维持，几乎每个士兵都感到痛苦不堪且各自都感到无助。

作为中国今天令人痛心局面的一部分，那里已成了一个完全的没有了真相、没有了常识和没有了人的互爱的世界，人们相率无耻，竞相卑鄙。那里的人大都鲁莽、怯懦、告密、献媚和荒谬、冷酷，且又无助和无奈。

对于我的纪念文字中，我拟最大限度地使用士兵的真实姓名：一则，考虑到这些人都已复员回家，搞秋后算账是颇需要费上些周章的；另外，作为真相纪录中活的参照物，为未来人们求证这段历史真相提供可能。虽然，在那种环境中，获知士兵的真实姓名颇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知道的大都是绰号和假名，但究竟还有一部分士兵的名字是真实的。

士兵中间很快就有一部分人知道了我是谁，他们中间有不少上网高手，能突破封锁获知很多外面的信息。他们能咬着牙告诉我很多信息，当然也有人因此被多次殴打过。他们这支部队来自北京武警总队第三师第十七支队第二大队第五中队（后一年换成二大队的第六中队）。有士兵第二天就知道了我的名字（他们值班

时听到了警察与我的谈话时获知的），他们还通过网上手段获得了许多关于我的信息。另外，他们是常年执行看押任务的，但据他们自己讲，从未出现过类似这一次的神秘气息。因为他们中间有些人直接参加了对陈良宇的抓捕，也有几个人多次参加过对高官的抓捕。而十七支队的第二大队曾负责看管过陈良宇、陈绍基等落马贪官，也在前一年直接负责看管刘晓波先生。另一个使士兵感到神秘的证据是，据他们讲，在具体的关押点上，能见着北京总队的领导即属罕有的例外，而这次则数次见到总部中将级别的领导，而武警部队总部中将副司令也两次来这个点上检查工作。

中共刻意营造的神秘氛围，本意是在士兵中间激发所谓的「神圣使命感」，却也启动了士兵蓬蓬勃勃的好奇心。因为据他们讲，有些神秘过程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例如，他们说每次接受任务后从来都是直接开往目的地，目的地对士兵从不保密；这次则不同，不光不告诉他们目的地，而且提前一天就将他们拉出了营房，且用黑布条蒙上了所有人的眼睛，然后又上了火车，在火车上继续被蒙着眼睛走了一天一夜，下了火车后就被拉到了这里。到这里才发现，这个地方就在北京昌平区的一个山区里。从他们的驻地海淀区用两个小时就可以赶到，却折腾了这么长的时间。其实，他们这种做法很滑稽，是这个制度一惯务虚的又一个实证。因为他们说，送他们来的车辆和一部分士兵当天下午就返回了营房，这种神秘过程已全无了实际意义。

通过士兵的描述，看押点人员配备情况如下：武警部队二十七人，属恒常保持人数。其中，监管室由十名士兵或士官组成，分成五个班次，每班两人，所谓的「五包一」，由五个班次轮流换班；监控室五人，由五名士官担任，亦分为与监管室相匹配五个班次，每班一人；自卫哨五人，亦分成与监管室值守一致的五个班次，每班一人；应急小组五人，值守班次与前面一致；另加两名值班干部，大队领导一人，中队领导一人，凡二十七人（有时是三名以上的干部）；点上由公安部门提供的警犬一只，由于该犬一腿行走有些颠簸，遂取名「小瘸一郎」。我听了那只警犬二十一个月的嗥叫，今日仍音犹在耳。

那里的安保布局，整个结构类金字塔状构成，我是在最下面，武警部队则位覆我之上，而武警部队的上面又设了一个公安系统的总监控室，负责监控武警部队的一举一动，并监控及监听武警部队与我的交涉情形，由三名老警察组成，三人轮流值班，二十四小时一换。他们虽互不统属，但武警部队每日必须在确定的时间向公安方面抄送一份「一日目标监控情况抄报表」，这里的「目标」就是我。

然后，公安方面还驻了四个人一组的「审讯组」，由三男一女组成，据说后来只有在上面来检查时这个小组成员才都在。至于被称作是「贵宾」的九名神秘人物，实质是负责酷刑的打手而已。即便是在他们体制内部，这种人的身分也是不介绍的。

这样，从关押的初始阶段，属于长驻那个关押点的人员不低于三十九人。而具体负责室内监管的副哨，手执一本「目标日常监管记录」（确切名字不详），在「目标」没有异动的情形下每一刻钟进行一次记录，若有异动情形随即记录。这项记录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据说每天下来的记录要超过两个记录本，单此一项，二十一个月的囚禁过程就用去一千四百本左右。每天晚上，须在日常记录的基础上填写一份「抄报表」，给公安系统，一份「上报表」给大队，这只是一个「上报」连结的基础性环节。在此基础上，大队向支队日报，支队向师里，师里向总队而总队向总部报告。然后，每周一次「总报」，每周的总报也得抄报公安系统一份。而武警之上公安系统的总监控室则每日向上级提交一份监听、监控报告，并附上一张监听、监控光盘，所有日报、抄报不可有一日中辍。那群士兵常为此蹙额疾首。这些士兵在家时，大都是一提学习写字即头疼的角色。

十八、关押本国人竟有抽水马桶不让使用

这次的关押点，据士兵讲是在北京昌平区山区一个叫「卧虎山庄」的地方（2009年4月28日转移后的秘密关押点也在卧虎山庄，因为我曾在卫生间两次发现「警察同志」使用的餐巾纸上写有「卧虎山庄欢迎您」的文字）。这山庄的经营

者当有着不一般的权力背景，因为北京周边的森林植被原本属稀有资源，能在林区获得修建经营性山庄者，你尽可揣想他们的能耐。据士兵讲，这个权力背景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因为北京市公安局几乎所有象样的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而由他们担任安保任务。

据说我这次关押租用的是卧虎山庄的办公楼，因为原址是明清时期的坟地，建成后据士兵说夜里鬼患不断，终于放弃（在我的羁押期间，便是在囚禁室，也多次出现过灵异影像，有两次竟直接与士兵发生了交涉，而监控录像看到的只是士兵的手舞足移，我颇欲看到之，更欲与之办理交涉，而终于所欲不遂）。而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每月十数万元租下来，专门关押重量级的异见人士。我的囚禁室在地下室，应属半地下构造，据说地下房间的三分之一是在地面以上。卫生间在

二楼，干部值班室及武警部队监控室也在地下室，士兵全住二楼。

那地下室有两大特征使人不能忘：一是潮湿；那种潮湿直可用「稀湿」来形容，一个纸箱若在床边放上两周，其外形直似刚从浸泡了很久的水盆里捞出来，捏一把水哗哗下流。一是冬天阴冷，夏天闷热；他们的解决之道是安装空调。因为武警部队一接管对我的看押任务即进入夏季，闷热难耐，他们为此屡向北京市公安局交涉。大约在当年的5月下旬，由北京市公安局出钱，除了我的囚禁室外，其余住人的房间都给装上了空调。

由武警部队接管后，我连带着黑头套被人架着上二楼厕所的待遇也被取消，由于房间里没有卫生间，他们就在我的房间门口外面楼道里放了一只小便用的废弃塑料桶和一只大解用的马桶。囚室门朝外锁上，钥匙由监控室值班人员控制，我若需要解手，得向士兵喊报告，由他们按动安在室内的呼铃按钮，而监控室值班员打开门。我上厕所的过程是属于加强哨的过程，即不论大手或是小手，由三名哨兵将我围成个三角，各距我七十五分而呈欲扑状，做出随时紧急处置的形、神准备。那种过程真使人不堪，有人会说习惯了就好了，我经历了近十年竟终于没能力习惯起来。

羞耻心，是人类感情的组成，一个健康的人，尤其在解大手时被三个人居高临下盯着，而且是在一只马桶前，这始终是我心理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负担。就为这上厕所，与士兵发生的冲突实在不少，我们中国人中间最缺乏爱，而在看管者与被看管者之间则更是罕有。而作为人类群体之间的基本尊重，在我们同胞之间也很少能得到应有的承认，更别说在公职人员那里。在有卫生间的地方，人在没有离开马桶前即可冲水，没有了后顾的尴尬，而他们就给你一只桶，那过程实在是不堪入目，可这又是一个人道的必有过程。中共当局有厕所不让你用，而强迫我们接受这样的过程，这是赤裸裸的反人类行径。

在武警接管的当天夜里，应该是有部队系统的大人物来检查工作，因为能听到一群的陪随人员，我听到他大声说：

「这怎么行，看他一次解大手，我们的人可能两天吃不下饭。他解完还得我们的人倒，倒一次半个月吃不下饭。我们不倒，我们不给他倒。」

估计后来两边交涉的结果，武警部队果不负责对马桶，却是由公安系统雇人倒，这种机制始终运行不畅，他们有时一两周不来倒一次。

我很抱歉使读这些文章的朋友经历这种不爽的感受，那种经历真的使人束手无策终于无可奈何。这种精心的天才设计显然旨在长期地羞辱我，但实际上却显

现了设计者的卑鄙和愚昧。正如河南一个大学生士兵讲：

「日本人八、九十年前在东北关押中国人的监室里就装上了抽水马桶，没想到共产党今天关押本国入竟有抽水马桶不让使用，非得这样做?！」

对于我，羞辱，谈不上，羞耻也不当属于我。再说，这已属于我在这十年里的「正常生活，」我常给士兵讲，人在绝对无助的情形下，习惯成就了他的一种本领。我的烦恼是有的，而这些烦恼源自个别看管人员的不可理喻的要求。像「娘娘腔」一样干脆剥夺你排泄要求的事，此后倒是再没有出现过，可一些士兵屡屡向我提出他们自己的使人无力满足的要求，即请你千万千万不要在他们站哨的时间解大手。不是只一个人给你提这种要求，是一群人给你提这种要求，让你实在无可奈何。因为我常被规律驱策，不可能随意地改变，为此惹得一些士兵很不高兴，也存心给我吃了些苦楚。最明显如一个绰号「艺术家」的湖北籍士兵，真是让人无法评说他。

「艺术家」大学毕业就业数后来当兵，头脑很好使，岂能不谙人情世故？他就明确要求我不要在他的班上大解，这种要求实在有点超出人理。有一次早晨在他的班上大解，他大为不悦，竟至于停供我的饮用水。我避其锋锐没有抗议，但等他下午站哨时，我当面指出了他的错误，他昂然不屑一顾，我就不再客气，我说：

「年轻人，切不可一事不遂己愿，伸手扼人咽喉，暗昧心理终身害己。」

这种事例，即因这事而停水报复我的，也就只发生过两例，且都是在六中队，其中一次发生在「耗子」（张浩）身上。这「耗子」君，是士兵个体给我制造苦楚最多的一位。其他人因为上厕所而跟我别扭的事也常有，而大都只是给我个脸色看或制造点小麻烦，究竟没有上升到断炊断水。但囿于这种非常的现实，我也最大限度地理解他们的心情，我唯一能做的就量控、将原有的一天一次的规律降为两天一次，半年后终于至四天一次。这种量控的努力，首先是出于实在的无奈，其次是对有关生理常识的乏知。终于成功地敛控至四天一次大解时，我颇为这种结果自喜过，可终于物极必反。事实证明这种努力的方向及结果是有悖生理规律的，我患上了便秘，导致大解十分困难，遭遇了此生从未碰到的问题。

我的相关知识不能使极端减少大解与便秘发生联系。哨兵中有个叫刘巍的内蒙籍士兵，他的母亲是蒙古族，这小子身高近一米九，天津大学毕业，风趣幽默而心地善良。有一次，我在他值班时大解过程颇苦，由于解手的过程里有监控而无监听，我告诉了他我在这方面遇到的苦恼，他告诉我导致便秘的原因正是从一

日一次减少至四日一次所致。

他是第一个主动提出：「你就在我的班上解大手吧，多少次都没有关系，我完全理解你的难处。」

这坏小子的一番话差点让我泪水潸然。后来，他的同年兵成成（夏智成）、郑智中（音）、郭通（音）都向我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帮小子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心地善良，他们给了我不少很人性化的关照，当然这一切是极具危险的。刘巍的这一提醒使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把大解次数回复到二日一次，并开始以意念疗治便秘而终于根绝之。

身陷地狱环境当中，致病及治病都凸显了今日中国因素——中国特色。尽管稍有人性常识的人都清楚，这「中国特色」是今日中国黑暗势力自画的「人相」，所有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扑腾在中国黑恶势力苦心经营的中国特色苦难大泽中，没有人能够例外，包括黑恶势力集团自己。历史将很快昭示世人，他们将自食其果。

十九、谈原本就不是个问题

大约是武警部队接管的第二天，中共组成四个人的谈话阵容。关于谈话，表面上看是这次酷刑的成果。实际上，我从不拒绝对话，相反，我非常愿意对话，谈成与否，只是价值的一个方面，而对话本身就是一个当予以肯定的价值。这次酷刑进入室内后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要求继续与政府谈，但操作者愚蠢和蛮横，加上我针锋相对情绪化，使酷刑过程又激烈地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应当清楚，对话在我这里从来就不是问题，他们的愚蠢使之成了一个问题。

那王处长用电击器对准我的下巴，劈头就问：「下阶段与政府谈是不谈？」

又说：「丫的要敢说不谈，今儿就弄死你。」

这种蛮横在我这里绝不会受到鼓励，我咬牙不发一语，招致了一个多小时疯狂的折磨。这里面是有些情绪化的东西的，而人格尊严岂能被随意踏在脚下？最后终于同意谈也是在他们停止了暴虐，用语言技术地缓和了气氛后的事。

我只说了一句：「他原本就不是个问题。」

这次组成的谈话阵容，四人中有两人系2006年8月15日被捕后，连续三个多月负责审讯我的三人中的两人（三人的负责人佟中华，因深得于泓源的赏识而得到了拔擢。他深谙昏官心理，每次于泓源一出场，他会立即从衣兜里掏出小笔记本和笔，神情肃然地「认真记录」着于的话，从无例外），

和一名女性警察。而负责人则是一位五十岁左右，对自己的学识、阅历蓬勃溢于言表自负的官员，他即使坐在那里不说话，精明、狡猾和阅历就在他的眼里外溢，他身高逼近一米六，头顶上风光无限呈全然的「不毛之地」，能听出他读了些书。第一次谈话的开场白颇有趣，我这里记述的也只是个大概，我又不反感他，他们从不介绍姓名，所以我赐其雅名为「绝顶君」。

二十、「绝顶君」的开场白

大略是2010年5月2日中午，「绝顶君」率众登场，开场白若下：「老高，下阶段由我们几位负责跟你谈话，说个大白话儿，不愿意接手你的事，听说让我接手你的事，提前几天就开始了发愁，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现象。办了几十年的案件，还都是大案子，那是些真的犯罪分子，大多数是些杀人放火的主儿，跟他们轻一句、重一句都不需要刻意计较，不需要斟字酌句，跟你不一样。甚至来这儿前三天，就开始为初见你的第一句说什么、如何说而深思冥想。是不是不自信、觉得自个儿没这个能耐？当然不是。我办过许多高层人士的案件，包括大学教授的案件，资格、能力不成问题，但还是出了提前几天就发愁的怪怪的这么一出儿。接下来咱们得打一段时期交道，今天的主要目的就是先见个面，具体要谈的咱们慢慢来。老高，接手你的事以后，我接触了很多，有一个绝对的规律，就是所有体制内接触你的处级以上干部在私下都说你是个好，这是极少有的现象。我为什么对你说这些？老高，很多人想挽救你，你应该能懂这里面的意思，挽救你，真的，把眼光放远一些，抛开所有的东西，回去过自个儿正常人的日子去。你现在这种处境，无论背景有多复杂，你应该清楚，很多关心你的人希望你能尽快地摆脱目前的这种处境，回到你家人的身边，让你的所有亲人都安心下来。什么社会不公、社会黑暗、酷刑虐待，关你什么事？咱管不了。想管，结果如何？把自个儿管到这儿来啦，多么不划算！我希望下阶段能跟你聊明白了，和政府达成个谅解，回去过自个儿的日子去吧。现在一天有多少人在围着你转，钱都花得海了去了，省心点，自个儿做个好人就很不不容易了，谁有能力管天下的不平事？我听说政府领导非常关心你，只要放弃一些东西，愿意就任何话题和你沟通，遗憾的是机会一个一个就这样被你给弄丢了。不能再胡涂了老高，都奔五十岁的人了，五十都知天命啦，赶紧回头还来得及……」

他一口气说了一个多小时，如果不是一种伎俩的话，还真包含了不少人情、人性因素。但从后来几个月的长谈大略上可以得出，这是一种伎俩。因为核心目的却与此前所有的谈话目的归于一途，即与政府合作，否则头破身死，只不过这次很巧妙地糅进了人情因素。就在这一天的继续谈话中，即可看出由他出面也不会有乐观结果，我们之间的根本冲突是无法靠「伎」来抹平。

当他颇得意地侃侃而谈一个多小时后，我问他：「你不会说你不清楚这几天针对我发生了什么吧？」

他脱口而出：「老高，这就是你的不聪明。其一，君子当与人分享快乐，而不是把自己的不愉快扯出来与别人分享；其二，已发生了的事实覆水难收，再回过头来反当他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我说：「依着你的逻辑，你做了几十年的毫无意义的事。因为你前几十年里所办理的刑事案件，有哪一个不是事情已发生以后你才介入的？」

「老高，咱谈点有用的，往前看。」他说。

「你没来之前，这里发生了针对我的极其野蛮的暴行，是政府派人干的；现在你来主持谈话，也是政府派来的。你们好像两副面孔，究竟前后两副面孔我该信谁的？至少应当面对这个问题。」我纠住了这个问题。

而「绝顶君」的一番答话让人刮目相看：「嗨，老高，赶紧感恩呀，赶紧感恩。道理很简单，如果你看到你儿子面临车祸，你的举动绝对只会是猛地一把将他推开，哪怕他被推得跌伤，而不会是曼声细语地站下来给他讲道理。不发狠心采取断然措施，一把把他推离危险，难道要看着他被撞死撞残吗？你已经很危险啦，不用点紧急手段都是害你。」

他越说越得意，眼睛烁烁放光。我不再说话，第一次谈话就这样结束。

「绝顶君」的谈话究竟有多少次，我没有确记，总的时间跨度约八个月，终于还是将目的归到与政府合作，至少应当完全放弃与政府的对抗而获得政府给予的帮助。

二十一「魔鬼天才」其杰作与下场

到8月份的一次谈话中，他们主动地提到一个被我关注了几年的具体利益，即我的表哥承包了南水北调工程的一个标段，工程于2007年即验收合格，一千二百万元的工程款被当局扣住不给，其中有近千万元属于农民工工资，表哥

贷款垫付了民工工资，致他自己几近破产。就我与表哥的个人感情而言，这个具体利益的终于实现非常重要。只要愿意，我们可以获得更巨大的利益，但这一次他们没有谈到其他具体的利益。因为我有数年来一直绝不逾越的底线，表面上给他们的印象是一种软坚持，大致上他们已完全明白，这是一个数年来一直软坚持着的硬底线，不是利益范围内能够撼得动的。

这一波次，他们的所有目的是围绕着实现使我完全放弃，回归他们所谓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这对我不是没有吸引力，因为那种酷刑屡屡临到，实在太残酷，而囚禁更加地残酷。他们设计的那种囚禁方式，足以在生理角度彻底摧毁一个人，人毕竟有着实在的物质性的一面。世间再没有比共产专制的黑牢更邪恶的去处，我对坐牢是有思想准备的，任凭你想象再丰富，我都终于没有想到他们会设计那样邪恶的囚禁环境。我曾为律师，我所了解的最严酷的囚禁就是「禁闭」式关押，亦即我在沙雅监狱所经历的那种关押，即把一个人关押在一个全封闭的小囚室内，这种关押对一个有些精神空域者而言，作用极有限的，因为究竟你还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待在那里面。虽则像沙雅监狱一直有高音喇叭的干扰，但他终于还是一种物的干扰，而物的干扰终于还是有限的。

共产党为政治犯设计的牢房，从技术上，对一个人，从生理到精神方面的搅扰迫害无所不尽其极。我常当面说他们只有技术方面的苦恼而绝无伦理方面的负担。他们并不是把你关进牢房那么简单，用北京国保「瘦猴」的说法是：「想进监狱，美死你。」他们把你关进一个完全封闭的地下室的同时，会安排十名以上的秘密警察「陪关」。他们轮流保有两人与你一同关在里面，大致上两个小时一轮换，保证昼夜不辍有人「陪」着你。你若坐着，他们就紧挨着你的膝盖站在你面前，左右各一位；你若站起来，他们其中一位会迅速绕至后面，前后各站一位，几乎紧挨着你的身体；晚上你睡下，左右床边各站一位，吸烟、喋喋不休地说话、咳嗽、打喷嚏、打哈欠，样样都能让你不堪其苦。有的人打喷嚏，他故意喷你一脸，你若生气，那正是他的目的；你不与他计较，他得寸进尺。在那里，野蛮可以畅行无阻，是那里唯一表彰的德行。你吃饭，他们左一位、右一位紧挨着你站着，说着话是最稀松寻常的事，飞着烟灰、一个喷嚏、一声咳嗽，常让人胃口大跌，终于你还得吃下去，因为那就是你的生活。这种看管方式的设计被武警士兵谑称为「魔鬼天才」的杰作。

（世间之事是述不清、道不白，若非黄光裕偶然事发而使「省委领导同志」陈绍基成了被暴露的贪官，人世间谁能得知他就是这个「魔鬼天才」；一个叫安家的河南籍士兵讲述了陈绍基被用此方法看管时屡屡慨叹不已，

多次说：「想不到我发明的这一套被全国推广的监管方式会用到我自己身上。」安家这孩子，若有可能，我后面还要讲到他。他自己也曾遇到过一次「意想不到」。有一次，他眉飞色驰地讲述了说他们十一个士兵曾把一个「法轮功」学员打得死去活来，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我们把他的头皮都给打掉了。」不料，过了几天听其他士兵说，他被中队长史胖子给打啦。因为在那里，士兵挨打像吃便饭，亦就没有在意。下午，他进来站哨时颇使我吃了一惊，他的前额上方紧靠头发的地方赫然缺失了一块皮，还在往外渗血。一问，头皮怎么掉的？「被中队长史胖子给打掉的。」）

那「魔鬼天才」杰作的其中一个最著名邪恶环节，就是你解手的时候哨兵会三人将你合围起来，看管者亦不堪其苦。而且，这种关押的设计者，充分利用季节性的严酷气候，酷热和严寒成了给被关押者制造苦楚的生力军。北京的夏季，炎热得酷烈，房间里没有空调，若有窗户、门打开借用点自然风或是流通空气还尚可将就，而囚禁室的密封是当局精心追求的目的，经年累月的封闭致室内严重缺氧，初进里面站哨的士兵夸张地呕吐，更灾难性地浊化了室内空气。湖北籍士兵李俊良和他的主哨卢大个，进来不足一个小时，我发现他们的上衣像水里捞出来一样紧贴在身上，脸色惨白得可怕，各自同刚进来时判若两人。不一会，他们紧急敲响门铃，门打开后几乎是扑了出去，一出门二人同时开吐，主哨竟扑倒在地晕过去，此后七天没能进来站哨。

监禁室缺氧致士兵头晕目眩的事例不胜枚举，出现呕吐的事例也屡屡发生。像金野人，也是呕吐次数较多的一位士兵。我感谢他们，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会拚死憋着而终于吐在外面，而呕吐在室内的还是绝对的少数。最夸张的是河南籍士兵「橄榄球」和另外一名他的同乡，他们是突然爆吐在室内，数天之内，那滋味实在不好受。

金野人曾在站哨时向主哨建议，希望能向上反映，让士兵在囚禁室戴着氧气面罩站哨，但被骂了一顿。不过，这种刻意谋画的、专门对付我的污秽环境对我的伤害确实效果不彰。士兵每天两次进来站立四个多小时，而我一口气在那里面待了二十一个月，我不但没有出现呕吐现象，就连轻微的头晕不适都没有过，士兵颇觉骇异（**耿和知道，我本颇怕热，但是，在那里每年有几个月浸泡在汗水里，并没有感到多少煎熬**）。其实，我认为这与心理作用亦有干涉。在于我，断无改变希望，故而心理稳若盘石。另一方面，山涧间空气颇好，士兵从舒畅的空间骤然换成囚室的闷憋空间，生理的不适反应即起亦是一个原因。

二十二、你现在的现状纯系反人类现象

那段时间我的心里出现过波动，考虑过是否放弃几年，觉得耿和太苦、太过于艰难，为她们娘仁故，我完全牺牲自己甚至舍命为她们娘仁也心甘情愿。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这种波动的幅度底线从未波及至与当局合作的范围里。尽管他们时刻对之保有着出奇的热情。8月份的一次谈话「绝顶君」的一番话颇为新异，对与我的交流次数同效果不彰的情形，他开始显出一些躁急。

我理解他的心理，他无法实质性地向上面证明他介人数月后的收获。其实双方交手的时间已五年多了，人类中间是医不活死马的。他的介人是他个人的不幸。

他那天给我谈了他的不解，他说：「慈禧太后曾对她的财政大臣说过，说：『芸芸众生，不外乎活在名、利两个字下。』你现在的现状纯系反人类现象，既不要名也不就利，这是出乎人类群体之外，不是反人类行为是什么？」

我告诉他：「认为我既不为名亦不就利的结论是机械的，带有明显的蛮横标准因素。我从未出乎名利场外，不与权贵合作正是为了我的名，我现在有四套房产，那是曾经我就利的证据。这种结论反映了心态的狭窄和蛮横，就像你们对爱国标准的强制摊派一样，不用你们的方式攫利就是反人类，不像你们一样地祸国就是汉奸卖国贼。」

「好家伙，说着就又骂开人啦，现在给你什么都不要，这不是事实吗？什么都不要，不是反人类现象吗？」他又说。

「不从你们手里接受与不要是两个概念，给什么都不要更是一个伪命题，把人的权利、自由还我，把公民的权利还我，焉有不要之理？」我对曰。

这次谈话又不欢而别。

在这年10月底的一次谈话中，他说：「现在外面形式发生了些变化，但你不要乱猜，以为大环境发生了变化，我给你明确了，不是大环境开始变了。政府希望你从这里走出去。」说完他看着我。

我说：「是谁把我非法囚禁在这里，又是谁不让我从这里走出，你是心知肚明的，听起来好似我痴迷这地狱生活而绝不肯出去。」

「现在要出去就比以前简单多啦，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咱先搁一边，你现在给政府写上几句，认个错，感谢感谢，出去过自个儿的日子去。」他又说。

我拒绝了。

一个政府，竟长期以黑帮的方式囚禁公民，施行使人类无地自容的野蛮暴行对待公民，完了你还必须向他认错，还得感谢他，这是一种毫不遮掩的流氓行径。

对我的拒绝他颇生气，说：「老高，给你台阶你不下，关你六个月是他，十个六个月也是他，慢慢在这待着去吧。」

这次谈话像以往无数次的谈话一般无果而散。

到11月份，「绝顶君」又来与我谈了一次，这是他与我的最后一次交涉。这次来，他摆出一副轻松的样子，说：「不需要认错啦，只需要给于局（**指于泓源**）写封感谢信就行啦。」

我终于没能让他轻松地离开，我告诉他：「一个正常人，向凶手致谢是反人类的，而凶手在施暴的间隙，要求被暴虐者向他致谢也是反人类丑行。」

谈话彻底结束。

二十三、日常洗漱的悖逆现象

这次为期二十一个月的秘密囚禁，留下许多值得纪念的记忆，其中一些过程即便在常人生活中都归琐屑一类，但他在那样的特殊环境里，中国黑暗势力常煞有介事地放大这些琐屑事，常使人啼笑皆非。

1. 理发是大事

这次地狱生活里的第一次理发过程即颇使人难忘。我的头发已很长了，天气的炎热强化了我对这长发的在乎。又如以往每次的秘密囚禁一样，就理个发问题屡屡反映，终不能实现。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身边武警士兵每周日都在理发，可他一旦与共产党的权力发生交涉，简单的事就会变得无限复杂起来。负责我理发的是2006年参与预审的警察郭某（**全名不详**），就这理发问题，多次向他当面反映，极具戏剧性的场景是，他每次都神情肃然地企图颠覆你的常识，使你相信：理发是大事，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给你的回复中重复最多的是：「老高理发的事再绷一绷，报告都打上去几份啦，估计很快就会有准信儿。给你理发是大事，不是一两个部门就能解决的，是要跨多个部门协调的事。跨多个部门协调不是我的力量能办的事，这跨部门协调是大领导的事，所以你就再耐心绷绷吧。」

我问他：「每个周日外面楼道里都有理发的声音，你一把打开门进来个士兵把这头发给理了会如何？」

「那不可能，谁会干这种砸自个儿饭碗的事儿呢？」他说。

真若非亲身经历，你实在无法理解黑暗政治体制下权力与人的关系的这般变态与扭曲，权力成了主宰，活人成了死权力的不容置疑的奴隶，且心安理得。

终于，「跨部门协调成功」。

一日，囚室被打开，郭警察进来，仍一脸肃然说：

「老高，好事，理发的事批准了。你知道今儿是什么日子吗？」

我不解其意笑而未答。

「老高，今儿星期天，按规定是我的休息日，我跑了一百公里赶来给你理发，只要上面同意，我这里是一天都不会给你拖。」他又说。

头发终于被削。

2. 不给牙膏

另一个颇值得纪念的是日常洗漱中的悖逆纪录。在武警部队接管前的洗漱是不可能的，因为房间里没有水，须有人提进来水才能洗漱，这不是秘密警察的力量所能成就了的事。交到武警部队手里后，每天一早一晚由士兵给提进来一些水完成洗漱。交接肇始，公安方面不给提供牙膏，士官值班人员进来说过几次，说他们（**指警方**）不给牙膏怎么弄，我总是乐呵呵地回复他们，人类没有牙膏的历史远远超过有牙膏的历史。对于早晚的洗漱用水，绝大多数情形下，士兵没有为难我，在这方面给我添苦楚的始终是极个别的个人因素。但有一点，即是饭前便后没有条件洗手，多次希望他们白天能给半盆水进来，以便需要时洗个手，终于没有同意。我给东北籍的一个士官反映希望能够给予理解，得到的回复是：

「领导说啦，你不是来这里旅游度假的。」

而对于要求给室内放个垃圾筐的事，终于在关押结束时都未被批准。

而关于由我自己每周刷洗一次便桶的请求，始终不予同意。实在令人难以启齿，可究竟人类无人能够避免排泄这一节，那便桶长期不洗刷，那种异味实在难闻得可以，可我们究竟又是具有灵智的生命，我们改变不了排泄本身，却可以改变这排泄产生的影响。你们不洗，我来洗，维持这种不让人洗便桶的环境是极野蛮的，是不可理喻的。而这一节，直至关押结束终于不被上面批准。

四川资阳籍士兵「大哥」说得颇有道理，他说这便桶是应该洗的：「复杂在你提出要洗，凡你提出来性质就变了，上面就一定不会同意。」

3. 这种洗澡场景世界独一无二

武警接管前的洗澡则更是一种痴念，武警接管后，经北京有关当局批准，准许每二十一天即三周洗一次澡，只有在洗澡的时候才允许你洗衣服。实在令人难堪，尤其在夏天里，到了第十天以后，人身上的那种酸臭程度实在使人无奈，人整天湿浸在汗水中。那洗澡的阵势足令常人目瞪口呆，不亲身经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仿佛我的一举手一投足，须臾间可使这个政权灰飞烟灭。他们在二楼厕所旁装了个平时供士兵洗澡的热水器。我的洗澡必须上到二楼去洗。

每三周的一次洗澡仍不是到时间即可启动的程序，必须得到总监控室的警方值班人员批准。一经得到批准，洗一次澡可是个大动静，首先是用高频对讲器通知「目标洗澡所有人员就位」，然后囚室会被打开，必有一名领导进来，一个立正姿势，神情肃然地面向你宣告：「根据上级批准，本部今天奉命执行安排你洗澡的命令，请你依法配合（一个非法过程要你依法配合）。」然后转身下达「按预案执行」的命令。这时，会由两名士兵走过来一左一右搀扶着我出门。一出门，迅速又有四名士兵就位，两人在我前面倒退着走，两人跟在后面，四个人均伸手呈保护状。这时，我们组成了一个七人共体的移动阵势。而从我出门至洗澡点，楼道楼梯两旁，每隔两三名站立一名士兵，军官则肃立在楼上一名、楼下一名指挥着。我洗的过程中，一般有不低于六个人的士兵围着，其中两名士兵脱得只穿短裤、拖鞋站在我跟前呈欲扑状。整个洗澡过程中，一群士兵目不转睛地盯着你。洗澡结束，又是一声「目标洗澡完毕，所有人员就位」。一阵紧张的动静，又与出来时一样的阵势被送回囚室。

一次，一位姓顾的士官跟在我背后低声说：「也许你注定不平凡，这种洗澡场景世界独一无二。」

然而，他只看到了「独一无二」的一个局面。

4. 医生来不看耳朵

我耳朵经这次酷刑后一直听不大清楚，我原本以为过上半个月乃至一个月后会自然复原，但结果不如我所愿，时间带给我的是听力渐趋坏下去的现实。一度

时期，足有四个月里，一只耳朵干脆就什么也听不见。这颇使我不安，我一再请求有关方面本着人道之念给予治疗，但每次反映上去就全无声息。由于他们属两个不同的系统，所以武警部队担心我完全失去听力于他们不便，据士兵讲是屡屡向北京市公安当局交涉给检查治疗，在武警方面的多次催促下，北京市公安局不得已派了两人来到关押点与武警交涉。

据当日值班士兵讲，说其中就有一人是医生，说：「他们来到这里并不是要进来给你看耳朵，而是来给武警方面做解释工作的。他们好像很有经验，说一年之内听力会自己恢复的，然后就走了。」

5. 硬坐出前列腺疾病

另一次是，因长期不允许活动而硬坐着，加之卫生状况极差终于导致前列腺疾病，小便越来越困难，并伴有严重的疼痛。我从不轻易问诊食药，除非不得已，在那种环境则尤不愿吃他们给的药，但有一段时间是实在难受得可以，我要求给予治疗，却一直被公安当局冷酷地拒绝。然而，这次前列腺疾患却获得一个意想不到收获，就是武警部队担心，就这样坐下去终于有一天会导致尿不出来的后果，他们开始允许我在囚室内自主选择活动时间，活动范围也由原来的原地活动，改变为在两个哨兵站定的近二点五米左右的线段内活动。平常之人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但这对一个在那种环境中，以那种方式囚禁之人，那积极意义是很大的——当然不大可能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匹比，但这足使我高兴了好一阵子。我有一种绝不怀疑的信念，即只要允许我不受时间限制地活动身体，在一年之内，我完全可以依着信念及对应的活动疗治好前列腺。时间加努力褒奖了我的信念，不足一年，所有疾患完好，耳朵也完全恢复了原有能力，终于无忧矣。

二十四、独裁者以暴力维持人们的「相信」

我的这些文字记述没有事先的绸缪，没有大纲性架构设计。一方面，这都是我的切身经历；另一方面，我素喜自由，包括文字记述，素不喜受格式的局限。故从专业写作角度，尤其「文人」的挑剔功夫，可能会使一些读此记述者哀叹至扼腕。这正是我的不足。好在记述这些文字的本念系述说真相，而不在于文字功底及学养，而结构上的颠倒凌乱、错落终于难免。

在这些真相记述中，我将用以下部分文字纪念那些武警、官兵兄弟，纪念他

们承受着的压迫，纪念他们中的善良人性，也将纪念他们中的暗昧人生。

可以说，我对中共武警部队真实现状的目睹过程，多是在目瞪口呆中。实际上，稍微了解今日中国现状的人都清楚，共产党政权今天得以存继的唯一支撑力量就是暴力；而使得这种暴力得以实现的群体即是百分之百的军警及特务。表面看来，构成今日中共政权基础的是全体贪官恶吏和军警、特务；而实际情况是，贪官恶吏若失去了对暴力的恣意支配权，他们这种人是人类群体中最没有力量的人。构成一个个人体力量的最基本部分，是他健康的人格和美善的人性。失去了这两样东西，人，退异成了纯生物生命。

这个地球上，纯生物能力超人类者众多，但他们究竟与人的力量有霄壤之别，区别仅在于人多了人格、人性。人格、人性究竟是有力量的，你尽可看看今日中国，有着坏人格、坏人性的中共黑暗势力群体对一个国家、一个庞大民族乃至对全人类文明的戕害现状。可能有人不大会同意我的观点，认为专制政权的传统支柱还有「谎言」这一节，那是每个专制制度的初始力量构成生态。

谎言不能总起作用，而事实上，没有暴力做后盾，那些明显反常识的谎言真的会有人去信他吗？尤其在极权专制政权的末期，近全部的规律是，当权者说什么都不会被人真实地相信，他们就只剩下了以暴力维持人们的「相言」一途。当然相信的人还是有一些，以愚昧做基础。而其余绝大多数人的「相言」说白了就是一种伎或者说是术，藉以掩饰与怯弱有关的不名誉和不尊严，这也是人们常能看到极权专制暴政国内常有高支持率「民意」现象的原因。例如，2003年年初曾有两个「民意」数字引得世人讥诮：一个是伊拉克暴政灭亡前一个月的「民调」，其结果是人民对萨达姆的支持率百分之一百；一个是北京市民在「萨斯」过后的「民调」结果，对故意就「非典」问题撒谎的北京市政府的支持率为百分之九十以上。写到这里，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这究竟是一个民族的愚昧还是智慧？民的明白与官的虚假交相辉映？

二十五、「维稳办」设立的目的

在没有接触武警部队前，我多以为，既然武警成就了政权力量的全部，毫不夸张地说，军警在则政权在，军警一转身，什么人模狗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绝大多数会成为反人类罪犯而接受刑事追诉。因此，军警就是中国黑暗势力生命的全部保证，也就是俗称的「命根子」。想象中，中共黑恶势力对军队的宝爱是

无与伦比的，而现实却令人目瞪口呆。他们对军队的控制并非系我原来认识的给予利制的软力量，而是干干脆脆的硬力量，即暴力控制。尤其对士兵的控制，则全部依赖暴力。表面上看，是洗脑与暴力并举，但士兵都认为洗脑过程旨在完全控制你的时间，是部队「维稳」的一种常态化手段，即全部集中控制所有士兵的时间，釜底抽薪般地不给士兵有制造不稳定因素的时间，让士兵既无获取「不良信息」的时间，亦无「胡思乱想」消化各自不满的时间。

今天中共的武警部队，可以断定，他们把自身日常精力百分之九十花在「维稳」方面，诸位切不可以为这百分之九十的精力维持的是社会稳定，这个日常的「维稳」是维持武警部队自身的稳定。人心已全散了，而对人心这种柔软的对象，武警当局剩下的唯一聚拢手段就是硬暴力。

2003年，当美军地面部队突入巴格达，以摧枯拉朽势扫荡萨达姆政权时，中共军事评论「专家」惊异得目瞪口呆，为什么？专制动物不仅没有力量且个个都是鼠目。潘多拉先生在《北青报》的社评文章〈一切独裁者都是纸老虎〉入木三分，道明了一个不二的规律和旁观者的明白。武警军官今天日常的主要精力就是部队自身「维稳」。当我第一次听说部队上下都成立了「维稳办」时，我还是震怔不已。从总部机关到各支队，都有自己的「维稳办」。

士兵们在总体上，他们的智慧是不容小觑的，对于行迹于各处的「维稳」人员，士兵的统一称谓简单且切中要害——「阉狗」。士兵的头脑是清楚的，他们向我谈到说「阉狗」是非法的，都是各级首长的私器；说正常的约束原则、约束程序是管不住了，因为当官的太腐败，人心都彻底散了，他们只好用这种非法的手段。这是他们的普遍认识。

他们中的大学生士兵的认识颇出乎想象，我曾与江苏籍士兵陈杰（音）聊起了这一现象，他的话让我肃然起敬。

他说：「其实这是必然的结果，他们根本不把人当人，终于导致这种人人自危的结果，很正常，自食其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我和大学生士兵刘巍、郭通、赵治中，都谈到过这种现象，他们的观点都实际而有见地。其中，刘巍是颇有思想的，他们认为，部队开始对洗脑是抱以厚望的，当终于发现士兵干脆不信，或表示质疑，或消极抵抗成了普遍现实时，洗脑就纯粹变成了一种无赖的手段。就是用洗脑，没完没了的洗脑，占去士兵所有的时间，这过程本身就有意义——士兵没有了制造麻烦的时间，表面上就稳定了。他们认识到这「维稳办」与部队组织建制以及职能完全没有关系，纯粹是私人控

制部队局面的工具。他们有些认识的见地更令人钦佩，他们认为，所有「维稳办」的设立目的都是各级领导为了保官，而非考虑到为了部队整体的稳定，说「维稳办」恰是今天部队日趋不稳定的最大祸首。

正如江苏籍士官顾班长（名不详）所言，他说今天的部队，「阉狗」到了哪里，不稳定就定会出现在那里。说他们常像鬼一样地昼伏夜出，搞得人心惶惶。我记得有一次他在谈到这一现象时抬头看着房顶，几近一字一顿地说：

「今天的武警部队，不出大事是偶然的，出大事才是必然的，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官兵关系是水火不容，当官的根本不把士兵当人。」

二十六、部队里的「维稳」现象

郭某是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毕业（自考）。我和他的沟通是最多的，尽管那里说话必须「咬牙切齿」。小伙子个人命运悖逆不顺，家境颇特殊，但人很勤奋，有毅力，颇有见识。他与我谈部队「维稳」现象时，已服役一年半的时间，他说部队今天的现状大大出乎他的想象。

1. 学习班上的笔记得上缴

郭某说他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竟然在部队每日组织的学习班上，抄满了四十三本笔记本，说回过头来看令人惊讶不已。他说有三点必须澄清：一是学习教育是强制的，谁要流露出不满必然挨练（指挨打）；二是那些学习教育的内容对正常人类没有一点用处；三是当两年义务兵人人要抄写几十本，而绝非就他一个人抄写那么多。

我故意问他，既然抄写的都是无用的东西，那么为什么还要经年累月白费这些劲呢？他说意义就在于这个过程，他们要占去士兵的所有时间，不能给你留下单独思考的时间，实际上是把士兵集中起来控制的一种手段，让你没有时间给他们惹麻烦。

郭某又说，他们当兵期间，购买笔记本成了最大的开销，而且每抄满一本即得上缴，说是怕泄漏国家机密。他说这实际上是怕泄漏丑闻，怕这些垃圾内容流露到社会上让别人取笑。除了没完没了的爱党爱国教育外，学习内容都是支队长以上官员的讲话记录，他说整日抄得士兵苦不堪言。

2. 「阉狗」被基层官兵殴打事件

十七支队有两个最著名的「阉狗」，一名叫严立谋，一叫李兵（都是音），我在那里见识了他们与基层官兵之间独特的游戏，而我的见识则多源于听，但还是偶然得了面见严立谋先生的「光荣」。

据士兵讲，「阉狗」是从不进监禁室的，士兵说他们每次扑来，多摆出一副力可拔山的强势姿态，其实那正是他们心理不安的表现。因「阉狗」被基层官兵殴打的事件时有发生，结果多不了了之。他们大队的副教导员就追打过「阉狗」，这事件还颇著名。

前面说的那位顾班长，就曾在一次李兵动手要搜他身上有无违禁物时，一把攥住对方的腕部，严正警告对方行为违法，若搜不出违禁品就当面赔礼道歉，而对方竟罢手。

记得，颜立谋先生一次突然间闯入关押点，对关押点搜查得人怨狗叫后，大概严先生那天是强大得不耐烦，竟闯入监禁室来「维稳」。我已久闻他的大名，绝非情绪化的认识，严先生脸上武警军官共有的苦相极仿佛，一双人群中概率不高的鼠目，与我的目光碰触时，眉目中的表情瞬间变得极复杂，迅速低眉下视，他好似意识到了什么，进来站了不到一秒钟即迅速掉头他往。

关于「维稳」人员，士兵们认为他们是武警部队中最不受官兵欢迎的角色，却是领导欣赏（内心则未必）的红人。士兵称他们为「阉狗」自有其道理，大致上是人格特征不甚明显。其实，他们本身是「中国特色」人格化及具体化的鲜例，也是像「中国特色」一样不名誉的例证。他们既是「中国特色」的衍生品，又是「中国特色」的牺牲品。

由于有了中共纪委这样一个法外施刑的「中国特色」体系，而这法外施刑的主要工具就是武警部队。因而，有时一个支队被党的纪委调遣配合「执法」的网点遍布在北京各山区的著名旅游景点（中纪委所有的「办案」点都在旅游景区租赁整座宾馆用），可怜那「阉狗」就整天奔突在各点之间。有压迫就会有反抗，这是物理和人性的共同点。

3. 突击检查禁止士兵用手机

在我的那个关押点，有一个专门的哨叫「自卫哨」（据士兵讲各点均如此），那楼的隔音性能颇差，不论白天黑夜，往往一声惊呼爆起：「检查组来了！」整栋

楼会轰的一声在这种实至的、足令人惊心动魄音响裹覆里度过绝对不超过一分钟的时间，然后戛然进入一种死寂。那种环境里人的心性功能必须好，否则，足可致人骤殁。开始一个月里我非常地不习惯，那氛围，直似一大群静卧饭台的羊群里骤间突入一只狮子，而群起的一霎间轰响。而这种情形又大都在深夜里，有时那爆起的哨兵声让人心悸，有时干脆就炸出一声：「阉狗」来了。

其实，他们闹这么大的动静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阻挠士兵用手机，而禁绝士兵用手机表面理由或者是冠冕堂皇的目的，是说为了国家安全，其实这种理由就连「阉狗」也未必真信。中国有数亿部手机不构成对国家的威胁，偏偏多出数百部手机在士兵手里即国将不国，竟能撼动国家安全，实在不大使人信服。在今天，手机已成了人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共的「维稳」官员及其鹰犬，他们常不知倦怠地与人类生活的常情常理作战，终于只能是笑柄，对军人手机的禁绝之举就是一个莫大的笑柄，而这莫大的笑柄不仅止于这个荒诞过程，还包括他的戏剧性结果。

每个士兵竟至少有两部手机。人均两部手机成了常态化保有，一部没收即会迅速补给，以保证使用的不间断。藏手机、谨防突查手机等，成了士兵私底下的主要话题。本来是一个人类阶段性的文明成绩，竟成了军队控制者的苦恼，何以成了这些秉兵柄者的苦恼？做贼者心虚使然。一是担心士兵看到「负面」信息；另一个主要方面是，中共今天仍在背对着人民的作恶，绝大多数都是由武警士兵来实施的，武警不过是穿上了军服的普通人，担心他们泄密而引起民众的不满。中共各级纪委的每个「办案点」都是绝对对外保密的，而负责看管的则全是这些士兵，而士兵感到不平的是，干部可以拥有手机，有后台的士兵有手机者也不在少数。

我曾和一些大学生士兵探讨过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其中一位的说法很令人刮目相看。他说，今天部队的不稳定因素硬是那些当官的给制造出来的。他说，他感到大为不解的是，好端端的环境，却专门有一群人负责寻找不稳定因素，功夫不枉有心人，你苦思冥想要找不稳定因素，所以你得到的都是不稳定因素。他说，最为不解的是他们将原本很正常的东西视作不正常，终于正常的东西也成为不稳定因素。最主要的是，他们把士兵中可能有敢讲真话者、有些正义感情的人视为不稳定因素。

二十七、新兵「指鹿为马」训练

武警刚开始接管看押任务没几天，安家（音）讲了他在新兵时一个经历没太引起我的注意，后来许多士兵都讲到了这同样的经历，如田羊羊、李俊良、金野人、刘巍等等。对于这种现代版的「指鹿为马」，我没有震惊却有着颇长时间的哀伤。从太监赵高迄今两千多年过去了，在精神、道德及人性领域，这民族连原地踏步的能力都终于没能保住。他们遇到的经历如出一辙。

以安家为例，新兵到的第一天晚上是要开班会的，这是中共军队的历史老例。班会一开始，介绍完姓名后的第一个项目，把他们都给搞懵了。

班长指着班里亮白的墙壁挨着个问新兵：「这墙是什么颜色？」

答为「白色」者，立即遭致惊心动魄的暴打，连续有五名被提问的新兵遭到暴打。

当问到第六名新兵时，他回答说：「班长说他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这名士兵立即被班长表扬。

班长又开始重新提问挨打了的士兵：「这墙是什么颜色？」

全班十名士兵一律地答：「班长说他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

十双拳头在一双拳头的面前全然萎倒，所有人都不再承认自己的眼睛看到的颜色。

我与刘巍、郭通等谈到过这一现象，刘巍说他会不假思索地跟群顺着班长说。他说你若不愿颠倒黑白，对你的殴打、欺辱是没完没了的。他们新兵班人人挨过打，唯独他没有挨打，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比哈巴狗都乖顺，伺候他比仆人都殷勤，还一条一条好烟给他送，他就没有打我。」

他对着我说的这些话，我的内心对他没有生出一点厌恶之情。他很善良，亦能助人，那种一边倒的恐惧场合，他的做法是不当被指责的。他的分析颇客观冷峻，他说这种行为并非是有组织的统一安排，但他却是一种禁绝说真话环境的产物。他说现在部队这种现象很普遍，多是一些头脑简单的班长的一种肤浅效仿。可以肯定这不是有组织的安排结果，但这种做法却不为部队当局所禁止。士兵就这些问题向有关当局申告的话，必然得不到正常的回应。这是军队内消灭真话、消灭正常感情的一个具体组成，一个派生方法耳，只不过有关当局实现目的的途径究竟要「文明」得多。

二十八、说真话？你出去准备挨练吧

几乎每个新兵都提到过，新兵刚到部队会有一次统一的考试，开始时谁也不知道这个考试的目的，直待考完了，一批新兵被退回原籍后，经过交流才发现，被汰退回乡的新兵，都是在答试卷时选择了说真话、有正义感情倾向者。那些被退回去的新兵被退得一头雾水。公开的原因是他们有心理疾患或有激进倾向，实际上，当上一年兵的人都心知肚明，这种考试的直接目的就是淘汰那些有说真话倾向及可能存在有正义感情倾向的人。即便侥幸没有被淘汰回去的，如果在那样的环境里你没有学会足够的狡猾，有时一失足说上一次真话，那绝对不是个等闲小事，会在整个部队上下折腾成一个极著名的「丑闻」。直像这偶尔失足说了一次真话者原系本·拉登的助手，而终于被暴露似的。

湖北兵成成，身高一米八四，所谓「虎背熊腰」，人很善良，也很单纯，但到了部队，这些优点屡屡为他带来祸事。最著名的一次祸事就发在我的那个关押点上。一次，师里突然来人组织了一次考试，考试前一位干事慷慨激昂，告诉士兵，这一次必须讲真话，讲了真话不用怕，师里会坚决地保护讲了真话的人。但终于上当讲了真话的人也就成成一人。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现场判卷的结果是，那动员答卷时必须讲真话的干事的又一番陈词：

「哪位是夏智成？」他问。

傻成成「呼」地站立而应答。

「好，有种小伙子，终于发现了一个。」

那干事说完把成成的试卷的答题部分还念了一遍。结果，考试一结束，成成轮到了上哨，他进了监禁室，美滋滋地等待着领导表扬他。不料，祸事骤至，大约半个小时后有人进来替换他，一进来就一脸紧张表情，悄悄说：

「你出去准备挨练吧（指挨打），现在全点的人蹲在地上挨练呢。」

成成一脸不服，嘟哝着一边说「我又没犯错误」，一边走出监禁室。不出半个小时，成成又进来站哨，他眼睛里的那种恐惧让我终身难忘。

然而，那种极度恐惧的眼神在那段时期是屡屡看见，光在站哨期间被拖出去暴打后返回监室的有李俊良、姚家俊、田羊羊、成成等，都是带着这种眼神回来的。但也有拖出去打完了回来后全无特别表情的，如金野人、张天亚、刘飞、曾令龙等。一般挨完打进来后，我从不主动问他们什么，但我的内心无限地哀伤。他们还都是些孩子，真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我大都会用动情的眼神

看着他们，他们大都抬头盯着房顶，眼泪无声地流着，我的心里无比地哀伤，而又无能为力。

过了一会儿，成成仍盯着房顶却在对我说话：「老头儿，我每天都在幻想突然得一种病，就像脑瘫病人一样昏迷过去，等到该复原的那天就醒过来，醒来了刮个胡子，理个发，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

这话说得实在令人哀伤不堪，这个不切合实际的愿望，他在我跟前讲了不少于十次了。绝不是一种巧合，李俊良、卢坤等多个士兵，曾在站哨自言自语过这种进入无感情状态的期望。

等成成稍微平静下来，我就悄悄问他，又挨打了吗？他说，他一出去就被班长周小赛拉到一间空房子给打了一顿。但事情没有因着成成已挨了打而结束，这件事引起的祸事才刚刚开始。

中午换哨的人一来就说：「中午的饭都别想吃，全点从今天开始整顿，我们蹲了一上午都站不起来了，你出去再挨练去吧。」成成一脸不安地走了出去。

二十九、砍不了头就得说话

可能有人会疑问，为什么一个人讲了真话而全点的人跟着倒霉？今天的中共部队有一种很邪恶的责罚机制，叫「一人得病全体吃药」，他实际上是极权专制中国独有的一种古老连坐制度。一人得咎，罚及旁人。一个人犯了「错误」，一个班乃至一个排的士兵全部接受处罚。用士兵的话讲，这就是逼着让所有的人都恨那「犯错误」的人，逼着让人入监视别人并实时告密。这项罚责原则在今天的部队里是公开施行的。不过，成成这次「犯错误」的后果大得超出了他的想象，不仅全点被罚，还下蹲半天、中午饭不能吃，而且迅速作为严重事故上报大队、支队，最后全师做了通报。这种赤裸裸的野蛮及恐怖，让这一群坏小子常常防不胜防。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李俊良与主哨张天亚在监禁室说话，被公安方面监听值班人员通报了武警部队，拉出去一顿暴打后，李俊良眼里的那种恐惧久久不能褪去。我基本不忍心去看他的眼神，几十分钟后，我看见他仍出神地瞪着天花板，眼睛一动不动，两股泪水亮亮闪闪往下流着。然而，他的主哨士兵张天亚站在一旁却面无表情。

我问张天亚，为什么每次被拉出去打了后却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结果他说：「他（指李俊良）到明年挨了打后也不会再哭了，习惯了就好啦。」

为了在监禁室说话而挨打的事从未中辍过，可监禁室里的士兵讲话之事也从未中辍过：姚家俊被打后一回来就又讲话，七年的士官邓班长拉出去被副指导员扼住咽喉顶到墙上教训了一顿，可一进来就又开始讲话；金野人这小子因为在里面讲话挨不少打，就连排长和他一班哨的过程也照讲不误。有关当局对于士兵在监禁室讲话是若临大敌，但解决之道却只有殴打一途，把解数使尽，终于无法禁绝。

田羊羊的挨打，就是被从百公里外赶来偷听的支队政委抓了个现行犯的。

记得，那天田羊羊一进来就说：「老头，我怎么右眼跳个不停？」

我说：「你小子今天在里面绝对不要讲话。」

他说宁愿挨打也要说。结果，不到二十分钟就被拉出去暴打一顿。

刘巍有一次说到这一现象时，竟对着监听器大声说：

「说话的事，你们百分之百地堵不住，除非把人的头砍了，砍不了头就得说话。」

我曾经跟士兵开玩笑说，在监禁室讲话的压迫上，士兵算是来了一次集体的起义。当局冷酷的恐怖手段在这一问题上彻底地失败的，像讲话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一样，凶残的打压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三十、洗脑教育失败的例证

我常在想，当局对于一种恶手段的效果难道就从不做评估吗？恶的手段本身成了目的，这是怎样的一种愚昧和反常？这是当局反人性政策无效的一个鲜活例证。另一个失败的愚昧政策是强制洗脑教育。实际从施行手段上看，至少，在具体实施洗脑教育的基层官员心里心知肚明，这种政策已完全失效。但这是上面给的硬任务，洗脑教育必须继续，而士兵的消极抵制不断，这种政权的最后手段也就会适时应势登场，即暴力手法，用士兵的话说「就干脆耍开流氓」了。既然不再产生有效的后果，手段成了唯一的目的，把士兵的每一点闲余时间都用在「学习教育」上一——我完全控制着你的身体及思想的时间，以这种最原始的控制来实现「稳定」。

对于这种干脆以暴力来维持的「学习教育」，绝大多数士兵苦不堪言。这帮小子几近全部都是在家里不大爱看书学习的主儿，每天要抄写大量的领导讲话语录，稍重要的人物讲话还得背下来，实在令他们头痛不已。有不少士兵说过，说从表

面看，中国士兵是全世界最注重学习的群体，全人类没有任何一个学校、任何群体能像他们一样，如此没完没了地学习。但作为一个特殊的旁观者，我可以肯定这种教育的效果是怎样地与设计者的愿望背道而驰，许多具体的例证完全可以支持我的这种肯定。

最有趣的是，连续两年的新兵分下来到了看押点，与我熟了以后都会好奇地问我同一个问题，有涉「六四」事件的真相问题。我无一例外地会反问他们为什么会对这一问题感兴趣，他们的回答有以下几个共同处：一是说特别好奇，因为当兵来之前从未听说过「六四」事件；二是当兵后在部队的学习教育中知道了有这个事件；三是不相信政府说学生杀死大批武警官兵的事是真话。他们都谈到一个教育中播放的光盘，说光盘中当年的「反暴英雄」，后来因为平暴功勋卓著而终于成了北京武警总队长的声泪俱下的控诉。这位「英雄」说他亲身经历了学生对武警官兵的大屠杀，说他带着进去的一万多名官兵，出来时仅有八百人「幸免于难」，说那种对官兵的仇恨和屠杀的惨绝人寰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

安家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他一直在想：「没有说有学生死亡？」他说一群训练有素的军人还死了那么多，那学生死得应该更多。

安家的副哨说：「不管学生死了多少，也应该让我们知道呀。」

凡与我谈到这一问题的士兵中，对当局教育不信的居多，他们最多的一句话是：

「如果信了那是真的，还问你干嘛？」

他们中的一些人上网技术较好的小方等，都是通过教育而知道了「六四」事件，而后从网上获得屠城真相。

「贼喊捉贼是共产党的传统强项。」一些终于知道真相的士兵说。

最能说明这种洗脑教育失败的例证，莫过于在老兵即将复员阶段，竟有很多老兵在最后的几天问我「六四」事件真相，大部分名字我今天都想不起来了，只能确记的有刘飞、「艺术家」（兵名不详）、高耀辉、「耗子」等。这些都是经过几年洗脑教育的士兵或士官，临复员回家了却秘密地探问这些问题，这对洗脑教育功效是个莫大的讽刺。

他们当中又有一个叫「大脸猫」的士兵，我问他为什么不相信教育光盘说是真相，他说他很小的时候爷爷就给他讲：「凡是共产党的事你都反着听，反着看。」有时候，当官的还在台上慷慨激昂，一些莽撞的士兵就在台下提出了疑问。

三十一、「眼镜」先生专制情结极浓

我在部队的囚禁生涯最后八个月里，看押点上主要领导频频被换，可「眼镜」（是士兵送他的外号）一直是具体负责的排长。这家伙专制情结极浓，他给我添了不少苦楚，他对我、对士兵的管束上颇青睐高压和管制，他是唯一在部队关押中克扣我的饮用水，并迫使我激烈反抗的军官。但我并不认为那是他的坏人性使然：一方面，武警军官普遍压力大，几乎所有的军官与实际年龄极不相符的苍老相就是一个证据；另一方面，「眼镜」急欲做出成绩的心情急迫；而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人年轻，躁急却不知自持，终于导致了一个失败去拥抱他。实际上，真正富有坏人性的是他的前任负责人，他的那种阴狠才是实在的，但他从不与我正面冲突，见面总是笑嘻嘻的。

当得知「眼镜」先生在看管我十个月后，在中共公安方面的力荐下，武警北京总队为他记了二等功的消息时，告知我这一信息的士兵说：

「他那是踩着你和我们士兵的痛苦去上庆功大会的。」

「眼镜」先生在一次例行的形势教育中，给士兵讲述他们对我的关押看管任务是如何神圣、如何地光荣且正当，不料士兵中有人举手向他提问，说：

「如果一个人有罪，正常的情形是应当把他审判后关在监狱，这种关人方式太不正常。」

然后又问他：「既然你说这种任务如此地神圣光荣、正当，可为什么把保密看得跟命一样重要，谁要泄漏出去说这个人关在这里的信息，就本人判刑，全家遭殃，世上哪有怕人知道神圣和光荣的事？」

有两个士兵在不同时间里给我讲述了这个过程。他们说这个士兵的提问，让「眼镜」愣了有半分钟张嘴不说话。但「眼镜」对这件事的最终应对使我觉得：一是他不是个恶人，至少那时他还没有成了恶人，要是他的前任遭到这种提问，不仅那提问的士兵，便是其他人也遭了大殃了；二是他是个明白人，明白在他的内心；三是他是个有限的诚实人。

他是如此回答士兵的：「其一，你不该问这个问题，要是别人在这里主持学习，你问这种问题就很危险；其二，为什么必须拚死保密的问题，本来也是不当回答你的，因为像这样的勤务只有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才会有，人家正常的国家里不会有这种勤务，所以必须保密。」

听了这个过程后我颇感慨。至少，在他的不愚昧及有限的诚实方面是有理由

予他些尊重的。但他也有不大能令人原谅的方面，他把大不符合、甚至是完全悖弃良心的事，为了自己仕途升迁而当成一种技术活去做。一定程度上，比那些愚昧而行恶的人更不可原谅。你要违背他的意志，他应对的手法竟不计底线。他的个性有些棱角，至少在比他更弱者面前是如此，但他却不容允许被他管束者的个性也有着棱角。

他觉得我孤傲不敬也纯系他想当然，至少，我断乎学不会躬身媚笑。他当面对我数次警告我的「态度错了位」，忘了自己的处境，忘了谁主谁次的问题。这是我觉得他不大明智的一面，这原本不当是个问题，但他却跟我的态度办理起不依不饶的交涉，并据此停供了我的饮用水，终导致了那次被武警部队列为事故的冲突。

他当面斥责我说：「我将以一切手段对付你，让你明白了你的身分。」

我也被激怒，我告诉他：「你的门面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就对手而言，你们武警部队的门面也还小了一点。所以，我希望你能冷静，我头上没有帽子，没有人能处理得了我，而你却不同。」

当然，后来回想起来，我是情绪化了些，但他停我的饮用水是越过了底线的。

三十二、高人劝止武斗实施方案

「眼镜」先生另一个著名的失败，是跟士兵的关系方面。

中共部队每一年规律性地有一个最严峻的「维稳」阶段，那就是一年一度的老兵退伍阶段。这种显著的严峻可谓历史悠久，至少在三十年前我当兵的那个年代即是很突出的存在。那时，每到老兵退伍前的三个月内，营连军官会明显地很内敛，与老兵之间客气有加，一般事上能退避即退避。今天，武警部队老兵退伍前的「维稳」形式更加地严峻且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我的部队囚禁生涯经历了两个年度老兵退伍过程，连我都不自觉地绷紧了精神，担心那些与我朝夕相处了不短时间的年轻人会莽撞行事。这绝非空穴来风，就有河南籍士兵和安徽籍士兵半夜站哨时绸缪过如何施以报复之举的事宜。今天这种官兵紧张关系与我当兵时期的情形发生质的区别，那个时期兵官之间是一种愤怨，而今天则干脆是一种仇恨，这是十分令人哀伤的一种变化，但他究竟是一个实在的现实。安家、刘飞、姬班长、方成等，几乎有一半左右的士兵当着我的面说过他们恨当官的。

一个至少是我那个关押点的规律是，每年到9月底左右，老兵就不再参加正常的操练，而六中队2011年则是提前两个月左右，老兵连教育学习也不再参加，除了站哨，老兵什么事都不再做。

我于刘飞及「艺术家」的站哨时间问他们情由，他们几乎是同声说：「双方结怨太深。」

「那为什么还都继续站哨呢？」我问他们。

「点上人手是定死的，我们要都不站哨了，其他士兵就更苦了。」刘飞如是说法颇使我感动。

每一年的这段期间，基层军官用刘飞的话是「又狡猾又能忍耐」，而一些老兵与新兵的关系也常一触即发。我倒没有向当局邀功的图念，但被我劝止的武斗实施方案至少有五次以上，好在这些莽撞小子还听我的。他们给我起绰号「高人」（但六中队士兵都称我「老头」），一些坏小子筹谋报复打人的方案会一脸虔诚地向我述说一遍。

每当这时，他们都会说：「高人，有个事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我每必告诉他们：「向我征询的意见一定是最有利于你们的。」

张浩一人在两月内至少激活了两次报复打人预案，打的对象即是一米九六的「长颈鹿」，而且每次都是联络好了人数，决心要「废掉他」。不过，都被我苦苦劝止了。这「长颈鹿」是我送张龙飞的绰号，这小子身高近两米，在士兵眼里是个绝色的坏主儿，心狠手辣，是个四年士官，动辄将士兵拉至一个空房间里暴打一顿。一个月不到的时间，曾有数名士兵被他多次殴打得鼻青脸肿，其中严重的如刘飞和库库（名不详）。刘飞被打成「熊猫眼」；库库被打得最惨，进来站哨时头上都流着血水，渐渐地意识出现模糊，硬被我说服按门铃出去到医院检查，一千多元的医疗费全由「眼镜」排长掏了腰包。这是因为：一则，张龙飞兵龄比「眼镜」长；二则，「眼镜」在关押点主政期间，张龙飞的拳头成了关押点秩序的唯一保证。

「眼镜」和「长颈鹿」二人始终对我充满了莫名其妙的仇恨，他们压根想不到数次针对他们俩的暴力行动计划都被我止遏住。「大哥」、方成、刘飞（他后来终于还是实施了，他差点一个扼喉要了「长颈鹿」的命）、张浩、「草苗」（名不详）、「库库」等都具体拟定实施报复计划，有些计划准备一举灭其性命，还有如库库拟一举断其一腿，都是在向我征询意见时被阻遏。他们都是些不到二十岁还不深谙世事的孩子，这种莽撞的选择对他们阶段性的人生而言都是致命的。

「眼镜」和「长颈鹿」，用简单的感观判断的确是很坏，但他们俩同样都是二十四岁左右的年轻人，更何况我不认为他们是很坏，「眼镜」只是升迁欲望不能自持，而产生了超常的躁急脾气，加之人亦年轻；而「长颈鹿」的坏则囿于他先天性的智商缺陷，他的悲剧正是他整日亢奋的理由，实际上军官利用了他的头脑简单，他自以为自己的每一拳都是爱国举动，都是神圣的「维稳」大举。

我曾在一次洗澡过程中与「长颈鹿」沟通过「爱国」这个话题（**因为那里无窃听器**），但很失败，既是我的，亦是他的，但终于还是他的。不可理喻。他很兴奋，认为他正在「为祖国和人民奋力奉献」。我问他：你应该去爱你身边的一个个具体的士兵还是那空泛缥缈的「祖国和人民」？他说当然要去爱「祖国和人民」。很多方面，我们之间已不再是什么分歧、不同，大家恍若隔世。这不仅仅是军队经年累月「学习教育」的毁灭性失败，更是中国学校教育及社会育人正常功能的失败，但这确是黑暗政治的成功，是他们的最大成绩。

三十三、人性无以逆转的肌理病坏

我在那些士兵面前都说过，这小小囚禁室却是一个人性的大看台，他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及中国人人性的一个截切面。然而，你在这个截切面上能看到的则都是些明显的病坏肌理，人类共有且必有的正常肌理，在中国已呈现极难逆转性的病坏。这种病坏的肌理常使人绝望，因为早已不是什么讳病忌医，而是将明显的朽坏肌理当作是健康的最佳状态。

中国的青年已堕落至一种迷幻状态。有一段时间，他们中的许多人既亢奋又焦急：亢奋的因是邻人日本发生了大地震，他们为邻人的苦难而亢奋得夜不能寐；而另一个使他们亢奋的因由是，在极短时间内，已有八百多万「爱国人士」上网发帖庆贺邻人的灾难；至于令他们焦虑的因由，则是「网上爆挤」而耽误了他们上网表达「爱国」的激情。

我终于得了有幸与当代中国的爱国骁将面对面的「光荣」，但收获的也终于是些令人哀伤不已的痛。这种爱国的悲哀不特止于爱的方式或状态，更悲哀的是这种方式或状态被唯一真理化。他意味着这种败坏人类声誉的爱国激情仍将一路地激荡下去，既不允许置疑，更不允许有别的不同形式。

有一次，「草苗」上了哨后兴奋地给我讲述了日本地震之后全国人民是如何地爱国热情大炽，爱国大阵是如何地蔚为大观，以及他个人对日本地震灾难是如何

大喜不止。说完后，看我一言不发，竟歪着头问我对日本地震有什么看法、怎么看待全国人民的爱国激情。我本不想说什么，因为我在「爱国者」面前已碰过几次壁的。无奈，在他一直追问下，我说对日本地震灾难我也很痛苦，我们应当对这场地震中逝去的生命予以哀悼，对灾难中的日本人民应当予以同情和力所能及的帮助。我看到他的脸已变得渐渐地阴沉起来，但我还是性情既起而滔滔不绝。我说这种爱国心是最直接的祸国害己之举，他置全民族于极不名誉的境地，他反映了当代中国爱国者大阵中普遍的人性、道德和人伦常识已臻至毁灭性败坏境地，以反人性为荣，以反道义为荣，以无耻为荣，以无知为荣……

「不许你讲我国的坏话，不许你讲我国的坏话！」

「草苗」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我的话骤停，我盯着他的眼睛。

「不许你讲我国的坏话，就不许，就不许！」

他边说边还很别致地像小囡囡据理不饶人似地摇了几下头，我禁不住微微一笑。

「你笑什么？我们领导说你们这种人不爱国，一点都不假，以后就不许你说我国人民的坏话。」他的头又左右摇了几下。

我终于不能再说什么，他那一脸阶级仇、民族恨是实在的。中国的「爱国者」终于已不是可以理性沟通的对象。实际上，这话题是他自己引起来的，而且其时距日本地震发生已有近一年的时间。

三十四、「我党」、「我军」形象的计较

关于日本地震，我碰着唯一一位不同意幸灾乐祸的士兵是北京籍士官郑军（音），他是唯一能就此问题与我理性探讨的士兵。他说，他注意到中国「五一二」大地震时，有两个令他意想不到的现象：一是没有一个日本人在网上幸灾乐祸；另一个是，日本救援队每挖出一具遇难者遗体，全体队员都会肃立默哀。他说为此很感动。我说那本应当是人类共有的高贵、对生命敬畏的高贵及对他人灾难感同身受的高贵。我认为，对日本地震灾难的欢欣是我们民族声誉的大损失，是一种令人目瞪口呆的毁坠；他同意了我的结论。我问他为什么会有不同于他人的认识，原来他的未婚妻在日本留学，他是从他未婚妻那里了解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民。

然而，在如何爱国的问题上，郑军则又骤间没人了那天下共一面孔的爱国大

阵中。他说，他当然算是很爱国阵营中的。我要他具体举出使自己难忘的爱国之举，他说他每听到「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你比我的生命更重要」的歌曲都泪流满面，这当然算是很爱国啦。我告诉他，你这种爱国行为绝不比你给路边叫花子几角钱更具有意义。

我和他们中的不少人探讨过这个问题，足使人痛心的是，他们清一色不认同爱路边的小草、爱野地的动植物生命、爱身边的每一个人、给每一个具体的需要帮助的人予以援手与爱国的联系，一谈爱国则崇高的大话、空洞的宣言而终于没有一点实际用处。我常在想，部队每天几近没完没了地进行着教育，学习的内容却几乎不与正常人类发生关系。郭通曾说过，说他们学习教育的东西，都是一个人一生都用不上的东西。

能不能在这种学习安排中腾挪出一些时间，学习一些人类群体生活中必须用到的东西？例如，士兵们普遍地不大懂得一个人应有的基本礼貌，待人接物、一般人际交往中应当注意的常识都几乎是普遍性地缺失，尤其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互助、互爱几近全无。他们给你送饭时，大拇指赫然浸泡在饭菜里，对着饭咳嗽、打喷嚏，对着人咳嗽、打喷嚏，在入睡觉时不停地讲话。部队当局应该给他们一个基本的告知，这种现象几年里颇使人头痛。睡觉倒是可以依着意志排除声扰，可那对着饭菜或者人打喷嚏、咳嗽的事，开始一段时间确实给我添了些苦楚。后来，也只能是每遇这般情形，就立即告诉自己：这就是你在这个阶段的、必须的生活条件，如果你去计较即是极不明智的自寻烦恼。

他们对「我军形象」的计较到了令人不解的境地，有些维护手法是违反人类基本常识，甚至是直接反人类声誉的，有些僵化的坚持根本就是反人道的。他们忘了一个基本常识，或者一个基本联系关系，即一个人的内质对外在形象的涵养。将所有的冲动和精力全用在形式的捌飭上，从根本上不再认可人的形象与内质涵养的联系。为了在我这个「敌对势力」面前展示人民武警的良好形象，他们要求哨兵在我面前除了记录文字工作外，必须做到笔直腰板纹丝不动，连眼睛都不能眨一下，稍有不测立即拉出去暴打一顿，这种以极其野蛮的手段来维持「文明形象」的做法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由于一些新来的士兵迷信了这种站姿与「我党」、「我军」良好形象的「神圣」关系，几个月下来身体健康被摧毁者实在不在少数，有的新兵几个小时不眨眼，泪水一直往下流；甚至竟屡屡出现新兵阴茎静脉曲张的病变，其中萧少阳等士兵终于不得不手术治疗。几年下来，腿部静脉曲张者十有六七，而腰肌劳损者十之八九。

六中队有个身高一米九几的大个子，小伙子很帅气，新兵一下连在我的点上站了一个多月后调到了其他点上，六个月后又调回来做监控，而这做监控是须有资历的，大致上是一群士兵中军龄最长者为之。有一次，哨兵拉肚子，他进来临时顶替。一见是他，我便问他一向可好。他眼泪一下流得像瀑布，说他的腰已经废了，现在已不能站哨了。然后是我们双方的无语。像「耗子」、田羊羊等腰肌损坏不能站哨的士兵亦不在少数。他们说全军最惨的是「天下第一哨」的士兵（指天安门广场的哨兵）。可能有些夸张，说几年站下来都不能生育了，说给西方国家使领馆站哨的士兵，冬天再寒冷也不允许穿棉衣，以向他们证明中国国家的良好形象。

三十五、公民法治概念阙如

他们的教育中，从不把公民概念、公民的权利，以及一个公民对国家及社会、对他人应有的责任列入内容。我与那里几乎所有进来站哨的大学生聊过有关公民权利以及纳税人的话题，这个话题我同样与包括沙雅监狱警官在内的许多警官聊及，得到的结果直可用「绝望」来形容。这是怎样的一种荒诞现状？作为国家、社会及家庭未来的年轻一代，他们几乎清一色地成了平面人，几近全然没有了现代社会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知识。你直可想象我们拥有怎样规模的愚昧而全然不知，这是怎样的沉重现实！

关于纳税人，我问的第一个士兵是卢坤，他脱口而答：「我们不可能是纳税人吧？」

而其他数字大学生中，也没有一个人能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纳税人身分。我在沙雅监狱就同样的问题在不同时间问过六名警察大学生，无一例外地不认为自己是纳税人。只有一名胖子看着我的眼睛犹豫间来了一句：

「应该不是吧？我觉得我还没有这种资格。」

最令人惊悚不已的是，在他们六人中间，有四个人对我问及的「你是公民吗？」的问题不能肯定地回答，其中有两位则说：

「我们是国家公务员，怎么可能是公民呢？」

从洗脑者的角度评价，这是他们的成功，这是大成功，无论从幅面还是深度。但历史很快将会证明这正是他们终于拓通死途的原因，因为这对于一个社会

的发展趋向而言，他终于必将使一个社会所有的文明发展功能、活力迅速而普遍地坏死。当一个社会终于只剩下专制权力这一个生命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社会置死地而后生的大转变终将来矣，因为究竟还有着不愿相率死去的一部分人。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留意过，这个世界上的税课形式有两种：即秘密税课过程和公开的税课过程，规范的一点说法叫价内税（**秘密课税**）和价外税（**公开课税**）。两种课税形式实则是文明政治与野蛮政治的甄别标准。凡制度文明国家实行的都是价外税，即每一样商品都标明商品本身价值和应纳税金，即任何消费行为必然引起应税行为事实的发生，使每个人在消费过程都清楚自己又向国家纳了一次税及纳税数量。这不仅使人意识到纳税人的自豪感，更使人产生一种对税收支配监督的自觉。国家税收额里有「我的钱」，既有「我的钱」，我就当然有权利监督你怎么花这些钱。这正是制度文明政府会在费用支出上小心谨慎且精打细算的原因所在。政府必须在乎纳税人的脸色及敬畏纳税人的智慧。

经年累月里，对于专门报导「我们很好，国外很乱」的中共电视里，你可曾听到说西方民主国家出现过贪官？而另一个几近绝对的规律是，在所有极权专制国家里，全部采用价内税课的形式，你消费的每一样商品价格里都含有税金，被政府「悄悄地拿走」，他们不让你知道你是纳税人。由是形成今日中国普遍而公开存在的反常识逻辑，所有花销费用都由纳税人全额支付的共产党，还口口声声让给他提供费用的纳税人感谢他，一种极其无耻的反常识逻辑大行其道。时至今日，中共党媒公然口口声声嚣叫着「端党的饭碗」、「吃党的饭」这种无视人间廉耻的论调。今天，在世界范围，全额由纳税人养活的政党大略上只剩下中共及朝鲜劳动党（**共产党**）等少数几个无赖政党，也是全人类仅剩下的几个在纳税人面前无法无天的流氓政党。像美国这样的制度文明国家，任何一个政党，安敢胡乱花去纳税人的一分钱试试！

部队每天没完没了地学习、教育内容，几乎不与人类文明发生任何联系。我曾经问过几个大学生士兵，问他们对国家的法治前景有怎样的期待，回答几乎都是：「无所谓，反正只要我不违法就一辈子也跟法律不发生关系。」在这样的态度里，你不仅看不见丝毫的公民责任，你更看不见一个个体人当有的良知。只要我不违法，公正不公正与我何干？另一方面的沉重则是这些现代平面对人类法治精神价值的可怕疏离，及对基本法律常识的理念性缺乏。而事实上，作为一个现代人，你与法律发生着须臾不可剥离的联系。

你一脱离母体，便在私权领域与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等亲属产生了法律上的身分关系，这种身分关系以诸多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内容。同时，一个生命呱呱坠地之时，即是他或她的公民及纳税人身分的取得之时。一个人待在家里，除了与诸多身分有关的权利、义务发生交涉外，还与民事领域的诸如财产权、相邻权等诸多法律保持着关系，有些诸如居住权、休息权等甚至与宪法发生着联系。人一出门，即与道路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发生干系，上一辆公交车即与经营者发生合同关系等等。

这是我与一个江苏籍大学生士兵交流时谈到的，关于法治话题的一段话，他听得十分惊讶。他说，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再到部队的学习教育，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知识，他说：「凡是对人有用的知识他们都不会给你讲。」这也是我在武警部队被囚禁二十四个月（这是累计时间，其中含在榆林武警部队的三个月）的切身经验，那里最需要的是一系列的启蒙教育——人性的、人类社会的及现代人基本常识教育等，最起码应当培育人类群体必须当有的东西，诸如道德、羞耻、同情心、克制、诚实及规则意识等，进而学习爱人、责任及相关文明知识成果。

据士兵讲，所有学习教育内容都是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教育，许多士兵认为那种教育纯粹瞎扯淡。像刘巍、郭通等都谈到过，爱与不爱、爱什么、怎么爱，都应该由个人自己去选择，这种强制分配只会适得其反。然而，教育者本身的愚蠢常让你目瞪口呆。

三十六、从「李沛瑶被杀死事件」看中国的贪腐

他们中的许多人，给我讲了许多有关当官的贪腐、反常识、反人类的事例，其中有不少士兵讲过他们北京总队总队长的贪腐事实。说他们全是说一套做一套，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说在北京总队范围内，不管哪个支队、哪个师或哪个部门有建设或装修工程，百分之百会由总队长的儿媳妇来负责，但绝大多数情形下她出面后就躲到背后。说百分之百的师长夫人会总代理「安利」产品在全师的销售，包括每一个具体点，一经设立，那些管官的官夫人都会亲自来交涉，从此点上官兵所有的消费都只能「安利」一个面孔：一支牙膏九十五元，一块香皂五十元，所有价格都高得令人咋舌，每个人都必须买。

我被关押的那个点上，绝不出两个月左右，那些领导夫人就会放下身段躬身前来，每一个士兵都不能例外，连监禁室的哨兵都会有人进来换出去过关，每个士兵私下都骂骂咧咧，但终于都无可奈何。虽然点上士兵出于保密需要不允许穿军装（有些士兵几年下来都穿不了几天军装，几乎所有的任务都要保密），但士兵所需的所有便装全都必须由大队长或中队长夫人统一购买，而士兵只能接受。

其他，士兵的评优、转士官、入党的所有机会，也都是花钱的结果。例如，转一个士官，最多如江明周（音），因为他先天性颞裂说话不清楚，不符合征兵条件，更不符合转士官的条件，所以花钱数额每个环节上都是别人的三倍左右。他亲口讲，光转士官一项，他父亲送部队领导就有八万多。又如，四川贵阳的「大哥」（名不详，年龄小，个头小，全中队都唤其「大哥」）是耳聋，当兵也花了别人的几倍钱。十七支队支队长（团长）老家在河南，据他的同乡士兵讲，无论入伍还是转士官或是考军校，所有收好处的事都由他老家的姐姐负责打理，每年从河南、河北、安徽、湖南等地来送钱的人纷至沓来。士兵说，不论是官、兵，每个机会都几乎是明码标价，尤其是士官提干，最基本价五十万元；干部每晋升一级，唯掏钱买一途。

按士兵的说法，部队的腐败已烂透到根，因为那里封闭且直接，一个支队没有任何人敢查支队长、政委，一个师亦然。每个人都是花了大价钱获得的官位，所以保官位、收钱及「维稳」成了一把手的所有工作。

据一些士官讲，武警部队的彻底腐烂，源于原中共人大副委员长李沛瑶被杀事件。说这个事件，江泽民集团是完全用黑帮的逻辑而以法律的名义处理的。这些士官分析得很有道理。他们说，首先是对事件的处理，江泽民集团几近疯狂的报复手段，采用了中国黑暗政治中最惯用的「连坐」追惩及凶残打压手法。

可以说，在李沛瑶被杀事件的处理方面，江泽民集团开创了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纪录。张金荣杀死李后，张金荣的班长一路上溯到师长（据说师长是被撤职）全部被处罚，师长以下全部判刑，不仅张金荣已复原回家的前班长又被抓回判刑，连张金荣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派出所领导，所有征兵干部全部被累及。最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准备将整个北京总队官兵全体逐出北京与西藏总队对调，因有人提出这种做法极易逼出急乱，及认为只有被惩罚者才配驻守西藏的认识才罢手。

据他们讲，当局处理这一事件的做法，使所有军官都感到，军官被判刑、处罚已与确定的自身错误行为无关，而是与不确定的他人行为相关联，使自己的前

途、命运呈完全不确定性。说此事件发生前军方赴地方接兵还有所瞻顾，此事件以后就干脆只要给钱，半聋半哑的人被征成兵的事已屡见不鲜，一切都只顾眼前利益，自己眼前利益以外的事一概不去顾及。至于军官对这个案件处理的另一个不满理由则是此前我从未听说过的，即是说，张杀死李并非肇因于张的行窃，而是李强奸了张金荣的妹妹，这与国保警察所说的倒是一致的。有关当局为了保全「领导同志」的面子，而完全罔顾事实及士兵张金荣起码的尊严，这种公然颠倒黑白且殃及一大群无辜人的冷酷行径，全然没有顾忌武警官兵的基本尊严。

三十七、两个「维稳」的荒诞例子

然而，缘着这起事件而引发的，对武警官兵的整饬仍在继续——每年的2月2日，武警部队全体官兵必须全天进行安全警示教育，从无例外，官兵们实在不堪其烦。而另一个使官兵不堪其烦的是，高级领导反常识的愚蠢在部队日常管理方面令人目瞪口呆的折腾。

不少士兵都讲到过两个著名的荒诞例子：一个是二大队领导因「烟灰缸里有烟灰，垃圾桶里有垃圾」而被通报批评做检查的事。

由于「维稳」人员的霹雳手段，全军上下噤若寒蝉，直若死水一潭。然而，「维稳」人员只有不时能找出问题才能证明其存在的价值。最有趣的遭遇莫过于，上面首长差「维稳」人员至十七支队找问题，下达了「找不出问题不得回单位过春节」的死命令，而十七支队首长又向各单位下达了「哪个单位出了问题就不得休息过春节」的死命令，双方出现了长时间的僵局。其实，对于无法无天的「维稳」人员而言，什么是问题，颠覆常识的问题评判标准就是问题。

又一次，他们终于发现二大队队部办公室烟灰缸里有烟灰，而垃圾桶里有垃圾，大喜而不能自禁，二大队终于被通报批评，大队长在全支队干部大会上做检查。士官们在讲述这一节时是维妙维肖，说他们大队长煞有介事地站起来做检查，其中有几句做检查的话在部队上下传为经典笑谈。

他说：「我们大队的严重错误就是往烟灰缸里磕烟灰，垃圾桶里倒垃圾，给全支队脸上抹了黑。所以，我们全大队决心痛改前非，今后保证做到：烟灰不磕烟灰缸里，垃圾不倒垃圾桶里。」

据说念完这段检查内容后，会场上一片死寂，支队领导亦长时间默不作声。但究竟这场检查仍是有实在价值的，「维稳」人员们终于消除了「烟灰缸里磕烟灰，垃圾桶里倒垃圾」的重大不稳定因素，而终于带着胜利的喜悦返回单位过年。

另一个实实在在发生了闹剧的幅面和维度都与前述事例不可同日而语，而娱乐性效果亦更加宏阔而尽显中国特色。

士兵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武警换『老大』。」怕什么？怕新官上任领导瞎折腾！说有些干部干脆「胡日鬼」（**西北方言，意指不务正业、行事歪门邪道者**），一些「新政」措施让人目瞪口呆。

不少士兵都讲过一个叫「干化管理」的「新政」。说一位领导上任后为了显示自己与前任的不同，出所有常人的意料，颁布了一项「干化管理」新政。这项「新政」要求，武警部队所处环境不能出现有水的地方，但凡部队训练驻防的地方有不干的地方，即算是重大违规事件，不能有例外且不得讲客观原因。而这「新政」在检查组及「维稳」人员的督查过程，则被扭曲异化至无可复加的地步。人民武警再崇高、再神圣，终究还是人群，是人就不能离开水。一旦有「维稳」人员突击检查，发现正在做饭的锅碗瓢盆里有水，这可不得了，这是一个大事故，将是一个支队重大违纪的黑纪录。为了避免撞在「维稳」人员的枪口上，为了不致成为违反「干化管理」的黑典型，逆来顺受惯了的基层官兵被逼开始了自己的日常应对：食堂不再做饭，买来馒头、面包分发，有的部队馒头、面包吃腻了就干吃方便面；需要喝水的时候，官兵们集中关在房间里突击喝水，且还远置数道「斥候」以防不测。杯子里、纯净水桶里、瓶里若被发现一滴水，那一个中队、一个大队此前所有的牺牲与所有的努力即付诸东流。

至少有三个士兵讲过同一事件，说一次一个庞大的「落实干化管理」检查团扑至，全支队上下风声鹤唳，群起而奋力应对，但百密一疏，终于因在一个中队炊事班的窗台上发现了一个矿泉水瓶里有几滴水而功亏一篑，令一群男儿扼腕，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涟涟。」

最使士兵普遍头痛的是厕所里的抽水马桶。马桶底部保有一些水是一种密屏异味上扬的功能，但设计者，至少是购买者没能高瞻远瞩到终于会有「干化管理」这一伟举，终于苦了这威武之师的官兵们。马桶底部要存有水，而与「干化管理」的神圣使命生出冲突。究竟是威武之师，部队给每个官兵一块毛巾，谁上完厕所谁就立即把马桶里的积水给用毛巾蘸干了，而毛巾却被沾湿了，各人的湿毛巾自己藏好了，谁暴露了跟水发生过关系谁负责。

他们说自「干化管理」英明决策颁行后，官兵就不敢洗脸、不敢洗澡，洗衣服跟做贼一样。「君王城头换降旗，妾在宫中安有知？四十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对士兵有涉「干化管理」的述说文字记录至此，自然而然地想起花蕊夫人这首诗。不是面对面听了「干化管理」亲历者的讲述，作为一个俗常人，我断乎不敢相信人间真会有此类活生生伟举。

三十八、诋毁狗屎的恶臭和乌鸦的黑

中共官员动辄即指责别人「恶毒攻击党和政府、肆意污蔑党和政府」，最近又制作了个新面相叫「抹黑中国」。其实，这群当今人类最为无耻的败类，他们也非常清楚，他们已没有了被污蔑、被抹黑的资格，没有人会多此一举给漆碳抹黑。感谢两次累计二十四个月的部队关押，为我更深、更全面及更贴切地了解这个绿林政党的本质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契机。2011年的一次谈话中，谈话者依然是指责我「恶毒污蔑诋毁党和政府，抹黑国家形象」。

我说：「如果真有人污蔑、诋毁狗屎的恶臭，抹黑乌鸦的话，此辈当诅咒。」

我和武警部队两年的「特殊交往」，所谓「五味杂陈」，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在极权专制权力面前，在各自的小利益计算折冲中，一群一群的，包括被称为「威武之师」的武装集团，都成了怎样的一种令人惊悚的情形？「一堆无脑蛆」，没有比这更恰切的比喻了。群体的不争不鸣不说，连天经地义地证明大家还是人的冲动都集体丧失。然而，究竟是人，都还在动，利用一切时间或精力经营自己。

几乎所有士兵，人人有泥鳅的天生秉赋，监控室的监视是如此严密，他们却有办法使用手机，这是重大违纪事件却从未有人被暴露。部队当局对他们的担心有时是多余的，怕他们对负面新闻中非公正、非正义事件做出正常人的反应，那既是不了解他们，更是冤枉他们，他们的眼界高不过女人胸部。

百分之百的，人人与几名、十几名甚至几十名的女人保持亲密的聊天联系。如萧某某，同时保持着与三十二名女性的网上联系。有一次，他在一个监控死角给我晾晒那些女人的趣说，上至三十八岁，下至十四岁。他说，他每天忙得是头昏眼花。他说，这方面当官的、当兵的都一样。说就数量而言，他网聊的女人远不算是多的。士兵之间聊天，十之八九的话题离不开女人。

他们中的许多人，人性中的凶残、冷酷的成分令人咋舌。在权力面前俯伏驯服无可挑剔，而在同伴面前的冷酷蛮横亦无可复加，昨日还是被士官欺压的士兵，今日刚转成士官即对士兵大打出手。最典型如六中队的那个「少林弟子」，他刚转成士官没有几天，即有多名士兵被他暴打欺辱。

三十九、君子与小人的对话

对于人类正常感情而言，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一具行走着的皮囊。

1. 发了一笔板蓝根横财

有一次深夜，河南籍士兵周某与姬某在夜哨时聊到一件事，姬某说2003年初，一个多年与他们家有着药材生意往来的供货商，拉到他们家所在城市十几吨板蓝根，当时是每公斤两元钱亦无人问津，无奈寄存在姬家。不料几个月后，人们对「非典」的恐慌及信息的不畅，与满天飞的虚假消息的畸形结合，板蓝根原材价格一路飙升至三十万元每吨。那十几吨板蓝根的主人喜极而方寸大乱，在赶往姬某家的路上车毁人亡，姬家以「中国特色」的寻常逻辑发了一笔横财。但姬家终于还是没有把事情做绝，那货的主人遗有两岁的女儿在托儿所，他们按板蓝根涨价前的价格把钱算好后送至孩子所在的托儿所。

结果，周某批评姬某说：「如果是我，不但不给那孩子钱，还要把女孩子接到自己家里来，养到十二岁时就可以天天操她（指奸淫），操完了还可以给家里干活。」

对这超出了人理的冷酷，我忍无可忍便劝了几句，我说：「一个人若没有信仰已是十分地不幸，他的心里充塞着无边的黑暗，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若再没有了道德底线这个唯一的安全闸阀，那他就是十分危险的，将会给自己造成无尽的伤害。」

周怒气难抑，我闭上了眼睛。

周说：「我他妈看到这老头心里就不舒服，哥儿们想找个机会整死他，在我们手上还敢得瑟。」

姬某一句话让我免于被整死：「这种小人不值得跟他计较。」

两位君子终于放了我这个小人一马。这种毫无廉耻的对话，在那个小小的囚禁室里多得不可胜举。

2. 卢大个经常夸耀的东西

卢大个的叔父是公安局局长，他自己初中都勉强毕业，但他却有着医学本科文凭；他有两个身分，一个是当兵的他，一个是上大学的他。他还有几个月才退伍，可当地一家大医院的「B超」室已安排了他的职位。他的父亲本系蒸卖馒头的，但他的姨父后来当了公路局局长，于是他的父亲就成了公路局下属一个部门的领导，没几年，花七十万买了一艘游艇，在当地富甲一方。

卢大个在站哨时经常夸耀这些东西，我告诉他应该有基本的是非意识，因为你和你的父亲、姨父都涉嫌犯罪，你每天宣扬的这些都是具体的犯罪事实，你为什么要宣传这些对你及你们一家完全不利的事？」他听得一脸茫然，但终于此后再没讲过。一米八几的个头，平时看则体体面面，却把犯罪、把羞耻当成荣誉表彰，这是怎样的一种失败？从这种失败中，就显见武警部队常年学习教育于干脆脆的失败。

此外，经年累月地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直可以说已使许多人变成了仅挂「爱国相」的会行走的废人。而极度夸张的危机感及安全形势教育，在士兵的心里已经适得其反。军队的危机意识教育、安全警示教育已到了变态的地步。喋喋不休地告诉官兵，国内外敌对势力磨刀霍霍，不愿意看见中国人民过上富有幸福的生活，每时每刻都想扰乱人们已有的幸福生活，而军队肩负的就是保卫人民这种既有的幸福使命。武警士兵起床后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时刻牢记我们面临的严峻形势，牢记我们肩负的神圣使命。」而所有开会、学习教育的开头，都必须念诵这句话。要求每个官兵都铭记：「两眼一闭（指上床睡觉）提高警惕，两眼一睁（指起床）警惕到熄灯。」

四十、「六四」战备的具体处置

作为冷峻的旁观者，我发现中共统治集团的安全心理直在占领者之下，我常称他们为「占领者」。据士兵讲，从2007年起，每年10月份的诺贝尔和平奖公布曰前三天，北京、天津两地的武警部队全部进入二级战备，所有的官兵吃住在车上，枕戈待旦准备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不是亲耳听到那战备亲历者的讲述，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每个敏感日必然战备，草木皆兵，动辄大惊失色、惶惶然若失家狗。他们士兵中也有些明白人，五中队两个大学生士兵曾提到，政府官员别看他们满嘴仁义道德，其实他们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是什么，他们比任何

人都清楚。说他们开一次「两会」，要动员几十万大军保护，要布置数道防线，驻京、津、唐地区的所有部队，包括解放军，全部进入二级战备。武警士兵戏称：「中共开会，军队受罪。」说最荒唐的是共产党开一次重要的会议，要投入的军队人数会超过百万，说几千人开会，在自己的国土上一个政党开个会，会有一百四、五十万军队战备执勤。

我告诉他们，这一点都不荒唐，这是最真实的国情，倒是我问他们：「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一百几十万大军准备对付谁？」他们笑而不答。

许多士兵都讲过每年「六四」战备的具体处置，说到6月3日白天，会从各部队抽掉大批官兵着便装分片包责执勤，对北京街头出现的通体着白色服装或通体为黑色服装的人要重点盯踪；如果上述着通体白色或通体黑色服装者有朝天安门方向行进的则须立即逐级向上报告；若到了天安门广场附近而且目的地已明确的，如果是中国人就进行盘问，必要时断然处置；若是外国人，当报由公安部决定。而从6月初开始，就会派出大批秘密警察及便衣士兵，分布在较大的蜡烛销售场所进行秘密布控；对于购买蜡烛而形迹可疑者，一直须盯踪至购买者具体的居所，并在6月3日、4日进行全天候蹲守；如果发现夜里关了电灯而使用蜡烛的，要求与管片民警协同处置；对购买了蜡烛而朝天安门方向行进的，当伺机处置。

至于各国家机关政府人员，也被要求在「六四」期间不得穿通体白色或通体黑色的服装，更不得穿着上述服装群体聚集，不得在夜里使用蜡烛，而发现居住处周围有在夜里使用蜡烛的，有义务向政府部门报告。说不仅武警及公安人员全员出动，许多政府机关也得抽调人员加入到巡视中去。说京、津两市投入到这项「工作」的人员有几百万，尤其许多小区安保人员也被动员进来。说每到这一阶段，军队及警察部门的领导人是彻夜不敢闭眼。

四十一、夜间的紧急「拉动」

我与部队「相处」的时间里，每至敏感时刻，他们的警戒反应已到了变态的地步，那种紧急「拉动」的动静岂止于惊心动魄？有时一小时会「拉动」数次，喇叭传来刺耳的呼叫「某某方向出现X名不明身分人员」，或「某处有不明人员做不明原因的聚集」等，数秒之内，整座楼被各种紧张紧促的声响裹覆。

1. 「六四」前夜里的紧急「拉动」

2010年的「六四」前，夜里有一次紧急的「拉动」，第二天哨兵讲，说因接到武警总部的紧急通知，才夜里「拉动」，紧急传达了海外一个叫陈维明（音）的雕塑家（或是画家，我记不确切），创作了一座天安门大屠杀的微型雕塑来污蔑党和政府，抹黑中国形象，说这是京、津地区武警部队的一次联合行动，所有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而严阵以待，要彻底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污蔑和颠覆行为。至少有六名哨兵给我讲了这一过程，我问其中一名士兵怎么看待这一过程，他说关键是那些人要把雕塑运到天安门广场，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破坏稳定。我又问他：「你算是明真相者吗？」他张着口不再言语。

2. 北京东直门地铁站口花圃小爆炸惊动胡锦涛

大略是同年的9月、10月份左右，半夜两三点进行了一次紧急「拉动」。夜深人静里，这种突起的「拉动」动静实在超常得可以。第二天，至少有四个班次的哨兵当成笑话给我讲，说是在北京东直门地铁站口附近，路旁一个种花的地方有人扔了一个爆炸装置发生了爆炸，没有人员伤亡，此事竟惊动了中央军委和胡锦涛，说胡锦涛下令军队、武警必须连夜传达，连夜进行形势警示教育，让全军官兵牢记我们面临的严峻形势，牢记我们肩负的神圣使命。士兵说那至多算是个治安案件，竟惊骇了中央领导的安全神经，竟然向全国武装力量连夜紧急传达。士兵最经典的一句话是：「他们已经出不起事了，哪怕是一件小事。」

3. 游行方阵里的冒牌学生

他们笑着给我讲述了2009年的所谓国庆游行，真的，不是在这种特殊经历中的际遇，谁能想到这游行方阵都作假，而且是中央「领导同志」的亲自部署。原来，人们看到的那些「群众方队」里，安排进去为数不少的秘密警察和士兵以防不测，而这种「群众方阵」中的人员安排还是秘密进行的。而大学生方队则是公开的安排进去大量的武警官兵，方阵四周外围的三排全是由士兵对外冒充大学生。有一士兵说大学生私底下戏称士兵是「狗」，是专门被派来看住大学生的狗，而士兵则反讥大学生被圈在里面而与猪同命。他笑着说其实狗也罢，猪也罢，反正都不是人。

四十二、当了兵才知道上当

关于军队中对基层官兵的野蛮压迫，几乎每个哨兵都向我诉说过。一位陈姓士兵说，武警士兵在当权者的眼里就是狗。他说其实认了自己是只狗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认了狗命就没有烦恼，更不会有人的苦恼。他说，武警士兵中人人知晓的一个顺口溜是：「武警士兵一条狗，哪里需要牵着走；解放军士兵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有一次是郭通和刘巍一班哨，谈到这种现象时，郭通说了一段流行于基层官兵的说法：你若是恨一个人，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去当兵；你若希望一个人很快变成猪狗，就让他去北京当兵；你若希望一个人不仅变成猪狗，而且生不如死，那你就让他去当北京武警。

一些大学生士兵谈到，许多人这些年都在看类似「许三多」的军事影片，他们认为，实际上上演这种类型的影视是有目的的，就是忽悠年轻人去当兵，当了兵才知道了你上当到了什么程度。

「与影视片中看到的军旅生涯比，我们好似突然从人间坠入地狱。」一位士兵说。

他们认为严酷的训练、严苛的要求完全不可怕，你到了部队才发现，严酷、严苛确实在，却不是为了训练和正常的纪律。严酷和严苛十之八九，甚至是整个部队生活的十之八九全用在洗脑而「维稳」游戏中。稍有怀疑、稍有不满即会遭致赤裸裸的暴力殴打，而稍文雅的则是让你抱头下蹲。

郭通是个大学生，循规蹈矩，谨小慎微，一次因为学习教育中一点动作，下课后被班长陈胖子叫去谈话。说「谈话」一开始，陈胖子喝令他抱头蹲在地上，他说他感到自己受到极大的羞辱，想着毕竟自己大学毕业，且根本就没有犯错误，所以下蹲处罚将不会太过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他下蹲后陈胖子开始躺在铺上玩手机，而玩手机是重大违纪事件，玩了一会他竟酣然入睡，这一睡就是两个小时。他说两个小时的下蹲真是生不如死，也正是那两个小时候他彻底地看透了部队，也看透了陈胖子。

赵治中也是一个大学生士兵，他说，看透了部队是缘于在新兵训练期间，家里姐姐来看他的事。他说，那过程真是超出人理。他的姐姐被堵在大门外等待，

他的训练早已心不在焉。训练休息间隙，新兵排长说是要带他去见姐姐，没有料到那竟是一种贴身监视。他说，从头到尾排长都坐在他身边，没有让他和姐姐单独说话的机会。

「他们害怕新兵逃跑，更害怕把部队里的黑暗说出去，就觉得自己完全被控制起来了，还不是因为他们屁眼下面不干净。」

士兵普遍认为，基层官兵完全处在一个权利的黑洞中，没有任何权利可言，而上面当大官的却有无法无天的自由。

「蔡包子」是一名士官，终于盼至探亲期，拟于2011年春节回家与亲人欢聚，结果有一天这「包子」君一脸苦相，因问其故，「包子」君却说是国家秘密不能说。过了一段时间才有士兵说，中央军委突然下达了命令，说是胡锦涛的意思，命令要求紧急召回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所有回家探亲的官兵，包括已到家的或正在回家路途的官兵；立即停止批准所有的探亲申请，理由竟是说埃及国发生了「暴乱」，说党中央、中央军委、胡主席，担心国内外敌对势力仇视中国的安全稳定，像埃及的暴乱分子一样乘势「作乱」，为了保证全国人民能过上欢乐祥和的春节，胡主席要求全体官兵停止休假，提高警惕，肩负起神圣的历史使命。那些后来中止假期返回部队的人，说部队基层官兵就没有权利，即便法定了的权利，领导一句话就可以随意取消。

四十三、褥子角上竟可拧出水

这一次在北京武警部队的囚禁历时二十一个月。从生物人角度而言，这是十年来数十次的秘密囚禁生涯中，囚禁环境最为残酷的一次。首先是前面述说过的酷夏炎热和缺氧之苦，而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地下室的潮湿，这是这次囚禁生涯另一个最著名的苦楚之一。山区雨颇多，而囚室内长年因为封堵至密不透风，至秋季，衣物、被子可以在洗衣机里甩出水。而当局的冷酷则人为地加重了这种苦楚的程度。士兵可以每隔两三天晾晒一次被褥，他们的门窗还可以全天候保持通风；而我则完全相反，为了能争取晾晒实在潮至无法再盖的被子、褥子（最初几个月就没有褥子，后来卢坤多经争取终于给拿进来一条布满黑绿色霉点的褥子），我和他们的交涉延绵了二十多个月，终于到被突然押离亦未能实现。士兵目睹了那种惨状，被褥上的潮湿霉斑点布若繁星，褥子角上竟可拧出水，因为武警部队并不能决定是否允许我的被褥在外面晾晒。听说这最终事决于「中央领导

同志周永康」。

因为有一次郭通和刘巍站哨，终于盼到三周一次的洗澡机会，可晾在室内的衣服还是迟迟不干，就想在室内换个晾衣位置，他俩却说绝对不可以，说室内晾衣服换地方必须上报师里才能决定，说今天又是星期天，无法逐级上报。后来，至2011年7、8月份，那被褥实在是再不能用了，才在六中队胖排长值班时，在轮到我洗澡的时间，悄悄拿出晒了一会。对于我嫌晒得时间太短，几无实在意义的抱怨，他一脸为难说他们没有这个权力。

这次囚禁最为刻骨铭心的苦楚当属冬季的寒冷。作为生理煎逼的一部分，头一年的冬季几乎是不给送暖气的。此生迄今，我从未像那年的冬天那样在乎过冬天的冰冷，毫不夸张地说，那种无法摆脱的寒冷造成的苦楚量，超过任何一次酷刑的痛苦当量。一切仿佛都是冰做的，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冰。我的过去有过极贫穷的经历，记忆中却从未有过像那段时间那样去全心全意地在乎那寒冷，那寒冷有着超乎经验的附着力，超乎想象的穿透力和他那绵绵的韧性。白天的室内活动时，我就将被子披在身上，监控人员阴迟（音）制止不果，最后紧急按响报警铃。七年士官邓全英进到囚室内制止，说必须先把被子放下，等他向上请示以后再决定行不行。我拒绝之，我说除非你能喝出这寒冷，否则，这最低人道要求不应当与权力发生交涉。最后，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囚室寒冷难熬的，同样还有士兵。据说，烧锅炉的是个老头，他每天中午十二点半才来上班，下午十四点半准时下班回家。之所以每天要烧两个小时，是因为担心冻裂了暖气设备及自来水设备，使室内温度维持在零度以上即可。士兵在里面站两小时下来，据他们自己讲，身上都被冻麻木了。他们中有人开始自己动手，每次上夜哨之前都会去加一次炉火，渐渐地人人如此。没有想到，这使人束手无策的寒冷竟意外地被士兵的自保行为给消解。因为听士兵讲，那锅炉房虽然阴森可怖，却没有监控，有些可敬的士兵下班后也会去加一次炉煤。到了第二年冬天，夜里由士兵加煤烧火实际上成了一项制度，基本解决了夜里的冰冷。

四十四、一束束人性的光辉闪耀

在这里，此时此刻，当我记述这段经历时，依然从心底里记念起那些士兵。我想记下他们中间一些一直使我无法忘却的名字，只可惜有些善良士兵的名字始终不为我所知：李俊良、夏智成、赵治中、魏皐、郭通、刘巍、方成、小周（潮

北籍，名不详）、卢慰（音）、郑军、顾班、李玉祥、麦汝好、胖排长、副大队长（名不详）、卢坤，他们每个人对我都没有过一点恶意，士兵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几个月的（最长十个月）「共处」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人性的善。

我常想，这些小子在家里都是独生子女，尚不懂得怎样关心父母，但他们却给了我一些难得的关怀。尤其让人感怀万斛的是，这帮小子竟用心计给我关怀。他们中的不少人在知道了我的身分后，竟多次在送饭时，在饭盒底部埋压上肉、煎鸡蛋等好吃的菜，有的在中秋节偷偷地在手里攥个月饼进来给我。由于我的囚室内当局故意留了一个监控死角（审讯、谈话人员的形象是不能摄进去的，因为这不属于法律程序），这个监控死角在那二十多个月里也给我留了些益处，这些坏小子有偷零食给我吃的，他们的撤离、换防都是向我保密的，可许多人走之前一定会设法进来与我偷偷道别，其中大多数竟泪流满面。有些嘴里还念着：

「老头你受罪了，好人自有好报，再见了，我要离开啦，再不能照顾你啦，一定好好保重。」

尤其将要退伍的人，他们的胆子相对要大得多，不少人在将要离开前的几天里，竟大胆勇为，整班哨地给我放歌曲听。广州的一位、湖北的一位、四川的一位，在复原离开的最后一晚上，都是一直流着泪给我放歌曲听，而武警及公安方面的监控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中，小周提出退伍后去看我的家人，好让家人得知我的情况；然而，被我制止了，我不愿给他们带来危险。每年他们复员时我是整夜不眠，人间重别情，一个被秘密囚禁之人，且是不能开口说话之人，竟让这些执行禁闭管制我的士兵生出些爱情来，实在让人感叹人性究竟是相同的。尽管这是当局全力防堵的，终于没能止绝得了这种无声的相同。

我常纪念他们，在我后来的中共挂牌地狱囚禁中尤甚，在那黑暗全由人心成就的环境，我们依然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一束束人性的光辉闪耀。而对于胖排长及那位副大队长，只是较其他军官给我制造的苦楚而言，我愿意纪念他们俩，他俩从未对我有过一点具体的恶意，从未主动给我制造过一点苦楚（对了，我想起来了，那副大队长姓宋）。

四十五、脚下腾挪的岂止是个物理距离

有一次，我与士兵刘飞他们发生了颇激烈的冲突。说客观的，我与一些人发生冲突都是缘于他们公然在囚室里欺辱新兵，实在忍无可忍时，我就会挑茬引起

冲突而斥责他们的愚昧与无良。那阴迟（音）当着我的面殴打新兵，我与他的冲突最多、最不留情。我曾策画过准备狠狠地治一下「少林弟子」，而被卢慰屡屡劝止，因为他在欺辱、殴打士兵方面出众地冷酷。我与刘飞虽然冲突不少，我并不认为他是坏，只是一种肤浅，跟他一起站哨的新兵横竖不合他意，我能理解新兵心里的那种不安及无助感，我有时就找个借口挫一挫他的横劲。哨兵在我活动时挤压我的活动空间一直以来就是家常便饭，很普遍，看不惯他老骂人家新兵，但我不能以此为肇因与之冲突；我就计较活动空间被压缩之事，双方冲突骤起。刘飞按响了报警铃，胖排长当值，首先一进来就声色俱厉地斥责了刘飞，然后很温和地希望我有什么不愉快的事说与他，他将尽全力在权限范围解决。

我脱口一句：「让你们的士兵在脚下腾出点活动空间却屡不能实现，你们脚下腾挪的岂止是个物理距离，而是人性，为什么你们是如此地不通人性？」

要是别的军官，我们又将为此起冲突。我从胖排长的面色上看他是个善人。

他笑着说：「说得好，士兵们脚底下腾挪的确实不是个距离问题，而是人性问题。我们有我们的局限性，但在规定的范围内是不能任意压缩的，否则，规定就真成了乌龟的屁股（龟腩）啦。」

从那以后，胖排长给划定了活动距离线，根绝了士兵的随意压缩。

四十六、刘飞的三个「球」

而对于刘飞，我也通过私下传话管道，讲明了我真的动机在于他以后不要压迫新兵，后来与他的关系还处得不错。他的当兵动机是为了避免坐牢，这在士兵中却很普遍，光他们四川籍的士兵，五、六两个中队里就有好几人，河南的更多，他们普遍的说法是：「跟我一起混的同伴基本上都已经坐牢了，若不当兵，我自己也早就进去了。」我跟刘飞之间的冲突次数仅次于阴迟和张浩，而阴迟是干干脆脆地坏，此君当与张浩归于一丘，但我仍认为与他们的年龄当存在关系。阴迟的坏没有敢针对我的，主要是针对新兵，这方面他当与「少林弟子」归于一丘。

阴迟头一次进来站哨就在我跟前耍起了威风，这实在是他们的不明智。我的坐姿不符合他们的规定已成了一个实在的现实，阴迟第一次一进来下令让我按规定坐好，我没有理他。他若聪明懂点自处之道，不再言语，得免使自己下不了台的情形出现。

相反，他第二句话的用词及语气骤变：「我让你给我坐好嘞。」

沉静了不到半分钟，咬着牙的第三句就砸了过来：「我让你给我坐好，你是听不到吗？」

我想我必须开口了，因为他显然不愿自己停下来，若再软抗下去，冲突会被他的愚蠢给扼擢升级。

我说：「这位军爷请偃息愤怒，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在你今天没有进来之前，我已经在这里面待了十一个月，终于还是没有改变你刚才看到的不令你满意的坐姿。我想说的是，我不认为你能改变了我，如果你要坚持你的目标，我会相应地接招，但绝不会改变你要求我改变的。你现在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不再说话，因为我和你一样地有脾气。」

大家都算运气，他不再发声，危机息解。

张浩与我冲突最为激烈，但我不认为他是坏。不客气地说，此君就是个「半碗水」，当知道了他这种「忧势」后反而应势而为，与他之间的平静一路保持到他退伍。

刘飞这小子说话，绝不出两句就会带一句「他妈的」泡沫语。武警士兵是我此生迄今遇到过的，说话用「他妈的」概率最高、最集中的人群。他们中的许多人油嘴滑舌却用词单调匮乏，但未必无趣。仍以刘飞为例：

一次站哨中，刘飞企图甜睡，副哨羡慕地顾盼，亦有欲睡之意。他突然睁开眼睛时发现副哨正看着他，他立即来了一句：「你他妈看球？」副哨立即停止了「看球」。过了一会儿，这位主哨大人又睡着了，结果被副哨掉在地上的笔响声给惊醒曰：「你他妈弄球？」副哨立即停止了「弄球」，昂然而立。刚过了一会儿，副哨履行例行的记录，翻看笔记本的声响吵醒了他而怒曰：「你他妈干球？」副哨立即停止了「干球」，而肃然以立。

我当时真的是觉得这三次发言是言简意赅，用词的娴熟程度实在令人刮目相看。有一次，我向他说起了这次的三「球」用语过程，他听了后谦虚地说：「那他妈算个球。」

四十七、李副导的冷酷和三个「不」

我前面提到的两个被我记念的军官中的宋副大（士兵这般称呼他），是因为所

有二中队官兵中，他在那个关押点上待的时间是最长的，只离开没有几天，就发生了我与「眼镜」君的激烈冲突，其时与「眼镜」君一起蹲点的是一位副教导员，冲突发生后，宋副大又调回到这个点上。他进囚室有过几次，但我们从未说过一句话，他的眼神很和善，他从未给我添过一点苦楚，这在于我已是足够的友善。与那位荣立二等功的李副指导员比，他至少是个聪明人。

对于因监管我而被记了大功的李副导，我从未有过一丝的恨。对他有厌恶，而这厌恶全缘于他对士兵的冷酷，此君其貌不扬却心计颇多，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许多。从人生的精神亮豁层面，尤其人生的快乐层面，至少在我看来他没有快乐可言。实际上，冷眼旁观，他亦属这黑暗政治遮覆下的一个悲剧角色；所不同的是，他在殚精竭虑地维持着这个角色。是普遍的无力感使然，还是出于混沌无知，亦只有他自知。他身上满溢着国人颇不缺的狡猾，他从不与我正面冲突，见面必龇牙笑相。

实际上，一个人的做事展显的才是他的真实面孔。我常想，一个在任何人面前都狡猾行事者，这不再是狡猾而是愚蠢。他不快乐且常焦虑，这是他的眼神和面色上能够看得到的「诚实」。有一件事颇能反映他的冷酷及内心的不平：和

士兵从山上发现了若干流浪狗，并且有「流浪二代」小狗崽，据说不及半岁而憨状惹人爱，被他们捉了回来。有一天夜里，小狗不知何故狂吠，而不幸正是李副导值班，他手执电击器来到栖息纸箱里的小狗旁，蹲下很耐心地开始电击那小狗，直到那吠叫声止歇后他才从容离去，自卫哨兵目睹了这残忍的全过程。他离去后哨兵走近发现，小狗口吐白沫，浑身抖动不歇。第三天，顾班进来站哨时说小狗已死，并被他们埋葬。

那几天里，我每天不由得问起那小「流浪二代」的状况。据说牠被电击后连续几天腹泻而水食不进，最令人哀伤的是，牠死前只要看见人走近就恐惧地抖动不止。顾班颇爱狗，之前他给我讲过许多这只小狗的故事，尤其是牠与那只据说是庞然大物的警犬之间的趣闻。说那警犬从不欺负这「流浪二代」，处处呵护牠，而小狗则在警犬面前无所顾忌地，甚至是近乎无赖式的撒娇，一天下来则形同父子。这让人慨叹，在一些方面，人不及狗，尤其在今日中国。

关于李副导的事，几乎每天都有士兵在那里讲，我从不参与，但记忆中的东西能铺覆半本书，却显然不会为之徒费笔墨。但其离开几个月后，由于我终于在「眼镜」眼里不肯驯服，「眼镜」打电话向他讨招，据士兵讲，他脱口告诉「眼镜」三个「不」，即「不正面冲突，不向他让步，不让他舒服。」说「眼镜」得此密招喜形于色，但究竟不是自修的内功，不懂得应有的平衡，而终于导致了我們那次在这囚禁中最大的冲突。

四十八、三次例外的谈话

在这次军队的秘密囚禁中，除了「绝顶君」的谈话以外，还有三次例外的谈话有必要提及，并且仍不打算「为尊者讳」。我将客观记述这三次谈话的大部分内容（**不一定能记忆完全**），因为这种例外的谈话是从不做记录的，而且谈话者通常都只是一个人对我，全是突然出现，但这种谈话内容，武警及公安方面都应存有监听档案。对于谈话时间，我未必能记得确切。

1. 其一

首先是2011年春节，张雪代表他的「师傅」于泓源的一次谈话。张雪是于泓源最信任的一员悍将，这种信任给他带来两样不幸的东西，一是狂妄自负，一是无底线的一路堕落。张是个不大有深度的人，鉴于与于泓源这个大人物的关系，他不仅走路必成气昂昂状，而且除了他师傅外从不平视旁人。那一天，囚室被打开，张气昂昂而人。

「老高怎么样啦？」他还没有坐下来就来了一句。

「活着就是全部，一目了然。」我答曰。

「最近有什么想法？于局派我来，咱唠唠。」

他又来了一句，我说：「想法不是最近的，我就是因想法被关在这里的，这是你知道的。」

「听起来还有情绪啊？不满意，是他妈的忒惨了一点，有情绪又能怎么样？还不是救不了自个儿？我还就跟你说了，死了心吧，想现实点就赶紧救自个儿，什么丫的狗屁民主、自由的，什么改变中国，现实吗？说起来这些我他妈的就不痛快。这他妈的都好几年来，还死不死、活不活地在这拧着，看自个儿那惨样儿，值当吗？老高我今天来不是跟你谈判的，我就是进来给你传话的，这几年你坏了我师傅的大事（**指我未按于泓源指引的路走，而坏了于的升官大梦**），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谁跟我师傅过意不去，我就跟他过意不去，谁让我师傅不舒服，我就不会让丫的舒服。谁坏了我师父的大事，我就敢他妈的撸他。没准儿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甭给我说狗急了会跳墙，没有墙让你跳；甭给

我说兔子急了会咬人，咱没人让你咬，就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几年这滋味你好像还没有尝够，我老跟你说让你现实点儿，你听过吗？推翻共产党，能行吗？美国人，靠得住吗？别逗了，最近我们的胡锦涛主席访美，美国人怎么样？还不是笑脸相迎？美国政府花了三十万美元把白宫南草坪修葺一新，迎接我们的胡主席，谁还会关心有你这一号关在这里的人物呢？赶紧想自个儿的活路吧。」他越说越激动。

「其实，你们的世界也不甚完美，我能看出你活得很不如意。」我说了一句。

「什么意思？听不明白。」他说。

我说：「咱们见面不过八个多月，而你一下老了的有十岁，好像美国政客的笑脸相迎也没有能使你们的世界无限地好起来，而又无限地好下去。」

「还不丫的是像你们这种人给操的。最近，又有一个反正过来的人（指**投降者**），说起你们这种人，他说，你们要比杀人犯坏得多，杀人犯害的不过是人的身体，而你们这种人害的则是人的思想。」他接着说。

「所以，你最好的自保之道是离开我，且越远越安全。」我说了这次谈话中的最后一句。

大致上他也不认为再谈下去会有什么奇迹发生，愤而起身离去。

张雪和他宝爱的师傅于泓源仇恨我，这有他们这十年来一以贯之对付我的冷血手段为证。但我迄今还没有恨过他们，他们无底线的自私、他们自身的局限以及专制特权思想的长期浸淫，终于促成了他们今天行为的扭曲，我更多的是可怜他们，我常庆幸自己没有成了他们。实际上，他也是这个制度的具体悲剧之一，是这个制度普遍的物产，各自充当着这个黑暗政权的具体的不名誉角色，丧失人类独有的许多美好——内心的平和宁静、道德自豪感、良知和爱。

2. 其二

我在2009年5、6月间与张雪有过一次聊天，他对有于泓源这样一个师傅，而感到很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这正是他的局限所在，他只见到了问题的一面，忽视了事物本有的多面性，只看见于这个大人物给他带来眼前蝇头小利的一面，却忽略了正是他对于泓源的愚忠，死心塌地地甘做其凶残工具，给他个人未来命运埋下的悲剧伏笔。当然，个人的无良及汹涌的贪婪是一个自身的東西。这次聊天中得知，那段时间正是他的妻子生孩子的时间，而也正是他的师傅重用他而让他全

面负责押禁点事宜的时期。他妻子的分娩也没能让他回去一趟，他对师傅竟还感恩不止。

我问他对此有何感想，他脱口而出：「为了千家万户的幸福和安全，我宁愿牺牲自己，并且感到无上的光荣和自豪。」

我说任何牺牲个人利益和幸福的安全目标都有不正当之嫌，他又来一句：「苦了我一个幸福千万家，我自个乐意。」

我感到我是再没有必要和他谈下去了。但张和于两人身上也有着让我感动和欣慰的质量，那就是他们对各自孩子的爱。每谈及孩子，你能从他们的眼里看见柔和和爱意的真实存有。孩子每有个小病，他们那种关怀的细心、关心的程度直让人觉得他们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张亦很爱他的妻子。我常想，这是他们终于没有不可救药的希望所在。

3·其三

我在那里的另一次谈话者，就是张雪的师傅于泓源，具体时间当在其高足张的谈话后不久。从心理角度看，可能是觉得张的谈话没能改变我，而终于再亲自出面一次。

于对关押室的环境是掌握的，他不但穿着户外服，而且还围着围脖。一进来不到一分钟即蹙额摇首，说能不能把窗户打开，说：「这屋里空气太糟糕啦。」这窗户是他自己下命令堵死的，因为他这位大人物要来，今天窗户还打开了一会，可打开了意义也不大，打开才发现在窗外面还钉了一块聚乙烯塑料板。而刚坐下一会他又嫌太冷。他就以这环境为由头进入谈话。

「老高是忒惨了一点，这他妈是人待的地方吗？」于搓着手说。

我说：「这却是人营造出来的环境。」

「甭给我说这个，环境差，就等你一句话，你的关押环境改变，就是你个人命运的大改变，也都在你的手里。怎么改？是大改还是小改，都就等你一句话。」于说。

我说：「听你这话好像我成了你的领导了，那你现在就赶紧回家去吧。」

「你什么意思？老高我今天大老远赶来再给你一次机会，直说了，是最后一次。而你也到了真正该严肃考虑你出路的时候了，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不要听不得人劝，天上不会掉下馅饼。就是掉下来他也不属于你。现在可以给你说了，今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刘晓波了，给了又怎么样？是能弄到一笔钱，那又怎么样呢？还不是花不上？还是得乖乖待在牢里。下命令呀，给共产党下命令让放人呀，我们怕这个吗？改变了共产党了吗？没有。诺贝尔和平奖算个屁，小小的挪威国，是什么呀？我外交部发言人义正词严，在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我们党从不含糊。都在嚷嚷呢，嚷嚷什么呀？共产党的监狱就敢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我这里把话说明了，共产党如果明天灭亡，我今天晚上一定会弄死你。我心里就专惦记着这事，一看共产党要完蛋了，我替共产党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干掉你。那时候，我知道我好过不了，你也别想好活了。」于气呼呼地说着。

「如果你手上主动沾上血，那无异于举刀自戕，这样说并不是虑及你会杀死我。你杀不死我，我继续活着就是一个证据。你每次都想弄死我，终于我还活着，还会活着看到中国的改变。」我实在懒得与他多说。

「老高，我不相信你的智商能在我之上，谁他妈要说你老高的智商在我之上，你打死我也不信呀。你不大有头脑，这你还别不爱听。我总以为有可能是我的一己认识，最近我亲自与余杰谈了一次话，结果很好，在谈到你时，余杰说他不愿提到你的名字，更不愿意谈你的问题，那见解简单却精辟，不愧为文化人。他说：『高不仅是一个完全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听见了吧？你总以为就我一个人说你头脑简单，咱就不往远说，就看人家余杰，人家懂得进退，这就是有头脑的人。这一次，他很惊讶体制内还有我这样思想开明的人（**其实，这是于惯用的伎俩**），谈得很顺利，愿意与我们保持沟通。我提出希望以后每次有非学术性的文章或书要发表时，让我们政府先过目一遍再发表，人家很痛快答应了，比我想的要顺利。我有余地，你就有余地。无论利益上我们怎么让步，你好像听不见似的，我们没有退路，就会有你的好果子吃，刀把子不还在我们手里吗？老高，你太拧了，这是你个人命运悲剧的主要原因。把你掰碎了能捻出几根钉子来？给你好出路你不要，一个一个的机会被你堵死了，搁这慢慢地待着去吧。其实，有些事，有个软话儿，低个头，咱能给你立马解决，买个电暖器一插不就解决了，难道为这事还该我们磕头求你，你好好琢磨是不是这个理？给谁都可以谈，最近我们也找了范亚峰，他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历史上哪个秀才造反成功啦？』不愧为『小诸葛』，人家能心平气和地跟我们谈，美国人能谈，蒋介石能谈，有什么不能谈的？」

于海阔天空地扯了一大堆。我觉得没有必要跟他再扯下去，加上他也早就冷得受不了了。

对于谈话我从不拒绝，但也从未主动找过他们。在技术环节上的妥协也屡屡做出，他们所谓的「谈」即是沿着他们划定的道儿走，那不是谈而是「下达命令」，是其一贯蛮横使然。

我还是顶了他一句：「美国人能谈、蒋介石能谈是历史事实，但让他们接受共产主义制度，能谈吗？另一个历史事实你也清楚，那就是和你们没有谈成。」

「我原计划今天跟你谈一个小时，可我受不了这个（指太寒冷），再说好像也没有了必要。老高，我还是再留一句话给你，我们随时等着你给我们写信或者传话，留给你的时间不会是有限的。我走了。」于说完站起来就走。

这是于泓源与我见的最后一次面。

四十九、于泓源身上的诸多冲突存在

对于于泓源，我不想说太多，不愿对他个人带来不利影响。但从官的一面，他有着所有这种体制贪官千人一面的共性，即无所忌惮的腐败、无良、冷酷及无法无天和极强的升官欲。冷眼旁观，腐败无疑是他们拚死保护的制度之必然产物。而他个人的问题就在于他视腐败为理所当然，即便在我这个敌人面前亦无顾忌意识。他可以随时走进任何一家豪华酒店的最豪华套间。他每次见我，不是在高级会所，就是在豪华酒店。有时深夜绑架谈话完毕后，由孙荻、张雪用专车接来伺候他睡觉的人的画面还是令我吃惊不小。尽管我对中共黑恶势力的腐败是心知的，但腐败出这种气魄还真使人目瞪口呆，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将有些环节推迟安排几分钟而避开我的眼睛。

于先生看了这段文字切不可伪装得一脸无辜，说是我无中生有的构陷于你，2007年8月左右在昌平那次绑架谈话后的事，你一定会全忘了。

于身上有许多冲突存在。他凶残冷酷却异常爱他的女儿，他给我谈过他对女儿的爱，我始终以为这是他人性还究竟残存的证据。他对女儿的爱这一节常激动着我，尤其在囚禁期间，我对中共黑恶势力未来命运走向做个人思考时，这一节对柔化我的心有着颇大的影响。孩子是无辜的，身分关系是无法选择的，但于先生若爱女儿不假，就当2017年前做出符合这种爱的选择，否则，你会给孩子留下无尽的苦楚（于先生切不可以为我这是煽动你，更不当认为这是在威胁着要像你对待我的孩子一样地去仇视你的孩子。一个追求健康的人格者，是不会在心里留下仇恨及报复他人的琢磨空间的）。

于先生你对我这些年做了些什么，神看得清清楚楚，但神给我的启示画面里，你竟然并不必然地成为2017年后被追惩的前政权犯罪官员之一，而是启示你自己选择或他人伸手拉你一把，使你脱离危险。神颇使我感动和惭愧。如果你认为我是一个合适的伸手对象，我会毫不犹豫地向你伸出我的手，从病态和黑暗中站起来走向光明。但你终于没有能够抓住我伸向你的手，那是你自己的个人悲剧而已，无论你是否站起来，无论你是否抓住了伸向你的手，无论你有多后悔，而我有多少遗憾，究竟这中国大地上从来没有过的历史巨变终于将会发生。

于先生身上的另一个冲突存在，就是他以如此不明亮的一颗心去求神拜佛。从虔诚而神圣的层面上看，这是一个笑话，这是中国式的「信神」。他实际上是与「神」共谋作恶，共谋永远拖住黑暗，永远践踏良知。我过去结交过不少和于先生是归于一类的信「神」官员，逢庙焚香，遇「神」纳头便拜，双手合掌念念有词，这种「信神」实质上是许多国人狡猾行事习惯的延伸，这是最愚昧的「信神」方式。真正的神，你只有具备了内心的良善和光明，才有与神交通的条件。便是不信神，一个人也不可没有了内心的良善和光明。如果一个人的内心缺失了这两样东西，你纵有天下财富，你也是个不幸的人。信神为的是谋利，这是一种亵渎，是诬把神亦归于利竞徒一伙，使人饭喷。最近得一信息，说于先生被安排去做了管律师的司法局局长，你肯定为之有过不少的笑，但我依然希望你好自为之，为将来的命运有一些瞻顾。

五十、我能活九十四岁

另一次颇不投机的谈话发生时间我已经记不确切了，我印象中当是2011年中秋节前的一个上午。记得，囚室门被打开，有人招手让主哨前来，对着主哨耳言几句，主哨回身扬头示意副哨撤哨。他们刚离脚，进来一位类梁山「矮脚虎」式的人物。一般谈话者来了是先坐下再开始，此君颇出类，进来双手背剪挪动短粗双腿，先是在囚室逡巡一圈后，竟背对着我兀地一句：

「老高这环境能挺得住吗？还能撑多久？」

「我能活九十四岁。」我说，他仍在房里转着。

「啊，好家伙，九十四岁？这可惨了，在这样的环境中再关将近大半辈子，那得有点儿硬功夫。今年四十八岁了吧？」他继续踱着步，一副气昂神态。

我懒得再接茬，他又来了一句：「能不能谈谈？」

「这已不成问题了，我们已经在谈，若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谈的意义仅止于过程，何必再开启一个徒劳的过程？」我说。

我颇另眼相看此君，他昂然离去。

五十一、饭菜样二十四小时密封保鲜

这次囚禁中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有趣现象，即是每天给我送餐。这种体制下，一些过程有时颇耐人寻味，各部门之间在有涉我的问题应对方面是大有不同，给我最清晰的印象即是，只有北京市公安局将自己的脸谱制度化，凶残冷酷及无所顾忌。而只要换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就会有自己的考虑，共同的特征就是去制度脸谱化，以在与我打交道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全部门利益。只要脱离北京市公安局而换个部门，即都会在与我第一次接触中强调不同，都会告诉我他们的最大目的和最大利益是保证我的安全。他们只把看管我当成一项技术活，都强调不在乎我的身分，暗示上面给的任务是监禁而不愿意出事，强调他们对我无恶意，而双方不应该有冲突。武警部队亦不例外。

曾有多位领导进来强调，他们不管我是谁，只是在完成上面交给的任务，不希望与我起冲突。但他们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处理也颇微妙又直接。首先是，虽然将我交付给武警方面关押，而公安方面却在武警之上安排了个总监控室，对武警部队与我的日常往来进行密不透风的监视。而武警方面则也设立了自己的监控室，对囚室的情形进行全面监视，并且设立了严格的会见登记及签字程序，对囚室的一切进行着自己密不透风的监视。

这一次，名义上是部队关押，但关押点安排及食宿费用及食宿本身安排全归公安方面负责。对武警方面而言，饭菜由公安方面安排，就出现了安全保障的不确定性，因而就出现公安安排送饭菜，而武警方面每餐当面提存饭菜样并当面密封置冰箱内保鲜，每餐如此从无例外，每样封存物满二十四小时后弃置。这就出现了一个很畸形的现象，一个被当局视为头号敌人者，且被口口声声唤作畜生的人，安保措施却被畸形地拔高。

五十二、半夜体检及摁手印

2011年12月14日半夜，我在睡梦中被人摇醒，睁眼一看是六中队中队队

长，说接上面紧急通知，让我立即起床接受谈话。我起床不一会，门被打开进来三人，两人就是我前述文字中提到的「恶煞一郎」和「恶煞同一郎」，另一官员模样者倒背双手站在桌子后面「一郎」提着手铐「同一郎」一手提着黑头套，三人进囚室并不说一句话。我被示意站起来，两位「恶煞」走过来扳转我的身体，将我压坐在床上，然后煞有介事地开始拍摸搜查我的身体。有一人蹲下搜查我的下半身和鞋袜，搜查完毕后将黑头套套在我头上。然后，两人将我的手拧在背后给铐住，我被架了起来，感到自己被架出了门，又开始架着上楼梯。我感到自己被架着走出了门外，这是二十一个月来的第一次，一股凉爽通灌身体，第一次在户外听到警犬「小癩」雄厚浑实的惨人的嗥叫声。我被架上了车坐下，左右各一人压着我的肩膀，汽车开动，一路无一人说话。

汽车行进两个多小时后停了下来，我被架下了车，然后感到被架进一个门。

「妈的低头。」终于听见有人说话，后脑勺被人狠劲往前压了一把，我们站在一个地方。

「还是把头套给取了吧。」又有人说话了，我的头套被取下。

我发现我站在一个很空旷的大厅中央，左右各立一人抓着我的肩，我远视一眼，发现这是一处庞大的医院挂号、划价、收费大厅。「一郎」又蛮横地一边喊低头一边伸手扳压我的头。这时，又走过来数人，后面跟着一群警察、有录像、照相者。领头的是一位老者，颇儒雅，后来知道他是那所大医院的院长。

「人全部到齐，上去吧。」那位老者说。然后，他转身前行，我被人押着蹒跚其后走。

上了二楼，听到身后有人说：「应该给他把手铐取了。」

到了一个挂着「抽血」的牌下，一群人停下，有人从后面开手铐。我被搀到抽血桌前，一位女士在口罩后面发话，说：「给你抽血化验。」

我终于明白这半夜把人架出囚室原来是要做检查，这种体检，我只须跟着走即可。从我看到的现象倒推，这次体检是至少提前一天即安排好的，由院长带领指挥，凡要涉及的科室，必有人早已守候在那里，整座大楼，每上一层，只我一位「就医」者。显然，这种安排意图是，天亮前对我的体检必须进行完毕。所有人员都是黑夜赶到，而到场人员则有中共公安系统、中共司法系统及医务人员三方。我无须动脑，架至那里检查即可。

只是，在耳鼻喉科检查时，女医生突然惊问：「这人声带怎么成这样啦？」四周静寂无语，那双惊异的眼盯着我。

「我已经二十个月没发声说话了。」我说了一句算是回答了她。

心脑检查结束后，「一郎」又给我套上了黑头套，双手又被人拧在背后铐了起来，开始有人架着我下楼。

汽车在路上颠簸的时间很长，我并不知道要被弄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会不会又回到那个被囚了二十一个月的地下室？终于又听到警犬「小獾」那熟悉的嗥叫声。大致上是因为已到了白天而塞车，故而导致了远远长于去的时间。我又被架着回到那个囚室，已到了十二点多钟，证明了在路途颠簸的时间有四、五个小时。站在一旁的哨兵见我回来，就很关心地悄悄询问我外出几个小时的遭遇，说：「很多士兵都关心你的下落。」

回到囚室，我想又要开始较长一轮囚禁，亦做好被长期囚禁的心理准备。不料，当天夜里到了睡觉时间，又有军官进来通知说：

「上面来电话，让你先不要睡觉，说要找你谈话。」

大约夜里十点钟左右，囚室门被打开，进来的还是昨天夜里来的那三个人，并不说话，那头目在桌子上铺开了几张纸，说了句「开始」，那「一郎」和「同一郎」过来就把我挟在中间，然后就抓住我的手，把我的手全掌压在一副黑印台上，使我手上各指都蘸上印色，然后强行抓住我的手开始往他们铺好的纸上摁手印、掌印。我看那些纸都是空白的。我迄今不知这次「摁」了那么多手印的意图。但我也从未因此生出过心理顾虑，任何计谋、手段亦无法染黑了我的心，更别说卖身。

五十三、秘密囚禁的终结

2011年12月16日早饭刚过，囚室门又从外面被打开，又是那些人闯了进来，又对我进行了搜身后给戴上了黑头套，手又被背铐起来，我被架着出了门。

没想到这竟是这次秘密囚禁的终结。这一幕我曾经梦到过，哨兵恰好就是梦里看到的湖南籍士兵「周老英雄」，但当时我浑然不知要去做什么。

我又听到户外的人间声息，又被架到车上。这十年里，我在秘密警察手里，无论坐车时间有多长，他们绝不会因为在车里面而取下我头上的黑头套，车上坐着被背铐着是很不好受的，因为无论多累你也不能向后靠，况且更多情况下还有人在你背上压着，将你身体压成躬身状。

车在路上走了有两个多小时，我的内心在这种过程中从不做任何揣忖，不

想，是那种状况里最符合利益的选择。汽车停了，竟然在车上抓下了我的头套，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破例。

「一郎」几乎是咬着牙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妈那个X，你丫的一会儿下车要是敢把头抬起来，一会儿回去有你好果子吃。」

我不愿在一些非刚性原则的环节上招致激烈冲突，下了车，我没有抬头，仍被他们俩架着前行，但我的余光发现，一下车走了几步后路两旁镁光灯闪烁，并有许多录像机在录像，我就抬头平视，那阵势足够壮观。

进入一栋大楼，楼道两旁几十米的距离内足有几十名穿警服的人员，各自在忙碌着摆弄手中的录像机、照相机。偶有一两名穿黑蓝西服的男女间杂其中，而胸前缀饰有检察院或法院系统的徽标。我颇诧异，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推架至一个房间门口，两位警察上前来替换下了那两位「恶煞」后将我推进房间。一进门才发现那是一个小型法庭。

我一进门，两位警察左右搀扶着我至被告席，我明白这是要「开庭」了。几位「法官」正襟危坐，是清一色的女「法官」。法警打开了我的手铐，「法官」问了一下我的家庭、住址，突然说现在「开庭」，全体立起；一起立就念了一份裁定书，说我在缓刑考验内继续不思悔改，违反监管规定，经北京市公安局申请，撤销缓刑判决，改为实刑并予收监。一念完就说：「现在签收裁定书。」法警立即扭转我的身把笔递在我的手中，签完字即把我押出法庭。前后时间，我印象中绝不超过两三分钟。

五十四、「司法程序」背后的身影

我当时心里突起两个词，再多一个字亦属多余。一个是「贼」，这是在那种氛围里最恰切形容当局的一个词，再多一个字亦属多余；一个是「水性杨花」，这是在那种氛围里最恰切形描「法官」的一个词。但我终于没有说得出口，因为三位「法官」全是女性。这一点上颇显于泓源的老到，他心很细，很了解我。

一个「贼」字，任何经历那个过程的人，除了那些贼的活道具，你不可能找到比这更贴切的词形容他们。整个过程，你感觉到这就是个做贼的过程，是由一群贼操办着这一切过程。所不同的是，这是一群头顶着国徽的贼。但贼终于是贼，无论他们啸聚的场面有多么大观，头顶上戴的是什麼，究竟无法掩隐流在血脉里的贼的怯惧。整个过程，表面看是一个法院的庭审过程，但这个过程中唯一

不被顾及的就是法律。我在你的黑牢里，从物理层面上看，我全被掌控在你的手里，基本的法律程序便是再不耐烦，硬着头也该走上一遍，你怕什么？

「依法治国」是你们自己死皮赖脸要挂着的人相，一个颇受关注的案件中，连装都懒得装一下。最起码在法律程序上，你应当提前三天将开庭书面通知我；法庭上你至少当确认一下我的身分，告知我当有的权利、义务；最起码也应该公布一下「法院」及「法官」的名字，询问一下有无回避请求；至少也当问一下北京市公安局指斥的违反缓刑规定是不是事实，询问一下我对裁定的意见。全部过程就是等于给你送达个早已打印好的裁定书。我算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于泓源的人之一，从头至尾，这个「司法程序」都能看到他的「身影」。这是一个法盲，没有比「法盲」这名词更适合于他的「执法者」身分。

我曾在东北大法学教授王玉琦诉姚志萍案开庭时说过：「中国法盲最集中的人群是我党的政法干部队伍，其中最顶级的法盲群体是我党宝爱的法学专家教授。」

在我的案件中，中央领导同志周永康是项目组组长，实际上他并不具体管这个案件，他只是定基调、定框架，具体操办这个案子的实质就是项目组组长于泓源。他曾在2009年5月份的一次劝说我换一个秘密身分被「强行送出国」的激情演说中，踱着方步，一副气昂昂状，激动中说了许多有气魄的话，其中：

「你还没有最后得罪我，就等于没有得罪国家，你要是惹恼了我，就等于惹恼了国家。」

这气魄是怎样的雄大！他可以以项目组组长身分搏捏所有程序。

这里最令人哀伤的是中国的「法官」们，便是为了个人尊严故，亦应当坚持进行表面上应有的程序。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不仅是职业身分上有着毫不掩隐的水性杨花，最令人失望的是他们个人人性方面的水性杨花。职业尊严、个人尊严一泻千里，而全然没有了挣扎的冲动。他们在「法庭」上个个昂首挺肚，这是令我痛心的另一个理由。在这样一个干脆的反法治过程中，做出这般姿态，这要有着怎样客观的无耻底气？被一个愚昧而凶残的秘密警察头子搏捏在手中，不以为耻辱而竟当作荣耀，这是怎样的一种人格失守和损毁？但这一群贼的「法律剧」表演还没有就此休止，而更令人目瞪口呆的贼行还在后面呢，只是其时，我连目瞪口呆的条件都被剥夺。

五十五、裁定书不过是块遮羞布

两三分钟的「庭审」出来，我实在憋不住了想要解小手，因为他们是突然来到囚室将我架走的，没有来得及上厕所，所以在去的路上就憋得难受几次请求，却被呵斥。可这人道能力实在不能被喝退。「法庭」出来，我立即又提出上洗手间，但被拒绝。

我很快被押上了车，车门一关，他们立即撕下了人相，先是给我戴上了头套，然后打开手铐将我的手拧向背后铐住，我将裁定书捏得紧紧的，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看他的内容，我担心他们一会抢走这份裁定书，我知道于泓源、孙荻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2006年12月24日的判决书就是他们后来在家里给抄走的。

果然不出所料，他们故伎重演，突然感到有人抢夺我手里的裁定书，我颇惊异我那时的手劲，竟然没有成功。但反抗只剩情绪和本能，便是把这两样发挥至极致也决然徒劳无益。我死攥着不放，究竟还是他们的经验精到，「刺啦」一声，有人捏紧我的手铐，骤至的巨痛使我立即松了手。他们成功了，那裁定书永远离我而去。其实，那裁定书对我毫无价值，他跟国家司法审判权力没有关系，只是中共黑帮的一块遮羞布尔。即便如此，戏刚演完他们就抢了回去。

五十六、武警部队离心离德

汽车终于停了下来，我被押下了车。下车前竟又给抓下了头套。我被押进一座大楼，楼道又是许多穿着制服的摄影、录像人员，二位「恶煞」推着我走进了一个里面全是警察的房间，这是我由不挂牌地狱转向挂牌地狱的开始。

终于，我结束了在部队的秘密囚禁，在中共武警部队秘密囚禁两年（其中榆林武警部队囚禁三个月，北京武警部队囚禁二十一个月），我称之为「不挂牌地狱」。我先后在十年时间里，累计被囚禁竟达七年时间，在不挂牌地狱的近四年囚禁，其中二十四个月就在中共武警部队的囚禁。

这在部队的两年囚禁颇为特殊，特殊就特殊在这种囚禁是由一群士兵看管我，他们与中共秘密警察不同。警察群体虽然与他们一样是中共黑恶势力在中国恣意抢劫和压迫的工具，但不同的是警察群体本身亦属这种抢劫和压迫结果的分利者，尽管与中共黑恶势力的核心层群体相比，警察群体的分利所得充其量是点残羹冷炙，是权贵集团居高临下扔给的一点牙惠，但究竟与武警士兵的纯义务助

虐有着本质的区别。从我这几年的经验看，中共对这两个打手集团控制的手法也截然地不同。对于警察群体，一方面给予他们一点分利，另一方面则给予他们几近无法无天的特权，其限度是不能过分影响到整体的抢劫和压迫的长远秩序。而对武警部队的控制策略则是予干部以利而予士兵以力，这力即是赤裸裸的力量压迫。

抢劫是中共权力产生的基础和目的，而抢劫的落脚点则最终量化成具体的利益。

士兵的群体太过于庞大，而暴力则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且无任何成本和完全环保的资源。正如大学生士兵陈杰说的那样：

「我们不把我们当人看，我们就不会真心实意地为他们卖命，我们在一起都是表面的，大家实际上是貌合神离。」

正是这种「貌合神离」，几近致全体士兵的离心。谁若给我透露一丝军队的信息即会招致惊心动魄的暴打，而士兵这种外泄信息的冲动从不源于你向他们询问什么，而是他们「排除万难」的外泄冲动。对于信息的获得及传播已成了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但我从不主动向士兵打探任何信息，甚至从不主动与他们说话，这是这种特殊环境中特有的自处之道。士兵年龄都很小，绝大多数连小学都没有好好上完（**尽管他们人人都能亮出入伍所必须的初中毕业证**），这也是他们不假思索地把自己心里那点「国家机密」随意泄露的主要原因。无论基于什么复杂心理，但有一种心理是共同的，那就是一种掌握了「国家机密」的、是那个年龄阶段会有的、近乎神秘感的心理优势。我那信息获取的时间跨度也足够地大，绵绵盘桓两年。两年的时间，足够形成对这「威武之师」全貌的基本印象。

五十七、「威武之师」的三大项目工作

作为整体，这支「威武之师」常年经营着三大项目的「工作」：其一是不敢有须臾懈怠地邀媚表忠，以在卑怯和猥琐中维持其奴隶地位；二是利用普遍存在于各个阶层的「阉狗」们控制部队，不舍昼夜地维持自身的「稳定」；三是作为中共黑恶势力掌握的主要暴力工具，随时在各种「维稳」过程展示他们的愚蠢、冷酷和残忍。

1. 邀媚表忠

对于向中共黑恶势力邀媚表忠的主要是武警上层领导集团，这些领导集团本身就是这黑恶势力的有机构成，在整个黑恶势力的利益经营中，肩负着暴力工具的保障及控制工作。在这种经营中被喊得最响、最普遍的一句话就是「武警部队永远忠于党，永远听党指挥」，这是一种怎样干脆的无良及无耻！并不富裕的中国纳税人为他们提供着从锦衣玉食到手头弹压人民的装备，而他们整日耀武显威的权力基础，则恰是全体中国公民的被迫让予。

2. 阉狗们的维稳

便是畜生，极少有认错主人，更少有不认主人的。中共军队的道义水平或认识能力绝不在畜生之上。而他们对军队自身「维稳」目标的经营绝非空穴来风，然而这是他们长期与人性、人权及人的基本尊严为敌的必然结果。军队作为暴政体制苟延的工具，如果他自身的「稳定」成了其日常经营的主要目标，他作为军队本身当具有的能力则大打折扣。作为「国家」武装力量而言，他们还有没有力量，各方都心知肚明，历史已经无数次教过我们，近如萨达姆的「精锐」共和国卫队，当真正临到剑与火的阵势时，鸟兽散是他们这种「著名」的「精锐」及「威武之师」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能力。但他们就真的没有力量了吗？不然。面对手无寸铁的和公民，他们不但有着力量，而且很有力量的，当年的天安门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时，这支「威武之师」就创下了零伤亡的骄人成绩，这焉能是非「威武之师」所能匹比的？萨达姆的「精锐」部队被美利坚军队打得永远地「化整为零」是真实的；而他们当年一夜之间杀死五千库尔德人的纪录也是真实的。作为中国黑恶势力继续绑架中国人民的暴力工具，作为继续中国黑恶势力控制国家的维稳工具，这支「威武之师」究竟是有力量的。

3. 凶残镇压人民

士兵讲述了许多有关这支「威武之师」在凶残镇压人民和抗争方面的具体事例。一些士兵及士官大都讲到了三次大规模的暴力镇压事例，可惜具体地名我已不能确切记起。只记得一次是在湖南，一次是在安徽，另一次是在甘肃甘南。从多名士兵、士官的讲述里，我们得出几个方面的共同点：其一是一点「动乱」多点集结镇压；以安徽为例，一无良富商驾几十万的豪车撞死一个小孩，下车后面色

从容，行若无事，激怒了围观人群，指责他冷酷无良，结果他来了一句：「死个小孩有什么大不了的，大不了三十万元钱。」这证明了中国富人的又一共同特质：愚蠢。他立即遭致了围观者的围攻，由于他无能力抑制的蛮横与跋扈，导致事态升级。这土豪是当地地级市超市的垄断式经营者，愤怒的人群越聚越多，终于升级为开始砸抢这土豪的大型超市事件。在北京运士兵急往安徽的飞机上，军官向身边的士官讲述说，从卫星图像看，同时急急赶往安徽参与「处突」的武警部队有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及北京等几十支部队。

其二是集结不拖延，一地出事，武警总队迅速下达指令，各参与部队迅速进攻，不计较成本代价。

其三是到了事发地的镇压出手迅速，不犹豫，不拖延，力止事态的蔓延扩大。

其四是镇压手段纯暴力化和黑帮化。据参与过多次「处突」经历者讲，每次赶到事发地点前，或在途中即部署完毕镇压现场分工，而穿着武警服装而身荷械具者只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到现场的官兵都穿着便装，他们都会佩戴同一频率的微型声话耳麦，装扮成围观人员混入人群伺机以动。最令人目瞪口呆的规律是，有一部分官兵会扮饰成「闹事人员」，他们的任务说了令人难以置信，是以最快的速度使和平聚集、和平表达的局面结束，让局面升级为「暴力抗法事件」或「打砸抢」事件。因为让和平聚集、和平表达的时间一长了，担心人员越聚越多会使事态在质的或量的方面都发生不可控的局面，因而，已接受了这种特殊任务的官兵，就会成为「闹事人群」中态度最坚决、胆子最大、情绪最激动的「闹事者」，他们往往会有「壮怀激烈」，甚至会「声泪俱出」的激情表达，使人群中的激情汹涌、激愤之情难抑。当此之时，这些特殊的「闹事者」就能成功将事态升级为「暴力抗法事件」或「打砸抢」事件，那些穿着警服的、「闹事者」的战友就会立即出手暴力弹压，大规模地抓捕已「名正言顺」，只是抓回去的「闹事者」人员中，有一部分不仅不会受到处罚，还会论功行赏。有一个士兵说，他在安徽的「打砸抢」过程中「弄了一兜高档打火机」。了解这些惊人的内容，真使人不知说什么好？说什么才能恰切、完整地表达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情？

五十八、取缔法轮功者的崇拜

与这支「威武之师」两年的「无间」相处，了解了太多的令人难以置信。另一个难以置信，即是这支「威武之师」这些年来不为外人所知的，在与神鬼办理交涉的过程表现得甚至令人啼笑皆非的虚弱。

中共黑恶势力表面上是不承认神鬼的存在，这不仅是他们的愚昧，更是他们的不幸，也是使他们及为数不少的国人终于无底线堕落腐败下去的最大原因之一。今日，稍有人类文明常识的人都知道，神是人心灵的安慰和力量。没有信仰，人就没有了生命的根基，与树没了根基即必枯槁同理。一个无信仰的人，其生命与雨中飘萍无异，没有自主的方向。最主要的是，不信神的人，他（她）终生缺失一种能力，那就是内心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冲动及能力。

共产专制政权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愚昧政权，便是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皇权，无一例外地至少在表面还承认其权力来源于神性，无论基于何种冲动，首先他们承认神，更不会反对人们对神的信仰。共产专制政权在对待宗教信仰问题上，造就了体制内人员的多面人格，许多官员一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焚香拜祭，以裡他们自己心目中的神。许多官员家里常年薪火不辍，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我曾在中国北方一家著名国企党委书记家卧室里发现李洪志先生的挂像及像下三柱燃香，而他在单位则监管着对「法轮功」的取缔工作，当然从这个恶党的角度而言之是一个具体的失败，但他本人的信，则极大地缓冲了冷酷的镇压运动在这个大企业造成的损害程度。

五十九、花样百出止鬼闹

中共武警部队与神鬼「作战」的趣闻，士兵（官）讲了许多，而具体事例的讲述是多不胜记。这里仍作为趣谈，纪念这支「威武之师」作为整体与神鬼作战的「伟举」，以与关心我的人一道分享这些趣获。

按士兵的讲述情形，这种「邪事」发生的时间都是在中共妖人江泽民做了总盗跖后开始的，各地「妖事」蜂起，真若不是亲耳听了士兵的讲述，则极使人诧异。首先是从1990年起，各省武警部队鬼闹事件普遍而高发，而这支「威武之师」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甚是不堪而又束手无策，而终于，还是北京武警部队经

过各种方式的试验，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据士兵讲，一些莫名其妙的怪事很普遍地发生，诸如：哨兵好端端站在地面上站哨，头脑一模糊却发现自己哨位竟在地下室，可监控器则完全空白；有时哨兵从二楼下楼接哨，走一两小时竟到不了一楼；有些女兵宿舍睡上层床铺的人，常莫名其妙地从上铺跳下，有的竟双膝着地致伤，而自己不知有这过程，从头迄尾犹在酣梦中。至于国家档案馆的鬼闹事件则更是让哨兵心惊胆寒，但愚昧官员群体的应对措施仍是僵化的「不信、不传、不议论」。

据说，有一次监控器拍摄到一通体白衣女子与哨兵贴身并立，但当局有他们不信的「办法」，他们竟然给当班的哨兵以上哨时间带陌生女子聊天为由予记过处分一次。据士兵讲，这个处分是上面决定的，因为当时的当值军官接到报告后曾与监控人员一起赶到哨位查看，而并无那女子旁立，而回到监控器上一看又赫然旁立，军官当即用对讲机又一次询问哨兵，旁立的女人者何人，答曰：「无人。」结果，后来没有人敢单独站哨，因为常有档案馆里莫名其妙的哭声、笑声、尖叫声传来，吓得哨兵魂不附体。

士官郑军就讲到许多奇异遭遇，其中一次，他在半夜站哨时，旁边水稻田里竟突然走上来一个女人，手里拉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孩，他说这种事太反常识了。

事实上，全军各自为阵的应对措施花样百出，但终于没有能够止绝这「鬼闹」。例如，档案馆里的应对之举先是双哨，而又双哨附近旁掷桃树枝（**他们曾在我的拘禁室长期放置桃树枝，并多次有士兵听、看见些灵异声响或影像，可我从未有过类似的经历**）。甚至曾有一度时期，给每个大队、中队部队门口上方悬置大型国徽牌子，说国徽应该是正义的象征，而且国徽天然地代表了正，且中国的国徽又是鲜血色红，必能镇压邪孽；结果，这种代表了「天然地正」的牌子在各单位门口悬置后，闹鬼事件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凶。

又有些部队在「鬼闹」灾害频发的情况下，干脆将部队整个营房涂成了通红色，据说效果彰显，于是通过电话而不是下达文件向全军推广，使全国武警部队的营房颜色全部涂成红色；可没有多长时间，「鬼闹」事件又复活如初。然而，最终成功镇住邪僻的却是一些女兵宿舍的偶然尝试：她们抱着侥幸，试着在宿舍门口左右各旁置一只小石狮子像，竟止息了「鬼闹」。「捷报」迅速传开，说武警总部迅速用电话向全军推广（**说有关领导以为这种事是不能以文件形式推广的**）。据说，武警军校学员和各部队的见习军官以及士兵、士官的红色肩章，在起初的设计动机就是为了取红色而避邪。据此，这支「威武之师」终于摆脱了

.....

十几年的「鬼闹」之苦，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当然，任何伟业的成就都难免要有曲折或走弯路：双哨；双哨而旁掷桃树枝；用国徽代表的「天然的正」悬置在各单位门口；而又将全军营房涂成通红色；而又全军各单位营房总大门口左右侧置石头狮子雕像；加之全军绝大部分成员的红色肩章。据说，全军镇妖取得成功后竟使中共顶层妖人江泽民大喜，说曾在一些场合的闲聊中提到此事。不料没出多久，全国各大部委、各大企业、各大银行，地方各级政府竟竞相在各自单位的大门口立置石头狮子雕像，很快而为全国各行各业效法，竟使石狮雕像的气魄越做越雄大，同样意外雄大起来的还有石狮雕像的加工制造业。

六十、中共纪委的反法治恶行

二十几个月的军队囚禁生活，从武警官兵那里获得的另外一个大见识是关于中共纪委的。在这以前，我与大部分国人一样，只晓得中共纪委有一项「双规制度」，实在没想到这「双规制度」作为一个政党，即一个社团组织内部的，对其成员的非法律性约束规矩，执行过程竟会显出如此无法无天的野蛮气魄，他竟干脆就是一套国家宪法及基本法律体系外的办案系统。

司法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一极，其以在一国内法域及司法权力由宪法及基本法律确立的司法机关来行使和独立行使为其主权标志。一统法域意味着在同一国土施行同一实体法律，以及办案程序由法定的侦查、检控及审判部门专门行使，这既是国家司法主权的完整、正当、健康及一般体现，亦属当今人类普遍的法治文明形式上的一般体现。在国家司法体系外「办案」的可能只有一种，即是黑帮行径。普天之下，任何在国家司法权力之外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都是践踏国家司法主权的行径，都是反人类文明的行为。中共纪委系统的直接办案，是在国家宪法确立的司法体系外的反宪法行为，其直接侵蚀的就是一国神圣的司法主权，说文雅点其没有程序的正当性，说直接一点，他就是一种野蛮的反法治的恶行，是一种公然分裂国家主权的行径。单是强行带走党员干部之一举，就是对公民权的野蛮践踏，而却并不止于此，这更是野蛮践踏国家司法主权的行径。

然而，中共纪委办案并不止于将人强行带走一节，他们会对你以秘密关押，包括对被「双规」人员的亲人封锁消息。关押期间，对被关押人的人身、人格尊严以及人的基本权利视为空物，而对被关押者施行酷刑、变相酷刑及人格侮辱的

野蛮暴行非常普遍。据士兵们讲，最惨的是那些省、部级以下官员、涉嫌行贿人员以及涉黑嫌疑人员。说对这一类型人员的酷刑，变相酷刑、侮辱人格及日常性殴打是家常便饭。有个士兵（暂不写出其姓名）讲，有一个局级贪腐嫌疑人被抓后，由于他「不配合」，士兵站哨被撤出来，由打手进去将他带到另一个房间（每个纪委办案点都有若干专门的打手待命）。没料到，这哨一撤就是一个星期，打手四班轮换，与那人吃住一起。一个星期后，那人被人架了回来，他的脸部肿得像变了个人，已不能独立站立。

还有些被关押者，士兵说他们（指纪委）办案的办法特别多，对有些不交代者，他们有时也不打你，但绝不让睡觉，这项任务交由士兵执行。说一般不超一周，那些人大都会跪着哀求，说只要允许睡觉，什么都愿意交代。在这种不允许睡觉逼交代的过程中，纪委人员整天游山玩水，至多偶尔来问士兵一句：「那臭狗屎开口了没有？」若回答说没有，来问的官员大都是来一句：「耗丫的，慢慢耗着保证开口。」

士兵们讲，每个纪委办案点都设在豪华高档宾馆或旅游风景点上，几乎都是常年包下一座宾馆。像中共中央纪委在北京一个叫癖山（音）旅游风景区就包下一座极具规模的高档宾馆。从士兵透露的信息中，常有一号楼、二、三号楼的说法。很多士兵最羡慕的是纪委人员花钱的大方，他们说光每栋楼每月的租金均不低于一百万元，而数百士兵，一两百办案人员的吃喝花销，真是按士兵的说法：「花钱就像烧纸一样。」

又说每个办案点上都配有若干个抓捕组，抓捕组清一色的由武警士兵组成。每抓一个新的嫌疑人，接下来的几天是抓捕组最忙的时候，有时忙得晚上都不能睡，抓捕的人员范围根本没有仅限党员干部，他们说纪委办案说抓谁就抓谁，一般是先抓嫌疑人的配偶、子女，抓来只是说让他们配合办案，其实一样地关押，然后抄家组带领士兵去抄家。接下来就是抓嫌疑人的情人、行贿人、涉案的亲属及其他人员。尤其涉黑案件中，有时一案要抓捕一、二百人，每个人都是单独关一个房间。有时抓人不是为该人与案件有何干涉，只是因抓嫌疑人时该人在场，为了暂时地保密而把人抓来关起来，待可以公布案件时，有关人员会找到该人，硬话、软话都说一些，放出去的人一律悄声而不敢就此讨个说法。像陈韶祖被抓时，一同陪他来北京「开会」的秘书就被以案件需要保密为由关押了六个月。六个月期间，对秘书不予任何询问。如果不在部队被囚禁两年，我与所有国人一样，只以为纪委办案虽然没有程序正当性，但仍觉得那只能是他长期的愚昧、长

期无法无天的习惯使然，这证明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天真。以陈韶祖案为例，人们可以从中共读出很多信息，据此明白中共为什么不惜公开破坏宪法法律，而如此热衷于「办案」。

有一位大学生士兵说了他的观察，说陈韶祖案的偶发因素是黄光裕的偶然交代，而黄既已供出就不能不处理，但中共高层在这方面的「智慧」真的是异于常人，他们说这个案件有最高领导的批示，说首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党的形象，仅以黄光裕交代了的那一笔为限，不应再扩大案件范围，不仅不再扩大陈韶祖案件的贪得数额范围，更不再扩大本案涉及的其他贪官，以最大限度地保这丑恶党的形象。陈韶祖关押期间竟配有专门的厨师，由其点菜，他与中共纪委是有默契的，既不用交代个人的其他贪得事实，亦不交代其他人的贪腐行为。因担心查出的数额太大，贪官太多太刺激国人的心理而影响党的形象。

另一方面，在有关惩治贪腐的问题上，中共纪委是提前在法外给案件定下基调，括定框架，然后口头向检察院、法院领导下达指令，只须给纪委已办结的案件套上法律的外衣，而不得再问及纪委未涉及的数额和人员。说有些贪官贪得几亿、几十亿、上百亿，但最后都会按几千万元定案，说几乎每个大案均如此。实际上，凡是涉及官员的案件，国家司法机关实质性的办理案件权力全被中共纪委剥夺，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莫大耻辱及遗患无穷的黑暗现实。

六十一、反腐能不能进行到底是个伪问题

中共最近又一次提高嗓门儿喊着说又要依法治国，帮凶及帮闲文人，以及泱泱大国的愚民又找到了欢呼雀跃的理由。一个做了大半辈子的妓女可以变为贞女，而中共永不会依法治国。在中国，真的实现了依法治国，对于中共而言无异于拔恶狼牙而断恶棍手足，人们可以绝对地嗤之以鼻。

当年，在中共对外介绍习近平先生的在职法学博士学历时，我是不假思索地嗤之以鼻的。需要在此澄清的是，我当时不屑的，却非系怀疑习先生在法学方面的卓荦大才，而是中国对在职官员的博士授送机制。今天看来，当时把这两样东西都扫入一丘，而一同伺以鼻音亦无有风险。

共产党对待别人，动辄祭出「听其言，观其行」的手法，而对于中共本身，全世界都知道是不能听其言的。「依法治国」，他早就写进宪法，而写进宪法的岂是一般的放言？然而，凡是文明人类目前该有的，他几乎全都写进了宪法。不仅公然阻止这些公民宪法权利的表现。宪法权利的兑现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国家

的宪政机制。中共抢得政权迄今已六十六年，别说建立宪政机制，连「宪政」这个词都成了敏感词。

在今天的中国，敏感词是「见不得人的词」的别一名称。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在不大广泛的范围内谈谈宪政，竟被中共党媒点名批判。「反党」、「抹黑中国」这样的无耻大棒舞得气壮如牛。就说习先生的反腐，三年下来了，可曾在机制上或是在技术程序上有过趋向法治的冲动？对于官员的「双规」，可曾顾忌过他们的公民权利？他们首先是中国公民，其次才是党的官员，可曾考虑过任何公民未经司法机关批准不受逮捕，以及任何组织及个人不得凌驾于宪法及法律之上这种最基本的法治理念？

在中国，常有人「失踪」，尤其是官员。一般人的「失踪」没有官员的「失踪」幸运，绝大数「失踪」官员（**自杀者除外**），一般过上一年半载以后会以贪官面孔露面。叫骂声及叫好声交相喧嚷，唾骂贪官而褒扬「习大大」，而这种喧嚷声遮没了的是这种「办案」方式的黑帮化，忽视了这种「办案」方式对中国走向法治文明愿景的毁灭性破坏。「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才是中国问题的真正沉重面。与之相比，抛弃共产党专制反倒成了技术性问题。

其实，习的反腐已有近三年，完全可以结论的是：其一，他全无将反腐纳入法治程序的冲动，更别说是理性的设计；其二，他的反腐，从根本上仍是为了保住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地位，谁在这问题上怀疑他，那是猪脑狗眼。对于中国今天的黑暗现状而言，腐败问题只是技术性的，黑暗的根本性导因是中共的独裁统治。贪腐灾祸与专制独裁的关系是毛与皮的关系。便是彻底地剪去毛，亦不带来毛被根灭的后果。习的反腐能不能进行到底是个伪问题。有人认为说今天的中国无官不贪是个极端说法，持这种观点者，即便不是贪官，亦是有着与贪官一样的猪脑狗眼。今天的中共政权，贪官污吏是其政权构成的全部基础，彻底反腐等于颠覆其政权，这绝非「习大大」的本意。

习先生当是个头脑清醒的人。首先，他的反腐是技术性的，且亦唯能是技术性的，不仅不敢去触及这必然滋生繁荣腐败的黑恶制度，而且对举世闻名的真正巨贪，如江泽民、李鹏、贾庆林、吴官正、王乐泉等一干人仍礼敬有加。习弄掉几个如周永康、徐才厚等小老虎，而反腐的考虑只是个外衣。立威、剔除异己及展示有限的狠手段才是他从以前的其他党首那里继承来的本领。

中共历史上，唯有胡耀邦、赵紫阳两位党首没有「杀」同僚立威，结果如何？毛泽东的凶残恶辣不须赘笔。邓连拿下三任党的主席，且都是现任主席；江阿斗、胡黏儿也都有过拿下政治局委员的小手段。今天，有人将习先生与毛、邓的名字并提，这首先是习先生自己的不幸，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罄竹难书，在人类历史上亦是空前绝后的。而今天中国的全民腐败现状正是邓改革的结果。我们显然不能否定改革本身，而邓式的改革则是今天中国灾难的技术导因。

第八章

走向挂牌地狱

2011年12月16日，我暂时结束在中共不挂牌地狱的累计近四年的囚禁，开始了在挂牌地狱的为期三年的生活。这一天，经历了近两个小时的路途颠簸以及两三分的「法院」「开庭审判」过程，我被二恶煞在路上抢走「裁定书」后，押进了一个里面全是警察的房间。这是秘密监狱与公开监狱的一次交接过程。

一、与挂牌地狱掌管者的交涉

我开始与挂牌地狱掌管者的第一次见面，第一道程序与不挂牌地狱没有不同，剥个精光，但究竟比不挂牌地狱要「文雅」些，我理解为这次的剥光赤身交接程序是在秘密警察与中共司法部之间进行的。这个程序很短促，随即我被另一群警察带走，走进了「北京监狱中转站」。当然，进了这座监狱的第一个见面程序依然是剥光衣服，警察解释说这不是专门针对我的，说是所有的监狱对一切犯人的老惯例。在剥光衣服后宣布必须穿着统一的囚犯服装，这个过程是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进行的，始终有不低于六人的警察围着我。那个房间当是临时腾空的，房间正中央放一张单人床，床的周围摆一圈椅子。囚服换完后他们让我坐在那张床上，一圈椅子上都坐满了警察。其中一人佩戴着耳麦，胸挂微型录像器，这是我进入这挂牌地狱就开始了的一项特别「待遇」。

坐下后我再次向他们提出交涉，要求他们出面索回我被抢走的「裁定书」，他们答应很快进行交涉。因为我并不知道接下来他们对我的「服刑」生涯会做怎样的安排。对于普通囚犯应有的相关程序方面的知悉权利，对于我则不仅完全空白，有关环节的告知义务全变成了他们禁止性纪律，从这一天起，一直至四天后来到了沙雅监狱被摘下头套，我才知道自己到了那里。在刻意营造神秘氛围方面，中共司法系统与秘密警察的行径当归于一丘。

我坐在那单人床上，众警察犹众星捧月般围定而坐。警察究竟比士兵自由得多，士兵不仅不能坐而且禁止说话（事实上，士兵的说话从未被禁止得了，但绝对不能发出声，连嘴唇也不能动，只能咬着牙「说」）。他们的所有话题都说的是调工资、级别待遇以及买房有关的事。这一天时间里，我数次就要回

「裁定书」问题、秘密关押期间国保抢走我大量的个人财务，包括一箱价值九百多元的书的问题，以及家里的钥匙被他们强行拿走的问题进行交涉，他们每必客气地答应，后来才知道他们那是在敷衍，只要拖到明天就与他们没有了关系。

其间，有人拿来一本《穆斯林的葬礼》，不管书写得如何，这对我而言是非同寻常的，我已有近两年的时间没有见到人间文字，许多文字也想不起来了。尽管我在部队囚禁期间曾努力过，每天安排固定的时间来以汉语拼音字母顺序为检索参照，对记忆中所有的汉字、汉字单位进行回忆梳捋并无限组词，但究竟靠的是闭目玄览，终于还是有很多字的写法是记不起来的。至少，一本书里有大量的汉字是可以肯定的，他可以帮助我渐渐地恢复与中国文字的关系。后来经他们同意，我把这本书带到了沙雅监狱，不料，一到那里此书竟被锁入库房，三年里交涉不低于一百次，终于未被允许看阅。

12月16日全天至17日早晨，我就被一群警察围在床上，他们对我表面上看是礼貌有加，遗憾的是他们中绝大多数已不大懂得礼貌的实质性内容。到了夜里，他们每三个人一组轮流坐在我床边看守，每一个小时换一次班，而那门开、闭门发出的声音颇不小，那不是门开、闭本身的声响，而是不懂得礼貌的动作带来的声响。最不礼貌的声响是他们坐在你睡觉的床头不知倦乏地高谈阔论。我已连续两年没有听到那种若无旁人的讲话气魄，尤其在夜深人静时，但我不认为他们是恶意为之，不过是一种恶习罢了。长期与囚犯打交道，加之个人修养方面的放任（我这里的「长期与囚犯打交道」非系说囚犯不懂得礼貌，而是中国警察对于囚犯根本就是不需要有礼貌），久而久之，致他们不幸地失去了对人礼貌的能力。

二、开往新疆的列车上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被叫醒吃了早饭。刚吃完一会，又进来一大群警察，为首的一位长脸君站着向我宣布，接到上级命令，要将我押出北京往异地关押，但不告知我押往地。他同时宣布，从现在起作为在途囚犯，必须给我加戴脚镜。话音一落，立即有两人一左一右蹲在我的脚前开始为我加脚镜。此生第一次拖上了脚镜，北京当局在这面对我还算「客气」，那铁链长度足在一米以上，虽则重了一点，但究竟还是可以迈出较大的步伐行走。但拖着脚镜走路实在是困难得以，加上手铐和脚镜后我被两人挟持颇困难地走出大楼。

天已大亮，四周都是高墙电网，这是我数年来第一次看到天地，但只一瞬间。院里停了数辆「依维克」警车，外型上看是一模一样。前面的几辆全密封，除了驾驶室外通体不安装玻璃的车，以前也经常见到，但从未弄清楚他是做什么用的，这一次才终于明白，那是武警的运兵车。我被架上了一辆警车，到了车上竟没有给我戴头套，这是多年来的一次例外。前面是数辆警车开道，我的车前后是武警的数辆运兵车。到了火车站，我的车队在一个我不清楚的具体地点待了好一阵子，看到了车队中还有若干豪华中巴车，但窗帘挂得严严实实。过了一会，车队直接开进了火车站站台，我的头上又被套上了头套，我被人架着下了车，走了两三百米，架我的人就说：「抬脚，上火车。」我被架进了火车，脚下铺着柔软的地毯，我感到我们进了包厢，我的头套被取下。车厢里有四名警察，我被告知，路途期间一天有两包方便面，小便只能在车厢里解，可以看看闲书。一进包厢包间，取下头套后我看到包间内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但有一点被他们忽略了，那窗帘布上缀饰着新疆维吾尔风情图景，意味着这趟列车是开往新疆的。

我问一位警察：「火车多长时间到新疆？」

他明显一愣，看我盯着窗帘，他很精明，说：「跑新疆的火车并不意味着咱们的目的地一定在新疆，沿途有许多站点，还不一定在哪里下呢，没准儿还会去了东北呢。」

我知道那是为了掩饰被我看出的「机密」破绽后的一种信口胡诌。

火车在路途驰行三十多个小时，为了减少大、小解，除了一天吃点方便面外，我基本不喝水。我坚持认为，人的羞涩感是神赋予人类的诸多情感之一，在车厢里面对那么多的人及录像机解手，实在使人难堪得可以，即便经过那么多年特殊的历练，这种难为情仍不见得有丝毫消减。在列车上，我经历了此生迄今第一次的戴着黑头套、戴着脚镣、手铐上大厕的遭遇，那实在就叫个「窝囊」。在火车上有过上厕所经验的人都知道，那厕所的空间实在小得可以，我不知道那里面是否有过同时进去三个人的纪录，三个人进到里面，本已挤得够呛，而我又是被锁住手足且堵上眼睛。究竟是人类，关键时候还有着互助的能力。同我同时进去的两人成了我的「眼睛」，他们的言语成了我的「视线」。我感觉到进了厕所，「正了位」后，我的一只手铐被打开但迅速锁在了旁边的一个人的腕上。我下蹲后两膝顶着一个人的腿，证明厕所里至少也有两名警察，但我感觉到厕所的门是开着的，应该外面不仅有录像，厕所周围还有人担任警戒。这些年我上大厕的隆重仪式早已成了寻常事，但这是一次特殊的隆重际遇。

在火车上，陪我的警察每几个小时轮换一次，他们进出时能看到包间门口有武警把守，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至少我所在的那一节车厢里没有「外人」，全是去新疆送我的人。因为偶有他们的同事相互间找寻，有时找到我的包间里，那里的人总会重复一句：「除了五号包间是首长的包间外，这节车厢上其余包间都可以进，都是咱们的人。」

在火车上近四十个小时，印象最深的苦楚还是已成了身体一部分的脚镣，开始还觉得没什么，戴至第二天后才感到那东西的厉害，尤其是在夜里睡觉，一翻身，内外脚踝周围那种痛是钻心的。实际上，翻身亦只能设法一侧身而已。手铐倒没有多大事，一方面我早已习惯，另一方面，北京司法警察对我要比秘密警察文明得多，除了客气有加外，他们给我戴手铐时竟检查了一下松紧程度，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待遇。

三、新疆同志你们慢点吧

我们于2011年12月17日上了火车，经历了近四十个小时的驰行，于2011年12月18日夜抵达新疆乌鲁木齐。尽管他们一路关掉了列车上的喇叭，但从他们不经意的对话当中，我还是得知列车将在快进站前的一个叫乌拉伯的地方专门停两分钟，已有新疆警方在那里等待。大约晚上九点左右我们到达乌拉伯，我被架下火车后听到跟前有人说：「交给我们。」随即我感到他们将我交给另外的两个人。不出所料，「还是新疆同志好」（于泓源语），我立即感到了新疆警察的蛮力。绝不是情绪化的认识，你能从那种蛮力中感到一种与他们所处僻远之处名实相副的野蛮、愚昧及冷酷。我能感觉出的不仅是这野蛮、愚昧及冷酷的习性，更有他们以这冷酷的蛮力向北京的领导表现「新疆同志」的忠心，及对「敌对势力」的仇恨。

那两位「新疆同志」在北京领导面前真是足够奋力，首先是刻意使出蛮力，量化成具体的力的单位衡量，那加于我身体的力量足在百斤以上，几使我不堪重负。那野蛮和冷酷的另一个表现是用蛮力催逼扑行的速度，由于我什么也不能看得见，只感到脚下的路高低不平，还过了一次铁轨，一股巨大的暴力催逼着我按着他们力的导向扑跑，岂止是踉踉跄跄，我是稀里糊涂地东倒西歪。大致是北京警察感到太野蛮或是下意识喊了一声：「哎，你们慢点吧。」但终于还是未能减缓两位「新疆同志」的奋力蛮为。

终于，一阵子被人架着的东倒西歪扑行后，我被架上一辆应该是中巴车上被压得坐下，我感到自己浑身大汗，左右则各坐着一位喘着粗气的活物，他们也累得够呛，气喘吁吁足有十分钟多。所谓「屋漏又逢连夜雨」，车上的暖气热得出奇，我的脸上、身上，明显地感到汗水的流淌，尤其是脸上，那汗水叫个「滂沱」。我感到汽车在路上颠簸了很长时间，我拚命地转移着注意力，以减轻闷热带给的生理煎逼，盼望着早点到目的地，不管这目的地是个怎样的魔窟。那是一段没有意料到的苦楚过程，后来回味起来，实际上是多个因素合力作用所致：我穿着很厚的棉衣棉裤、一段猛力催逼下的狂奔、上了车后闷热的暖气，还有那很厚的黑头套。

四、那话儿可餐乎？

终于，目的地还是到了。我感到我被人架进了一个门，前后有很多人，亦感到有闪光相机向我抛媚眼。我被架着上了一层楼梯后往前走了一阵子，感到周围有许多人，当天是周日，无疑都是冲着我来的。一个群体一同向前移的大声响，渐渐地，前面的脚步停了下来，但作为核心的我还是前行着，终于，我被定止在一个地方。

「把衣服给扒光！」听到了一句人话。

我的头套被取下来，我看见是在一个二楼的平台上，一群大盖帽云集在我的外围，有两名大盖帽全副武装一左一右各抓着我的胳膊，另外几名大盖帽正手忙脚乱地扒脱我的衣服。很快，我即被扒了个精光，我被他们使劲压坐在地上，实际上是半躺状态，那地上实在冰凉得可以，我努力使自己的思想置身事外，不断提醒自己必须保持着冷峻的旁观者心态，观察正在发生的及将要发生的一切。

所谓：「心有余而神不劳，事从容而就理。」虽然这几年我经常被扒光衣裤，这已是移交至司法行政系统三天时间里的第三次被扒光，但在如此之多的国徽下面被扒光尚属首次。最有趣的一幕出现了，又来了几个大盖帽在我的面前站定，面色严峻，我这时已进入「旁观者」的状态，除了那地上冰冷给我的提醒外，我的意识已基本旁置，进入了可冷峻观察眼下奇特景致的状态。

有两名大盖帽弯腰分开了我的两条腿，一名不到五十岁的大盖帽一脸肃然的恭敬地折腰下蹲，开始在我身上摸摸捏捏一番后，两眼停在我的两腿中间，也就是俗称的「私处」。稍顷，他伸出右手托起了一对辜九于掌心，那神色颇怪异，

口大张，两眼烁烁放光。他显然有些忘神，企图将那一对玩意儿托高但却扯痛了我，但他终于没能醒过神来，继续捧着一对鞑九恭敬端详。由于是低头端详，那两玩意儿第一次与国徽保持了如此亲密的距离，一双鞑九与那国徽相辉相映，各增对方艳色。

我看着大盖帽那副出神情状，当时差点脱口而出：「可餐乎？」但终于强忍着未能喊出口。因为常人无法想象那种环境的特殊，那种静肃中有着一堆常人难以理解的敏感、脆弱的心里。那种静肃中，一句「可餐乎？」的威力当量绝不亚于一颗炸弹，会招致他们极疯狂的举动。但我发现旁边站立着两位警衔很高的「大器物」。由是，我意识到刚才的那位大盖帽的恭敬肃然神情未必是对那两玩意的，当是做给旁立的两位「大器物」看的，那两玩意是借那「两大器物」的脸才空前绝后地在国徽下风光了那么一回。但无论是真是假，他们俩在众国徽辉映下，把在一双戴着洁白手套的掌心上，被煞有介事地几近瞠目结舌地恭敬端详的过程却是真实的，虽然我并不认为那两玩意当受这等规格的礼遇。说心里话，那俩跟我生死相依的玩意，「跟了」我近半个世纪，这一次也真算是露了一脸，不但见到大人物，且史无前例地与众国徽亲近了一回。我私下认为，这是只有在盛世中国才会有的盛况。

五、禁闭室门上悬着一张人脸

当然，这场盛况也有不完美的环节，所有我的内衣裤均被现场那两大人物下令给扔了，那都是我自己的财产，根本没有任何向我哪怕是说一声的冲动。「全给扔了，换我们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那神态口气，完全是在扔他自己的东西。一阵子折腾后，我又被架进了一个不足六平方米大小的房间，不想刚才的在地板上的风光无限带来了又一个不美的局面，肚子开始扭着痛，进而开始拉肚子，颇使人苦不堪受的是水管里面竟没有水。实在倒霉得可以，一直至第二天凌晨突然被押离前也没有来水。

那是一间监狱的监闭室，六平方米以下的禁闭室，被禁闭者全天候吃喝拉撒全在里面，白天门会一早一晚各被打开一次。早晨打开是要把夜里睡觉用的一块泡沫床（实为床垫，但禁闭室里并不置床，一块泡沫板，既当床又当床垫）和一块被子给清理出去，晚上睡觉前再拿回来。在白天里，禁闭室里唯一可动的物就是被禁闭者自己，里面绝不允许有任何与人类生活活动有关的东西。我并不知道自己在何地，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在乌鲁木齐，二是在某座监狱的禁闭

室，由是我以为已是到了目的地。

当天夜里，实际上是从我进入禁闭室起，禁闭室门上的瞭望孔外就悬着一张人脸，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这真是多此一举，因为禁闭室内有相对而至的两部录像器，坐在监控室即对禁闭室一切予全面监视。这反映出一种微妙的不安心理，以最原始、最直接的方法盯着我，才能让一些人相对地踏实些。这种心理在正常人看来实在不可思议，诸如在部队关押期间，每逢停电以及重大节假日、敏感日，包括在我解大手的过程，都会派出加强哨来盯着我，这种心理几至不可理喻，至少我能肯定的是，我的生理能力总不会在重大敏感日有所加增，我甚至认为那些每必自夸什么高瞻远瞩、什么高屋建瓴的「领导同志」，也不大会认为我的生理能力会在这种被他们认为是特殊日子里神奇加增。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是，无论他们动用多大的力量规模，亦唯能局限在对我生理能力的控制方面，而令一些人恐惧的却并不是我的生理能力，由是这种怪异却又合理的不安即常溢于形色。

第二天，即2011年12月19日凌晨我被叫醒，经我两次交涉后，两位黑脸「大盖帽」提进来一只脏得令人不堪的水桶，放在地上一看，「败絮」更在其里，水桶内壁附着的脏污有着令人咋舌的「高度」，估计是一只长期不予清洗的污水桶。我立即提出抗议，两位警察中的一位走了出去，稍顷即带着另一位警衔高于他的人进来，他应该是个头目，他进来弯腰看了一眼脏桶后，来了一句：

「就这样将就着洗吧。」神情显得极不耐烦，说完扭头就走。

那水桶实在脏得不堪人目，表面上对我的抗议有过一个煞有介事的反应过程，但终于止于过程耳。我也没有任何办法，在路途已两天没有洗漱过了，他们要干脆不予你提供，你可有奈何之法？

刚吃完早饭，门口有话传进来：「把棉衣穿上，一会要出去一趟。」

在禁闭室是无法判断白天黑夜的，我总以为是正常的监狱进餐时间。我穿上棉衣，禁闭室门被打开，大盖帽云集。我意识到这「出去一趟」不大寻常，但仍未意识到会有一整天的长途颠簸。几名大盖帽走了进来，一个黑头套套了上来，这是我这几年只要出门则必有的待遇。我常思忖，究竟是我无颜面对天日还是天日无颜面对我？

我被架下了楼，出了楼明显地感到地上有雪。我被架上了一辆车，那车至少是一辆中巴，因为我在车里还被人架着走了一截距离，「转身，迈左腿」。我被按着坐下。汽车出发，尽管头套很厚，但我还是能感觉城市灯光一波一波的亮光。

终于，大约半个多小时左右以后不再有光波掠过，应该是到了城市的郊区。我依然天真地以为这是要到乌鲁木齐市郊区某座监狱，压根没想到他们会煞费苦心把我送到千里之外去。

六、兴师动众的小解排场

大约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感到世界的漆黑度减弱了些，而且是很稳定，根据我这几年的经验，这应该是天亮起来的征象。我在这种过程中从不动脑子，思维呈完全屏蔽状，这种状态的最大好处是绝不会与痛苦烦恼办理交涉，而整个过程都是昏睡或昏昏欲睡。路途中常耳闻我周围大吃大喝的情状，但那不是我的世界，这次亦不例外。

「卤肉，谁吃自己拿。」

「八宝粥、红牛饮料谁要？」

他们大概是饿了。早晨，实为半夜，两个馒头一碗、苞谷糊糊，肚腹是不大计较环境的，途中他们倒是喊过话，说要口渴了说话，但我是下了不在途中喝水决心的。

「还是新疆同志好」，在北京戴上的脚镜行走起来已足够困难，一到新疆，这悍勇的「新疆同志」给我换上的脚镜重量足在北京脚镜的二至三倍之间，那是一种极原始脚镜，粗壮、粗糙及沉重是其所有的个性。那铁环粗度足有两公分左右，而铁链粗细也足有一般人的拇指粗，最原始的是脚镜与手铐之间竟用一条极粗的铁链给连在一起，使得人的手及脚整日地保持着固定的距离，手指能终日固定在肚脐周边而不能略举，若要吃东西，则或腰着弯或坐下，这手口之间才能发生关系。最主要的苦楚是行动，北京的脚镜还尚可迈步行走，而新疆的脚镜则只能寸挪，便是慢慢挪动亦很艰难，这时我才意识到这种铁镜加身是怎样的一种不人道。这是酷刑的另一个面孔。

我曾在一文字里说过，共产党从不接受不同的声音，以致使自己退化至不再有人类正常的感情和一般的智商。像这种极原始的镜铐给人造成的痛苦难以言状，虽则，共产党从不在乎他的反对者作为个体人的具体痛苦，但今天的中共却爱面子得出奇，一方面口口声声「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现在是中国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一方面，在一些明显的反法治、反人道的环节上长期无动于衷。由于他长期不允许批评，导致了他失去了基本的是非善恶誉毁的分辨能力，

这是一种恶报。损人利己是恶人的本能，而损人不利己则是无脑恶人的本能。对他人的痛苦视而不见是有辱人类名声的无良行为，而刻意追求为他人制造痛苦则直接是反人道的罪恶。

千里之途十几个小时，我只上了一次厕所，若不要有头套，则对付这种困难的过程可增力不少。黑头套一套，便是没有镜铐人亦手足无措。再说，我上一趟厕所，会给一大群人造成不便，整个服务区洗手间要被全副武装的士兵清场并警戒，给许多不确定的人造成麻烦，这是我所极不愿的。只上一趟厕所，那动静亦足够地大。最有趣的环节是到了厕所里面，权力究竟是有限的，有些过程终于还是得属于我。我可以肯定，世间没有任何尊贵的角色尿尿过程敢与我的排场景致匹比，那才真叫「兴师动众」。除了这「最后一击」属于我的生理过程，其余一切都为大盖帽们包办。

「再往前挪点，再挪点，好，好，可以操家伙啦。」

我常有些怪思考过程，我当时边尿边想，世间没有任何一国国家权力可以如此这般地与公民的小便过程亲密无间。我想起了那句「万绿丛中一点红」句，虽然看不见，但我可以想象见彼时大盖帽的密集程度。在那般密集国徽的闪烁里，真难想象，一个被锁住几乎所有生理力量者，一泡尿竟可牵出公权力这般伟大的动静，世间罕见而盛世中国独有。

在一片国徽下的静肃里，我完成了俗常人都有的一尿。颇费了一番周章后挪回了车上。上了车，我听见「把头套去了，让他吃点东西」的人话，我的头套被取下，是慢慢地取下的，这是个例外，过去几年里都是猛地一把给抓掉。这可能是北京来的人在昨夜里提醒的结果，因为今天明显地比昨天少了许多的野蛮，连说话声也一改呵斥而竟变得软和了许多。取下了头套，我发现我们所在的服务站是库车服务站，库车是属于新疆阿克苏地区。

七、撞见孙荻躲在法律皮面背后

这时，我的「服刑」地对我而言仍是个谜。此前中间给我取下过一次头套，发现车是行驶在南疆托克逊县境内，我揣想有可能会是被送至吐鲁番地区关押，但刚一会又被套上了头套，而且一走又近七、八个小时。根据我的新疆地理知识经验，这吐鲁番是个分道的去处，往东则是鄯善及哈密方向，往西南向则朝着库尔勒及阿克苏。又是近七、八个小时的急驰，我认为或已至鄯善地区，或已至阿

克苏地区，头套一摘，果然身置阿克苏的库车县。估计取下头套之权是「新疆同志」的擅自行动，结果一取下头套，竟看见北京国保小头目孙荻正往一辆新疆公安厅的警车里钻，而在他的前面已钻进半个身子的人未及看清是谁。

严格意义上讲，这种场合是不应该让我看见孙荻的。虽然我们十分清楚，在中国，对于政治犯法律说雅点是道具，说俗常点就是魔鬼挂着的人相。对于政治犯的所有压迫功能都是由秘密警察具体执行，而当这种压迫必须披上法律的外衣时，一应的量体裁衣诸事宜，所有的环节主事者则仍是秘密警察头子。所有的法律程序，包括程序的启动及其节奏，实体刑压的尺度，公检法都是依其指令而行。对我的刑戮案件里，背后施行指令的是于泓源，而台前具体执行的则是孙荻。这种行径从共产党抢得政权迄今，在对反对者打压的过程及结果上并无本质区别，而形式则是变了的，而且是「与时俱进」的变化，那就是用法律的皮面。虽然这在于他们是极不情愿的，因为这很麻烦，但究竟还是得「与时俱进」的。既然这般在乎「与时俱进」，那么所有见不得人的过程都当躲在这法律皮面的背后。我于三天前，即12月16日，已由黑帮关押转在法律皮面下，这时期的孙荻理当躲在法律皮面的背后，都进入了监狱的执行程序啦，作为秘密警察的小头目，孙荻再继续抛头露面不仅有悖「与时俱进」，在一个具有些法律知识的对手眼皮底下，终于也是很光彩的。但偏偏这张不当在这个环节上出现的面孔被我给「撞见」，这在于他们实在不是件完美的事情。

孙荻其人，在中共这个官若浩海大景中，其官职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北京市国保支队支队长，但对于中共这个名为政权实为黑帮的集团而言，孙荻的职位及其恰当地执行「职务」，对苟延这个绿林集团寿命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的。首先是北京在中国特殊的独一无二地位，对于中国的黑恶政权而言，其保住权力的唯一手段就是恐怖打压，就作用及效果而言，这种恐怖打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在北京。于泓源曾在山西的一次调侃中不无得意地说：「对于异议和维权人士，只要北京踩得及时踩得狠了，就等于稳住了全国，北京稍有失控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泓源凶残、愚昧并有异于常人的冷酷，孙荻被他赏识的则正是这一素质。秘密警察执行的是这个恶政权最坏的那部分职能，其主要职能即是对国内不再相信其谎言，而企图说出真相的那部分公民，在威逼利诱终于不果情况下的冷酷打压。执行这种职能者必须具备的素质即是无良、凶残和恶辣，而这种素质孙荻都全备。

这几年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孙获成了我「生活」中的主要部分，使我得以近距离观察他及他所代表力量的行事逻辑。简单看来就是一种毫无心理负担的作恶逻辑，实际上还是一种利益逻辑，孙获代表的利益或者说孙获所处的利益层级，属中共黑恶势力特权利益枝梢末节，但那依然是一种蓬勃恣肆的特权。孙就配有专车，但他的专车可以挂任何牌照而免于任何处罚。2006年以前，我还常记录他们跟踪我的车辆牌照，后来才有人悄悄告诉我，跟踪我们这类人的车辆牌号都是假的，以保证这种车辆可以自由违章，而他们都有免被盘查的证件，只有在中共奥运会期间极严格的进京车辆检查，在外地警察的盘查中才遇到了麻烦。我才知道每天跟我在一起的孙获及王铮开的车牌号都是假的，这是我亲眼看到他们在山西及河北的查验警察面前被查出是假牌照，他们的特殊证件好像也没有起作用，终于由北京方面打电话后才免于纠缠。但我发现到了北京的查验关卡，他们的证件则畅行不误。

孙获的特权范围几无边际，他在北京，那六、七百元一条的软中华烟好像取之不尽，他不论到哪里有一个习惯特点，就是在没有坐下前掏出一包中华烟，抽出一支后啪地往桌子上一扔，谁想抽谁抽，他自己是一支接着一支，很潇洒。我曾问过他一天得多少烟抽，他说他个人一天两包就够了，说帮忙的人多了就没准儿啦。一出北京，不论到哪里，都是住最好的饭店，吃最好的饭，仿佛那官帑就是些随意即可取来的东西。于泓源颇赏识他，但并不完全信任他（**于真正信任的是张雪，非系张的才华，而是几近变态的献媚，以及与孙不相上下的凶残与冷酷**），这是旁人即可明显看出来的一点。

但在库车看见孙获还颇使我一愣，我还以为暂时几年内可以摆脱这个挂着人相恶魔的搅扰，至少是在表面上可以不再见到他。这大概是我没有政治头脑的又一个证据。我总以为中共监狱系统隶属于司法部，而司法部隶属于国务院，秘密警察直接控制司法系的做法还真出乎我的想象。这使我想起2010年在部队关押初期「绝顶君」在有一次与我谈话中，竟直言威胁我说，如果再执迷不悟下去，别以为将来进了监狱就能清净。

「监狱又能怎么样，下到监狱我们的人照样能跟着进去，到时候派两个人跟到监狱里去恶心你，给你个无宁日、无尽头的局面。」

八、庞大阵容千里相送

掀开头套后，不仅让我看到了孙荻，尤其令我吃惊的是这次千里奔突来送我入狱的壮观大盖帽阵容。

早在车队穿越托克逊干沟时，我的中巴上一位姓吴的处长在对讲机中不经意的一句讲话，让我大略上得知这次「护送大阵」的规模。他在回复别的车的呼问时说：

「我不知道，每组是三辆车，二到五组归我管，五组以外我不清楚，吐局他们（指新疆监狱管理局的车辆）、公安系统加武警系统的车人家自己编队。」

但真的直视这庞大阵容时，却远远超出想象。首先是北京来押送我的人都在阵容里（在火车上他们每四个小时左右轮换在我的包间里值守一次，面孔都可以认得出），而北京来的大盖帽阵容已足够地大，但「新疆同志」今天则成了绝对主力。我这几年里究竟是见过些场面的，但这阵势还是令我咋舌。

有人给我擎了一块馕，递来一瓶矿泉水，我开始用膳，车前及车门周围有武警军官肃立。而车上的所有警察都看着我，有回头的，有扭侧头的，可以说都是一脸稀奇的表情。若不了解内情的旁观者，你当觉得这种众目睽睽是颇异常的，你若了解眼前这一切，你会像他们一样不放过这一路难得的瞩目机会。所有眼前的壮观景致，包括这些瞩目者自己在内，今天都属于「我」的一部分，包括那些北京来的，配有专车的「大器物」，以及当地的也坐着专车的「大器物」们。

12月18日凌晨有一梦临到，前后不到三秒钟，梦中看到我的耿和右腿膝盖以下被截去，她拄着双拐，脸色异常惨白全无血丝。由是连续两天心情沉闷。我从不为我自身的、在常人眼里的困难处境烦忧，正如中共黑恶势力曾在个别谈话中颇得意地指明的那样。我的亲情很重，尤其见不得耿和她们娘仨受苦。我清楚，这一次的失踪又达二十一个月之久，又是一个生死不明，可以想象亲人所承受的痛苦煎熬，他们盼着我能活着回家的「好消息」，可过几天，他们将获得一纸我被投入监狱的消息，这消息对于我的亲人，尤其对于耿和的打击是至大的，所以那两天我颇郁闷。但当取下头套看到眼前的壮观场面时，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自以为在世界范围内已强大至心烦气躁的中共黑暗势力，以眼前如此超常规模的阵势来「肯定」你，你的沉闷是没有道理的。

九、总算到了沙雅监狱

吃完半个馕后，车队浩荡连绵驶出服务区，这一次竟暂时没有再给戴头套。我的车里前几排坐的都是前几天与我一起从北京来的人，整车无空位。我的头顶前上方临时固定了一台录像机。车队前面的车辆大都是警车，亦有为数不少的小轿车，还有数辆武警运兵车。大约一个小时候左右，我看到车队驶出高速而驶向标牌指向的沙雅县。这时候，我大略上明白，我有可能被送到沙雅县监狱关押。一出高速，头套又被人给套上。

对于沙雅，我以前了解些皮毛，缘着我曾经所在的新疆星河律师事务的一个律师同事，他曾是沙雅县司法局副局长，后辞职到我所从事律师职业。贫穷、僻远、环境恶劣，这是他嘴里了解的沙雅概况。但我迄今未能看到过这个小县城（去的时候戴着头套，回的时候被半夜押离）。来去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里公路上密布着减速带，大大迟滞着车行速度。

经过两小时的驰行，我听到车上有人说：「总算到了。」

又有一个人说：「X监狱长的脸还是那么黑，嘿，真全体出动了。」车停了下来。

「其他车辆停外面。」外面有人喊。

我的车又启动，但不足一分钟又停了下来。我被人架下了车，紧接着被人架着上了几级台阶，应该是进入了一个门，我的脚镜拖在水泥地上的声音可以得出我正行走在一个楼道里。我被架着一个转身，「抬脚，进门」，有人话。我被架进了一个应该是房间的地方，一进房间脚镜就没有了拖地声，我被人架着身转一百八十度后取下了头套，眼前乌鸦一片大盖帽，有录像机，有照相机。我发现我身置一间约七、八平方米的禁闭室内，地上铺着半公分厚的橡胶地板，四壁上饰覆着厚度足在八公分以上的烟灰色沙发垫，头顶上一盏昏暗的灯。有两名大盖帽正蹲在我脚前卸开脚镜。一卸完脚镜，我又剥光了衣服，赤条条地等待着双方的交接。

这是三天来第四次风光无限地站在国徽下面。然而，从北京到沙雅一路的脱光衣服，相较而言，沙雅监狱却是最不野蛮的一次。其中有个警察说，这只是个象征性的过程，你脱下来可以转过身去，然后就可以穿上衣服，这是在无数次脱衣游戏中仅有的。

穿上衣服后，在众目注视之下，一位维吾尔大个子警察，立正而神情肃然地

向我宣读「罪犯入狱」的有关注意事项，后来得知他就是十六监区的监区长。一应表面程序完结后，热闹和宏大都悄然退去，禁闭室门被朝外锁上。终于禁闭室就剩下了我一人，我得以对这个将要关押我三年的禁闭室室内予观览的机会。

十、摆饰用的小风圈

禁闭室约八平方米：一个泡沫床垫占了约两个平方米；地上赫然有一个蹲式厕坑，旁置一离地面约二十五至三十公分的水龙头，这一区域约占去一个平方米左右；门口划了一个红线禁区约占去一个平方左右。由是这个房间里剩下可供活动的空间不足四个平方米，即一张双人床大小。后来的经历表明，便是这四个平方米左右的空间亦非系你可以自由使用的。禁闭室的顶部四个角配置了四个监视器，门口上方装了一个不大的喇叭，就是这个不甚惹人留意的喇叭，出乎意料地在未来三年里「担负着」极其邪恶的使命（实际上是九十六周）。

禁闭室前后各安一铁门，临着楼道的铁门是供人进出的，一出门就是幽暗的楼道，门距地面一米六左右高的地方有一小孔，是送收餐具及供楼道值班警察向里观察的装置。后面一铁门在中国监狱则主要是装潢门面的，所谓「与国际接轨」。这道铁门外是个约三平方米的小风圈，他实际上是个小房间，只是没有顶部，他的作用是给禁闭室日常通风用；在中国监狱，他绝对是摆饰，与我并排的禁闭室，三年里从未听到有开门通风的动静。我最初被关进去后就没有打开过那个通风门，多次与值班警察进行交涉，他们都说禁闭室通风门从来就没有给打开的习惯。

而我的交涉是有依据的，保持禁闭室内的通风、采光，是他们的监狱法明确规定的。我忘了不知过了几个月，经我与艾尼瓦尔监区长及马监狱长的当面交涉，并提醒了法律的相关规定，监狱当局最后同意每天上、下午各予十五分钟的通风时间。此外，囚犯在监狱关押期间，从人道需求出发，监狱当每日保证被囚人员予一定的户外放风时间，但这是一项依法当有，而为我交涉了三年却终于没有能享有的权利。后来，在那种刻意追求密封的环境里，由于缺氧导致胸闷头痛的事如影相随，他们同意每次十五分钟的通风时间增到三十分钟，期间我可以到那个三平方米的小通风间里活动；但进去才发现，我这禁闭室的小通风间竟然被临时加盖了房顶，完全变成了一个三平方米的小房间，这种做法不仅违反了中共政府加入的相关领域的国际条约确立的原则，也违反了中共政府自己颁布的法律

精神，违反了其宪法中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保持人权的条款。我一再督促他们，既然以法律名义囚禁，就当遵守他们公开颁布的法律原则，并他们承认或加入的国际条约。事实上，仅从正常人格角度瞻顾，这种做法，是一个在卑鄙龌龊方面心细如丝的无赖小人的下作行径。

多经交涉，2012年的3月25日左右，我听见外面有电焊机切割的动静，心里颇有了些高兴。觉得把放风间顶盖给取掉后，其一，每天能给禁闭室通两次风；另则那本不该有的房顶被取掉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增加禁闭室内的光亮，改善室内昏暗情形。然而，我的天真再次被他们独有的卑鄙智慧给遮没。他们并未将那个房顶去除，只是将他修改成一个活动房顶，在上面拴上一条绳索，绳索的一头拴在二楼的窗户钢栏上，每天通风时由别的囚犯上去将那活动的房顶盖拽开，半个小时通风一结束，那顶盖子与黑暗又一起压下来。我曾经问过一个警察，如此劳神费力，而目的却既见不得人又违法，为什么竟乐此不疲呢？他先是笑而不答，过一会儿则笑眯眯地说：「这里最不缺的就是人。」而每个禁闭室里，朝着楼道一面的墙上都装一个玻璃小窗户，为的是让外面的值班员观察禁闭室内的情形，客观上还多少能使里面的光亮有些许改善，可第二天他们就进来给糊上一张维语报纸，在最后一小时给换成了玻璃纸，是暗蓝色的，里面基本看不清楼道里的东西。

十一、别以为是来度假疗养来啦

到了那里不一会，内侧铁门上的小观察孔被人打开。

「A2, 开饭。」

因为里面仅我一人，无疑，这A2是我啦。外面递进来半碗水煮白菜，一只黑手递进来两个馒头。

那水煮白菜可谓青白分明，那菜里究竟有没有放油，三年里常是我与值班警察辩论的话题之一。我说那菜里是没有油的，我不能承认我没有看见过或感到过的东西，而警察则人人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且对有关这个话题的反应也很激动。他们中只有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会对这种问题笑而不答。反应最激烈的则常说我胡说八道，说那菜里当然有油的，问题出在你房间里光线不好，有的则说是我的视力不好。

有一回是王治警官送饭，我笑着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总以为共产

党的方方面面都脏污不堪，这真的是一种不全面的看法。共产党有清白，这个清白就在犯人的饭碗里。」他是低头不语。

真的难以置信，这一清二白的煮白菜，竟可以一口气吃三年。

第二天刚吃完饭，禁闭室门被打开，两名警察走了进来，其中一名肩着一条长凳子，说要跟我谈话。我后来得知他俩一人姓周，是个干事，一人叫陈帆，就是十六监区的副监区长。这次谈话主要是周在谈，陈始终一言未发。说是谈话，实为他一人在那里讲话，因为他那副德行实在不令人愉快。我一直没闹清楚那一次谈话的必要性。周坐在长条凳子上，右脚踝（外侧）抬放在左大腿上，开始盯着坐在小板凳上的我。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看我不答，他又问了一句：「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嗯？」

「知不知道？」我还是不说话而盯着他看。

「你不说是吧？你不说我来告诉你，这是监狱，你是罪犯，来这里不是让你旅游度假的。这里是改造罪犯的，这点你必须清楚，你首先要尽快从心里适应自己的角色，你要在这里吃牢饭，接受强制性改造。吃牢饭的滋味是难受的，但没有办法，因为就这标准，犯人每个月按国家标准是一百三十八元钱，还不够买两袋面粉。这些犯人都特别能吃，有的人一个月不限制的话两袋面粉都不够吃，哪里有钱买菜买油？而国家是以实物拨付给我们，并不给钱，菜都是自己种的白菜，实际上都吃得超出了标准的，别以为自己是来度假疗养来啦。这里是个特殊的场所，一切都是强制性的，没有商量余地，一切都是单方面的、强制性的。」他说完就起身离开。

十二、沙雅监狱医院

第三天早饭后禁闭室铁门被打开，专门负责看管我的马兵（音）携一大群警察出现在门口，操弄录像机及照相机的大盖帽间杂其中。马兵与另一名警察走进来，给我戴上了头套，戴上了手铐，我被人架着走出了大楼，又走了较长的一截距离而被架上了一辆车。二十分钟左右车停后，我被架下车，又感到被架进一个门，我的头套被取下，一个规模不大的大厅里全是警察，有后来能对上的是教育科、狱政科、刑法执行科、生活科等各种科长、医院院长，说是要给我做体检。

沙雅监狱规模有多大我不清楚，因为一则我长期被单独监禁在禁闭室里；二则所有一般犯人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一切，对我则要刻意保密。但根据我所在是十六监区，常年保有三百余人的规模估算，便是只有十六个监区，这个监狱亦关押五千人以上，但这个医院却实在小得可以。全院有杨院长、胡院长、韩医生及另外两名医生总共五人，与现代检验手段有关的就只有X光机及B超机两项，其余的就基本与一个诊所一样。根据我几年的了解结果，全院五名医生有三名长年在各大分点打针卖药。以十六监区为例，犯人一般病情只能在监区医务室买药对付，只有濒死的大病，才有可能允许到监狱医院里住院，而监狱医院就只有一名院长和一名技术医生。而院长的主要精力就是参加各种会议，大部分时间，监狱医院就只有一人。你尽可想象这绝大部分时间就只有一个人的医院，他能有多大的疾病诊疗能力？在监狱里，当局绞尽脑力堵我的眼睛和耳朵，但我自有获取信息的途径。非是好奇多事，既已深陷其中，那么便设法了解、认清相关领域的病痛及程度，以资为未来的医治及改变提供基础。

共产党的许多美好在纸上，我在入监教育读本里看到，犯人享有全额医保，并将其纳入当地政府的医疗保险体系中，但这种美好仅止于纸上。他们，至少是沙雅监狱，不做任何机制上适应这种好的保险制度的改造，哪怕是渐进性的改造。我了解到，犯人非住院治疗的所有费用都是自己掏钱，那么住院治疗费用免费也算是个好事，但他们要想住院治疗实犹登天之难（**因为，每个犯人都给监狱制造利润的机器，后面要讲到**）。

有个监狱警察在与我聊到这话题时笑称：「监狱医院给犯人治病的最主要方法就是不让你住院。」

然而，这次体检不知何故，第四天又重新体检了一遍。两次的蒙面去「体检」完了后，我开始慢慢适应或被迫适应这挂牌地狱的强制改造生活。这两次走过场的体检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我就一直被单独监禁在禁闭室里，直到第二年3月份的家人会见时，又走出门半个小时。

十三、监禁室夺不走的空间和光明

禁闭室的监禁，并非中共监狱法里规定的一般意义上的监禁。按照中共监狱法规定的监狱，对罪犯的监禁场所两种，一种是监舍，一种是禁闭室；监舍是一般监禁场所，亦即对罪犯执刑罚的常态监禁场所，而禁闭室则是非常态的监禁

场所，他是对在常态监禁场所里违反监规纪律罪犯的所有处罚规定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处罚。中共监狱法明确规定，禁闭室禁闭处罚的期限不得超过十五天。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那种囚禁实在是太残酷。据中共司法部编写的《入监教育读本》承认，即便是常态的群体单纯囚禁，时间一长亦会导致许多严重的生理和心理病变。所以，对于囚犯每天必要的放风，予适当的活动时间，保持禁舍内的日常通风、采光及囚犯之间的日常言语等感情交流，是极重要的人道保障。而禁闭室禁闭处罚不得超过十五天的规定，自然是在立法时对人的人道承受能力考量的结果。一般犯人对此是心存恐惧的。我常听见一些被处以禁闭处罚的犯人到了禁闭室门口仍哀求不止，使劲哀求能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而取消这禁闭处罚，我常替他们哀伤不已，因为他们的空间只在眼睛里，就如他们的光明只在眼睛里一样。

空间及光明若只在眼睛里，不仅自己一生拥有的空间及光明被无限地减缩，最可怕的是这种空间和光明成了一种别人可以夺走的东西。空间及光明若在心里，他们既是无限旷大的，更是任何人都无力剥夺的。

每个监狱都建有一定数量的禁闭室，以资执行对罪犯中最严重违监规纪律者的处罚。但在中共监狱里，禁闭室又多了一项法外功能，就是对他们认为的、比较危险的政治犯单独监禁，最近这二十几年里又增加了一个与政治犯同命运的群体，即「邪教类罪犯」，实际上绝大多数就是「法轮功」人员（在监狱里实际具体发生执行效力的不是中共公开颁布的法律，而全是中共监狱系统，甚至监狱、监区制定的监管规则，在所有这类规则中，都是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与「邪教类」罪犯并列，从无例外）。

中共黑恶势力就一口气在禁闭室里单独监禁我三年。在他们提供的《入监教育读本》里，提到一个湖北监利监狱一个叫都星样（我当时怀疑是把名字给打印错了）的罪犯，累计被加刑至三十年，在前十几年的关押中，其累计被处罚禁闭关押的时间达四年之久，「创下了全国监狱系统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沙雅监狱一名狱警2014年7月份私下承认，在沙雅监狱禁闭室一口气关押三年的还没有过先例。

十四、冷水淋虐器

这禁闭室关押针对的对象，就是罪犯中最严重违反禁规纪律者。其关押的目

的很简单，就是不把人当人，是完全把人当成了动物。但实现这个过程却颇不简单。即禁闭关押的执行过程颇复杂，需要很大的耐心和细心，这些耐心和细心都是为了达到彻底整服一个人的目的。我的禁闭室在室内附件上与别的禁闭有一点小差别，因为要定期检查我的禁闭室的监控、监听等设备，每至这时，我会被关在其他的禁闭室里。

先后进去过其他三个禁闭室，除了监听设备属我独有，我的禁闭室装有四部监视器，而其他禁闭室一律为一部。但最令我诧异的是，其他每个禁闭室竟都安装着一个淋浴喷头，而这淋浴喷头是直接对接在自来水管子上的。在沙雅被监禁一段时间后完全可以断定，那个淋浴设备不是基于让被禁闭处罚人员洗澡的动机而安装的，而是一个针对被禁闭人员的暴虐器。我以前常听说看守所或监狱强逼「不听话」者洗冷水淋浴（**法学博士李柏光先生在福建一个看守所关押期间，就被强逼冲冷水淋浴**）。看到这些「现代装备时」我仍有些诧异，这成了一项制度，每个禁闭室都有且整齐画一。而沙雅监狱的普通犯人都没有条件洗澡，当局怎么可能单单宠爱起被禁闭处罚的刺头来！让被禁闭处罚的刺头们在受处罚的期间享受平时无法享受的冲澡呢？更何况这些淋浴喷头是直接装在冷水管上的，你尽可想像这些头顶国徽人群的暴虐人性。

每个禁闭室整齐画一地安装上这种反人道的暴虐器，这是需要认真的制度安排结果。首先是会议研究，向上级报批、立项、设计及经费拨付。你无论经历着怎样的铺排过程，无论这种过程在文件中被表述至怎样崇高神圣，最终目的还是整人、对人道的公然暴虐。

每次他们检修我禁闭室设备时，我必须坐在别的禁闭室的小矮凳子上，我就坐在那冷水淋浴器下，在感叹中追想这个问题。沙雅监狱用的水是地下水（**只是犯人用**），那水的冷冰程度足使人畏惧，不难想象那冰冷的喷头下面曾有过多少次人的惨叫声。最使我不解的是，这样的问题是怎样在桌面上，在国徽下得以研究，得以通过，最终得到批准实施的（**2013年8、9月份，他们统一撤除了那些冷水淋虐器**）。

十五、红马甲们

禁闭关押过程繁琐复杂，可对于监狱倒不会成为一个问题。除了我以外，其余禁闭关押的过程全部由监狱方面挑选的其他犯人来代为操作。这类型的人实际

上是一群水性人格群体，他们就酷似中共电影、电视里的翻译官或汉奸类人物，自私、阴暗、怯弱、凶残、无底线谄媚及对同类的极端冷酷，必须恰当地集于一身，他们的外形标志是一件红马甲。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实际上就是二警察（我称之为「红马甲」）。

在高墙电网里面还有钢栏铁护，而钢栏铁护里面才是日常监禁囚犯的去处。监舍大楼里是冬天寒冷，夏天闷热。最主要的是那里长年奇臭不堪，每个监舍规定额员十二人，但最低关押十三到十四人，另加一名坐班员，一天早晚两次各供一桶开水以供饮用，断无热水洗漱，犯人常年不洗澡、不洗脚。初涉其境，那臭味无边无际直使人绝望，我常和狱警调侃说奴隶有一种本领就是「习惯」。几周过去后，再也「闻不到」那臭味了。可狱警就惨了点，他们每天都要回家，环境的转换使他们每天进来都无法使臭终于成为习惯。

作为环境的一部分，人类却有着改变环境的能力。我估计这「红马甲」的出现就是狱警改变环境冲动的结果，对于犯人的日常技术性管理，监视、管束及必要的信息沟通，监舍内的所有秩序维持、学习主持，日常生活秩序的维持，诸如打饭、分饭，分发、收回餐具及犯人的理发、打开水等，全部由「红马甲」代理狱警实施。实际上，「红马甲」是狱监与普通犯人之间的隔离层，绝大多数情况下，狱警的蛮横、辱骂针对的都是哈着腰的「红马甲」们，而「红马甲」也有威风发泄的另一面，那就是针对普通犯人。对于禁闭人员，所有执行过程都是由「红马甲」操作的，每个禁闭室门口外的瞭望孔前站着一个「红马甲」，他的职责是保障禁闭处罚的日常运转和盯着禁闭室内的情形，以绝对防止被禁闭人员自伤或自杀。

禁闭室里白天只能放一个高约三十公分的硬质塑料小凳，不知是否是刻意设计使然，坐面竟是躬凸型的（2013年后换成了平直坐面的小凳），其余一切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均不允许出现在禁闭室。每天早晨一起床，禁闭室的被子及床垫（床垫就是床）即全被「红马甲」给清理出去。被禁闭人员的吃饭、喝水都由「红马甲」从瞭望孔里递进去，然后通过那个孔盯着里面，吃完、喝完后立即收出餐饮器具。被禁闭人员欲大小解时当大声报告，经获准后会有手递进去。禁闭室内是不允许走动的，被禁闭人员除了吃饭、大小解外，其余时间则必须端正正坐在小凳上，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髁上，稍有挪动即会遭致呵斥。

我这些年遭遇过比三次酷刑更难缠的东西，一样是囚禁室内的闷热，一样是寒冷，这第三样就是每天没完没了地静坐「反思罪过」。一个人，无论你的内心

有多么地强大，但究竟你一样有着生理有限性的一面。中共黑恶势力最不可原谅的就是，他们并不顾及被处罚者生理方面的有限性，许多压迫过程远远超过了人们的生理极限，给人造成了极大的生理痛苦本身成了他们追求的目的。

十六、入监教育学习

到了晚上睡觉时间，「红马甲」就会把那个泡沫床垫及被子给送进禁闭室，每天如此，周而复始而不厌其烦，但唯有我这一切，三年来都是大盖帽不厌其烦地操作的。对于禁闭室的一切，大小解、接送餐具等物，连行走的路线都用红漆在地上给你标出而不得僭越，即便是坐小板凳，也用黄色油漆在地上标出两个脚丫子印，坐下时两只脚必须不偏不离地放置在那两个印模上。他们把罚坐这种变相肉刑叫做「学习」。你若吃完了饭或解手完毕后，头顶上方喇叭就会炸出一句「学习」。

沙雅监狱留在我记忆里的有几样东西永不磨灭，其中一样就是这「学习」。这种「学习」是有别于普通人类意义上的学习，他们并不给你书、笔、人或纸张，你只能坐在那里玄览。对于其他被禁闭人员，坐小凳是没有余地的，因为他们从不置疑其合理性。确实也没人敢置疑，一则最多不过十五天，另则，监狱警察的暴戾及绝对权威超过任何暴君。那里是人性及权利的绝对荒域，你主张正当的人的权利，他们必规律性地狂怒不已，说你公然挑衅政府，和政府对抗，你会招致无法摆脱的麻烦。但在坐小凳子问题上，我认为这种做法是赤裸裸的反人道行径，我拒绝坐小凳子，要求坐在那个泡沫床垫上，并且每小时给留出一定的活动及大小解时间。最后，监狱当局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同意了我的床垫每天不搬出去，我改坐床垫。但那坐床垫也实在不好受，首先是那东西仅高二十五公分，其次是每天从早晨七点半起床至晚上十点五十分至十一点钟睡觉，中间十五个小时里，除了三顿饭外就是坐。虽然后来允许每个小时起来活动十至十五分钟，但那种坐姿及坐的时间足可在生理上摧残一个人，连星期天都没有，但我每周就坐六天，坚决拒绝星期天也坐下去。

2012年3月份，到星期天时，值班警察过来下令让我「学习」时，被我拒绝。

艾尼瓦尔监区长赶过来打开瞭望孔明确地问我：「星期天不学习吗？」

我回答：「是的，便是六天也是违法的，星期天绝不学习。」他盯着我看了一会悄然退去。

到后来我还特地为其他犯人争取了每周一天的休息时间。对于被禁闭关押者，法定权利及人道需求，凡设计者能想到的则尽悉被剥夺。经过一段时间的禁闭式关押，我慢慢体悟到，他们把禁闭者干脆就当成了动物，但却不是宠物，所有中共法律规定的，普通犯人当享有的权利一律与他们无缘，诸如普通犯人享有的会见、通信、每天白天将监舍门窗打开通风、每日数次在院子里放风、监舍里每周看几次电视、节假日自由活动、参加日常体育活动及节假日娱乐活动，和每周所谓的改善等权利。

我通过听，获得了许多被当局认为机密的情况，其中最明显的，也是最令监狱当局后悔不迭的是，将他们对犯人的电击酷刑滥用，及对禁闭室滥用的既反人道又反法律的丑行「暴露」在我的面前。依照法律规定，禁闭室的唯一法定功能就是执行对最严重违反监规纪律者的处罚。但实际的执行情况是，他首先是执行对不肯认罪的政治犯（他们称「危安犯」即：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及「邪教类」罪犯的入监教育期间关押。了解关涉北宋历史影视作品者知道，北宋已决犯人投监的第一道程序是决其一百「杀威棒」，实际这种野蛮原始的刑罚时至今日并不曾根绝，唯换了一名称耳，在今天中共刑罚体系中叫「入监教育」。

这入监教育期为三个月，就给人生理方面制造的苦楚总量而言，若可以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承受一百「杀威棒」。中共在这「杀威」程序中，最核心的功能是根植你的罪犯身分意识，其第一个目标就是你必须认罪。他们会对投监服刑的人员进行入监分类甄别，对认罪的人员则实行集体关押，进行两月的入监教育。而对于「政治犯」及「邪教类」人员，入监教育则被监狱系统法外规定为三个月，而对于不认罪的「政治犯」及「邪教类」人员，则在入监教育期间实施禁闭式监禁，入监教育期满后仍拒不认罪的则入监教育再延长一个月。

入监教育期间最苦的就是连坐几个月小凳子。但根据警察私下讲，入监教育期间的禁闭式监禁一般时间长不了，监狱有足够的方法让你认罪，他们对犯人的改造体制设计是，以改造率来评定各监狱及各警察的政绩，而改造率的第一个硬指标就是认罪。中共中央政法委将罪犯改造率硬指标下达给中共司法部，司法部将这种硬指标下达给各省监狱系统，各省监狱系统下达给具体监狱，监狱则会将具体的罪犯改造率指标量化下达给每个监狱警察。不亲身经历这种必须完成的罪犯改造率的改造过程者，无法想象这种改造机制及其实现过程的邪恶，没有比「邪恶」二字更能恰切、精确地表达改造机制制度的本质。正常人无法理解这种机械目标所带来的价值。

中共抢得政权六十六年里，其政治最发达的部分，即最有力的部分，就是监狱。体制的邪恶本质导致了实现改造目标方式的绝对简单及其冷酷，绝对的恐惧实现了绝对的服从，而实现绝对恐惧效果的唯一手段就是电击酷刑。他们提供的由中共司法部颁行的《入监教育读本》的前言部分，首先就是「中央领导同志」周永康下达的，关于罪犯改造率的「重要讲话」语录，并说整个司法部系统在「中央领导同志」周永康的重要指示里，找到了实现罪犯改造率目标的方向和信心。

十七、电击器下的惨嚎声

截至2012年元月4日，马兵找我进行威胁性谈话时，半个月的时间内，在我的耳力能及的范围内发生了电击酷刑四次，这使我感到异常震惊。罪犯进入刑罚执行程序依然有电击酷刑现象，这是我绝对不曾料到的，这大概亦属我的神让我终于来到监狱的一个重要原因。被电击酷刑人的惨叫声与其他任何生理巨痛导致的惨叫是不同的。我自己曾多次被电击的经历，使我一听即清楚有人正在被电击。那种惨叫，严格说来是惨嚎声，是一种不间断的嚎叫声，我的体验是他与意识无关，至少，意识是不能止息这种嚎哭声。

我进入监狱后，为了相对地减少冲突，经审慎考虑后，我向监狱当局承诺将严格遵守监规纪律，不挑起冲突，前提是监狱当局必须依法办事并保障人权权利。但连续几次的电击酷刑时，我都站起来来回踱步，因为我实在难以平静，不安和愤怒攫住了我的感情。不论其姓甚名谁，这时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人的惨嚎声，在不远处还有一支代表现代科技成果的电击器在电击一个人，而正在做这一切的却是一个头上顶着国徽的人，他不是罪犯，而是一个赋予改造罪犯职责的警察。

我了解这个制度，可以绝对地肯定，同一时间，在这片国土无数个角落里，无数个头顶国徽的人正在进行这种昧灭天良的「工作」。但直接被听在耳朵里的，依然使人的良心、正义感情受到一种毁灭性的挑衅和践踏。我清楚在这种漫无边际的丧灭天良面前我作为个体的束手无策，但我无力使自己无动于衷，我一直在考虑对策，当然也在自私地考虑着给自己可能带来的后果。在这种对策还终于没有思量成熟前，我本能地选择了不再遵守他们的制度，以期他们来找我时与他们做计较。

2012年1月4日上午，电击器滋滋喳喳声与人的惨嚎声再次响起，我的感

情再次受着煎迫。没有到他们下达的「下学习」时间，我站了起来，结果只一会儿，禁闭室门被打开，马兵背着手走了进来，他一进来就问：

「你最近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我正准备找你们呢。从我来到现在，这已经是我听到的第五次啦，你们不应当这样做。」

我正说着，他打断我，说：「嗯，那你听到了又能怎么样？你别多管闲事，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

我说：「是的，我的确无能为力，你们这样做是违反《监狱法》的。」

这时，外面来了一个他的同事示意让他出去了。

对于这件事，双方的交涉开始，我就要计较到底，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我的努力几无实际意义，这是这个制度罪恶的一部分，根绝之，唯改变这个摧灭人性的专制制度一途，但既已碰面，就不能不表达我个人的作为人的在乎。就此事，在此后近一个月时间里，我先后与监区长艾尼瓦尔、教育科康建辉科长、李副科长（名不详）及马监狱长进行了面对面的表达。除了艾尼瓦尔监区长决绝否认外，几位科长在不同场合、不同的时间面对我的关切，均默默地看着我，未做任何表态。

马监狱长则是听完我的关切后，足有半分钟时间咬着下嘴唇不语，然后猛地抬起头来说：「按说是不能这样做，应该依理服人，可现实有时很复杂，有时对的是些精神病人吧？」

我说：「马先生，要是精神病人就更不应该了。按照中国的刑法原则，精神病人犯罪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他们就不应该出现在监狱，更不该明知是精神病人还用这种方式来改造他。」

他说：「也许是间接性精神病人。」

我说：「马先生，咱们不是就此事辩论，针对任何人的这种行为都是对整个人类的犯罪。我想特别提醒您的是，这不是您的个人错误，也不是你们沙雅监狱的错误，他甚至不是你们监狱系统的错误，这是你们改造政策的必然结果。如果您能使得这种行为减少了，甚至不再发生了，这对您个人而言是功德无量的事。」

这只是一种感情的本能表达，我清楚我在这个阶段的无能和无力。他们不会停止这种改造方式，因为他们实无力停止，他涉及到庞大的系统利益问题。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这点，电击器的声音没有改变，也没有减少，但人的惨嚎声音却改变了，那惨哭声直似从瓮底发出的，显然，那是在嘴上给缠上胶带的结果。

我唯一能做出的就是替他们祷告，并继续进行交涉。针对我对电击酷刑的关注，他们竟设计了一种犯人每个人每个月必须填写的表格，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填写的表格中签名证明：监狱对犯人从不实施酷刑，没有一个人敢不填表签名。有一次，我直接叫来艾尼瓦尔监区长，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他断然否认，他通过瞭望口，歪着脑袋一脸严肃地说：

「我不会做那样的事，我自己也是几个孩子的父亲，我还是心理学本科学历，能干那样的事吗？但是，在家里，孩子不听话、做坏事，做父母的也一定会教育他们，有时甚至打几下，但那都是为了爱他们。这里也一样，对不听话的，我就像对待我的孩子一样教训他们，请你别乱想。」

他说这些时我一直在轻轻地摇头，他完全在说假话。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是在一个有信仰的家庭长大的，并迄今仍生活在信仰者的环境中，这是我最鄙视他的一点。

十八、艾尼瓦尔监区长

艾尼瓦尔具有多重人格，是个官场产物，这真是他自己的大不幸。然而，他颇自负，这与他的个人积淀及阅历有关。他是个平面人，究竟没有汉族的官员那么复杂，这也正是后来他被从我身边调离的原因之一。相较汉族监区长的阴暗冷酷及花样百出的诡计，我更愿意和他打交道。他有狡猾的一面但颇不谲掩饰。

我到那里的第一个冬天，禁闭室内异常寒冷，保温内衣裤外加棉衣裤，这等装束便是在外面亦足能御寒。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出在禁闭室内不允许活动。艾每天进来查看禁闭室的温度，铁门门缝围着一圈两三公分厚的冰霜，作为景致倒颇显超俗，但作为人的居所那的确是惨了点。有时他一天进来几次，有时他一起床就进来，嘴里念念有词：

「高智晟受罪了，高智晟来到新疆受罪了。」一边念着，一边弯腰用手触地测温。

我多次目睹，他在监狱长面前装出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这种明显是装出来的驯服、恭敬的神态，矫情又滑稽，与他在犯人面前判若两人。因为我的禁闭室里面是地暖，有时实在冷得受不了我就坐在地上，所有值班警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独陈帆副监区长是个例外，你一坐地上，他会急急如扑火般过来制止。你告诉他房间实在冷得不堪，他会说那不是他能管得了的事，说强制你遵守监规

纪律是我的责任。

十九、世界上还有这种法盲

关于陈帆，我在沙雅监狱前期吃过他的一些苦头，他是艾尼瓦尔的副手，年龄二十四岁，肩上挂着一杠一星，这是警界最低的衔，但十六监区二十几名警察中，在多名两杠三星、两星的老警察之上，却当上了副监区长。我常暗忖，他若没有后台背景则必有过人之处，即便是在坏的方面。我在沙雅监狱的入监教育期间，他是分管对我的文化教育，因此与他的接触最多。所谓对我的教育，实际上就是个形式罢啦。我清楚他们需要的不过是陈帆面对面教育我的画面及课时，做向上汇报成绩的资材。那画面颇滑稽，每周一至两次，陈肩着长条凳子进来「教育辅导」我，五个多月的「入监教育」，一本十几万字的《入监教育读本》，两天便读完，却硬是让我读了近五个月。无论从文字还是从法律、法理各方面，那本书对大多数有初中学历的国人来讲并不深晦，陈帆懂的也未必见得宽泛出众，然而我得认真端坐倾听他的教训。有一次，他读到书中说，有些罪犯以自己的行为是违法而不构成犯罪为托词，而无理申诉的事例，便大声呵斥说：

「这是最可笑的法盲，说违法而不构成犯罪，世界上还有这种法盲，哪有违法还不构成犯罪的。」

学法律者都知道，犯罪必定违法，而违法则不一定犯罪。犯罪违反的是特定的法律，即刑法；而违法则是对违反包括刑法在内的所有法的一般表述，诸如婚姻、继承等私法以及有关行政、法律、法规等专门的法律、法规等。这证明陈先生此前是没有接受过普法教育的。

我从聊天中得知他是2007年当上警察，其时他才十九岁，因此对他的经历颇生出些兴致，就问他，你学什么专业？他说没有学什么专业。

「很抱歉，问一下你什么学历？」我问。

他说：「相当于技校学历。」

「那您怎么可以考公务员呢？」我又问。

「新疆有新疆的特殊性，这有什么稀罕的呢？」他说。

「那您还是比较特别的，竟然能成为副监区长，这个监区有许多警龄、衔阶远在你之上者。」我说。

「啊，对的，公务员很多，但能走上领导岗位的毕竟还是少数。」他对曰。

我进沙雅监狱第三天时，他与监区长进到禁闭室各做自我介绍，陈莫名其妙地一个侧身，面墙而立，说：

「高智晟，我告诉你，你慢慢会了解我，我不管你以前在外面有多牛逼，在我这什么都不是，一点用都没有。你是个明白人，不用我给你说得太多吧？」他显然是给我说话，却不看着我。

我到沙雅监狱的第三天，在走体检过场的时候，他自己坐在桌子上翘着腿大声训斥我站姿不正确，那显然是在他的一大堆上级面前表现自己，因为我刚到监狱几十个小时，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样的站姿是正确的，他多次在他的领导面前挑我的刺。我总不说话，第一没必要，其二，他实意是要向领导表现他自己，至于说因此而践踏了别人的人格尊严，他的身分是完全不可能想到这些的。

他未调离之前，我每两周都被强制刮一次头（监狱称理发为「刮头」）。其他犯人刮头都是集体在大厅里，由「红马甲」负责执行。由于禁闭室内不得有插座，所以理发时必须到同在一楼的「谈话室」去理。每次刮头都是由他负责给我刮，他不仅是法盲，而且心里颇不光亮。他每次刮头前，都要先进到禁闭室里给我戴上黑头套，由两个警察将我架到谈话室。我指出他的做法是违法的，他却振振有词，说法律也没有规定犯人在监狱不能戴头套。我立即驳斥了他的说法。在中国这样的制定法（大陆法系）国家中，政府的行为只能是法律的授权行为，法律明显规定可行的才能实施，亦叫授权性规范，绝不能是任意性规范。这与公民的行为正好相反，法无明文规定即不可为。他听了一脸茫然，俄顷即说，别给我讲这个，这是监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别的老狱警曾私下向我提及他，提醒我在他跟前别太认真，说他心狠手辣，这正是领导看上他的一点，说他对犯人狠着呢，说你千万别招惹他。实际上，我的出现，对沙雅监狱而言亦属一个意外的局面，这一点他们在后来多次谈话都有提及。

二十、一句「谢谢啦小伙子」犯大忌

中国的监狱，是这个星球上最特殊的场所，高墙电网里是公权力的天堂，却是私权利的地狱。而公权力实际上已异化为每个警察个体的绝对权威，这种权威所向披靡且漫无边际。由是在这种奇异的环境生出两种扭曲变态的人格，狱警的无限膨胀却弱不禁风的敏感人格，和犯人的无限卑下却异常麻木了的人格。我常坐在禁闭室思忖这种现象。警察动辄即很受伤害，暴怒到歇斯底里，而犯人的

格尊严则真似脚下的泥土，常被踩着而终于不喊出痛。一种身分上的区别，被错误地理解或被搏捏成了人格尊严方面的差异，而身分上的绝对不平等终于异变成了人格尊严方面的绝对不平等，生出了两种绝对病态的人格，例如你全无恶意的一个玩笑，这在正常人之间不但寻常，且受欢迎，但绝不可以发生在犯人与警察之间，狱警在这方面的计较程度真让人哭笑不得。

犯人每天自己去打两次开水，而我是没有这种自由的，每天由值班警察给我打开水，一次是巴拉提和奴尔艾利两位警察来给我杯里倒开水。后者在提壶倒水时，前者来了一句「到满啦小伙子」，我在接过水杯时来了一句「谢谢啦小伙子」。不料犯了大忌，要是别的犯人则解决起来很简单，臭骂或暴打一顿，警察被「伤害」了的尊严也就迅速「复原」。在我跟前可就稍复杂了一点，可究竟又不能不计较。第二天中午，马兵和教育科干事高建军把我押至谈话室进行谈话，说是受马监狱长的委托来找我谈话的，而谈话内容却令人目瞪口呆：说我在昨日警察倒开水时称警察为「小伙子」，是对警察的极大不尊重，严重伤害了警察的自尊，人家已经反映到了监狱领导那里去了；指出让我不要忘了这是监狱，更不要忘了自己的身分，说这是个很恶劣的纪录，在沙雅监狱是从来没有过的纪录。我笑着指出他们活在一层坚硬的壳里，全无了人的乐趣，他们却不以为然。

后来，我也渐渐习惯了这种不同，因为我们实实在在地是不同了。比方说我们的伙食，直到昨天晚饭前面对大哥为狗准备的那盆食，我感慨说若是在监狱里端到犯人面前，那绝对算得上是一餐很好的改善。我曾不止一次在李建峰警官跟前说过，说他们若有一位警察敢尝上一口犯人的饭菜，在于他们，那算是一种英雄壮举，因为他总是在我就伙食差的问题进行交涉时说：「我认为犯人的伙食是不错的。」

二十一、专案组是中共政法委的尚方宝剑

时间在飞逝，而我对沙雅监狱的了解也在增加，尽管监狱当局煞费心机，尽一切可能硬生生地封堵我的视听。另一方面，对监狱当局对我的三年监禁策略框架亦基本了然，我总结为以下几句话：一是一以贯之的禁闭式关押，二是一以贯之的隔绝视听，三是一以贯之的饲以猪狗以下的伙食，四是一以贯之的不得施加酷刑，五是一以贯之的剥夺我的所有依法应享有的犯人的权利，六是要绝对确保我在沙雅监狱不出事。完成上述目标，对于沙雅监狱而言，颇不是件容易的事。

三年里，我能明显地感到他们作为具体执行者的难处，对于监狱而言，对犯人的监管手段几十年来退化到唯暴力监管一途，由于是以法律名义的关押，监狱系统也不愿在与我交涉的三年里对我动以酷刑，他们非常明白，周永康系统在此之前六年里的手段无不用至其极，而终于没有改变什么，他们没有必要再使自己的脸谱制度化，这一点他们是明智的。但，作为一种制度性的本性，冷酷和蛮横是他们维护监狱秩序的全部手法，除此之外，他们会变得束手无策。不出手则已，出手即双方冲突不断，而有些安排方面，作为具体的监管监狱，他自身也有无奈。诸如全禁闭式关押、剥夺囚徒当有的全部权利、禁闭室内长达九十六周的高音喇叭骚扰、完全隔断视听等。

有人在私下给我讲过，说沙雅监狱也很无奈，「因为这都是局里（指新疆监狱管理局）的特别指令」。对一以贯之的禁闭关押，不仅是违反基本人权的冷酷行径，而且是直接违反中共《监狱法》之原则的。他们在《入监教育读本》中，在向罪犯阐述劳动的必要性时特别指出，说单纯的监禁是不符合人道的，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让罪犯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是最重视人权保护的，所以政府为了爱护你们的人权才让你参加劳动。还特别指出，全世界的监狱都普遍地认为单纯的监禁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会造成被监禁者严重的生理和心理疾病。可他们对于我，则不仅是单纯的监禁，而且是单纯的单独禁闭式囚禁，三年不变。在这个问题上，新疆监狱管理局应该也没有决定权，连中共司法部也没有。项目组的实际组长于泓源说了才算，名义上周永康是项目组长，实际上他并不事必躬亲，实则全由于泓源高擎着「周」字的大旗而恣意妄为耳。

项目组是「文革」的产儿，他不仅超越法律，而且超越诸多的法定组织机构，直类似过去皇帝的尚方宝剑。今天，中共的各级项目组，不啻是中共政法委手里的私器。中共政法委是个非法律组织，而非法律组织则不可能有法定的办章程序，即办案程序黑帮化。而项目组则出于政法委这个非法律组织，其办案的黑帮化性质更加昭然。以我的案件为例，名义上是周永康同志和孟建柱同志负责，实则由于泓源全权负责。一个北京市秘密警察头子，他可以随时聚扰公、检、法三家负责人，随时假周永康同志及孟建柱同志的名义下达指标。所以，我到新疆关押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关押，都是由于泓源亲差孙荻具体执行。据沙雅监狱一名警察私下讲，我的禁闭室装修及其相关数据的提供，北京国保方面都是专门跑到沙雅来安排的。所以，这种违反《监狱法》的禁闭式监禁，中共监狱

系统也是奉命办事耳。但监狱系统在执行对我的禁闭式监禁时是有所保留的，这当然是基于他们的利益角度，而非对我的关爱而予的保留。

二十二、隔绝视听的手段

2012年6月10日，因此前的6月9日上午我的一次针对自我生命的激烈方式抗议，监狱狱政科和狱内侦查科两位科长来找我谈话，首先对我的自我行刺行为，宣布了监狱给我的记过处分，其次不厌其烦地给我念了禁闭关押的有关规定。这个过程颇值得玩味，他实际上是向我暗示，监狱是有保留地执行着对我的禁闭式关押，许多更严苛的措施监狱方面并未认真执行。诸如严格按禁闭关押执行，则每天只能吃到两餐饭且没有菜、每餐只有两个馒头、室内只有三至五瓦的灯泡、节假日不得休息、禁闭室夜里睡觉不给褥子等、不得通风、不得参加文体活动、不准会见等。告诉我这些，是让我明白，监狱已经是照顾我了。但对我而言，禁闭式的监禁本身对我造不成伤害，物理空间的局促对我造不成什么影响。人眼里的空间究竟不是最大的。

对于一个有信仰者而言，无限的光明和自由空间是在闭上眼睛之后。我希望能被单独囚禁，因为集体纷杂扰攘使人不堪。最主要的是，那种群体被驱来策往的过程，人的尊严荡然不存。另一方面，我也想充分地利用一下困厄挫辱这笔难得的资源，以期完善并尽可能地提升自己。因为我有过这方面的经历，我以往精神方面的积累大都获取在困厄挫辱时，而非春风得志时。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单独囚禁过程对我的生命质量提升而言，无论怎样夸张地形容都不为过。他使我获得了几臻至理想的，与我的神交通的环境。禁闭室围堵起来的不是孤独，而是幽静肃穆。对于当局而言，禁闭室并不是他们隔绝我视听的唯一手段，他们在给我制造与世隔绝感觉的问题上，颇花了些心思的，且在坚持方面是不懈而一丝不苟。但这不具有新颖性，这只是北京秘密警察手段的接续，他们长期巴望这种做法能给他们带来惊喜，可时至今日，这种惊喜终于还没有出现过。最常见的检验方式就是谈话者经常一见面就问：

「老高，今年是哪一年？现在是几月？今天是几号？」

我常不客气地分两层回答他们：第一，这对你不当是个问题，除非你刚来到这个星球；其二，为了不使他们失望，我不仅准确告诉他们年日，而且具体告诉他们现在是几点几分。他们往往一脸茫然。

在沙雅监狱执行对我的视听隔绝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较而言，秘密囚禁则容易得多，只要选点恰当则可。而监狱则不同，他还得在同一栋大楼里关押其他罪犯。但从看的角度而言，即遮堵我眼睛的而言，他们是成功的，但并不完全成功。十六监区监禁大楼是坐东朝西，禁闭室在一楼的西侧，从南至北十四间，我就被关在这最边的第十四间。从视角角度，我的对面是八、九、十号三个集体监舍。据狱警讲，为了迎接我的到来，在我将要到来的前一天，这三个监舍的犯人全部搬出而腾空。截至2012年4月初前，监狱方面成功地做到了没有让我看到一名大盖帽以外的人。事实证明，他们对我的隔堵是有道理的。

大略是2012年4月初，据说是监狱爆满之故，实在不得已，上述三间监舍也满满地关押了犯人。但在第三天或者第四天，被我看出一一些明显的违法及违反人道方面的问题，我只是在康科长与李科长与我的谈话中，指出了这些被我无意发现的问题，两位科长对此一语未发。但奇迹出现在当天夜里，我听到了有铁床铺挪的声音，颇折腾了些时间。第二天起来，在他们开门例行地收走被子时，我发现与我做了几天邻居的三个监舍关的犯人已全部撤走。那三个监舍的几十名囚犯的消息，后来也有了答案，各监舍每天无数次报名，原来每个监舍关了十二人，第二天起则都成了十四人。由于放置铁床影响室内秩序，各监舍多出来的两名犯人每天晚上铺着一块木板睡在地上，早晨起床时统一将这批多出来的木铺板收进库房，一到晚上就再拿出来，此后两年半的时间里天天如此。

我的存在对中共当局而言实在是个巨大的现实，但堵上我的眼睛，对当局而言意义则更是巨大的。使我一直深感不安的是，究竟是因为我的缘故，使那么多的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睡地铺，且每天都须搬来搬去地折腾。由于我的缘故，隔壁的十三号禁闭室也不能关人，就只好做了三年的临时库房。每至搬出、搬进床板时间，准会有警察过来悄悄关上我铁门上的瞭望孔，三年来从不例外。这次搬家风波后，除了一名每两周给我刮一次头的师傅外，直至被押出监狱再也没有见过一位大盖帽以外的人。

二十三、一种看得见的死寂充塞着

按中共《监狱法》规定，犯人只是不准留长发，但在监狱里实际执行（**至少是在沙雅监狱如是**）却成了一律强制刮成光头，两周一次，任何人不得例外，我在技术问题上一概不坚持硬抗。陈帆副监区长未调离之前是由他给我「刮头」，

他被调走后即换由一名罪犯给我「刮头」，使我有机会在两年多的时间与犯人近距离接触。然而，这种接触严格计较则不能算是人类意义上的接触，因为双方不能说话。我可以不忌讳他们的戒律，但却不能不替他考虑，不愿因我而带给他不必要的麻烦。见面向他问个好，刮完后向他道个谢，他都是笑一下以示回应。

每一次「刮头」时间从不超过五分钟，一般在两到三分钟左右，但每两周一次的「刮头」，对十六监区来讲是个绝对的大事，禁闭室无法接电，只能到一楼大厅里进行（陈帆在时只能在谈话室）。十六监区每个人都须为这两周一次的盛举付出一点代价。首先是由值班警察事先指挥众「红马甲」将一楼的窗户全部关闭，而窗户上的玻璃是贴了窗霜花纸的，使我不能看见外面的任何东西，关掉大厅里几乎全天不关的电视机，然后一楼进行清场，除了大盖帽及我的「刮头」师傅外，全部犯人得暂时躲在外面去，遇有异常天气时，则将人员全部清至二楼大厅，待我回到监舍后再返回或下楼。遇有临时安排的谈话或会见、体检时，一楼的犯人不论正在做什么，都须立即中止撤至二楼。待我走出禁闭室时，整个一楼一层死寂。尤其「刮头」时，平时喧嚷的一楼大厅，三个小凳子（两个狱警加我）旁伫立着那面无表情的「刮头」师傅，一种看得见的静寂充塞着一楼。从上一次对面三个监舍突然搬走犯人后，一楼北侧二分之一的空间独占性地属于我的「场」。一楼楼道又恢复了一道犯人不可擅越的红色警戒线，越过警戒线在监狱算是重大违纪行为。

我的周围绝大部分时间是静寂，大致上，维持表层秩序的最有效手段莫过于暴力。在我看不见的旁边有三个监舍，我和他那里面的犯人唯一「接触」方式就是听，听他们每天的报数，听他们每天被训斥、被辱骂，听他们每周四夜里的「唱红歌」，但他们的监舍绝大部分时间是没有声音的，被属于我的静所淹没。犯人每天早晨新疆时间七点半钟起床，一般不超过八点半就会出去劳动，午饭和晚饭时各回到监舍半小时内即出工，晚上十点五十分至十一一点休息，犯人若能提前二十分钟回到监舍算是偶然的幸运。晚上一回到监舍即简单洗一下开始睡觉。由是，整个大楼就再没人死寂。一天二十四小时，他们在监舍里能发出声音的时间绝不超过三个小时。其余二十多个小时即全属于「我的时间」。

当局为了制造这种气氛可谓煞费心机。依照法律规定，监狱每天应予犯人一定的听新闻时间。但沙雅监狱的犯人这项权利应该是被几近完全取消了的，三年内打开广播的时间不超过十天，即只在2013年4月9日至4月17日打开过几次，其余时间，属于新闻性广播是绝对没有再打开过。便是这么几天，那些黑暗的东

西也未能忘了对我的特别关照，他们把一楼北侧半栋的喇叭全关了，一楼北侧半栋的犯人因为我的缘故，而不能听到喇叭新闻广播。2014年年初以前，沙雅监狱监舍里是没有电视机的，每个楼层的大厅里装有一台电视机，犯人每周周日上午、周日晚上可以看几个小时电视。由于大厅里白天一直有警察值班，所以电视机也就一直开着，唯独我每次去「刮头」的时候关着。有一次警察忘了关，或者因为是体育比赛他们实在想看，而被陈监区长发现，立即下令关了。据说还作为一次违纪事件进行了处理，还罚了警察的款。

我刚到沙雅监狱时，他们有节假日播放流行歌曲的习惯，陈监区长调来后即从此停止播放，因为那次电视未关事件，他们干脆撤去了一楼的电视机。为了不允我看见犯人，我禁闭室周围的卫生平时也不能打扫，只在遇上上级检查或重要节假日，才在事先关闭我禁闭室铁门上的瞭望孔门后，于警察在场情况下进行打扫。那里真是个特殊的世界，拖地的工具竟不带把，犯人只有撅着屁股用双手握着一堆布条倒退着拖地。

二十四、一座专门关押维吾尔族重刑犯的监狱

对沙雅经历的记述，因为除了关押时间外，没有别的事项是在记忆中线性发展的，因而我的记述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凌乱的感觉。我的记述基本是循着一种自我聊天式的模式，每天只是把彼时记忆中想起了的东西记录下来，而实在不能一件件地捋出个顺序而去记述。对这种凌乱，我得在此向未来能看到这些记述的先生、女士们表达我的不安和歉意。

对于沙雅监狱的见闻已经有些篇幅了，可我迄今未介绍沙雅监狱本身，这在我，实在是有着现实苦楚的。实质上，我无法实质性地向诸位介绍他，我在那里生活了三年倒是不假，可除家人的两次会见加起来有一个小时外，我的全部时间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不足八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度过的（我曾有一些文字里看到，金大中先生竟能从囚室里看见星星，李敖先生也能在囚室里见到太阳，让我羡慕得一塌糊涂）。来时戴着黑头套，去时半夜押离，从看的角度，我实在不能给朋友们更多的东西。但从听的角度，我能谈的亦是十分有限的。

沙雅监狱是一座专门关押维吾尔族重刑犯的监狱，里面监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维吾尔人，我只听狱警说这是座专关维吾尔人的重刑犯监狱，仅此而已。据我所掌握的相关知识，以警戒程度界分，中共监狱分为高度戒备监狱、中度戒备

监狱和轻度戒备监狱；而按服刑人员刑期界分，则分为重刑犯监狱、轻刑犯监狱及一般监狱。无疑，重刑犯监狱属于高度戒备监狱，这类监狱关押的对象依法只有刑期达十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缓罪犯。但实际上，中共重刑犯监狱还秘而不宣地关押了些特殊罪犯，即「政治犯」和「邪教类」罪犯，这也是我这个三年刑期者被关在专门关押重刑犯沙雅监狱的部分原因。

在中共的所有监狱中，重刑犯监狱的条件是最差的，而管制却是最严苛的。沙雅监狱当算得上一大型监狱。一个参考迹象是我所在十六监区，是否是编号最高的一个监区不清楚，但至少亦有十六个监区（后来不知为什么改称六监区），他们那里是每三个监区一个关押点，集中围堵在同一高墙电网内，我们监区所在的点关押犯人一千多人；另一个参考迹象是每天通过狱警人手一部的对话机点名编号呼叫，从「00一」开始，最高听到过呼叫「三八三」号（这是我听到的最高的号，我只能偶尔听到，到我跟前来的狱警是不能带对讲机的），证明那里有四百名以上警察。据说，每个监区一般编制在十二名左右，而我所在的监区是个特别情形，专门看管我的警察不低于八到十名。而十六监区又是集中关押政治犯及邪教类罪犯的。

沙雅位在南疆阿克苏地区，紧邻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人类聚居地的边缘，地处塔里木盆地。气候干燥少雨，冬寒夏热，每年3、4月两月属季节性沙尘天气，有时一连数天，甚至数十天里尘埃蔽日。以禁闭室的密封情形，有时早晨起床时，那床垫上的褥子被挪走后，赫然一个褥子的形印，地上用指头一捻，一个指印。有时一连几天甚至十几天，即便在梦中也能闻到一股呛人的尘土味。听警察讲，那里地下水位高，含碱量很大，若是纯蓝或纯黑色的衣服洗了晾干后，能看见附在表面的白色状物。据说除棉花外，其他植物其生不繁。那里不是人类生活的一般理想之地，却是一个兴建监狱的好去处。沙雅的正南乃至西南，及东南面数百乃至千公里以内的扇形地区，都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我在那里三年的时间里，从未有过一场象样的雨，下雨是那里的稀有景致。

二十五、「包夹」成员成了特殊的生命体

对于监狱里，通过看，来了解他，对我而言也是不可能的，但究竟还是有过三天时间，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由于监狱爆满，不得已，他们曾在我禁闭室对面的两个监舍关押过三天左右的犯人。仅在这三天的时间，给了我直观了解这监狱

的机会。

我发现那里有一种奇特的政治，即类分人的政治，这种类分人政治的标志是不同的犯人佩戴着不同颜色的胸牌。这种上面涂上不同颜色的胸牌类分着不同罪犯的身分。后来我咨询过狱警，他们说这是区别不同罪犯的认罪态度，改造积极性相关的管教级别标志，分为严管犯及宽管犯，而严管犯又分一、二两个级别，宽管犯亦然。但在那样的群体中，能佩戴胸牌者还算幸运，最不幸的是那些肩部、前胸及后背上赫然缀着黄色布片的政治犯和「邪教类」罪犯，那极艳目的黄色布片就直接缝缀在囚服上，幅面足够地夸张，双肩及胸乳以上和后背的大半部。政治犯的后背缀片上写着「WG」（**危害国家安全罪中拼音缩写**），而「邪教」类罪犯后背缀片上的字母缩写我竟记不起来了。

尽管罪犯群体的处境普遍非常地糟，但最令人哀伤的还是「政治犯」及「邪教」类罪犯的处境，不管那群犯人中的什么人，不管他们佩戴的是什么颜色的胸牌，他们人人可以把这两类罪犯踩在脚下，且不用承担任何风险。

「『政治犯』和『邪教』类罪犯的人道处境非常糟糕，我希望你们能克制，给他们以起码的人道承认，保障他们作为罪犯的权利。」这是我在向康建辉科长及李科长当面就此事交涉时说的一句话。这两类型的罪犯被剥夺了一般犯人应有的除了吃饭、睡觉外的一切权利，诸如放风、看电视、课间站立起来原地活动，闲暇聊天等权利。我看他们从不进行，哪怕是轻微的抗议，包括面对其他罪犯的侮辱。

中共政权在政治上最成熟的经验之一，就是对犯人的管制。他们在监狱将所有的犯人编入一种叫「包夹」的小单位，每个「包夹」三名罪犯。「包夹」成员实际上成了一个特殊的生命体，吃喝拉撒睡须臾间不可分离，相互监督、实时举报，一人犯错误，而其他「包夹」成员不举报则后果连带；一人上厕所，其他两人直站在跟前；一人有情绪变化或不满言论，其他两人须立即报告，否则责任连带。他实际上是将所有的人串成一个提串，他的另一头则是捏在狱警手里。而各「包夹」还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对「危安犯」及「邪教」类罪犯的监视及报告。

我常为政治犯和「邪教」类罪犯的处境感到焦虑。我清楚我的交涉对于改变他们的命运而言无实质意义，但唯能如此而已。白天他们的房间里只要有广播，那内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针对他们的，且没完没了。当面议论他们，指责他们，当着他们的面向狱警告他们的状是每天必有的内容。而不论哪位狱警进监舍，都会首先问：「有没有『危安犯』、『邪教犯』的情况报告？」最热闹的是每天

早晨起来打开监舍门时，一群人竞相报告「危安犯」「邪教犯」的情况。这种公然的歧视及侮辱几乎每天如此。那些杀人犯、强奸犯们，竟然因为有了政治犯和「邪教」类罪犯的存在而竟高尚起来。监狱真当评估一下这种做法对于监狱自身的意义。

二十六、点名、报数，然后不确定的恐怖

在那样的群体里，保有尊严，对没有信仰者而言是十分困难的事，但最可怕的是人们整体没有了这种自我保有的自觉。我发现，那种靠着恐惧维系的秩序是很脆弱的，只有外在的硬力量才是最有效的或是被认可的。至少，我能得出的结论是，监狱的饭（**菜则有量限，而饭则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馒头**）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可饱足的，但每次盛馒头的大铁桶一落地，一群人每每立成扑状上去抢馒头，饭前的排队不但瞬间消形，其意义也完全被眼前令人难以置信的凌乱给否定。这里其实出现了一个保有尊严的可能环节，但所有的人却竞相在那馒头面前奋力，而没有觉得出这种奋力的极不尊严。那情形常颇使我难忘，我倒觉得监狱当局在这种存在的改变上可以有些作为，但究竟意义不会大。每个个体对尊严的在乎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每个个体在奋力自爱的同时，也当对身边的同类存有最基本的爱和尊重，而这又是痼疾僵化的专制力所不能为的。

使人深感忧虑的是，鉴于这种实施了六十多年以硬力量维系「秩序」的机制，他现实地成了一种干脆成熟的去人性机制，他在这样的过程中模化了所有人的格，将所有的人都干干脆脆地改造成了纯生物意义上的人，怕和自私成了最显著的特征，而暴力之外如影随形的「包夹」机制则更是强化了这种怕和自私，人人以人为壑，人人都是一个行走着的无良、自私和怯懦的堡垒。

中共监狱羁押人数从来都是顶级「几密」。我个人认为，中共监狱所有的羁押人数当不在一千五百万以下，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中国的监狱数量远远大于大学的数量（**做了几年律师才知道，光是关押未决犯的看守所，加上兵团、铁路、海事、军事各级各类看守所，总数当在五千以上**）。他的这种改造机制，不是在矫治人，不是因类施教，对症下药，与人讨论是非，使人认识到错的基础上从内心培育人的善良、爱及责任。只是简单机械地追求他们所谓的改造率，而实现路径及手段又全靠暴力压制。这里只有监狱自身的工作目标而不再有一丝的社会责任冲动，终于异化成完全自顾自，而与社会的文明进步建设脱节。

根据我几年的听闻，在那里唯一起作用的就是恐惧，恐惧无时无处不在却又看不见，不确定的恐惧在每个人的心里徘徊，既无力驱散又终于不得躲开之法。例如他们每天的集中点名，早晚各一次的集中点名是确定的，而不确定的点名也随时进行。这种点名制度安排对每个犯人都是一个不确定的恐怖。一声站队点名，混乱、急促的跑步声骤起，在一阵凌乱之后，列队、立正稍息，屏息等待，接下来就是不确定的恐怖，却每天必然要发生。

点名、报数，惊心动魄地被暴打。报数过程被暴打的概率最高，成了一个人人自危的恐怖过程。尤其那些不大熟悉汉语者，更是终日栗栗危惧，他们被要求必须用汉语读数报名，有许多人来自僻壤远乡，根本就不懂汉语，但那是一个什么地方，不仅不被理解而且不被允许，不仅不允许你不熟悉汉语，而且不允许你有个学习过程。一个数字报错一顿暴打后再重新开始报数。一层楼最多时甚至近二百人，总有人出错，报数、打人，再报数，再打人。有时竟很长时间都耗在这种循环中。我可以肯定，一部分人当会因此生出心理问题。我曾就此与一个狱警谈过，他说可能有，他说就有过一些农村来的巴郎子（维吾尔语，小伙子或男孩）听到叫点名就吓哭了。

报数即便终于结束，但「恐怖」结束的只是一个回合。又一个例行的回合开始，集体或个体被训斥，会有人被责骂、被处罚。有人被叫出来的，羞辱殴打全取决于值班狱警的偶然心情。我是那里唯一不参加这种过程的囚犯，但客观地说，不参加的只是我的形，我的心每必全神贯注地参加到其中。我更多的是为那些每天必有的、不确定地被殴打、被羞辱者担心，常因此哀伤、愤怒而终于束手无策。我常想，对于人的尊严，人的基本权利而言，一个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会造成怎样的灭顶之灾？！

二十七、用当宗教点燃每颗黑暗的心

弗兰克说过：「人会为意义而生，也肯为意义而死。」我常在想，坐牢是不幸的，而落到专制中共的死牢里，则更是一种毁灭性的不幸。

在那里，最没有尊严、最受欺辱的是政治犯和「邪教」类罪犯。但从某种程度讲，那里关押的有谁不是政治犯？每个犯人在入监教育期间都会有一本违反监规纪律处罚明细手册，在第一类「重大违纪行为」中，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就被列为头一条。任何人，在监狱里，你若不拥护共产党

的领导，在那里的一切努力就不被认同。犯人整体一天有五阶段需要背诵不同的誓词「感恩政府共产党」「感谢党和政府」及「我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等都是誓词里的内容。

这个邪恶的党，他总是在不恰当的地方出现。并不富裕的中国纳税人是监狱费用的全额承担者，犯人应当有感恩心理，当感恩的当然是中国纳税人，每天让犯人举起拳头，把应予纳税人的感恩给同样被纳税人养着的共产党，这是一种对道义、良知及常理的野蛮强奸。由这样一群背弃道义、良知及常理的群体来执掌犯人的改造，你尽可想象那结果会是何等地糟糕！

他们在犯人中间强制灌输邪恶价值观念的同时，没有忘了消灭犯人内心可能的光明和美好。在《重大违纪行为目录》中「非法宗教」详列其中。在监狱里，你才能真正看清共产党对宗教的真实心态。共产党反的是宗教，而不是什么「非法宗教」。而「非法宗教」本身就是个荒诞说词。请看他在「重大违纪行为」中列出的「非法宗教」内容：「做乃玛孜或变相做乃玛孜的」（**是穆斯林的一种祷告过程**）、「煽动他人做乃玛孜的」、「祷告或变相祷告的」、「煽动他人做祷告的」、「用穆斯林的模式进行洗漱的」、「饭前或饭后用穆斯林的模式摩擦的」等，样样针对的都是宗教本身，而非所谓的「非法宗教」。

而实际上，宗教非法与否何以界定？谁可以做宗教的裁判？我曾问过几个狱警，其中一位高某就是专门负责这方面教育的。

我说：「你们天天喊反对『非法宗教』，什么是『非法宗教』？」

他们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又问他们：「既然你们喊禁绝非法宗教」，在这里，你们保护的合法宗教行为是什么？」

他们说，在监狱里就没有合法宗教。

「那么没有合法宗教，则何为『非法宗教』？」我又问他们，依然是没有人能回答。

我和他们中间的不少人讨论过这一现象，我认为，在监狱里存在太多毫无意义的压迫，他的另一面就是太多毫无意义的被压迫，亦即许多压迫导致的苦难，除了被压迫者的痛本身外并无意义，这实在使人不解。「人会为意义而生」，一旦失去意义，人就活不下去。今天的监狱，用强力维持着一群人的活着。求死不得是一种更可怕的生活，监狱现在的「包夹」制度及夜里监舍的坐班制，就是完全堵绝了一个人的死路，活得毫无意义你也必须给我活着。实际上，这正是极权

体制的愚昧和邪恶，人世间没有任何群体比那里更需要宗教的沐浴。当允许每个人的内心寻找在苦难中活下去的意义，用宗教点燃每颗黑暗的心，在那点亮的心里去培植善良、爱、诚实和责任，这对监狱是百利而无一害，不知疲倦地、长期愚昧地与人的内心向好的期望作战，这是怎样的一种愚蠢?!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话题，因为在那里，在管教者群体的内心点燃宗教的星星之火，则更是个当务之急。因为管教者的人格及观念，比被管教者更需要矫治。例如：他们可以从容地撒谎，说谎不假思索且全无心理负担，把弄虚作假当成职务行为而有序布置，而从容操持。

二十八、高墙电网内胜似天堂的表演

在沙雅监狱，每年都会有若干特殊日子临到，那就是迎接各类的检查及参观，不亲耳听见，真不敢相信，一个作假的过程会是如此轰轰烈烈而人人奋力。每到这样的时日将临的前两天，监狱即开始了为检查者或参观者进行预演彩排。楼内过道及大厅开始挂红悬彩，平时昏暗的楼道也会为彩灯扮亲。最令人心醉神驰的是大楼外，真可谓鼓乐齐鸣，常让人想起「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王维诗境。

那院子很大，是一个点三个监区一千多犯人用的公用场所。能确切地分辨出来，从不外乎的套路是整个大院分为三大场所：一处是汉文化中的威风锣鼓，鼓钹声振聋发聩，据狱警眉飞色舞的描述，真正夺魂摄魄的是在那威风震耳的鼓钹声里，那庞大的用彩绸裹头、彩衣覆身的表演阵容；另一处是更庞大、更冲击视觉的太极表演阵势，人人身着黄彩衣裤，踏着优美的音乐，在艳阳下画一演变（我是只能一边听着狱警的绘声描述，一边闭目玄览）；还有一处是维吾尔的传统民族鼓乐合响，据说也有一大阵和着鼓乐跳着「刀郎舞」的人。真的，你若闭上眼睛，置身于那欢庆喜乐的氛围里，你会忘了自己置身何处。

真不是杞人之虑，我曾为此有过担心，因为这种直上干云霄的「祥和喜乐」氛围，会有让那群参观者中不谙世事的糊涂蛋产生非进不可的理想，因为这种氛围使人觉得那高墙电网外才是足让人却步的人间苦境，而这高墙电网内，才是胜似天堂的乐土，参观者但有生活不如意者，受了这「真实」场景的蛊惑而萌生出非进来不可的决心，岂不是祸事？因为还有一样物质安排内容则与那精神大观场同样有着蛊惑人的气魄——即每至这样的时日，中午必有一顿好饭，那饭真的会

提醒我们是在这人间。

每至彼时，警察来送饭时，我都会念念有词：「人间烟火味，人间烟火味，一不小心回到人间一回了。」他们笑而不语。

但这对监狱方面而言则是个大痛，对他们而言，是我们在喝他们的血。但对我们而言，亦是个「塞翁失马」的事。参观一结束，他们会忘情地喝上一阵子我们的血，饭菜质量较寻常猪狗以下的标准再往下滑一大截。需要澄清的是，并非说在这样的时日，犯人就能呲着牙面对山珍海宝，那种特别改善的饭菜要在高墙外，送给叫花子你都会一脸抱歉，只是相较于我们平时的饭菜而言。

这样的过程每年至少也得有个三四回。但我所担心的有人会被蛊惑而决心非进来不可的事也不会发生，因为2012年4月20日，来参观者的几句话即冰释了我的大虑——楼道里突然响起一个颇不美的女声：

「人大政法组的、纪监组的，看着我手中的旗子，别走散了。」

来者亦非俗器，更是一群深谙骗术的内行，不过是一群骗子之间的荒诞游戏耳。每一个这样的过程，唯一积极的意义就是使犯人能喝一次监狱的血；但究竟，犯人是长期被喝者。

二十九、一周一次的饭菜「改善」

有一次，我为饭菜质量太远离猪狗的标准而与监区进行交涉，监区长康建辉出面与我交涉（康仍为教育科长，由于替换艾尼瓦尔的陈监区长屡屡与我发生冲撞，从2013年10月后，十六监区监区长暂由康代理）。康让人到大厅把贴在墙上的食谱拿来给我看，我真的无法记述我当时看了食谱时是怎样的目瞪口呆，那是艺术，那是远远高于实际生活的艺术，是造假的艺术。原来，我们在「纸上」的生活是那样的让人悦目，在那张纸上，我们不仅当天早晨还「喝上」了鸡蛋汤，而且每天还有花卷、面条吃。我以前总以为艺术究竟还会与生活有些干涉，这次终于看清了原来艺术可以如此地远离生活。

我以前听说中共大部分监狱里犯人的伙食还不错，因为虽然政府给付标准极低，却有弥补之法，那就是犯人的生产收入可予些许补济；但沙雅监狱这般无边无沿地差还是超乎想象的，但他的差只在菜食和花样调剂方面。沙雅监狱的馒头很好，而且好得一以贯之，馒头不仅好，且可以饱足。但那一周二十顿馒头，足使人对那好馒头蹙额。更加上那一以贯之的水煮白菜，那真是一种无边无际的苦

楚，我是一闻到那煮菜味就发呕。

名义上一周有一次改善，就是一顿面条，即维吾尔人的拉面，菜还是往日的煮白菜，里面有时能看到黄豆粒大小的鸡皮。我常想，即便放进去两公斤重的一只鸡肉，这一千多人每人碗里也当有两克左右的肉，但绝大多数情形下你是没能力从碗里找出这种东西的，尤其那肉的做法更给身处苦难中的犯人增加了苦楚。可以断定，那是将鸡肉剁碎了扔在一锅水煮白菜中煮出来的，毫不夸张，那菜味绝对与杀鸡摊上那锅退鸡毛水味无大异，那种腥臊味蓬蓬勃勃，要吃进去这一周一次「改善」的「鸡肉菜」是真的需要些毅力的。我有两次直接将菜原封不动退到来送餐的马兵手中。

便是这样，这一周一次的「改善」也不能与法定的节日犯冲，一旦这周里有个法定节日，这种「改善」就会被取消，待到节日那天即成就了那节日的「改善」。每逢节日，这种算计从来不会错过。最滑稽的是，每逢大节则必有一顿包子，这包子的馅就是平时的煮白菜，量却远不比平时量足，一个包子咬上几口仍不见白菜出来。尽管这样，从2012年10月份以后，我的每周一次「改善」待遇也被取消，至2013年7月一次与马监狱长的谈话中我究问其故，他惊诧说「不可能」，可我这一周一次的「改善」还是实在地被取消了，这次交涉后又给恢复了。

常人无法理解我们与那一顿面条的计较，那是只有在那种环境中才能有的苦经验。可能读此文字的朋友会以为我有刻意记述沙雅监狱的「不是」之嫌，这正是我所力图避忌的。我所展示的是一个具体监狱的问题，却是整个中共监狱问题的一个剖面。我从不认为这是沙雅监狱独有的问题，而问题是否全面、客观，这是我不能肯定的，因为三年里我只能看到我一个人的饭碗。但狱警无数次告诉过我，说你的饭菜与其他犯人的是一样的，而这信息是否是不真实的，我不得而知。

我想澄清的是，我对沙雅监狱没有恶意，我对他们更多的是怜悯，因为作为具体的监狱，他们对我也没有恶意，他们只是更上层权力针对我实现恶意的工具而已。相反，作为具体与我打交道的执行者，他们在许多方面是务实的及变通的，这是我要感谢他们的（我在后面会谈及相关方面的问题），但我绝不会因此在揭他们的问题时徇私情，因为他们身上的所有问题，都有这个制度以及这个社会时下问题的醒目标志。

三十、过度劳使犯人的问题

「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这是人类用苦难得来的经验，可这不争气的民族迄今不肯醒悟，尽与人类的普通经验反动。这终于衰老下去的民族，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里整体地被愚昧攫住；而此后的又一个三十多年里，攫住这民族的邪恶大手竟不见得有松动，更不幸的事是，这民族又被近乎原始的自私和贪婪攫住，这是这民族的大痛、大不幸。诺大的中国，今日竟只剩下唯一的一种声音：祸国殃民的「爱国贼」的声音，这实在是人类这个时代的不幸而畸形景观，我的这些文字会成为嫡派「爱国贼」讨伐大阵的目标。但究竟不过集体怒吼而已。

在沙雅监狱禁闭的三年，我体悟到，指责他们践踏法制，那有些高抬他们，也有些为难他们。法，作为人类文明的普世成果，便是践踏他，究竟还属文明人类群体中的现象。今天，沙雅监狱的问题是出乎人类文明范围的问题。人类最成功的文明成果，就是对同类生命的爱 and 缘爱而生成的敬畏。这种普遍存在于文明人群体中的爱和敬畏，是每个生命最信实的心理安全保障，亦属不可怀疑的共有底线，这个底线是构筑个体之间、个体及群体及群体与群体之间信任的基础。一个人、一个群体，乃至一个民族，当他们下堕至这个底线以下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下堕至人类社会人以下的纯生物人状态。堕人这样的状态中，无论你身置何种位阶都是不幸的：压迫与被压迫者，都是不幸的。被压迫者没有尊严，而压迫者何曾有过？在全世界，中国公职人员的权力最大，但他们却是全世界最没尊严、最不名誉的公职人员，如果他们无论整体还是个体，他们若理解了人类关于羞耻的含义，那他们一天都混不下去。虚假和暴虐成了他们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尊严。他们极喜欢权力永远私化下去，这纯私化的权力终于将毁掉了他们，因为他们把权力已私化到山穷水尽的境地。

我曾找李建峰警官就沙雅监狱过度劳使犯人的问题进行过几次交涉，其余的时间我记不大清楚，最后一次交涉在2013年11月份（**凡我所说的画面应当都有录影资料保存**），我的原说大致上是：

「李警官你好，从9月份以来，你们完全取消了犯人的星期天休息。我一直以为是收棉花季节的缘故，现在看来不是，一则棉花早已收完，二则犯人这段时间的劳动都是在楼上。我特别提请你们在过度劳使犯人的问题上能有所克制，承认他们的基本人道需求，能使他们得到应有的休息，至少每个周日当保证他们得到休息。就过度劳使犯人的问题上，我已有过几次对你们的提醒了。」

遗憾的是，类似情形下，每一个与我面见的警官的第一反应就是替监狱辩解或者撒谎（这里我无意指责李警官，那种辩解与撒谎实在已于意识、是非判断观无关）。

李警官立即回答我：「他们都是自愿的，都是自己要求的，因为他们多干活可以挣点钱。」

「李警官你相信你正在说的话吗？」我问他。

还好，从当周开始，犯人星期天休息了。

三十一、监狱犯人的劳动所得哪里去呢？

专制制度下的监狱，那高墙电网圈住了一种颇原始的制度，即奴隶制度，只不过犯人的处境比奴隶要差得多。奴隶尚可娶妻生子，夜里尚有关起门来的自由；犯人则在夜里像动物一样被关在一起，连睡觉都被监视器及坐在监舍里的「坐班组」人员盯着。那高墙电网还圈住一种原始的自由——公权力的自由，但公权力只是那里权力行使着的面相，实际上，那里已没有了公权力，如非要说还有的话，那也是一伙人手里的公权力。这种捏在一伙人手里的公权力只剩下三大作用：一是接受来自国家的钱财，二是暴力维持对监狱当局有利的秩序，三是使犯人成为监狱实现私利的活工具。

我过去听说犯人虽从事繁重的劳动，却可以换来提高生活水平，具体就是改善饭菜质量的结果，但至少在沙雅监狱是不能够，他的不能不是因为那里没有繁重的劳动，而是监狱当局原始的贪婪。监狱犯人的劳动所得喂哺着一种暗存于监狱体系的分利机制，这种机制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我能得出的确切结论是，以沙雅监狱为例，其犯人的收入来源为两大块，一块是终年不辍的外事加工收入，一块是监狱种棉花的收入。这种收入的一部分就成为监狱警察的私分利益（比例不详），这是不允质疑的现实。有警察给我讲过，说光外来加工收入他们监区每月奖金不低于三百元。这种利益分配机制将每个警察都囊括进来，不仅刺激了获取利益的冲动，更使监狱的全体警察形成一种共同的利益默契。在如何劳使犯人的问题上，不用再做专门的动员即能形成惊人的一致，由此生成了每个成员对这种分利机制本能的保卫冲动。

阿克顿说：「权力滋生腐败，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是世间最可怕的东西。我留心观察的结果是，犯人一天劳动时间在十二

小时左右，这是可以计算得出的结论。犯人每天早晨七点半起床，夜里十点半至十一点钟睡觉，期间共有十五个小时，早晨出工时间绝不超过八点半，午饭和晚饭两顿饭加起来的的时间绝不超过一个半小时。每天用于劳动的时间绝不低于十二小时。有时还经常提前起床。

我曾就提前起床问题及犯人的劳动时间问题，多次与李警官交涉过，颇引起他形于色的不满，他立即喊来「红马甲」（当然只能使我听见而不能看见）问：

「我们早晨有没有让你们提前起床？老实回答。」

「红马甲」大声回答：「没有提前起床，是按规定起床的。」

但在时间上他们是蒙不了我的，他们对此也很清楚。一天十二小时左右的劳动，竟还被取消了星期天，这种行为直可以「惨无人道」来形容。我的交涉意义不大，因为究竟我会有一天被押离那里，一切都将复归原初。可能有些愚昧的「有识之士」会对此质疑，说监狱不有驻检监督机构吗？不还有上级有关部门的监督吗？那是他对中共官僚体制架构的无知。要知道，监狱内部也有当然的纪检监察部门，他们的存在，只是扩大了分赃的群体而已。在中共把政的六十多年里，纪检、监察、反贪、反腐的机构可曾少过？中国公职人员的贪婪行为可曾减少过？谁有能力在中国找到一个不贪腐的官员？至于说上级主管部门，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保护伞，而是下级贪赃枉法所得的主要分利者。

新疆沙雅，据狱警讲，个人种植棉花年收入百万乃至数百万元者颇不少，而监狱的大规模种植利润会更加可观。外面的电、水、种子、劳动力等成本，对监狱而言，是不存在的。虽然犯人每月可以领到八元钱的补助，这钱也是由纳税人承担的。由是，在新疆任意一座几千人的监狱，其仅棉花种植一项收入当在千万元以上甚至几千万元。这些收入都哪里去呢？我曾就这一问题问过一个老警官，他笑而不语，结果过了两天他给我讲了一个颇有深意的例子。他说，监狱的一切花销都是记在犯人头上的，他很诡异地笑着说这是应该的，因为这是犯人的劳动收入嘛。他说，以养鸡为例：

「今年沙雅监狱又增加了六、七千只鸡，用犯人养着，吃犯人种的粮。下的那么多的蛋哪里去了呢？当然是给犯人吃了，你信不信？有帐呀，帐上记得清清楚楚，全是你们犯人吃啦。鸡肉也一样，都在帐上记着呢，都你们吃了。」

我给他算了一下，从我的碗里情形判断，每五个犯人加起来一年若能吃到一个鸡蛋，那就已经夸大了事实，而每十个犯人加起来一年绝对吃不到一只鸡，监狱除「肉孜节」外，只要「改善」，百分之百的是鸡肉。实际上，他是通过这

事例告诉我，监狱收入所有被私分部分，都是把帐记在犯人名下的，用《入监教育读本》里的话说是：用于犯人的生活改善和添置改善劳动工具和生产条件。其实，劳动工具及生产费用都是由纳税人承担的，所以我认为这些奴隶的所有劳动收入，绝大部分被监狱及其省里的上级主管部门私分，而极少部分上缴司法部后，或可能有极少部分以利润的面孔上缴国库。实际上，一个现实的存在是，在每个监狱里被关押的犯人，其只有形式上的国家属性，这是因国家承担监狱运转费用才维系着的一点形式，而其实质上则成了各监狱那一圈大盖帽的私有奴隶。

对私利的贪得无厌，生成了他们每个个体对这种分利制度的保护本能，以及对过度劳使犯人这种不人道机制的本能辩护。这是许多人，包括分利者中的部分人都意想不到的分利机制。公共权力赤裸裸地私化，既已私化，私意支配即变得心安理得起来；既已私化，那么如何劳使犯人、如何管理及对待他们更有利于实现私利，就会成为那一群大盖帽本能的默契和冲动。我也是在那里待了三年，才慢慢看或听清了这些表象上无法得出的道理。

三十二、不当利益置换了人的道义感情及良知

我开始也不大理解，琢磨着，人世间的道义、人的良知为什么会在一群人中整体消失？渐渐地终于地启悟开去。不当利益作为一种买价，慢慢地置换了每个人的道义感情及内心的良知，当然亦有别的复杂原因，诸如个人的无力感、被迫随大流等因素。因为那种环境对人的改变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明显地改变了而个人却不得觉知。

例如，有一位叫毛锐尖的大学生是与我同一天到达十六监区的，我的习惯是不论见了谁，即便是我的压迫者，我都会向他问好，不论他如何反应亦不改这种习惯。这毛警官，头半年里，你问他好，他亦回问：「你好。」半年以后，你问他好，他回你以「嗯」。一年后，你问他好时，他不再理你。我曾笑着说他终于成了合格的警察了，他不解其意，我告诉了他这种变化，他说他没有注意到。其实，这是分在那里上班的所有大学生警官的现象，只是他们不自知耳。

又如，他们还有一个规律是，在初上班半年左右的时间里不大会去骂犯人，但半年以后渐渐地像警察了。我曾和不少警察讨论过这一现象，包括在北京时曾与张雪（张雪说有的人他就吃这一套，他举了个例子，说他上班第一天抓了个贼，师傅交给他审，结果审了两个多小时那人死不承认，他师傅从外

面回来后二话没说狠狠地抽了那人两巴掌，然后坐下一问，那人全招了），但监狱的警察普遍地认为：

「犯人都是些杀人放火的东西，你不收拾他，他不吃你这一套。」

人很容易俯就现实，稀里糊涂地成了环境的一部分。一个善良的人加入了中共公务员群体，那实在是一种不幸。

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假如我是狱警中的一员我会如何？我坚信，我成不了恶人。但没有人可能拒绝分到你手里的利益，更不可能以正当与否和到手的利益办理交涉。在冷酷劳使犯人的问题上，我们看到的是人类不加节制的贪婪之害。为了实现私利，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贪欲，监狱对犯人的过度劳使已到了毫无理智的地步。按照法律规定，劳动者每周的工作时间是有规定的，即至少保证劳动者每周有一天的休息时间。警察每周休息两天，而犯人有时每周连休息一天的时间都没有，每周工作在八十个小时以上，长年被驱不若鸡犬，而之所以若此现状，并非国家法律规定使然，而是一群人的私欲支配结果。这个现状已成不能改变地存在着，这正是不受限制权力运行的必然结果，在现有体制下解决之，无异于自握头发而欲将自己提离地球之难。

我在那里也常想，在监狱这种人类共有的特殊场所里，权力与权利关系的处理问题。绝不能以其场所特殊而回避了这个问题，从长远利益及一个人的精神利益角度着眼，身处权力不受监督的环境中是一种不幸，他不是导致掌握权力者的人性缺陷，而是致他们人性残疾。在许多方面，你能明显地看出这种他们不自知的残疾。

我曾有一次在洗脸过程中被值班警察白利平奚落了一顿，但他奚落我的用词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

「你洗脸时间，以后快点，都五分钟了还没洗完，人家别的监舍十几个人，洗漱时间八到十分钟必须结束。」

我说：「十几个人洗漱时间不超过十分钟，这怎么可能？（我有意刺激他）您不是在说谎蒙我吧？」

他真跟我急了，说：「怎么不可能？一直都是这样的制度规定。你这人说话，我蒙你有什么好处呢？哪个监舍敢超过十分钟？」

后来的我看到的事实证明了他在这件事情上倒罕有的没有撒谎。我的对面监舍关进来犯人的两天里证实了他的说法，犯人竟然整体不刷牙，每人进去洗手间到出来的时间绝不超过四十秒。

就此事我直接问过马兵，我认为这种一个监舍十几个人的洗漱时间限在十分钟之内，这完全违背了客观实际，犯人竟然集体地没有刷牙时间。他说，这是监狱，监狱的管制是无处不在的。但后来又有警察与我私下交谈时说，新疆有新疆的特殊性，说穆斯林信徒有一种宗教式的洗脸，洗的过程会在心里边默祷边抚摸自己的脸，担心他们利用洗脸之际进行非法宗教活动。我说，穆斯林信徒以宗教方式洗脸是正当的宗教活动。他却一瞪眼说，在监狱里面进行宗教活动怎么不是非法的？而他自己就是穆斯林家庭长大的（说不定私下里，他自己就是穆斯林），说绝不能给他们进行非法宗教活动提供机会。

在那里生活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在压迫者眼里，被压迫者作为人的基本需求是不被理解的，甚至是不再被承认的。我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以喝水为例，监狱犯人与警察喝的水就不同，这事作为机密向我们保密，可实际上不下于三个警察在无意中向我「泄露」过这个机密。沙雅监狱犯人生活饮用水来自地下，那水毫不夸张地说是色味俱全，我曾在李建峰及巴拉提警官面前说过这些不客气的话，我说：

「没有蛇蝎心肠，是不会让犯人饮用这种水的。」

那种水煮面是不用放盐的，这绝不是夸张。但也有警察讲过，监狱也知道这水不适合饮用，说浇了树树都死，也曾情真意切向上级呈以急请，请求解决，上级为此拨款五百余万元（这是我刚到沙雅监狱就饮水问题交涉时，警察给我讲的）说很快就能解决。后来，这话被李建峰警官证实，也是说很快就会解决。我在那里关了三年，离开时，问题依然如故。用警察的话是，钱一到沙雅监狱就没人急了。

三十三、新疆监狱管理局监制的胶鞋

那里有太多的黑暗常让人目瞪口呆。买来的东西质量与价格的反差能达到超艺术的程度。据说，此项利润一年即可获数百万。当然，这种获利机会的获得者的背景是不言而喻的。此项利润并不属监狱而是私人承包，一个月只进来卖一回货，全监狱犯人一个月消费不是小数字，我们那三个监区点一千多名犯人一年就是一百多万元，而且那里的货售价高得让人咋舌。不究品质，仅从外形上看，一件汗衫在外面最高十元钱，那里面要卖价三十元。三十元买回来不到一周就破了，马兵警官帮我让缝纫组的犯人给我缝好了。在冬天里，禁闭室睡觉脖子冷得

不行，特嘱马兵买一套高领内衣；内衣必须洗一次才可贴身穿，可洗完晾干后的结果让人哭笑不得，高领上衣成了成熟的低胸衣且成了「短袖」衣。内裤则成了标准的「中裤」，我买的还是最大号的。我与马兵进行了交涉，给的答复是，没有办法，监狱卖的东西就是这样。最后，只有不再穿他。这货物来源带有私管道属性，那么纯粹从公共管道来的又怎么样呢？他们发给我一双外形与当兵时的胶鞋一样的胶鞋，看上去当是很结实的，我心里还盘算着至少穿他一年以上，因为监狱里卖的胶底布鞋绝不出三个月报废，鞋底在水泥地上轻画即成一条黑线。

我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家里人靠着疲劳肢体攒下来寄给我的，每花他们的一分钱都是我的感情负担，所有在这三年里与我接触的狱警见证了我的节俭，但那真是使人目瞪口呆的夸张效果。那外表颇不错的胶鞋，穿到第三天，左脚前方即开了个大洞。我想这一定是个偶然现象，便是用纸糊的，糊到那种厚度，若对付着穿能穿上几天是没有问题的。现实很快证明，那问题不是偶然现象，因为到第五天时，右脚上穿的那只鞋也风光无限地开了花。由是，我开始认真地琢磨开他的品质来。原来，他用的胶是一种极生脆的胶，轻轻一折即裂开，轻轻一撕就开，这种超艺术的夸张效果，我只在《康熙微服私访》电视剧的腐败官场看见过几次。最令人感慨的是，在前鞋脸上，「新疆监狱管理局监制」几个字组成若红太阳般的一个圆圈赫然印在上面，那是怎样的一种气魄？一种无法无天的气魄，一种毫无羞耻的气魄！而对那个红太阳般的标识，我无论作为纳税人还是公民，或者是接受这鞋的囚犯，都让人感到一种莫大却束手无策的耻辱。那一圈汉字，他是对文明无耻的示威，是对接受他的人的一种侮辱。

我找来他们进行交涉，辩护的本能使他们脱口而出：「所有犯人的鞋都一样，没有人故意给你一个人发这种鞋，一般就是穿一到两周就扔了。」

公权力有一个绝对特质，即只要失去监督，他就会置换成私利，且决绝地不顾一切地去置换。

「新疆监狱管理局」这三年里作为一个恶的影子，他无处不在。作为犯人必读的材料，我看了不少由他起草的文字，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罪犯管理守则》，他最大的特征是反人道、反法制，从政权角度看，他还直接反宪法、反立法法、反监狱法。你感到那不仅仅是一群法盲在起草东西，你同时觉得那首先是一群流氓，其次才是法盲。你能从那些材料里看到一种自由：公权力恣恣肆肆的自由。他们把政治犯完全当成了恶魔，那种精细的管制，除了疏远了法治及法律本身外，真可谓「滴水不漏」。即便如此，在实践中也不执行那里面规定的，对政治犯于

狱警在场时可以适当放风的规定，而是完全取消。回想小时候看中共拍摄的《红岩》电影，国民党监狱竟然每天给政治犯（他们实际上是一群暴徒）在院里放风，竟然允许他们在监舍内自由行走，犯人绝食不但不受电击、关禁闭处罚，而且还做出让步，觉得与共产党对于政治犯的手段比较，那监狱简直是天堂。

三十四、换灯泡·加防盗铁门

2013年，我的禁闭室对面正对着瞭望孔的墙上挂了一个铝合金大相框，上面大书一「德」字，而背景画面却是老子的画像，相框正面又赫然写着「新疆监狱管理局监制」一行字，常听人讥笑中共官员文盲、流氓加法盲，绝大多数情形下的确并不冤枉他们。老子说过：「上德不德。」即真正的德并不表现为形式上的有德，亦即老子是反对「德」字「上墙的」。将「德」字上墙却配上老聃的画像，这是个无知的笑话。而最滑稽的是，一群当下最丧德、毁德之人高举这「德」字大旗，这实在需要超人的无耻勇气。

那个时段，在于我，只要有挥之难去的苦楚时，必会有人私下给我提到是「局里（指新疆监狱管理局）安排」的声音。2012年春节期间，我的禁闭室灯管烧坏，当时是春节休息，他们给临时换上一个小灯管，据说是十二瓦的换成六瓦的。房间里原本就很暗，这样一换则更暗了，但考虑到春节假期完了即可以换上，也就忍一忍就过去了，可没想到这竟成了一场无法摆脱的噩梦。为了将这六瓦的灯管换成十二瓦的，我无数次与监狱当局进行交涉，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不能成功。后来有人说，给你换灯管的权力在局里，大的换小的可以，小的换成大的则必须报局里批准，局里不批实在没人敢给换。在这文明制度国家，这种现象会被当成笑话听，有时你很想找个不鄙视这一群同胞的理由，终于你会发现你在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这使我想起另一个我亲身经历的笑话。

2010年底，中共武警北京总队作战部部长率众来到我的囚禁点，亲自部署作战任务。究竟是作战部长，一来就看出了结构性的战略漏洞，认为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应该在我的囚室外面的过道上再加一道防盗铁门，「以使党的『执政』地位更加稳固」（士兵的话）。中共武警总部作战部立即批准此项伟举，并报主管副司令某中将（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最后定夺。该中将为了在战略及战术上把握全面和准确，在两级作战部长及北京武警总队某少将以下一群骁将悍兵的簇拥下，来到了我那臭不堪闻的囚室门口。据不少士兵讲述，说那中将很年轻，很有

气魄，说他们的李副指导员却显得战兢、猥琐（提前两天就有师里，总队的两级工作组来反复调教这李副指导员如何向首长敬礼，如何向首长报告，并嫌他的形象过于沧桑）。于是，在我囚室门口装个防盗铁门的伟举开工，笑话才开始——首先是价格的向上滚雪球，至少有不低于十名的士兵讲述过这种让人笑不起来的、中国特色的笑话。几乎所有士兵都认为，那个防盗门最多价值两千元，但从中队到了大队就成了五千元，大队到了支队就成了八千元，支队到师里就成了一万五千元，而师里到总队就攀升至两万元，说总队到总部的情形就不清楚了。但这并不是笑话的巅峰时段，后面发生的事更使人哭笑不得：此项工程竟被列为当年年度武警部队所办成的「十大实事之一」，而且，防盗门安装竣工之后，一时全军上下来参观者众，真可谓摩肩接踵，一时间，我的囚室门口热闹非凡，不亲身经历，实难相信这是一群正常人进行的过程。

言归正传，换个灯管的事终于在十五个月有了眉目，实际上我理解是沙雅监狱的一种变通，即禁闭室实在是有些太暗，而我又屡屡提出交涉，「局里」却终于不批准，最后于2013年3月17日，他们又在我的禁闭室多装了一盏六瓦灯泡，既未触犯局里的禁令，亦解决了实际问题。

三十五、局里要求每周写「五书」

这「局里」在我的问题上开始时是有些想法的，首先「必须彻底放弃反动立场，弃暗投明；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绝不会给你好下场的」。但对于我的改造，手段上是由司法部定了调的，对于像中共新疆这样的「局里」，你不允许他使用酷刑，等于废去了他的所有行为能力。不能用肉体酷刑，他就想别的办法。

按中共《监狱法》规定，犯人在监狱期间是可以买书或借书看的，但「局里」彻底违法剥夺了我的此项权利，至2013年3月17日前，由于「局里」的特别关照，我实际上是等于完全没有书看。你从监控画面里看，我的身边每天白天是搁了一本书，但那是一些用途不在手纸之上的书，什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什么《邓小平理论》等。那陈监区长笑嘻嘻地拿来了一本书，表面看有几斤重，但接过来一看是本《江泽民理论著述》。这是人类最愚昧的一种对物力的糟践。

到2012年5月份，鉴于我不停地交涉，经「局里」批准，监狱当局给了一本老子五千言的《道德经》，什么「圣人病，以其病病，夫为病病，是为不病」，一口气让我看了五、六个月不给换书。当然，这能读到老聃的五千言也是有条件

的，那就是「局里」此前让我每周必须写「五书」，即「悔过书」、「思想汇报书」、「决裂书」、「揭批书」、「决心书」，这是所有政治犯及「邪教」类罪犯每周必须完成任务。对于「局里」而言，他有足够的办法逼使你每周完成他要求的五书。但对于我，他的所向无不克的办法又不能用。有趣的是，我倒写过几次「五书」，只是写的内容「局里」大为不满，不但「顽固坚持着反动立场，而且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诸如，每次的「五书」，我每「书」里只写一句话……

「悔过书」中，我一般写句：「我后悔自己过去对中国黑暗势力的罪恶揭露批判得不彻底。」

「思想汇报书」中，我说：「我每天都在思想着如何结束中国的黑暗制度。」

「决裂书」中，我写一句：「我决心与中国的黑暗势力以彻底的决裂。」等等。

后来，他们终于不再要求我写这「五书」，但要求每看完一本书必须写一份「读书心得」，我同意。这是一个伸缩度很大的问题，尽在自己掌握中。但他们出尔反尔，可以想象，让一个反动分子在关禁闭期间忘情地看书，肯定会使有些人心里不舒服。到《道德经》看完后就不再给书。因为此前几年里疏离了人间文字，即便是再糟糕的书，他还有人间的文字可供我亲近。所以，我提出愿意看看毛泽东的书，因为毛的书从纯技术的角度是可以看看的，更何况，毛选集的一至四卷有着一定的史实维度。后来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他们只提供了毛选集的一至四卷，我要过几次第五卷，终于不给提供。可能与我书写的「心得」有关。

三十六、读毛选集心得

研究中共历史的人必须究读毛的著述。毛的书我读得颇认真，我多次要求每天能提供一支笔及几页纸，希望能把一些即兴的感触写下来，但终于没能遂愿。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一件事，那时我有着大量的时间，很可以写些随情而发的文字的。所以，当一至四卷看完后，我写了二十六页之多的「心得」。

毛是个幸运者吗？用中国人的成功哲学观，这不当是个问题，但毛终于将是个历史的悲剧，包括他本人和他所开启的波澜壮阔的事业。毛的悲剧没有结束，他的尸体迄今不能安然入葬就是证据。虽然，他身后出了一代又一代「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但终于还是没有坚强到把那具腐尸搬离「中国的心脏」地。毛的最显著的悲剧之一，即是今日中华民族仍然继续着的极权专制悲剧，这是中国社会今天一切罪恶和苦难的直接根源。

毛之后，中国迎来过邓小平及其一群、江泽民及其一伙、胡锦涛及其一帮，今天又有习近平及其一撮强势盘踞「顶层」。但这看似在活动着的历史，对中国人民来讲只有灾难的意义。在愚昧、冷酷及凶残打压这民族的美好愿求方面，邓、江、胡及习，无疑当与毛归于一丘。无耻、冷酷及凶残成了他们一脉相承的能力。

今天，习的技术性反腐好似颇赢得了些赞声，他好像感觉也很好，但这些赞声与当年毛泽东发动「文革」时赢得的赞声比如何，谁赢得的赞声更响亮、幅面更大观？如此万众一心地支持「文革」终于给中国带来什么？邓的改革，当年同样赞声高响，今天，终于有不少头脑冷峻的国人意识到，「邓式改革」是中国继「文革」之后的又一场浩劫，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浩劫，而后者则是一场灾难程度更具毁灭性的经济浩劫（写至此，须泼清的是，我同样不反对改革，但我所反对是这种邓式的最坏改革）。

所以，我们必须冷峻地认识到，毛、邓及习，他们三人的政治目标及政治逻辑是完全相同的，三者的手段及路径上并无本质的差别；无法无天、暴力压灭不同声音及变态的集权方面如脱一模，所以最终结果也无疑将是一样的。你细细思忖一下三者的基本手段及路径，「顶层设计」是他们紧攥着的私活，又都利用着民众情绪发动民众参与，但都不给民众实质性参加权力构建的机会。毛的「文革」给中国造成了几近窒息性的灾难后果，历史已经证明，邓式改革给中国造成的灾难绝不比「文革」的祸患更容易修复，更何况「邓式改革」是被习完全拾捡起来的政治遗产。所以，目前所做的一切，本质是在继续着这民族的悲剧。

而读毛的著述后的「心得」，也招惹了监狱当局的不安，他们找我谈话说：「你写的哪里是心得，那成了对政府的揭批书了。」

因此，决定今后写读书心得时只给一页纸，所谓：「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后来，这一页纸也不敢给了，说我利用了要求写读书「心得」的机会而「继续坚持反动立场」。终于，连看书也给停下来了。双方又屡生冲突，因为他们单纯的禁闭式关押，不允许参加劳动、不给书看，这全是与他们自己的法律规定相违背的，「以子之矛，击子之盾」，我只要求他们遵守自己的法律规定。

三十七、理论精英的突破犹如尖锐湿疣

后来，终于又极不情愿地在几个月后给了一本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读本》。内中说是我党集中了五百理论精英寻求理论突破的结果。我的读后感又让他们恼怒不已。我就抓住了他们集中五百人格侏儒搞理论突破的肮脏心理——他们为什么要搞理论突破？不自信。他们比谁都清楚，共产主义在全球早已是过街的鼠子，只有鼠子般目光的丑类们才会将之抱持不放。理论突破做什么？说简单一点，就是给狗屎改个名称。我是真可怜那五百名党所宝爱的「理论精英」，终于是自取其辱，终于没有能够突破。我用一段文字给他们以形象的比喻。

我说，有一种传统的性病叫尖锐湿疣，病颠时际其状艳如桃花，这将一种使人生畏的性病说成艳如桃花，这足算得上是「理论突破」了。虽然是艳如桃花了，可他究竟还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性病。

他们说，难道人家五百精英还就不如你一个人清醒？

我说，数量并不能决出问题的本质。我又给了他们一个关于数量的例证：我们小时候家里用的茅厕，每至夏天，里面会聚集众多的蛆虫，我敢肯定，那一年聚集数量都在五百之上，也未见牠们弄出过什么突破来。

听者怒目而视，用他们监狱侦查科长的说法是：「这是公然抗拒改造的行为。」

书是又不给看了，其间多次有人私下提过：「局里不让给你看，没有办法。」

三十八、对模化及弱化思维及戕害灵魂的书籍之批判

看书从表面上得到了些改善，是从2013年3月17日后。表面上看，开始能给你些书看，但不仅给你提供的书使你无奈，而且他们终于心里不大情愿，开始算计我看书的时间，并为此百般绸缪、绞尽脑力。其间，发生了几次不小的冲突。你绝食抗议，但一般在绝食三十个小时左右，他们在竭尽一切恐吓手段终于效果不彰的情况下，会在技术上让些步（有狱警私下讲，说我是当下中国唯一敢绝食而不被「收拾」的犯人）。然而，他们给提供的一沓一沓的什么《心灵鸡汤》、《挣得第一桶金》的书，那实在是些垃圾书，至少对我如是。

后来，由于终于认为我并不会放弃反动立场，看完书后的「读书心得」也不让写了。而一些书中出现的问题，甚至是些技术性问题，并不涉及敏感问题，我希望写文字把这些错误给指出来，但当局已是「十年怕井绳」了，不同意提供纸笔。

例如，一位自夸「思想比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的人还要先进」，且「希

望马克思主义能够永驻中国」的「学者」在北京大学的系列演讲，许多常识性的错误几乎充斥他的全部文字中，这大概是他被北京大学宝爱的主要原因。最具娱乐性的一段演讲中，他告诉那群白面团似的北大「高材」生说，地球的自转速度是每秒钟三十公里；他那次演讲两个多小时，倘若地球终于听了他的指令而转了开去，他老人家即使因为「思想先进」，也不能在地球这般转速中从容地讲下去，他也不能一口气与那群白面团熬上几个昼夜。他的演讲还肯定了一个理论，即老子的「大音希声」理论，说地球在自转中肯定能发出巨大的声响，只是由于这声响太大而终于「大音希声」了。白面团团们已经被驯化得没有了质疑的自觉冲动；但我认为他的这一结论是反物理。

另一本《余秋雨散文集》里，我读出一种蓬勃恣意的虚假——爱国的虚假。国，爱到了撒娇，爱到了矫情，爱到了不真的地步，对之作为榜样传播，实在是误人不浅，我希望能写出我的批判，但被拒绝。今天，回过头来看实无必要，但彼时我有的是时间，想抒怀一个旁观者的观点。

在今天的中国，全天候爱国心大炽的嘴力爱国者，普遍颠颠劲远在余先生之上者，说不雅一点比蠢驴都多，对牛抚琴就不再是牛的问题了。真正培养年轻人善良、爱心及责任心的书籍在中国是罕有物，而一些模化及弱化正常人思维，甚至径直戕害人的灵魂的书籍则大行其道，我们不能叫那些坏模子们得了便宜还自觉高尚。我在这里并不是要主张阻止那些传播无识与颠颠术的读物出版，只是在唯有他们才能出版发行的时代里，我们不能没有了抗争意识。

三十九、高音喇叭广播九十六周

关于「局里」对我的所有特别关照中，用九十六周的时间对我进行精神骚扰的高音喇叭广播，是这三年留在我记忆里最为恶劣的黑暗纪录，这种恶劣及黑暗，并非说这种过程对我有多大杀伤力，而是新疆监狱管理局这种愚昧及动机的恶劣。整整缠斗了九十六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他们比谁都清楚，一个「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人，这种教育对我是毫无意义的。作为一群恶棍，他们同样比谁都清楚我骨子里面感到厌恶的东西。

四样内容毫无理智地被重复播了九十六周：「危害国家安全的三十条禁令」及一段不到半个小时的「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内容，外加一段爱国主义教育。每天反复播诵，两段加起来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播出内容，不

但每天反复播出，而且一口气播了六十八周。最荒诞的一次是一口气不间断播诵了三十八遍，这是教育干事高建军自己统计的（**这点他没有作假，与我统计的结果一致**）。「危安犯三十条禁令」是由一位男高音吼播，而后者则是由一名女士叫喊的。那种气氛真的是似曾相识，你若闭上眼睛，那刺耳的喇叭声，那更刺耳的激言厉声的尖叫，仿佛完全置身「文革」的疯狂环境中。开始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到后一段里，必然要灭亡的就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制度，而干脆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必然灭亡」了。有一段不到五分钟的内容里，光「社会主义」一个词就出现有六十多次。其中一段说：「不可否认，近些年社会主义的发展出了挫折，但这是事物波浪式发展过程的正常现象。社会主义将在全人类彻底取得胜利。而资本主义国家必然灭亡，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还有一段说到：中国的社会主义主要发展到最关键时际，又出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

究竟是「新疆同志」，现在中国的一些重要的大地方，你不大再能听到那种「文革」式的激言厉声。真理终于不取决于是否抑扬顿挫，甚至也不取决于激言厉声。绝无半点情绪化的夸张，那女声的激情亢奋劲，直使人觉着她会是一位恣情撒娇的小囡囡。我真的怀疑着她对社会主义的爱、对资本主义的恨至于如此情不能自持的地步。

我曾在几个不同的狱警跟前建议过，我建议他们把这段广播设法复制一下原版隐藏下来，我保证他们将会因此发一笔财，但前提是2017年后立即注册。我至今肯定，那「新疆同志」的激情（**也许是真情**）喧嚷，再加上那与人间烟火不大发生关系的内容，他将在2018年的中国成为风靡一时的娱乐俏货。

关于他们所进行的高音喇叭的扰攘，我与「新疆同志」的冲突可真所谓不计其数。你无法想象更无法理解那种近乎着了魔的邪恶冲动，激烈的冲突每周都有，一个是不该开的时间给你突然打开，到了关的时间不给你关，而冲突最多的是猛然给你加大声音。

四十、自我行刺抗议

2012年6月9日早饭后，由于那喇叭声音实在是大得让人无法忍受，连续几天的交涉无动于衷。当天早晨，我叫来了监区领导，让他们到禁闭室里听上几分钟，结果陈监区长进来不到二十秒钟就出去了，说没有办法，监区只能调大不能

调小，想把声音调小必须打了报告，由上面决定。调小声音，他们只须像调大声音时那样动动鼠标即可，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障碍。我当面告诉陈监长希望他能理智，不要做得太过分。陈昂头而去，喇叭继续刺耳尖叫。

这些年来只要有会，我的血性反抗也没有含糊过，这点他们也非常清楚。我从不挑衅，更不把血性当成常规力量，很多技术环节上随时愿做出妥协，但绝不贪生惧死。当天在再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我割腕抗议这种邪恶的丑行。但这次自我行刺式的抗议是失败的，他们据此发现我也是有「痛点」，用他们的话说是发现了你的「七寸」。对于新疆监狱系统而言，绝不允许我伤残或死亡，这是上级下达的死令。他们在这方面的防范有的是经验及措施，那就是让你绝对地欲死不得，他们有的是人，他们为了「保护」我这样一个敌人，不惜投入人力物力。一时间，专门调来看管我的人绝不低于十人，全天候，一点风吹草动即扑至禁闭室予以防范制止。他们有一种惊人的、常人难以理解的气魄——作恶的气魄。

这次血性抗议使得环境更加恶化，原来一天只安排一个时段的高音喇叭广播，于我割腕当天开始，变成了两次；原来早晨一睁眼开始的广播骚扰上午结束，此后变成了晚上也要进行骚扰广播。我在不同场合的谈话中，都向他们表达了我的不解。人之损人大都是为了利己，损人而不利己的事，便是愚蠢的个体也不见得愿意热烈而持久地去做。我每问他们，为什么如此损人却毫不利己的恶事，你们以国家的名义，当成日常工作来做呢？他们每必面无表情而不发一语。只是私下有人讲，说沙雅监狱并不愿意做这种无用的事，但这是「局里」的要求，说「局里」也不是因为非要与你作对，而是因为部里有要求，而且「局里」要求把这当成大事，要站在政治的高度去做，说实际上只是为了将来总结汇报时，说新疆监狱系统针对高智晟做过几千个小时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当官的脸上有了光就行啦。

四十一、野猪打杀十只上报五只

其他当官的是不会想的，有些狱警在与我聊到这方面时举了个例子，说当地有一种长着巨獠齿的野猪（后来他们给我看了那种野猪的照片，一种使人震撼的美种以其奇丑而成就了的美），说私猎一只野猪在黑市上售价可达一两万元，一些穷急之徒颇愿铤而走险，但当地法律部门的打击也是很残酷的。说当地对这种盗猎者的残酷打击，表面上是在保护这种国家二级野生动物。说可当地有

此牛逼的人，市、县的党委及政府主要领导，武警和解放军的主要领导，监狱的主要领导，公检法的主要领导，他们打野猪吃就没有人能管了。县委书记让公安局领导给弄只野猪吃，你敢不给？

一位维吾尔警察讲：最大的灾难还不光是当地领导爱吃这野猪肉，当地领导的各上级领导也爱吃野猪肉，你就必须给他们弄到。说有时一个电话就要要几只，讲要往北京送，还要说这是政治任务。有这种「尚方宝剑」，下面也不敢含糊，也不会糊涂，打杀十只就上报五只，一半死野猪赴北京完成政治任务，一半就中饱了具体执行者的私欲。

那维吾尔警官说，近几年上面的这种政治任务越来越多，当地的野猪越来越少（在武警部队囚禁期间，一个外号叫「草苗」的士兵曾在新疆库尔勒服役，他多次讲到同样的情形，说杀一只野生黄羊所得的肉量不亚于一头驴；说他们中队长指导员家里的冰箱里常年的黄羊肉、野猪肉不断，还常给上级领导送；说打一只狼做成标本可卖到数万元，连当兵年限长点的士官也敢干，因为他们手里捏着领导的把柄）。那位警官说，不管是干什么，只要说是政治任务，是非对错任何人也不能过问，一问就是不讲政治、政治立场不坚定；说只要是明显的不对的事，百分之百会被说成是政治任务。

他幽默地说：「江泽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发明了『讲政治』以后，什么麻烦也没有了。」

四十二、彻骨的冰冷和无边无际的闷热

2012年6月9日那次割腕抗议之后，这种以高音喇叭为武器的骚扰一直进行到2013年4月9日，鉴于我的抗议从来未停止过，长期担负如此神圣任务的具体执行者实在也疲劳得可以，终于在播了不多不少六十八周时，给换成了「拒不认罪绝无好下场」的认罪服法教育。

有趣的是，有人来找我谈话，说他们为了争取给我调整内容，而不知付出多少感人的努力，希望我就此能给他们美言几句。我虽不在官道，却极谙官道人的心理，这无关宏旨，我懒得动手，加之写这种东西素不是我所长的，我让他写下了自我表扬的文字而给他签了个名，举手劳成人愿。

然而，他们跟我们不同，我常理解他们的处境，能设身处地予他们以理解，但他们却不能。我在那里长期坐着，一天竟至十几个小时，每次该开饭要站起来

时，浑身的那种几近摧残性的痛苦确实足够承受。许多次在吃饭时，为了赶紧缓解臀部痛苦，我就跪在地上吃饭，因为一吃完了饭，喇叭就会实时爆出「学习」的命令。那终于经年累月的「学习」得以维持，当感谢我的意志，舍此，这足以将一个人摧残成千上万遍，但究竟人的生理有限性是无法改变的实在存在。

颇令人诧异的是，包括马兵警官在内，至少有过三位以上的警官，在我吃完饭来收碗时，竟一脸好奇地问我：

「为什么喜欢跪在地上吃饭？」

我只好回答说：「男儿膝盖有黄金，闲置黄金不用是糊涂的。」他们终于还是满眼茫然。

不再理解他人的感情，这是一种人性的坚硬壳层，是铁壳政治的衍生物，因为作为这种铁壳政治的执行人，他们的自身处境与被执行者的处境已属断层性的隔绝。对于被管理者无须在具体操作中有任何的义务性顾忌，这种壳层常随处可见。例如，新疆天冷，维吾尔人又有戴帽的习俗，县城以下的聚居区，每个维吾尔男子一顶帽子是不分季节的。在监狱，一年到尾，每两周一次「刮头」，人人光头而不能有任何例外。在这一问题的执行上是完全背弃人道的。你的法律并未强制性规定（不论什么，一旦你指出他们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他们会立即给你拿出「局里」的一大堆规定，他们完全无视立法资格、立法程序这些决定法律生命能力的东西，以为只要领导写在纸上，交给下级的就是法律。由于有着这样的「法律」意识，所以那里的「法律」泛滥成灾。例如：有一份「局里」关于对犯人日常监视的记扣分标准文件，其中有一条要求犯人每周要交一份书面的「思想汇报」，汇报时必须包括以下内容：你本周在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法律观、价值观、民族观、国家观、道德观方面的认识。你若身处其境，则可得知这种规定有多么地不现实——许多犯人连名字都不会写，偶尔听到他们教授的文化课内容：上、下、左、右、人、大等）犯人必须剃光头，即便犯人剃光头对你们有着重大特别的政治意义，你们是不是应该在冬季给发顶帽子，他们每天去外面可有两到三次的放风时间，光着头实在过于寒冷。

我问过狱警，为什么只有个别人有帽子而绝大部分没有，他们说只有夜里坐班组才能有帽子，因为坐班组在别人起床后还要负责院子里的卫生打扫。而他们警察冬天却有棉帽子戴，就像他们夏天有短袖而犯人却没有一样。沙雅监狱洗漱用的地下水，便是夏季用起来亦是彻骨地冰冷。我曾多次请他们换位想想，设法给犯人解决，他们大都会冷冰地告诉你：犯人就是犯人，要知道自己来这里干

什么来啦，不是来度假享福的。又一次我实在冰冷难忍，就给高建军警官反映，期望解决犯人冬季热水洗漱问题。不料这位三十一岁即有着十六年工龄（其中当兵十二年，十五岁当兵），才转成干部没有几年的教育干事把脸一沉，说：

「就像是国家改革一样，什么事都要有一个慢慢来的过程，大家都一样，不可能一步到位，我现在就明确告诉你解决不了。」

「大家都一样」、「要有一个慢慢来的过程」，这听起来是在情在理的。可这里有个很滑稽的背景：他们自己可以用热水，可以洗热水澡，却强制我们慢慢等待。特权保证了他们拥有着与我们不再相同的环境，以致他们不能体验到我们的感受。实际上，在观念上，他们认同并接受了这样的事实：作为人，你们和我们是不同的。

我的禁闭室的闷热竟超过了北京的地下囚禁室，由于他刻意封闭的设计，使得那种闷热一到夏天是无边无际，人像动物一样完全被圈在里面，剥夺了一切对炎热的干预可能。偏偏雪上加霜的是，我在此前从无鼻炎病患，在沙雅的禁闭室里，一到盛夏，鼻炎如影相附，颇使人苦得不堪。普通监舍的窗户二十四小时开着，门在白天也是全打开的。而禁闭室则是终年封闭，2013年7月11日，经多得不计其数的温和交涉不济于事时，我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于7月14日前必须解决通风问题，否则将采取断然措施，他们知道我说出的话是从不含糊的。结果，他们说我的房间不热，是去年经实地测试得出的结论，并把结论报告了上级。

我突然想起在2012年夏天，我实在闷热难耐，多次要求解决法律上规定的通风问题。有一天，他们进来把禁闭室前后铁门全打开后，拿进来一个测温计进行了测验，当时并不明其意欲何为，这时才明白过来，他们那是在测我的「室」内温度的。真令人目瞪口呆，禁闭室前后门同时打开后，可立即形成一种局部的过风通道，室内凉爽程度远远超过外面，他们竟把这样测出来的温度作为我禁闭室的常温资料向上汇报。当时的测量者就是李建峰警官，今年来回复我要求的正是他，我要求他现场重新测试，等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时，尽管还未到了每天酷热的巅峰阶段，他与方勇胜警官一起来测量，结果不到五分钟就升至二十八度半，这是他自己报的结果，客观结果没能让我看。我问他，怎么可以打开前后门来测定这禁闭室内的温度？他说没有想那么多。

终于，他们也承认了禁闭室热的程度是他们原来不曾想象到的，于2013年7月14日给解决了适当通风问题，虽则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那闷热的程度，但终于没能使鼻炎有丝毫改善。一段几近莫名其妙的鼻炎经历，一进禁闭室则立发，一出

禁闭室而立止。2014年8月7日夜里，被押解出狱后，这死缠了我三个夏天的鼻炎则再未与我照面。便是在禁闭期间，只要走出那个禁闭室门口，非常奇怪，鼻炎就没有了在室内的坚韧和顽强，症状像立刻被根治般。这三个夏天的鼻炎，是在这三年里我所经历的最著名苦楚之一。每天就用卫生纸堵住鼻孔，整天张着口呼吸。

四十三、扣留信件与如临大敌的会见安排

在沙雅监狱期间，中共黑恶势力另一个丑态可掬的表现，是在限制我的通信和会见的权利方面。然而，犯人在监狱的通信及与亲人会见的权利，是他们自己公开了的法律承诺了的。

对于中共黑恶势力，法律只是他们在一些过程中挂出来的人相。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是厌恶这碍手碍脚的人相的。当他们背对着公众的时候，毫不掩饰对人相的厌恶。

我做律师时，曾在乌鲁木齐县法院阅卷受阻而找庭长交涉，指出律师阅卷是一项基本的职业权利，不料那庭长为此发了烈怒，其状直似被踩了尾巴的狗。

「什么法律不法律的，一听你们提法律权利我就不舒服，卷就不让你阅，你找法律去。」这是他们的一种最普遍的心态。

在阻挠我的通信及会见方面，特权淫浸出的扭曲心态成了其次的因素，「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是中共黑恶势力向来的做法。我在这座挂牌地狱的三年里，家里亲人的来信，包括耿和的所有来信，几乎全部被扣住，只有大哥、二哥各有一封信，被他们拆开审查后，并经「局里」及北京一些黑暗的东西同意后才交到我手里，按一位狱警的话说是：「只有通情达理，没有恶毒攻击党和政府的信才能给你。」而我的两封回信则全部被监狱当局扣押。对此，我要求他们据此出具扣押凭据，而不是黑帮式的扣留。结果，沙雅监狱狱政科许科长与另一名科长来找我谈话，宣布「依法」扣留我给二哥书写的家信，理由是信中内容涉及「国家机密」，并具体例举出信中泄露机密所在。诸如我信中提到：

这封信会费些周章，他要辗转至北京，经北京某些大人物同意后才有可能到了你们的手里

近几年里，只要是我的名字，几句真话，让他们整个政权上下震撼……

这封信里会有不少错误的字、句（范仲淹之「羌笛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就被我在那封信中记在了柳宗元的名下），因为我已几年不接触人间文字了。

许科长来谈话等于明确告诉我，扣留这些信件的决定于沙雅监狱无关，他们只是奉命行事罢了。他说：

「正如你在信中所写到的那样，这封信是费了些周章的，确实是辗转至北京，大人物是看出了许多问题的，现在向你宣布，这封信由于涉及一些不能泄露的国家秘密，根据有关方面安排，我们决定予以扣留。」

但他们的扣留都不出具任何凭据。就此，我多次与他们进行交涉，提醒他们的行为不能总是跳不出黑帮行径。信件是特价物，其所有权当属特定的人，他是特殊的财产权，扣留是个非法律名词。要求他们依法出具，或暂扣文书，或出具没收决定书，但他们已完全陌疏了合法的办事程序，使出惯用的泼皮无赖招数：就不理你。看你能如何？他不给你出具任何凭据，你连起诉他的条件都没有。

在我的会见问题上，中共黑恶势力更是如临大敌，便是在外部压力下不得不安排会见时，亦讳莫如深。不过是与我的家人见个面的过程，他们表现出的怕实在是超出了常理。我有时说他们是绿林团伙，这实在有些高估他们，他们没有绿林盗跖的恶胆。我常想，便是一个小黑帮团伙，也当是有些硬气的表现。就规模而言，人类历史上还有哪个黑帮能与今日中共匹配？按照他们的法律规定，在押囚犯每月可以与家人会见一次，现实中，这只是针对普通犯人而言的。对于政治犯和「邪教」类罪犯，他们在执行中是完全抛开了法律规定，稍微有点影响的政治犯，一个简单的会见竟要经过北京一些人批准。他们选择将我囚禁在沙雅监狱本身即是一个极阴暗的安排，以给我及我的家人在会见方面造成心理上的负担。

我在那里囚禁的三年中，经北京的批准，只安排了两次会见，两次加起来只有一个小时。每次会见，都是家人已到了会议室。他们才突然打开禁闭室来押着我出去会见，一进来就来一句「安排会见」，随即便宣布一长串莫名其妙的不准：一、不准攻击党和政府（**作为一个个体，我是从不担心有人攻击我**）；二、不准污蔑党和政府（**我从不认为他们有被污蔑的资格**）；三、不准泄漏国家机密；四、不准打听负面信息；五、不准使用暗语、隐语；六、不准泄漏监狱的改造秘密。会见安排阵势更是无处不显阴暗和猥琐，在外面反复给你讲，不要讲敏感的话，否则有关人员会有吃饭碗被砸之虞。

他们的会见室，一名犯人可以用一个话筒与几个人同时聊，在我会见时，他

们煞费心机，只能一对一讲话，家里来两个人则一人只能守在一边。但究竟，「依法办事」这张人相还不得不提一提。我已经近三年没能见到我的家人，而家人则更是长期为忧虑和绝望攫住，别说通信、会见，连我关在哪里、是死是活都无法得知。终于看到了我的亲人，我的岳父和我的大哥，两个大家庭里最重要的两个男人。那场面实在使人不堪。两个白发苍苍的男人，会见中竟像孩子般呜咽进而号啕大哭。我清楚他们这些年里所遭遇的屈辱和苦难。会见中，他们的身后始终站着一名警察，那种防范真叫「滴水不漏」，电话筒不时传来许科长的提醒和制止。我知道，可以说他们怕得要死，作为一个黑帮体系，每个人的危险都是不确定的。我和家人的会见录音是要送到一些北京的黑帮头子那里审查（**会见去的路上，有人说会见录音将送北京，希望讲话时不要讲敏感的话，免得上面骂他们**）。一个偶尔的不高兴，下面的人就可能丢饭碗。

第二次会见是在2013年，是岳父和四弟同来。我的四弟跟我感情最深，他的眼泪是罕有物，不料一见到我即流下了泪，迄今想起犹然在眼前。

四十四、在沙雅监狱的代号：A2

有必要在此述及的是我在沙雅监狱的代号：A2。谁会是中国A1号？应该是先我入狱的刘晓波先生。A是中共对「危害国家安全罪犯」的代称，A后的编定则是由中共高层对重量级政治犯的统一编序。晓波君颇有交椅情缘，A1当是归了他的。

我在那里的一切都是遮盖在A2之下，据说政权体系内的所有往来文件、通讯、电话尽悉以A2代称。我在那里看见过几本登记册，诸如《A2罪犯就医情况登记册》、《A2罪犯就餐情况登记册》、《A2罪犯就寝情况登记册》等，据说有很多登记项目。我曾问过他们，不厌其烦地做这些纪录意欲如何？回答是要对历史负责。这不大是属于我们能弄清楚的玄奥。

今天是2015年3月3日，屈指算来，离开沙雅监狱已有半年余。监狱对于我，只是换个方位或名称耳。有狱警曾问起我对沙雅的印象，我说与此前的黑帮式囚禁比，沙雅监狱算是个不错的地狱，但他究竟是地狱。那里是权力的天堂却是权利的地狱。我在那里三年，我对他们的感情颇为复杂，犯人绝对的被压迫地位不须说，而压迫的执行，作为那一群警察群体，他们同样是奴隶。对于人而言，自己尚不得自主自己的思想、认识及人性良知，他不可能是一个拥有真正快

乐的人，更不可能是一个能拥有健康人格的人。好在他们有自己对快乐的认定标准，这是他们终于还能快乐的保证，在这种权控体制下，绝大多数公职人员拥有了一种能力——麻木和冷酷。而这是我不大愿意原谅他们及甚至从心底鄙视他们的理由。因为他们的麻木、冷酷，与常人又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特定群体的麻木及冷酷是一切罪恶得以从容发生的现实条件。然而，我评价他们不是全因着他们待我如何，而是他们对其他那些罪犯的态度。那些普通狱警，普遍地在态度上待我都不错，可他们有时一转身对其他犯人就成了一副恶面孔，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为此我也与他们中的个体及单位都交涉过。

凡是面对我的事，他们做起来也都很用心，这也说明沙雅监狱所处的微妙地位——又要恰当完成上级交代的、对我的压迫任务，又不愿与我发生过分的冲突；要确保后一个目的，他们就得在许多具体的环节上灵活、务实。凡是上级下了死命令的结构性方面，他们不敢逾越，在执行过程中，凡是能有技术回旋余地的，沙雅监狱都能以灵活的态度应对，这是我要感谢他们的。诸如：在洗漱的问题上，他们不能给我提供热水，他们却可以给我一双乳胶手套；我不能吃凉馒头，监狱专门给买了一个保温饭盒给送饭，三年里坚持不懈，做得很认真；那里的犯人没有洗澡条件，监狱每周六吃过晚饭后，必会给我提供一桶热水，三年来，除了极个别人值班时故意找点茬外，绝大多数情况下做得很好，我每周六的洗澡成了一件大事对待；2012年10月份后，由于身体缺钙，夜里腿部老抽搐，经交涉，监狱同意帮我外面买牛奶喝，同意我的东西在外面超市买。我也能体谅到他们的许多身不由己，除了些原则性的问题，我也力控自己能与他们平静相处，并基本上实现了这一点。

四十五、刑满释放前与康科长的谈话

在中共的招牌地狱囚禁又是三年，有三个群体一直对我念念不忘，即：我的亲人；那些一直以来关心我、关心着中国命运的中外朋友；另一个最关心我的即是中共黑恶势力。

2014年7月22日下午，我的禁闭室被打开，说要进行谈话，到了谈话室一看，那里正襟端坐着三个人，一见我，其中一位笑嘻嘻地唤「老高」，我来了一句：

「不是私事吧？」

其中一人回答：「怎么可能是私事呢？」

「那就先解决谈话的资格问题。」我说。

「啊，我们是公安局的。」他们其中一人说。

「中国有几百万警察。」我回了一句。

「啊，北京的和新疆的。」那人又说了句。

「北京、新疆各有两千多万人。」我说。

「给你说了是北京的和新疆的就行了。」他明显有些不耐烦了。

这又是一群企图蒙面执法的「执法者」。我站起来转身就走。

「你们的政权打发你们来找我谈，这是你们挂了牌的法律场所，周围的武警、警察全是你们的人，你们竟没有胆量报上姓名、职务身分，而这又是你们自己法律明确规定了的公职人员与公民谈话必须的程序。」这是康科长追过来时我对他说的几句话。

局面僵持在那里。监狱方面一下午两次来找我，说人家老远从北京赶来，不愿说出姓名、职务，肯定有人家的难处，希望我能通融，我坚决给顶了回去。

这真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局面，几千万的党员同伙，几百万人的持枪者，如林的枪，如林的炮，如林的电击器，如林的监狱，竟然在与一个个体的谈话过程中不敢报上姓名！

晚饭前，康科长又走了进来，希望能各自让步，说他们只能报上工作单位，以及职位与姓名结合称谓。经监狱中间的搓合，我同意吃过晚饭后再谈。我也清楚，中国的法治局面绝非系于此一举，对与这种秘密警察谈法律，那确实是对驴抚琴。我更清楚，对于我，8月7号后的「出狱」，若侥幸，便是从小监狱进大监狱罢了，我从不反对谈，谈本身并不决定着什么。我更清楚，2017年前，与中国黑恶势力的交涉仍将是我生活的主要内容，具体操作层面的接触是必要的。

吃过饭，我来到一楼大厅，对手一改下午见面时的态度，主动站起来把手伸给我。

「公安部一局的任局长，这位是新疆公安厅的张处长。」双方面对面坐了下来。

「下午那位态度是不应该的，所以这次谈话就不让他参与了，给咱们创造个好气氛。」那位自称是公安部一局的任局长说。

「我倒不太计较是否有他在场。」我接了一句。

「老高，你在这几年了，外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习近平上来不大一样了，

全国人民都叫他『习大胆』，反腐力度非常大，政府的变化也很大，希望你出去有机会听一听，看一看。」任说。

我问他：「你了解我的案子吗？你了解北京公安局这几年里和我打交道的情况吗？」

他说：「我不了解，因为我刚从湖北省调到部里不久，但我明确地表明，过去对付你的那些做法我不同意，过去对你那些做法的人也都受到了处理，连姓于的（**指于泓源**）也得到了应有的处理（**于实际上是得到了提拔，由副局级升为管律师的司法局局长，任何以这般说法不得而知**），连周永康都下台了，周的四个秘书都已被抓，周也快了。」

「周的下台亦罢，被抓亦罢，并非我所期望的，这只不过是这种制度下多一个具体的悲剧而已。但无论如何，周将在2017年以后会被以反人类罪面对审判，是我所不怀疑的。请您谈些具体的，直接讲你来这里想谈的东西。」我说。

「你是说2017年那事（**指中共灭亡事**），还剩四年啦？我听说啦，不可能，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你估计错啦，至少还有四十年的寿命。谈谈老高，出去有什么打算？」任问我。

「何以打算那是私事，如果你真感兴趣，可以告诉你：回北京；活着，并且准备快乐地活着。」我回答他。

「回北京不行，北京回不去。部里让我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希望就这个问题尽可能地达成一致。回北京，部里无权决定，可有权做决定的人不可能跟你来谈。不能回北京就是决定，我们也不能给你谈得太多，何况我们知道的也就是这些。」任继续说。

「要么回北京，要么再进监狱，对我而言，共产党就是我的监狱，总是要有人待在监狱里的。」我接了一句。

他愣了一下又说：「老高你应该多替你的家人考虑一些，也让你的家人安定上几年，如果能让你回北京，我又何必跑到这里来跟你谈？北京肯定回不去。有什么困难说出来，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一定办。生活费、工作，什么都可以解决。北京之外，想住在哪里，由你自己决定（**这个问题他撒了谎**）。」

「我有什么问题？你们判了三年，迄今累计关押时间已近七年，人在家里突然被绑走，北京家里有许多事等着我回去处理，两套房子近十年的物业费、取暖费、有线电视费、网络费、水电燃气费、孩子们的保险费，早已成了一个天文数字，房子本身也到了需要维护的时间，家里的钥匙至今控制在北京公安局手里，

竟近荒唐地把我家里的锁都给换了，你觉得我该不该因此进行交涉？一个生物人，有了生理病患是需要看医生的，在你们手里，六、七年时间，只有在监狱是有感冒小病可以吃点药，包括牙病，你们一直根本不予理会。我现在一口牙已全部松动，有四、五个已经掉了，我在北京有固定的牙医，我要求回北京有什么不合理还是不合法？这些年来，当局完全丧失理智的打压是不是也该歇歇劲啦？」我问他。

他沉默了一会：「这些都好办，但只能在北京以外的地方治牙。」

「牙必须回北京看。」我回答他。

谈到最后，回北京的问题上他们终于没有让步。我心里清楚，这个无赖政权作恶的能力是丝毫不容质疑的，心狠手辣，言而不信，手段会无不用尽其极，我再要坚持回北京已毫无意义，不管怎么说，先回两个家里看望两家的人后再做计较。最后我同意暂时不回北京，先回乌鲁木齐市看望岳父母一家，然后在新疆或西安治完牙病再回陕北老家。他满口答应，但后来事实证明，他全部撒了谎，完全否认了他当面说过的话。迄今被押离监狱半年余，我的牙仍不能得到治疗。

四十六、永不懈怠对自己品行的经营

2014年8月7日，当是形式上我的刑满释放日，我知道我不能像其他犯人一样正常地走出监狱，不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行程，而充满着诸多的不确定，而确定的是不会有自由。凌晨四点钟（约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我起了床开始拆洗被褥。这是我入狱的第一天即决定了的事。我入狱时，他们发给我的褥子脏污不堪，其中一面竟有一个极显目的人形污迹。我提醒自己，这就是你当下的生存环境，你是无力改变的，你唯一能做的是在出狱前把被褥洗干净了，不要让下一位接收他们的人面临你正在经受的烦恼。我把被褥洗完开始打扫禁闭室卫生，这是我三年来从不改变的习惯，每天把禁闭室打扫得可谓一尘不染，连厕所的坑每天早晚各一次地认真擦洗，从不苟且，这是我精神经营的日常组成，这一点，在各囚禁阶段是被公认的。

我曾看到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劳动党）头子阿利亚，在共产专制政权败亡后被判入狱，在一次接受记者探访时说，在囚室每天被逼抹洗厕所坑，说：「这哪里还有人权可言？」说到洗厕所时还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我不需要任何人逼促，我每天蹲着把地上都给抹得干干净净。他们有些狱警

颇不解，包括李建峰警官曾数次提到过，说别的禁闭室打开了，臭气扑面，里面脏污不堪，唯独你这里是个例外。我告诉他，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环境，都不能懈怠对自己品行的经营，保有对生活的积极信心。

监禁的经历并不会常有，当认真对待这段经历，颓废、慵懒足可摧折你本可有的美好。我本来计划着，他们释放我时只能是在上午上班后办理，心里想着，走出监狱大门后，最起码在监狱周围转一转，看一看。我在沙雅三年，有一种颇强烈的好奇心，想看看这里的地貌环境，感受些这里的风俗人情，最主要的也是首要的一个大愿景，即是一出来后直扑维吾尔饭馆，吃一碗维吾尔拉面，盼此刻久矣！可以说是常有朝思暮念时，毫不夸张，已有数年与人间烟火隔绝之苦了。作为一个俗常人，唯有此情最苦煞人，过去常伸手即可得的一碗家常面，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竟是镜中景水中月。监狱里吃的饭，是完全远离着记忆中的人间烟火味的。

在监狱里，我常于闲暇时闭目与心中的美味办理交涉，有时馋情大炽时竟坐卧不宁，想到耿和给包的韭菜鸡蛋饺子，竟忘情地大嚼起来。常想起「过屠门而大嚼」之说，有时实在馋情催逼不能自持时，竟自己跟自己对话安慰。我常心里说：「老兔子，满足生理上的馋情是技术性，是低端的，只有在精神上抚平馋势并心满意足才是你当有的能耐。」因为在那里，是处在一个完全无力安抚生理馋情的环境中，你希望越大，临到你的失望将更大。

例如，2014年春节到了，想到多少能有些与寻常不同的饭菜，可接下来的现实让你目瞪口呆，提前一周的一顿「改善」面条移到大年三十夜里，成了我们的年夜饭。早饭更令人发呕，食谱上写的是「杂碎汤」，别说让人吃，若心平气和地闻一闻即算上是一种能力。据维吾尔警官讲，是买了几个马肝子（**马肝子便宜**）剁碎了，扔在几口大锅里煮熟了就成了食谱上的「杂碎汤」。我对送饭的狱警说过：「这是需要怎样无良的气魄才敢给苦劳一年的犯人上这种年夜饭？」真不如平时那点咸萝卜疙瘩，无论如何他是能吃的。最后的现实是，春节的一周里，我七天里吃了十四个馒头，早晚各一个，不再吃他们的菜，这样你才不会失望。

一走出监狱即吃上一碗维吾尔的拉面，久已固化成了想象中的图腾，但想象终于是想象。

四十七、在贵宾候机楼卫生间镜子里见到自己的脸

大约五点多钟，禁闭室被打开，说外面有人来接我，早晨八点钟的飞机，故而提前办理出狱手续。我走出了那间生活了三年的禁闭室，心中起了些隐约的不舍，毕竟完整的三年，除了两次会见约一个小时外，那间灰暗的禁闭室是我三年的全部天地。我心里默念着与他道别的词离开了那里。

到了外面，果然有人来「接」我，在黑暗路旁停了几辆警车，中共公安部（**国保局**）的李姓处长、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公安分局的一位「大队长」已奉命到位。一个极短的过程后，我直接被押上车，据说是去飞机场。后面由监狱长亲自驾车送那位「中央领导」。大约一个小时后果然到了机场。

下了车，往机场走的时候，在辽阔的视觉空间，一种突然的天旋地转扑面而来，这是我从未经体验过的感觉，脚底下如蹈虚棉。我已有五年的时间，是足不越户地生活在一个几平方米的灰暗环境里，已经完全陌疏了与天地共处的能力。我清楚这只是一种从长期拘禁的小天地到寥廓大空间的一种不适应反应，而且颇有掀天动地的局面。

我意识到人的生理能力个别情形下的身不能由己，意识到，一个人精神再强大，亦无法予自己的生理能力以无限的提携及支持。即便在那囚禁室里，当屡经抗争、交涉而终于不能使他们停止非法的、高音喇叭的精神骚扰时，我就不再遵守初时承诺的服从他们的规章制度。任何事物都有其多面性，坏事竟变成了一个好的结局，禁闭室一天静坐十几个小时的局面，变成了室内完全由我自主。这是我五年里终于获得的「自由」局面。从此，我获得了改善自己体能的时间，便是在那样的环境中，我每天苦练不辍，一天一千五百米的原地跑步，十公里的来回踱步，一百个俯卧撑、仰卧起坐，其他活动身体的项目，每个时段规律性地进行固定的活动内容，从不例外。尽管监狱的饭菜不支持这样的体能消耗，但我高昂的精神为生理能力的加强及韧性能力的继续提供了超乎想象的补给。但体重还是不可避免地锐减了三十多斤，由原来的一百五十多斤降到出狱后的一百二十六斤。

进到候机厅，我们没有加入到熙来攘往的人群中，而是被带到极豪华的所谓贵宾候机楼。无疑，那是专门为当地那些特殊「人民公仆」备置的候机前的休息场所，那真叫一种「大气魄的浪费」，地上铺着有百平方米之巨的豪华地毯。整个那个上午就我们两人，而部里「领导」则另有去处。

那大客厅里光照极好，在卫生间的镜子里，我看到了已「陌疏」了五年之久的一个面孔，那是一种极奇特的心境，真的没有任何夸张的冲动，我当时一怔，任何有一点生活经验的人，都会对我的脸上那种神色感到惊异。「一脸的地狱纪录」，是当时一看到镜子里面的面孔时，我心里的默念。真的，那真需要一个人有着足够的抗挫折性心理能力。我想到的第二个恰当词是「一个活在人间的鬼」。由是我心里生起了一个负担，担心我的亲人看到这种状况时感情承受不住。还好，后来也唯有两大家里的两个姐姐看到我的模样时恸哭失声，其余亲人则都是默默地看着，眼里则都满溢着哀怜之情。

四十八、你不停车我就真跳车了！

飞机到乌鲁木齐后，那大队长开车与我离开机场，进入市区后他突然告诉我，暂时还不能送你回家，咱们得先到卡子派出所去报到。我毫不犹豫地要打开高速行驶的车门准备跳车，他大惊失色，说：

「想不到你如此地不配合，你要出了事，这不直接害我吗？」

「我可不害你，你立即把车停在路边上，我下车。你若不停我就跳下车，绝不含糊！」我说。

「老高，你不要为难我，这是上面的指示，直接送你回家，上级领导不又骂我吗？」他跟我急了，大声说。

我说：「你们这种做法有没有考虑过我和我家里人的感受？我已经五年未见到我的亲人，他们也在眼巴巴地等着我回家，你们竟做出如此缺乏人性的安排，你拉我到派出所做什么？他没有一丝的力量，更没有一丝的冲动来保护我的权益，我还有与他打交道的价值吗？他还有这种资格吗？」

「那没有办法，人家按法律规定就管着你。」他说。

我说：「你说的是错误的，按法律规定，他当保证我的安全，保护我免受干扰的权益。我们辩论这些没有意义，你不停车我就真跳车了！」

最后，他终于同意送我先回家，并如实向上级反映所发生的一切。

四十九、挑选人进「国保」的标准

我回到岳父的家里。

大姐耿青一进门大哭，说：「高，你咋瘦成这样了？」

一家人见面嘘长问短，慨叹这几年的委屈、痛苦，我唯能静静地听着。

刚吃完了中午饭，就有人敲门，所谓「怕什么就来什么」，我实在不愿让家人再受惊吓和担忧，但这却又实在是我当下所处的现实环境。两名警察气昂昂而人，说要依法履行职责，找我谈话，要给我做笔录。我强忍着愤怒告诉他们，不仅扑进家里，你们就是扑进到我的被窝里，你们也得不到任何你们想要的东西。我问他们有什么急迫的大事煎逼，我五年来第一次与家人见面，一家人在一起还不到两小时你们就闯进来，希望他们能像人一样地做事。那俩警察好像一脸无辜，说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刚接到上级通知，让他们立即赶到这里给高智晟做谈话笔录。我拒绝了他们的非法要求后，他们自顾自地做起了「笔录」，在我拒绝签字后退出。

他们退出后，家里人以为这就没有事了，但我清楚他们不会就此罢手，我太了解他们了，即便下边不愿再来搅扰，新疆公安厅也不会让步，尤其他们的那位张姓处长。给人性让步、给人之常情让出点空间，这是他们根本不具有的能力。我预料到，下午还会有人找我的麻烦，却没有想到是新疆公安厅的一处处长和中共公安部一局的李处长。

刚打发走派出所的两位警察不到两小时，又有人来敲门，听起来人还不少，一开门，进来三个人，为首的是公安部李处长，后面跟着新疆公安厅的张处长，还有一位脸色晦暗的小伙，说是一位前途无量的新疆公安系统最年轻的科级干部。

这张处长已经是跟我见了几次面了，前次陪公安部国保局任局长来监狱与我谈话的就是他。我想他应当是新疆公安厅一处处长。因为任是公安部一局局长，在中共公安系统里，自上而下的「一局」、「一处」、「一科」，实际上就是中共的秘密警察系统，亦即中共的政治警察。这在警察序列中位居「一」者，足见其在中共心目中的地位及重要程度，就是当今中国恶名昭著的国保（**全称为国内安全保卫总队或支队、大队或处**）。

这「国保」不是中共独有的现象，肇起于前苏联，后迅速为所有共产主义政权效法。这支秘密警察执行的是专制政权最坏、最邪恶的那部分职能，他是所有共产专制政权的共有现象，是共产党手里残酷打压异己的凶器，用武警士兵的话说，「国保」就是明末魏忠贤阉党手下的「东厂」。各共产专制政权的存在及灭亡历史规律性表明，越是到专制共产党的灭亡阶段，这帮人性阉畜就越疯狂、越

凶残，他们就是自身及其专制机器「灭亡的加速器」，这种现象非人的意志能够转移。

我曾与北京一位颇同情我的老「国保」聊过这种现象，他说到挑选人进「国保」，说他们挑得真准，他们肯定心里有个不能成文的规定标准，说：

「要像小孩一样不大懂事，要没有人情味，敢打人，打人打得狠，最主要的是要绝对听领导的。」

我给他总结的是：「愚昧、冷酷、凶残且绝纯的奴才性格。」

他说：「我可没有这么说。」

五十、对张处长与李处长的印象

这张处长给我的印象颇不好，倒不是先人之见，是因着他的秘密警察头子身分。他持续地处在精神亢奋状态中，这大略上与他陪着「部里领导」有关，蓬勃着一种炽热的表现欲和矫情的献媚冲动，但颇不得要领。我敢肯定他陪着的李处长对此绝对与我有同感，就行政级别上他们同为处长，但究竟人家是你的上级部门来的，你的角色是陪着人家。可以肯定他没有僭越筹谋，但其不能自持的表现欲却是形于行色的。另一个不能自抑的，就是已被他这种人视为正当权力的蛮横。他那天当着岳父一家人的面所表现出的蛮横及凶恶，我想给李处长留下的印象也是恶劣的。

李给我的印象颇好，至少在那几天的往来接触，礼貌、理性，有分歧亦愿与你平和沟通，颇能节制自己，颇能设身处地。我想，后来我们在不少的技术环节上达成一致，与他给我的好印象是分不开的，虽然他当面给我的承诺（即北京以外的地方都可以去看牙病）像他本人一样消失地无影无踪，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颇好的印象，他只是个传话的而已。张处长那天当着我岳父全家的面就差没动手打人，他对李处长的平和之不耐烦颇形于色。

张处长是这种制度的产物，是这种制度蛮横本质的具体活触角，他是个平面人，更是个法盲。在沙雅监狱的那次谈话中，他不知是哪根神经短路了，竟眉飞色舞地谈到新疆「维稳」形式，谈到「理直气壮的高压态势」，谈到了「高潮迭起的严打斗争」。我不客气地当面向他指出，严打是个非法律概念，「高潮迭起的严打斗争」更是反法治的。他说，他完全不同意我的说法。「我说你是完全不懂我的说法。」我告诉他，作为制定法国家，法律从颁布施行至最终废止，一惯

性和稳定性地执行法律，既是法律执行的主要特征，更是法律及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

「严打」是相对与「宽松」而言的，而这些概念是法律里面没有的概念。他瞪眼质问：「难道政府一波一波的严打斗争是违法吗？」我不愿继续对驴抚琴，就此止话。

张这次屡屡能陪上「部里领导」与我办理交涉，可能被他视作是难得的献媚邀宠机会，脚下的步幅、步频不能自制，官僚体系中个自处之道他是全然不晓，以至于我回到乌鲁木齐家里才两天时间，还不是在我自己的家里，竟被他安排了四个波次的警察「登门拜访」。

实际上，后来有人给我讲，张能成为新疆秘密警察头子，作恶方面你可别低估了他的深谋远虑，他那些是故意恶心你，实际目的是逼你离开新疆，明摆着，新疆的「维稳」形势异常严峻，你待在新疆是他们一个很大的麻烦，首先是张的麻烦，他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你赶紧离开新疆。此言有理，实际上榆林警方后来当面就向我表明过这种意思。

五十一、你看你现在都成啥样啦？

我本打算在乌鲁木齐看完牙后再回陕北，最主要的还想再恢复一段时间身体状况，这边的家人既已不能避免，但最大限度地不要让陕北的亲人也看见我当时的「鬼相」，但由于张处长他们的「热情」实在异常，于是决定到了西安再看牙。新疆警方一听我说要在西安看牙满口答应，说要立即向北京报告，立即减少了对我的骚扰，连例行的见面也突然变得文雅起来，不再闯到家里来，而是改在楼下树林里。

新疆的亲人看见我的容貌情形，断定我身体有大问题而瞒着家人（这与后来陕北亲人的判断如出一辙），放心不下，非要我当着他们的面做体检。我知道我的身体内质很好，我坚持认为，除生理规律性的改变无可遏制外，快乐的心情、坦阔的胸襟及不懈的意志是可以拒病患于身外的。基于安抚亲人的担心之念，我在乌鲁木齐市进行了全部的体检。身检结果正如我所意料，身体各项健康指数大好。这些结果也出乎我对手们的意料，他们至少有两人私下与我提及说：

「检查结果好得出乎政府意料。」

他们说：「从外观情形上看，你有可能随时跌倒再也起不来了。」

我倒是确实「跌倒」过，但也是既倒既起。我和家人那几天奔突在几家大医

院间，多年来第一次坐公交车。走至离车站还有百米时公交车进站，家人说那趟车半小时才有一趟，主张跑着赶过去。不想刚跑十几米而天旋地转，稀里糊涂即扑倒，好在家人全在我前面没有看见。我感到天倾地旋的，但本能地竟又站了起来，踉踉跄跄竟然还可以往前走。

先到了公共车前的大姐大呼：「高，你怎么啦？」

我说：「有点头晕，已经好啦。」

到了车上，被大姐和大姐夫围着，大姐说：「高，不要再犯傻啦，他们都快把你整死啦，家人谁看不出来？只是不愿意说，你看你现在都成啥样啦？」

我安慰他们：「我亏欠的只是生理方面的东西，我人很简单，不出一个月即可恢复一个常人当有的身形。」

五十二、单仁平们的蒙面嘶叫

体检结束后，我拟静心陪家人几天后赴西安看牙。一天，那从监狱押我回来的「大队长」来到大姐家，说是来给我送报纸的，是一份《环球时报》，上面有一篇「单仁平」的文章，我记得标题好像是〈西方国家为什么热捧「维权律师」〉。我大略上览了一遍，单仁平是不是行文者的真名不大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篇文章是指挥刀下的产物；另一个可以肯定的是，该文作者是一指挥刀下的蠕动物。

这些年里常有类似情形，即常有这类无脊椎物蠕伏在指挥刀下嘶叫，而且是常蒙面嘶叫。《北京晚报》上就常有这类蒙面英雄指骂「南都长平」及那曾经活过的《南方周末》报。这些水形人格的东西，便是在如林的指挥刀下，在纸后的遮掩里，也终于还是要蒙起面来的。单仁平与他（她）的文字是在指挥刀下拼聚而成的。一则，我并未如文中所言是刑满出狱，而是在非工作时间的半夜里秘密被押出监狱；二则，我并未如文中所言是刑满释放，而是迄今没有「释放」，当局只是给我换了一个较此前稍大了一点的关押场所而已，大群操枪的「单仁平」们整天就围在我的周围。

单文中说我有激进的主张。一则，我不过在中国主张实现宪政，即实现中国的制度现代化，只要不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当不会反对中国的制度现代化；反对在中国实现制度现代化者，如「单仁平」们，不仅没有资格指责我们激进，其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死敌，是人类文明的死敌。二则，「激进的主张」终于不过一

种主张耳；人类所有刑法，其调整的对象只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而不能是人的思想，以「单仁平」的文中文逻辑能得出，中共对我判以刑法本身就是对其刑法原则的反动。三则，我在高度戒备的半夜里被秘密押出监狱，「单仁平」何以得知具体情形？

实际上，「单仁平」文章的真正含义在于给我及我的支持者、同情者传递恐怖信号：「绝不允许你再胡来！」

「单仁平」不仅是爬行物，且是有眼无珠的爬行物。中国今天令全人类震惊的腐败、堕落、权力崩溃性私化，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结构性丧失良知、道德，这哪一样是因我的「胡来」造成的？稍有一点人的常识者都不难想象出，看看那些落马贪官的罪恶，即可想象到我们拥有着怎样的、有利于贪官污吏腐烂的政治制度。谁都清楚，中国现在只有一类官——贪官。无论是落马贪官还是暂时在马上的贪官，他们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他们眼里，人类只有一条正路，即是永远地骑在他人头上自由的贪腐路。他们反宪政、反法治、反自由、反宗教、反普世价值、反民主选举，一切人类今天普遍公认的美好，只要不利于中共黑暗势力的自由贪腐，则全冠以西方的错误思潮。

最近，中共最高法院公然反法治而动，叫嚣要坚决反对西方的司法独立思潮。这种愚昧和无耻的气魄足与「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匹比。公正就是公正，何分西方、东方？没有审判者的独立地位，岂有司法的公正可言？

在这里我还想多言几句，算是一个公民不大成熟的声明。2017年后，对前政权的罪恶必须进行清算，我们绝不挟狭隘的报复感情，但对于漫无边际的罪恶视而不见的人群是没有希望的，追惩罪恶是人类呵护正义的最普适手段之一。我们同样清楚，没有宽恕就没有明天的思想，对于2017年以后全民族的大和解，以及重塑这庞大民族精神质量的价值及意义，南非公民拥有的化解仇恨、实现社会和解的能力，中国人也能有，但便是南非，也是以「真相、真诚忏悔」来置换宽恕的。但对于一些邪恶已经深及骨髓的反人类罪犯，诸如江泽民、罗干、胡锦涛、周永康，若在未来两年里没有令世人公认的改变，则绝不在宽恕之列。二战结束后，颇具宽恕思想及感情基础的盟国，同样有处决反人类罪犯的纪录，这证明了在结构性的价值趋向问题上，大家都是不糊涂的。而二战后盟国的另一个颇特别的判例有必要在此提及，那就是对莱尼·里芬斯塔尔的罪恶追惩。她在纳粹暴政集团还有力量的时候，忘乎一切，纵情美化法西斯，尤以《意志的胜利》为着，她的下场，为我们未来追惩如「单仁平」、李从军、强世功、胡锡进、秦刚、洪

道德、逢先知、华春莹，以及《解放军报》、《辽宁日报》、新华社等恶党媒的总编们，还有中共大大小小的宣传部长，提供了范例。

时至今日，仍嚣张不羁的中国黑暗势力的文武全队走狗，当计算着你们的将来。详细的个人想法，我将在后面专门提及。

五十三、新疆与陕西警方相互扯皮

体检结束，转眼在乌鲁木齐大姐家待了半个多月，如我所言的情形，我的身体亏缺的只是物质方面的东西。真是恍似隔世，被人唤了几年的「畜生、狗屎」，回到亲人中间俨然至尊宝。耿青大姐的厨艺在这段时间，与全家的亲情交相辉映，我两周里体重飙升了十五斤，一家人惊诧不已，我则坦然以对。不仅如此，连神色也明显地变得好起来。

然而，这期间与新疆警方数次敲定了赴西安治牙病的日期却屡不能成行。他们给的理由是北京方面拖延不决，实际上我后来才知道，是新疆警方在与陕西警方相互扯皮的结果：新疆警方想在西安将我交给陕西方面，他们一直在骗我，根本没有考虑我在西安治牙的问题，只想尽快交到陕西警方手上，看不看牙病即与他们无涉了；而陕西方面则要求新疆方面在榆林交人，且毫不松口。就这样，双方一直你来我往。我直到现在仍坚信，不让我在西安看牙病并非是中共公安部的决定，这只是个技术问题，费用由我的家人承担，且任局长当面答应了的，实在考虑不出他们再行改变的必要。毫无疑问，新疆想尽快地把我交给陕西方面，而陕西方面的想法却相反，能晚接一天就晚接一天。

后来，榆林警方当面有人给我讲过，说：「谁也不愿意陪着你在西安看牙病，这应该是北京的事，你的案子费用都在他们手上，一群人在西安的花费，地方局谁愿意白掏？」

直到8月25日，即离开新疆的前一天，「大队长」才突然给我说，是别人帮着订的机票，到西安后当天飞榆林，说回去看看亲人再出来看牙病，都已经协调好啦。木已成舟，我只好如此。

五十四、佳县看牙病失败

8月26日大约下午六点钟左右，我被押到榆林机场，我的大哥、四弟、表哥

都在机场外等候，但这纯私权领域的优先权却不归他们，省、市、县三级公安部门的数辆车及其一群人接走了我，在车上双方又发生了不愉快。我的四弟家在榆林市，一家人精心准备了当天的晚饭。

我就在车上质问那一群警察的负责人司某：「你们这样做不仅违法，而且违反了人之常情。我的亲人五年没有能见我，这五年来第一次回家，在四弟家与亲人一起吃顿饭有何不妥？你们现在完全按着自己的意志控制我的人身自由，剥夺我一家人的私属权利，为什么你们的做法总是趋就坏的方向？」

司某说：「我们只是奉命行事，上级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做，你给我们说这些也没有用。」

当夜，我被一群人押回了老家大哥的家里，四周布满了一批「不明身分人员」。其实，他们的身分是明确的，农村本是个熟人的社会，加之这些年里，只要我回来，大哥的院子里就会有大批的秘密警察游荡，接下来的几天双方又冲突不断。回来仅两天时间，竟有四批次的大群警察闯入我住的窑洞里，大哥深知我的脾气，老是形影不舍地跟着我，但冲突终于还是不能避免。事实证明，终于先忍不住的是大哥自己，第三天他自己大怒，把电话打到了当地公安部门负责人那儿，大声指责、质问、抗议、警告他们，要么立即把人再抓走，要么停止干扰我们的正常生活。

我回家后的一个现实问题即是看牙病的问题，一方面长期得不到医治，一方面是长期营养不良，再加上2010年4月28日的酷刑等多方面的因素，我的牙大都已松动，必须立即施以治疗，最紧迫的问题是实在痛得可以，冷热不适。但榆林警方的态度是得向上面要来钱，否则没法成行，而我们自己去西安看病却不被允许。但这牙的问题本已经拖了五年多了，实在不能不治，当地医疗部门又实在不能将就，外人无法想象佳县的落后。

实在牙痛得不行，硬着头皮去了一趟据说是当地最好的牙医诊所，不但没有一次性的工具，连诊治机身及四处，满目都是血污。那牙医从一个沾满血污的缸子里操起一把镊子就要给我拔牙，我速闪一旁。我想，在这里治疗，终于还不如掉完了全口牙更容易使人接受，究竟其损害结果还是确定的。但疼痛的苦楚现实地凌逼着我的忍受，退而求其次吧。

「您这里应该有医牙痛的药吧？您酌情给我推荐点药吧。」我说。

「有。」一个标准的四川口音。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沓艳黄色的、被裁得一般大小的方块纸，熟练地铺落在桌

子上。我大悟，他这是要给我「配药」了。

我仍脱口而出：「您这是要干什么？」

「配药，你不是要买药吗？」他一脸不解地看着我问道。

「没有成盒装、成瓶装的成品药吗？」我赶紧问他。

「当地就这样配药，你爱要不要的。」他脸上堆起了不快。

佳县看牙病的试验失败。我是再不愿出村看病，只要出村，必须由大哥给当局说明情况才能成行。可终于还是痛得不堪，最后的一招，只有去榆林试试了，但我的心里仍然忐忑不安。

五十五、在榆林看牙医

榆林倒是个地级城市，有着一个「文明」的外壳，但那是干脆的金玉其表。

2009年11月28日，在西安候机时，专门从榆林赶到西安「接我」的武警韩队长问我：「对榆林的印象如何？」

我说那里住的全是穷人，他说榆林现在不穷，是陕西最富的地级城市，说：「过去在省上开会，榆林的领导总是坐在后排最不起眼的地方，现在一开会都坐在最前面，榆林人现在腰杆挺得直着呢。」

我说那里穷得只剩钱，我告诉他，榆林全市找不到一个报亭，榆林的书店里买不到任何宗教类书籍，哲学、社会学、自然学科方面的学术性书籍也没有，对一个社会而言，这比没有钱更可怕。

沉默了一会，他说：「这才是真问题。」

到榆林市的看牙病亦以失败而告终。那看病过程真可谓惊心动魄，可能早已习惯了国人会认为我是大惊小怪。我意识到近二十年里，我实际上已脱离了普通人的就医环境，期间，无论是在新疆还是在北京，我们总有办法让自己和家人不排队就医，而且常能够在颇雅洁的环境里就医。就就医论，我们曾经就是这社会不公的一部分。最近这寻医，才体会到中国绝大部分人寻医问诊的艰难，尤其这次在榆林的就医经历。我去的还是榆林市最大、据说还是最好的医院，在此我不想提及那医院的名字，因为我所看到的问题，根本不被他们视作是问题，而这种问题亦属当下国人人群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即在公共环境既缺乏公德又缺乏个人应有教养。

我简直难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一个规模颇大的长房间里，两侧隔置出十几

二十个半人高的治疗机位，中间留出一条极狭窄的走廊。视觉上的紊乱拥挤与那里吵闹、喧嚷的糟糕程度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而几十名医生及护士、实习生是这吵闹、喧嚷大阵的生力军，他（她）们虽然个个手里正干着活，却见人人双唇掀动不停，忙乎着响应自己耳朵里听到的一个又一个话题，整个大厅的医护人员仿佛被声音的网攫住了，却又似乎攫不住任何人的注意力，因为大家都竞相发言，争先避后。实际上，大厅里很难听清是谁在讲话，却又看到没有人不在讲话。

我当时温和地向我的医生、护士提出我的不满，因为给我看牙的正是他们的牙科主任。

我说：「这整个大厅吵闹得使人不堪承受，而这喧嚷的主力却是你们的医生、护士，你们竟然维持着这样一个就医环境，这使人感到一种不安全感，让人看到两个完全的放任：医院对医护人员德行要求的完全放任，及所有个体对自己个人德行的放任。」

他们却问我是哪里人，我说：「这哪里人不当是个问题，问题在于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着的混乱是实在的，更主要的是这竟被大家视为无物。」

一位护士心不在焉地来了一句：「国有医院，哪里不都一样？」

我能改变的现状就只有放弃治疗，决定仅把老疼的两颗牙拔了，绝不在这里治疗。但终于，这简单的拔牙仍出了不大不小的问题，致未来一周里苦恼连连，最后不得不又去找他们。这次拔牙后出现的情形颇使人沮丧，可谓「怕处有鬼」，拔完牙流血不止，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先例。

我的处境，去一趟榆林颇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难在心理，没出村前必须先要由大哥与当地办理交涉。当初刚回到佳县时，要求我每日必须给当地派出所打电话，我告诉他们这是化日下的睁眼酣梦；他们颇使了些花样手段而终于退而求其次，要求出村时给他们报告——这个又是多此一举，因我每分秒都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双方都不愉快，他们惯用的手段对于我意义全无，局面僵在那里。大哥整日惴惴不安，背着我向当局提出，我若有事出村，由他事先出面向当局办理交涉。我知道后的反对意见亦不被他接受，而我也没有再坚持。

我原本想着，拔个牙，出血不止虽属超常，大不了流上几天血就没事了。白天咬个大棉球，还问题不大，可晚上流的量大得惊人，一晚上须开灯起来数次予以处理。大哥夜里与我同睡一炕，他实在担心得可以，以为这是缘于我身体的其他不健康病由。到了第五天夜里的情形则更夸张，大哥沉着脸逼我去医院；我答

应再观察一天，若仍无改变则全听大哥安排。对这件事我迄今不解，近乎一种邪象，我清楚自己的血凝能力正常，周身含血液在内并无病患，竟会出现这般反常过程？到了第六天夜里，情况变得失控起来，枕头跟前旁置一塑料袋，人基本无法睡。大哥责备我倔强得没有了理智。

「我不愿看见你求告那些黑暗东西。」我沮丧着脱口来了一句。

「都到这份上了还想这个？理他们都没有空，你身体肯定还有其他毛病瞒着家里人，必须现在就出去到榆林大医院。」大哥边说边开始穿衣服。

我自己虽然坚信这个时期神不会让我在健康方面出大的麻烦，但这血流不止究竟不可旁置不理，也开始穿衣服。大哥一看等于我同意了去医院，就赶紧叫住在县城的侄子开车赶到。离天亮还有两个多小时，我们连夜赶向榆林。到了那里，医生问明情由并予以处理，说从未经历过这种因拔牙而流血一周不止的病例，但说无大碍，他有法使流血立止。果然灵验，不到两分钟处理完毕，然后嘱我留下观察半小时后若无反复迹象可自行离去。期间，四弟亦赶到医院，决意让我留在榆林观察两天。

五十六、亲情真是一柄双刃剑

在接下来留在榆林的几天时间里，我与榆林警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方面是因为那天夜里他们还不及反应过来我已经出了村，是未经批准而突然离去，这对蛮横习以为常的当局可不是个小事，可在我这里他又实在不算个事，这就是冲突的根本症结。

我住在四弟家里，一些恶徒屡屡闯进院内，虽然并不作声，但那无疑是在宣示一种威胁。这对我已无意义，但究竟还是在四弟家，他家院子里还住了另外一家邻居。一次，一大早起床开门，榆林秘密警察头子「眼镜」就站在二楼廊桥上，一脸阴气。

我与此君「打交道」有些时日了，2006年4月份率众流氓不舍昼夜在大哥家院子里行恶的就是他。近十年了，我每回陕北，总能看到他的身影。2009年年底及2010年初我在榆林被秘密囚禁期间，囚禁点的总负责人就是他。2009年在大哥家的绑架、2006年以流氓手段赶我出陕北的现场指挥者都是他。真所谓「沧海桑田」，近十年过去了，此君仍不见有一些符合人性的长进，仍在执行着这见不得人的勾当，颇使人替他惋惜。

由于四弟一直坚持想让我住在城里，他心疼我，嫌我住在村里，不仅饭菜单一，而且无法洗澡，冬天没有暖气，决定让我住在他的家里。这原本不当是个问题，且中共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当面承诺了的。没想到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亦出尔反尔，反应非常激烈，明确表示不惜动用一切手段阻止我住在城里。一则此前有当面的承诺，二则我从不霸道强势让步，结果，为这点小事竟至剑拔弩张。此前坚留我住城里的四弟可怜兮兮地开始劝我回村住，我不答应，榆林警方扬言要采取断然措施。其实，那是一种没底气的表现，既然这般硬气扬言做甚？四弟使出了最后一招，把大哥搬上了榆林。

白发苍苍的大哥，这几年来，为了我的事受尽了难以尽述的屈辱和心里的煎熬。亲人的苦难煎迫经历，是我这十年来的几近不堪承受之痛，亲情真是一柄双刃剑。

大哥一见我，劝了我不到十分钟，见我终于不让步竟至大哭，呜咽着说：「咱老子死了这么多年，兄弟几人从未红过脸，你们几个一直尊敬我、听我的，我也从未把你们往不好的路上指过，今天就算大哥和四弟求你啦，他们这些年在你的身上丧尽良心的事做得让人听都不敢听，为什么到现在都不知道一点回避？住在四弟家和住在大哥家有什么区别？这又不是大的原则问题，为什么要这么强？」

我是最不能见到大哥和四弟流泪，加之在这件事上，我的神始终不做任何的表示，无疑，神是启示我这不当是个问题，住在村里更符合你后续的安排（**事实的确如此**）。我答应了听从大哥的安排。

兄弟三人平心静气地聊天时，大哥才告诉我说：「现在敢给你说了，我为这个事找过他们几次，给他们说了你们公安部领导当面给老三（**指我**）答应了的，除北京以外的地方都可以住，作为政府，你们怎么能说话和放屁一样呢？结果，他们完全不讲理，说你们又不是小孩，共产党写在纸上的也说不承认就不承认，更何况是口头答应的事？现在上面不承认说当面给你答应的事，让把你堵在村里的命令却是明确的，我们吃的是人家的饭（**指恶共**），人家叫我做甚我们就做甚。」

大哥说对他而言，能看到我活着在他的身边是压倒一切的意义。前几年三天两头失踪，以及失踪后留给家人无尽愁苦，永远是让人心存余悸。

五十七、大哥的身影

在这样的文字记述里，我没想到过专门有段文字去纪念我的大哥。在我关起门来写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他每天就坐在院子里给我劈柴。

1. 柴斧下的歌声

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农家专门生炉子取暖的习惯。但今年冬天，大哥早早地从城里给我买回了「洋炉子」，每天认真地给我烧着炉子。为了保证我的绝对安全，他不让我烧炭而全部烧柴。我那炉子吞噬柴火有如饕餮般气魄，他每天给我备得妥妥贴贴的，风雪无阻，有时竟能有歌声从他那儿传到我的耳朵里。

我爱我的大哥，就像他爱我一样。我从小没有父爱，经历过人生惊心动魄的悲壮与艰辛，在这记忆的惊心动魄画面里，最清晰的身影是大哥而不是父亲。

永不见有个尽头的贫穷困厄摧垮了父亲抗争不辍的生命。当父亲倒下时，人生的凄风苦雨并不曾停歇，终于是站在最前面的大哥艰难地肩起这人生的重担。四十年过去了，劳苦，漫无边际的劳苦，使他身体都变了形，原来的粗壮健硕，早被这祖祖辈辈以苦为生的岁月剥蚀得形影全无，现在是只剩得又瘦又小的身形。

我常想，大哥是中国农民命运的活标本，亦是中国底层人民悲苦人生的一个真剖面。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国家当是公民个体生活里阻风遮雨的主要屏依，这既是国家本质的最低道德底线，亦属人类构建国家的感情及伦理初衷。而「大哥们」一生命运中最沉重的部分却是国家加在他们身上的，他们已不再有任何依赖于国家的巴望，他们一生都在坚韧抗争，却从来不是针对权力。

2. 老三，铁刮子也刮不平世界

今天早晨吃饭，两小孙女不在列，问及缘由，大哥愤愤然骂着：「黑门儿（方言，指人死绝而灭门）共产党尽做这断根的事，孩子天不亮就去排队报名去了，该上学啦。」

我说：「这正常的上学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他说：「家里一直避着不给你讲，共产党断根的事都做绝了。过去村村有学校，现在，全乡只有闰家坪村一所小学，其余所有的村子小学全部关门，周围几

十里范围内村子里的小孩都只能去城里上学。一个孩子上学花上几千元上万元都不一定能上得上，所有的孩子上学，家长必须在城里租房，这一年下来又是一两万元。今天报名，只报六十名，剩下的孩子就走投无路。一部分孩子上不起，一部分孩子上不上。十几年来，为此拆散了数不清的家庭，一个人住在城里，一个人住在村里，婆姨被人拐走的事每年不知道要发生多少起。」

我问他：「乡村小学为什么要关闭？」

他说：「还不是因为那些贪官们，他们现在什么断根（指断子绝孙）的事都敢做。老三，腐败让中国社会连根都烂完啦，即便共产党明天倒了，中国的元气一百年也复原不了。乡村学校关门并不是上面让干的，但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名义上，现在村村仍有小学，钱，国家照样拨着。每个村都有公办教师，国家照样月月付给他们工资，他们每年的工资有五、六万元，只要给教育局领导送上两万，就可以只领工资不上班。你到全县任何一个村去看一下，都是这样，没有人不知道，贪官什么钱都敢吃，不知要苦害到什么时候？」

我说：「全县那么多家长，就没有人敢告他们吗？」

他说：「谁敢告，咱村平利和一群家长要到北京去告状，结果你也知道的，谁告状他们就抓谁。再说，告也没有用，还不是让教育局去查？」

大哥无意中的一席牢骚话，说得使人神情黯然。

他看我不再说话，他又说：「老三，铁刮子也刮不平世界。咱这祖祖辈辈的村子，最近突然下了命令让合并，咱村、石嘴峰和李家狐三个村合并成一个村，说是为了减少农村干部。其实，上面的想法可能是好的，但农村干部一个也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因为各村支书原封不动，村长改了称呼也原封不动，反而每三个村又多出来几个村干部。最主要的，老百姓又不是猪猪羊羊，是个招呼都不打就合并了。老三，共产党在农村搞大食堂的事你没有赶上，把农村人都折腾得活不下去了，饿死了多少人！他们一点教训都不吸取，这合并村子，跟以前搞大食堂有什么区别？他们脑子一热就干断根事，根本不管老百姓怎么样想。现在农民耕地机用点汽油，必须派出所批准才能买，在他们眼里，农民每个人都是强盗。」

我默默地看着大哥那无助的眼神，我与他一样地不安而无能为力。

3. 号啕声在山间回响

我迄今记忆潋潋的波光里，存储了许多有关大哥的画面，有些关于他的记忆则成了这生命的一部分。写到这里，这些永不可消失的记忆画面就在「眼前」跳动着，切换着。

1975年盛夏中午，大哥从农业社干完活，利用中午回家吃饭时间跑到自留地里锄地，其时父亲去世不足两月。我提着半罐子稀得与水无异的饭送到地里时，看到那我一辈子无力忘掉画面（**写至此，我的泪水扑簌簌落下**），大哥光头光脚光着上身，一边使劲地干着活，一边像凶孩子似地号啕大哭。几十年过去了，那充满绝望的号啕声音犹在耳。我把罐子放在地上也汇入号啕声中。他抬头看见了我，但哭声未停，他走过来，我以为他要吃饭，结果他一把抱住我，兄弟俩的号啕声在山间回响……

4. 砖窑底下汗水和着尘土流淌

1976年，大哥同我一起去县城卖药材，卖完药材置办了一些必须的东西后，他说你先回去，他有点事要办完后回去。

在我回家的路上，路过申家湾村的砖厂时，因我从未见过砖窑，出于好奇走到一口砖窑沿上向下探望。没想到那是一口刚起顶的砖窑，那时的砖窑是竖窑敞口，一股冲天热气使我本能地闪到一旁。可就在这一瞬间，我看到那一生不敢忘的画面，窑底有一个人光穿着短裤正在往架子车上装砖，身上的汗水和着尘土流淌。我一声「大哥」听得他抬起头来，脸上的汗水流淌得更加醒目。

「你赶紧躲开，太热了！」他说了一句又开始低头干活。

我说：「大哥，我也帮你干吧？」

「滚得远远的，里面只能站得下一个人，小孩子进来几分钟就热死了。回去给妈妈讲，我包了一窑砖，五块钱，明天天亮前干完活直接回组里（指农业社）劳动，不要担心。」他边干边急促地说着。

我那时懵懵懂懂，只是觉得他太可怜、太苦啦。那时父亲辞世已一年余，将父亲压垮的贫穷重担已全然落在他身上，他用心、用力，用一切可能的承担，来肩负起这穷家前进的重轭。

三天前，也是在吃早饭的时候，我提起这一节，他却说利用赶集给别人拉煤、干活的事常有，说：

「是大大没了后的事啦（方言，指父亲去世后），你说的这次我不记得啦。」

5. 卖上二斗米不就解决问题啦？

1977年底，二哥要当兵，体检回到家里，母亲急问结果如何，他却不说话躺在炕上流开了眼泪。

母亲沉默了一会安慰他：「今年没验上明年还可以再来，哭有什么用？」

他坐了起来哭着说验是验上了，而且接兵的也看上他了（**二哥年轻时是很帅气的，尽管常衣衫槛褛，但依然是我的记忆里那个时代不多的美好之一；真不像现在的他那样，便是铁石心肠者见了也会动恻隐之情**），说接兵的干部将他拉到一旁悄悄地告诉他，部队的领导看上他了，只是想去的人很多，希望他能在公社武装干部那里活动活动。二哥说，他问得多少钱，那部队干部说得二十块钱。这对我们家庭而言可不是个小问题，母亲听了也就不再说话了。

黑夜，干了一天活的大哥回到家问清原因后说：「没有过不去的沟沟坎坎，这问题放在三春期（**指年初**）就是个大问题，现在刚收到秋，卖上二斗米不就解决问题啦？至于说明年饿肚子，那也是明年的事，咱家哪年不饿肚子？先解决眼下这个大事，明天我去卖米。」

几十年过去啦，前几天与回来看我的二哥提及此事，二哥依然泪水潸然。

「诸葛一生唯谨慎，大哥大事不胡涂啊！」我仰面感叹道。

6. 谁也不能说死说这不是老三的一次机会

转眼间到了1982年底，我当兵的时间了。我从黄陵打工回来，竟只给家里带回来四元多钱。经历数不尽的苦难，决绝地回来就要当兵去。回来见了母亲就说了我的想法，母亲却一言不发，不料大哥天黑回来后，母亲却开始表态，说：

「你们这些孩子都是铁石心肠，你老子死了这么多年，你大哥受的罪连牲口都受不了，你们翅膀一硬就光想着自己，长大一个走一个，你们就忍心让他一个受这份罪？」

我明白母亲的用心，她同样心疼大哥，但又愿意让我出去，她把问题留给大哥决定。

端着大腕跔蹬在地上吃饭的大哥默默地听完，仰头看着母亲说：「妈，谁也不能说死说这不是老三的一次机会，受苦人的饭碗永远丢不了，大不了好吃好喝

三年后再回来受苦吧，我支持老三去当兵闯一闯。」

新兵离开县城那一天，在所有送新兵的亲属大阵里，我的大哥是唯一追在车后面跑了五里路的送行者。所谓「人间重别情」，我们坐的是大卡车，公路逶迤弯曲，而他则抄近山路追。汽车行至大西沟山上，已经离开县城五里路了，我用眼睛在我熟悉的山道上寻找大哥，看到他吃力地向上奔跑。我举起手，他看见了，拚命加快速度边跑边向我摇手。三十多年过去了，那形象反而更加清晰。

正在写这段文字时我在想，包括后来的四弟当兵，都是他奔前跑后，送走了一个又一个，对于我们要出去的人而言，便是朦胧飘忽，但究竟还有可能的希望存在，而他永远是被留下的。

父亲去逝后，大哥以石头般的诚实独肩肩起一家人生存的苦难重担，当二哥、我、四弟，我们长大了，终于可与他分担着生活的重负时，我们都心里生出了外出寻找希望的想法。他用他的善、义及对我们的爱，拓通了我们奔向外面世界的路。

此时此刻，他正在外面听着晋剧而劈着柴，每天认认真真经营着我的取暖炉，经营着他从未对我们说过，甚至没有想到过的这个字——爱。

7. 淚眼潸潸的时刻

2009年6月28日，「失踪」半年后的我突然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出现在大哥的院子里，他赶紧跑过来。一看大夏天的，我还穿着冬天的服装，他竟像孩子般呜咽起来，回到母亲住过的窑洞里依然痛哭不止，惹得我也热泪汨汨。

2012年3月份，在沙雅监狱囚犯会见大厅里，隔着玻璃，他看见我被人押过来，他和我的岳父两个白发人，又痛哭失声。而为了这半个小时的会见，他三上北京、两去新疆，受尽了中共恶徒的欺辱。

2014年8月26日，我被新疆警方押出机场向榆林警方办理交接时，我听到大哥的声音在叫「老三」。我寻声望去，见大哥与四弟、表哥站在远处望着我，而大哥是叫了一声「老三」后又在那儿泪流满面。他后来说他一眼看到我成了那样，他当时难过得差点背过气去。但他不知道，这已经是我体重增加了近二十斤以后的情形。

对于大哥的记述，足可以是厚厚的一本书，然而这不是我当下要做的。

记忆中，大哥向我走来的画面可用洪波涌起来形容。他总是头脑冷静，大是

大非问题颇不糊涂，但也常有穷人气短之举，他有一次去北京时，一位多次来陕北并在他家里吃住过几次羊肉面饴铭的、每次从他家里拿些土特产的秘密警察小头目给他塞了五百元钱，他是接住了的。我从未为此事有过一丝埋怨大哥的冲动。但在这一点上，我和四弟都认为是不妥的。

当然，大哥在一些大的场面上，他总是能有异于常人的惊人之举。

8. 一勺粪便急救木狗兄弟

我有个亲表弟官名木狗，今年三十多岁。

这木狗君有一次与姑姑使气后竟将一瓶农药给喝空，当家人发现时已不晓人事，只是四肢机械地抽搐着。姑姑、姑父呼天呛地大哭，在封闭的山村里，这骤起的喧嚣声就像传统军营里的紧急集合号令。我这木狗表弟，是个弱智人，平时在村人眼里颇不被重视，可喝了农药且终于倒在地上的木狗一时竟不平常起来，过去总不大正看他的一双双眼睛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集体给他以一次空前的注意。木狗的亲人及自认为有资格号哭的人一时多了起来，汇成号啕大泽。

得讯的大哥也从干活的地里撇开锄把就往回跑。大哥究竟是大哥，他拨开那围观的人群大阵，看了一眼地上躺着不断抽搐的木狗表弟，大呼一声：「你们都是死人呢！」说完直扑向茅厕，操起舀屎勺使劲地探底一搅，一股黏稠物借力而涌起，他一勺下去舀了个恰到好处。他呼开人群，彼时也有些高瞻远瞩的人登时大悟，有人加入了大哥主导的急救大阵，扶人的，撬牙的，没有语言，却一切有条不紊，凡事俱备。大哥稳执那舀屎勺，对准木狗兄弟已被撬开的嘴，那勺粪便随着大哥缓缓扭动的手，流入木狗兄弟的口。木狗猛地一大喷嚏，大哥脸上立时布满尿花，人群中出现骚乱，大哥连表情都没有动一下，「继续灌！」他喊了一声，人群又趋稳，腾空了的舀屎勺被撇在了一边。大哥指示把木狗君的身体放平，不到二十秒，木狗君吐得翻江倒海。围观的圈子越来越大，经木狗腹内杂烩了的粪便与农药的混合物立时喷射了一地，臭气弥漫天空，木狗竟睁开了眼睛。木狗君又活过来了。

可能有些雅士会认为我这段文字实在够得上低俗，可究竟中国农村社会里几千年来，实在是地是就这么「低俗」地活着。我几乎每次回到老家，都会有人给我调侃这个过程。

人当然是雅起来的好，自从世界上有了「科学发展观」，自从中国有了「五

百理论精英」后，我更觉得大哥急救木狗兄弟的手段非特不雅，更与「科学发展观」以至「五百理论精英」美的世界格格不入。但就功能而言，「科学发展观」也罢，「五百理论精英」也罢，其作用应不在那勺粪便之上，其价值当在那勺粪便之下。

我常说，中国农村地区的人活得极悲壮，活得无依无靠。急难之际，人民会扑向茅厕，操起舀屎勺，而不是去医院，因为那和他们是实在的两个世界，「终于站了起来」的人民还不能生出急难之时寻诊医院的能力。

我有时看着大哥而心里暗想着这些事，哀伤及钦佩之情常蓬勃在胸。有时也在想，这「科学发展观」，这「五百理论精英」们，在中国的农村地区，何时才能在贫穷而朴质的人眼里取得超过茅厕、超过这舀屎勺的地位？有时竟生出就此问题向大哥咨议的想法，但终于没能开了口。

9. 大哥变了

记忆中的大哥尽好的。但在这里生活一年多后发现，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改变了许多：其一是贪，只要可以获得则全然不顾念来路的正当与否；其二是除至亲外，于他人不肯有一点同情心，更不肯有力所能及的具体帮助；其三是他不再善良，总欺辱比他更贫弱者。我于此屡劝而无有改变，这是我的至痛。痛哭而规劝事亦时有而终于不肯有一丝改变的，成了我们兄弟姐妹中的异数。

孰能敌得过亲情！唯能努力保持清醒、警觉，并在亲情面前保有冷峻的是非判断。

我无法时刻盯着我的亲人们（令我欣慰的是，其余的亲人绝不贪得一分钱的不劳而获）。2017年前，我随时会再被绑架，我必须在此严峻声明，此后任何未经我同意的，于我大哥的捐赠或照顾，都将被视作为于我的非善意之举。

五十八、对外隐瞒行踪的几个因素

回到陕北老家迄今已有半年的时间，但我们对外隐瞒了这一事实，这是我要代表哥向外界朋友赔礼致歉的。

首先是，两个大家庭在我还没有回来前即共谋定下了要对外保密两年，要调养恢复我的身体，这是我在表面不能反对的。我也想尽一切牺牲使他们能安静一些时日，这是我已欠下的感情债，也是我的岳父老泪横溢当面哀求了我要我答应了的。但实际上，中共黑恶势力在这个问题也算「成全」了我的两个大家庭，他

们无数次地威胁我的家人：

「高智晟只要和外界联系，我们就会像过去一样采取果断措施。」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家人常如履薄冰，担心我再度与当局冲突。他们的是确是怕了，怕失去我，尤其这次回来后见到的情形，岳父在哭着哀求我时说，家人见我那副形容，私下以为我有什么大病，他说他们当时都认为我可能偶尔跌一跤就再也站不起来了。这种看法竟与回到陕北家里后、这里家人的看法不谋而合。大略上是11月份，四弟才给我讲说在榆林机场看见我后，他和大哥两人都哭了，都认为我定有一种进入最后阶段的大病瞒着家人。我至今觉得那可能是六年不见天日而生成的异于常人的形容误导的结果，因为我从未感觉出与以前有什么不同。

另一个因素是我不愿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来访者在我的眼前被抓。这样的经历在2006年、2007年及2008年，北京家里的楼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中共黑恶势力就在我家楼道里及楼下抓走一个一个的来访者。我曾从窗户上亲眼看见一位日本朋友被架进了我楼下的小房间（**是中国黑恶势力在我家楼下盖了一间小房间，供指挥人员值守**）。还有一次，一位从四川的李律师从我门口被架走，也被架进了那个房间，那律师很冷静，中共特务大声呵斥他：「你是什么人？找高智晟什么目的？」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律师从容地问他们：「你们是什么人？什么目的找高智晟是违法的？」因为从未有人这样大胆地质问他们，所以那一群法盲者竟一时张口无言。

当局曾在与我的谈话中明确提出，外围想要去找你的人由我们解决。我初回来那段时间，一批又一批的警察游荡在我大哥院子四周，我若对外说我已经回到了陕北，就会有一些人赶来看我而被抓，从技术角度讲，我不愿看到这种无意义的牺牲。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已有六年里基本没有看到有点价值的书。一回家，一头扎进了书堆里，不允许出村，甚好，书中有比村外更大更深的世界，书这几个月里成了我全部的世界。虽然因为不能去看牙病，而牙齿常与我有些痛苦的交涉，家人也常为此焦虑，我则常以为，便是我的全口牙掉完，也终于于共产党的灭亡大势无补，该去的定会去，就像该来的一定会到来一样。2018年，在没有共产党的中国里，我就装他一口新牙吧。

而还有一个更大的因素是，我拟利用半年的时间边看书边写点东西出来。首先，想把我小时候到儿子出生前的这段历史写成文字，他不是基于一种时髦的写出所谓「自传」的动机，而是儿子高天昱的建议，他请求我给他讲我成长经历的

故事，我立即答应，因为这不需要构思，只要做记忆梳捋即可。没料到，讲了几句，小家伙无意中的一句话，诱发了我将那些经历写下来的冲动。他说：「爸爸，我要把你讲的故事将来整理出来出一本书。」我欠孩子的太多，孩子有这想法，我即愿意花费点精力认认真真地把他写出来，作为一点爱给予女儿及儿子。不料，这一写一讲竟全然耗去了我两个月又十二天的时间，写成了竟达十九万字左右的记述。此后，我就着手写《2017年，起来中国：酷刑下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自述》这本书，这一写竟又占去了我三个多月的时间。亦即，我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写出了流水账般四十多万字的记述。其中，最有价值的核心部分，是关于对我的神的见证。

五十九、隐居陕北老家的日子

这期间，我的时间安排极紧凑，不夸张地说，连上个厕所都是跑步往返。白天写书，四千多字的记述，晚上及大清晨看书，而这段时间里，我可以说是六亲不认，关着门，不是写就是看书。因为我还不能让家人发现我在写东西，可以说，对于我写东西之举，一定程度而言，家人的「敏感」程度不亚于共产党，他们怕再次失去我。为了安抚他们，只要他们开门，我立即将笔记本和笔藏起来，操起面前的书便看。大哥不止一次在吃饭时间问我：「你最近没有写东西吧？」我暂时还只能骗他说没有，我也真不知将来怎么告诉他说我骗了他。

我在任何环境里都会迅速将自己导入一个循环画一的规律里，这次回来也不例外：

每天早晨五点准时起床看书一个小时；

六点至七点钟一个小时的户外院里活动锻炼身体（其时，四周「保镖」闻声而动，组成一个极特殊的，只有我们之间才能领悟的氛围）；

七点至七点半洗漱、打扫室内卫生；

七点半至八点一刻间读《圣经》；

八点一刻准时坐下来写东西；

除了两顿饭及中午户外活动一小时，至下午六点半前就一直在写这些文字；

晚上七点点准时开始看书至吃完饭止；

晚饭后活动一个小时后再看会儿书，至八点准时入睡，常触枕即可至酣睡境。

我的白天是足够地苦，所以必须保证足够睡眠。信神的人，思想常保有着很简单的状态，最大的益处即是倒地即入睡之效。回来一个月，体重陡增三十斤。

这段时间，外面也竟还有些惦着我的人，费尽周章来找我大哥，希望我能出去为他们工作，除一家给年薪六十万元外，另两家则都是开价百万元以上年薪。他们都知道我不能离开村里，竟都提出，将我的名挂在他们公司后，唯提供思想方面的价值支持即可。其中，愿付六十万年薪的是我的亲戚，几次游说我的四弟以助其遂愿，但都被我拒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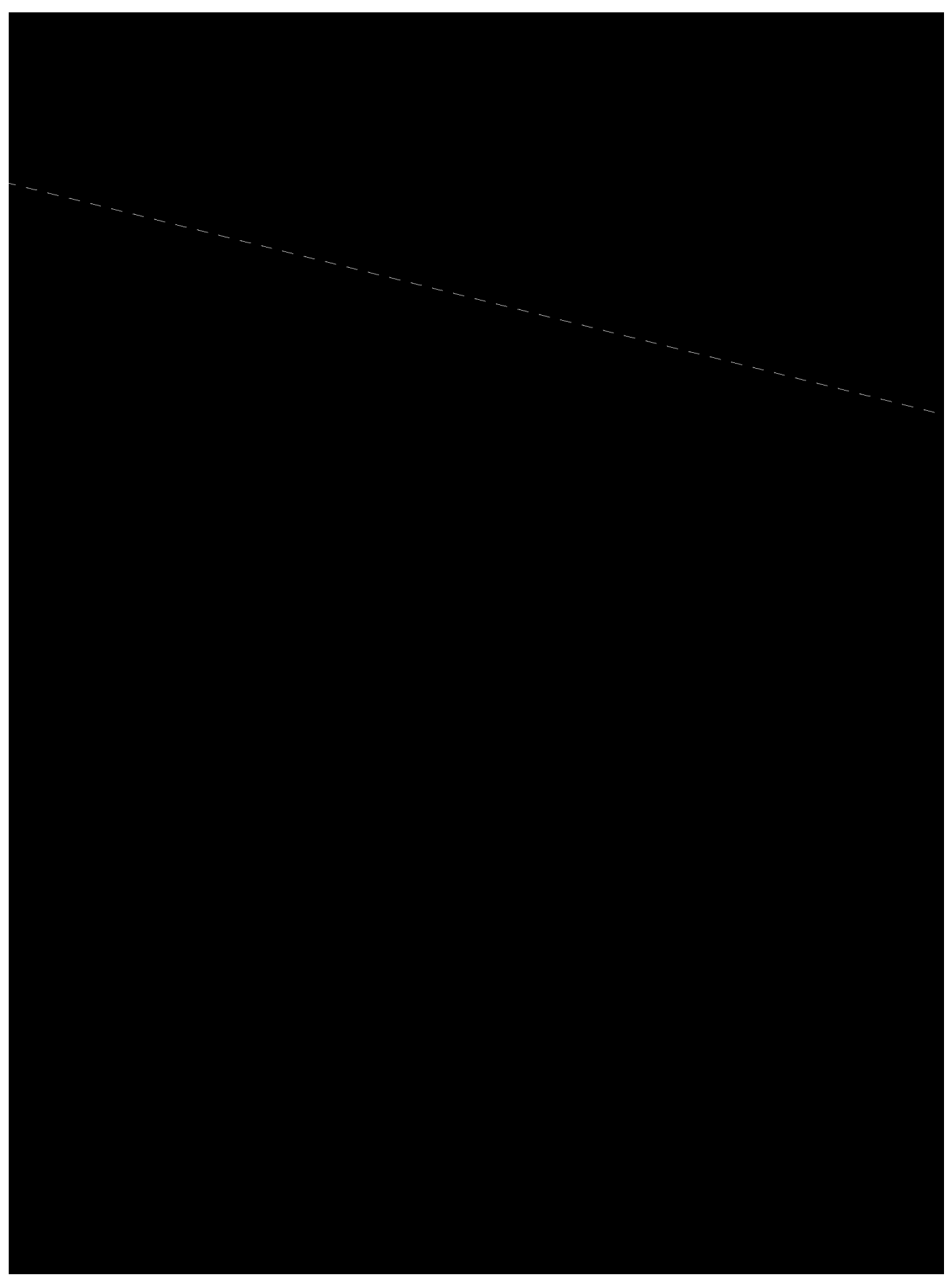
对于一个已经身无分文的俗常人，钱对我而言，不单是简单地钟情而已，且偶有炽烈的爱情生出，但究竟还是不敢苟合的。公司愿以百万元年薪竟只为获得一种思想方面的联系及支持，这颇是令人欣慰的一个理由，在权力压迫无处不在中国，民间的自觉进步究竟是不可阻遏的。思想作为一种力量，甚至作为具体价值，竟受到经营者的认可，这无论如何算是个进步。但具体到我而言，我是不认为我的这点思想能与百万元年薪的气魄去勾兑的，每个星期天，我是干干净净地休息一天，清理个人卫生，更担心有不明亮的力量在其中发力。进城洗澡是不可以的，这究竟与「国家安全」不大方便。现在还是「我党」的天下，他仍然有足够强大的力量阻却我外出洗澡，加之我若非不得已，是不愿在公众浴场洗澡的。我发明了陕北山村式的洗澡（当然未必具有独创性及新颖性），只是一周一次，倒也痛快淋漓。此项发明不仅具有现实的技术意义，按「我党」惯常的说法叫「还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他一举粉碎了反动派的封锁围剿，解决了一个如影相随的苦恼。

星期天的暇余时间，我大都会爬上老村脑畔山上转转，渐渐地竟寻找到了家乡的美。这是我过去几十年里所不曾留意到的，有时竟美得使人惊心动魄，尤以秋日早晚为着。在日初之阳里，足下大地，襟前红日，指顾山河，天、地、人，相映成趣，那种壮美之情无能言传。到了落日时，在落日里，经验那不落山河的雄大与壮丽，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经验趣获。太阳落下而山河不落，每至彼时，送走了落日，我常忘神地站在那山顶上神驰，觉着乾坤间此刻仅遗我和足下这星球，心跳成了天地间的唯一声响，有时若非疾飞归鸟的提醒，弄不好真能把整个世界给丢了。

今天中午出去活动，在雪压风欺了一个冬天的泥土上，小蒿草又吐出了新绿，而背阳处灰白雪色依然无动于衷。这颇给了我些激动。满眼里，依然是冬天的严酷与肃杀肆虐过的踪影。真的，这些看似极不起眼的小神迹，常能赠给人以哲学般的大启示，严酷和肃杀不是死亡，是成就生命又一次蓬勃的前奏。他给我

的另一个启示是，我的家乡从不缺美，缺的只是我们发现美的能力，或者竟是些注意力。

写于2014年12月27日至2015年3月18日
于母亲生前所居窑洞



第貳部

神的普遍啟示
和特別見證

第一章

神对共产主义政权，在中国寿命的启示见证

首先我说明的是，虽然本书记述中有许多我亲身经历领受的奇妙之事，但我知道自己是有限的受造之人，不敢妄加解说神的旨意，更不敢僭越代言妄称神的名，但我又不能将亲历的真真切切的事情隐瞒不说。

故此我申明，本书所涉及对一切有关上帝在世界和中国普遍启示的解说，只是我个人的领受。如果一切来自上帝，如果我的个人感受没有谬解上帝的旨意，想必上帝会让世界看到这一切的应验。而如果这一切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希望就让这些文字作为一个中国受难基督徒的内心纪实存留。

此刻，我在上帝面前存无比敬畏之心，交出自己这份诚实无伪的心灵纪录。

愿蒙主耶稣基督悦纳！

中共在中国大陆专政的期限为六十八年。神对任何影响人类群体运命的重大事件、过程、存在或现象，在命定时即会给世人许多引导启示。可惜大多数情形下都会被懵懂的人类所忽视。这个话题与不认识神的人谈很困难，尤以中国大陆更甚！

一、机械化信神者

中共统治集团是一个很奇特的群体，说确切一点，这是一个很可怜的群体。公开的或者在阳光下，他们决绝地否定神的存在，可在隐蔽处，他们没有一个不信神的，信的神真伪且不论及。

我曾在中共高层一个私人圈子里的聚会场所偶遇清华大学一位研究《易经》的教授，他主动向我提起我对中共贼首的三封公开信，主动提及中共妖人江泽民。他说江泽民信神很虔诚，成了其日常生活之主要内容，连每天出门，几时出门、出哪个门，及几时当进门、进哪个门都要扶乩问卦以定。我笑着说那不叫虔诚信神，那叫全「机械化信神」。他说江还重新修置了扬州老宅的大门，说「他还想法不少」。

在对待神的问题上，中共这种做法极易造成其成员的多面人格，造成他们行事的阳奉阴违。但就信神本身而言，他们同样表现出出众的愚昧。信神是一个奇妙的心灵和诚实过程，如果是虔诚信那位创造、救赎和启示的真神，这个过程必然是在人的生命里培蓄并滋荣善和爱的过程，其中公平、正义及良知必将成为其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相反。他们信神，类我所述江泽民的信神，乃是：机械化信神，把神当成一种逐利的工具，心里满溢的是黑暗的图景，祈望神遂其恶愿，那实际上确认了一种昏聩的信念——神可为共谋者！

2010年3月28日，我被专门负责对我秘密囚禁及施行酷刑的中共北京国保头子于泓源和孙荻，率众转移至山西五台山，颇使我惊异的是，这两个无恶不敢为的秘密警察头子一进寺庙，竟然对着那些泥胎偶像，双掌合并，口中念念有词，纳头长拜。我不知他们闭目纳头跪拜时，记忆影像中剥光衣服电击政治犯这一节，是在心灵中如何与神交涉的！但通过几年的「朝夕相处」，我可以断定，他们的怕要比常人多得多。

二、三次灾难恰好是三个「08」

2009年5月份，在秘密囚禁地，两个秘密警察聊天，说高层现在是草木皆兵，看得见的也怕，看不见的也怕。说过去是只怕人，而现在是既怕人又怕神，说这怕开神就麻烦大啦。

「这玩意你看不见他，你有劲使不上，他又不像老高（指我），再牛逼照样捏死你，可这神，只有你怕的份啦！」

我不说话（按照规定他们在我面前不得讲话），听他们一路扯下去。他们说2008年中国发生了三次著名的大灾难，即1月7日的南方大雪灾、3月14日的西藏所谓暴乱、5月12日的汶川地震，说这三次灾难日每次的自然数字之和都是「08」，三次灾难恰好是三个「08」，与奥运会开幕日的三个「08」相吻合，说「高层吓坏啦！」，说在去年这是顶级的国家机密，今年才敢说啦。

当注目的是2017年里的大变化——惊心动魄！世界瞩目！

三、「七五」事件应验风传

中共高层群体信神，当始于妖人江泽民时代，此前的中国高层的绝大多数不

信神应是表里如一的，尤以毛泽东为甚，从他的著述及他与哲学家的谈话纪录看，他对唯物的信仰是实在的，这就铸就了他和他的党的悲剧结局。但即便是毛泽东，他对一些神秘的现象或信息亦充满了好奇。

2008年，坊间，甚至是中共秘密警察中间，均风传说中共在2009年里会有大事发生，结果2009年7月5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五」事件。这是新疆治安恶化趋向普遍及表面化的时间分水岭。中共新疆当局几近歇斯底里地表明自己的无辜。

关于「七五」事件的导因这里不予论及，但长期高压统治断难辞其咎，从事发当晚，中共新疆贼首王乐泉的电视讲话即可解释这个问题。王在电视讲话中声称说：「动乱分子当天曾两次在人民广场聚集，都被我武警部队冲散。」王的注水大脑显然没有意识到这里面透露出对他们而言的「负面信息」，那就是一贯的暴力打压任何和平表达的恶习。两次和平聚集被暴力冲散，和平表达不能，暴力宣泄成了绝望的选择。而对于中共而言，「七五」事件只是其在新疆麻烦的开始，他们大略也多少意识到自身的一些问题，但仍回避了政治黑暗这个万恶之源的根本性问题。

每次谈到新疆频生暴力反抗事件的教训时，当局及官控媒体上都会不厌其烦地提醒各地方当局，「要尽快抓紧落实一批长期得不到落实的民生项目，尤其要抓紧落实一批与民生紧急相关的项目、措施」。稍有点思想能力的人，绝不难以从这种「紧急落实」中读出这个无赖政权对民生，尤其是对与民生紧急相关的项目的长期不作为与「暴乱」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要么像汉民族一样永无底线地忍声吞气，要么起而反抗，和平表达不能时，暴力宣泄。

四、共产党和国民党历史命运的对比

神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命运的历史转变的时间安排上，也有着明显的对比性启示。1975年蒋介石先生去世，国民党的伟人政治时代终结；1976年毛泽东去世，共产党的伟人政治时代结束。国共两党均进入了强人政治时期。国民党进入强人政治时代的第十三年，即1988年，历史性地呼应台湾人民的要求，选择了「永远和台湾人民在一起」（蒋经国先生语）的生途，在台湾实行民主宪政的多党竞生政治，使国民党获得了新生。而共产党在进入强人政治时代的第十三年，即1989年，面对中国人民的和平政改愿望时，却野蛮地举起了屠刀，对手

无寸铁的、自己的和平公民施以惨绝人寰的杀戮，终于也堵死了共产党自己的活路，愚昧地为自己拓通了死途。国民党在做出了历史性明智选择二十八年后，即2016年，正是其竞夺政权执政八年的届满期，而共产党则在做出了历史性选择的二十八年后，即2017年，正是他的死期。人们习惯说「历史有时是惊人地相似」，实则是昧却了应有的灵性判断，忘了这一切背后的神秘推手。

第二章

神赐予我及我家庭的特别引导和看见

一、人生最大获得期的十年

我自己过去不认识神，只承认自己眼里能看到的東西，这是我个人的阶段性不幸和暗昧。蔡卓华牧师被北京当局迫害案中，给了我接触《圣经》的机会，但《圣经》没能给我异样的感动，这大略正是《圣经》璞的一面。

几个月后，北京当局开始全神贯注地打压我，我与中共恶政权的冲突终于走向公开。在世俗人的眼里，2005年迄今的十年的时间里，是我个人及我家人命运的困厄时期，且这种困厄的终结将遥遥无期。今天，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世人：这十年里是我人生迄今的最大获得期。所谓「登泰山而小天下」，与这十年里的获得相比，过去的除了妻子及两个孩子外的所有获得都小得可以忽略不计！这一伟大的获得就是认识上帝，并渐进地改造了过去深及生命深处的顽梗和愚昧，终于驯服地汇入基督徒的浩瀚大数组中，聚集在主的名下。

在这点上，我特别感谢范亚峰弟兄，认识神并完全地接受神，本质地提升了我个人生命的价值；首先是提升了生活的质量，其次是加增了一个人心理的力量，这种加增是信实的，更是不可量计的。

二、不要企图荡灭大地、填灭海洋

记得有一次在沙雅监狱与监狱长发生了颇不小的冲突，他实施了包括高音喇叭进行无休止骚扰的多种恶手段给我制造苦楚，我绝食抗议一天半时，他找我谈话，我盯着他的眼睛逼视他，他却怯而回避我的目光。

我一字一顿地告诉他讲：「在我的面前，你，和你背后的力量将永远是失败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更是。一个基督徒，你眼里他是一粒沙尘吗！请你记住，一粒沙尘的筋骨是大地；在你眼里，他若是一滴水，请你明白：一滴水的魂魄是浩瀚的海洋。你的出路是加入进来而不是企图荡灭大地，填灭海洋！这是在做无用之功！」

我大致可以断定，十六监区一千多名被囚禁者，以这种口气跟他谈话的绝无第二例，竟一时使他不知所措。没有几天，他竟调离了这个监区，那次谈话经历竟成了我们的告别议程！

然而，作为基督徒，心中力量的生成、培蓄及滋荣壮大，与我的对人的有限性认知及内心对自己谦卑的培蓄是同步的，我虔诚地信靠神却从不迷信，对之，我常保持着冷峻的警惕。全能者上帝这几年与我保持的交通，在开始时，真的惊讶得让我惊心动魄。论到基督徒，我当算是这个时代最幸运者之一！但起初那种震惊恰证明我属灵生命的不成熟，对神信靠得不完全彻底及不够坚定；我很快开始提醒自己：如果你真实相信了神的全能，那么，你对任何鲜活的灵异遭遇都不应表现出内心的惊讶，你当敬畏及赞美之，当作为你信心的基础，而不是持久地惊异！我很快使自己平静下来，冷静地梳捋、记念每一个奇妙的见证，使自己信心与属灵的生命在主里一起成长。

三、祷告得蒙应允

我绝大部分时间不为自身的具体利益祷告神，但每天晚上睡觉及早起前必有恒切的祷告——为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明天。在一些重大的环节，有时对一些具体的、阶段性的抉择上，我向我的神祷告过，所有祷告，百分之百地明确予以答覆，时间均在第二天凌晨起床前最后五秒钟之内，从无例外！

1. 异象一：被「释放」回家

2006年8月15日，我被中国黑恶势力暴力绑架。因为那场冲突颇为持续，也颇有些当量，当局下了决心欲置我以死地，国内外及我本人都认为那次最低将会被判十五年左右，当天夜里审讯安排在看守所规定睡觉时间的一分钟后，我刚躺下不到五秒钟就有声音传来：「815」提审。审讯完毕我回到监舍，睡觉前我做了认识神以来的第一次祈问前景的祷告，祈问神这一次是否会如世人所言被长期囚禁，这也是第一次通过祷告后神给我的启示。临起床前最后几秒钟内有一梦临到：一大群人围着一个巨大的古墓坑，坑里躺着一匹死马，肤呈褐色，议者纷纷，但众口一律：是匹死马。我好奇地挤进去来到墓坑边，奇迹顿显，那死马腾跃而起飞奔出墓坑而去，在众者的瞠目结舌中远驰。我心中豁然，知道这次囚禁将维持不久。

2006年12月12日，当局对我的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12月20日起床前几秒一梦，梦中牢门被打开，我迈出牢门，瞬间即走至我老家的村口；12月21日，在同一时间得同一梦，只是这次迈出牢门瞬间即进了我老家的院门；12月22日，在同一时间得同一梦，只是这次迈出牢门瞬间即进了母亲生我的窑洞家门里；我于当天被「释放」回家。

2. 异象二：听见神的声响

2009年2月3日夜，当局在陕北老家大哥家里又一次绑架了我，由于这次绑架他们没有准备黑头套，在路上，他们将我的保暖内衣套住我的头，由于时间太长，且几无透气性，我一到目的地即发呕不止，我感到我的脸部出现了肿胀。秘密囚禁地条件非常残酷，那应当是一栋别墅的顶部角楼，有六至七平方米，窗口用超过十公分厚的沙发垫堵死。每天坐立时间十七个小时以上，他们刻意营造与人世隔绝的氛围，一天两顿煮白菜帮子。真正的，你无法述说清楚那种惨无人性的压迫。

到第四天夜里，我向主祷告了两个问题：第一，这次囚禁意味着什么？第二，囚禁时间会有多长？结果，第二天临起床前五秒钟内神回答了我这两个问题，第一个画面我迄今未能读懂：天空出现一个类似于电影银幕般的窗口，一个身影背向我，其装束类明朝文官，身披绛紫色的绒质大麾，他的前面有棉絮般雪花密降，而画外音则回答了我的第一个问题：「吉兆！吉兆！吉兆！吉兆！」四次重复，那声响中的雄性魅力即便是诗人、艺术家也无法描述清楚。可以肯定，那声响在天地的任何地方都不会有死角，却并不振聋发聩。那是我迄今唯一一次聆听了神的声响。

而神用两个字清晰地回答了我祈问的第二个问题：一个「挨」字！一个「唉」字。我从这两个字中读懂神所传与我的全部思想——「挨」字，表达神绝对的自信、保证和绝不容置疑地命令：你只须承受，其余一切事属呼神。而「唉」则告诉你：这次囚禁时间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短（我当时想象为半年左右）；另一层信息是：由于神爱你，神也在承受，我不会改变我的预定。时至今日，每每想起那个醒目的「唉」字，我必禁不住热泪涌流。这位全能者，却有像人一样细腻的情感，他有着无限丰富的慈爱，人的痛苦都与他息息相通，就是他的痛。这是我第二次为解惑而向神做的祷告。

3. 异象三：用圆圈圈起来的「民」字

第三次就具体问题所做的祷告是在2009年的5月份。4月28日，因囚室来了几个人，在我的头上套了两个枕头套被架下了楼，后架上了一辆车，这是唯一的一次在白天转移囚禁地的纪录。车开了一个小时后停下来，我被架下车，左右各一个人，各执我一臂，各用一手压在我肩上，将我身体压至九十度而疾步前行。我当时心里颇哀伤，为这个苦难的民族哀伤；人类文明已到今天这样的时代，这民族终于没有什么长进！仍然用如此原始的过程解决大家的异见。我知道这又是要转移秘密囚禁地了。每个囚禁点从不超过三个月即要转移一次，每次转移过程实际上是精心设计的，属于恐惧神经战的一部分，刻意在过程上营造神秘和恐惧。因为在车上的一个多小时，我的头被压在我的两膝之间，头上又套了两个枕头套，严重缺氧使人思维呈浑浊状，唯一的积极作用则是减少了生理痛苦。

到了新囚禁地，于泓源又来谈话，大意是：要么同意被他们强制送出国境，要么让你无限期地与世隔绝生不如死。我就此做了祷告，请神原谅我生命的软弱，若神应许，我愿出国避祸，若不应许则毫不含糊。结果，第二天临起床三秒钟时间，神回答了我。我看见一块巨大的黑板，大约有八平方米大小，上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单字或短语，可谓成千上万，黑板正中间写了一个「民」字，还被粉笔用圆圈圈起来，然后又用一条虚画的引线，引至黑板最上部边缘上的空白处又写了一个「民」字，也用圆圈圈起来。这个回答，隐含了极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当天我立即拒绝了强制送我出国的议题。「有识之士」会问，既为强制送出国境，何故要你同意？道理很简单，强制送出去很容易，但我不止一次告诉他们，我立即会让他们后悔不迭，我很快会寻找自愿者作伴越境回国，使他们灰头土脸地回到问题的原点！

因为是有求而必应，更使我不敢动辄就祷告神，神对一个卑微之人的祷告有求必应，他的降卑正体现了他独一无二的至高位格。在我的眼里，这种降卑是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庄严和崇高，所以我绝不轻易为个人痛痒而向神祷告。尽管这样，在秘密囚禁期间我还是有过四次事涉个人重大选择的祷告，唯能使我至今顿觉快慰的是，我每必顺服神的示教，挺过了一次又一次困难的过程。

4. 异象四：「全党岁九十六」和「关」字

我的第四次有涉个人选择的祷告，是在2010年的7月份。这次的囚禁最为残

酷，由于严重缺氧，士兵们常在囚室里面呕吐，房间潮湿的程度令人惊悚，床上铺的纸箱版捏一把水哗哗啦啦直流。作为基督徒，我动了假见证的心念，即是对我神的亏欠，关于这些事实，2017年以后，那些士兵会自己出来讲述。先后有上百名士兵在那里轮值，二十四小时有哨兵看守，这些细节我将在本书的后续予以详述。但对于囚禁环境及方式的安排上，当局绝不是随意决定的，按于泓源及其最得意的干将张雪的话：「丫的就叫你生不如死。」这是作为摧毁我生理及心理的系统安排的一部分。

残酷的囚禁环境，残酷的酷刑，伴随不断升格的利诱。到2010年7月份，我的生理承受真快到了不堪的地步，我祷告神，求神原谅我生命的软弱，我什么都不要，我以前所做的原本只是一种本能的良心反应，竟有如此没完没了的没顶灾难临到，尤其不理解并绝不接受祸及我无辜的亲人。为了我的亲人，我会毫不犹豫地舍命保卫他们，所以我准备暂时放弃与中国黑暗势力的僵持，为了亲人，我从此噤声几年。对于我妻子耿和正在经历的苦难，我有时心痛得不能自持。耿和一直靠给富人家打扫卫生挣点钱维持娘仨的生活，当局也不断地将这样的信息传给我，这却是他们讲的罕见真话。我走到今天，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反动当局还终于没有能打倒我，2007年9月、2009年9月、2010年4月，三次使他们自己惊心动魄的酷刑也终于没能改变什么！没完没了的暴力绑架、神经战，惨绝人性的残酷囚禁终于没有改变什么！但耿和在外面的苦难常摧抑着我的情感。前几天她在别人家打扫了六个小时的卫生挣了一百二十元钱，她在电话那头高兴地对我讲着，我在电话这头泣不能声。就在写这段文字时，我几次哀伤得搁下了笔。

我有一个表哥跟我一家很亲，但从亲缘上寻踪，用八根加长的竿子也够不着。他在南水北调工程上干的活在2007年就合格验收，一千二百多万元的工程款迄今扣住一分不给，所有民工的工资都是他贷款垫付，几近破产。2010年6月份，当局做例行的谈话时很干脆表示：「只要你愿意与政府合作，你表哥的钱一句话的事。」当天夜里又做了同样的保证。7月份，我向神做了一次作为基督徒极不应有的祷告，我向神说：是否继续被关押下去我全听神的，但请恕我愚妄顽梗，让我继续接受关押的神意当在物质层面向我显示，当是清晰而不含糊地；另祈求神在中国文明明天命运的前景，在物质层面上给我们一个证据。这是很浑的，但我还是硬着颈项，带着情绪在心中默念予我的神。

奇迹实在出现了。但在那天临起床前几秒钟里，神给了我一次清晰的警告：如果违背神意，我将立即夺去你最怕失去的。画面里，我与当局的代表相对而

坐，而阻隔在我们中间的正是我怕失去的！这次祷告的作用，意义是里程碑式的，不单是怕被夺去「最怕失去的」，这使我彻底地认识到，这件事的如何决定在神那里是怎样的重要，而他却是全为了我们。从此后，我就不再在这方面让当局存有一丝的幻想，双方剩下的则只有持续而稳定的对峙。

我以为梦中神的警告画面已完全回答了我的祷告，但真正的奇迹过了几天后就出现了，是真正的在物质层面上。先是在那张用于提审我的桌面上面裹的白色泡沫板上出现「96」这个数字，非常清晰，我很长时间不解其意，但我着实是琢磨过一阵子，以为这是我这次将会被囚禁的时间：96周？96个月？但终于不能释然。大约半个月后，这「96」的前面出现「全党」二字。成了「全党96」，我还是一头雾水，结果「全党」与「96」之间的上方有清晰显现一「岁」字！成了「全党岁九十六」文意完全读明白了，但几近不敢相信。

我坚信邪恶的极权专制统治必会灭亡，历史已无数次地示教过人们，但绝不敢相信中共会在我的有生之年败亡。这也与其时我对中共肌体内腐烂程度的了解还远远不完全有关。因为在世人眼里，中共的硬力量规模实在是足够地大，加之他对中国社会精致得密如蛛网的组织控制，和他干脆的冷血凶残和冷酷，国内和平力量对他的改变当是几代人才能完成的浩大工程，所以没有把「全党岁九十六」这句话放在心上。

然而，到7月底又一个奇迹出现，那桌子下面赫然出现一汉字「关」，仿宋体十分标准。我那地下囚禁处约十二平方米左右（我记不确切），秘密警察不知从哪里弄来七块破地毯拼凑着铺在地上，那破地毯颇厚，若掰开表面的毛可以发现，其色原为乳白色，但其外表早成土灰色。那土灰色的地毯上赫然出现一个深褐色「关」字，我当时觉得惊异，连忙问了当班哨兵，答曰：是个「关」字。其后我有意在一周时间里又问了四个不同哨兵，均瞟一眼即答曰：「关」字（我被关押在据说是一个山区里面，由中共北京武警总队第三师第十七支队的第五第六大队轮流看管，其中士兵二十五人，排长、中队长或指导员及大队副职各一人，他们谓之为「五包一」，即每天由五个班次，每班五个人负责看守我，其中两人守在我身边，一人负责在监控室监控，一人做应急值班，一人站自卫哨。而秘密警察系统又在武警之上设一监控室，以监控武警与我的往来交涉，有三人轮值；另有四人负责对我审讯。九人负责对我执行酷刑及恐吓任务，武警称他们为贵宾）。我意识到我以前向神祈愿的，要在物质领域确实地看见神的启示，神应许了我的祈求。

一次，一名绰号「大耳朵图图」的湖北兵当哨，他年纪很小，颇为单纯，他的祖母是基督徒。

我指那个字问他：「地上这是什么？」

他说：「这是个『关』字。」

「为什么会是个『关』字呢？」我又问。

他脱口而答：「『关』字的两点下面是个『天』字，这是天意。」

我又问他：「那这天意晓示谁呢？」

他又说：「谁在这里关着呢？不是给你的还是给谁呢？」

我没有一丝疑虑，这是神对我的明确晓示。但对于那每天都会出现的「96」，我没有予以特别重视。

5. 童声「4968」的启示与无法细说的奇妙梦境

大略是8月份的一天早晨起床前一两秒钟里，一个极美好的童子声音在我耳旁喊了一句「4968」，声音极清楚。人有时是很愚笨的，至少我是如此。我意识到这组数字应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当天总不解其意，当班哨兵——湖北的小周、河南的小李，也一同加入这琢磨的数组，终于不得要领。当天下午，我偶然想起49不正是中共建政年？1949年后加上68年恰是2017年，而1921年（中共立党年）加上96年也恰是2017年。可以肯定，这不是偶然的际会。但对于中共将在2017年崩亡的坚信，也是有了2012年3月12日早晨起床前的奇遇后。我在几秒钟之内收受了大量清晰的信息——2017年，中共死期确实矣！对于我在这次梦里的奇妙境遇细节我不能细说，但对中共恶政只有68年这信息是信实而明确的，而最末的一个画面我愿意与大家分享。

那天早晨临起床前的几秒钟，这位智慧之主通过两个具体的人的形像的三个画面，信实而确切地将一系列的，可以说是使人惊心动魄的信息在瞬间注入我的记忆中，一个核心的信息即是中共将在建政68年时的2017年败亡！三个画面中最末一个画面，是毛泽东大步从我禁闭室门外的楼道里走过来，轻轻推开我禁闭室瞭望孔的小挡板，将一本颇厚的书朝我扔过来，扔完转身离去。我在梦中立即明白这一画面的寓意。说来令人不能置信，那竟是我进入沙雅监狱这座挂牌地狱近三个月里，第一次「看见」我禁闭室外的楼道——在梦中。即便是在监狱里面，2012年3月底前，除了在禁闭室里面，我即使是去监狱楼道另一边的谈话室刮头

（监狱谓剃光头为「刮头」），都会被套上黑头套，由两名狱警架着前往。3月份后，由于我的抗议，每两周一次的走出禁闭室到楼道内另一头刮头时不再戴上头套，我看到的楼道情形竟与我3月12日在梦中看到的毫末不差，连楼道的光线，墙上贴着的标语纸张都毫无二致。

3月12日，是我母亲去世出殡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我都悲伤不已。没有刻意要这样，但每到这一天竟不能避免。我的神在2012年3月12日的那一天，在瞬间给了我许多奇妙的信息，提醒了我曾就中共政权年限问题及其灭亡的一些信息，给过我无数的启明，这种明示在我远未出生，甚至我的母亲还未出生时就已经开始。

关于这些奇妙的明示，我原拟用这样的文字给基督徒弟兄姐妹以见证，最终还是决定将这些文字公诸于世界，以增添苦难中人民的信心，以告慰那些倾力关注中国命运的朋友们，也为全能上帝做一次广泛而美好的见证！

就赤裸裸的酷刑而言，自2010年4月底5月初「同意做」民选总统后还真的再没有发生过，虽然俟候二十一个月的囚禁比任何一次酷刑的苦楚还要多得多。

所谓：「在其位，谋其政。」既然没完没了的电击酷刑非要把我送上「民选总统」宝座，我亦终于「愿意做起民选总统来」，我就把我「故民选总统」后的一些见证，亦即全能神的启示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我首先与大家分享一个美妙的见证是，我现在与我的神常日交通成了正常生活的一部分，神予我的关爱，可以说是不舍昼夜，须臾间不停歇。这是我的荣耀和幸运，我这几年来的一些经历，凡神应许的，我拟尽悉与大家分享。2010年7月份至12月份，我在这段时间里集中思考未来中国的问题，我多做深思默想，从不就这些问题向神祷告，但神却在不同阶段给过我启示。

二、两个启示画面

2010年7月份左右，由于地下室超常地潮湿、闷热且刻意的封闭，士兵在里面呕吐频率越发高起来。他们好在是五班车轮式替换，每十小时轮值两小时，而我却全天候被闷在里面。我多次请他们白天能给一盆凉水，以资应急性给身上擦一擦降降温，但终于没有答应，说师里把报告打上去后，北京总部没有回应。我从未像这十年里这般在乎过酷冷或酷热，他们是那样地绵绵不绝，而让我刻骨铭心地不堪其苦。对酷冷炎热的一切可能的干预条件都被控制在当局手里，所以那段时间我处在一种完全无助的煎熬中，这是于泓源、孙荻奉周永康之命刻意挑选这样的地方，这也是我唯一不能低估他们的一个方面，因为他们每次谈话都会说些类似的话：

「老高，别拿自己不当人，这他妈是人待的地儿吗？你的环境改变主动权可都在你自个儿手上，政府绝不会把给你留后路的门给堵死啦。」

真的，这种在生理上没完没了的苦楚，很难使一个人一路神闲气定的。而在这种过程中，刻意营造这一切的黑恶势力对你作为生理人的感受是心知肚明的，不断地找你来谈，说为的是尽快帮你摆脱这痛苦。

于泓源有一次就说过：「成了利益共同体，要什么官、要多少钱，一句话就成，共产党现在不差钱；退一步，做利益攸关者，不对抗，不合作，在利益上包你满意；非要做利益对立者，那就是死路。不管他是谁，有几把刷子。」

说完他又说：「真他妈不可思议，在这种过程中，弱者的一方反而完全掌握着主动权，党和政府反倒疲于奔命。」

所以，那段时间里，我考虑着如何在技术上做些让步来摆脱这种苦楚，神在两个临起床前的瞬间给过我明确的启示和警告——其中一次是中共「七一」立党jj日前，我在煎熬中心生抱怨，觉得中共把神的名踩在足下，无法无天暴虐了六十多年，连阳光、空气都成了他的权力支配物，使人民早对天道昭彰没有了信心。

1. 画面一：穿病号服的毛泽东

7月2日早晨，神让我在梦中看了一个画面，画面中，毛泽东身穿颇光显的条状花款式病号服，坐在一个极矮的破凳子上，呈垂死状，脑袋耷拉着，下巴托在胸部上，双目紧闭，对周围的任何动静都无动于衷。他左侧放一个破篮框，底层放着脏污不堪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而报纸上面放着几个鸡蛋般大小的几近干瘪的苹果，而每个苹果上面都有几个洞，每个洞里都有一条肥硕的蛀虫将半截身子挺立在洞外探头探脑。那每条蛀虫的肥硕程度与苹果的干瘪个小形成夸张性反差，毛的右侧是他住的一排远视还颇气派的窑洞，但稍走近看，但有一点常识，那窑洞已完全不能再住人啦，表面倒不特别旧，但他岂止是摇摇欲坠，他的崩塌近在眼前！画面里，我和耿和两人正忙碌着盘搭一个临时灶台，画面至此即醒。

2. 画面二：甲鱼与熊掌或能得兼

另一启示是，神让我在几秒内看了两个画面：一个画面是在我的面前拥有着硕大的甲鱼，和单只即有几百斤重的巨大熊掌，俯拾即可得；另一个画面就像镜头切换似地出现，是当我和一群大盖帽掉转头准备来取鱼和熊掌时，四境突然成了绝地，寸步不得行。

我睁眼将这个梦讲给内蒙古籍士兵刘巍，他脱口即说：「这个梦是在提醒你，常人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你却有这样的幸运，但你要找错了人，就会山穷水尽。」

三、国企政策取向及对前政权官员处置问题之启示

大略上是从那个7月份开始，我每天利用四个小时左右时间，在思考未来中国的国民性改变路径问题。尽管一些武警士兵耻笑我自身尚被踩在脚下动弹不得，却苦思冥想些不着边际的傻事，但我对于民主宪政中国的国民性改变的思考从未辍歇过，个人处境并不能阻滞我对这些问题的冷峻思考。相对于中国的国民性改变问题，实现民主宪政问题反而成了个技术问题。民主宪政的建立是技术过程，而使之臻于成熟及尽可能地好，则是个漫长的过程；而其中国民性的改良则是一个结构性的顶要紧事，但他却是个更系统而漫长的事。然而，能在人的内心里培养善良、诚实、爱人及正义感情的宗教信仰，在人群中的普及则是至关重要的，但他却与机械的、技术性的及运动式的追求无涉，这是另一个话题。

我确实在那段时间思考了中国许多结构性的问题，可谓无所不包：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法律的（包括法律的实体方面和程序方面问题）。未来国企的出路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问题，包括养老、失业、医疗保障，鳏寡孤残者的救助制度问题，土地制度问题，所有权问题，税赋问题，教育问题，宗教问题，对前政权官员及其帮凶的处理问题等等，但只有两个问题——即对国企政策取向问题及对前政权官员的处置问题上，神给过我明确的启示。在这些问题上，我从不祷告求神给启示。关于这两个方面的启示，我愿与朋友分享。关于未来国资管理及国企改革问题，神给的启示结论却很简单：国有民营或融资租赁式完成转制。

1. 拉着风箱做饭的老太太

神的启示是在梦里用了不足五秒钟来实现的。画面是一个高耸入云的、超乎想象的、庞大复杂的、多式、多层次、多角度的多点面，及错综繁杂联系着的机械运动传动系统，我站在一旁茫然不知所措，但看见那庞大的傲岸物旁边有一间低矮的民房，我走过去低头进了屋，是一间普通的民房，里面有个老太太正拉着风箱做饭，见我进去即说了一句：「在我这里可以解决你的任何复杂问题，也可以融资式租赁给我。」说完即醒。

关于对前政权官员的处理问题，我开始思考的当天晚上临起床前的几秒钟里，神以三个快速切换的画面启示了我。三个画面启示时间绝不超过三秒钟。

2. 羊圈里的胡锦涛

第一个画面是我们家过去的羊圈里圈了一些人，其他的人都背对着我看不清面孔，唯有胡锦涛正面朝着外面，穿的不再是西装革履，像特写镜头般，将羊圈中的胡锦涛清晰地展示了一下，我立晓其意。有趣的是，这个羊圈在1975年以后就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因为那时不准私人养羊是这个恶政权的大政，是他的英明国策，所以我记得这个羊圈在1975年奶奶去世后就被撤除，但这个羊圈在记忆中却依然清晰伫立。

3. 小腹鼓胀的温家宝

第二个画面是在一间普通民房里，温家宝坐在一个破旧的泛着灰白色的黑皮沙发上，手里攥着一个遥控器对着对面的大电视无聊地按着，他所坐着的沙发过去应该是气派而价贵的，虽然有几处破洞，但轮廓及基础极大气。温先生穿得像个普通退休工人，他的小腹胀鼓，给我一个信号是肝腹水，我亦立晓其意。

4. 蹲粪坑的于泓源

第三个特写画面是：我家老宅院子外面，陕北唤作「碱畔」的地方有一个大粪坑，实际上只是供倾倒垃圾的一个大土坑。于泓源（就是那个数次具体下达酷刑指令的北京国保头子）蹲在垃圾坑的紧靠坑边的地方，他蹲得非常敏感：双脚尖着地，双脚后跟托着臀部，双手托扶在双膝上，身子直立，重心完全后倾，看上去很危险，若旁边有人轻轻吹一口气，或轻轻戳他一指，他必仰面栽入垃圾坑。当时我也觉得立晓其意，但完全领会神的完整启示，却是在两年后的一次与警察的谈话中。

四、沙雅监狱康教育科长对神启的意见

2014年7月中旬，我再次就未来对前政权涉嫌反人类罪、反人权罪官员的处理问题进行思索，一天下午，沙雅监狱教育科长找我谈话，一见面，康科长就问：

「老高，最近想什么呢？」

答：「老规律，在想如何继续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呢！（双方笑）」

「要出去啦，不琢磨点啥？马上就要自由啦，心里面想什么有啥不能说出来的？」康又问我。

「你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你很清楚，对我而言，监狱就是共产党本身，共产党在，我就不会有片刻的自由。这三年在监狱中囚禁，是我这些年里最不坏的去处。与过去的秘密囚禁相比，这里是个不错的地狱。人习于苟安几成本能，我还真想让你们把我囚禁到2017年共产党败亡时止。我心里面想什么你感兴趣，可说出来你又如鲠在喉，犹芒在背，还是不说为妥。」我回答他。

康曰：「说出来，我愿意听。」

我就告诉他，我在思考2017年后如何处理原政权的那些涉嫌反人类罪的官员，并原原本本地给他讲了神在这方面给我的那三个启示画面。对于第三个启示画面，他提出了不同的理解，使我对他刮目相看。

对于这个梦中第三个画面的启示，我认为：第一个画面神晓谕我们，一部分中共高官的命运已底定，他们在位时针对这苦难民族所犯下累累罪恶的同时，也为他们自己拓通了牢狱之门。例如胡锦涛先生，其毕生致力于凶残阻挡中国人民步向自由、民主的光明之途，在他手里还有力量时，不肯给人民以丝毫的善举，他与温二人，给中华民族的所有成员，在道德、人性方面造成的硬伤害，虽予百年期无以弥合。第二个画面表明了，未来有证据证明一部分前官员是罪难道却情可原，可免于牢狱之灾。第三个画面，我早期理解为：一部分中共官员，由于其恶行昭著罄竹难书，将这部分人归于垃圾坑一途是神的直接启示，但这却不是神启示的真实思想。

康听完后却说出了他的意见：「老高，神给你的启示却不完全如你所理解，神还给了你另一层启示：那就是你可以伸出手拉他一把。」

康的这番话很给了我些震撼。我立刻意识到我的内心还不够豁亮，意识深处还存有怨愤，脑中仍瘀滞着不光明的东西。同时，经他这么一说，我心中豁然一亮，我深深地感到神丰富的慈悲和智慧，这个画面的启示非常有深意：其一，你可以一指将他戮入垃圾坑；其二，你可以向他伸出你的手，拉他脱离危险；其三，他可以自己站立起来，向前跨一步而远离危险，因着他的前面是广阔的天地。

这第三点是康讲话后我立即明白神的启示。神的这种伟大襟怀实在令人感动不已。因对个体生命的暴虐，就是对天道赤裸裸的蔑视及践踏，我几年来亲身感受了于泓源的凶残及冷酷，而神却仍未底定他的最后命运，将他的命运结局交到他自己的手上，这是怎样的一种广大襟怀和慈悲！

这个启示在未来的不到两年时间里，对中共仍在上掌权的官员是攸关重要的，但前提是他不至于昏昧而拒绝相信。但有一点是绝对须清楚地，即是这种昏昧无知只会带来个人人生、命运没人苦途的结果，却终于不能阻滞2017年行将到来的中华民族命运的空前巨变！但这件事也给我带来非常有益的启示，那就是：个人内心不当存有怨愤，胸中怨愤翳蔽，终于滞塞了人的智慧孔窍，极易亏欠了神的慈爱和美意！

五、十年来诸多梦境和神启

在这几年里与神的神奇交通中，我自己也得到了许多认识经验，因为我也受到了多次属灵领域或黑暗势力的干扰，但我几乎能即刻甄别清楚是神启示还是魔的干扰，因为魔的干扰有几个绝对的规律，即掩隐不掉的肮脏、猥琐、犹豫不决及混沌不清晰。

1. 两只死鹿

例如，2010年7月前，具体时日记不确切了，我拒绝了中共当局的凶逼利诱，明确拒绝了只做「利益攸关者」的安排，当天夜里，在梦中就有黑暗势力干扰。画面中，两只鹿活奔狂跳向我跑来，快到我跟前时，其中一只鹿扑地而死，另一只鹿掉进一个深坑里。我好奇地走过去一看，一只硕大的老虎在那深坑里。其寓意十分明显：鹿（路）死啦，鹿都（路堵）死啦。但有一个共同的特显画面露出了马脚：两只鹿倒地后都来了个夸张的特显镜头，那是两只母鹿，都是把母鹿的生殖器极醒目地特显出来，这是魔无力掩饰的齷齪。犹如现实社会中，中共当局倾其全部伎俩掩饰他的齷齪和无耻，而他的卑鄙与无耻却早已深入全人类的心里。

从2006年开始到2014年止，我有许多奇妙的经历，有些经历曾多次出现，虽然我并不能都完全理解其意，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每年有三个日子必做同样的梦，都是在临起床的几秒钟里，这是神给的启示是能够确信的，只是不能准确理解其意！神给我的所有启示引导分两类，一类是让你立即明白其意，一类则是反复显示给你，让你慢慢消化理解。这三个特定的日子，即每年的公历元月一日临起床前几秒钟里、每年的中国春节大年初一的临起床的前几秒里和每年的农历正月初六临起床前的几秒钟里。元旦和大年初一梦到的都是中共最高统治集团成

员或是于泓源等秘密警察成员，都住在我母亲生我的那孔窑洞里，看到他们吃住都在那里，均呈心安理得状。而正月初六除了梦到上述情形外，其余的画面都是我在这一年里被抓捕、被关押的情形，每一年必在某一时间里对号入座，绝无例外。

2. 我与毛泽东之上下山与进出帐篷的两个画面

以2010年为例：元月一日临起床前几秒里给了我两个画面：第一个画面中，在我家祖塋的靠山上，毛泽东率领了一群人从山上走下来，而我却沿着他们下来的路走了上去。画面立即切换，第二个画面里，在我家祖塋靠山山脚下的国道（已废弃）上，赫然出现一座类似蒙古包的大帐篷，我站在帐篷门前刚准备伸手掀门帘进去，帐篷门帘被从里面给撩起，毛泽东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右手掀帐篷门帘，左手捏着一张A4纸，一出帐篷就往前迈了两步站定，双手将那张纸折迭起来装在兜里，然后背剪着双手立正站直，看了我一眼后抬头看着西天，毛看上去很精神。那情形和我看在眼里的信息均给了我一个明确的信号：毛刚在那帐篷里办极了某种手续，我撩起门帘走进帐篷，没有看清帐篷里的任何情形就被哨兵叫醒起床。但对这两个画面所给的启示，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我也没有读懂。

2011年元月份的一天早晨，四川资阳士兵金野人（音）站哨时，见我醒来，就说他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满脸都是血，刚一醒来又右眼狂跳不止，不知何故？

我说：「你小子今天要注意一点，这是一个凶兆。」

当天下午他进来站哨时，右脸颧骨部位肿胀突起得像个馒头，半个脸呈酱紫色，面部痛苦得有些扭曲，因问其故（囚禁室监听、监视都十分严苛，一经被察觉，士兵必面临惊心动魄的殴打，所以在囚禁室内说话必须是咬着牙齿、嘴唇不动从齿缝中挤出一点声音来交流）。他说早晨刚出去就去跑操，回来时在冰面上滑冰，由于扑势过猛，被冰上嵌冻着的一块小石头绊倒，摔倒后唾出了很多血，回来照镜子一看，与梦中情形无二致。我怀疑他颧骨骨折，建议他到医院去看一看。他说领导说现在形势过于严峻，任何人不能外出就医。我突然想起2010年元旦早晨的那个梦，没想到我刚咬着牙说完了那个梦，这个连小学都没有好好毕业的野小子（「野人」是我给他起的绰号，巧合的是他真叫「金野人」）咬着牙告诉我：

「这个梦很简单，梦中给你启示的，不是让你在山顶上和帐篷里看到什么，而是这两个过程所代表的意义：一下一上，一出一进，全部意义就清楚了；毛泽东看着西天，表明了这个过程是天意，而毛泽东看上去很精神，预示着他们会在外人看来还如日中天的时候交代。」

他的话令我震惊不已，我问他何以这般言说，他说这个梦就这个意思，连小孩都懂得。但我却确实一年都没有弄懂，虽则并不终日地沉思冥想，却也认真地咀嚼过几次，终不得其旨。

此后，凡有我不能读懂的梦中启示，就必讲给他，但2010年大年初一的梦终于连他也没有读懂，迄今连我也没读懂。但正月初六早晨的梦中启示之意就被他给读懂了，而且完全正确，而我却在问他之前终于没有弄懂。在这里，我也把这两个梦中的遭遇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3. 关于胡锦涛和于泓源在我母亲窑洞里的梦境

2010年大年初一起床前的几秒钟里，神在我梦中给我展示了这一样一个我迄今未完全读懂的画面，画面中：在我母亲生我的那孔窑洞的炕上，胡锦涛夫妇色闲气定地倚靠着炕上摆着的铺盖卷，均呈半躺状。胡锦涛西服革履，气色极佳，连头发都烁烁光耀，夫人在一旁也雍容华贵，我却在一旁灰头土脸，头部出奇地大，头发呈土灰色，形若枯槁，双手被绑在后面。不一会儿，胡锦涛起身离开窑洞，走到院落中间却又回过头来冲着我说了一句：「我到乌镇去了。」梦骤醒。

至于正月初六早晨的梦中画面则是：在我母亲生我的窑洞炕上，于泓源和我都仰面朝天地躺在炕上，都把被子盖得只露出头顶；然后，另一个画面出现，是我戴着脚镜被两个人架着走开的背影。

金野人的解释是：「你今年将继续被他们关着，而且他们今年既不与你见面，更不会与你谈什么，但在今年年底之前你会离开这里，但不是释放，会戴上镣铐被关到别的地方去。」

后来的发展证明了那野小子说的是一点不差，那脚镜的颜色都与梦中一模一样。

4. 大蜘蛛缘丝而降的梦

2011年10月份的一天早晨临起床前的几秒钟里，一个清晰的梦中画面展示给我：画面就是在关押我的二十多个月的囚禁室里。囚禁室门被打开，我被押着走出门，朝着室内回头看了一眼（现实中则不可能，每次但有动静，都会有很厚的头套套在头上），一个非常悦耳的童子声响起「空啦，空啦」两声，房内顶部有一只大蜘蛛缘丝而降，而室内站着两个哨兵是周老英雄（湖南兵，不知真名，我赐其绰号）和一个我不知名的士官。

这个梦中预示后来被完全印证，2011年12月16日临晨我被架离那间被囚禁了二十一个月的地下室时，当班哨兵正是周老英雄和那个士官。而那个蜘蛛画面给我的启示是：将在冬至之前离开。此前，关于这个梦，我在周老英雄面前讲过两次。

5. 资阳士兵的五个梦

还有一个神奇的过程是神通过一个四川资阳的士兵（基于对其保护之念，隐去其真实姓名）。这小子对我特别好，在他给我打的饭里，常埋着肉、煎鸡蛋等类的违禁物。他原本在外面执勤，他说他总有一种奇妙的心理感动，感觉到在这地下室里关着一个好人，一个应该去帮助的人，后来他就请求进来站哨（里面都不愿进来，空气太污浊）。结果，后来在他身上发生了些奇迹。士兵们有一种独到的功夫，就是站着睡觉。他先后就站在我的面前做了五个特别的梦，确切地说应该是三个梦，因为其中两个实际上是他看到的画面。五个画面中，其中两个已经完全地实现，只是他本人并不知道，因为我离开时他早已复员回了老家。我梦中的画面是我走出了地下囚禁室，而他梦中的画面是：我被两个黑衣人架出去后进了一家很大的医院，然后又去了一处很大的建筑，被数以百计的黑衣人包围着，走出那建筑后又被押到长途车站。后来我所有的经历，犹如他梦的翻版，全如他讲述的梦中情景。

6. 办公桌上面悬着三个太阳

2011年春节期间，由于房内基本没有暖气，房子里的冰冷迄今使人心有余悸。据士兵偷偷地讲，说那烧锅炉的老头每天十二点才从家里赶来烧锅炉，下午二点半前准时离开，目的只是为了避免将暖气管冻裂。我此生从未像那段时间一

样在乎过冬天。那种寒冷的穿透力及坚韧的绵绵不绝，真让人刻骨铭心，终身无力忘却。我整日被子裹在身上，形式上的尊严已全无条件顾及。在地上来回走动也披着被子，被士官邓某进来制止，说必须等请示完上级才能决定是否允许披着被子，被我断然拒绝。

春节期间，我在心里对神有过怨愤，且愚顽地向神提了三个要求，如果这三个要求未来几年不能在中国实现，我立即宣布永不为基督徒，我愿为此承受神的任何罚难。其中第一个要求即是民主宪政制度。这只是一种心理的自我活动，并不是祈求，但神给了我信实的应诺——第二天早晨起床前最后几秒钟里，神给我显示了一个画面，画面里，我坐在一个显得很狭窄的办公室里，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很高的竹制笔筒，桌子上面悬着三个太阳，均呈初阳之状，初日之阳使办公室变得烁红烁红。这当是神再次给中国人的一个准确的信息，当成为中国人在未来几年的大信心基础。

关于神奇的、可以确定为来自神的奇妙引导启示，这几年里经历过的可以书写十数万字。囿于篇幅、时间因素，我只挑选了些与国家民族命运的浩荡巨变有关的启示公诸于基督徒的世界，公诸于基督徒外的世界，以飨所有那些长期以来关注我的命运、关注中国国家民族文明明天命运的兄弟姐妹和朋友们。

7. 水龙头飘出「高」字

我还有许多美好见证，但实在没有太充裕的时间去把他写出来。例如，2012年10月6日，我在禁闭室里用手捏住水龙头饮助洗碗，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只能借水的冲力饮助清洗。我一边清洗一边给神念着说：「今天是我妻子耿和的生曰，请神纪念她承受的苦难，给她当有的保护，请你倾听你仆人的祷告。」这时，一股水飘到墙上，一个周周正正的「高」字赫然墙上。这种类似的过程多不可胜数。

8. 禁闭室房顶灯罩上的「高」字

又如，2014年7月22日早一睁眼，禁闭室房顶灯罩上出现一个标准的「高」字。原来是昨晚一只苍蝇钻进了灯罩里，在里面奔突了一夜，而灯罩内壁上散落着许多被蜘蛛吃剩的弃物，做了这写字的材料。我一想，今天是个什么日子，我的神在提醒我什么呢？一算方知，7月22日恰好是我在中共挂牌地狱监禁的最

后十七天，神用「17」这个只有我自己心知其特别意义的数字来鼓励我。就在当天，中共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新疆公安局和我在乌鲁木齐原居住地公安部门，由四个层级的秘密警察头目组成的工作组找我谈话，只是谈了不到半分钟即谈崩了。

9. 神要说的话就在这页书纸上

还有一次永不敢忘却的见证是在2012年12月20日。中共监狱对重大违纪的服刑人员人身最严厉的处罚叫「禁闭」，即是封闭式的单独关押。法律规定关禁闭是对服刑人员人身最严厉的处罚，最长时间不得超过十五天，可他们一口气禁闭了我三年。按他们自己的法律规定，服刑人员是可以借阅书籍的，但我不被允许的，为此我一直与他们抗争，结果给了一本《入监教育读本》，一本十七万字的读本两天即可以读完，结果一口气让我读了五个月。你拒绝接受，他们每天专门给你开门送进来。从监控画面上看，你身边一直有书放着，只是你自己不愿意看。这种愚昧的游戏一直玩到2013年3月17日才略有转机，才开始提供诸如《心灵鸡汤》、《捞取人生第一桶金秘诀》之类的盗版书。

2012年，那本《入监教育读本》读了五个月后，多经交涉，监狱终于又给了一本「五千言」的老聃《道德经》，一口气又坚持了五个月不给换书。五个月后我拒绝再接受《道德经》，此后近两个月不给提供书。多经抗争，监狱于12月19日提供了一本1990年代的《心灵鸡汤》读本，我拒绝接受，他们每天给送进禁闭室。那几天我的心情颇沮丧，12月20日晚饭前，我无意中右手触到了那本书，结果我的左眼睑和上嘴唇极夸张地扑扑跳动不止，我的心被感动着——我的神有话要对我说。我立即拿起那本书，随手翻至第三百一十九页。一翻至这页，我的左眼睑和上嘴唇的跳频及跳幅骤然加增，我立刻意识到神要说的话就在这页书纸上。我一看，那是汪国真先生的一首新体诗，题目〈一切为了明天〉，诗曰：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明天，
明天并不遥远。
为了一个神圣的期待，
甚至可以献出一切。
我们已不需要再发什么誓言，
没有比为了明天更激动人心的事了，

他就像一个太阳，
能使万物都戴上绚丽的光环。
虽然我们相对无语，
却已了然，
我们将要去走的路，
会像金子一般的诚实，
不含有任何闪着光泽的欺骗！

所有这几年神给我的引导启示，这是最能感动我灵魂的一次，与那次三个太阳的启示一样，都是在我心存怨愤、情绪动荡而非出于祷告时，神给我的安慰性启示。他爱我们，不舍须臾间，他不厌其烦地扶持你，在你心灵的每个动荡阶段！他以爱安抚你而以义感动你。

正不舍昼夜、不择手段地在利益竞技场里疲于奔命的中国同胞们，到了该警醒的时候了。满满实实的喜乐和饱足唯在认识神的路上，而绝不在诡诈、伎俩及自鸣得意的利竞技场奔突途中。

六、 中国共产党「金陵王气黯然收」

亲爱的中国同胞，以上这些文字，是我最近几年来领受奇妙见证的一部分。我相信这是神对全体中国人的启示引导和祝福。我过去不认识真神，但我从不怀疑天道终会昭彰！我常坚信这样一个命题，即如果有神，则绝不会让中国就这样一路的腐烂下去，否则将会毁灭世人对天道的信心。这里有着他十几亿的儿女，中国今天每一天的维持，都是以践踏天道为条件的，我想这绝不是那位公义、慈爱、怜悯的神能够长期接受的。

我希望每个中国人能在这样的见证文字里做一些对自己负责任的思考，当我们只愿对眼前的现实利益、自己的具体利益攫取不计手段、不惜代价时，不知不觉中我们已失去了作为人最宝贵的东西：普遍的人性退化，在这样的生命群体里奔突，不仅谈不上安全感，也是没有明天的。中国今天这种全民族腐败、人性广泛糜烂坏死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我在过去十年里，是一路目睹着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走过来的，这种现状每维持一天，不仅摧毁性地损坏着这民族的声誉，也现实地蚕食着整个人类的名誉。

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共产党内的那些尚愿意对自己和自己亲人明天的命运还在留心的同胞们，什么国家、民族、人类共同的文明命运，你什么都不要去想，这有些难为你们，也有蓄意煽惑使人离弃现在政权的嫌疑。我不需要这样做，共产党统治集团在不舍昼夜地为这个恶政权拓通死途，这无须我殚精竭虑。我只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在未来的、只有两年时间里的所作所为，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这次前所未有的巨变给你自己造成的损害。考虑如何做对自己的子女有利，这是你真应当考虑的。不要被共产党手里那几件硬武器所迷惑，前苏联共产党手头硬武器的数量与质量数十倍于中共，结果如何？中国的历史也已多次示教过我们：统治者一次次迷信刀把子的结果都归于死亡这一途，谁能例外？人类迄今还没有例外的史证。

1. 看看我和周永康谁笑到最后

就以我为例，我岂可与共产党的硬暴力规模比，可十年来，终日惶惶的却总是他们。你问他们，我有没有过真怕？妥协有，且常想引导他们对妥协价值的认识。但事实证明，他们只有诡计没有妥协，这使我付出过惨烈代价，却也终于不再对牛抚琴。你问他们，所有十年来参与压迫我的人，他们可曾打倒了我？我对专制制度的威胁可曾比十年前减弱？这几年来每次绑架之后，邪恶集团具体与我办理交涉的打手们百分之百地会冲着我叫嚣：

「弄死你跟弄死一只蚂蚁一样地简单。」

结果如何？

2011年，「领导同志」周永康打发人来见我时，那家伙足够地肥硕，旁从一位替他拎包、拎衣服的仆从。

那肥头神情颇昂扬，一进门劈头一句：「老高，这环境还能顶多久？」

我答曰：「我能活九十四岁（**这确系我胡诌，没有出处**），我希望您有胆量告诉周永康，看看我和他谁笑到最后。或者您干脆告诉他，他会接受审判，如果他足够幸运的话，他会死在监狱里！」

我当时确未曾想到他的同伙会拾掇他。我对他及胡锦涛集团最终接受审判的命运从没有过怀疑。我在这里说这些，仍是想启示人们，人的生死岂是一个偶然的过程？他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邪恶集团梦寐以求欲置我以死境，这绝不是信口开河，尤其2009年的那次绑架后，这种强烈的图谋溢于言表（**后面有专门的述**

说)，我素斥之以一笑，结果怎么样呢？

当然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我这几年也是在一路地从恐惧中走过来的，我付出了些代价，个人也经历了一些可观的苦楚，尤以我家人所承受的苦楚使我最不堪，但我终于还是挺了过来。今天，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出我的经验 ----- 个不怕，让他们束手无策。但这种终于的不怕并不是偶然的精神现象，而是终于信靠神的结果。

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

（《以赛亚书》46:9-10）

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意定，必照样成立。（《以赛亚书》14:24）

你们当守公平，行正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显现……禁止己手而不

作恶，如此行、如此操守的人便为有福。（《以赛亚书》56:24）

「金陵王气黯然收。」中国终于汇入人类普世文明海洋的历史洪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2. 预先从丧家犬大阵中出来

公元2017年，共产党政权将在其迷信者的绝望中和目瞪口呆中崩亡，这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愚昧政权、流氓集团终于堕入死境，终于沦为一个使人类心有伤痛的、心有余悸的笑柄。届时，那些终于愚昧到底、坚持作恶到底者，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丧家犬大阵。

曾有人主张：「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我是反对的，我主张：「费厄泼赖（fairplay）。」但我理解对落水狗痛打的情感宣泄，而这宣泄应仅止于对他们过去的恶行及愚昧的谴责，而不能针对他们的人身。我们不能再制造、增加新的悲剧啦！他们也都有自己的亲人，我们不能再人为地为这民族制造新的痛点，把那些实在颞预顽固、作恶到底，而在2016年9月30日后，手上沾上了新血的前政权恶徒交到理性的法律追诉程中，以证明这民族尚可高贵，切不可基于内心的仇恨，而干出像他们过去那样愚昧而凶残的暴行，而为这民族增加新创痛和新的毁誉纪录。

我主张宽恕，但须有边界，对于2016年9月30日前公开宣布脱离中共邪恶政

权系统的任何人，除了手上沾上了无辜人民的血的官员，如江泽民、李鹏、胡锦涛、周永康、罗干等人外，其余人员均可以以真相及真诚忏悔换取宽恕，免于刑责。而对于2016年9月30日后，手上新沾上无辜人民血的人，不论是决策人还是具体执行人，我主张必须交付审判，这是人类呵护正义价值而采用的最普遍的方法。德国柏林围墙倒塌后，对守墙士兵亨里奇的审判为我们提供了范例（**关于这些，我在后面要专门论到**）。而对于2016年9月30日后仍把笔杆子当成凶器，继续助纣为虐的恶文人们，诸如《解放军报》、《环球时报》、《辽宁日报》诸主编者流，也必须使他们接受审判，二战后，盟国对为前纳粹政权涂脂施粉者的审判足以供殷鉴。

七、且听「痴人说梦者」之语

这篇文章中有不少「梦」字，却饱蘸了我清醒冷峻的善良愿望，各人在你们的看阅中去联系着你们未来行为的现实选择。如果你认为这只是一个痴者的梦语，你们在这一问题的选择上再一次去做了「有识之士」，我仍想对你说：2017年并不遥远，请你忍耐一时，等到2017年后再跳出来与我交涉也不迟。如果你觉得这些文字终于使你不能忍耐，尤指那些以指挥刀为骨骼的鹰犬文人们，你就跳出将来，在指挥刀下撒欢的日子究竟不多了。螳臂挡疾车，蜉蝣遏湍江，未必就没有了一点豪气。

黑格尔说：在中国，道德宗教的存在是无本之木，因为道德和宗教都以意志的自由为他们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而专制政治却相反，那种最专横的、邪恶的、堕落的、专制的横行无忌，却是以普遍的缺乏道德和宗教为条件和基础。

放眼当下中国社会，到处都有反事实、反道德、反理性者的奔突和嚣嚷。一些人，甚至是大学生、学者，争先恐后，相率展显愚昧，竞相以丑恶骄人。2006年发生了十位博士联署倡议抵制「圣诞节」的丑行，发展到去年「圣诞节」时，一些大学生禁止大学生欢庆该节，而在南方，一群大学生则走上街头号召人们抵制「圣诞节」。一时群丑乱舞，刺激得一群一向有着爱国老脾气文人摇头晃脑连连说好！

何以推销孔子是为世界文明做贡献？而作为西方文明精髓的基督思想一人中国就会祸国害民？一些人生怕中国有了点文明生机，自己愚昧、封闭已是不幸，何以号召别人也永远与他们一道留在黑暗里？

有些国人实在无耻或无知得可观，常以「有识之士」的面相告诫国人，说民主宪政将祸乱中国。那是对这民族最为干脆的污蔑，这些东西自己断乎不会相信他的这些胡言乱语。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民族就是全人类一个例外？当今世界，凡像模象样的国家，她的人民无不沐浴在自由和民主宪政的光明照耀中。人民尽可横向观览一下今日世界，稍有点模样的国家中，还有谁像我们一样，仍在尺把深的极权专制泥塘里扑腾并撒欢着。世间最庞大的一个民族，曾经有过四大发明的伟大民族，时至今日都不能拥有现代化的政治制度，这是怎样的一种不名誉？！这是这民族不光彩的一个奇迹。

至于喋喋不休地恐吓人民：「专制一亡，会天下大乱。」那更是胡诌。全球共产主义制度均可以基本平稳转变的规律不谈，就中国历史而言，二千五百年来，让儒家宝爱的人物，也就那「易容、漆身、吞炭」的豫让一位。我不太相信那些早已没有了人性基本特征的恶党徒，届时会汇聚成狂奔首阳山大阵，相率大嚼薇蕨而殉死！究竟哀「黍离」者还是会有一些的，完全无法无天的权势，完全无法无天之权势带来的漫无边际的财货，对于他们而言，那究竟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八、中国根深柢固的宗教传统必须改变

2017年将会发生的变革，是这个世间最庞大民族此前从未经验过的。在中国，与民主宪政制度建立同样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宗教观念的改变，倘若不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宗教传统，中国的文明建设终于会成为沙上建筑。

囿限于篇幅，我这里只提出纲领性思想，愿未来能有有见地的讨论观点。

黑格尔认为：「从根本上来说，现代世界对自由、自我规定性和人类生活之无限价值的坚持，乃是基督徒在数个世纪里宣扬人性的无限价值和尊严，宣扬爱的无限重要性的结果。」

在宗教里，一个民族把握到了对他来说是终极性的真理，因此这意味着国家及其法律权威的自身，必须根植于通过信仰而认识到的东西，以确保国家法律的正义性。

一个国家的变化若要真正走向成功的话，则必须要有信仰上的改革，因为倘若没有这样相应的改革，那么在民众的品行和实践上就不可能有任何深层次的变化。

因此，如果信仰要为真正的社会和政治自由提供基础，那么国家就不能侵犯宗教意识的自由，或是干扰宗教事务，他必须保障宗教自由以现实其宗教功能。宗教的外在表现上当有利于社会秩序和安宁，但绝不能屈从于国家权力之下。

（上述这些理念和思想当系出自《黑格尔导论》，但实在记不确切，更谈不上引用得准确，实在对读者及作者不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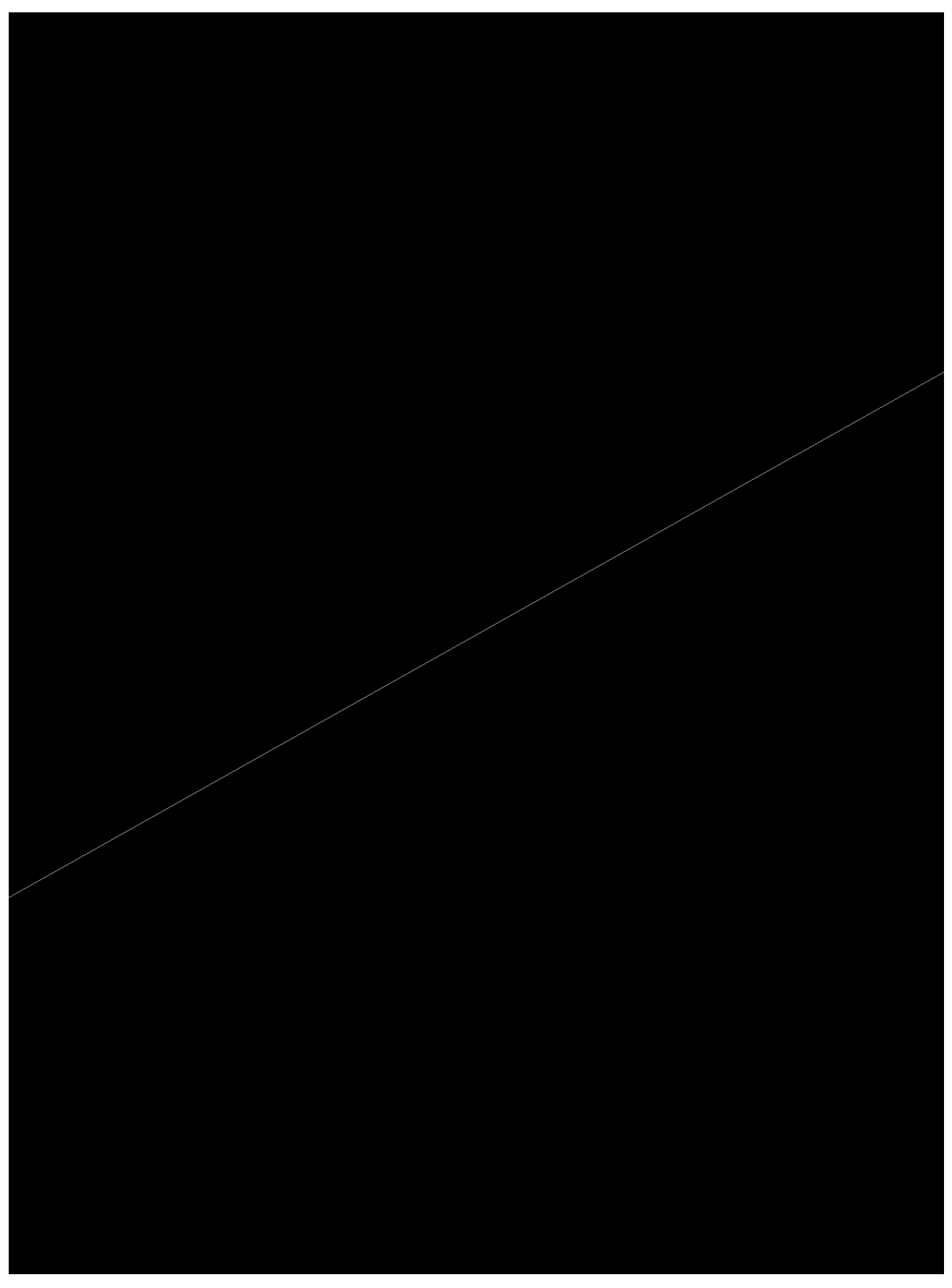
这些理念及思想，对未来中国社会之宗教建设和全面的文明建设具有实在的意义。

九、关于和平律师走进我母亲窑洞的梦境

2015年元月1日，值得在此一提的是，今日早晨临起床的最后三秒钟内，又有一个神赐予的画面临到我的梦里：

在我母亲生我的窑洞里，我和我的妻子在里面，和平律师走了进来，他身边有一个看不见的声音在给他交代着：「从今天起，你就住在这里给他们做饭、干家务！」

然后，梦境即止，起床。这是我十年来第一次在这个时间梦中回家，我只能粗线条读懂神的启示之意，录此与世人分享。



第參部

2017年後

對中國的展望

第一章

在当破当立中蹒跚起步

一、行走在兑现大梦的路上

对于2017年后中国展望只能是线性的，囿于个人知识、信息与条件等方面的局限，尤其我能够支配时间的穷蹙，对于未来中国的一些想法，在这里提出我个人的线性想法。个人的大愿是唯愿「一石」能击起万丈波涛，引发起各方面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技术性以及结构性安排、讨论及设想，以为即将到来的巨变及巨大建立提供支持。

亲爱的中国同胞，一切关心、支持中国实现制度现代化的亲爱的朋友，唯愿你们热情显身于这即将到来的、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变中来：以思想及行为。

这即将到来的巨变将改变五分之一人类的命运，这对未来中国及人类文明影响的意义，将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巨变之一。中国历史上唯有秦统一中国与满清政权覆亡对中国（且不论其好坏）产生过深刻而久远的影响。秦结束中国大地上的封建统治，建立了大一统体制（实际上汉、晋及以后诸王朝又有过不同幅面的封建建制，但中央集权架构则在此后两千多年里存在着并加强着）。一百多年以前清朝的覆亡对于中国的影响，之所以与秦统一中国事件并提，就在于他的反对者襟怀的民主宪政大梦，围绕这次清王朝覆亡，尤其在此后百年里，蓬勃在这民族心里的民主宪政大梦。尽管，这多难的民族在这期间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代价是血和泪，但这不屈的民族从未停止过实现这一大梦的努力。

我和我的许多朋友，很久以来行走在这兑现梦的路上。我们目睹了这路上洒着的、我们前行者的血和泪，而足下则是我们自己的血和我们的泪在流淌。今天，这路上的风景变得一目了然且有目共睹，那就是凶残的打压和坚韧的反抗，打压的凶残及反抗的坚韧共长，打压的广泛及反抗的普遍共长。郭飞雄、胡佳、郭泉、王炳章，仅仅几年的时间，中国的反抗，由几个著名的名字变成了今天勇敢公民普遍奋起抗暴的蓬勃局面，压迫生反抗，普遍的压迫生普遍的反抗，这既是人类历史运动的哲学经验，亦是我们目前正在目睹着的活的历史现实。王登朝、李化

平、唐荆陵、于世文、侯帅、董广平、李玉凤……，在技术上，这样的纪录已成为不可能！但这样的名字本身即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而历史自有其记录能力，他已无数次示教过我们，他不仅记录着这民族勇敢者的名字，他更将记录着这民族那些败类的嘴脸。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周永康、罗干、袁仁贵们……。记录这些人类中的败类名字，在技术上同样不能。仅眼前几十年的人类历史，更是给我们以鲜活的示教，独裁者，尤其是凶残独裁者的下场，齐奥塞斯库、米洛舍维奇、萨达姆、卡札菲、穆巴拉克们，这种人类败类的纪录名单里，将再添这些中共恶徒的新名。人类历史有一个一目了然的规律，那就是历史大势浩浩汤汤，顺势而为者则汇入这浩大壮丽中，相反，则唯被荡灭之一途。

中国的改变即将到来，其虽非既成事实，却是即将成为的事实。作为这一代中国人，我们是幸运的，而更幸运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孩子。身处这历史的变化中，还要有太多的责任需要我们肩起，我们当以实践对各自孩子前景一样的热情肩起我们的责任，这关涉到我们孩子，及孩子的孩子们的根本性福祉。我们这代人，尤其是未来具体参与中国现代化政治架构的构建者的人，与积极的热情并重的是冷峻的头脑，我们首先需要清楚，将要到来的公民社会并非一个弊绝风情的社会，更不是一个不再有具体痛苦的社会、一个不再有具体的非公正的社会。但任何非公正、任何具体痛苦都不能是制度的产物，任何的非公正、任何可导致具体痛苦的现象，都不能成为个体无法撼动的存在。未来所有的建立均须考虑到对非公正、对具体痛苦救济的敏感反应能力。权力当永远行走具体倾听，以及去非公正和对具体痛苦敏感反应的路上。权力必须回归他的本初——人们建立权力运作组织的本初功能，即成为为公民需求服务的工具，而不是这种需求的统治者。

二、民主宪政中国过渡政府将出现

民主宪政中国的过渡政府，将在2017年年底左右历史性的出现。我认为民主宪政中国过渡政府在技术上将会是协商的产物。暂不可测其生成的细节，却可以肯定其必然要生成的结果。与过渡政府必然会在2017年至2018年上半年间出现一样的事实是，过渡政府一经成立应该会立即践行以下当务之事：

（一）向全人类宣告民主宪政中国过渡政府的成立

中国将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一部分，从此，将与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和谐相融，成为人类文明秩序及其发展的建设性力量。承担各国公认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国家责任、义务，这种承担含对内的和对外的两个方面。宣布接管境内外一切属于中国的机构、财产、债权及非恶性债务。未来的国家将保持政教分离的原则。政府既不确立任一种宗教为国教，也不禁止任一种宗教。外国宗教团体或宗教个体在中国设立宗教学校或其宗教组织，从事传教和宗教教育活动的，不需要经过国家许可，活动者普遍的法律权益将得到保护，但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秩序。对于以宗教之名，行违法犯罪之实的团体，法律将惩罚具体的违法和犯罪行为和个人。

（二）废止公法领域一切恶法，宣布中共为非法组织

作为人类最大最邪恶的恐怖组织，中国共产党须终止一切活动，原政权的所有权力活动终止，撤销所有的劳动教养机构、场所、强制转化所、强制学习班，清查并撤销所有公开的、秘密的，关押「邪教人员」、上访公民的机构、团体和场所，释放所有的上述机构、团体及场所的被关押公民。

对于所有上述机构、团体、场所，无论其属性，无论其是否是营利性的，除了撤销外，对有关负责人员，或经营者，启动罪责追惩程序，但对于他们之中的所有人员，除2016年9月30日后继续作恶者外，凡能在2016年9月30日前公开说出真相、公开进行真诚的忏悔，并与具体的受害人达成谅解的，并脱离共产党系统的，对他们之前的罪错建议不再追惩。

（三）国家将设立大屠杀纪念馆

大屠杀纪念馆将中共几十年的暴行以文字、音频、视频、实物等方式展示，并将邀请各国政要参观，以使中共的暴行永为后人镜鉴，并永不重蹈覆辙。各地亦可将中共实施洗脑和酷刑的基地开放参观，设立相应的，揭露中共反人类罪暴行的博物馆。

参考德国对纳粹相关出版物、徽章等禁止的先例，中国将禁止与中共有关的一切标志、徽章，销毁支持中共意识形态的宣传洗脑书籍、报刊、杂志、绘画、旗帜、徽章、歌曲、影视作品等。

国家将组织专门人力全面研究中共暴行得以发生的社会、经济、政治、心理基础。

国家将全面清理「党文化」，包括中共为中国人灌输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话语系统、行动准则。

国家鼓励全社会反思每个人作为个体在中共统治期间的行为、言语和态度，以及对中共存在和延续所负有的道义责任。

国家将整理从辛亥革命到中共解体期间的真实历史，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四）释放政治犯、宗教犯及一切冤狱犯

释放一切因和平反抗暴政而获罪或涉罪的政治犯；对因思想、言论、出版、集合、结社、游行示威及宗教信仰、拆迁、上访、投敌、资敌罪而获罪或涉罪人员予以释放。对于有理认为是陷构成罪的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经营罪，以及以邪教身分而非实施侵犯他人人身权利而获罪或涉罪者予以释放。对上述人员构陷犯罪过程的所有前政权人员，不论是党政或是司法人员，除了他们在2016年9月30日后的再行作恶不再宽恕外，对于之前的罪错，凡能在2016年9月30日前公开讲述真相、公开脱离中共体系、公开进行真诚忏悔的，并与具体被害人达成谅解的，不再予追惩。

（五）废止一切对公民自由权利的限制

国家应制度性地倾力保障公民的思想、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及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建议未来国家制度性地禁止政府不得办系统内部流转及信息发布功能以外的报刊、杂志和视听媒体。

（六）废止一切对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及政治权利的限制

倾力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人类普遍意义上的合法财产权利，和人类普遍意义上的政治自由权利。

（七）探寻政府体系及其机构的建立。

（八）宣布中国将在2022年开放人民直选总统

为了举行全民直选意义上的首届总统选举此一目标，探寻建立一个与过渡政府并行的委员会，以为未来民选议会的影子机构，负责对各自治地方及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构的建立和其员额选录予咨议指导，委员会内设立若干专业小组，负责厘定有涉国家、政府、各自治地方立法、司法、行政机构、组织建立的技术原则及期限；负责对国家、国体、政体的确立及意义的阐释，厘定立法、司法、行政之权利、权限、行事原则及相互关系原则；与过渡政府一道协助组建最高法院及审判人员的遴选；负责有关国旗、国徽、国歌的产生事宜；负责制定符合普遍的人权，普遍的公正的刑事诉讼临时指导规则。负责厘定对前政权党政涉罪官员及其帮凶的追惩原则。

（九）成立「真相、真忏悔换宽恕委员会」

寻求建立一种由政府人员、NGO组织及个体自愿者，共同主持的「真相、真忏悔换宽恕委员会」的机制，探寻、实践并最终实现全民族大和解，使原来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都尽可能快地解脱出来。

（十）寻求现实对包括新疆「七五」事件获罪者在内的，因暴力反抗暴政而获罪者的特赦。

（十一）对若干罪犯予以大赦或减刑

对在监狱及其他场所的羁押，以及正在保外就医的、剩余刑期在三年以下的（含三年）已决犯，包括缓刑犯、假释犯、小区矫正者及独立适用附加刑者予大赦。而对于其他未获得及不符合前述大释条件的被拘押者均减除三年刑罚，但下列罪犯除外：

职务类犯罪（特指前政权公职人员，不含非国有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故意针对未成年的犯罪者、故意针对老年人的犯罪者、故意针对女性性的犯罪者以及针对女性人身的暴力性犯罪者。除因反抗暴政、追讨劳动所得、反抗不法侵害及防卫过当者外的故意杀人、抢劫、涉毒、醉驾致人死亡及重伤的、诈骗的。

（十二）收回中共在境内外的一切财产，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反人类罪调查

新政府应收回中共在境内外的一切财产，对其所有层级的省委常委、政法委主要负责人、纪委主要负责人、宣传部门主要负责人，以及公安、检查、法院司法及监狱系统的主要负责人，与安全系统的主要负责人、秘密警察中原中共国保系统的全体成员，以及中共党政系统中的，被受害人有特别具体告申的人员进行反人类罪调查。对于中共原军队（含武警部队）中参与「六四」屠杀者，以及其他暴力镇压的决策者、指挥者及执行者进行反人类罪追诉（调查）。对酷刑的决策者、指挥者及具体实施者予反人类罪追诉。对历年来所有强制拆迁暴行中的决策者、指挥者及实施者，不论其属于党政还是企业人员，全面予反人类罪调查或者其他的犯罪追诉。

对于前述人员，中共党的各级党委常委中，除极个别恶首外，不论是谁，凡在2016年9月30日前公开宣布脱党、公开自己的罪犯真相，并真诚向全国公民忏悔祈恕者，建议应当对其免除刑罚。

对于前述人员中的中共各层级政委、纪委、宣传部门，以及公、检、法、司之安全部门主要负责人，与秘密警察系统的大小负责人，凡在2016年9月30日前公开宣布脱党、公开自己的罪错真相，并真诚向其所在地域或系统的受害公民进行忏悔祈恕者，应当免除刑法。

对于前述人员中的公安部门、检查部门、法院及司法、监狱部门、秘密警察成员，以及强制拆迁人员的具体施害人员，凡能在2016年9月30日后停止作恶，并能在2016年9月30日前公开脱党、公开施害真相，并真诚忏悔的，应当免除刑罚。

（十三）所有中共党政系统的前述人员，以及参与迫害活动的其他团体或组织的人员（如保安公司、强迁企业等），必须退还其全部非法所得，以作为其真诚忏悔的条件，财产退还的接受者只能是过渡政府或具体的受害人。

（十四）建立全面而具体的，确立对鳏、寡、孤、独、残障人员以及低收入家庭的政府救助制度，政府的所有福利安排都必须以他们为中心，而后向上引申。

（十五）国营企业的特点为垄断、效率低下与缺乏竞争力

多年以来为中共聚敛了大量财富，而持续强化其暴政恶能量。因为国家掌握的权力和暴力，国家企业和个人企业之间不可能存在公平竞争。新的国家将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也是行使政治权利的保障。

（十六）对原所有的国有企业资产进行全面爬梳核录

新政府将全面清算登录所有国有企业资产，探寻建立一种由政府人员、议员、NGO组织及专家自愿者组成的招决标委员会会员库，所有国有企业、原国有经营单位，均须得在公开招标的基础上实行租赁经营及以融资租赁形式卖断。所有租赁经营及融资租赁方式卖出，均得须经历两个独立程序；第一个程序中，由从招标委员会会员库中摇选的、须得三人以上单数组成的专门小组，负责研究具体企业的租赁经营或融资租赁方式出卖的招标规则、投标规则，标多范围、进行竞标资格及其审查规则；第二个程序中，由从具体决标日的决标现场，在招决标委员会会员库中摇选的，须得三人以上单数组成的决标小组负责现场决标。

对于投标者的资格审查，由第一个程序中的专门小组进行，审查内容包括投标者的法律主体资格，法定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包括对投标者既往的信誉、履约、纳税、社会责任方面的瑕疵纪录进行审查基础上，着重对其未来履约能力方面予瑕疵审查，以保护双方的长远利益。

对投标者的主体资格审查中，投标者的国籍不作为否决原因，而对于原政府中人员的投（竞）标资格是否进行限制，希望展开有见地讨论，然后由民意或者民议机构拟定。

（十七）健全医疗、医药制度

新政府将全面开启医疗、医药制度改革，包括对经营者、经营主体资格、经营资质、医疗保障制度等各个方面，祈愿在未来几年里，能在各个方面展开广泛的讨论，以确保改革过程和改革结果公平、公正，以确立公平、公正及有效的医疗保障制度、药物生产、经营及独立透明的审监制度，以及透明有效的政府资金投入机制。

政府不再作为医药行业的经营者，经营者的国籍不受限制。

（十八）改革并健全土地私有及矿产经营制度

新政府将探寻建立以私有制为最终目标的土地制度，确保改革过程及改革结果的公平、公正，全面探寻建立矿产资源的管理及矿探、矿采制度改革，全面借鉴成功国家的相关经验，从经济、环保、安全、效率、效益及公平、公正诸方面借鉴，以最终建立科学的、现代化的土地及矿管经营制度。

对于不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矿探、矿采经营资格，不当有国籍限制。

（十九）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

约翰·洛克认为：「没有财产的地方亦无公正，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管理之下重大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政府不得以公共利益之名，在非战争环境下强制征用公民或法人所有的财产，确立征用得以高于市场价予以补偿的原则。

确立公民住宅权神圣不可侵犯原则，政府不得以公共利益之名强制拆除公民合法享有的房产及建筑，除法院批准的逮捕行为外，任何未经所有权人或使用人允许的进入行为，都是非法或犯罪行为，逮捕行为必须回避未成年人的视觉及孕妇和危重病患者的视觉；只要被逮捕人不予反抗，在住宅内的逮捕行为须得和平实现。

（二十）改革并健全教育制度，并全面保护孩子的成长

确立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原则，解放我们的师者，解救我们的孩子。

中国的黑恶势力，为了他们一撮人的贪欲，在教育问题上，不惜扼死这民族生命的命脉，六十六年的恶行，不仅让这世界最庞大的民族丧失了基本的思想能力，并成功地使大部分人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灵性，谎言不仅不再是一种心灵的负担，反而成了一种被普遍认可的能力。丧失了思想能力，昧却了人的灵性，人成了行走的皮囊。如果说这群体中尚有人的思想气息的话，那就是升官发财，官民尽如是。

今天，中国社会道德已经沦丧至崩溃状态。对他人的同情心和爱，不仅是人基本的感情特征，更是人类的高贵和能够高尚的独有特征，爱党爱国口号的空泛灌输，将一代又一代人的同情心、爱，乃至人当有的思想能力荡涤殆尽。使中国人尽数退化成了生物人。丢弃了灵性实则是隔绝了我们与神的联系，由是则失去了心灵本当有的约束意识。

2009年11月28日，在对我的秘密转押途中，我得到一个让我永无力量忘掉的消息，即广东东莞一个市，一年竟有一千名以上的儿童被盗、抢及诱拐失踪。孩子的大量失踪，对于父母及亲人造成的伤害是怎样的惊心动魄！这对于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何等不名誉的纪录！除了共产专制国家外，世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人群能有这种承受能力。失踪后的孩子，大多数被故意打残致伤，然后作为一些坏种发财的工具，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不义，然而他仍在继续着。

在这里晾晒这种人性黑暗的证据，定会被中国的黑恶势力及嫡派爱国贼投入「抹暗中国」营垒中。与在孩子面前的无底线残忍一样，今日中国拥有蔚为壮观的爱国贼巨阵现状，正是中共几十年黑暗教育制度的伟绩，无神论配合着涤荡人性的模化教育，不仅成功地钢制并固化了人们的思想，亦钢制及固化了人们的人性。

今天中国人的道德及思想的痿下现状，已成为全人类的笑柄。我们的教育如何改，我们不需要苦付冥思，有成熟的模范，照着美国的教育模式，只要非先天的智商差异，好的方法、好的技术无所谓东西方之别。把孩子当人而非工具或接受器，爱他们，尊重他们，授他们以渔而非鱼，他们是未来的一切，未来的国家社会、家庭会怎样皆尽在他们。好的教育制度使一个国家、社会及家庭未来的好不再是悬念，而坏的教育制度则使国家、社会及家庭未来的坏不再是悬念。

2017年后，学校不再能有政府干预的身影及声音，学校完全自主。彻底摧毁应试教育，政府针对学校只做两件事：一是服务，二是做学生、教师及学校法律权利保护的坚盾。与对旧教育制度颠覆性重建同等重要的是，建立特别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将积极干预家长针对孩子的暴力伤害与精神伤害过程。建立一种与信誉纪录联系的邻里及目击者举报制度，将这种举报尽可能地确立为义务规范。打孩子、侮辱孩子不再是私事，而是触犯法律规范的事。小区、邻里、NGO、目击人，强制性规范，多方合围恣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家庭暴力，给孩子们以最敏感的保护。

应当着力培养孩子的公民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他们能够吸取人类宝贵的思想财富，能从普世的道德、对人类的爱和同情出发，判断思想或行为的对错，并承担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检讨自己对社会承担的道德、经济和政治责任，从正心开始，然后修身齐家，心怀社会和天下。

2017年后，国家将刚性禁止成年人以孩子为乞讨工具。一方面，我们将建立

严谨的贫、弱济助制度。另一方面，政府是否考虑为每对父子、母子建立DNA档案纪录，街头乞讨的孩子一经发现，即由政府暂时接管监护权，以使孩子的学习不致中辍；与孩子一起乞讨的成年人将被留滞，以资查明与孩子的身分关系，并予以相应的法律处理。若是偶然的财产被盗失而应急性乞讨者，将迅速而具体地获得政府的帮助。政府将在制度的设计与衔接方面，缜密设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制度，以期在短期内，根绝使孩子「失踪」的这种人世界最丑恶的现象。未来当重点惩罚对未成年人的侵害。

与对孩子严密地保护相对应的，是树立孩子们的规范意识，对他人权利的尊重意识，将严法规范孩子中间的暴力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

（二十一）全新改革警务制度

警务制度将作为各地方自治制度的一部分，所有的警察署之间只有横向的程序及技术联系，不存在权力的制约联系，警察总署对全国各自治地方的警务不再有传统的行政领导权力，只有程序方面的义务（诸如全国通缉令的发布等），和技术方面（诸如刑事）的支持义务。

当然，总署有一样特别的权力，即是对外交流中代表中国最高警察当局。对于各警务单位的建制，涉及到复杂的技术问题，包括警务所职能的分配与设计，诸如治安警与刑事警的分置等，未来可能会取消派出所，代之以小区警务室。将大规模地削减警署行政员额，改革过去以行政机关及行政人员为主的不合理建置，将警务重心放置在具体的警务层而非相反。消灭户籍制度，实行公民身分证制度。将设计缜密而简单的、针对警察及其机构的限权制度，使警察真正成为以保卫公民人身及生活秩序的一种有效的服务力量，而不是使人恐惧的所在。

（二十二）重新设计、构建财税制度

财政收支程序将借鉴，甚至是结构性地移植美国的做法。财政收支全程在网上公开，包括总统每一分钱的支出，都必须予以网上公布，公布结果必须使人一目了然地明白，而不须揣测忖度猜谜语。政府预算必须由议会批准，而执行情况则向全体公民报告（网上公开）；预算外的特别支出则须得议会的特别批准，支出过程及结果仍须全面网上公示，不得以国家机密为由而免于公布。这种设计是对公职人员最好的安全保证。

国家将对税课体制予以全新改革，中央政府不再设立最高税务行政当局，而由各自治地方自行设立税课体制。改过去的流转及消费领域的价内税为价外税。对于过去执行的「九级超额累进」个人所得体制予以结构性改革，大幅提高个人所得税初级起征点，提高高收入者税纳比例，开征财产税及遗产税等。具体周详的改革内容，期望在未来的一两年里，在广泛而有见识之讨论中形成雏形。

（二十三）国家武装力量的改革商榷意见

中共军队是人类当下最不名誉的群体。他们由一群形式似男人者组成，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军队，其实他们比谁都清楚，他们是当今中国黑暗势力最后唯一的骨骼。他们的愚昧及不名誉在于，他们原本可以作为堂堂正正的国家武装力量，这须他们转个身，但他们却甘心卑下，做一群恶棍的打手，仰败类们鼻息，食权贵们的牙惠。好像做一群人类渣滓的跟丁颇是一件荣光事似的。

最近中共《解放军报》说「军委领导同志」徐才厚是国妖，这真让人饭喷，这只能让人觉得，在领导同志徐才厚未露出国妖相之前，这份无耻的报纸自己是国妖。看看这份报纸当年对「领导同志」徐才厚的肉麻臭捧纪录，以及他对今天仍是「领导同志」的其他国妖的臭捧。中共《解放军报》，与中共《辽宁日报》、中共《求是》杂志及中共《环球时报》及中共中央电视台一样，是当今人类最愚昧、最邪恶及最无耻的国妖群体，未来中国武装力量获得新生的第一步就是取缔这份祸害中国几十年的国妖报纸。有这样报纸的世界则定会是国妖的世界，而国妖横行的世界里，则定会有这种国妖报纸横行。

中共军队体制的臃肿、落后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共军队团级及团级以上单位都设有政治部，这是与军队天然职能毫无关系的体系，层级越高规模越大。诸如中共军队中央系统的政治部，即为中共军队四总部之一（**原为参、政、后三总部，后来增置了总装备部**），这个吃闲饭部规模大得惊人，他纯属于中共党的系统，你看他光伶人将军养了多少！中共军队政治部系统的干部，占中共所有军队干部的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干部的存在，与军队功能无涉，只是共产党控制军队的工具，而中共政治干部并不止于成建制的政治部系统。中共军队建制中，从连、营、团、师一直到各总部，都是设了两套领导体系，这就是中国军队的政治委员制度，仅此项制度，即使中共政治干部员额占去了整个军队干部总数的一半，加上成建体系的政治部体系的干部，中共军队中的干部，每五个人中即有三个人是政治干部，军费中的主要部分是干部的薪酬，亦即干部中百分之

七十五以上是吃政治饭的獒犬，这种奇特的笑柄独中共有之（**支部建在连上是中共军队的独创**）。

中共军队的另一个奇特存在，是省军区、地级市及地、州之军分区和县武部的设置。这在政治文明的国家是个天大的笑话，他们的存在与国家职能不发生任何关系。他们原本就是准备与苏联开战为目标的产物。苏联崩亡已二十四年矣，他们依然赫然存立且颇冠冕堂皇。全国三十一个省军区，属军级建制，其规模大得惊人，这就是三十一个军的闲人被养着；全国六百多个地级市、地区及州，就是六百多个军分区，军分区属师级建制，这就有六百多个师级建制的闲人被财政养着；而全国有三千多个县，即有三千多个县级武装部，武装部的编制是正团级，这就又有三千多个正团级队单位被财政养着。

然而，全国武装系统机构设置并不止于以上所述之加总数目，每个地级市有地级市武装部（**正师级**），省会城市有省级武装部（**正军级**），铁路系统各层级也都设有武装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团、师及兵团，都设置武装部。以边城喀什为例，一个一、二十万人的城市，有两个师级武装部（**地区武装部和农三师武装部**）、一个县级武装部（**市武装部**）；而各设区的市又有区武装部。这种正团级以上的成建制武装部就有四、五千个。

此外，中国尚有十万个以上的乡、镇政府中，又设有武装干部办公室，仅此一项又是几十万人。虽然这些「专干」属地方系统，但其仍系中共武装力量体系的一部分。这种人工培养的蝗虫数目究竟有多少，中国公民不得而知，在中国，凡是见不得人的丑闻都是国家机密。这批人数目当在两百万左右，他们存在的全部价值就在于经营自己的利益，如果说与国家还有关系的话，那就是以国家名义源源不断的拨款。纳税人白白地养活着他们，然他们并不愿安分守己，郭正钢不就是一个省军区军官吗？

在中国，多一个干部就实在地多了一个祸国殃民的东西，这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对于中共体系而言，他真正的死敌是中国人民，这种原本准备对付苏联的武装体制，在苏共崩亡二十四年后仍继续维持着，作为潜在的对付人民的力量是中共唯一的考虑，削去这个恶存在，将是未来武装力量改革首先需要面对的。

中国武装力量的另一个结构性改革目标即是裁撤四总部，以美军建制及装备供给机制为蓝本进行改革，将规模性地削减陆军常规保有量，强化海、空力量及特种部队建制，削减军事首脑机构人员，军队企业将全部转为民营。公开招标竞购是未来军队的装备供给机制。

上述改革目标将在十年内实现。

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之原中共武装部队，将改归由内务部执掌，改为内务部队（**武警称谓太不名誉，成了恐怖的代名词**），负责国家宪法秩序维护及其他当由内务部队完成的职责。武警部队员额将大规模削减。

据武警士兵讲，全国每天在同一时间，用于中共党政系统哨兵及纪委「办案」的士兵有十万员额左右，他们说按每天五班轮换制，每天用于站哨及「办案」的官兵足在五十万以上，而这都是用于非法的力量，是正常国家力所不需要的。这部分的改革将在三至五年内实现。

（二十四）关于未来中国司法体系及司法权之行使

中国属制定法及大陆法系国家。人类两大法系即大陆法系（**德、法为代表**）和海洋法系（**即美、英系**），在独立司法体系下很难结构性地分别孰优孰劣。我个人喜欢海洋法系，他永远不存在立法滞后问题，更不存在在实践中，因法无明文规定而对危害社会行为束手无策的问题。刑法保护社会关系，这在两大法系里没有质的区别，然而，社会关系领域日益不断扩大，大陆法系对新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则显得滞后与被动，而海洋法系则无此之虞。海洋法系，审判案件者就是创法者，无形中使审判者内心生起冷峻、严谨及不敢懈怠之情。海洋法系同样会有错案（**这是由人类的有限性决定的**），但永远不会有司法腐败，保证这点的就是他的陪审团制度。

中国的司法体系可以说迄今还没有建立起来过，中共在形式上是有司法体系的，但实际上，他是党权的另一名称。作为一个国家，过去几千年里，中国从没有建立过司法体系，哪怕是形式。然而，这个国家对制定法有着强大的依赖惯性。

我实在没有更多的时间在技术上去深思默想这个问题，这里特别寄托希望于贺卫方先生，以及今天人在海外的袁红冰先生、郭国汀先生等诸法律专家，思考着有无可能在技术上设计出纠问，或是审判中可否引进陪审团定罪制度？陪审团定罪，确定的法定刑，当庭裁决，可永久性根绝司法腐败及非法公正问题。而对中国未来司法体系的建立，我只有粗浅的想法，希望本书发表后能抛砖引玉出一些规模性的讨论，以使我们未来建立的制度相对地减少缺陷。

2006年年初，我曾获得台湾大学王兆鹏教授著《美国刑事诉讼法》，那里面

的知识及数据足够地滂沛，那书后来被恶党抢走，相关的一些知识也终于不清晰起来。对于未来的司法体系，我的粗略想法如下：

法院的设立问题：

各自治省域设立三级法院，即初等法院、中等法院、省高等法院。

国家设立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制度。

国家不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将违宪行为纳入普通的诉讼审查程序，任何与宪法冲突的法律或行为都归于无效。

由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法院单独行使逮捕决定权。

法官实行终身制，总统提名，议会表决通过后任命。法官代表国家审判案件，并在判决或裁定等司法文书上具个人姓名，对所理案件终身负责，法官得对错案承担责任，甚至被剥夺法官身分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院不再设有诸如院长、庭长一类官职，建立大法官或首席法官制度，大法官或首席法官不享有程序性事务以外的职权，各法院之间独立审案，互不辖制，大法官或首席法官不得干预其他法官的案件审理。

法院内设置治安法庭、轻罪庭、重罪庭、民事庭（或单立民事法院）。

未来中国可不单独设立检察系统，而是在司法部内部设置检控系统，负责向法院控诉治安及刑事案件。检察官不享有批准逮捕权，无权签发搜查令，扣押令。逮捕令、搜查令、扣押令均得由法院（实为法官）发给。司法部、各自治地方司法部、局负责法院生效判决之执行。未来的看守所将辖属司法部门，警察系统不再设立看守所。监狱将辖属司法部体系。

所有刑事案件均得有初等法院受理，经上诉由中等法院判决的，被告人可以原审两审中其宪法权利被违反为由，向自治省高等法院上诉。对于自治省高等法院的判决，被告人可以其宪法（国家宪法）权利被违反为由，向最高法院上诉。

对刑事案件被告人向自治省高等法院及国家最高法院的上诉理由，是程序性的还是实体性的，以及高等法院、最高法院的审理是程序性的还是实质的，当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择定。

刑事诉讼中必须确立的原则：

美国联邦宪法在全美各司法领域占据极重要的地位，其中的人权法案即专门为保障刑事被告人的程序权利而设，各州都不得违反。美国在1960年以后，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连串的具体判决和宪法正当程序的规定，将人权法案的哲学、法律具体适用于各州的刑事案件，把抽象的宪法条文换成刑事诉讼的具体规范，带来了美刑事追诉程序革命性改变。理性、睿智、前瞻能力方面几臻醇化之境。

囿于时间及学识方面的原因，我认为我们当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借鉴这些好的原则，将他们植入我们未来的刑事追诉程序中，以期尽可能地确立刑事诉讼原则，尽可能好地保护刑事被告人的人权。

关于搜查、扣押、逮捕的规定，应当借鉴美国联邦宪法增修条文第四条之「禁止不合理搜查扣押」，规定必须有宣誓的证词且构成正当的理由和请求，法院才能发给搜索、扣押、逮捕的文书，这些文书须对逮捕人、被搜查人或被扣押人有详细的描述。

搜查令的例外情形：

1. 被搜查人同意
2. 逮捕时的附带搜查
3. 一目了然的搜查

但目见武器或证据则可即行扣押。

未来侦查阶段当借鉴美国联邦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之警讯、警语告知原则。警察在讯问被拘捕的被告前必须告知程序，否则，被拘捕人的自述不得作为证据：

1. 你有权保持沉默
2. 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
3. 你有权聘请律师在场（这项权利可绝对保证避免刑讯逼供）
4. 你若无财力聘请律师，法院会指派律师给你（为了公共安全，可以不做上述告知，或警察化装入狱套取证据的可做上述告知。这是联邦最高法院后来对上述规定所做的限制型解释）。

在法院审判阶段，当借鉴美国联邦宪法增修之第五条之：

1. 不自证己罪原则
2. 不受双重处罚原则

以及宪法增修条文第六条之：

1. 获得律师帮助原则
2. 获得快速及公开审判的权利原则
3. 享有对质诘问的权利
4. 获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法则：只要是违法取得的证据，不论证据对案件性质及结果产生多大影响，审判中都不得采用。

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被告无须证明自己无罪，证明被告有罪的责任归检察官，而且必须证明被告有罪至无可置疑的程度。

确立疑罪从无的原则。

可确立认罪协商原则。控辩双方达成的认罪协议须经过法院认可后，才产生法律效力。

确立第一次出庭程序，这属于一次程序审查，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警察不得有任何不必要的延迟，应立即将被逮捕人带至法官面前，法官将告知嫌疑人被逮捕的理由，及其享有的权利——诸如沉默权、获得律师帮助权、获得保释的权利等。

确立审判前预审程序。即被告被逮捕后，审判前设置的一个实体审查程序。嫌疑人被逮捕后，不得有任何不必要的迟延，将其立即带至治安法官前接受预审。检察官必须成就其起诉该案的证据条件，使法官确信眼前的被告就是本案案涉犯罪的实施者，否则则驳回检察官的控指而释放被告人。若形式上的证据条件成就，则须由法官决定对被告人保释或收押。这个程序并不决定被告有罪与否，他只是决定被告应否接受正式的审判程序。

建立严谨的民事权利法律保护体系：

我最近通读了《法国民法典》。本书不啻是法兰西民族对世界民事领域的巨大贡献，是人类民事生活领域的共同财富。同样作为制定法系国家，我主张未来中国民事领域实体权利保护及调整，可结构性地借鉴这部法典。我过去对这部法

典是陌疏的，慵懒是主要原因，有时也觉得其制定于二百多年前，期间，人类民事生活领域，人类的观念、思想及遗传学新成果，对民事主体身分权利及身分能力和身分关系产生了与二百多年前不可同时而语的影响。最近通读该法后，则所疑尽释，他使我看到了拿破仑的另一面，更看到，经过近些年几次的规模性修改，已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的民法经典。尤其，最近三次的修改，即：2004年、2006年及2007年的三次修改，生成了2004年439号法律、2006年729号法律，及2007年308号法律。对婚姻、家庭、继承，以及对未成年人及成年人法律保护进行了大幅面的增修，使之成了一部现代化了的民事法典，是可予我们以成熟借鉴（**未来香港司法制度与大陆司法制度的衔接问题颇复杂**）。

（二十五）探寻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知识产权保护，六十多年来在中国是结构性地缺失。我们缺的不仅仅是一种严密而刚性的机制，更缺的是一种尊重及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在这方面，未来中国将借鉴当今世界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最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同时建议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部门。

所谓「乱国用重典」，未来政府将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不懈怠、不妥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不论假冒者、生产者、销售者，不论法人还是个人，一经确定其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将依法快捷地启动追惩程序。建议对第一次违背者处以巨额罚款，情节严重者，除巨额罚款，终止其经营资格，对责任人处以刑罚。对违禁纪录在两次（**含两次**）以上者，终身剥夺其经营资格。

中国若不能成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大国，我们将永远不能成为知识产权大国。一个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决定了他的现代文明程度，希望有关方面专家能在这方面审慎地构思，设计出中国周详而无疏漏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二十六）建立全面有效的环境保护及环境改良机制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专制共产党已经毁了中国的一切美好，物质的、精神的、道德的。环境方面造成的损害，更是有目共睹且触目惊心。中共，今天除了作恶以外，不论做什么都是三心二意，就连治理环境污染这样的、涉及国家及居民长远福祉的事，他从未打算认认真真的去做，因为这与官员的政绩无关。

2008年，「五一二」大地震期间，我被带离北京，在河北一些农村地区，看到了惊心动魄的环境污染恶果。在新河县的一些农村地区，在冀州市周围的农村地区，多条河流，全部成了流动着的死水，他彻底颠覆了记忆中河流外观给人的传统印象。「黑污、恶臭及死气」成了所有河流的共同形容。河流两岸原有的树木已全部枯槁。我当时的震惊、哀伤和无力感，难以名之。我与当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聊天后得悉：二十年前，那些河水尚清澈如明镜，不仅可供人畜饮用，鱼虾且优游其中，每至春夏，虫鸣鸟啭于河畔草丛或树林间。那潺潺流水，滋养着两岸无数生命及禾黍，千百年里如是。

我问当地人：「政府没有治理安排吗？」

他们苦笑说：「这里的河流名气太小了……」

中国的环境恶化问题已现实地威胁到整个民族的生存安全，我们再也没有条件拖延下去了。便是2017年以后，我们立即开始了全方位的认真治理，我们仍须花费五十到七十年恢复改善期。

未来中国的环保部门必须由专家执掌，有志于这方面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者，现在就当开始这方面的缜密思考，包括刚性规则及刚性规则的实现机制建立。未来环保部首长当是直接向总统负责，必须敏感地执守刚性规则，否则，我们的前景是极可虑的。任何基于利益而挑战国家治理目标的团体和个人，必须予以严厉的处罚，绝对不能给任何违规者以侥幸及幻想余地。动用尽可能有的监督纠举机制及举报查实后的重赏机制。中国必须有这样的开始，否则，这民族安得有后乎？

（二十七）中国饮食安全的应对问题

普遍的食品及饮用品安全，在制度文明国家早就不是一个问题。生产、流通、经营及销售，保证饮食品安全，这是人类最基本的常识，亦属人类群体中不可动摇的信任底线。为了利益，无视他人健康及生命，这与杀人犯罪没有质的区别。为了迅速实现利益，不惜改变动物的生长形状、生长规律，这是对天道的侵害，他可以无限强化人的贪欲与自私、固化人的冷酷无情。这是人性的最大损失，亦是文明的最大威胁。地沟油、毒奶粉、毒大米、假烟、假酒、假鸡蛋、假大豆、假饮料，一些同胞的无良让人目瞪口呆。中国，已完全地、普遍地陷入了互骗、互害的大泥淖中。

最近二十五年里，中国人堕落的普遍性、堕落的深度及干脆程度，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是人类文明史空前绝后的大面积不名誉纪录。有许多人觉得不好理解，其实，他的导因是一目了然，这是中共几十年无神论教育的必然结果。这种黑暗现状再次警醒世人，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群里会终于导致怎样可怕的后果。

信仰对人心灵的约束无时无刻不在，使人坚信，人品行的另一头连着神的褒奖或惩罚，没有信仰的人仅信诡计，伤天害理唯独剩下技术问题而不再是人和心灵的负担，这不仅是不幸的，更是可怕的。看看中国今天的现状，在愚昧、贪婪及冷酷方面，没有了官民之别。饮食品安全问题现状，与环境问题一样地恶劣、可怕，成了这民族实际面临的大问题，面对他、应对他及终于改变他，是未来民主政府面临的急迫问题之一；相反地，邪恶的专制体制不仅是解决这些大问题的障碍，甚至可以说他本身就是这问题的根源。在专制者眼里，只有权、钱是项要紧的。我们不能什么事都等2017年后才开始着手解决，期望一切对自己及亲人的明天怀抱有好想法的人，当开始在这领域的思考，以使我们届时能尽可能快地建立并导入这种问题的解决机制，恢复我们正常人的生活环境。

（二十八）政府对贫弱者的济助机制之建立

我颇花了些时间思虑这一问题，终于不得要领。这里面存在许多的现实差异平衡问题，区域的、城乡的等等，这不是传统的思维惯性，他实在是传统已经造成的问题。而技术层面亦有诸多问题需要设计应对，包括济助对象和标准、给予机制、监督机制、济助形式（**可否供给粮食、油及食品券，只予一小部分比例的现金形式**）等等，一己之力犹虎吃天。

我认为，凡享受政府低生活保障而具有劳动能力者，当履行一定的、政府指定的义务，例如每周从事三日左右的义工工作等。具体如何设计及实现，有待热心者及专业者之努力。失业保障，以及鳏、寡、孤、独、残障人的生活保障，或偶然困难者之保障等，当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建立并展开。

（二十九）建立中国的宪政体制

中国有着自己的沉重现实，一小撮人永远富可埒国，而一大群人则永远是穷弱不堪，这现象的长期不能改变，造成这两个群体都不再有改变自己处境的念

头，渐渐地变得都麻木开来而又麻木下去。

宪政体制的建立是个技术问题，但又不完全是。真正复杂的是普遍的宪政思想、宪政感情的生成。宪政体制在中国从未真正确立过。孙中山先生的军政及训政前置安排是个失败的设计，为此后的专制独裁预置了空间。今天的中国，真正深谙宪政精神的人恐不足百分之三左右，这是一个很大现实问题。

在中国主流社会层面，有几大主要群体不懂宪政为何物：首先是中共体制内成员，党政军、人大「代表」，他们几乎百分之百地是宪政盲。我个人就这一问题在不同时期问过不下于百人，他们几乎分布在中共体系内的各层级、各领域。这应不难理解，宪政，作为一个名词，都被他们公开地禁忌。其次是中国的学生群体，他们也可以说是百分之百地不知宪政为何物。我在最近六年里问过二十名以上的军警及士兵大学生，他们只知道有宪法而不知什么是宪政。中共司法干部队伍则更是一群干脆的宪政盲。

在中国，今天真正懂宪政的人士，首先是一些被边缘化的、有良知、有责任意识知识分子，或者至少是不为当局所宝爱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则干脆因为长期眷恋宪政，而被囚禁在监狱里——他们是贺卫方、资中筠、陈丹青……，随着打压严峻的加增，跟着加增的即是这一类人的名字。

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启蒙，虽然可喜地由原来的点发展到现今之广泛层面，但仍存在着许多令人不安的现状。例如，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他们尚待被启蒙，在他们的文字里，诸如「解放战争」、「三年自然灾害」、「解放以来」、「建国以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词，满目即是，这实在是稀里糊涂得可观。

中国的沉重，在于宪政思想乃至宪政常识的缺失。光有了宪政体制，并不意味着已经拥有了宪政。今天俄罗斯之宪政，就值得我们深思并作为警惕。普京先生实际上是今天俄国的独裁者，这对普京本人而言也是个很大的悲剧。

我思虑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未来中国公民和媒体警惕：一是权力不能控制媒体，刚刚结束专制集权的国家里，权力控制媒体冲动的惯性之强大是现实存在的，媒体自身须得保持高度警觉，不可以依附权力为荣而出卖自己的独立权利。二是未来必须建立刚性的禁绝机制，来阻断政府控制媒体的可能。三是媒体不可一味赞誉权力，媒体必须时刻保有着对公权力之监督、怀疑及批评的冲动；政府有好政绩，一则是他的本分，二则是公民有目共睹，媒体没有赘述的必要；四是公民自己须自重，不当无底线地热捧政府首脑，更不可迷信崇拜他们，要相信人

的有限性，如果你真诚地爱他，你就当冷峻地支持他，盯着他的不足，坦诚地去批评他。俄罗斯人崇拜斯大林，铸就了人类历史上仅次于中国灾祸的悲剧，他们忘了旧伤，又忘情地崇拜普京，现实的悲剧已经到来，这是中国2017年后的媒体及公民必须警醒的。

宪政是什么？他就是实现宪法权利的机制。《刑法》若没有《刑事诉讼法》，他就是一纸空文。实现宪法权利的规则，就是宪法得以落实的程序法。若没有宪政现实规则，宪法就是一张写着公民权利的纸，他的价值超不过纸本身。而人类主流宪法的核心功能（**理论功能**），即是限制公权力而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实现这种限制和保护功能的途径即是宪政途径。国际上，实现宪政的途径在技术上有两种类型：一是通过专门的宪法法院制裁违宪行为，而保护请求人的权利；二是赋予普通审判中的违宪审查功能，纠正违宪行为而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在中国这样几千年里宪政缺失的社会，刚性而普通的宪法审查机制至为重要。宪法中当确立公民对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不受追究的批评权利和普遍而简单的权利救济程序，以期实现健康而文明的宪政制度。

相对宪政制度之建立，宪法制定是个技术问题。北京曾经有过两位律师朋友在我面前表达过参加未来宪法制定的大愿。其实，这种历史机遇百分之六十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热心于这方面事业的朋友，你现在即可以开始你的制宪工作，将你制定的未来中国宪法公诸于世，而提挈大家的讨论。

中国2017年后，肯定要有一部尽可能完整地约束公权力、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的宪法。对制定法具有强烈而普遍的依赖感情是中国的现实。世界上最早现实民主宪政的英国，迄今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实际上，制定一部适合民主宪政制度的宪法在技术上并不难，他不需要太多的深思默想，民主宪政制度模式是普世的，而主导这普世模式制度的就是这民主宪政宪法。这民主宪政宪法在民主宪政国家亦都大同小异。我们的宪法可以在结构上借鉴，而在技术上加添我们的公民普遍地认为应当有的东西，而所有加添的动机及结果，必须是更有利于约束公权力而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绝不能又以「国情」、「中国特色」的名义去安抚公权力，再遗无穷祸患。

中国公民切不敢忘乎不受制约的公权力的邪恶及无边的祸患纪录，中国那些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未来几年里应多做这方面的启蒙工作，这是我们的现实。我倒不主张多花精力与什么花蝴蝶、周带鱼、胡锡进这些小丑办理交涉，这种交涉既不对称又很不划算，包括这些丑类自己在内，他们清楚自己是什么，除

了那些已失去脑力的大小毛左们外，他们招来的都是鄙夷的眼光。他们的未来唯丧家犬一途，我们现在即可完全抛弃他们，根本不必要将视力及精力给这些丑类。然而，我们不能抛弃那泱泱大观的小毛左，他们是花蝴蝶、周带鱼、胡锡进及司马南们的成绩，是些受害人，是专制洗脑教育体制下的独有物。我们当爱他们，像爱我们自己失足的儿女一样爱他们，他们和那些丑类是有本质区别的。丑类的内心蕴蓄着生机勃勃的邪恶和卑污，他们是恶制度的主动力量，而小毛左则是被丑类恣意驱策的被动力量。无疑，小毛左的存在，滋补着专制制度所必须的恶能量，但他们却不是恶本身。

我们把笔端指向丑类们，使他们变得有价值起来，被瞩目起来。他们中决心丑恶到底者，2017年后由特别法庭与他们办理交涉。一切的作恶者都将在未来的岁月里得到当有之结果，但文人中不论何人，2016年9月30日前，放弃作恶并公开忏悔者，当免除追惩，并不受歧视。唯愿像陈丹青、贺卫方等一干「汉奸」先生和女士，当肩起知识分子的道义职责，多做公民权利知识方面的启蒙，告诉未来的公民，政府的权力不是其天然自有的，而是我们公民给的。我们公民给政府权力不是为了让他管制我们，而是必须为我们提供服务的。政府所有人员，包括总统在内，都是公民的雇员。政府的权力是每个公民依宪法契约授予的，在每个公民的具体权利方面，尤其在人权方面，国家及政府的权力绝不具有天然的优势地位。培育未来公民在捍卫公民权利方面的敏感意识，尤其对来自公共权力方向的具体侵害必须保有应有的敏感，以使我们这个饱受专制戕害的国家，终于能建立起真正的公民社会，迎来我们的民主个人主义时代，彻底地解放这世间最庞大的民族。

对于提醒并培蓄中国公民的宪政意识而言，国家宪政体制的建立也是一个技术问题。未来中国的国体是民主宪政体制下的联省自治——其实质是犹如美国、瑞士、德国般的联邦制，实同而名不同耳，区别在于表述，以及联邦式自治及联省式自治。公民既是联邦（联省）国家的公民，又是其所在的自治省的公民。国家（联邦）、各自治地区，公民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及其相互关系，都由国家（联邦）宪法框定。自治省可制定不违反国家宪法原则的省宪法。

孟德斯鸠说：「德行是民主政体的基础。」西方文明的「独立与自力更生，个人的首创和地方的自我负责，成功地依靠自我活动，不干涉邻人事务和宽容异端，尊重风俗习惯和传统，以及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本质上，政府不过是个手段，是个工具，

个体与国家职能的本末倒置必然会腐蚀一个国家自由的根基。

「使人民的服从、统治者的独断行事都减到最少限度。一切人民必须服从的设施，无论关系如何重大，都当由人民加以决定和决议。」（记得不确切）

黑格尔认为：假如人民的私利和国家的公益恰好是相互一致的时候，这个国家便是组织得法，内部健全。作为民主宪政条件和基础的类似理念、意识及品行的培蓄和成长，是需要由未来的自由媒体不厌其烦地与公民反复交流的。

未来中国的政体是（直选意义上的）总统议会制。（联邦）中央及各自治地方各自由立法、司法、行政，这三个既独立又相互存在技术关联的体系，为国家及各自治地方权力体系的总架构。总统由全体具有选举权的公民直选产生。总统每届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但不得超过两届（我们当吸取俄罗斯今天的教训）。总统是国家元首，对外代表国家，是行政最高首长，是国家武装力量总司令。总统是一个执政机构，由内阁成员组成，为议会的执行机构，但独立于议会。总统无权解散议会，议会无权罢免总统；议会可以依照特定的法律程序弹劾总统。总统负责国家的内政、外交、国防事务，对内履行宪法秩序维护以及公民宪法权利保护等职责。总统的机构组成除了传统的国家普遍具有的內政、外交、国防、财政、卫生、劳工、商务、司法、安全、警务、廉政、海关部门外，还有诸如文化、教育、国土资源、农业、交通、民政、水利、质检、计量、检验检疫、兵役、知识产权、科技等职能。这需要在广集公民建议的基础上，最终确立未来内阁的架构，祈愿未来两年里能见到有见地的讨论意见。

（三十）台湾关系问题

未来民主宪政政府将放弃武力解决台湾的统一问题。

大陆与台湾都是中国不能分割的领土，中国的统一当和平实现。

我有一个未必成熟的想法，即是：

2017年后，中国大陆干脆起用中华民国国号，起用中华民国宪法，恢复中华民国法统，先在形式逻辑上达成统一。

中华民国大陆政府及中华民国台湾政府在终于统一前并立。联合国使用中华民国国号，使用中华民国国旗。国旗、国歌、国徽双方共享。驻联合国代表团由双方成员组成。所有由国家或政府为成员的国际组织，均由双方协商基础上派代表组成。驻国际机构的首席代表或主席，由双方人员轮流担任。所有驻外使、领

馆，均由双方协商派员组成，一方任主代表时，另一方任副代表，下届则由上届的副代表方任主代表，上届的主代表方则任下届的副代表。内部实行协商议事机制，双方可协商达成最终统一路线图，确定一个统一前的期限；在此期间，台湾和大陆都各自保有独立的行政权力、司法终审权、立法的独立权，但这种独立权是相对的，即在《中华民国宪法》原则下的独立，双方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保有或减少武装力量。双方税赋及财富不在非自愿的情形下越过海峡中间线。所有对外关系都由双方协商进行，或者在确立了统一年限后，由中华民国（大陆）政府和中华民国（台湾）政府各自行使对外的程序性外交事务。

在双方确定的统一期限到来前，中华民国（大陆）政府可做以下承诺，但并不要求中华民国（台湾）政府对等承诺：

1. 台湾公民在大陆取得与大陆公民平等的权力，这权利包括公民权利和民事权利。台湾公民在大陆的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内的政治权利不受限制。广泛的民事权利，诸如：居住、迁徙、置业、上学、自愿服兵役、婚姻、继承、收养等，与大陆公民平等享有。
2. 台湾军队在属于传统大陆主权辖下的领陆、领海、领空、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享有与大陆军队同等的权力，诸如训练、补给、演习、追逃等行动，但在技术上当提前知会大陆有关部门。大陆方面将继续恪守海峡中间线原则非经台湾同意，军队不出现在任何由台湾控制的区域。
3. 台湾的企业，在中国大陆的领陆、领海、领空、领海毗连区及海床、其洋底，属于中国大陆主权辖属，而无争议的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范围内，享有与大陆企业同等的权利，其上述范围内的经营行为当遵守中国大陆的相关法律义务。
4. 承认台湾生效判决的既判力效力，愿执行台湾的生效判决。
5. 台湾政府或公民提出的，而不影响大陆政府或公民实体权力或权利、利益的其他需要予以方便。
6. 台湾岛内中国人的「全民公决」结果，不能产生国际公法相关原则意义上的法律后果，台湾是全体中国人的台湾，其与加拿大魁北克省法语系族群谋求该省独立，数次公投结果皆为联邦最高法院否决的法理意义是一致的。
7. 对于新疆和西藏的未来，两省的僧、俗领袖当有因应历史及现实的考虑。联邦（省）式自治，是现今历史背景下，各省能够获得的最充分、最现实的自治形式，中国没有任何可能获得接受国家分裂事实的能力。

（三十一）未来中国的外交方向设想

将彻底放弃所谓的大国面子外交，全面探寻建立务实的、注重国家实体利益，并兼顾国际法律义务及道德义务的外交机制及习惯。

作为基督徒，我坚信神对人类历史的主导。2017年，中共的灭亡更将信实地证明这一点，亦将更坚定全球基督徒的信念，我们很难以使所有的人接受我们的观点。那么，我就谈谈我对历史规律的认识。按今天中国一些人的看法，美国今天是霸权性主导着全球事务。这种状态究竟是历史自己的运行结果，还是美国人精心运筹的结果呢？稍微了解美国历史者都不难做出客观的结论：今天这种现状不是美国精心筹谋的结果。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的对外政策等是极保守的，具有很强的内敛特性。无论是门罗主义时代，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都恪守着保守的，甚至是孤立的外交战略，都在做着独善其身的、不现实的酣梦。然而，历史在各阶段都不大体谅美国佬这一厢情愿：一战期间，德国潜艇超限袭击非参战国的商船；二战期间，日本偷袭珍珠港；二战后，苏联向全球推销共产主义的图谋及行动，都迫使美国放弃自顾的保守政策，而参与到全球事务中来。实际上，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又一次逼迫美国主导全球反恐事务的历史的自我表达。

上帝永远做正确的事。数百年前英格兰新教受迫害是美利坚合众国产生的前奏，讲英语的美国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迄今，没有任何一个事件的意义超过他。上帝对于美国是赋予特别期望的。美国人每当出现自顾其利、不愿在重大的世界关键性事务上承担义务的自觉时，都会有局部毁灭性的大事件及大灾难降临到他，他会规律性地在惨痛的牺牲面前进而担负起只有他才能担负的义务。全人类都当回顾近一百年里的世界历史，我们都当感谢上帝使这个星球上有了美国。否则，人们尽可能想象世界在有了苏共、中共这种邪恶政权后，没有了美国的可怕后果。

回顾这些历史节点，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强大，以及他对全球事务的主导力量及资格的获得，并不是人为谋算的结果。冷战开始前，美国从未谋求主导全球事务，而他终于获得了主导全球事务的资格和能力。卢旺达屠杀事件后，世界对美国不出手干预的批评极多，克林顿先生曾亲赴卢旺达致歉，这个过程具有标志性意义，即：对一种资格的世界广泛认同和美国人自我认同的自觉。

人类历史上倒是有一个这样的国家，谋求霸权的野心和行为从未止辍过，那就是俄罗斯帝国，只是上帝从不使他获得这种资格和力量。俄罗斯人在历来的国际事务中，只要有条件满足私利，他绝不会关注道义，全球共产主义的邪恶祸端就在于那里肇始。俄国绝大多数人清楚共产主义的邪恶，但他们为了私利，不惜毁灭人类普遍的美好前程，赶走德国占领者后，他们在东欧多个国家用刺刀和坦克扶植起后来臭名昭著于天下的共产主义政权，置那些国家的人民于黑暗政治祸害中近半个世纪。俄罗斯对他身边的弱者，历史事实地只有欺辱和掠夺的纪录，从不给予平等的帮助，至今日如是。他从未对大国沙文主义有过反思，相反，但凡力量允许，即会抢夺他人的东西。二战前及二战后，苏联人对待周边弱国的祸害后果绝不比纳粹德国更可以原谅。但综观历史不难发现，以满足私欲为目的的霸权行径得不偿失，无有例外者。今天的俄罗斯，货币贬值，民生艰困，经济乏力，外交孤立，可哀的是他们迄今不加以反思这乃是他又一次图谋霸权的结果。我们需要在这样鲜活的历史规律中保持冷峻的认知，只有表里如一地尊重人间道义，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人，你才能得到神的褒奖并扶助，亦即，你必须心底里正义，并充满了善，才能蒙神的喜悦和恩予。

中国人，当从心底认同并感谢美国人民中普遍具有的善良和道义感情，这就是美国之所以强大的道理。多年来，多少中国的良心人士被逼出自己的国家，美国人民接纳了他们，这种包容的胸襟、气魄以及具体的担当，世间独有。但我一直以来对美国政治家群体保留着我的爱情，我清楚他们与民意的关系，但我更清楚他们亦有着独立于选民之外的利益，尤其最近两届美国政府，不客气地说，他们利用了中国的人权灾难现状，认识到了中共专制集团的贼盗心理，从中共那里获得了巨大的好处。这是不名誉的、反道义的，我每有机会即会当面指责他们。这里主要的罪恶在于中共，但美国政府的旁助喝血是不能被原谅的，尤其是奥巴马政府，与中共政权的勾肩搭背到了忘情的境地，这是极恶劣的道义亏欠纪录。你们心里想着什么，我们中国人心知肚明！我在这里客气地提醒奥巴马先生：中共将在2017年灭亡，未来两年里，少留些历史笑柄吧！

所以我认为，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我们将支持美国长久地发挥主要作用，这符合我们的利益。中共灭亡后，对于人类的美好未来，对于上帝的美好信念方面，我们将与美国人民趋于一致，怎么样有利于我们去实践这些美好的信念，我们就理性地俯就他。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将唯美国人马首是瞻，我们将保持着应有的冷峻思考和怀疑，凡不符合普遍道义的事，我们将站在美国人的对立面，坚

持着我们的独立，绝不意气用事，不迁就感情。但绝不在战略上、结构上寻求与美国对抗。对抗，不符人类的利益，不符合两国的根本福祉。

我们当不忘记百年来美国价值对人类道义前景的支持和担负。当然，我们也清楚在这种担负过程的美国利益因素，但这种过程中当有尖锐的对立冲突，我们理解其中的美国利益因素，我们将在未来的历史中力助美国这种坚持和担负，力助美国及主流世界为减少专制政权所做的所有努力，包括以硬力量改变著名的邪恶政权的努力。「九一一」事件后，人们再次欣慰地看见和感到坚擎美国光荣和梦想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精神的强大之生命力。「理智的对话和精微的制衡」可为全人类政治及法制建设的圭臬。

美国亦应注意到中国与他的诸多现实的不同——历史的、自然的和文化的各个方面。

中国的历史文字里，「易子而食」、「折骨而炊」、「征地以战杀人盈野」、「征城以战杀人盈城」，野蛮而残酷的争夺权力战争常致「国无宁日，岁无宁日」，这确实是美国国土上没有的经历。美国人的生活变迁是循序渐进式地缓慢改变，而非革命性地骤变。与中国不同，在美国，他的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历史地形成了一种远远优于中国的平衡。而且，美国独立迄今，其国内政治、宗教等诸社会形态则更是与中国大相径庭。中国的耕地只抵美国的一半，而养活着四倍的人口。美国据说只有百分之一的农事人口，而占百分之八十的中国农民的经济生活仍是当下，便是较远的未来亦仍是严重依赖人力的劳动密集型过程。两国人的生活经历、经济上的现实差距、宗教与政治及文化传统等诸多的、历来的及现实的差异都是实在的。注意到这些实在的差异，是未来建设中美关系必要的思想基础。

对美关系、对日关系及对欧关系，是未来中国对外关系之主轴。对日关系，需要双方有更多的理性、冷静及设身处地。对于历史的纠葛，大没必要投人大热情，或则壮怀激烈，或则呼天唤地。这首先是表演，其次是不自信。历史就是历史，历史的客观结果岂是炽烈的情绪表达可以决定？要说歪曲历史，人类历史上还有谁能在这方面与中共比肩？仅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共对这段历史的歪曲到了何等令人不齿的地步！在中共的哲学里，历史就是谎言本身。「齐有太史简，晋有董狐笔」，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本有着相对独立的史官制度，他本身就是极有价值的历史，但中共彻底地颠覆了他，人们尽可瞻顾一下赫鲁晓夫在苏共全党代表大会上，就斯大林罪恶的秘密报告后毛泽东的疯狂行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

谓的杨尚昆等人的「秘密录音事件」。所有毛的言行是不允许记录的，为什么？人人都懂。

对日关系当务实且看主流。日本于战后，尤其1970年代后，日本政府一直向中国政府提供着巨额的无息贷款援助。对于侵华战争的赔偿问题，1972年，日本时任首相田中先生曾当面与中共毛泽东提及，毛泽东语出惊人，不但大手一挥不要求赔偿，反说要感谢日本人，说没有日军的那场战争就不能有共产党的今天。说中共集团卖国祸国，可曾有一丝的冤枉他们！中日关系中有两个障碍，即历史问题及钓鱼岛问题。但时常把历史问题搏捏成具体的现实问题，是中共的老手段，他唯一的意义即是一次次的群体怒吼，旨在频繁地转移人们对国内黑暗政治的瞩目。历史问题与民族情绪成了安全工具。

中日关系朝着积极有利的方向发展，符合双方的现实及长远的战略意义，这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识，这种共识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具有着强大的运行惯性，纵使日本右翼领袖政权，同样不得不俯就这种既有的运行惯性。在我们看来，他们是大多数中国人不喜欢的右翼势力，可他们同样是日本国内利益的坚定维护者，这是我们不当疑惑的，他们不大可能时时处处留心体贴我们的需要。坚持我们自己的利益原则，坦然面对分歧，建立双方利益的交汇点。所以，未来民主宪政中国将着力构建和平及相对稳定的中日互利关系，建立符合两国人民长远福祉的关系。

关于钓鱼岛问题，从一个法律专业人士角度看，大致上双方都不掌握该岛主权当然的归于己方的、具有无可争议的法律支撑点的证据。否则，即便有再超常的掩藏癖者也早已公诸于世。这既是这一问题的简单点，而又是他的复杂点。钓鱼岛主权究竟当归谁？当然该归我们，可日本人也是如此认识的。这就是问题的现实复杂性。在完全没有国际法意义上可供判断的法律支撑点情况下，双方的任何一方寄希望于提高嗓门或亮亮肌肉而独获钓鱼岛的主权及其利益的想法，都是天真的和情绪化的。钓鱼岛的分歧是现实的，但不能长久地使中日双方结构性的利益为其所左右。钓鱼岛的问题如何解决？和平解决。选择战争是愚昧的和不负责任的。

今天选择战争，中共必败，我比当局更了解他们的军队能力。他们的军队，若论优秀，在面子上营造点威武的能力世界第一，可他究竟不是现实的战力。什么「二十分钟解放台湾」咧，什么「两小时解决藏南问题」咧，这说大话也是世界第一。从哲学角度，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力量是心理的力量。中共目前的这支

军队及他所保卫的政权内心的脆弱及不安，已到了让正常人感到莫名其妙的地步。那么，即便缺乏正常的心力，在技术上占了绝对优势也可能可以获胜，可不幸的是，中共目前军队的落后超乎人们的想象，这点我比习近平更了解实情，缘着他处在一个最难看到真相的位置上。现在他们常让世人看到那几样漂亮的新玩意，全是刻意地营造出的面子。2008年8月，我「旅囚」至新疆时见到了些当时仍在部队的战友，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炮兵装备仍旧是1950、1960年代的老器物，我一点都不惊讶，但是他们说通讯兵迄今仍整日背着线圈满地奔跑地练收放线训时，真惊得我目瞪口呆。

「连坊间老弱都用上了手机，士兵还练着这有何用？」我问。

他们说没有办法，说中央军委的作训大纲没有改变，总不能让士兵每天歇着吧！

现在全世界都已清楚了，这些士兵的中央领导同志是怎么样的人物，诸如徐才厚、郭伯雄、谷俊山们，靠着这些人形兽，提升军队的战力，实在也不大现实。他们所做到的就是每个地方安置一批新玩意，一则糊弄军委江主席、胡主席、习主席们，二则糊弄一大群早失脑力的国人。中国军队只有一样绝对不能怀疑的能力，即是对付自己手无寸铁的人民。我在武警部队被囚禁二十四个月，其与中共国防军情形大同小异，甚至没有小异。其日常精力主要就是部队内部维稳，所有士兵都是当局假想中的不稳定因素，被士兵称为「阉狗」的维稳人员不舍昼夜奔突于营房间。

江苏一陈姓士兵曾说过，说真要打起仗一定会出笑话，因为他们从来不把士兵当人，士兵凭什么给他们卖力？这样的军队，能作战，那是反常理的。军队中中共干部的腐败程度比地方更直接而更加肆无忌惮，就像中共监狱里的无边黑暗一样，绝对的权力而无监督，加上干部人人没有信仰的可怕，不难想象军队上下的腐烂程度。这样的军队，只有习近平们才迷信他是有力量的。

所以，选择当下与日作战，等于故意送我们的孩子去死。但日本人亦切不可以为一次打赢则可永远控制钓鱼岛权益。双方的历史恩怨是个现实的存在，日本人若欲再次以武力从中方获得好处，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只要日本人再次选择了武力相向，未来中国有办法在没有生命牺牲的状态下，使日本人在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利益永不得实现，需要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中国将腾出点精力满足日本人的武力偏好。

关于中共军队的战力，可能有些人不愿接受我的上述认识，我看现实点更好，当年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之「精锐」及「骁勇」不仅被伊拉克独裁者吹得神乎其神，不同样被中共媒体吹得让人头晕目眩，终于成了一个令人饭喷的历史笑柄。

关于钓鱼岛的价值问题，前几天我的大哥有个有趣的疑问，他说钓鱼岛上又不能种庄稼，不能住人，要他干嘛？这很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疑问。主权之争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价值高度。其次，钓鱼岛权属的价值之外，他同样有着巨大的现实利益。中共媒体从未告诉过国内公民这些利益。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记忆中是1973年至1982年里，由一百六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共同制定，应该是1994年生效，中国属该公约的签字国，好像是在1995年批准了公约），海洋分为内海、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用于国际航线的海峡、公海及公海海底等。人类未来的资源前景在海里。钓鱼岛的资源可并不仅止于大哥眼底的那个丛草不生的石头山，那岛屿外围切线以内的海域是内海，切线外围十二海里内是领海；内海与领海是国家的领土，其上空是国家的领空。而领海外围又有十二海里（以领海十二海里计算，有的国家领海六或九海里，那么他的毗连区宽则为十八或十五海里）宽的毗连区，国家可在毗连区内行使有关关税、财政、移民、卫生等方面的管辖权。而毗连区外是从领海基线量起至宽达二百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沿海国对这一海域中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享有主权利。离岸二百海里的范围内多属浅海，有有机生物和日照充裕的良好条件，是海洋生物繁衍的主要区域，也蕴含着大量的矿物资源。而专属经济区外则是从领海外部界线量起宽达三百五十海里的大陆架（世界上最早提出大陆架主权要求的，应是美国的杜鲁门总统）。

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大陆架是领海以外、依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二百海里的距离，沿海国对大陆架上探勘和开发资源的活动享有排他性的管辖权。所以，人们尽可想象围绕着钓鱼岛有着怎样漫无边际的利益（有关海洋法律方面的记忆未必准确，有不恰确之处，敬请读者见谅）（注：钓鱼岛专属经济区内有数千亿桶的原油，这对资源匮乏的日本是不愿意放弃的）。

这足够大规模的利益，加上主权国家的利益价值，再加上日本人的历史恶纪录，日本人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铤而走险，符合他们一贯的利令智昏的恶习，见了棺材也未必下泪，这将成为日本人的下一个不幸，而不是机会。

对欧关系与对日、对美关系一样，成为坚擎未来中国对外关系架构的支柱性关系之一。欧洲是人类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公元前五百年，雅典就出现了民主政治，而欧洲的真正文明崛起于近代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经济扩张和内政建设。欧洲不可撼动的强势地位结束于一战。一战后，欧洲一方面在成功着，而另一方面在衰落着。全球前所未有的一体化进程，加速了他的在资本、技术、观念、制度方面的扩散，也正是这种快速扩散培蓄生成了对他的抵抗力量。但今天的欧洲，依然蓬勃着生机——财富的及精神的，他仍是人类文明秩序结构性的推动力量，与欧洲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对我们未来的文明发展，具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西方文明贯穿着对个体自由重要性的强烈意识，而这正是中国文明发展中长期结构性地缺乏着的。中国从秦代开始，高度官僚化、层级化的社会建构迄今不能有纤毫的改变。前者的历史一直伴随着对普遍的人权主张及追求。在艺术、宗教和政治生活中，我们都能看得到或感受到满溢其中的、人们对个体自由的主张和表达。这正是我们未来的全面建立中应予以重视及借鉴的。

我个人期望「北约」组织的作用拓展至为文明政治拓土之领域。野蛮的专制政治，实在是人类第一恐怖势力，其严重践踏着人类文明能力和文明的声誉。

乌克兰危机警示欧美，北约依然需要在欧洲发挥现实的军事作用，维持相当军事能力的必要性。

2017年后，我预料未来民主宪政政府将会迅速与美、日、韩等国协调解决北韩问题。作为当今人类最邪恶的恐怖势力之一，他的许多做法都是超乎人理的，他的邪恶势力虽不及中共，却也是今天人类文明秩序最不可确定的威胁。人类文明的力量在超出人理的独裁者面前是孱弱不堪的，他们只迷信硬力量。由于邪恶中共的庇护，北韩今天颇使文明世界无策可施。北韩这样的政权存在一天，都是人类文明声誉的大损失。

2017年后，中、美、日、韩当担负起保卫人权、保卫人类文明秩序的现实责任，在与金氏家族达不成和平交权的情形下，毫不迟疑地以硬力量解决之。中国有义务做出这样的选择，六十多年前，我们在那里打了一场不道德的战争，不仅白白牺牲了我们数以十万计的优秀儿女，作为那场战争罪恶后果的一部分，两千三百万北韩人民的基本人权，迄今被昧却了灵性的金氏家族踩在脚下。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不名誉的存在之一。这是中国人不名誉的纪录，我们有着无可推卸的责任，一个统一的民主自由的大韩民国，符合世界的利益，也符合我们中国的

利益。

对于南海问题，传统声索国（**俗语，指一直以来主张主权利的国家**）当务之急是寻求达成下列共识：

1. 共同承认涉争范围海域（**含岛屿及其上空、海床及洋底**）的权属属于争议海域的法律地位事实；
2. 相互及共同承认各传统声索国对涉争海域平等的声索国主体事实；
3. 各自承诺及共同认可和平解决争端原则；
4. 所有传统声索国停止单方改变南海现状的做法，尊重并共同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的传统；
5. 探索建立由涉争海域传统声索国及其他自愿参加的中立国组成的、涉争海域争端协商机制委员会，寻求解决争端；亦可探寻达成相关声索国共管及共同开发委员会，在确保国际航行自由的前提下，共同开发，共享利益。

为了一只腐鼠，动物之间会相啮至血溅膏滴，人类群体中也从不少见这般景象。任何利益，不当在个体人的生命价值之上。利益之争，既属人类群体中的一般现象，亦属人类自身迄今尚无力克服的局限性。有些价值是可以用生命去捍卫的，诸如人权、人类共有文明价值等，但他永远只能是穷尽了所有非牺牲生命途径后的、被动的接受手段。中共邪恶政权在大陆的暴虐已进入历史性的最后阶段，这个事实，当今世界只有两类人拒绝承认：一是中共群盗跖及被他们洗脑而丧失了脑力的中国部分愚民，二是国际政客阶层。人们尽可看看中共群盗跖在今天中国的愚昧、无知及冷酷，臻至于怎样的令人目瞪口呆的境地！当局在南海的扑腾，是其本质及本能在这个阶段的必然反应。他们迷信「人民军队」的战力，就像袁世凯当年迷信百分之百民意支持其立登大宝，及覆亡前的萨达姆迷信百分之百民意支持其独裁统治，如覆同辙。呼吁各方冷眼静观，在2017年后再与民主宪政中国一道，以上述思想解决歧见，切不可情急之下，造成任何一方士兵牺牲生命的不可逆转的悲剧。

（三十二）NGO，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活力和柱石

2017年后，在中国大地上，无处不在的不再是政府及中共党的组织，取而代之的将是NGO，他将在这个刚解放的社会里，作为无处不在的抱团力量，为

中国社会的大和解，为在仁爱、诚信、互助、法治意识、所有权意识、公民权利及公民责任意识、伦理道德意识、纳税人意识及选民意识等方面培着美好质量、习惯等，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一定意义上而言，中国在1949年以后是只有国家而没有了社会。党的组织凌驾于国家及政府之上而无处不在，这种现象亦只有中国、朝鲜、越南等少数几个共党国家里存在。而党的组织机构活动、党内工作人员的所用费用全部由纳税人承担，这在全球也仅剩几个无赖的共产主义政权。在制度文明国家里，一个政党的经费全额由纳税人承担，那是天大的笑话。尽管如此，他们对养活了他们的纳税人不仅没有一点感恩的心理，反而凶残地压迫纳税人。他们的全部花费都不能进行审计，以致像党员干部嫖娼用的振动安全套发票都堂而皇之地报销，这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无耻的公款用途，但这在中国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他几十年里一成不变的强权政治，中国没有一个完全自由独立的NGO，而共产党的组织却细密如蛛网，植人社会肌体的各个系统，像吸血虫般吸附在这民主瘦弱躯体上，控制着这族前行的手足及冲动。

在这里，有必要晾晒出这吸血大阵的冰山一角，刺激一下一些国人已硬化了的神经。以下简单列举这六十六年里全额由纳税人血汗供养着的，与正常国家职能毫无关系的吸血虫机构及其吸血虫大阵。

1.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领域、各级党委体系及其人员
2.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领域、各级党的组织机构体系及其人员
3.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领域、各级党的纪委体系及其人员
4.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领域、各级党的宣传机构体系及其人员
5.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领域、各级党的监察体系及其人员；
6.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领域、各级党的统战机构体系及其人员
7.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领域、各级党的外联机构体系及其人员；
8.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领域、各级共青团机构体系及其人员（**每级团的机构里又有纵横交错的内设机构，党的组织内部有的建制他都有，党的组织机构内部没有的他也有**）
9.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政法委机构体系及其人员
10.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民族工作委员会及其人员
11.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校机构及其人员
12.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农业委员会及其人员

13.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工业委员会及其人员
14.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其人员
15.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及其人员
16.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老龄工作委员会及其人员
17.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及其人员
18.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老干部工作委员会及其人员
19.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经济委员会及其人员
20.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交通工作委员会及其人员
21.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水利工作委员会及其人员
22.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民政工作委员会及其人员
23.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财经委员会及其人员
24.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环境工作委员会及其人员
25.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金融委员会及其人员
26.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国资委员会及其人员
27.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精神文明工作委员会及其人员
28.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其人员
29.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发展改革委员会及其人员
30.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医疗卫生工作委员会及其人员
31.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教育工作委员会及其人员
32.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科技工作委员会及其人员
33.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绿化工作委员会及其人员
34. 中共中央及各地各级党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及其人员
35. 中央各部委、办及各地各级政府，以及政府各级职能部门内部设立的党的组织机构及其人员
36. 设在全国人大及各地各级人大内部的党的组织及其人员
37. 设立在各地各级司法机关内部的党的组织机构及其人员
38. 设立在全国政协及各地各级政协内部的党的组织及其人员
39. 设立在中央军事部门及各地各级军事单位内部党的组织及其人员
40. 设立在各地各厂矿、企业、事业单位、学校幼儿园、卫生、金融及各所谓人民团体内的党的组织机构及其人员
41. 设立在各地各级工会、协会、行会、街道内部的党的组织机构及其人员

42. 依附中共强权，而全额由纳税人养活着的九个「民主党派」中央及各地各级「民主党派」组织机构及其人员
43. 由中共强权控制下的，全额由纳税人供养着的全国各地各级政协机构及其人员各地各级妇女联合会，会计师协会，律师协会，科技、医师、记者、作家、红十字、工会、残联、美协、企业家协会，全国及各地各级工商联合会等等各种协会、团体更是多如牛毛

在制度文明国家，这些行会团体不仅没有级别之分，更不可能由纳税人供养着，他们被人民称为「二政府」。这种行会中的人员中，许多人的邪恶程度比主子更甚。以北京律协为例，每年违法收取的律师及律师事务所「注册费」达一亿两千万之巨，这些巨额费用悉被几只黑手贪攫，会长李大进则更是无耻地全然超出人理。「面对律师他是阴狠的太监，面对权力，他是乞怜的巴儿狗。」北京律师界如是评价他。他们依附强权，而终于成了强权本身。这些行、会、团体，将在2017年后悉由NGO组织取代。政府将倾力支持服务于NGO，使之能为建立并恢复中国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积极作用。

我不厌其烦记述上述这些远比蝗虫恐怖的机构及其人员，这里寄托着我特别的感情，那就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令一个民族屈辱的现实，在过去的六十六年里，这些纪录广泛而现实地浸润在这个民族的血和泪水中，他记录着我们这庞大民族的苦难和文明的耻辱。他提醒着世人，邪恶的共产专制的恐怖，惊醒这民族的后来者，当永远远离专制制度，保卫人类的尊严及文明前途。

（三十三）启动对「危害人类罪」犯罪者的追惩

国际上，2003年正式成立了国际刑事法院，其主要职责是对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及「战争罪」的个人进行刑事管辖。迄今为止，国际刑事法院正在处理的案件有近二十起。

根据国际公法之反人类罪普遍管辖原则，中国将在2017年左右设立特别刑事法庭，对于前中共政权广泛而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进行追惩。在特别刑事法庭的建立方面，中国将寻求联合国的帮助。这方面是有先例可循的：1994年，经安理会决议，成立了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对前政府首长、军队长官进行起诉，有五十多人被判无期徒刑等不同刑期的刑罚。大约在2003年左右，联合国与柬埔寨

寨协议成立了特别法庭，对1970年代犯下屠杀暴行的前柬共领导人进行审判。

中国将直接以「反人类罪」对前中共政权的涉罪人员进行追惩。这样做是有国际法渊源依据的：其一，国内法是国际法的第一渊源，国内法具有国际法创设的当然资格。其二，国家法的效力意义是，各国公认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构成国际法效力基础的（我记得未必准确）。而我们引用的法律准据是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为了善意警醒今天在上掌权的大小中共官员及其帮凶，在这里，我将不厌其烦地将两个公约中的人权保护内容抄列如下，所有践踏、违反这些规定的行为，都将接受「反人类罪」（实际上就是危害人类罪）调查，无论是谁，不能有例外。

无论是谁，在2016年9月30日前公开脱离中共系统，公开说出犯罪真相、公开真诚地忏悔，并与具体受害人达成谅解，将得免除刑罚。

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保护的个人的主要的人权内容：

1. 违反人人都有生命权权利，不得非法剥夺。未满十八岁的人不得判处死刑，怀孕妇女不能执行死刑。
2. 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行为。
3. 违反结社、和平聚会和示威自由的权利。
4. 危害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
5. 妨害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6. 妨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权利。
7. 妨害婚姻自由权的权利。
8. 任意干涉私生活权利的行为。
9. 儿童有权享有家庭、社会及国家的保护，没有尽到应有保护义务的行为。
10. 妨害自由迁徙权利行为。
11. 妨害公开公正的审判及无罪推定之诉讼权利的行为。
12. 施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行为的。
13. 妨害健康权的行为，包括在预防、治疗和疾病控制及改善环境方面故意懈怠的行为。
14. 妨害生活及住房权利的行为（强制拆迁是最恶劣的罪行之一）。
15. 妨害罢工自由的权利以及工作权，教育自由权、休假和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
16. 违反男女平等及同工同酬权利的行为。

中共政权的所有官员及其帮凶，对照他们几十年来的所有行为，可以发现，两个国际公约公诸的上述主要人权内容，正是他们不遗余力地践踏的对象。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丧心病狂、触目惊心来论之，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在聂树斌被冤杀的问题上，这个邪恶政权把反人类丑恶行径表演至极致。这样的罪恶不据法论罪追惩，不仅恶劣损害人类的声名，更使人对天道昭彰丧失信念。

中国共产党的邪恶罪行，还包括：拒绝建立独立的司法审判制度；中共纪委体系非法办案侵犯人权的恶行；邪恶的暂住证制度；收容审查制度；劳动教养制度；洗脑及不公平的教育制度；下岗职工祸害恶果；暴力镇压上访等告申行为；拒绝受理公民的起诉；审判委员会控制审判；政法委操控侦控审判工作罪行；以制度施措遏阻，并以暴力任意构罪的犯罪行径及阻挠结社、集会、示威自由及自由建立工会的权利；以制度措施及暴力任意构陷罪名等犯罪行径，阻挠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在强制拆迁方面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制度性阻绝及暴力打压罢工自由的权利；骇人听闻的酷刑及其他反人道行径；在监狱等场所剥夺公民休息权利；始终拒绝建立医疗保障制度之恶行；每年数以十万计的儿童失踪、被残害等种种反人类罪行罄竹难书。

在独裁制度庇护下，公权力成了犯罪凶器及罪恶遮蔽器，追惩犯罪是人类呵护主义感情的传统及普遍方式。一个民族或一个个体，绝不能是非不分，将罪恶与善行视同一律。今天，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严正声明，因为，所有上述罪恶不仅没有收敛征象，反而更加肆无忌惮，更加地简单直接。我们必须严正告诫今天仍迷信暴政权力千秋万代永续的官员及其帮凶们，你们今天所有的犯罪行为，将成为2017年后，针对你们罪行的具体指控内容。所有针对良心犯们的司法构陷，具体到每个个案，中共领导体制内的所有党委、常委都必须承担刑事责任，除了相反证据证明外，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中共最高层必须对其任职期间所有司法构陷承担刑事责任。如果你们尚有人的感情，还愿意为你们及你们的亲人做些责任的考虑，那就做出最有利于你个人利益的选择。如果你们愿意继续作恶，把其他同类的苦难当成儿戏，那也简单，2017年后咱们慢慢在司法程序中讨论！不要届时说别人言之不预。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只是在提醒你们不要再犯罪，给自己在2017年后留些余地，仅此而已。像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囚禁，这种公然藐视人类普世文明价值判断底线的恶行，已完全超出人理！再次对良心人士郭飞雄的构罪刑献，这种邪恶的气魄人间罕有。

你们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做出选择，要么两年后成为中国自由公民的一员，要么终于归于监狱或绞刑架！各自好自为之。也许今天的你们会对着这些文字冷笑，当终于认识到他的振聋发聩时，好与坏则均成定局矣！

2015年3月25日于陕北母亲生前所居窑洞

后记：罢笔后意犹未尽的漫谈

一、强势崛起国家之历史性悲剧

《2017年，起来中国：酷刑下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自述》这本书书写算是结束了，从2014年12月27日至2015年3月25日，耗时近三个月时间，期间四分之三的精神用于本书的写作上，每天仅腾出四分之一的精力读书。我写文字不习惯列纲，曾经试过，终于觉得犹如自缚手足。坐下来，进入状态，每日（周日绝不写作）三至四千字，在下午二点半前即可完成大部，院里活动一个半小时后写至确定的时间点，再开始一天的看书时间。感谢神，这本书的文字工作在我这里已经完成，下阶段可全天候转入读书时间。清朝最后一位摄政亲王说：「无事好清闲，有书真幸福。」无事和有书是我当下阶段坐拥的资本。

本书文字工作实际于昨日下午即结束，至4月10日止，又做了一遍全面的技术性检查，颇有终释重负感，本拟从今天开始全天候与这「无事」和「有书」来办理交涉。今天早晨五点半看了两篇文字，一篇是谈中国今天所谓的「大国崛起」，一篇是一位中共纪委人员写的关于「双规」的文字，尤其后者，简直是瞎说。文中说中共对党员的「双规」是合法的，理由是：入党者接受了党章，亦即是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形成了人身契约，中共根据党员已接受了的党章对其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是执行契约效力的行为，因之是合法的。作者颇为这一说法感到得意。这种逻辑非常荒诞及愚昧（如果竟不是无耻的话）。只要有事先约定便是合法行为，如果这种逻辑成立，雇凶杀人、贩卖毒品、贩卖军火前，只须签个协议不就成了合法行为了？公民、法人及其他的组织可以订立契约，但其约定不得违反法律及其他人利益。

该篇文章的作者，其论调实在可以欺骗许多人。中共有些气魄是世间独有的，诸如无耻的气魄及无法无天的气魄。这就是当下中国的荒诞现实，一撮人瞎说，一片人瞎听，瞎说者与瞎听者都心闲气定，唯有瞎说有自由，唯有瞎听有安全。倒是这篇文字说那双规的环境一般人支撑不了一个月，而能坚持一个月者，

即简直就是英雄之说法是确实的，对于空间及光明唯依眼睛获得一途的官员俗类们，能熬过一个星期而不崩溃者，真当刮目相看。我曾在那种环境里累计囚禁过近四年，对于没有信仰者而言，那种环境设计是足够地残酷（**看管我的士兵，就是平时供中共纪委驱策而看管被「双规」贪官的**）。

今天看的另一篇文字即是有关「中国的崛起」说，什么第二经济实体啦，什么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啦。凡有关中国崛起的文字，腔调、思想均共出一模。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崛起？中国人当做怎样的思考者？前几天我读了一篇一位定居海外的颇著名历史学家的文字，文章说中国当下还需要习近平这种人，读来令人扼腕。他并不身处必须瞎说的恶环境里，他在美国，中国的瞎说大阵早已旌旗翳天，壮怀激烈，一头突入这蛆虫阵容，实在是一种不幸。关于中国当如何崛起，我没有文字方面的深思熟虑，但我们却有成熟的历史范例使我们警醒。作为国家的崛起，中国自己就有过秦皇汉武的崛起，有唐开元盛世及清「康乾盛世」时的崛起，但那种崛起究竟是于普通人民无补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那气魄固然雄大，但透过「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掩隐不住的是普通人无助的忧伤与哀思。

以下，再看看近代世界上几个强势崛起的国家的规律性悲剧结局吧：

1853年，当美国战舰开进神户时，日本已沉睡了两个半世纪，但那究竟是个不俗的民族，日本国迅速崛起，仅四十年即打败了欧洲强国俄国，首创亚洲小国打败欧洲大国的历史纪录。但不幸的是，日本国家的崛起终于带给本国人民漫无边际的灾难，更给周边国家带来深刻的灾难。这些著名的灾难已不需我在此赘述，但我们有必要对这种「国家崛起」的价值予以冷峻地思考。

另一个著名的「国家崛起」范例，即是纳粹德国在一战后仅二十多年的惊人崛起。他们崛起的事实不容置疑，可这种「国家崛起」终于给本国人民及世界人民带来了什么？便是为这种「国家崛起」亢奋至寝食不安的、以希特勒为首的那群人又获得些什么结局呢？中国，曾经的思想大国，终于成了六十六来的思想侏儒，总不肯像正常人一般地思考，经年累月跟在独裁者屁股后面狂呼「大国崛起」者，该不该为自己问一问：这崛起起来后，我因此获得哪些具体利益呢？经济的？政治的？人权的？什么时候我个人的权利及尊严不总是被踩在崛起的国家脚下呢？什么时候个体才能不恐惧地、自由地提出这种问题，向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我们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崛起，还是我们每个公民个体的崛起？

二、中国需要怎样的崛起？

一百五十年前，一位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旁观了中国社会种种不可思议的苦难后，得出结论：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即民主、自由、个体权利、契约意识、规则意识及宗教信仰，等等，这些文明人类群体中最普通而基本的东西。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的书里有段话，颇值得今天那些狂呼「大国崛起」的国人品味。他说：不必担心美国的技术被中国偷窃，因为美国有更快的发明新技术的能力。他说，最当担心的是中国偷窃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等代表了美国价值的东西，当中国开始拷贝这些东西时，才是中国真正强大的开始，才是实质性威胁美国的开始。

托克威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里，对大国崛起的两种不同模式予以概述，使得目睹了二十世纪这两种崛起模式大相径庭结局的我们，禁不住叹服起这位法国人的思想力量，他说：

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从不同起点出发，但好像在走向同一个目标。这就是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美国人在与自然为他们设置的障碍进行斗争，俄国人在与人进行搏斗。一个在与荒野和野蛮战斗，另一个在与全副武装的文明作战。因此，美国人的征服是用劳动者的犁进行的，而俄国人的征服则是靠士兵的剑进行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制。而为此目的，俄国人差不多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人之手。前者以自由为主要的行动手段，后者以奴役为主要的行动手段。

他还结论道：

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然而，其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

台湾著名学人龙应台关于大国崛起的一段文字使人印象颇深：

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他的人民所引以为豪的是军事的耀武扬威，经济的财大气粗，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不起。因为这种性质的崛起，很可能最终为他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会带来灾难和危险。

今天的中国，很有那么一群人，每至「第二大经济体」、「二十分钟解放台湾」的军事能力器嚷起，则眉飞色舞，他们似乎比统治者还要高兴。满目的社会不公，普遍的践踏良知，公权力的无法无天，自己交不起学费、看不起病的诸多烦扰终于变得不重要起来。似乎唯有「大国崛起」顶重要，个人切身利益、人类道义、人性良知全然可以虚无缥缈，这种人格类型颇不寻常。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说：

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他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他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

于他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他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

在一个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没有了具体的怜悯、没有了对不义反抗冲动的社会，这里需要着怎样的崛起？中国的正在致力于启蒙实务者，还有不少的事要做，包括必要的冒险。

清早起来信马由缰写下了上述自己认为有些作用的己见。关于之后有什么样的崛起，无疑当是这片国土上每个个体的崛起，他的人格，他的善良，他的独立判断能力，他对同类的真爱，他的批评才能，他的契约意识，他的公民权利意识，他的规则意识，他的所有权意识，他的道德及诚信意识，他的正义感情及宗教信仰意识。只有个人在这些方面的崛起，国家才能真正有价值地崛起。今天的中国社会，已全面地消灭了上述正常人当有的思想及感情。这样的「国家崛起」，只是像为共产主义苏联崩倒前添加高度一样，徒增反向的意义，增加点崩塌过程的壮美耳。

三、和电视里说的是两个世界啊！

本是搁笔了，可这几天又频看到几件有趣的事，不免又有拿起笔来的冲动。山区的夜是漆黑的，却常有人在漆黑的夜幕里偷着来找我。我倒没有抱怨我的那群看管者疏于防堵的意思，更想特别提醒当局不需紧张，来者对你们不大有危险，都是些不同面孔的苦主，总以为找到我或可能摆脱他们各自的绝望，所以才在黑暗里，冒着被抓的危险来向我展示各自的苦楚。

以昨夜为例，有七、八位被抓官员家属来找我大哥，非要求见我。我正酣梦里，大哥敲门悄声说明来意。

我不愿见他们，大哥却说：「他们很信任你，半夜三更摸来不容易，还是见见吧！」

原来，这群被抓官员的亲属正酝酿着群体上访，用他们的话是「去上面闹」，理由是：全县干部没有一个不贪的，具体证据都有，为什么单抓他们的亲人？但在「去上面闹」与不闹的争论中，有人提出说高智晟目前正软禁在老家，说他能给一个负责任的意见的，于是便半夜偷着来见我。他们如此信任我，倒颇在我意料之外。最后，他们接受了我的道理，放弃了去上面闹的打算，而又都不愿意离开，说非常愿意与我聊天。

他们给了我很多信息，其中有许多的贪腐黑幕。说了去年省纪委书记安东（音）来佳县时，县委县政府如何周详布置所有警力阻隔民众与安东一行的联系，而使安东一无所获的内幕。出人意料的是，他们说的最多的话竟是，「政府肯定快完蛋了」。说这反腐败绝对不能进行下去，原因是「上下都是一条在线的蚂蚱，敢动县长，那市长、省长就会跟着被抓」。

他们刚走又有人敲门，农民李XX一家来找我，政府非法征地，双方协议约定的补偿款拒绝给付，坚持追要而被暴打，告到哪里都不管。他们的哭诉使人哀伤。我从他们的哭诉中看到：没有一个部门，没有一个公务人员愿担负起对这个政权的哪怕是一丝丝的义务，更别说为公民的义务，整个政府的正常职能完全丧失，岂止是末日心态，简直是一个泼皮流氓的末日心态。法定职责奢谈，没有一个人能为他人的苦难有丝毫的触动。

「和电视里说的是两个世界啊！」李XX抹着泪说。

最近，王岐山先生说：「谁说我们解决不了腐败问题！」

听了直使人想起「这是个娱乐的时代」这句话。王先生说这句话时的神情不大清楚，可那语气里却透着昂首挺肚。「腐败并不是杯中之物，而是盛物之器皿。」在中国，总有那么一群人天生具有凌空蹈虚的本领。他们的哲学里，从来否认普遍经验的效力，否认有目共睹的事实。

四、一大群饥饿的毒蛇全都扑腾出了洞口

今年春节期间，村里人的来访不再被阻挠。一些多年在外承包工程的人，现在竟全部歇手，因问其故，对曰：

「是习近平反腐败搞的。」

这回答颇使我诧异。我坚信普遍的黑暗和腐败依旧，却没有想到过他会因反腐败而恶化。但他们在外共同的经历却是实实在在的。他们说以前承包工程，发包单位一把手受了好处后，各职能部门一路绿灯，办事就会很顺利。说现在一些单位的一把手是不吃了（指收贿赂），可他屁股下面又不干净，所以不敢管制下级吃贿赂，现在是每个环节上都会卡要贿赂，赤裸裸的，说没有一个环节可以例外。过去一个人吃，现在变一群人吃。他们有个很恰切的比喻，说过去是一条粗壮毒蛇堵在门口，只要喂饱一条蛇就行了，习近平的反腐败，是猛地一把将那条粗壮毒蛇给拔了出去而腾开了洞口，久憋在洞里的一大群饥饿的毒蛇全都扑了出来，比以前更可怕了。还有一部分村民反应，过去不管怎么说，送了钱还可以办事，而现在一些领导是不收钱啦，可是他干脆就不给你办事啦，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五、萧秦功们应留意即将到来的变化

这几天看到美国著名的中国与亚洲事务专家沈大伟先生刊于《华尔街日报》之〈即将到来的变化〉一文，文章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他认为中国目前领导人「希望借着打击贪腐和持不同政见者来巩固统治，对中国社会制度的这种专制手段，很可能令中共引致像苏联一样倒台的结果。」

此文又戳到了中国一些东西的痛处，一大批踏在朝靴底下的宠犬学者，指挥刀所指，竭声嘶叫，竞相奋勇。什么萧秦功，什么邓聿文，几乎摆出全队走狗阵容，但他们腔子里面的成色，决定了他们的东西终于还是臭不可闻。

萧文、邓文，我浏览了一下。文中没有忘了絮叨些过去的荣光，而终于本意还是媚权。萧文建议「加强社会管控，对于维持稳定，防范政治风险十分必要」。他实际上是稀里糊涂地支持了沈大伟先生的判断，却又认为沈文「从学理上看也确实十分肤浅，甚至缺乏必要的逻辑」。翘尾挺肚，丑态可观。萧文、邓文，文字叙述详细却昏昧不明，这又是指挥刀下耀武扬威的鲜例，丑貌上蒙着公正的皮；他们与沈先生的文字，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孔恰被这特殊的历史阶段给记下。

良知及人性都硬化了的丑类们，对哪怕是极小一丝的改革都倾力加以阻挠，而这反对改革的口实却往往公正而堂皇。他们连一点有见地的不同意见都忍受不了，往往比主子的反应更加敏感。这使我想起前几年里，我每有点声音发出，奴

子的反应总在主子前面，主子的讨伐总是慢奴子半拍。萧秦功、邓聿文两位「理论精英」嘤嘤不休了半天，终于还是当与王伟光、冯先知们归于一丘。他们的文字将各自的丑像画得格外清楚！面对专制权力的不义、社会的普遍不公，他们死尸般地镇静，这是怎样的一种无耻的本领？无疑，不义和无耻成了当下文人苟活的要诀。坐拥不义和无耻两样东西，终于是安全了，可跟着加足的是卑下的恶奴子嘴脸。恶制度是摇着摆尾族的大本营，沈大伟先生是犯大忌了，他指出了这大本营实在是危在旦夕矣！

但萧秦功们的嘞嚷也让人们看到了另一面，那就是他们的不安，虽则在指挥刀下，终究对指挥刀的力量也时常怀疑着，既然面对现状如此地心安理得，认为他是如此地美不胜收，怎么还要有「十分必要」的防范呢？既然已很好，人民感激尚且来不及，怎么可能想着改变他呢？这是一种什么逻辑？文且不通，理将焉附？但指挥刀究竟还是萧秦功们的肝胆，情不能自持地要求主子「加强社会管控」，如是，则永续他们作恶奴子的酣梦。这些东西可能不懂得中国历史，更奢谈人类历史！秦统一中国之际，其拥有的暴力，从规模到质量是何等骄人，真可谓「所向披靡」，那时主子的敏感还在奴子之上，「亡秦者胡」一句谶语，始皇帝「高度重视」，立驱八十万悍兵，三十万北扑，五十万南驰，「亡党亡国」不过十五年耳。两千年前是扯得远了一点。近看已「亡国亡党」的前苏联，其暴力规模及质量远非今日萧秦功们的主子可比，结果如何！我倒是希望萧秦功们，在指挥刀下留神着将来的变化，利令智昏者究竟不大光荣，弄不好会毁折前程的。

阿伦特说，在极权体制下「似乎是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是由最好的分子，而只能是由最坏分子建立」。

六、光耀粪便，圣化蛆虫

我在被中国黑恶势力秘密囚禁时，当局竟拿了一本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读本》给我，我抱着熟悉人间文字心念看了一遍。

有谈话者问：「有何感想？」

答曰：「这不过为阿Q的冢中枯骨捌飭了一套新衣耳，说俗一点就是给狗屎起了个新名。」

谈话者又说：「这是人家五百理论精英搞出的理论突破，难道就比不上你一人？」

对曰：「不过一群断脊狗耳，便是全队走狗上阵，终于还是走狗耳。」

谈话者又曰：「你太狂妄啦，人家那都是顶级的理论高手，你把人家说得一文不名。」

有趣的是，我在沙雅监狱囚禁期间，他们也拿来过一本同样的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读本》，我与他们也有过一段有趣的对话过程。

萧秦功亦罢，或是什么「五百理论精英」亦罢，在当下中国，唯他们能够观四向、听八方，他们光耀粪便，圣化蛆虫，丑貌上蒙公正的皮，以丑恶骄人是他们独到的本领。缘着他们，对暴政辩解的文字总是铺天盖地，其实他们同样清楚，文字组织得再巧妙动人，不过是血迹上的掩饰耳。他们啼笑俱伪，常相互标榜，尤其近些年来，文人们大都练就一套媚权祸国的看家本领，决心把这中国永远留在黑暗这边，一些昧劫了灵性的文人，襟怀祸国大志，练得祸国雄才，媚权附势的奴子们，常汇成旌旗蔽空的阵容，互济狗胆，祸国气焰万丈。今日中国，杀人者依然昂首挺肚，那脸上不能褪去的血污早被忘得一乾二净，就是这类文人的成绩。他们在人类廉耻面前威风八面，猛不可抵，尤其在公开批判西方文明及普世价值方面真是悍勇无比。人类群体中公认的一些应有之底线被视为空物。我想这种文人使他们去经营棺材铺，他们会毫不犹豫讴歌瘟疫，利益成了所有的标准。

有两样东西独归中国的爱国贼们，臆绘的辉煌荣光和臆摆的旌旗翳日的威势。既有荣光，且是灯火般辉煌的荣光，没人这大阵，那自己也就非荣光不可了；既是旌旗蔽日，那终于就是没有风险的了，蜷伏在这漫无边际的黑影里摇唇鼓舌，不需要纤丝的勇气，唯一副刀枪不人的脸皮即可，便是偶遇攻击，究竟是不必自己出阵临刀的。这些东西常貌似悍猛无比，实则是摄于现实中权力的淫威而以己身的卑怯乞怜，这是一种加入的妙诀。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不甘寂寞，都有丑恶骄人的气概。这臭名远着遐迩的爱国旗下，实则是摇首摆尾族最后的大本营。

罗伯特·达尔说：一只眼镜蛇不会因为牠的主人说牠是鸽子就成了鸽子。无论一国的领袖和宣传家们说得多么动听，只有他具备了民主所必须的全部政治制度，这个国家才有资格成为民主国家。

我有时在想，2017年以后的中国是否当有一种特别的设计，对于那些凡西方必反者当有些人道的体贴。对于那些处处反西方者，让他们屈尊去坐西方人发明的飞机、汽车、火车实在是有人道的，更不当使他们坐在西方人发明的电灯

下、计算机前受苦。我想，满地的绿呢大轿子，遍地的豆油灯，这不光安稳，更具有别样的情致。

七、多做对国内被压迫者有实质性帮助之事

本书发表后，我的处境将会变得更坏，所以今天既再拿起笔，即想把心里的一些想法尽可能地都写出来，期望更多的人抬起头来，给将要到来的巨变给予应有的瞻顾，以各自的方法，加入到这已经开始了的巨变中来。

我期望本书能以中、英文两种文字，于2015年10月初同时发表。本书所有收益的一半（**税前**）捐与2017年后自由中国的福音传播事业，藉此与傅希秋牧师商榷，期望能建立一项「自由中国教堂建设基金」，以资为2018年始的中国各地教堂建设未雨绸缪，这是一项顶重要的事。专制共产党在中国最邪恶的成绩是使许多国人远离了宗教信仰，没有信仰的人类群体是最可怕的，共产党六十多年的无神论暴政已造成怎样的可怕局面是有目共睹的！未来中国，一种昌明政治的建立，一种社会风气的生成，一种有道德社会的终于形成，离开了宗教信仰都是沙丘上的建筑。历史已实实在在地证明：「凡基督教所到之处，人民智力开放，迷信除去，思维扩展，科技发达，社会较为公正，人民生活水平较高，生活祥和安宁。」（**刘杰垣博士语**）人类中，每个个体生命的善良、对他人的爱、正义感情的保有，最有效的培蓄路径即是使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有教堂的小区长大、生活。这里面无需美丽的说教，看看今天排在世界最前面的所有文明国家无不如是。有关捐赠事宜全权授权由我的妻子耿和负责。

在此特寄言境外华人同胞，多做对国内被压迫者以实质性的帮助之事，当利用联合国人权保护方面的「来文机制」，具体地去揭露压迫，说明被压迫者，记录压迫者的名字。关怀、帮助那些流亡在外的难民同胞，人人力争去做有益的事。

这些年里，我常能遇到一些莫名奇妙的举动，每使人扼腕。2006年，对于我的和平抗暴之举，几个文人竟撺掇丁子霖女士公开喊话制止，那理由好像是说为了宝爱稳定的秩序，实在糊涂得可观。雍容揖让、同好同好、万喙息响、天下太平的局面究竟理想，但这种局面便是在羊群中间也不大容易维持。一些人的忙忙碌碌总使人不解，常不知他那热情寻求的价值所在。

2006年至2007年间，一位中文笔会会员来看我两次，第一次来时是与小乔君同行，非要一起吃饭。不料，饭局开端，他说了一段颇使人不理解的话。他说，

来北京后「向刘晓波先生做了请示，经晓波同意后来看看你」。吃饭期间，竟用软和甜美的声音汇报着见面的情形，使人哭笑不得。我不知道此君是在向我强调他此行的正当性，还是在向外界暗示晓波君是个奴隶总管。最不理解的是他第二次来看我时，竟秘密地录了音（后来他在自己的文章里夸口有此大举），只是因为宝爱我的形象才不愿向外公布这「使老高更难堪」的录音内容。把精力用在这些方面实在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

八、对习近平的忠告

共产党体制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共同特点是，在他崩亡之前的最后一秒里，你看到的依然是他的强大和稳定。这便是许多逐利之徒依然继续虚蹈幻想的理由。「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不结束专制暴政，国无宁日矣！这是这本书这篇准后记里必须再次提醒世人的。

在此，我仍想向习近平先生表达一个个人愿望：在你剩下不多几天有力量的日子里，不要再抓捕不同政见者了，同时，希望你立止在新疆的杀戮，希望你能盘算着自己的将来。这话实在不顺耳，尤其在于你。人都是有限的，这不顺耳的话对你是最要紧的。你现在的所有行为，都将成为2017年后你个人命运归向的决定因素，唯愿你有个好的将来。

独裁者昏不可抵的表现各异，却都有个相同的规律，即是总迷信手头的几件兵器。他们从未在历史的演绎中学到点什么，人类历史上，曾在世界舞台上高视阔步、自负至不能自持的超级帝国，远有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及罗马，近有极权怪物苏维埃帝国，可有避免覆亡下场者？

便是新近几位如萨达姆、卡札菲、穆巴拉克、本阿里这些昏昧的独裁者，他们手头可曾缺少过兵器？同归一丘的独裁者，为什么你会认为唯有你能够成为历史的例外呢？谁能遮掩住天亮的到来呢！

习先生，从人的认识角度，我依然认为你未来的下场可以与萨达姆们不同，这取决于你在未来一年的时间里做出与萨达姆们不同的选择。你和你的恶政权整日在忙碌些什么？阻止在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阻止民主宪政、组织言论及思想自由，阻止信仰自由，阻止司法独立和公正，阻止建立公平及符合人道的医保制度，阻止建立普遍公平的教育制度，阻止建立普遍公平的养老供给制……，但有闲暇挥霍贪腐所得而在吃喝嫖赌中度日。你上台几年，这个坏政权的面目更加

地狰狞丑陋，你们已沦坠为全人类的笑柄。在共产极权早已成为过街鼠子的今天，自欺欺人的遮掩及冷酷打压，徒加些这笑柄的娱乐性耳。你凶残地打压了几年，你惧怕的、人民的和平反抗可曾因之有了纤毫的减退趋向？你的政权奋不顾脸皮掩盖真相和完全流氓式的压迫反抗，可曾因之带来一小点你们所巴望的改变？你迄今摆出一副非坚定不移地走向绞刑架不可的气势，这实在是你个人的悲剧，中国人民走向宪政文明的历史步伐，不会因此而有了你们所期望的推迟。或终于被处火绞刑的奴隶总管，或与人民携手走向国家的美好，此间区别，你并不限于甄识。

致谢

本书若能有何俊仁先生亲赐一篇言序，则大增辉矣！在此，特别向何俊仁先生及维权律师观察组致谢！向美联社及莫莫记者和所有这年里关注支持中国文明进步事业的团体及记者朋友致谢！特别向全球所有关怀、支持中国正义事业的人们予感谢！特别感谢那些帮助了我妻子和孩子的善良人们！我在这里向你们说声：谢谢了！

最后，我想向我亲爱的妻子耿和，向我敬爱的岳父岳母及全家，向我的大哥大嫂、二哥、四弟、姐姐、妹妹及两个大家庭的全体亲人，还有我的宝贝女儿、儿子表达我深深的歉意，我爱你们！我爱你们胜过爱我的生命！因为我现在不能向你们说明我正在工作的事！我瞒着你们，答应了要使你们平静两年，这是我心里的痛，因为我一直在骗你们！关起门来写下这本书，在跟前的大哥大嫂都被我给骗了！我理解你们对我的爱和关怀！但当下我实在没有能力属于你们。中国要变好，必须要有一些人具体地去做些事，我请求你们原谅我。你们当看到一个规律，即是每次被绑架后我都能活着回到你们身边，这是最后的一次绑架了，安心等着我回来。

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中国！

2015年4月11日于母亲生前所住窑洞

写书中和写书后的漫谈

一、神赐写作良机

在坐下来之前尚未想好要写些什么，可又确有些想法萦怀，终于取题为「漫谈」。

一年前的这时还未生出写书的想法，这是因着被带离新疆前岳父的再三请求。他要我向他保证两年内不发出声音，更不要发表批评共产党的文字。希望我能给两个大家庭以两年的平静。向我三番五次的请求而每必泪水濡面，我终于于离开的前一天答应了老人。但我终于还是未能信守住承诺。

于我的亲人而言，在他们眼里、心里，共产党这十年里刻意加在这两个大家庭的灾难何其惊心动魄，何其使人毛骨悚然！缘于斩不断的亲情，他们对于我这些年的遭遇，用岳父的话是：

「总是让人目瞪口呆，我们总是在绝望里幻想着奇迹发生。」

我能体悟到亲人缘着对我的爱而生出的切骨之痛，和希望能赶紧停止与魔鬼的缠斗，理解他们在我身上的巴望及幻想幻灭后的绝望无助心理。对于中共恐怖组织这十年里加于我身上的，在俗常人眼里的大灾难，我自己并未有过不能摆脱的沉重感。但对于我亲人的在乎及痛苦，常能为我带来窒息般的痛。而这种深隐于内心的、噬骨的痛是我这些年的感情大负担。这缘于我对他们的深爱，但又无力成全他们而产生内心的激烈纠结。

有时，亲人在制止不能的情形下会说出令人伤心甚至是很绝情的话，以期刺激我放弃。我能理解他们，而他们却把我正在做的事看得有些简单，或是纯粹感性化了。

今年5月份岳父来村里看我，我向老人表明我可能很难坚持使两个家庭平静两年的承诺，老人一时竟愕然无语。

稍顷，他问我：「你是不是中邪啦？为什么差点没命了都不肯回头？你这种固执与邪教有什么区别？」

随后是双方无语，后来我们都流泪了。

「邪恶制度不除，我绝无力量有自己的，在你们看来的正常生活。」这是沉默了许久后我说的一句话。

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去年这个时候，我还为欲住城里的事与黑帮剧烈冲突着。这缘于中国公安部有关头目来沙雅监狱时的一次谈话结果。他们拟不惜一切代价阻堵我回北京，而我则拟不惜一切代价回北京。后来双方各退一步。

「只要不回北京，你可以在北京以外的任何地方住，只要那你愿意，连费用都可以由我们承担。」这是他们最后的话。

公安部一处李处长在离开乌鲁木齐的前一天，又来重复过上述这些话。事实很快证明他们是在骗人，只是为达到当时不允许我回北京的目的而已。住城里确实要比在村里方便得多。村里无法洗澡，冬季无蔬菜，尤其雨雪天上厕所极为不便。漫长的冬季里生炉取暖，实在是麻烦得不堪且极不卫生。另一方面，我在其时并未怀疑过，我对岳父，使两个大家庭平静两年的承诺会有变化。住城里时肯定会有黑帮人员在身边，欲写东西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能考虑到的因素。应该说我是住城里还是住村里，于当局而言并非是个结构性的大事，可他们却像邪灵附体般、几近歇斯底里地阻止这个于他们原本无关痛痒的目标。这个世间最大的恐怖组织，2017年崩亡前的最后一秒里，在物理层面上他们永远会是胜利者——他们又成功了，将我堵在了村里。

村里有一样东西是城里绝不能有的，就是他近乎神圣的肃静，是个写书的绝佳去处。终于决定了写书——利用神赐的良机，终于就写成了书。

二、与出版编辑者的若干争论点

写书应该是个苦活。好在我的两本书都是对过去人生轨迹的回忆，只是一个盘点记忆的过程，把既已经历了的事写下来，不需要任何实质性的深思默想。只是依循着记忆，把既已发生过的事情写在纸上的过程，需要的是能坐下来并能坐下去的能力。

我这里所说的两本书指的是《高智晟与儿子讲自己的故事》（以下称《故事》）和《2017年，起来中国：酷刑下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自述》。前者二十万字而后者约三十三万字。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彼时所写的是两本书，这是因为《2017年，起来中国：酷刑下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自述》书稿传出并与行家们传阅后，生出讲《2017年，起来中国：酷刑下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自述》劈为两本书的建议，「建议」

谦逊的说法。这本书的主体结构分了三部分，即：「2017年，起来中国：酷刑下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自述」、「真相」、「2017年后对中国的展望」，并一篇颇不短的「后记」。至少是我的认为，本书最高价值在第一部分，即「2017年，起来中国：酷刑下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自述」，这是我对神将于2017年灭亡中共奇妙启示的见证，并以此为本书书名，争论的主要焦点正在于斯。第二部分「真相」是对2005年始迄今，我与中共恐怖组织冲突公开化后至今十年里所发生的事实追述。这一部分约二十二万字，内容是在不同时间里被绑架、酷刑及囚禁过程，是这部书的主要看点。第三部分是「2017年后对中国的展望」，为个人的见解。囿于篇幅，只是纲领性地提挈些相关观点，意在引发有见地的讨论。

然而，书稿脱手后，围绕书名及应当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来出版的问题，发生了有趣的争论，这种争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各执己见；而争论的双方则是我独为一方，我以外的当时接触到书稿的行家为一方。市场的、专业技术的是他们看重而坚持的，而我于书的市场前景不大愿意瞻顾，却最关心本书尽快地、普遍地传播的前景，这是个显而易见的矛盾。但出版行业的规矩是既存的，且不以我的喜忧而实在地发挥着他内在的作用。

今天回头来看，双方都没有错。于双方而言，存在着资格、资历的不对称。于他们，倚仗既存的且实在在起著作作用的行业规矩、专业眼力的坚持，是在做正确的事。于我，则是以神的特别引领为依凭，信实的奇妙见证及对这种奇妙见证信实的信心。这种经历的独一无二，加之这种奇妙经历只会是个人的心灵和精神过程，很难让他人以你的述说为依凭，所以这种争论就不免要发生了。

于市场前景而言，我更看重在2017年之后的巨大市场价值，即中共恐怖组织于2017年败亡后，本书于这一神奇启示的证实引发的惊异性关注，而这又是一般重眼前实利的出版商不大愿意耳闻的。

终于，我做出了迄今也许会永远让我扼腕的让步。《2017年，起来中国：酷刑下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自述》将被拆成两本书出版，「真相」部分独立成书，其余部分合为一本书出版，两本书变成了三本书。

虽然《2017年，起来中国：酷刑下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自述》拆一为二，原拟出版的两本书变成了三本书，但迄今并未有过有关三本书的话题，因为《故事》一书一直被冷落而旁置，在所有涉及出版的讨论中，均没有人提及有关《故事》书的出版事宜。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本书的，也只有我和耿和及我的俩孩子。从哲学和伦理价值角度，我更喜欢《故事》这本书，这也正是我先写成他的原因所在。

目前，我和夫人正商议着，便是举债也要使之出版，送给我的女儿、儿子，以及那些对艰困人生的活法有着兴趣的人们。

三、律师生涯遭遇的几件趣事

在我的不长的律师生涯里，是颇有些内容的，从旁观者方面思忖也还能引起人们兴趣的，但囿于篇幅，未能予以当有的罗列，这也是使人扼腕的憾事之一。仅在律师执业中发生的故事即可独为了一本有些份量的书，当不乏跌宕起伏而惊心动魄的内容，多可为黑暗中国司法体制的、昏乱腐败司法现状之活的病理切面。对于篇幅的顾忌仅为一个方面，终于不能胜过自己的慵懒，则是另一个不小的原因。

我的律师生涯也并不总是剑拔弩张而森严壁垒，有些个别的过程，还甚至至于有着戏剧性的娱乐效果。

1. 我会在这个案子上拖死你

初为律师的第一年，作为被告代理人去开发区法院开庭，开庭前独审「去官」陈某一脸严肃地唤我到他办公室一趟。一进办公室，他扯了与案件并无关系的话（是我听来，在于他却全是在为这个案件发力），其中提到，别看他身在这小法庭，但上下有着盘根错节而至于撼动天地的关系，然后话锋一转，说道：

「本来原告是我的亲姨姨，你办理的又是特别授权，当事人又没来，配合一下，下午把调解书弄出来，调解结果又不能上诉，今天下午就可以结案。以后在开发区办案有事就来找我，我还可以给你揽不少案源。」

我听得目瞪口呆。我本能地问他，怎么可以审理自己亲属的案件？这是违反法律及法治原则的。我立即要求他回避本案的审理。他一脸愕然，竟问我，是不是刚出道？脑子是不是出了毛病了？是哪个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是谁？我肃然起身，说律师文书在卷中，其余拒绝在不适当的场所回答，我退了出来。刚一会，他又来叫我，说是「你们律师事务所主任电话找你」。我明白了他做了什么，我拒绝接电话，他凶狠地朝我吼了一句：

「我会在这个案子上拖死你，以后你在开发区办案有你的好果子吃。」

当天，由于我坚持要他回避而庭审未能进行下去，而这个案件也一直拖至我离开新疆也再无音讯。

本案的戏剧性在于，我并不知道他是原告的亲外甥，是他头脑出了问题竟告诉了我？不是。是他对律师普遍奴性、无良的经验和自信。他的经验里，不但没有任何律师敢不听从他的安排，而且还会感戴他的知遇之恩。

（这种现象绝非偶然。《故事》书中提到的天山区法院副院长刘志军，曾指着我不满地说：「我他妈从来没有遇到一个敢在酒桌上不给我敬酒的律师！」新市区法院副院长李刚指着我不满地说：「我他妈从事二十二年刑事审判工作，从来没有遇到像你这样敢不听话的律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陈文福案审判长勃然大怒唤来法警：「我从事十几年审判工作，在法庭上这样嚣张，公然敢顶撞审判长的律师还从未见过，你妈的是不是吃错药啦？」我常使一些视滥权为寻常物的「法官」气到犹狂犬暴跳。）

另一个喜剧点是，本案是他的亲姨妈诬陷我的委托人，诉是由他的姨妈提起的。他的「我会在这个案件上拖死你」的说法，是个令人饭喷的笑话，因为拖死的其实是他的姨妈。

2. 两个「搭档」竟不认识

十八年前的一天下午，我到新疆轻工厅法律讲课结束后适至中午，相关负责人非要留下吃中饭被我拒绝。

那负责人能言善道，说：「水至清则无鱼，真巧你的搭档中午也在我们这里吃饭，一起热闹热闹吧。」

我彼时只有助手而并无搭档。依着好奇心，我跟着他们进了一个气派的餐厅包厢。「搭档」正坐在沙发上入神地翻着食谱，我过去碰他一下，示意他跟我到外面说话，他跟了出来。

「问题出在哪里？两个『搭档』竟不认识。」一到外面我就来了一句。

「什么意思？你是谁？」他不解地问。

「高智晟，他们说我和你是搭档。」我回答他。

他一下愣在那里，终于慢慢地低下了头。

「谢谢你，你做事还是有节制的。」我说。

他慢慢抬起头来看着我说：「不好意思，高老师，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谢谢我？」

哦，纠正一下，我此生迄今从未做过老师，今后也没有这种打算。

「我感谢你是有道理的，你假冒我的搭档，最糟糕的结果也不过是发你一份工资，你若决心假冒我的儿子，我的财产就可虑了。」回答完他后我就径直离开了那里。

在中国这种人鬼难辨的社会里，你常被迫成为某种莫名其妙的角色，有时也会出乎意料地成了既有规矩的一部分。

3. 应酬是企业法律顾问工作的一部分？

1988年春节前的一天，下午快下班时，一家国企厂办主任笑眯眯地走进了我的办公室，说是到了年底啦，厂里职工还惦记着高律师，委托厂领导请高律师出去坐坐。我素不喜酬酢是他们所清楚的。辛苦一天后，应酬于杯觥交错、灯红酒绿中实在是一种糊涂的选择。于是我客气地拒绝了他。

「高律师，你不去恐怕不好办了。总厂下属十七个子公司的老总们都已到齐了，几十号人都在饭店等着你明说了，今天就是最为难你也得委屈自己，你不去，把公司几十号凉在那里，这些人都是公司上下的实权派，恐怕你明年和他们的交道就不好打了。再说，你得适应我们，出来应酬是企业法律顾问工作的一部分。」

我还是跟着去了。究竟是国企，那场面宏大气派。一指厚的地毯上，豪华的餐厅里，六张大餐桌直径均在两米以上。用食过程可谓昏天黑地，你看到人人都在使劲地说话，却不知说与谁及谁在听。吃喝完了，几十辆豪车开至一处叫「红海岸」的娱乐场所。我第一次参加那般场合，新奇而震撼。迷离的灯光里，一长串袒怀裸腿的女人站在那里，像货物般供人挑选。我第一次领略了国企老总在杯觥交错、灯红酒绿里的练达气魄。程序至这般环节，我在不在场就不甚重要了，或竟是不在场更为妥贴，我与厂办主任打了个招呼后离开了。

这次海吃昏玩经历我后来与我许多朋友、同事提及过，当夜花销足在数万元以上，而名义则是年底答谢高律师。事实上，我们之间只是一种合同关系，尽心尽力做好企业的法律事务是我的本分，更是我的合同义务，是我的工作。客户是我的衣食所依，这种昏天黑地的答谢原本是没有必要的，而这种组成骇人魂魄的答谢大阵则更属荒谬，他在中国成了牢不能破而天经地义的规矩，一种盼着花钱且不怕花钱的铁规矩。

我的律师经历不过八、九年，期间许多令人目瞪口呆的自以为于自己、于社会还有些价值纪念的遭遇，桎梏于对篇幅的瞻顾而没有能收入《故事》中，自以为是本书的一个精神性缺陷。

四 、 清理自我生命里的不洁净存在

《故事》书中，对我人生辙迹时间跨度颇不算小，而我自己人生的经历又颇不寻常，人生内容也可观得丰富，二十万字的记述唯能是线性的，而我再次要说，我喜欢《故事》这本书。

我感恩命运予我的苦难经历，也感恩命运又予我以记述这苦难经历的机会；更感恩于2005年起予我生命异乎寻常的苦难经历。在与中共恐怖组织冲突公开化的这十年里，我常处在亦真亦幻的经验中，有些经历常超出人的经验，想象中的地狱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十年时间，中共恐怖组织是殚精竭虑、尽心尽力地阻绝我与人世的关系。在物理领域他们是成功的，他们总能达到目的，取得令他们兴奋的大成绩，在这方面，他们总能挑选到最恰当的人选以实现他们的意图。那些不同环节上，执行不同意图的不同面孔的共同之处是，冷酷而不在于人类感情。在实现邪恶目标过程中的邪恶手段、实施方面精力充沛而心细如丝，可以营造出来的静可至死境，那种臻至死亡的静，常让人对于自己与人间曾有过的联系怀疑起来，有时竟时常寻索自己离开人间过程的细节，而不是对于与世隔绝现状的疑惑。那种经历很是特别，常常犹如在梦中，总觉着人间遥远无比。在书中，我只注重对实在过程的记述，而未能追述那些迷离恍惚中的感受经验。

有些自认为有意义的内容是因着顾忌篇幅的结果，而有些内容未能入书，则「是阻却于人性的软点。本书写成后时间又往去数月矣，外部物质环境不仅未有能良性的改变，反而更趋恶劣——无论大小环境。而自我对人性及精神领域的清洁、改善的努力还在进行中，尽管他是缓慢的，但总还没有停止。作为自以为遗憾的一部分，我将努力在这「漫谈」篇幅中予以弥补。

人性中可能有着本能的丑陋感情。终于准备揭自己不光明的经历时，一时思绪竟至枯竭起来，感情更是干涩无比。

1. 在自学问题上一时说了假话

我曾在1999年的一次记者采访中与记者说过假话——说我只有小学毕业经

历，初中至大学都是自学的，在这里，我将努力回述这个过程的真相，解放我自己。

人的虚荣是可怕的缺陷，而对由虚假换来的虚荣的侥幸则更是一场灾难，巨口便是偶然的机缘引起的，也会长期地予自己以不能摆脱的大压力，除非你能获得自我摆脱他的勇气。

1999年4月份，我正在北京办理一起上诉案件期间，接到一位采访过我的记者打来的电话（**据悉他后来辞职去了内地**），问我在北京期间会不会接受媒体采访。我只在北京工作几天时间，彼时并无媒体知道我的行踪，所以我未加思索地回答说不会有记者采访我。但我又追问了他为什么突然会问这个问题。他说他写成了一篇关涉我案件的文章，说把采访过我的事实改了一点，但向我保证，改得绝对对我有好处。在我追问下，他说将我从高中开始自学的经历改成是从初中开始自学的了。说为了使故事更精彩、更吸引人，并说「绝对对你有好处」。

我表达了我的异议，他却说：「已经来不及了，连大样都出了。」（**彼时我并不懂「大样」出了是个什么概念**）

又说：「又不是什么大事，在北京要有采访，你千万记住说成是从初中开始自学的就行啦，你要说得不一樣就害死我啦。」说完就挂了电话。

没想到几天后，由于参加了一个案件的法律问题研讨会，一些记者得知了我即新疆的高智晟而提出了采访请求，其中就有当时的《中国质量报》记者刘灿国。我想起了几天前新疆的那个电话内容，所以只答应于第二天见面时再决定是否接受采访，准备与新疆的那位记者进行交涉，结果那是个公用电话。

第二天与刘见面时，报社定了给我一个整版的报导（**其中半个版是我的图**），一见面摆开架势即进行采访。我担心新疆的文章闹出笑话，即把我从高中开始自学的经历说成了从初中开始自学。在这里，我要特别地向刘灿国记者及《中国品质报》，和读者们致以真诚的歉意！我向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讲了假话，这是令人羞耻的事件。这件事十几年里时时萦怀不安，这是个鲁莽的错误。

2. 愤世嫉俗心态下的小贪

1988年，我所在的喀什市拉丝厂是家乡镇企业，是从当时更穷的维吾尔农民手里集资数百万建成，是当时运动式上乡镇企业项目的一个坏结果。一边是「西北第一家拉丝厂」漫天海吹的宣传报导，外加一群一群的地、市、县「领导同志」

的参观闹剧表演，一边却是企业实实在在地全面地一路坏下去的局面。我看着就急，便与当时的市委书记苗世旺写了一封较长的信，指出企业生存及长远发展有碍的、显而易见的错误。我记得在信里，还谈到了改变之法。

彼时正值赵紫阳先生执掌中共局面，上下官员还没有进化至今天这般颟顸顽固而视人民为一切问题肇端的程度，至少，还未有「妄议中央」的昏令。

没过几天，苗世旺携主管工业的市委副书记王文、副市长张斌等，在那片天地里几乎所有的大员来厂里找我谈话，我提出承包经营该厂的想法，但当时不置可否，仅言及回去研究。这是我头脑简单的一个证据。这个穷困至崩溃边缘的小厂里，却有着以权力为背景的十分复杂的利益关系：当时政府主管副市长另有自己的打算，要在一个农场里调自己的一个亲信执掌该厂（**后来证明此举是置拉丝厂于死地的一个关键性步骤，该厂终于亏得血本无归而倒闭**），故而在那次谈话几天后任命我为副厂长，那是我一生迄今做过的最大的官。

厂里又一次处理了一批废旧钢筋，是本厂一个叫阿巴几的维吾尔人买走的。过了几天，我在往车间的路上碰见他，他将两百元钱一把塞进了我的上衣兜里，还没反应过来他就跑开了。我追问其故， he 说是卖那批钢筋赚了的钱，说你拿着自己买些吃的。当时一个月工资才一百多，两百元颇不算个小数目，无论如何我当时贪得了这二百元钱（**后来有人告发，给了上面一个借口，我被撤了职，退了钱**），这不是一件光明的事。

这件事后我下了车间干活，后来销售方面山穷水尽，又调我去跑销售。又一次，厂里派我去和田市处理前两年卖给一家物资公司的二十吨铁丝，指令说若你方再不付款即将铁丝拉回厂里。在把那批已在那家公司压了两年的铁丝处理过程中，我将超出厂里确定价格以外的两千元销售所得贪为己有，是彼时我个人所得最大的一笔财富，心里不安了很长时间。对企业不得自主经营，而庸官任意捏拿我们命运的现状有着愤恨，但又不能使贪得的两千元变得符合伦理。

感谢信仰使我生出重新检省判断这些不光明行为的心理冲动和能力。信仰使人得了新生命，活着的不再是过去的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清理生命里的不洁净存在，使生命尽可能地洁净，是基督徒的本分，是神对我们的义。我在新疆被囚期间曾多次考虑过将这些不光彩行为公开出来，但人太复杂、太有限了，终于在写书时没有能做到这点，延迟至今天。

五、中国维权人士处在诸多灾难中

还有些过程或现象要在这样的漫谈中提及的。这些年，外界于我有许多使我没齿难忘的关怀、支持和精神赞助之事，这是我要特别感谢的。但我总觉得我与外界赞助的情形有着若干差异，这也是使我不安的方面。

无疑，从俗世层面上，中国的和平反抗者，或者叫「维权群体」百分之百地处在灾难中，不仅因他们面对的是世间最为邪恶、最为凶残且最为无耻的、挂着政府面相的恐怖组织，还因着他们的周围生活着大都已为中共恐怖组织驯化了的，除了自私自保外，对任何苦难、道义、同情心这些人类独有的基本感情不再能有触动的人群。我这里并没有怨恨他们的意思，这实在是我们周围活生生的现实。这是恶政权恐怖统治的大成绩，也是邪恶得以畅行无阻的最理想环境。行走在这方国土上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无底线的自私堡垒。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灾难的条件。

看看前些年厚覆于陈光诚居所周围那些野蛮势力的规模及活跃程度，他们其实就是陈家周围的普通村民，一天百十来元钱，他们可以去做任何昧却良心的事。他们庆幸自己被派上了大用场，庆幸自己在家门口即能获得如此赚钱的美差。于陈家造成的人间地狱局面，于天良、于人类道义及人类声誉的无底线毁坏，悉与他们无关矣！我曾在现场亲历过那光天化日之下邪恶力量的惊心动魄。

1. 面对野蛮暴力纹丝不动

我们一行约二十多人去看望陈光诚，我车上有孙文广教授，动作稍迟缓了一些。一群年轻人已到了陈家巷子口，突然身后惊心动魄地大响动，回头一顾，我的那群同伴拚命前奔，后面一群打手疯狂地追打。瞬间，那群打手已扑至我身边，我纹丝未动，不仅足下，而且还有脸上的表情。我倒无意说我就是出类拔萃的英雄。跑，是彼时人的本能选择，却是最不恰当的选择。当时，群体地奔逃，刺激得流氓们亢奋不已而嗥嗥狂叫。

大略上，那天在附近的刘京生、马文都先生也看出了事态立止的效果。一大群人，追打者与被追打者，奔向同一方向。然而，所谓「同」实则不同，处境不同也。狂奔大阵所谓「卷土重来」，但到了我跟前却奇迹般停下来。那群打手惊异于还有人面对凶猛扑至的野蛮暴力竟纹丝不动，放弃了追打而朝我扑过来，且扑势凶猛，我的终于无动于衷使他们停下了脚步。稍顷，一人扑上来，我依然未

动，包括表情，他便跑到我背后将我的上衣撕得粉碎，仅此而已。这场丑恶大剧结束。

可以肯定的是，从那群打手的神态上判断，他们都是些周围的农民，他们是中国黑暗压迫力量最恒久、最普遍的承受者，一点蝇头小利，他们便不假思索地汇入这黑暗中，成为压迫良知的、最得心应手的凶悍力量。

2. 势单力薄的新手与邪恶强大的老手

中国的维权人士，不仅要面对挂着政府面相的中共恐怖组织和普遍麻木冷漠的民众，更要面对另一个更特殊的群体，即是国内外那群永远居高临下、手捏铁铸英雄托模、永做裁判的「批评者」。

中国的维权人士，不论何时何地，无论姓甚名谁，他们的对手则是同一的——中共恐怖组织。中国没有有组织的反抗者。于反抗者而言，不仅势单力薄，而且都是一露头即遭到野蛮打压的新手，而打压者则永远是邪恶经验丰富的老手。不仅如此，双方在物理层面上是完全地不对称。这些年的经历使人刻骨铭心地感受到这个黑暗的现实。作为个体，作为全无经验的新手，我们不仅被锁住了双手双脚，而且被置于完全与世隔绝的境地，而我们面对的不仅是物理层面上掌控着一切的打压维权力量的老手，更在于，便是于每一个细节，他都会动用庞大的团队来对付你。我们面对的局面不仅完全生疏，而且许多局面完全超出人理。有时为了实现某一个目标，他们会组成几十人，甚至是一、二百人，包下一座宾馆，几天几夜，甚至几个月、几十个月来对付你。

以我为例，我能得出的判断是，每至这种境地，我囚室的左右，一面是文走狗，另一面则是武打手。我们面对的局面实在是太复杂、太不寻常，有时几天几夜不让你睡眠。我的经历中，至少有过不低于七次的、大群人马包下一座宾馆对付我一个人（最短如2007年9月那次为两个月，最长的是在北京部队二十一个月，用于泓源的话是「钱花得海了去了」）。而对于手段：肉体酷刑、精神折磨，刻意营造心理战，用你的亲人，尤其子女的上学甚至是生命做恐怖要挟。在这种经历中，一个个体的承受能力实在是太有限。不亲身经历那种远离人世的环境，很难想象他的复杂及其黑暗程度，更不是那些永远置身旁观大阵，手捏铁铸英雄托模、头戴自制裁判冠冕的纸上巨人的眼界所能全视了的。有时，几十天、几个月、十几个月里，一大群人就围着一个目标，他们轮流着用无限余裕的时间与你

磨，手段是不计较的。

以我为例，每次开始时借着凶残的势头要价很高：「改变身分，否则思路一条。」但一般规律是，几个月后，大家都有个承受的极限，终于要有个结束的时候。于他们而言，几个月、几十个月下来，手里得不到任何东西是不能接受的。他们规律性地会退而求其次，用他们的说法是「必须找个台阶下」，给你换成一个较模糊的目标，让你写份东西，肯定共产党的领导或夸奖「政府」，或者夸奖围着你转了几个月的那群人。你会觉得既无耻又无聊，他们却不这样认为，会无限期地全天候与你磨，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时，几天几夜不能睡觉，人的意识常稀里糊涂，只要不是原则性的大问题，我会选择做些技术性让步，写些不痛不痒的东西，以期能赶紧睡一觉。有时一份东西要写上几十遍都不能令他们满意。从我的感情角度，写得令他们满意，实在是从石头里挤水——条件不能。他们也常为此气至歇斯底里。

我曾在昌平的一个秘密囚禁地提醒于泓源，每天夸你们的文章漫天都是，何必自寻烦恼？

于说：「那些文章他妈的狗屁不是，人就他妈的贱，这么多兄弟围着你忙了几个月，我们不能两手空空。」

有了多次这样的经历后，对于最近屡屡在中共电视台上「认罪」的那些被囚者，我对他们的理解没有半点杂质。顺便也提醒一下那些纸上巨人，多予他们一些理解、宽容，体谅他们处境的不易。

3. 邪恶势力不允许你做个普通市民

我前面提到我与那些赞助的文字不太相同，是因为我们，至少是我，照样有着自己无力割舍的利益需要计较，一些过程的发生与我们对当局的无底线邪恶认识不足有关，以至于出现了耿和她们娘仁被抄家后只剩下三百元钱，生活立陷绝境的情形，这是我完全无力承受的。若她们娘仁需要时，我会毫不迟疑地舍上性命去保护她们，后来中共恐怖组织阻止孩子上学的事则更是我无力承受的。孩子是无辜的，由于出生这一事实，我们无可选择地成了他们幼年生命的条件，这种生命的条件当然包括满足他们受教育的条件。我们反抗邪恶势力，也含着为了孩子的好将来的考虑。毁灭我自己利益后果的心理准备是坚定的，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但绝不毁掉孩子的生命前程，不特无力，也无权将这样的局面予孩子们而无动于衷。

2007年至2008年间，我是做过彻底放弃几年打算的，以期保障两个孩子能继续上学。无奈，周永康等中共恐怖势力在这个问题上太贪得无厌，要求我必须改变身分，哪怕在形式上。用他们的话叫「一次一包兜」，即孩子的上学、全家的北京市户口安排、孩子将来的工作安排，外加一笔巨额的利益，终于，逼迫我们将当时毫无把握的出国突围置于选择中，以求置死地而后生，把所有压力交给了耿和一人。

在这一年多的周旋中，我确实有过暂时放弃的打算。你想做个普通市民，而邪恶势力却不允许。

「你不改变身分，我们就不踏实，对我们而言，你始终是个悬着的问题。」这是于泓源的话。

4. 于可爱的女儿有个恶人父亲

于名义上是项目组副组长，但周永康作为组长却并不具体管事，而有周永康的狗头旗在手，于可以呼风唤雨。可以调动包括北京武警部队在内的公、检、法任何权力资源。于手中还有一柄大令牌是，他捏拴着北京地区镇压「法轮功」的大权。中共恐怖组织将法轮功的存在上升至危及其政权高度，为了保障镇压效果，他们赋予每个地方的镇压领导者以无限的权力，使得于对维权人士的打压有了得心应手的条件。

阿伦特认为，极权体制只有一个方面绝不出差错——挑选恶人，这是一个正确而邪恶的能力。

我近距离与于泓源打了几年交道，作为个体，我并不恨他。他特别爱他的女儿，这是我替他哀伤最多的一点。这真是一种不幸，我还是感慨人类的复杂及有限。他如此爱他的女儿，却不知道何以爱她才符合孩子的长远利益。便是你真的迷信中共恐怖组织能永远庇护你作恶，使自己可爱的女儿有个恶人父亲，这对孩子单纯的爱是怎样的一种亵渎。不对自己的贪婪、凶残人性予以一丝的控遏，怎么可以引领孩子走向美好善良的人生道路。拚上人性、天良往上升，做个大官，真的就符合你对孩子的爱？

六、书写禁书的「中国特色」

将要出版的三本书内容未必是有趣的，但于他们有关的有趣现象却很是可

观。由于中国目前的非人间环境，一些颇有价值的有趣过程暂时还不能原貌地公诸于读者，这又是一个令人扼腕的遗憾。

这几本书写的隐蔽过程就很有趣。

1. 你整天关着门我心里就发毛

今年8月底的一天，大哥一边敲门一边急切地喊着：

「老三，快开门。」这种急火火的情形还是第一次。我打开了关着的门，一脸愕然的大哥闯进来。

「老三，他们（指中共国保）说你写书了，是不是？」劈头便是一句。

我笑着看着他并不回答。

「他们说你写书啦，说书已经转给格格娘的了，是不是真的？」他又大声问。

「有事坐下来，大哥。」我说。

大哥坐了下来。

「你整天关着门我心里就发毛，写书这么大的事，我怎就一点都不晓得？是他们胡说你吧？」他一坐下来又问。

我笑着说：「大哥，当今世界有两股力量阻扰我回北京，一股是共产党，一股就是你。当今世界有两股力量最怕我写书，还是共产党和你。」

「这时候啦还说笑话，你就永远没有个愁的时候，弄出这么大的乱子，你跟没事一样。」大哥一脸不悦地说。

大哥沉闷了几天，他没有等闲看待这个在他眼里的大事，急急地召回了四弟商讨对策，而终于不能得出令他们满意的结果。

我是不改每日见面时的嘻嘻哈哈，而内心的不安是有的，我无力依着亲人期望的方向行走——尽管他们全是为了我的好，为此半年来我一直哄骗了他们。「关着门看书是我历来的习惯。」每次问我时我总是这样回答他。

有时看着大哥的背影，心里常有一些难受生出。冬季每天为我劈柴，有时还哼唱着晋剧或秧歌声。看着自己「胆大包天的弟弟」（他的话）终于循规蹈矩且实实在在地坐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而与世无争，他常喜形于色。每天抱柴、生炉子、加柴火、掏炉灰，总是乐此不彼。

「在村里，养你一辈子大哥也愿意。」这是去年回到家里时他说的。

「有些哄骗是不能避免的，我自己也无能为力啊。」我心里不止一次地重复过这句话——面对这件事，面对这大哥。

2. 一支笔让五百个师干瞪眼

心理有时更多地是环境的产物。「中国特色」在这个时代的这片土地上是无处不在的。关着门写，是这三本书书写过程中贯穿始终的「中国特色」。这关着门写是必要的，他实在并不仅止于心理方面的需要。刚回村里时，已明身分的人员两天中数日闯入窑洞里，冲突由此而生，后来当局改成了每十至十五天进一次窑洞，其余时间则均在外面守着。这种环境里，写作过程的全身心防范是必须的。十年里的特殊经验能得出的结论是，中共恐怖组织对揭露真相的文字是超乎寻常的恐惧。

写至此，突然记起了在北京的一次与蒙面人物的谈话内容（**不报姓名，不报身分**）。谈话中，对于我问他们为什么怕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对曰：

「你手头要有点铁我们倒不怕，你有一百个师，我们就两百个师弄你。可你手里的只是支笔，五百个师也只能干瞪眼啊。」

「你们手里的笔岂不是更多？」我回了一句。

「老高，咱关着门不说假话，现在让政府养着的文人确实是多了去了，都他妈狗屁不是的饭桶，他们丫的文章什么时候掀过一点动静，常他妈连替政府招架一下的能耐都没有。」他说。

「狗屁不是的饭桶你们还养着干嘛？」我问了一句。

「这你就不懂了，统治术，我自个儿也不太懂。共产党他妈的快完啦。灭一个拿笔的人，怎么说他妈的也比灭一百个师要容易得多，可硬是他妈的灭不了，事越弄越大，越弄越复杂，越弄越被动，当断不断，不敢下狠手，不他妈全盘输完才怪呢。」他激动地说。

「就他妈缺了一个「狠」字。」稍停了一会他又补了一句。

3. 隐蔽书写的二道防线

对于作恶，犹邪灵附体般不顾一切地去做，作恶后犹邪灵附体般不顾一切地去掩盖罪行。流氓身上穿上了西服，实在不大方便得可以。

便是穿上了西服，流氓终于还是流氓。这一点，我们比他们还要清楚，对他们的防范不可有纤毫的疏忽。书写的过程中，始终保有着「中国特色」的极敏感的警惕。

大哥养了一条土狗，其性情颇似我《故事》书中提到的万贵君，便干脆赐名为「万贵」。「万贵」于书写中的安全防范发挥了历史性的功劳，这「万贵」土狗的地位当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牠的警惕，甚而至于「绝对忠诚」认真尽职程度绝不在中共文武走狗以下。「万贵」于陌生人的「礼遇」是有别于寻常的，稍留心是能够听辨出来的。每得「万贵」的报警，我便会在数秒之内将伏案写作的情景切换成看书的画面，从未有过差错。几本书终于得以成就，「绝对忠诚」的土狗万贵功不可没，其精神足可与山上守着的那群「绝对忠诚」者匹比，这是第一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就是整日朝里关着门，以防突然地闯入，包括我的家人，这种安保作用于终于成书也功不可没。

4. 山村黑夜遮覆下的秘密会面

写作过程的另一个隐忧是，终于写成书如何把书稿发出的问题。感谢神！这个问题很快得以意想之外地解决。我居住的山村及山村黑夜的实在，为这种解决提供了条件。

这僻壤山村，却有着无数与外部世界联通的小道，虽然大都曲折而阒寂。山村里是黑暗理想的处境，厚实的黑暗是这里黑夜绝对的统治者，无边无涯而不受任何动的或不动的光的搅扰。而这里独有的冥界般的静寂，更赞助了山村黑夜的幽深。

我于每天必临的黑暗里长大，素不喜欢这里的黑暗。这黑暗遮覆着数不清的、使我整个童年胆战心惊的传说。而写书期间，在这黑夜里发生了的故事，改变了我对黑暗一贯否定的看法，甚而至于成就了几次颇不寻常的见面。这不寻常，首先在于我已有六、七年的时间与外部世界隔绝，另一个几近惊心动魄的不寻常是，几个批次的不同面孔在黑暗里的出现。这是需要胆量和风险心理的，而更多的则是黑夜里山路的危险和艰难，便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于黑夜出行也非易事。来者都是些我不曾见过的面孔，无一例外的是，见面过程犹久别至亲般，来者大都激动、兴奋，灯光下，笑脸上挂着的泪珠闪闪亮亮。

尽管充满了危险，但这种不寻常的见面拓通了我与外界的联系路，使我获得了成就心愿的条件，但代价也是无以估量的，他们中的两人迄今仍在中共恐怖组织的死牢里。一个中国人去见另一个中国人绝对不是罪，恐怖的黑帮绝不会以此名义囚禁他们，但各方在想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些高贵者的代价是绝不会白白付出的。

七、「中国特色」的苦难

一些回到这里后目睹、耳闻了的问题久久萦怀，使人痛感中国问题的沉重以及他的幅面和深度。相较于改变恶政权，这些问题的改变更加艰难、持久及复杂，这是极权统治者的必然结果，又是极权制度生存的理想土壤。

1. 农村老人弃养问题

首先是农村普遍地弃养老人，丧失了抚养意识的问题。有些活生生的弃养事例泯灭人性、蔑视天良，老人的无助处境常让人痛心，有些就出在我的亲属圈子里，有些逆子就是我儿时的伙伴。我常愤怒难抑而又终于无可奈何。有时也绝望地穿行于其中，企图为老人挽回些活下去的条件，然而每必灰头土脸。儿时快乐伙伴面孔早已恍如隔世，变成了一个个面目狰狞的、坚不可摧的、自私而冷酷的堡垒。

中共恐怖组织六十六年的反人性统治，的确在中国是得了大成绩的，制造了数不清的「中国特色」，中国农村地区老人晚年的无助惨境，即是极沉重的「中国特色」。首先是结构性地没有养老金社会保障，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支柱性亏欠。无论老人如何「含泪感谢低保制度」，无论党媒说得天花乱坠，可农村老人们没有养老金确是实在的。从道义上、从人类伦理上以及结构性的社会矛盾面上，这都是个大问题，是个异常严峻的大问题。这些问题的继续，延续着老人的苦难，更延续着他们对这个社会的绝望。而社会拥有这样的病态现象，也在普遍地强化着人性的麻木和冷酷，人伦、道义及道德就在这种习以为常的麻木和冷酷中与人群越来越疏远开来，与这些大问题互作因果而互相强化，继续恶化着中国社会的病痛。

我这些文字不在于揭露这种荒蛮的社会问题，而在于外部智慧如何冷峻面对这些问题，于2017年后全面地医治设计路径问题。相比较之下，未来对老人的生活保障补救是个技术问题，而何以在制度设计上干预、医治晚辈的人性冷酷，以及视人类伦理感情、道义及道德感情如敝履的问题是长远而棘手的。

2. 麻木自私的凶残面相

最可怕的是不仅在中国农村，千百年来为人们在乎着的、传统的名誉评价氛

围及其功能已丧失殆尽，人们变得越来越疏离，而当维护蝇头私利需要时，人就会变得可怕地凶残。

我在同村有一个近亲，儿子、儿媳悉为弱智，儿媳双眼是瞎的且先天性地不能说话。我这亲戚对待儿媳的凶残、冷酷，常使我和四弟愤怒而苦恼连连。残障人士是何其不幸，而生活在这时代中国的残障者则更是雪上加霜。我们盘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试图将她送进福利机构，费用由我们设法负责，可又碰上了「中国特色」。生活不能自理的残障者，福利院、养老院都不收纳。我们天真地以为把她所需的生活费付给亲戚，情形会变得稍好些，不料，每年生活费照拿，可人饿得不成了形。我们又将给钱改成了买吃的送给亲戚，可情形还是一路地糟下去，饿死她仅剩时间了。我数次打电话恳求她的生母能救她而被拒绝。因着她的生母扣着她的残疾证不松手，自己领取残疾费享用，而我这亲戚铁定了心要回这残疾证，你不给，我就饿她。其实，全部残疾费用一年才几百元，两家都没有穷到必须依靠这几百元。而四弟每年少则几百或千元生活费予亲戚。

人一旦缺了基本善良，再加上无底线的自私，就会变得凶残可怕。终于不得已，后来改成了四弟掏钱买食物，由我每天负责送一次看着她吃完，已有半年了，就这么维持着她的活命。我常在于她送吃的路上思考着，未来政府、社会必须建立起普遍的、敏感的有效救助机制，帮助那些生活最不如意的人群，认真诚实地救赎，六十年来，我们社会于天道的可怕亏欠。

这些现状使人不安的是，我们未来如何使人们在乎来自同类的名誉评价，如何有意地在人群中培育和呵护人性的善良，这比任何制度更善良。当有组织的行善不再「危害国家安全」时代到来时，专门性的NGO以及密布小区的教会组织，将会呈现无限量的大作用。我们要使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获得及时而具体的帮助，这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声誉和福祉。我想，这会是未来政治的重中之重。忽视了这些生活中的无能为力者，最伟大光荣的政治都是扯谈。

3, 综合执法检查站」交警拦路抢劫

尽管是远乡僻壤，可黑暗的、且完全私化了的权力依然是这里一切的主宰，而他在一切领域都是肆无忌惮的坏榜样。

今年8月底，又有人深夜来找我，打开门，进来两人作揖问好，是山西吕梁地区两名个体运输经营者，说是在太原上访时获得了有关我的信息，白天不敢

来，而夜里摸黑到来（所有来找我者，包括当地官员都是黑夜而来，这都是「中国特色」的常识）。与他们聊了大半夜。我首先告诉来者，找我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对此他们说完全明白，只是想找我吐吐心里的苦。我并不需要向他们瞭解什么，坚信我们有着怎样邪恶的政权，即可确信无论在什么领域里必会有着怎样糟糕的坏现状。受害人的血泪控诉，不过是坏现状在某些领域的具体化而已。便是这漫谈里，我依然需要顾及这篇文字的篇幅问题。

大略上，他们在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跑遍了山西、内蒙古、陕西、河南、甘肃几个省的大部分地区，从客运领域到货运领域，终于到现在的上访专业户。我已经极少为中共恐怖组织在各个领域的反动及反动的野蛮现实感到惊讶，但于他们的叙说，仍使我感到一种焦虑和不安。他们经历的黑暗现状使他们绝望。而为他们所讲的各地交警的滥权，遍布各地的「综合执法检查站」的拦路抢劫，以及权力与黑社会结盟垄断客运运营权的现实最使我印象深刻。他们说这「综合执法检查站」是最近十年里陆续出现的。

「那就是土匪抢劫，可人家是共产党的，弄死你你也没有办法。」其中一位说。

「各地都一样，说是综合执法的，可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上面写着综合执法的警车在你前面一横，一句话也没有，他们知道你明白他们要什么，你就开始给钱。给得少了有时就破口大骂，赶紧再加钱，给到满意了才会很不高兴地把车挪开，再去等下一个倒霉蛋。」

另一位接着说：「又一次刮大风，半夜在甘肃西峰市被堵住，我赶紧跳下车递上五百元钱，嘴里还讲着好听的话。他们嫌少，一把朝上头（指空中）把钱给扬了（指扔了），我和儿子当时就急得嚎了。嚎顶甚用？最后就要走了一千七百元，等于两千二百元白扬了，啥条子（指收据）也不给你。有时他们把车一横，连车都懒得下，把车窗摇下来，钱给不够不挪开，这种事跑一趟车要碰上好几回，没个尽头。」

4. 拉一车沙子就不罚款不扣分

他们讲的另一个普遍现象是，所有沿黄河的县里，都会有交警队的领导经营大洗沙场，每过一县，交警会堵住你要罚款扣分，然后提出让你拉一车沙子就不罚款不扣分。说长途司机最怕扣分，就不敢不答应。

「你说我们满满拉着一车货，咋买你一车沙子，就是是空车，我们要一车沙子干嘛？他们就说沙子拉不拉都没关系，把一车沙子的钱交了就行了，每个县都这样，十几二十年里就这样，谁也没有办法。」他们中的一位说。

5. 独霸客运线路经营

最触目惊心的是客运行业，他们原来在离石市到太原跑客运，用他们的话说是「硬给打怕了」。他们说现在各地所有线路的现状都一样，都是心狠手辣的黑社会老大与权力勾结独霸线路的垄断经营，不了解这种黑内幕的新客运户，被弄得家破人亡者各地都有。

「我们认识的人中间被白砍掉手、砍掉腿的人，到处都有（2006年，我与马文都先生遇到事故住在河北定州市，来找我的访民中，就有一位被砍掉半个手掌的个体运输户）。地级市的每条赚钱线路，那些黑社会都是和省里当官的勾结，连当地的领导也不敢惹他们，太黑了。」其中一位说。

对于这些现象，我后来有意地在不同时间，与村里人攀谈中进行了求证，结果在料想之中。

6. 看看警察来了会收拾谁？

写至这里，使我想起去年春节来看我的一位远亲，在亲缘上我们很远，但我俩却很亲（北京的国保头子都知道我的这位远亲，在最危险的时候也经常来看我）。

我这亲戚的妻子在分娩时大出血死亡，他将孩子背在背上在山西打工，后来买了农用车打工，再后来成立了工程队承包工程，积累了几千万元的财富。

2007年，黑帮两会期间我被带离北京，至山西太原时住「长风大酒店」。为了看我，他晚上也悄悄住进了那个酒店。当天夜里发生的事几年后他才讲给我，怕我不愿忍受而把事闹大：

隔日早晨，他发现自己的车门被撬开，里面几千元物品被盗，但未敢惊动我。他与酒店进行了交涉，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他目瞪口呆。酒店态度蛮横，他被迫说要报警，不料酒店负责人说：

「你现在就报警，看看警察来了会收拾谁？」

我这亲戚是老实人，他不信天下还有这种黑白颠倒的警察，便报了警。警察

出警效果真高，几分钟便到。一名警察一下车即大喊，问是谁报的警，他赶紧跑过去接茬。

「把你的驾驶证、行驶证、身分证拿来。」警察命令道。

他又赶紧递上这些证件。

不料，证件一到手，那警察开始大骂：

「你妈逼，谁让你自个儿把车门撬坏又诬陷别人，跟我去派出所接受犯罪调查。」

他当时惊得不知所措，警察走过来指着他鼻子继续辱骂，并开始动手拉他。这时，一个酒店保安上来劝他，说到了派出所你会吃大亏的，边说边把他拉进了酒店大堂，让他赶紧在大堂柜台上买两条软中华香烟送给那个警察，不然今天麻烦就大了。外面六百元一条的中华烟酒店卖一千二百元。他也管不了那么多，赶紧掏钱把烟买上递到警察手里，在众人的围观中，接过两条烟的警察一把把他的一堆证件砸在他脸上，用山西口音来了一句：

「太原是个法治社会，绝不允许你们胡来。」然后径直走进大堂，把烟往柜台上一扔，柜里人赶紧把钱递上，警察接过钱昂首挺胸上车离开。

我的这位亲戚说他那天一连几个小时就坐在车上发呆。浑身像散了骨架似的。几年后向我讲述完后他感叹：

「在有权人的眼里，我们这些人连狗都不如，他们可以随便胡来，谁也没有办法。」

7. 小官赖账，检察院诬陷清白人

去年8月底他来看我，听村里人讲，他被一家县检察院绑架，在先后两年的时间里多次被囚禁，囚禁地就在检察院的地下室，第一次关押后花了好三百多万元才放人。原因是他借给当地一个小官三十万元钱，那小官赖账，说是行贿而非民间借贷。检察院不抓受贿人却抓了他这个被诬陷的行贿人。陆续关押了两年，财产被敲诈殆尽，最后又被罚款五十万元才放人。

我当面问他，他却说：「死也不能给你讲是哪家检察院干的，我早就给你们家的人安顿好啦，谁也不会给你讲，你也不用问，问谁都不会告诉你。」

果然，我问家里人，问谁谁都不知道。其实，知道了又能如何？

「你自己被冤枉关了十年了，不也是白关了吗？」这是大哥的话。

8. 农村传统道德与秩序之死灭

感谢神给我这些年的特别经历：先是在中共恐怖组织私设的死牢里，又在中共军队私设的死牢里，后来又转至中共恐怖组织的挂牌地狱里，终于又回到农村。我虽在农村长大，而与之疏远几十年矣。

中国文化中有些东西值得思考。与世界多数国家不同的是，塑造中国文明的决定因素始终是强大的国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强大的政府从不受法治的约束，这是统治者随心所欲的原因。两千多年前的万里长城，或是当今宏大的形象工程，无不是普通中国人民的牺牲和生活换来的。从古迄今，有谁能拒绝得了来自冷酷权力的驱策。

短命的秦王朝在事实上定义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秦之后，于专制政治而言，中国的政治制度在结构上是没再发生什么变化的。只有个别朝代在制度上做过技术性微调，而其目的也不外乎是为了使专制制度更加地精微而更具长久的生命力。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针对专制政治的变革实践。最著名的商鞅变革却是集权专制政治的发轫。此后，也有过北宋王安石中途夭折的变革事件，也旨在技术上寻求力挽神宗年间已明显地一路衰颓开来的北宋专制统治。统观中国历史政治以外，支撑人类文明发展的社会、经济、哲学和道德诸领域，在过去两千多年里竟没有发生过任何结构性的，或划时代意义的变化，尤其在中国的农村地区。

中国的历史，实质是同质政治王朝的循环史。王朝的创立者集才干与魄力于一身，其后便一路地腐败衰弱下去，直至被又一个集才干与魄力于一体者率领的暴力集团推翻，王朝又开始了大家所熟悉的循环。个体权利、作用、命运悉被淹没在宏大而冷酷的循环里。

与中国不同，西方文明历史中，始终贯彻着对个体权利和自由重要性的强烈认识。回顾西方历史辙迹，始终存在着对普遍人权的主张和尊崇。便是在他们的艺术、宗教和社会政治生活中，今天的我们看得见、感觉得出其中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表现和表达，尤以近代西方文艺、哲学、科学诸领域的巨大历史进步，无不成就于个人自由、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大背景。而在中国，从秦汉迄今，政治官僚化、社会层级化，在两千年里一路强化而来。政治始终作为赫然扭曲的病态存在，提挈主导着中国历史在时间上的进程。1949年后，进入这种病态历史的最糟糕时期。

中国农村地区在家庭或小农经济及大家公认的，且大都在乎着的道德评价现

状中，原地踏步了数千年。实际上，几千年来，农村地区与专制政治存在着的联系也只体现在劳役和税赋两个方面，其余方面的专制政治与农村并不发生关系。大家公认的且普遍在乎着的道德评价规矩及其起普遍作用的习俗，才是几千年里中国农村真正的政治，他古老、封闭、保守却稳定而起着实际的作用。这些在数千年来使农村地区社会得以存活的东西于1949年被彻底摧毁，取而代之的是假大空、冷酷、自私、厚颜无耻，流氓无赖大行其道，极适合极权专制体制生存所必须的、大家早已熟悉了的那些东西。中共恐怖组织由农村地区犯罪起家，所以他历来重视农村于其独裁权力延续的作用。他对农村传统文明的摧毁也是最彻底、最干脆的。现在在农村，泼皮无赖成了公认的力量，成了无阻的规矩，泼皮无赖得越干脆、越彻底就越有力量。我在这儿住了一年，有着震撼性的感触，具体事例不胜枚举。尤其，一些半吊子泼皮无赖，用这里人的话说是：

「这种人最怕共产党，可他们成了共产党最喜欢的那部分人，现在根本就不管他们，只有他们打死人才可能管一管。」

这是农村传统秩序死灭而整个道德摧毁后的新产物，没有人是无辜的。

9. 笑贫不笑娼的社会

我邻村同学的文盲妹妹，被市里一个教育局长包养而使一家人鸡犬升天的事，人人口口相传是因为羡慕。我在亲人中间，一年里总要听到几次羡慕的声音。

前几天晚饭时，大哥又絮叨起我这同学一家的光荣来：

「一个字不识，她（**我同学的妹妹**）一个人至少拿着三份工资，全家住在城里，不用干活，要啥有啥。」

这里只剩下一种美好——发达的结果。不论实现这种结果的路径及手段是怎样的无耻和怎样的伤天害理。

在所有的生命世界里，独人类具备了拥有道德的能力，这当是使全人类以为自豪的能力，是独人类具有的光荣，却被我们完全地丢失了。

10. 《东方红》作者为魔鬼脸上扑粉

可俯瞰黄河威势的佳县城畔，正快速崛起全县最宏伟的建筑——死人李有源（《东方红》的作者）纪念堂。文盲李有源生前所在的村与我的村隔沟相望。共产党与农民实则是一种抱团抢劫的默契。穷人李有源做梦都想不到他会不花一分钱而得到别人的土地，共产党抢来后让他种了几年（众所周知，到手的地后来又被收了回去，李有源们的处境更加悲苦）。他唱出了那首使共产党、毛泽东用来遮堵自己鬼相的歌。抢劫、杀人、放火、昧灭天良，成了光荣、伟大、正确而被公开地普遍地赞美。这些倒置了的逻辑、感情，成了六十多年来农村道德价值判断的新基础，是毒树之果。

「共产党财大气粗，几代领导人没能做的事，习近平一上来就拨了几个亿给李有源纪念堂。」一位来访的战友如是说。

「财大是真，气粗则未必。物以稀为贵，此举恰好证明，像李有源一样感恩戴德地为魔鬼脸上扑粉的糊涂蛋实在是少得可怜，此举正是气不足的表现。」我回了他一句。

中国今天所有的坏局面悉导因于恶政治，可普遍存在着的坏局面却不再全是政治问题。另一个在人群中普遍缺失的东西是诚实信用问题，这是正常人类群体必须有的东西，却被我们完全丧失，这已是全人类有目共睹的可怕现实。在这样的漫谈里，我不必再谈及具体的事例来证实他的存在及其祸患程度。而如今在共产党恶政后，在中国社会重新全方位地培蓄并积极保有人与人之间的诚实信用的路径设计是个当务之急。从硬的约束规矩，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道德评价氛围的强势存在，需要更多地开始讨论、设计、思考及研究他。这又是一个关乎民族文明前景及我们的孩子们未来有尊严的福祉的大问题。

八、专制政权宝爱的东西

托克维尔认为：「在人性的所有恶中，专制最喜欢利己主义，他颠倒黑白，把齐心协力创造社会繁荣的人称为乱民歹徒，把只顾自己的人称为善良公民。」

极端的黑暗政治已接近最后的边缘矣，或最后毁掉中国社会或终于使自己灭亡。睁眼看看今天中国的情形，从官到官喜欢的那部分民，仗着各自抵抗力十足的脸皮，各种反文明、反人类伦理的丑行随处可见。

1. 明朝东厂和锦衣卫复辟

统治者贪婪、怯懦、残忍又荒谬，他们彻底地丧失世间每个政府都最想得到的东西——信誉、荣誉和尊重，而不肯自知。仗着牢不能破的自私和坚如盘石的自利，凡无耻之事无有不敢为者。官员从上到下，道貌岸然的外表裹覆不住异常卑鄙的心肠，荒谬绝伦的事得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得耐心而认真。昂首挺胸而人模人样，精心凿饰下的仪表，不仅使一些糊涂蛋对他们的坏人性产生了脱离实际的错觉，便是自己也竟相信起自己的高尚来，因而笑料迭出。他们把文化、财富和权势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并决心永远地世袭下去。

他们整日里警觉着，以无底线恐怖手法防堵人们看穿或说穿这个社会的病态或本质。中共恐怖组织抢得政权后，民主宪政成了公开的禁忌，明火执仗地与自由民主为敌。近年来，为了达到目的，使用开了在明朝以后被抛弃了数百年的野蛮暴行，特务统治横行无羁，未经审讯的囚禁、公开的暴力绑架、骇人听闻的酷刑拷打已遍地公开地实行起来，人民不堪其苦，却绝不允许公开表达。

只要有人类生活的地方就会有矛盾及公认的矛盾化解规矩，这是最普遍的人类常识。矛盾不是见不得人的现象。正常人中有了矛盾，用野蛮的暴力手段掩盖矛盾犹如以纸包火。这暴露了他们对人类世界复杂的全然无知和令人目瞪口呆的愚昧。

2. 现代阉宦魏忠贤者流及其干儿女

再看这些昏官周遭为他们所宝爱的走狗级及后补走狗级群体是些怎样的精神畸形物，尤其被贪官脏吏全天候宝爱着的几位先锋走狗，胡锡进、孔庆东、司马南等毛左分子，已沦为全民的笑料。他们个个以为，有了一张刀枪不入的脸皮即是有了所向披靡的威力。而像「爱国青年」侯聚森、杨三才这类后补走狗，则更成了当下国人饭后茶余的笑柄。

我似乎记得是熊培云先生说过的，大致意思如下的话：

「奖恶惩善、劣胜优汰的专制限制了他们发挥灵魂深处的『天体力量』，毛左分子们的特征是盲目排外，打着爱国和民族主义旗帜，干着伤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红卫兵暴行。他们骨子里欺软怕硬，在爱国主义表演上总是选择最安全的方向，对没抵抗力的假想对手慷慨激昂，实际上是爱国主义旗帜下的瞎起哄，他们组织偌大的群体攀附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对于与主流媒体不一致的声音乱扣帽

子，让自己的卑劣本性有机会释放。对于祖国的种种不公和恶劣之处，他们不敢或不知如何言说，因为祖国有着强大的国家机器等着他，是欺软怕硬的爱国，是披着硬盔甲的软骨头。」

今天中国的权贵势力，绝对权力已使他们精神中枢功能退化，公开且明显固执的蠢行总是使人目瞪口呆。现状显明，今日恶官的智商总在明末阉竖魏忠贤以下，而他们周遭的走狗及后补走狗的智商则更在他们以下，这使他们丑行众知而不能自知。

阉人魏忠贤一朝权在手，成群的干儿干女以有着这样一号非男非女的干老子为荣。终于将这弄得民不聊生的阉宦塞进孔庙配享祭祀，则是类如当朝的花蝴蝶、周带鱼式人物的勋业。专制体制下就这类东西疯长，而中国素不缺这种人格畸形文人，无耻加无良，是他们的全部家什。

写至此，则不免要提醒正处气焰盛张季的、今天的魏忠贤，及那群视有权的魏忠贤若亲老子的假脸人格阉类，请留意一下魏忠贤们后来的下场。

那些伏在权力主子影子下摇唇鼓舌的文人，他们的举动看似猛烈实则卑怯得可观。清一色地都是些精神上发育不全的畸形物，他们的跳踉丑态使人饭喷，个个在自我欣赏和相互吹捧中得到卑鄙的满足。他们无例外的拿手好戏是歌颂服从，褒扬盲目。扑灭自由、个性和创造是他们对主子的天职，他们从不为主子究竟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具体美德而争论。只顾竞相赞美死尸的雅静、安娴——赞美死尸至为和谐的雅静、安娴及安娴的雅静和谐。他们将人类公认的野蛮和无耻硬说成是「中国特色」而加以热爱。他们对公认的的身处卑鄙无耻境地心安理得。今天的中国，这种扭曲畸形人格者随处可见。昨日浦志强先生被陷罪后评论的第一条就是「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与这种不通人理的流氓去争论，不仅徒劳，而且使人痛感力不从心。无耻方面，与他们的恶主子难分高低。

3. 独裁者的鼠目和奴性

亨廷顿说：「在制度化的公民政体中，升迁至顶层使一个人眼界开阔，而在专制体制中升迁到顶层，反而使个人变得鼠目寸光。」

独裁者不仅鼠目寸光，其本身都是货真价实的奴才。居权位则骄横暴虐，失之则奴性立现。远若北宋徽宗，被掳后立成一个成熟的奴子，与他居位时的暴虐判若两人。

我在军队秘密囚禁期间听那些士兵讲：「那些双规后当官的贱得让人恶心，他们好像不记得自己该是个人。」

我周围的一些普通村民，对中共恐怖组织总是与那些全球公认的坏国家抱团感到不解，更对他们在国内总是迫害有良心、有责任的人士不理解。其实，这是必然的——人以群分是个规律。

希特勒「无与伦比地尊重」的唯一一个人是「天才斯大林」（见《希特勒餐桌谈话》，页113），而恶魔斯大林只相信一个人，那就是希特勒（见《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

希特勒曾说：「我是一块磁铁，常常在德国移动，吸引这个民族中的钢铁。我常常指出，总有一天，德国一切有价值的人都会在我的阵营中，凡是不在我阵营的人都没有价值。」

独裁者必视自己就是逻辑和真理本身。这也是他们只要还有着力量，即会忠诚地履行那些被公认的反人性制度要求而无良心、负担的所在。

中共恐怖组织对中国的血腥统治，已历史性地进入了最后的阶段。我在这里仍想再次警告你们，你们已在每个过程中留下了恶政权戕害文明的罪证。历史将与受害者一道，记下你们这个反人性政权压迫人民的黑暗统治的所有踪迹。你们今天的所有暴行，都将成为2017年后特别法庭对你们定罪量刑的具体证据，你们的犯罪行径必将受到具体的审判。

九、独裁者很难以史为鉴

社会的变革总是滞后，这是人类历史数不清的灾难渊源。

法国大革命前夕，为新思想影响的一些法国政治家，也曾试图以和平改革的方式改变法国的旧制度，却被当时的权力集团死抓住权力不肯松手，且不肯妥协，在屡试受挫后，终于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路易十六同志去了断头台通向的去处。

1905年，俄国独裁政府开枪射杀和平请愿的人民，是为俄历史上著名的「流血星期日」。这次开枪事件像中国的「六四」屠杀事件一样，断送了统治者与人民和解的可能。当年爆发的俄国革命迅速席卷全国，黑海舰队发生兵变。俄国国内所有阶层和势力都起而反对反动的独裁政府，争得了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还组建了民选的国民议会。

历史的实在示教是与独裁者不大发生联系的，于是便有了齐奥赛斯库的下场，于是便有萨达姆、卡札菲的去处。

十、真理使人自由

中国今天的许多坏局面为人们所谈论，可很少有人谈及中国社会可怕的信仰缺失问题。中国人群中信仰的普遍缺失，是黑暗政治可以追求的结果。而信仰的普遍缺失现实，以及他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伤害的深刻及长远性，却被大大低估了。就长远改变中国社会目标着眼，实现在大部分人群中建立普世宗教信仰的目标，比改变恶制度更有价值。但极权专制体制既是今天中国社会荒漠化原因，更是建立普遍的良性宗教信仰最根本的现实障碍。野蛮的政治使人们长期隔膜。无论这个社会有多少人，大家都生活在绝对的隔膜中，这便是无论发生什么味灭人伦的压迫，大家都会屈从的根本原因。

阿伦特认为：「专制在本质上是害怕被统治者的，所以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隔绝是长期存在的可靠保证，并总是倾其全力使人与人之间隔绝。」

托克维尔认为：「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想要自由，就必须信仰宗教。」。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政治纽带功能全无，道德则更崩溃久矣。类似情形下，唯有宗教是这种社会免于崩溃的最后可能，而我们社会里的宗教是早就被恶权力摧毁了的。使民众的品行发生深层次之变化，关涉未来中国国家命运的根本。保证这种变化良性发展的前提是，尽快建立普遍而有普世价值的宗教信仰。然而，这在2017年之前是不可能的。

1. 无信仰者之内心黑洞

今天的中国社会，人类群体中光明磊落、相互信任、关爱、宽容和相互妥协这些美德不能有立足之地，这些人类文明的质量公然地不为社会所容，这是我们六十多年里远离宗教信仰的直接后果。看今天中共恐怖政权的无底线邪恶，仅以「六四」屠杀为例，杀亡的生命数以万计，迄今二十六年过去了，死难者亲人的公开祭祀活动都要遭到野蛮的暴力打压，这种凶残及邪恶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这种无底线泯灭天良的恶行，于当权者自身而言，恰是他们内心极端恐惧的必然反应，是他们打压信仰的必然报应。

在西方社会，便是最黑暗的时期，也还允许被杀死的敌人有权被纪念，作为承认一个事实的自证——大家都是人，便是最专制的政府，也还给杀死的敌人以荣誉。

然而，在中国，相反的情形则随处可见，没有信仰的独裁者人性是个可怕的黑洞，这是作为人最可怕的损失。

2. 邪恶政权不亡之不可能

前几天从家人的微信上看到，山东英才学院的「李姓同学与其他六人组成一个祷告小组，每天中午或傍晚会在教学楼的楼梯之下，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祷告一小时」，而被人用手机偷拍后报告了公安局，因此这六人被公安局传唤，「正好当地教育厅不久前下了文件说，三人以上一起进行宗教活动的就要被开除」，所以学校要开除他们。

我常说自己总怀疑是在人间，原因在于：一是基督徒的祷告竟然被报告公安局的现实，二是公安局因此就传唤祷告者的现实，三是教育厅的文件矛头直指「宗教活动」的现实，四是学校要开除他们的现实。在这一串现实里，一个病人膏肓的社会局面格外地清晰。除了面临被开除的几名基督徒外，其余的都是些蓬勃着的主动因素。但你不能从其中找出纤毫的，与这个恐怖组织自己颁行的宪法和法律还有一星半点联系着的痕迹，如果非要说有，那就是对这种宪法和法律毫无遮掩的反动。

这个邪恶政权不快亡，天理不彰矣！他们要把所有的局面都弄到使正常人群目瞪口呆的地步。文明人类群体中所有正常现象，都令人难以置信地于他们有碍。他们把所有局面都弄得鸡犬不宁，而终于使自个儿也寝食不宁。人类既存的所有文明，都成了他们狂躁难安的理由。理论上，这种反人类文明常态的情形只能导致两个结果：要么在他们的导致努力下，终于消灭了人类既存的所有文明价值、行为和习惯，要么他们最终被消灭。不仅是他们全然丧失了试着与人类文明共处的冲动和能力，而人类文明若再容忍他们下去，也是冒着文明声誉长期被恶劣毁损的现实恶报。

这种邪恶现实清晰地警醒着文明，若不立即像他们一样地人性丧失，就要无限期、无底线地被他们敌视、污蔑和压迫。任何于正常人类有关的常识，于他们都尽显令人无可奈何的无力感。他们莫名其妙的不安已臻非人类境地。这种人间

罕有的精神病状支配下的行为，则会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进一步恶化他们与人类文明早已水火不容的关系。进入最后的疯狂状态则是他们在未来一年多时间里的精神常态。相比较而言，于他们，绞刑架通向的去处才是唯一符合他们所要的「安稳」局面的，便是监狱特有的「安稳」，已难以成全他们所要的死尸般安稳矣！

3. 「十博士」挡不住「祷告小组」

圣诞节将至，根据这些年的经验，又到了中国黑暗势力相率展丑貌、竞相显卑鄙的时机了。

尤其这几年来，一些知识与精神一样残缺的丑类，对这片多难土地上日渐流行起来的「圣诞」文化直若见洪水猛兽而恐惧不已。每至彼时，群丑总会遐迩呼应。早已被人类了然了的丑貌上清一色地蒙上「爱国」的假皮。他们于举世公认的「圣诞」美好祥和如临大敌，壮怀激烈而敌忾性大炽，一些丑恶文匪，「爱国」情炽烈至情迷心乱，昏头昏脑地欲「唤醒」国人，抵御西方文化的扩张，保卫传统文化。大谈传统文化的美若天仙。

既然这般美好，人民趋之尚且唯恐不速，何至于这般惶恐失措？何至于由几个没有了灵魂的文人来跳梁保卫？

此间最醒目的丑举，是终于未能名噪一时的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十位博士的「十博士联署倡议抵制圣诞节」事件。一串名校而一群博士，阵容排场铺张，刺激得一些同样丑貌上蒙着公正皮的媒体兴奋难抑，那情形似乎中国终于有救了，实质是奸尻文人骨子里的默契，不过一次全队宠狗的固宠表演耳。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人民究竟不至于昏若「名校」博士，于是便有了圣诞文化的日渐盛张，于是便有了山东英才学院的祷告小组，且是在「十博士联署倡议」以后。

从整个人类历史经验看，无论经历多少变迁、艰困和残酷，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亘古如斯。

去年圣诞节时，西安竟有高校将学生围堵起来以阻堵「西方文化的侵蚀」，长沙、武汉更有一些大学生走上街头号召人们像他们一样愚昧丑陋，终于好像效果不彰，这大学出了「祷告小组」就是个证据。

对于国内人民普遍的艰困与多如牛毛的具体非公正现实，这样的大学和这样

的大学生犹死尸般镇定，这更显出他们灵魂的肮脏——如果还有灵魂的话。

予人们心灵及感官的快乐与美好，是节日的意义和价值。何至于一脸沉重半脑子糍糊地，把一个快乐的节日过程，于「保家卫国」、「保卫传统文化」搏捏在一起。

这种现状正暴露出这国、这族灾难性的黑暗现实——今日中国有着怎样的名校，有着怎样的名校博士及怎样的相关糟糕机制。已到了这民族当以保家卫国的高度冷峻面对的时候了。

山东英才学院的那几名受迫害者，不必为当下的局面沮丧。谁能阻挡与神的联系呢？历史上有多少与基督为敌的恶政权，有哪个逃过了可耻的灭亡下场？而基督却永在。再说，这样的高校不上也罢，不上未必是坏事，而上下去则一定是坏事。于我而言，此生最大的幸运，一是认识基督，二是没有上过这种大学。

4. 基督的真正精神是什么？

黑格尔认为：「从根本上来说，现代世界对自由、自我规定性和人类生活之无限价值的坚持，乃是基督徒在数个世纪里宣扬人性的无限价值和尊严，宣扬爱的无限重要性的结果。」他说：「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味地追求个人的救赎和好生活的生命，而当是一种伦理生命，在这种生命里，我们的内心转而朝向普遍、朝向他者的好。」

「基督徒的信仰和内心自由的生活，是一种向他人敞开的、热爱他人的生活。死亡于基督徒，是通向新生命的大门，是生命的新状态，所以，他们能够平静地死，没有任何焦虑，更为恐惧而言，他们也能够无恐惧和焦虑地生活，故真正的基督徒是不会屈从于恐惧，会从容自信地面对任何邪恶。」（加尔文《基督徒生活手册》，赵中辉汉译）

人性、人心的普遍荒漠化是人群中最恐怖的现象，是作为人本身最令人哀伤的损失。这是一个人群长期与宗教信仰隔离的必然结果，这正是极权专制长期追求的结果。人类区域文明形成背景大相径庭，这种大相径庭最明显的背景是人类族群的早期是互补联系的。当有一天，人类实现了互相的联系后发现有几样不谋而合的共同点，宗教信仰即是其中之一（另外如规则、语言、文字等）。纵向看人类历史辙迹，或横向看今天人类社会宗教信仰的情状，无论是怎样的民族和族群，几乎在所有已知的民族和族群中，都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开始说宗教信仰

是人类天性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长期远离宗教信仰的人，其人格就会生成群体性缺陷而不自知。

前几天于郭飞雄案发声的文字中，只是括号里提了一下刘霞的名字，竟有不少声音为此与我交涉起来，道理讲得万水千山，终于还是不同意我对刘霞女士的同情。这使人哭笑不得。我既无暇也无兴趣与一些人认真严肃地无聊辩论，可这究竟是现实的存在。这使我想起2006年我被绑架前几个月，在一间教会里的遭遇。当时，由于不同意我对「法轮功」的同情，不少人当面指责我，一个月时间里，仅在台上讲道的主持聚会者中，就有三人不能掩饰对我的厌恶而点名指责我。对此，我大都无声以对——明知孤不敌众，内心却痛着。其中一次是作家北村先生站起来为我鸣了几句不平（记得另一次是一位刘姓女士，那时一位名人的太太在讲道时突然说：「有的人他们是不信神的，我们知道，高智晟他就不信神。」）。最后一次是一位张姓学者，讲道中直接指责我同情法轮功有悖基督徒的本分。这种事屡屡冲着我发生，使我哀伤和震惊不已。我当场迫使他承认了错误。我就此平静地提醒他，你有能力、有条件意识到法轮功学员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更使我哀伤和震惊的是，这是一群当局的批判者，一群高知。时至今天，我更认为，他们至少在当时还未成了真正明白基督精神的基督徒！我甚至怀疑他们从不认真读《圣经》。我后来离开了他们，但我终于成了基督徒，是神对人道、对爱、对公义的、使人生命震撼性的感动的反复强调和命令召唤了我，尤其神对孤儿、寡母、身处逆境中的人以及对贫弱之人关怀、帮助的呼唤，常使我感动得泪水汨汨。我坚决地认为，基督徒若不用《圣经》中神的话语诚实地改造自己的旧生命，是十分不幸的悲剧。

5.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这些年，中国的和平反抗者与我过往者无数。胡佳、郭飞雄、李和平三个人成了我的好友。他们豁豁朗朗、简简单单，把自由民主事业视作一种理想而奋力勇为，凡于实现这事业有益，不论他是何人，悉数热情相助。也有一部分人，把这当成了混名声和糊口的活计，凡事瞻前顾后而左顾右观，连同情心、正义感都要贴上山头标签。这实在令人苦思不解并痛着。我向来不愿为此费去口舌，这实在是在吃了许多具体苦楚后换来的真心话，非激愤之词。深知道中梁山白衣秀士王伦式的人物颇不少，常能给你意想不到的麻烦。「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

国未来民主宪政事业的拓路者，倘若于自己的眼界及行为不做决绝的改造，对自己及自己正实践着的是有碍的，这些现象与远弃信仰（或没有认识到信仰于自己生命改变的价值）存在着直接的关系。

我这些年的经历颇不平常。于困厄中，人是可以看清世人嘴脸变换的，过去围着你转的假人的脸变得真起来——假人相全然地真切，便是心、肝的颜色也了然起来。我自己性喜豁豁朗朗，而总不认为，阅人尚不至于不辨真假，这终于是个令我诧异的现实，这是我这些年的大获得。

这些年里，我常还面对另一群特殊的人，尤其一些特殊的谈话对象。由于我每必思考着信仰与中国社会的关系问题，便带一种思考来观察他们。在与各色官员的谈话中，总能生出些别样的感觉，或是些实在的认识，坐在对面的常会是个假人，你能明确地感受出，他的滔滔不绝是不与意识发生联系的。「党国治下的畸形产物。」我常这样想着。在与他们这种特殊交流中，我常向他们讲到信仰于人类的意义，他们总会不谋而合地以进化论驳斥我，似乎人类的宗教信仰就终结于进化论，这在中国无神论群体中是个普遍现象。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肤浅，上帝论与进化论是个既复杂又简单的哲学问题。

若一个死的或静止的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本意或创造的结果，如是，则上帝论和进化论是对应的。而一个活的或动的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无可争辩的结果，则「两者并不对立。进化论只是认识到了这世界的活或动这种创造结果的真理。不能想象，上帝一开始即给了我们静止的生命乃至静止的世界，他的灾难性后果是无法想象的。

「道德和宗教当是国家和社会中所有自由和伦理当然的根基。在宗教里，一个民族可把握到对这个民族而言是终极性的真理。因此，意味着国家及其法律的权威自身必须根植于通过信仰认识到的东西，即国家的法律必须是正义的。」（刘澎《基督教文明与美国强盛之基》，中国社科院网站，2015年6月10日）

世间绝不会有任何一个民族就这样在永远地沉默中绝望地生活下去。我们——中华民族，更不会成为世间的例外者。我们将克服万难，建立起我们与神、与文明世界的新关系——正常关系。

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宗教将在2017年后开始在中国生长起来，这是医治中国问题的根本路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思想将收入民主宪政中国的宪法中。人类普遍的经验已清晰地证明，宗教信仰有利于社会秩序和安宁，而另一个普遍的

经验则是宗教信仰绝不能屈从于国家权力之下。信仰要为真正的社会和政治自由提供基础，那么，权力绝对不能侵犯宗教的自由或干涉属于宗教领域的事务，国家能做的则只是保障宗教的自由，使宗教的功能得以实现。

2017年后，为六十八年黑暗政治凌压的苦难中国大地上，将迎来自由宗教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外国宗教组织、团契和个人在中国的宗教活动不受限制，不需要批准。他们，将成为中国文明进步不可或缺的健康力量，他们在中国建立的学校、医院、慈善等机构，将与中国自己的同类机构一样，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帮助；他们的人身、财产及具有普遍意义的宗教权益将得到中国法律毫不含糊的、无差别的保护。当然，法律的这种保护将依循相关的双边条约、国际条约、公约及通行的国际惯例为依据。

十一、在拓通中国民主宪政的漫漫长路上冷峻思考

无论写书中还是写书后，常有一个隐忧萦怀，那就是中国民主宪政的建立及其有效而符合预期运行的发展问题。就技术论，一部「精微制衡」宪法的设计并无多难。而如何使我们未来的宪政实践能够在「精微制衡」及全视角监督下有序而有效地运转，则需要有许多的哲学思考。今天，俄罗斯的现状是引起我这方面忧虑的现实原因。今天的俄罗斯同样有宪政：民主选举，但俄罗斯今天实际上是少数政客的威权独裁政治，他们事实上控制着主流媒体，讲真话的记者常有灭顶之灾，而司法对此实际上无动于衷，俄公务员的腐败、受贿举世公认，媒体成了欺骗民众、赞助黑暗的生力军，我们必须保有冷峻的警惕，使中国能够避免重蹈俄今天的覆辙。另一方面是拉美国家民主宪政发展的现实情形，也可使这一代中国民主宪政的建立者、研究者多一些借鉴性思考。那里也同样地有宪政，有民主选举，可像美国那样的独立司法却始终没能在这些国家建立起来，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同样的情形出现，是我们必须敏感思考和敏感警惕的。

在拓通中国民主宪政的漫漫长路上，满是我们先行者的血和泪。今天，恐怖的暴力绑架、骇人听闻的酷刑折磨、惨无人道的秘密囚禁，仍是这路上的全部「风景」。此时此刻，仍有许多这民族的优秀分子，正用自己的牺牲痛苦抗击着极权专制的残暴和不义，正为这民族走出苦难而在黑暗里负轭前行。我们这些暂时还尚有些空间的同道，有理由为他们的勇敢付出所感召，肩起我们的历史责任，

为自由、民主、宪政中国的建立助力，使终于建立起来的民主宪政符合所有牺牲者的预期。

今日世界上，已没有了任何一个主要的国际机构或任何一个稍象样的国家，将民主宪政以外的政体视作合法的、正当的、非野蛮而可以接受的统治形式。除了中共、朝鲜等极少数几个流氓政权外，全球所有现代国家都不否认对自由、民主、公平、正义价值的推崇和追求。而实践并实现这些价值的前提是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我们这些人为实现这些价值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货真价实的民主宪政制度于我们比生命还要重要。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在这片土地上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政治制度。中国的政治制度现代化，必须研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尤其是美国宪政的实践成果。

（一）借鉴美国宪政

我于2007年被软禁期间曾拜读了王希先生的《原则与妥协》（2005年版）。在近五个月的时间里读了两遍，做了数量可观的笔记。可惜，书与笔记均在9月份酷刑期间的再次抄家中落人贼手，造成不能逆转的磔骨之痛。

大略上凡人都会有梦。习近平先生的酣梦是「在建党两百周年时让中国人民幸福得叽哩咕噜咧」。这奠定两百周年酣梦的气魄究竟雄大。我当时只有个十年的梦想——建立中国的民主宪政。而作为个体，则是在这梦到来前尽些微薄的力量。这究竟是在中国，我这梦于习先生们的梦不大方便起来，他们便把想象中的地狱活生生地给了我。这又八年过去了，历尽了曲折和苦楚，在这民主宪政梦中终于没能醒来，于习先生们已底定的二百年大梦的不方便也终于还在，但我是绝不抱歉的。

对中国民主宪政的思虑是我在这漫谈里最要紧要谈的，但会有许多遗憾，损失了的笔记本奠定了这遗憾的基础。对王希教授的思想及观点引述即保证不了准确，于此向王先生及读者朋友致以歉意！经历了这些年，经历了这些事，记忆中的东西恍如隔世。建立中国的民主宪政，追蹊美国的宪政史，于我们而言是绝不可或缺的。

世界史上，经济革命及政治革命均肇端于英国。英国的经济革命于近代人类文明史上的价值及作用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但其政治革命却是于世界另外两次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一道，影响着近代世界历史进程。相较之

下，美国革命于其后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意义更甚，这种影响力迄今不可低估，尤其于中国。

美国革命的巨大价值不在于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国家，而在于他使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国家。他开创了世界成文宪法的历史先河。讲英语的美国的出现，是世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意义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美国宪法的制定用了一百二十七天，因为他是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其实施后了近二百三十年的历史，依然是美国宪法的制定史——宪政实践与宪法完善史。

今曰美国宪法，实则是1789年宪法、与1791年成为宪法组成部分的《权利法案》，以及此后两百年陆续通过的第十一至第二十七宪法修正案共同组成（**其中第十八修正案是对醉酒类酒的禁酿、禁酤，现已废止**）。

美国宪政史于未来中国民主宪政政治的建立，及符合预期的运转之镜鉴作用及价值无可限量。而俄罗斯宪政现状，以及其与中国共同的前共产主义背景于我们的镜鉴作用也同样十分宝贵——是他在相反方面的镜鉴价值，这是我写这个漫谈的主要感情背景（即为什么会在宪政体制下，为什么在民主选举的情形下出现实际上的威权独裁政府）。

美国宪政发展史，是宪法对权力运作的精微制衡设计和全体公民对宪政实践全视角监督机制日臻形成的历史。

美国宪政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使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人类于理性政治的追求变成现实。他的理论基础是洛克的「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论，是特定的历史阶段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综合运动结果。

美国宪法生出一个全新的政府体制，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将联邦制的思想、政权、权力结构及其制衡，以及人民主权等抽象概念变成了完整的现实。

美国宪政于后世有许多有趣的认识和说明。

美国宪法制定的过程，实际上即民众广泛的政治讨论的过程，终于制定了的宪法则是这种讨论的结果。其大略上类似一个契约的订立过程。制定成的宪法即成了对政府和民众都具有约束力的契约。

「宪法是一国政治关系的总设计和总安排，而宪政则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国家治理」，以及治理过程中具体的政治实践，「他既是国家组织的根本法，也是国家的法律制定和执行的准绳」。

宪法与宪政，犹如火车与铁轨。无宪法，宪政是无用之途，没有宪政，宪法

成了无轨的列车。宪法与宪政，更如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缺一即使对方成了废物。中共迄今是只有宪法而无宪政，这是所有共产专制政权的通病。

美国宪法的历史，实际上是围绕宪法原则进行辩论的历史，「更是辩论的结果：妥协的历史」。

（二）与未来新政府有益之借鉴

下面，基于我的认识，顾念到本篇文字的篇幅，将线性罗列若干未来制宪及宪政设计、实践中当重视的借鉴，以期作为将来相关思想的一部分。

1. 关于民主宪法权力之限制及行使

作为美国宪法组成的《权利法案》，是美国宪法制定后又补充制定的宪政权利体制」。就立宪而言，他们走了一段弯路，是1791年新增的。这将是我们要避免的。美国《权利法案》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并不是列举人民有哪些权利或者说宪法赋予人民哪些权利，而是说政府不得侵犯人民既有的何种权利。这里昭示了两个鲜明的思想：其一，宪法中的权利源于人民的让渡，宪法权力的行使是基于人民的意志；其二是权利不是政府赐予的，而是在政府还没有出现以前人民就有着的，这种权力及权利观于我们非常重要。

2. 关于宪法身材机制

美国最初制定的宪法中缺少一些结构性的、使民主政治得以有序运转的东西，诸如：宪法的最终解释权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问题，政党在宪政体制中的作用、地位及其活动规则问题。这些在宪法中缺少的界定，曾使美国宪政发展史遭遇过几次巨大的挑战，这是文明必须注意借鉴的问题。美国宪法身材机制的缺失，使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任内的、美国宪政史上颇不名誉的四部法律通过成为可能。1803年，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案的判决中，历史性地确立了最高法院的宪法审查权，给了最高法院钳制国会和总统的能力。

3. 关于一人一票之民主选举

民主选举，是民主宪政国家中最重要的政治。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是政权合法性及正当性的要素和前提。选民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政权组织构成，不只是政府合法性、正当性的体现，更是一个政治结构稳定的基础。而选举的原则当体现普遍性、平等性、直接性和自愿性。任何形式的政府，如果他不受选举程序和独立司法的限制，不论他嘴上讲得如何天花乱坠，他实际上实施的则必是残酷而无孔不入的专制。

人类天生追求的并不单是物质，还有承认，对人尊严和价值的承认。一人一票的自主选举，是对这种尊严和价值承认最恰当、最合理的保障。

选举权是美国宪政史上最古老、最重要的公民权利之一，尽管他也走过了不少曲折。但选举权仅为公民权利的一个方面。

公民权利意味着一种国籍的归宿，一种法律上的身分权。公民权利是个复合的概念，是一种含有特定社会价值成员的地位，而公民法律身分的社会价值，是需要通过公民实际享有的权益来体现，诸如：享受政府的诚实服务、国家的福利、社会的保障、人权和自由的充分享有、人身及财产安全的有效保障等。而对那些在市场经济竞争中总处在劣势地位的公民，他的权利更体现在有统一成熟的社会保障机制、最低工资制、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制度和其他对应的福利制度方面。没有这些制度或这些制度并无可靠保障，公民权利就成了空物。只有通过定期的、普遍的、公开的一人一票选举，公民权利才能得到实在的保障。

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下，政府的合法性才能得到普遍的认可，其执政才能得到民众自觉而认真地支持。人民对政治参与的最好形式就是自主地参加选举。人民不光希望自己的权利、自由得到政府的保护，而且有权通过实质性地参与，以帮助、改进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效果。这种实质性的政治参与，保证了国家制度建设与公民权利建设在活的历史进程中共同生长。

民选政府，在国家遭到危难时刻，政府首长可以理直气壮地动员人民来保卫国家制度及其所代表的价值。

只有赋予人民自主的、有秩序保障的一人一票选举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政客才能在乎他们的感受，祈求得到他们的帮助，选举是所有权利的基础」。他是人民影响政治的最直接、最现实和最有效的方式。

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是民主政治生命力的保障，也属民主政治的形式要件。选举程序和机制的设计必须科学合理。这种程序和机制的设计必须本身是民

主的，否则，他将影响甚至抵消或降低选举的民主性。美国的「选举人票」制度的不合理性值得镜鉴，他因此导致了危机。如在2000年佛罗里达的选举，在该州六百万选民中，布什得票比戈尔多了几百票，但他却最终获得了代表该州全体选民意志的全部选举人票。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但这不是人为操纵的结果，就机会而言，双方是公平的**）。未来中国的总统当由选民直选。简单的数学逻辑，却因设计的悖理而无限地复杂开来，导致那次大选的历史危机。

在公民权利发展史上，1960年代，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改革」推动了美国历史上最多元权利的扩张，公民权利从传统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拓展到个人尊严、生活质量、基本经济保障、接受良好教育和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这些扩展了的权利，必须成为未来中国宪法及宪政实践中毫不含糊的吸收和保护。

4. 从「新政」看宪法机制下总统的权威和高效

美国的宪政史伴随着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大史。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联邦政府的权力扩大了许多。但每次他权力获得扩大，都是宪法修正案的结果。他扩权的另一个规律性特点是以国家的非常状态为背景，最明显的如内战、两次世界大战及「九一一」事件。这是由美国的州和联邦形成史以及两者的历史关系决定的。美国的州与我们未来自治省的地位不大一致，宪法并不是他的权力来源，而我们未来省的权力将必然来源于宪法。

美国联邦政府，便是美国国家本身即是十三州「制造」成的。其直接的现实背景是反抗英帝国强权的产物。所以，当时参与「制造」美国的人们。对强大国家心存余悸，保持敏感的警惕，使联邦政府当具备的能力在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历史后才陆续获得。美国为此承受了若干历史巨痛，这是中国未来制宪及宪政实践必须吸取的教训。

政府的治理既是人类文明的结果，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代价。建立有限政府当然应是一种基本的思想，对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与调和。民主宪政制度是人类目前能找到的，最接近理想的调和模式。

「印度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缓慢，欧洲福利国家的滞涨，乃至美国财政赤字问题的困境，在福山看来却是民主制度国家能力的欠缺的表现。」（**忘了出处，致歉**）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必须肯定，他不是民主制度本身的问题，只是有待进一步完善的问题。我们在将来的机制设计，如何避免上述情形当予以考虑之。

自由要求限制政府权力，却必须要有一个有能力保障自由的政府，这种保障自由的能力是必须的。政府必须有能力制止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权益的侵害，有能力保障社会公正，有能力维护社会公共福利，有能力保障公民权利的行使和制止垄断势力危害个体权利及公共福利。

从美国宪政经验看，总统必须拥有高度的自主权，在瞬息万变的国际事件中保卫国家安全和利益。政府必须成为解决政治危机、调节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核心之宪法机制，当扮演重要的领导角色。各国的普遍经验证明，国会因其特别的代议制性质和复杂的组织结构，不能快速有效地集中意志达成共识，不能在国家危机时刻肩负起领导公众的职责。只有总统有条件及时发挥关键的领导作用，以迅速化解所面临的危机，美国历史上所有重大危机事件中都证明了这一点。

当今时代矛盾地复杂化、多元化。国家和国际关系重大危机的发生，都要求国家必须有一个高效权威的行政中心，要有一个发挥政府核心领导作用的最高行政长官，担负起解决国家、社会复杂多样的矛盾，保证国家发展和繁荣的稳定及持续。

当今时代，个人利益、企业利益、地方利益与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国家利益实质是全体国民利益的总汇。国会和总统当成为全国性利益公平、有效分配的中心机制。

历史证明，总统的权威和高效是必不可少的。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重创了美国人的经济、生活和国民心理。正是罗斯福总统利用了总统机制的高效，在「百日新政」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出十五部法律要求国会通过，遏制了经济危机的恶化趋势，于稳定民心以不可替代的作用。

保护公共利益必须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当然，未来的公共利益必须建立在全社会价值共识的基础上。政府不能成为任何利益集团的工具，当超然于任何团体利益之外，其所有的动机和目的，都不外乎是为推进公众福利和繁荣，他必须是一个公认的富有道德责任感的利益协调者。

戴维斯指出：「无论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美国宪法对统治和人民来说都是法律，他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为所有不同类别的人民提供保护。」美国宪政历史表明，便是紧急状态下，国家尊重对正当程序原则的认可和坚持，这是美国宪政历史上最宝贵的价值之一。

5. 美国言论自由保护史上三个标志性案件

中国从未有过言论自由的经验。因着中国的权力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中国历史上，自由的权力对人民言论自由的冷酷钳制，不仅堪称历史悠久，其凶残及恶辣的程度全世界第一。远在周朝厉王时期，人民就有了「道路以目」的本领。进化至后世，人民便是「道路以目」也不能逃避祸矣。你不开口说话，可你有可能在心里骂当权者，于是这世上便有了「腹诽罪」。「腹诽罪」是绵密恶辣钳制人民言论的、人类历史上最为荒诞的恶招。有着如此绵长精微的钳制人民言论历史的中国，意味着这片土地上欲建立保卫言论自由的制度是何其不易。自由媒体被称为美国的「第四权力」。美国在确立新闻自由的原则及其保障机制方面，值得我们很好的借鉴。

中国权力钳制言论的历史于1949年后进入了他的最黑暗、最反动的时期。便是在黑暗的皇权专制时期，也还有着「登闻鼓」、「叩阍」这样的刚性制度设计，以保障民情、民意与权力不至于完全阻断。今天，衙门外不再有「登闻鼓」，官员出行如临大敌。衙门外等着人民的是武警和秘密警察。几十年来，因为言说，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被杀、被虐、被监禁。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屠杀、镇压法轮功，中国的「媒体」都是一片叫好，为权力的恣肆暴虐唱赞歌。

上世纪头十年里，美国新闻和出版界掀起了一场「黑幕揭发运动」，也即著名的「扒粪运动」。美国社会久积了的、已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丑恶问题，诸如社会腐败、妇女和童工的悲惨遭遇、城市贫民生活苦状等被揭露出来，这些广泛而持续的揭露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反响。其中，一些全国性的专业组织，从社会科学角度，对各种弊病的发生和发展原因进行了大量有见地的分析，并提出了解决的意见。这是自由媒体引领美国社会的一次道义의规模性检省和提升——含媒体自身的。

美国言论自由保护史上三个标志性案件，对未来中国建立新闻及言论自由的权利和原则，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界限，以及相应的机制，有着十分宝贵的借鉴价值。

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确立了著名的「沙利文原则」。大法官威廉·布伦南写就的判决意见，成了人类保护言论自由的经典文献。

他确立了媒体对公共事务进行不受干扰的、充满活力的、广泛的辩论，当是美国社会的基本原则，必须受到宪法保护；且确立了宪法必须保护与事实可能有出入的辩论，这是表达自由存活下去所必须有的一个呼吸空间。而这种自由辩论会可能造成于政府官员的名誉伤害，却绝不能成为压制言论自由的理由，对政府施政行为的自由讨论，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根本原则，反对强迫人民和媒体自我约束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批评。构成对官员名誉损害结果的前提是举证说明媒体在进行报导时，明知所使用的材料或信息是虚假不实的而执意使用，对使用的材料或信息的真伪有肆无忌惮的无视。判决强调了一种特权的对等原则，及政府官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有免遭诽谤罪起诉的特权，那么，公民也有着批评政府而免遭诽谤罪起诉的特权。（向王希先生致以歉意——记忆中的这种引述难保准确）

《纽约时报》诉美国案中，尼克松总统以损害美国利益为由，要求最高法院禁止《纽约时报》刊登被泄露的五角大楼文件，而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驳回，坚定地捍卫了新闻自由的权利。

1842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普林斯基诉新罕布什尔州案的判决中认为：「言论自由不是一项不分场合、地点可以任意使用的绝对权利，言论自由绝不包括使用那些会造成伤害和引起骚乱的污秽、下流、咒骂和诽谤性语言。」

这些都是言论自由所行使及保护所必须具备的思想。

6. 从欧美国社会福利措施演进中思考

美国宪政实践中的国家福利思想，及其实践效果均为未来中国的相关建立及实践所借鉴。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他是会最优先考虑处境最糟糕那部分成员的福利，今天中国社会的情形正好相反。

欧洲国家的财政制度主要用于富人向穷人的再分配。国家福利的实现途径，或如美国的累进税制度，或如欧洲一些国家的专门再分配政策，向贫穷和低收入家庭予资助和社会服务。

当今时代，福利保障措施已普遍地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公共责任。他不是施舍和行善，接受公共救助是公民应享有的一种权利。一个个体的不幸或陷入困境，往往是超出个体控制力量的因素造成的，典型如中国的情形。普遍的失业贫困，

相应保障性机制的结构性缺失，使绝大部分人生活在没有安全感、被隔绝、被抛弃的状态中。今天的中国，到处弥漫着无以名状的失望和不安之氛围。使这部分人脱离这种现状，从经济上站起来，帮助他们有固定的工作、稳定的家、小区和良好的教育，是未来中国民选政府及社会的首要任务。未来政府和社会的目标，不仅仅是建立和保障自由，而是予人人平等的机会；不仅仅是作为权利和理论上的平等，还必须是结果上的平等。

1980年代，美国传统的发放式福利政策受到了新思想的挑战。新的思想认为，政府应当从无止境的福利发放中退出来，将注意力放在改变福利接受者的动机上。有一本书叫《超越应享权利：公民的社会责任》，书中表述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认为政府有对穷人的救助责任，但不应仅止于机械性地提供资助，当有意识地去改变穷人的社会责任感，鼓励和帮助他们进入市场，而不是将他们庇护在市场规律之外。认为政府是一种机制，人民通过他强迫自己以必要的方式做到相互服务和相互服从。认为美国的问题不是经济不平等问题，而是如何解决处于社会底层者的依赖性问题。这种思想影响到1980年代里根政府的福利政策。里根总统自己也认为，美国的福利体制「造就了一种贫困文化的永久性结构」，发放式的福利体制已生成了一个「失去梦想和成长受阻」的阶层。他的这种思想以及他任内的福利政策影响了他的继承者。

克林顿任内通过了两部规范福利措施的法律，《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对需要家庭的暂时救助》，将公共救助与工作技能培训、就业意识培训结合起来。政府提供救助的目的是说明救助者最终能进入市场，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

富裕国家的保障，是对被救助者某种生活水平的保障，他不像今天的中国只向城市特困阶层提供仅足以维持活着的保障。

美国以外的世界，尤其是欧洲以社会福利为主导的国家，从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经验看，均规律性地出现了财政危困局面。如何在公民权利、国家福利及维持财政现状良性局面间建立平衡，以实现自由与繁荣的持续发展是未来民主宪政政府的课题。

7. 关于劳工法及劳资关系的思考

美国在劳资关系权益调整方面的经验，是未来民主宪政政府的建立者必须认

真研究并合理借鉴的。

美国于1898年通过的《尔德曼法》，于一百多年后的中国建立劳工保护规范及保护实践具有现实的镜鉴意义。尤以其中的禁止资方强迫工人签订「黄狗合同」（即工人在签订合同时必须承诺不加入工会组织，否则不予雇用）的规定。

该国于1933年通过的《工业复兴法》，允许私企成立自治协会。由协会、劳工和政府协商建立本行业的竞争规范，和在政府的支持监督下，由各企业协商建立一种于各方有利的市场秩序。其建立在竞争中的理性自治秩序的思想及措施值得借鉴。

1935年的《劳工关系法》，于劳工、劳工组织保护方面的规定有借鉴价值。确立劳工的组织形式，及加入工会的权利。以及就工资福利、工作条件及其保护、工作环境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该法实践历史性地证明，对劳工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权利机制的法律保护，对保护商业免受损害，保障劳资关系良性运行，及保护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具有结构性的积极意义。

8. 关于企业垄断问题的思考

未来国家将立法制止垄断对自由竞争环境的破坏。美国1914年通过的《反托拉斯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的相关规定可资借鉴。

而于反垄断方面，英国的做法更值得我们研究借鉴。「以最严格的方式来限制垄断的企图和带有垄断性的特权，而将公司的特权限制在那些被明确给予的权利范围内」。

9. 关于私人产权保障问题之思考

当今世界，凡市场繁荣和和社会富裕的国家，无不依赖他们背后的神圣产权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和自由的政治秩序。另一个现实规律是，几乎所有贫穷的国家，大都不是因为他们缺乏资源，而是因为他们产权制度方面的野蛮，且都有着独裁腐败的政治制度。中国的强拆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野蛮的、赤裸裸的反人类暴行，已被利欲熏心的中共权贵，在此问题上的凶残及冷酷雷打不动，这种使人震惊不已泯灭人性的犯罪行为，使中国的产权制度保护倒退了几千年。人们一边震惊着，一边也无助地麻木着。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810年对弗莱切尔诉培克案的判决、1816年对达特茅斯学

院诉伍德沃特案的判决，在保护财产、保护私人经济、钳制政府对私人财产及经济权益的侵犯方面，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他坚定地昭明了一种态度，法律对一部分人通过政治手段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财产和经济权益予以坚定的反对。法律旗帜鲜明地、历史性地站在了政治特权的对立面。两百年后阅读之，依然使人心潮澎湃。在中共恐怖组织的统治下的私财制度现状，使人心潮澎湃的却是他相反的情形。例如浙江吴英这类案件，2017年后将重新梳理，罪恶将得到追惩，所有参与抢劫者，包括司法走狗们，在受到刑事追惩的同时，受害人可向这群私利熏心的东西追偿经济损失。以此事表明未来中国对私属财产、权益保护方面的不含糊态度。

10. 现代民主政治的三大支柱

现代民主政治的三大支柱：选举政治、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目前，国际上联邦制国家大都采用两院制，类似美国的众、参两院。众议院议员名额以人口比例额配各州，由各州公民直选。参议院议员名额相同，而不论州之大小，且由各州选民直选。这种模式及其运作可资未来中国效法之。

人类现代民主政治实践的普遍经验表明，多党制在自由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互为反对党的政党能够利用同一宪法机制制约对方，防止同一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治以及具体决策的独霸和垄断。这些，都是人类经历了许多磨难后得来的宝贵经验。但是，必须制度性地防止国会内部出现的「坎农主义」，必须确立刚性的程序及其敏感运转和防范规则，防止多数党长久控制议会。

十二、宪政实践中的公平与秩序

以宪法为基础的日常而普遍的宪政实践，不仅是国家政治秩序稳定和社会秩序良性发展的保障，一部活的宪法，一套活的、与人民具体的权利和利益相关联的宪政运作，可在人民中间产生一种活的宪政文化心理。人民具体参与宪政的具体实践，是一国宪政文化产生和生长的基础。诸如美国公民的参加选举、参加陪审团过程、就职宣誓等制度安排，都为宪政文化的产生、生长提供了条件。在美国，人们的收入和财富不均是很显明，但这种不均却不是美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因为人们普遍相信规则于大家都是公平的，富人的成功是公平规则下的结果。

从尼克松被弹劾，而国家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的良好运行里，人们能够看到一种良性的宪政文化于其中的巨大现实作用，尤以2000年大选后联邦最高法院的最后决定效果，最能体现这种极具生命力的宪政文化于其中的现实作用。实际上，美国很多人对最高法院的决定是反对的，这其中就包括戈尔本人。但人们对最高法院的裁决程序制度及其所代表的制度价值的信任是坚定的。为人民信任着的既存程序及其良性运作，是政治稳定的基础。而人们对程序制度及其所代表的制度价值的普遍信任，是美国宪政文化生命力的骨骼。这方面的现象及其所代表的巨大现实价值，于未来中国宪政实践有着十分宝贵的经验——实践的和思想的。

十三、关于近况：答复关爱我的朋友之问候

近年来，总有关爱着我的朋友通过不少管道打听我的近况，藉此机会大略回覆之：

我的情形在我看来还尚可，并不如朋友们所想象的，总是在苦中煎熬。

1. 箪食瓢饮无忧，与神同行常乐

物质空间的暂时局促于我几无苦恼，或者说无暇苦恼，我有许多理由使自己可暂时置身俗世烦忧之外。客观上，于物质方面的情形大略上能为大家想象得到，被局限在小村里，与世不能争，粗食简衣，而十分能吃，二十分能睡。押回家一个月体重增加了三十多斤，由是始以有意识地节制。一日之计总在书笔间。

至于精神方面，则常处在一种内在优美的自我满足里。每日读书后的最后一个小时，在一本叫《约翰逊艺术史》的书中神驰。原本拟买来在节假日或其他闲暇里消遣，但终于成了我每天里最为神往的一个小时。艺术有一种神奇的能力，他可以抹平辽远过去与当前的鸿沟。在那里，人能寻找到内心深处的宁静和幸福，感受到了浑涵了和谐与和解的看得见的自由，能连续地欣赏到处于众多文化和历史形式中的美，是在山村里料想外的享受。

好像是黑格尔说过：「希腊艺术是如此地和谐，因为希腊的精神和宗教完美地适合于感性的表现，实际上，艺术是把握精神最贴切的形式。」从希腊的雕刻绘画中能够持续地感受人类精神的安宁，能寻得到某种看得见的思想和看得见的精神。于扰攘俗世生活里的人，某种久违了的纯粹精神性的思想也唯有在这平面艺术了，给予我的感官及精神极大的满足。

而离开了书本，我的精神世界则是与我的神的爱和奇妙的话语绾接着，犹如回到婴儿般无思的本能感受中——我实无痛苦。于我，朋友们大可放心矣！

2. 雾霾的苦楚相对变淡了

可从去年年底开始多了一样预料外的苦楚——厚覆于大地上的雾霾。如此程度、如此持续的霾祸，在这里可谓史无前例，无端给人一种人间末日感，苦恼挥之不去。可上周四弟的一趟河北、山东的出行，其所见到的浓厚雾霾之恐怖情形，相对地使我们这里又「好」了起来。原本计划在两地逗留一周的他，两天后连夜赶回。

「活在那种地方能憋死人，像闷在罐子里，连太阳都是不死不活的，咱连半年都活不过来，我真佩服那里的人厉害，整天就感到在地狱里。」四弟一进门即一脸夸张地这般说。

于是，我这里又「好」起来了，便是地狱，他也是个好地狱，比身处于赵国国都的朋友「幸运」多了。

十四、结语：新政府，保障人民幸福的政府

最后，我想以一段《独立宣言》文字作为本篇漫谈的结束语。

我们视下列各点为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具有造物主赋予的某些不可让予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政府才在人们中间得以建立，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来自被其统治的人民同意；但当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对政府原来的目的造成损害时，人民有权利来改变或废除他，以建立新的政府。新政府必须基于这样的原则并按着这样的方式来组建政权，即在他们看来是最能够保障安全和幸福的，……。过去的经验证明，只要当罪恶尚可容忍时，人类总是宁愿忍受，而不愿废除自己所习惯了的政治形式。然而，当一个政权滥用权力，巧取豪夺，一意孤行，企图将人民抑压在暴政之下时，人民有权利和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2016年1月1日于母亲生前所居窑洞

附录：作者手写原稿

OUR STORY BEGINS

49

力危害个体权利及公共福利。² 危险

从美国宪政经济看，总统必须拥有高度的自由主权，在瞬息万变的国际事件中保卫国家安全和利益。政府必须成为解决政治危机、调节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重要~~核心的宪法机制，当扮演重要²领导角色。各国的普遍经验证明，国会因其特别的代议制性²质和复杂的组织结构，不能快速有效²集中意志达成共识，不能在国家危机时刻肩负领导公众²的职责。只有总统有条件及时发挥关键的领导作用，以迅速化解所面临的危机，美国历史上的所有重大危机事件中都证明了这一点。

当今时代社会矛盾复杂化、多元化，国家和国际关系重大危机的发生，都要求国家必须有一个高效权威的行政中心，要有一个发挥政府核心领导作用的最高行政长官，担负起解决国家、社会复杂多样的矛盾，保证国家发展和繁荣的稳定和持续。

家¹ 当今时代，个体利益、企业利益、地区利益与国家关系越来越密切，²国家利益²实则是全体国民利益的总汇。国会和总统²当成为全国性利益公平、有效分配²的中心机制。

历史证明，总统的权威和高效是²必不可少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重创了²美国人的经济、生活和²国民心理。正是罗斯福利用了总统机制²的高效，在百日新政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出十五部法律要求国会通过，遏制了经济危机的恶化趋势，于稳定民心以不可替代的作用。

保护公共利益²必须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当然，未来的公共利益²必须建立在全社会价值共识的基础上。政府不能成为任何利益集团的工具，当超越于任何团体利益之外，其所有的²机制和目的，都不能外乎是为推进公众福利和繁荣，它必须是一个公认的²富有道德责任²的利益协调者。

戴维斯指出，“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时期，美国宪法对统治和人民来说都是法律，它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为

50

QUESTIONS BEGIN

所有不同类别的(美国)人民提供保护。”美国宪政历史表明，
便是紧急状态下，国家尊重对正当程序原则的认可和
坚持，这是美国宪政历史上最可宝贵的价值之一。

5、中国从未有过言论自由的经验。因着中国的权力
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中国历史，自由的权力对人民言论的冷酷钳制，
不仅堪称历史悠久，其凶残及恶辣的程度全人类第一。远在周
朝幽王时期人民就有了“道路以目”的惨状，进化至后世，人民
便是“道路以目”也不能逃脱。你不开口说话，可你有可
能在心里当权者，于是便世上便有“腹诽罪”。“腹诽罪”
是绵密恶辣钳制人民言论的、人类历史上最为荒诞的恶招。
有着如此绵长、精微的钳制人民言论历史的中国，
上意味着在这异国土地建立保卫言论自由的制度是何其的不易。自由
媒体被称为是美国的第四权力。美国在确立新闻自由的原则
值及其保障和制方面值得我们很好的借鉴。

中国权力钳制言论之历史于1949年后进入了它的最黑暗，
最白晳时期。便是在黑暗的皇权专制时期，也还有着“
登闻鼓”、“叩阍”这样的刚性制度设计，以保障民情民意
于权力不至于完全阻断。今天，衙门外不再有“登闻鼓”，官
员出行如临大敌。衙门等着人民的哭喊和控诉。几
十年来，因为言说，数以万计的人民被关、被虐、被监禁。
“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屠杀”、“镇压法
轮功”，中国的“媒体”都是一片叫好，为权力的恣肆肆虐唱
赞歌。

美
的——上世纪头十年里，美国新闻和出版界掀起了一场
“黑幕揭发运动”，亦即著名“扒粪运动”。美国社会久积了
的、已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丑恶问题，诸如社会腐败、童工
和童工的悲惨遭遇、城市贫民生活状况等被揭露出来，
这些广泛而持续的揭露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反响。其中

制作说明

一、《2017年，起来中国》简体版根据大纪元发表的繁体扫描版转换制作而成；若有错漏请以原版为准。

（原版下载需翻墙访问：<http://www.epochtimes.com/gb/16/11/15/n8494881.htm>）

二、简体版仅针对大陆网络读者酌情使用；如希望支持高智晟先生及其家人，可以购买原版书籍。

<https://www.amazon.com/dp/B01JTGUFU0/> （电子版）

翻墙访问：<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19455>（精装）

翻墙访问：<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19448>（平装）

三、若有版权或其它问题，简体版可无条件收回。文后附高智晟先生的三封公开信原文，三封公开信也是高智晟先生被绑架的直接原因，不可不察之。

原文地址（翻墙访问）：<http://www.epochtimes.com/gb/14/8/6/n4218072.htm>

高智晟律师致胡温的第一封公开信

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

公民高智晟向两位问好！

在能坐下来向两位同胞问好之前，为了关注另一群我们共同的同胞——法轮功自由信仰者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再次遭致系统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非法迫害的真相，我去了北京以外的一些地方，度过了几天“做贼般的日子”，是为外界传闻我“失踪”的原因。

新一轮持续的、系统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针对信仰法轮功同胞的野蛮迫害的暴行是正在发生著的事实，这不仅是最近各地来信中反映了真实，也是我们这次外出时所真切地看到了的事实。作为公民、作为律师，我愿对我看到并公诸于众的真实承担任何法律后果。

基于对两位长者基本人性的善意信任，我决定将我看到的真实以公开信的形式通报于两位，再次寄希望于两位，尽快以迅速的措施制止各地地方当局对信仰法轮功的同胞持续非法的野蛮迫害。这已不再仅仅是那些被非法迫害公民摆脱灾难的需要，这里还涉及中国的宪法价值、法治价值、道德及道义方面的人类的普世文明共识价值，这些价值不能在今天的中国、在你们的眼里成了没有价值的东西啊！

山东烟台市的徐承本10月15日一见到我即讲道：“我的爱人贺秀玲的尸体已被冷冻了快两年了啦，至今不能得到处理，他们有能力长期的折磨她最终把她致死，却在把她死后快两年里没有能力处理这件事。她在快被折磨死时才允许我看了一眼，当时我看到人已经神志不清了，但还是被锁铐在床上，而且下身没有一点衣服，看到我的亲人这种惨状，当时我的心都要碎啦！他们真没有人性，只几分钟就把我赶了出去。她才四十多岁啊！这是人死的那天晚上公安通知我看到的情况”。

“我爱人生前5次被抓，还曾在辽宁锦州被关押3个月，因为在北京上访被抓，关在芝罘区专为抓捕法轮功学员而在京长期包租的一家宾馆的厕所内，只有不到三平方米的地方，关了16个人，当时很多人都闷的受不了。因为我们的强烈要求，我爱人死后他们做了尸检，报告至今不给我，在我们多次追要的情况下，只是口头告诉我是‘因练法轮功而死’”。

文登市宋村镇石灰窑村的修炼者杜克松在今年5月被抓，被判劳教后，在看守所受迫害查出高血压，送劳教所被拒收关了50多天后因生命危险被放，9月27日又被公安抓捕，至今下落不明。

文登市的修炼者于正红，40多岁，是宋村镇寺前村人，9月27日在家被抓，被抓后绝食15天，送到医院后被通知“快不行了”，“后来由公安伪装（不敢说自己是警察）把她送回家。”

法轮功修炼者林基啸，是文登市宋村镇大床村人，女，40多岁，9月28日被抓，关在看守所，一直在绝食，家属去要人，他们说已送到王村劳教所了，但有从里面放出来的人说人还在那里，已经奄奄一息了。家人去王村洗脑基地了解，被告知说人不在那里，家人又去问‘610’人员，他们又说是把人送到青岛去了，这个人是死是活、目前到底在哪里？情况至今不明。烟台福山区的肖勇，一向循规蹈矩、口碑甚佳，仅因修炼过几天法轮功，今年7月被判了三年半有期徒刑。

“我是2001年6月第一次被抓的，折磨了一年后我的身体很糟，把我放了”，退休教师刘莉（应其要求隐去真名）平静地坐下来，一讲即是近两个小时。“2003年我出来后发现，从2000年起，我所有的工资竟被‘610’领走，我找‘610’和我的校长的次数谁也难以记清，至今不解决。我的丈夫也因修炼过法轮功，关押期间被折磨的失去了记忆，家中原来由他负责保管的一点存款凭证也在抄家后下落不明，他又记不起来。2003年春节，我把仅有的一百元钱给了被关押的丈夫，我们母女俩过年都没有一分钱。2001年6月，福山区公安局4、5个警察去我家抄家，抄出两本法轮功书籍，就强行把我抬到派出所，还对我进行殴打，我说警察怎么能打人？他们一边打还一边喊：‘就打你了怎么样’？他们审了一天一夜，其中一个姓张的警察说：‘你再说就要倒血霉了’。他从另一个人的笔录上抄了一份‘笔录’，然后让我签名，我拒绝，后来他自己签上我的名。连旁边姓陈的警察都看不下去了，说：‘她不签你签什么’？他咬著牙说：‘我就要让她倒血霉’。后来他们就凭这份当着我的面伪造的假材料关了我15天，后又直接送到了福山洗脑基地。在转化班他们不让我睡觉，强迫我转化，直到2002年1月，我仍未转化，他们就直接用那份假笔录判我劳教1年，由‘610’的主任王岳峰送我去的劳教所，当时劳教所给我体检，身体已被折磨的不像样子，劳教所拒绝接收，但他硬要求劳教所收留我，他们耳语一阵后，医生就用一尺长、一寸粗的针给我打针，我反抗，四、五个人将我按倒在床上强行给我打针，最后他们看到我身体还是不行，由王岳峰给我送回家中。

2002年11月20日，我继续去福山镇党委找他们的车镇长问非法扣我工资的事，我来到车镇长办公室，自我介绍后，他起身出去，我等了很多时间，他回来说：‘我让赵秘书跟你谈谈，你去他的办公室吧’。于是我又来到赵的办公室，刚进去，门外冲进4、5个警察，不由分说地把我拖上车，强行把我带到了福山洗脑基地。这次是2003年11月17日将我释放的，在此期间他们对我进行了毫无人性的折磨，曾经连续戴手铐长达43天，还将我反铐著吊到铁门上进行殴打，在关押近一年后，由于转化没有效果，只好将我释放。2004年11月28日，我再次被抓，由当地的派出所将我送到栖霞看守所，关了7天后，又转到栖霞洗脑基地，于2005年3月18日被释放。在此期间，他们继续用不让睡觉的方法对我进行迫害，曾经让我连续26天不睡觉，眼睛稍一闭上就被打醒，我曾多次昏倒，他们还采取连续站立的方法，不让我休息，并殴打我，每次连他们都累得直喘气。”

2005年10月15日上午，我们与瘸著腿的王德江见面，王的腿至今肿的连鞋都无法穿。“2005年8月15日晚上，我在牟平区高陵镇下雨村的朋友家，村里治安和高陵派出所共三人突然闯进来，我跟朋友跑出来，他们却大喊‘抓小偷’，村民上当了，我们被抓住。他们开始打我们，治安主任手提一把椅子

猛然砸在我身上，椅子当场被打散，我已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他们还用脚踢，其中一脚踢到我的肝部，我当即昏了过去。他们把我抬到车上，拉到高陵医院抢救，我醒来时发现把我铐在病床上，之前抓我的一个治安员在抓我时被我摔了一跤，他怀恨在心，看我醒来后就用鞋底打我。在场的公安说：‘在医院打他们动静不要太大’。当天晚上被抄的有两家，共抓了6个人，其中一位孙学进老人已经70多岁了。后来他们把我送到看守所，逼我签字报名参加洗脑班，我不签，狱警拧住我的手铐，问我‘你签不签’？我说不签，他一直拧到手铐已经陷入我的肉中，我还是不签，他只好转身走掉。后来他们找了个犯人把我拖进牢房开始打我。国保大队提审我一次，因我不配合他们，他们把我送到烟台的幸福洗脑班，开始不让我睡觉、坐小板凳，进行强制转化，让我写三书（保证书、揭批书和悔过书），还用车轮战，让我看污蔑大法的录像，第4天，他们看没有效果，牟平国保大队和烟台公安处‘610’头子于刚商量把我送到招远洗脑基地，我听到他们议论说像我这种情况只有在招远基地才有办法。这时我已经是7、8天没有吃饭和睡觉了。到招远后，他们抬着我，走一步就踢我一脚，嘴里还重复著‘看你转不转化’。放下我时，我已没有力气站立，只好躺在地上，他们继续折磨我，基地的主任开始用脚踩我的下身，他的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还用脚抬起我的头，然后把脚拿开，反复著让我的头摔在地上，还用脚踢，折磨够了才把我抬进监室，我感觉他们已经没有了人性。在招远基地都是一个学员一间小房屋，是专为洗脑特建的，尽管我站都站不起啦，他们还是用铁链把我捆到铁椅上，戴上手铐、脚镣，我继续不转化。第十天他们开始给我灌食，我开始不断地吐血沫，当时连他们自己看着都受不了，也跟我一起吐起来。他们按住我的头给我灌食，那里的主任问我转不转化，我说不转，他说在招远，你不转化就别想出去，我们这里办法有的是。他们把我背铐在暖气管上，只有脚尖能粘到地面，屋子里没有灯，24小时都很黑，我隐约感到，不时有人进来把手伸到我的鼻子下，摸摸看我是不是还活着。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的手腕都勒出了大口子。当时还用电线勒住我的嘴，让我不能说话，现在我连说话都流口水。被他们不停的折磨，我实在痛苦的无法形容，我动了自杀的念头，想咬舌，但他们又加了几根电线，使我嘴里也无法动弹，直到我昏迷不醒。我醒来后看见自己的腿已经变了颜色，开始变得黑青，左腿越来越粗，已有右腿两倍粗，右腿却越来越细。但他们还是不放松对我的折磨，我想上厕所，他们搀我起来，我发现自己已经不能走了，就摔倒在地上，他们接着把我抬到床上，还是绑住我的右腿，继续戴着手铐。当时那里的医生看情况十分不好，就让他们把我送到医院，医院的医生说我有生命危险，必须锯掉腿，后来他们又把我送到毓皇顶医院，那里的医疗条件最好，我住了几天，他们让我的家人出钱给我治疗，我们没有钱，后来家人把我接了出来。回到家后，由于我已生活不能自理，还得由我80多岁的老母亲自伺候我”。

王德江在濒死时被地方当局交给了他的家人，他和他的亲人恶梦般的经历今天仍不知在全国各地被多少无辜的同胞正在经历著！

“22岁的杨科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分校汽车专业系大二学生，从学生到校长，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因他在网上公开声明退团被一位中央领导特别“关照”，他在退团时没有写明自己所在的学校，为此，‘610’人员在全国高校进行了拉网式排查。今年5月，威海‘610’人员找到他，问他是否练法轮功，是否在网上退团，他说：‘我愿退就退啊’。8月20日开学，‘610’人员又来学校，29日他被抓走，父母打电话到宿舍后才知道。9月7日，他父母（杨平刚、常丽君）还有王胜利夫妇和济宁的王女士同时被抓，至今下落不明”，一位王姓老师告诉我们。

“2005年国庆前，山东省主要领导通知莱芜市公安机关，如国庆前抓不到亓英俊、陈莲美、王静等七人，公安机关的领导都要下台。9月29日半夜1点，上述人员即被抓。实际上现在我们这里的很多警察都不愿意抓法轮功学员，他们也没有办法啊！另外，现在全国各地都有来招远洗脑基地取经的人员，以便更加残忍地迫害我们，并且在胡锦涛访美期间中央下令先突击整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说他们最近打击不力，然后加大力度镇压法轮功。山东省的招远洗脑基地和山西省的一个基地已被中央指定为示范基地。外人不明白，越是这样的基地越恐怖，没有几个人能熬过来，地狱算什么！招远洗脑基地比地狱都可怕，连折磨我们的人也都变成了魔鬼”，一位曾经在招远基地被关押过的信仰者如是说。

“我叫亓鑫，今年19岁，山东省莱芜市人，是亓英俊、陈翠莲的女儿，我还有个弟弟叫亓垚，10岁。我父母从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2000年，我爸在公园炼功，被莱芜市警察绑架，后被送到淄博王村劳教所，判刑3年。我妈因警察的追捕被迫流离失所，后被抓关到莱芜市小曹村大队，那年我13岁，我弟弟才3岁多，我只好独自在家照顾弟弟，直到我妈回来。我爸回来后告诉我：在淄博劳教所，警察为了让他放弃修炼，同时用8根电棍电他，他的身体在地上不停地跳动，皮肤冒出被烧焦的味道。被电击后的几个星期，已经电糊了的皮肤开始一层层的脱落。后来我父母回家后，我们一家人又在一起生活了。我父母又重新经营起卖军用品的小店，我们总以为灾难从此过去了。直到今年的9月30日晚上1点多钟，莱芜市警察带领20多名武警闯进汶阳村大法弟子尚阿姨家中，绑架了我的父母和尚阿姨夫妇，而尚阿姨的丈夫并不修炼。8月份起，我爸爸得知被警察通缉，便把我交给一个阿姨，父母带着弟弟开始流离失所，我们一家人再次被迫分开。父母被绑架后，弟弟至今没有音信，我非常担心我的还不懂事的弟弟，我每天都在为弟弟祈祷。10月1日下午3点，莱城区公安分局柳青和张宝德、官司派出所的邵士勇等二十余人，在我家无人的情况下闯入，车号为鲁S1030的警车停在我家楼下，他们用钥匙打开我家楼下储藏室，并毁坏我家的门锁，进去查抄，直到晚上7点才离开。现在我们一家四口人在四个地方，10岁的弟弟在哪里都不清楚”。

河南扶沟县58岁的贾俊喜，2005年8月18日被当地警察劫持，经10余天的折磨致死，家人要求行尸体鉴定，却被当地警察强行火化（警察说：“告到北京也没有用”）。

2005年6月8日，广东惠州的朱家文（名假）在工地干活过程中被抓，54天后家人才获悉他被劳动教养三年的事。

2005年9月12日深夜，广州市东山区的石磊（名假）家中突然闯进几名警察，不由分说，架著石磊就跑，“当时我先生脚上连鞋子都没来得及穿，下了楼上了车他们就打他，听到打我先生的声音，我的心如刀绞。我们太无助啦高律师，至今不给我们任何手续”，石磊夫人在予我电话时带着哭腔说。

2005年9月6日，石家庄的法轮功学员段生、何丽被抓至今下落不明。

2005年7月19日，四川泸州袁玉菊、梁劲晖母子与其他共10名法轮功修炼者被非法抓捕至今关押。

……。

刚刚过去的“十、一”前夕，发生了北京、黑龙江等各地对法轮功学员行大规模的抓捕之举，各地在胡锦涛先生出访期间的抓捕带有明显的突击性，以上事实真相就在光天化日下发生，是无以掩盖的事实。

胡、温两位先生：一些地方当局对信仰法轮功同胞者的迫害已到了完全随心所欲的地步，我们无法接受这种公然反人类的野蛮暴行发生在21世纪的人类社会、发生在有政府存在的今天的中国的现实。两位必须与我们共同面对的现实是，一方面，两位主政伊始时，国内人民及外部文明世界均寄以极大期望，两位不时倡导的诸如“依宪治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也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承载着人们的期望；但现实是残酷的，同时它又是客观真实的。在那些被迫害公民须面对之的同时，两位和我们何尝不是一样地面对着这正在真实发生著的现实。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人，我们当然不愿意相信及接受你们在这方面的认知能力低于常人。对今日中国妇孺皆知的正在公开发生的持续迫害无辜信仰者的野蛮暴行，两位若不知情，那是你们针对国人的一种罪责；若知情而不予制止，这与具体行恶者的罪恶何异？就像我写公开信予两位是我仍信任两位的信念之依一样，调查中，许多有过让他们及亲人终生刻骨铭心的被迫害经历的法轮功信仰者，有些还是被新近的迫害过程致残者，还有那些甚至是被迫害致死者的亲人，他们共同所表现出的善良及对两位的期望，在调查过程中多次感动的我们潸然泪下！但我不得不与两位共同痛心面对的是，在针对信仰法轮功者迫害的这场浩劫中，一些罪恶的东西形去而神不散，持续不辍的罪恶不仅仅使无以计数的善男信女蒙冤涉难甚至含恨而死，这种完全悖越基本人性的迫害至今仍在延续著，同时被延续著的是持续被损害的我们的政府形象以至国家形象，它包括法律方面的、道德方面及人性文明方面的。这场浩劫的罪恶不始于你们，但这场浩劫在你们二人主政时期得以继延，这场针对自由信仰者的浩劫未能止于你们，这同样亦属一种罪责。若不尽早身体力行予制止，这将会成为一种历史的结论而不单单是我个人的一己认识。

在持续制造一个群体的人生灾难过程中，使我们更加痛心地看着及感受到，这场令常人莫名惊悚的灾难中的受害人，早已不再仅仅是那些自由信仰者及他们的亲人，持续对法轮功同胞的丧失人性般的残害过程，已使参与残害无辜同胞者自己本身已变得彻底的丧失了人性，诸如前面已提及的招远洗脑基地的若例行公事般、面无表情地踩压他的同类、同胞王德江下身的那位主任，面对四年里无数次讨要自己非法被扣的工资而早已身临生存危势的刘老师的那位“610办公室”主任及那两位校长，无不是这场疯狂暴行的受害者。对具体操作洗脑转化的官员及工作人员，只去评价及奖赏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结果，实践中，以完全造成这些官员及工作人员个体为了确保获得心目中的经济利益及邀功乞赏，已完全忘却了自己的人性，对同类的生命、痛苦没有人本该有的敬畏及体恤，没有了本应有的罪恶感、羞耻感及不道德感。在这种过程中，人类人性文明共识中既有的东西不再被重视，职业良心共识中既已形成的基本价值已完全走向了反面。法轮功修炼者贺秀玲在她离开这个人世前所经历的非人般的折磨过程记录，将在人类未来无限久远的有记忆的时期被后来者唾骂，她在奄奄一息时被送至太平间，直至“死”后才被获准见面的亲人跪在她的面前哀嚎著历数那种她离开人世前所遭遇的苦难，亲人们突然发现“死者”的两面眼角慢慢地流出泪水，亲人们嚎啕著发疯般地找医生抢救，医生出奇的冷漠急得亲人们呼天喊地，同村人听说贺秀玲还没有死，医生不抢救，急赶医院，找到医生大声指责医生，医生才带着仪器测试表明，心脏还在跳动，这时候，我们的医生同胞的第一反映不是如何救人，而是迅速撕碎表明心脏尚在跳

动的心电图，口中念念有词说：“人早就死了，活什么活”而逃离。贺秀玲带着泪水在亲人绝望的恸哭中死去。

我真不知两位同胞面对上述现实会有何感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的久远价值，以及全世界的在这场浩劫面前保持了不光彩的沉默者的各国政府的道德形象，都已现实地成了这场浩劫的受害者。

须在此强调的是，事实已充分表明，中国执政者对于它所领导的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必然引发的精神领域的变化，缺乏超前的预见和足够的体认。在长期和平的年代，在一个经济至上的社会，人类是不可能久久沉湎于单纯的物质消费的。在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盼持续推动下，宗教和信仰生活在民间的大面积复兴，乃是必然的趋势。它与科学和文化等主流话语，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现代文明早已解决了科学和信仰之间的分区划界、各守其土的问题。个人信仰的自主，必然导致集体意识形态的消解。个人权利的伸张，必然是对政府无限权力的压缩。这是当权者必须正视、不能不顺应的事实，这是人类历史的潮流。

在此，我不得不提及我及我周围许多人的疑惑与不解：公民与世无争的自由信仰为什么会招致如此持续的、无人性的更属非法的打压，这里的价值到底在哪里？！非病态及残缺人性者无以解释。仅站在打压者的角度价值估，这种选择除了将打压者自己孤立野蛮及非法的境地及持续恶劣地毒化著打压者本已令正常人齿寒的人性本身外，它原本即不存在任何正面的价值。这次调查中，我们除了看到这场始于六年前的灾难在继续的真实外，另一个真实也是实实在在的——那就是这场镇压本身的失败。从我们最近涉足的地方看，执行打压命令越残酷、越持续的地方，这种失败的程度及标志越明显，山东的济南、青岛、烟台等地，自由信仰者及他们的同情、支持者的张贴、散发的抗议及揭露罪恶的标语文件，可谓无处不在，许多公安派出所的门口即举目即是，坚韧延绵的抗争也在随着打压的持续而壮大著、拓展著，映衬著灭绝人性的镇压措施是多么地不得人心。相反，一些打压手段较温和的地方较著上述地方则是另一番不同景象，如陕西一些地方，这方面的局面则较为平静。这足应令那些迷信暴力者无地自容。将无以计数的财力、警力资源，无端消耗在使社会秩序更复杂化的对和平修炼以修心健身的法轮功者的打压上，完全是一种侵犯人权的罪行，恕我直言，两位没有权利、没有道理、没有借口不去迅速改变这种现状。

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缔约国。《宣言》明文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容加以无理逮捕、拘禁或放逐”。“人人于其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之基本权利被侵害时，有权享受国家管辖法庭之有效救济”。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三条也载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无论是国际法准则还是中国自己的根本法，都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侵犯人权、惨无人道地迫害本国同胞。正是基于对人类普世价值的信奉与对法治的尊重，本人郑重建议两位尽早做出决断，“停止迫害自由信仰者，改善同中国人民的关系”，切实履行“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的方略，在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基础上创建新的中国。

你们的这种实践，将得到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无尽的支持！

最后，我有必要特别提醒的是，两位应保证所有这封信中提到的那些饱经苦难的个体同胞，不致因为这

封公开信而再次遭致野蛮迫害。石家庄法轮功学员郝秋燕曾因我的公开信而被非法关押近8个月的野蛮行径，警示我们有必要作这样的提醒。在我还有安全的日子，我将继续关注他们的安全，无论作为文明人类中的一员，还是作为中国人、中国公民及律师，我都有权利这样做，虽然在中国它还十分危险。

上致

衷心祝愿两位：凡事平安！顺利！

你们的同胞：高智晟

2005年10月18日于北京

原文地址（翻墙访问）：<http://www.epochtimes.com/gb/14/8/6/n4218071.htm>

高智晟律师致胡温的第二封公开信

胡锦涛、温家宝两位国家领导人：

从10月20日早晨起，北京市安全局、北京市公安局的约二十名左右的便衣开始寸步不离地跟踪我及我的家人。每天至少有不低于9 辆的车围在我家门口的三个方向，18日、19日、20日三天，车辆增加到二十辆以上，我想请两位回答你们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这个国家的一个公民的如下问题：

一、你们是否如实地告诉了那些整日一脸倦容地盯着我的那群年轻人：高智晟做了些什么？你们有没有欺骗这些年轻人？

二、你们有没有如实地告诉这群年轻人，你们的这种作法是违反中国宪法、违反中国的基本法律原则的！是非法的？

三、你们有没有告诉这群年轻人，你们这样对待一个无辜公民的手段是最为肮脏和最为不道德的？

四、你们有没有如实地告诉在我们家门口的那群在夜里冷得瑟瑟发抖的、同样是无辜的年轻人，你们以如此低下的手段恐吓、威胁及限制我全家的人身自由的手段是当今人世间最不光彩和最不文明的恶举。

五、你们有没有告诉过这群年轻人，贴身跟踪、24小时盯着我全家的目的、意义是什么？

六、你们有没有如实告诉这群年轻人，这种作法是被中国人民咬牙切齿的肮脏行为，是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眼里是最为可耻的行为！

昨天和今天早晨我未出门晨练，我实在不忍心去折腾那群守在我家门口前后左右的近二十名年轻的便衣！说心里话，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我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几十名年轻的便衣，他们也是人，他们同样有父母、有妻儿，同样有权利、也有条件在寒冷的夜间与亲人一道去享受家里的温暖。每当早上起床后透过窗户，看到他们一个个不停地在原地蹦跳以驱离寒冷的场面，我和夫人的心里都感到很难受，今天早晨我和夫人还商量著如何解决这群年轻人白天的热水饮用问题。这些年轻人，作为具体的个体，他们都是我亲爱的同胞，他们决不是我的敌人，每每看到他们从不愿意正面碰接的眼神，我的心里都很难受！我感到了他们的善良和心虚！我必须澄清的是，对他们，我是仅有同情而实在没有一丝敬意！

两位长者：在一个制度文明的国家里，公民的法律权益受到侵害时，若行写信之举向国家领导人投诉将会被视为笑料，而这却是我的国家里公民在类似情势下不得不持续面对的痛苦局面，两位无法感受到此时此刻我内心的痛苦！

10月18日，我向两位以公开信方式痛陈了一些地方政府残忍迫害我们共同的同胞、那些自由的信仰者、践踏国家的法治原则的现实。迅速将我们看到的，对国家、民族健康发展极具危害的真实局面通报两位，以期通过两位与人民一道共同努力，开始消除罪恶及危险，以寻求建立谅解与和谐的中国。令人痛心及愤慨的是，我看到的竟是莫名奇妙的相反。10月19日，我接到了赤裸裸的威胁电话，10月20日开始，我的夫人吃惊地发现，两位不明身份者从我的家门口开始跟踪我，我才12岁的上学的小姑娘至学校，以后天天如此，直到11月15日那两位不明身份者的身份才明朗——他们开始贴身跟踪我。从11月20日开始，我的家门口和办公室门口每天各守着不低于3名的便衣，他们每隔几小时轮换一次。从他们出现后的第二天，我夫人每天接送孩子上学的自行车莫名奇妙地丢失，而同一车棚中近百辆自行车却安然无恙。昨天夜里，20多名便衣守在门口，我们新买的自行车的两个气门芯都被拔掉，我的轿车上莫名奇妙地被涂上各种无法洗掉的脏物。11月4日，北京市司法局非法宣布停止我的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权利；11月15日，我赴新疆开庭，从早晨出门到上飞机，跟踪我孩子上学的那几位便衣贴身跟踪着我，一到乌鲁木齐即有人接力跟踪我。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司法部官员向新疆有关部门全面调查我的含出身、政治清白度、有无行为劣迹及是怎么混进律师队伍、如何从一个律师变成“坏分子”的全面材料。这种与“文革”整人的套路毫无二致的下作做法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前日一回到北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我的两位朋友孔珊女士和诺瓦克先生到京，出于礼节，我去他们两位下榻的宾馆探望，在整个过程中，极个别素质低下的便衣把丢人现眼的事做尽，他在二环路上，在80公里/时速的情势下驱车挤擦我的车辆，惊得诺瓦克先生来接我的代表摀住了眼，在与外国朋友一起吃饭时，我们合影拍照，结

果贴身跟踪便衣说把他的像也照进去了，说我们的拍照行为严重侵犯了他的人权。他们的粗暴及跋扈惊得这些人权观察专家目瞪口呆，整个就餐的楼层客人就像看“耍猴”般围着看他们表演，他们一发无以自制，指手划脚、暴跳叫喊无不至极致，硬逼着孔珊女士将我们的合影删掉，几位人权官员不停地摇着头，草草结束了晚餐离开，几名便衣干脆就像随行般地跟着我们同行。

这两天，我家的周围邻居可谓大开眼界，不低于20辆左右的、挂有天津、北京牌照的车辆承担着监视我的各种不同角色功能。20日，我一回到京，我家周围便成了便衣警察的俱乐部，家中固定电话被野蛮掐断至今不能使用，他们让社区门卫、物业人员统统住进宾馆，腾出地方驻扎他们的人马。十几名便衣整日就站在我的楼下，无任何避忌之意，搞得本来平静的社区气氛煞是紧张。这里人们对我的了解导致了他们对政府这种荒诞行为的完全不理解！昨天夜里，我停车刚离开，夫人从窗户上看到他们七、八个人迅速跑步将我的车包围，围着空车折腾了近一个多小时，正常人完全不理解他们在做什么，半夜里，他们不下十次在我的楼道、门口东张西望，杂沓的脚步声吵得人无法入睡。谁会相信我的一家大小会在内室私处、在深更半夜关起灯来危害这个国家的安全？但这些便衣相信，他们中个别人的行为令人厌恶到了极点。我写这些文字予二位，我想代表我的孩子质问两位，为什么你们会继续延续著如此肮脏的权力运作现实，我相信守在我家门口的那群年轻便衣的心灵深处并不都是肮脏不堪的，但我却坚持对这种下作过程的幕后指使者的灵魂则必然是肮脏的认定。我们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质问两位，到底是谁在背后指挥着这最为肮脏的权力运作过程？谁有权力这样运作？我们的国家还远不富裕，九亿农民仍处在贫困状态中，由于贫穷，数以千万计的我们的孩子上不起学或因贫穷而辍学。把纳税人的血汗钱大把大把地花在如此既折磨年轻的便衣、又压迫他人的肮脏过程中，这样的行为禽兽不如！在背地里，以如此卑劣的行径对付人民，把本即瘦弱的纳税人的血汗钱花在如此见不得人的过程中，你们还有什么颜面每天西装革履的面对文明世界，有什么脸面面对自己的同胞？写到这里时，东北一位教授打电话表示，他可以肯定这些肮脏的行为不是你们二位安排下实施的，我认同之！但是，这种丑恶过程却能在你们二位主政以来，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人的身上都可以发生，这才是问题的本质。你们千万不要再低估今天中国人民的思考力量，回到正常人的心态上来思考、来面对今天的问题。今天中国的问题，再也没有拖下去的条件啦！压制我高智晟不足道，但企图持续以无道之法压制天理，终必为天理所灭。

在对我和我全家的非法及肮脏的迫害结束前，我将持续地做两件事。其一、每天通过以面对文明社会的公开信的方式，促你们的政府遵守中国的法律；其二、我将策划起诉非法迫害我全家的两个单位。

再祝二位一切平安！顺利！！

高智晟

2005年11月22日

原文地址（翻墙访问）：<http://www.epochtimes.com/gb/5/12/13/n1151842.htm>

高智晟为法轮功三致中国当局公开信 ——高智晟致胡锦涛 温家宝及中国同胞的公开信

胡锦涛 温家宝及亲爱的全体尚怀良知的中国同胞：

高智晟在长春市向你们问好！

在这里，我首先要对那些被广东省委、省政府血腥枪杀的无辜同胞表示我最沉痛的哀悼！对那些死难同胞的亲人表达一个公民的慰问和声援！同时，对广东省委、省政府凶残杀害我们善良同胞的野蛮暴行表达我最强烈的抗议！强烈要求最高当局遵从文明社会公认的基本准则，惩办凶手及责任者，抚恤死难者家属！

冰天雪地的长春寒冷异常，“躲藏”在一间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里是断著水的房间里的我此时热血沸腾，这并不因为是我正再次写公开信给胡、温两位！有幸为着一个世间最伟大的民族之一的明天而奔走，这足令一个普通的公民热血奔涌！

10月18日，同样是在热血沸腾的情势下，我致公开信予胡、温两位我们的同胞，紧急呼吁他们的政府“停止迫害自由信仰者，改善同中国人民的关系”。公开信发出的第二天，我的家遭到赤裸裸的电话威胁，第三日起，每日平均不低于十辆的小轿车、不少于20人的便衣开始了针对我全家的24小时围堵、盯守及跟踪。到第十五日，我的律师事务所被北京市司法局非法勒令停止执业。我的国家对一个公民公开建言的这种反应方式着实令人扼腕叹息！

这封公开信引起的另一番强烈反应是，各地被迫害的法轮功信仰者，纷纷发出让我去他们所在的地区以了解真相的请求，这些请求信尤以长春市、大连市为最多。从11月29日开始，我们几乎是24小时不间断地持续奔走于山东省济南市、辽宁省的大连市、阜新市、吉林省的长春市等地，行新一轮的真相调查之举，较以往此般情势下的独行经历不同的是，全程荣幸的有焦国标教授的伴行。

在这个时际，在成群的便衣还在我的家门口昼夜花样百出地刻意营造著恐怖氛围、全家被野蛮的压迫最为严酷的时期，11月29日，我摆脱了不下20名便衣的跟踪、围堵，我再次得以以我的方式进行了15天的真相调查。我想在此特别提及的是：我们设法说出这个民族持续被血腥迫害的真相，尤其是在这个时刻，也是为了提醒我们的整个民族——我们民族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及紧迫性。我们的民族，我们每个个体，是到了一个必须正色面对我们所面临问题的时候啦！任何理由、任何传统的方法及任何的耽延，都将是对我们整个民族价值的犯罪！

在这封信里，我将不会回避任何我看到的真实存在的问题，那怕这封信的公开之日即是我的入狱之时。十几日的调查，我再次看到了令我痛彻心肺的真相，“610”办公室，至少可以这样称谓它——国家政权内且高于政权力量的黑社会组织，它是可以操纵、调控一切政权资源的黑社会组织。一个国家宪法及国家的权力结构安排规范中没有的组织，却“行使”著本只能由国家机关才能行使的权力及许多连国家机关都根本不能行使的“权力”。它“行使”著在这个地球上，人类有国家文明以来，作为国家从不能拥有的权力。

我们看到了，被以“610”为符号化的的权力，正在持续地以杀戮人的肉体及精神、以镣铐和锁链、电刑、老虎凳等形式与我们的人民“打交道”，这种已完全黑社会化了了的权力正在持续地折磨着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孩子及我们的整个民族。胡、温两位，作为这个时代，这个时刻具有特殊身份的民族的一员，尤其作为在国内大多数民众心目中还被视作为具有良知的民族成员，是到了我们必须共同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啦！

此时此刻，我用颤抖著的心、颤抖著的笔记述著那些被迫害者六年来的惨烈境遇，在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迫害真相中，在政府针对自己的人民毫无人性的残暴记录中，其最持久地震荡着我的灵魂的不道德行为记录，即是“610”人员及警察的、完全程式化的几无例外地针对我们女同胞女性生殖器攻击的下流行径！几乎是百分百的女同胞的女性性生殖器、乳房及男性性生殖器，在被迫害过程中都遭到了极其下流的攻击，几乎所有的被迫害者，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行刑前的第一道程序那就是扒光你的所有衣服，任何语言、文字的功能都无法复述清或者再现我们的政府在这方面的下流和不道德！我们还尚存一丝体热的民族成员谁还有条件在这样的真实面前沉默下去！？

2005年10月28日下午4时20分，长春市的王守慧和刘博扬母子俩被“610”警察跟踪并非法抓捕。母子俩随后遭受了警察的酷刑折磨，当晚八时，28岁的刘博扬即被迫害致死，十多天后其母也被折磨而死。这对生前历尽磨难的不幸母子的尸体至今扣在“610”警察的手里。刘博扬死后三日才通知其父，其母王守慧的死亡时间至今不详！刘父找当地的律师，竟无一人敢接受他的委托，老人告诉他跟前的人：“在这样的社会里是生不如死，活着更痛苦，处理完他们母子俩的后事，我也将随他们而去。”

“王守慧一家三口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1999年7月20日打压之后，持续地遭到绿园区正阳派出所和正阳街道办事处干部的骚扰迫害。王守慧分别于1999年10月和2000年2月被非法拘留和劳教，在黑嘴子劳教所曾遭电棍酷刑八次；被逼每天白天干活，夜间站着不许睡觉五天五夜；被绑在“死人床”上数次，最严重的一次被捆绑在“死人床”上用两根电棍同时电击一个多小时，全身及满脸没有

一处完好地方，被迫害至生命垂危时才释放。

2002年4月11日，王守慧正走在路上，再次被绿园区正阳派出所绑架，并被长春市公安局一处蒙面带到长春净月潭的净月山上私设的上刑房上刑，坐老虎凳两天一宿。期间遭受酷刑折磨：两根电棍同时电击她的乳房等处；三名男子同时拳击其面部及上身胸、背等处，致使王守慧左脸面颊骨粉碎性骨折，大吐血。后肺部感染，在送公安医院住院期间，王守慧被固定四肢强行输液，不让上厕所，强行插导尿管又不护理，五天五宿不动，导致后来一直小便失禁。

2002年6月27日，王守慧一家三口又被绿园区分局政保科绑架至正阳派出所。王守慧被全身捆绑成一个团捆了一宿，后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三看守所期间，曾被手铐与脚镣连在一起铐了十八天，野蛮灌食一个月，后送省公安医院固定四肢强行灌食30多天，王守慧被迫害至奄奄一息时才被放回家。在同一时期的正阳派出所，几个警察对刘博扬残酷折磨，拳打脚踢，用皮鞋抽嘴巴，上绳，头上套塑料袋，把刘博扬的双臂背到后面，然后用手铐将人双手吊铐起来，身体悬空，并且来回悠荡或向下拽双脚。当时行刑的警察苑大川还叫嚣说：‘法轮功我也打死过好几个，打死你们我不用负任何责任！’每行刑时，母子俩惨叫声互闻，惊天地泣鬼神！

2002年10月29日，刘博扬被送至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非法劳教2年，12月份遭到警察强迫整天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晚上不许睡觉，白天还要被迫参加强制洗脑。2004年6月劳教期满时，劳教所却不放人，找借口给他加期47天，刘博扬是医科大学的毕业生，为人仁义厚道，尊老爱幼，在医院工作连年都是先进。”王女士几乎是一口气讲完了上述刘家母子的境遇。

48岁的长春市民孙淑香，在六年的时间里总共被非法关押过九次 以下是她在其中几次的非法劳教期间的部分经历自述：

“2001年下半年的一天，兴业街派出所八委的片警李振平和一个男的上我家劝我丈夫跟我离婚，我说不离，他就不停的打我的脸，都肿了，眼睛往下淌血，顿时眼睛看不清东西了，还问你离不离？你若不离就将你再送进去（指劳教）。我丈夫在他们的持续恐吓下和我离了婚。就这样好端端的一个家被政府给拆散了，至今使我流落在外。”

“2002年七月初我在去父亲家里，穿着便衣的警察突然闯进来问我是不是孙淑香？没等我回答就被绑架走。第二天，长春市局公安一处将我用车在颠簸了约两个小时的路程后，两个警察架着我带入一个阴森恐怖的地下室后，将头上蒙的套摘掉，同时呼啦进来八、九个警察，桌案上有大中小三个电棍，一捆绳套，另一边并列著三个老虎凳，两个警察把我架到老虎凳上，扶手上固定挂着手铐，手一放到扶手上，一翻就铐上了，老虎凳的扶手上有一排不同码的小孔适合不同的胖瘦人。警察老练地用拇指粗的铁棍，从老虎凳的两个扶手经过胸部腹部穿过把我紧固定在老虎凳上不能动弹。其中一个警察指著刑具问我，‘你看见了吗？如果你如实招来一个多小时就能下来了，如若不然各种刑法让你尝个遍。刘哲等（被迫害者）又怎么样？没有几个能从这上面活着走下来的。’一个看起来表面很斯文的警察打了我两个嘴巴，当问我认识哪些功友时，我说不认识，他就拿起电棍，用电棍前的两个爪子插到我的肋骨间电我。之后

问我功友的电话，我不说，就拿起电棍从手指尖开始电我，边电边问我认识哪些功友，我不说，他用电棍从我手臂外侧经过头到身体的另一侧，电了身体的一圈，接着又慢慢地电了身体的一圈，然后又换了一个高伏电棍充足了电，又开始从脚趾慢慢电我身体外侧的一周，我还不说，又开始从另一只脚尖开始电了身体的一圈，我是还不说，他们就用电棍集中电我的眼睛，眼睛有要蹦出来的感觉，眼前一片漆黑。我还是不说，他们又开始电我的肋条骨，我疼痛难忍，又电我的前胸部，边电边问和哪些功友有联系，我疼的说不出话来，所有功友熟悉的面孔一个一个的在我面前闪过，心头只有一念，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出一个功友，只要说出一个功友，就会立刻被抓来迫害。警察又把电棍放在我嘴里电，嘴被电糊了，肿起来外面全是泡，他们边电边说，叫你不说、今天就要撬开你的嘴。然后电棍又插在嘴里电击，一天一夜的折磨，我已是奄奄一息……！”

“2003年初我在刑桂玲家借住，有天半夜听见惊天动地的砸门声，两道门迅速被砸开，惊恐中见一群拿铁锤、拿枪的警察闯进屋里说：‘不许动，动就打死。’之后我们被抓到绿园区公安分局，把我们关在一个小铁笼里，把我锁在老虎凳上。他们当着我的面开始打刑桂玲，用皮带勒她的脖子，她撕心裂肺地惨叫，我看见刑桂玲被打倒，打倒了就用脚踢站起来之后再打倒，打踢著让她说与功友的联系，反复的折磨，然后解下皮带，勒她脖子直到喘不过来气，警察吼叫着说：‘让你不说’，刑桂玲被折磨的奄奄一息了，一个功友的名字也没说，然后开始折磨我，经过三天的折磨后把我们送到第三看守所。”

“2003年8月4号，我再次被警察抓走，把我抓到南关区公安分局，一个满脸麻子的警察抓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被撞的晕头转向，之后又给我坐老虎凳。紧扣我的双手，然后一个警察砸我的胳膊，手被拷子勒破，他们用铁环紧扣我的双脚腕，然后踩铁环上的铁棍，使铁环越扣越紧，脚腕疼痛难忍，又用塑料袋套在我的头上，然后在脖子上扎紧，一点都喘不过气来，憋的我要窒息了。看我不行了再放下头套，缓一会儿再来一次，看不行了又拿下，反复共三次。还有踩脚腕铁环上的铁棍的，铁环越来越紧，使我疼的抽起来，脚腕已破，流了很多血，我疼的昏死过去，他们用冷水浇醒我，之后把我送到第三看守所，我一直绝食绝水，昏迷了，27天的时候已奄奄一息了，才通知家属接回。”

长春市60岁的刘淑琴老人，六年里五次被非法抓捕劳教。老人异常平静地向我们讲述了她被野蛮折磨的经历。

“第一次被抓是2000年2月，警察疯狂地连打带踢拖着把我们推上警车，送到八里堡拘留所，非法关了15天，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我们一共被抓去10多人，受到了难以言尽的折磨，之后街道和派出所不断来骚扰。第二次是2000年12月31日去北京上访，我在天安门打“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被天安门警察扑上来用电棍猛击腰部，强行拖上警车。后送到宣武区看守所的一个操场上，大冬天让我们100多人坐在外面的地上半天，后来我被投入一间地牢似的房子里，墙上全是冰霜，警察逼我脱光了衣服后，指使人用大水管往我身上喷水，让我光身子睡在光光的地上，什么盖的也没有，屋里马桶臭味难闻，每天好几个警察轮番提审，警察晚上不让我睡觉，提审折磨了38天，毫无结果。

2001年12月31日，为了揭露政府对法轮功的谎言，我和几个功友出去挂条幅，被人举报抓住，“610”的警察不停地暴打我。晚上12点把我送到第三看守所，在那里，警察用拳头打我的眼睛，打得我两眼冒火星，一

阵发黑,又打我的脑袋,连击了好几拳.面对这野蛮行径,我告诉他们善恶有报,警察又让犯人拿来沉重(28公斤)的脚镣,给我戴上.被关押了22天,受尽了生不如死的折磨。后警察勒索了我家不少钱才把我放了。

2003年2月28日,我刚被放出来没几天,绿园分局的一伙警察又闯进我家,其中警察苑大川专门翻我家的抽屉,4000多元现金全部被搜去,没留任何票据.其中一个警察把我孩子从国外带回来的香水装进自己的包,苑大川正翻我的钱,我指责他们的野蛮强盗行径,苑大川就打我两拳,给我戴上手铐,他们为所欲为地翻我的家,翻的家里一片狼藉.后把我绑架到绿园分局刑讯室,给我上刑,坐老虎凳,折磨了两个小时后,又换上绑绳,绳很细,警察使劲勒我,手绑在背后,从前胸到后,五花大绑,推出行刑室.另一伙人把我推上车,警察用我的羽绒服死死的闷住我的头,闷得我几乎窒息,车子开了大约20分钟,到了一个行刑的地方(后来知道是朝阳分局),满屋子都是各种刑具,一到屋子就把我推到老虎凳前,有六个左右的警察给我戴上手铐脚镣,胸前横插上钢管,一个年轻的警察拿一根一尺多长的铁棒子,打我铐在老虎凳上的左手,打了十几下,我的手肿的老高老高,很快变成紫黑色.他们让我说出其他炼功者的事情,我说我什么都不会说的.这时十几个警察将我的手铐在背后,不停的拉手铐、脚铐、及钢管,在强大的拉扯下,只感到筋快断骨要折,使我窒息,难忍的疼痛使我死过去几次,警察见我昏死后就往我身上泼冷水,见我醒来时就继续用刑,就这样死去醒来折磨了我一天一夜,在警察使劲拉扯手铐脚镣时手铐和脚镣不停的往肉里扎,我的手腕和脚腕血肉模糊,地上流了一滩血.警察对我这个老年妇女惨无人道地进行的折磨,使我的胳膊、手脚、腿每根神经骨缝都疼痛难忍,全身动不了啦。三月一日把我送到第三看守所,检查我的心脏,血压都不行了,双腿不能走路,就这样还判我劳教两年.在昏迷中把我抬进黑嘴子劳教所,上厕所也得人抬着.在二大队,警察刘连英开始转化我,说我腿不能走路是装的,上来野蛮地用电棍电我腿、胸、心脏,全身都电了,当时一个叫伊丽文的刑事犯(她和刘的关系很好)看不下去了,把电棍抢过来说:‘别电她了,她都那样了.’刘连英这才不电了.由于不能走路警察经常骂我,利用所有的转化能手转化我,所有的警察轮番转化我,每天收工后也不让我睡觉,对我进行强行洗脑,逼着我写什么书什么书,我坚决不写,这样逼我折磨我连续两个月来,我经常血压高过200,心脏病严重,贾洪岩看实在转化不了我,就开始利用卖淫的犯人,对我进行迫害,吃饭睡觉,24小时行影不离对我进行严管,逼我进行转化,几乎天天每时每刻都在打我骂我,不准许我说一句话,说话就挨骂,就是找我的茬,迫害我.劳教所里黑白颠倒,坏人管好人,警察指使刑事犯随意地迫害大法弟子,专门监视法轮功学员.我每天身心都处在痛苦的煎熬中,长达一年的迫害使我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身体麻木,胳膊不好使,经诊断我脑梗塞,脑萎缩,我本来身体非常健康,是这一年的迫害使我变成了这样,只为我要作个好人,经受到这样长期的没有人性的折磨。”

说话慢声细语的张致奎平静地叙述了他在长春市被迫害的经历:

“1999年7月20日以后,我上访北京,因给北京人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抓后,交给长春驻京办事处的公安,他们把我的双手双脚都绑起来,用木棍把手和脚串起,挂在两桌之间荡来荡去,棍断了就跌在地上,对其他被抓的有的用皮带打,也有吊起来的,他们用白腊木棍打我的大腿,之后把我们送回长春的二道河子区公安分局.当时我们十几个人,进去后政保科长把我提起来,逼我把裤子脱下来,当时男女都在场,政保科长用皮带抽我的头,头发木,嗡嗡的响,什么也不知道了,他问我什么时候去的北京,叫什么名字,我被打晕了,感到自己什么都想不起了,他还继续打,然后用皮鞋先踩我的脚,再用皮鞋跟

碾我的前面脚指头，他一边碾一边用眼看着我的表情，我痛的大汗淋漓，打完我之后又开始打其他大法弟子，把我送到铁北看守所后，管教向犯人示意，让犯人扒光我的衣服打我，一脚把我踢到厕所撞到墙上，我爬不起来，两盆冷水浇到我的身上，又用脚踢我，胳膊和腿都流血了，腿上有一个大口子，一个月之后把我放出来，什么手续都没有。

99年11月底，我去北京最高人民法院上访，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叫来警察将我抓捕并交给了山东招远的驻京办，他们路上把我的皮带抽下，让我提着裤子走，他们一边走一边打我，到了招远驻京办，又继续用皮带猛抽我，打了半晚上。到了第二天，把我送回招远，送到了招远市看守所，他们让犯人打我，后来犯人看我活都抢著干了，犯人被感化不打我了，后来专门派来了个哑巴犯人打我。有一天，警察让我把头伸出铁门上的小洞，警察用脚踩着我的心，打我的脸，其他监室的大法弟子喊不许打人，后把我和妹妹送到辛庄镇公安分局（在7月20日之后我全家人被抓），之后把我和我妹妹分别关在楼梯下面漆黑的小屋里，小屋里因矮直不起身，只是每天晚上才让上一次厕所，每次关上十天，然后再送到招远看守所关一个月，就这样来回轮回过六次，我们兄妹被折磨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2000年国庆节，我去长春文化广场打条幅被抓，因国家新闻媒体全部说谎，都不帮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这样做。警察梁处长和一些警察把我的上衣扒下，用我的衣服包住我的头，用手铐把我的手铐在后面，从楼上把我拖下，架到车上。大约走了两小时，我感觉车出市区很远，到了目的地，我被架到一个屋子里，我头上的衣服取下后，我感到阴森森的，屋里有一个老虎凳，我知道是在山里，听到山风呜呜的。梁处长他们扒光我全身的衣服，把我按在老虎凳上，我的手反绑在后背的木棍的两端，在我胸部、大腿根部、和小腿前各横插了一根铁棍，铁棍的两端固定在老虎凳上，这样使我的身体紧紧地控制在老虎凳上不能动弹，双脚被扣上铁环固定住。这时梁处长拿出一把一尺来长的尖刀，在他自己的裤腿上正反擦了两下之后往桌子上一扔，恶狠狠地对我说：‘张致奎我今天就是叫你死在这，今天我在这把你整死，扒个坑把你埋掉，谁也不知道，谁也找不着。’说完梁处长出去了，至少三个公安开始给电棍充电，还有两个警察抓住我固定在后背棍子上的双手从后面经过头顶绕道前面，只听到我的骨头喀嚓喀嚓不停地响，骨头已断开，这样反复多次，令人窒息的疼痛使我痛不欲生。之后又用一只铁水桶扣到我头上，用罗纹钢棍猛砸水桶，猛烈的震动和刺耳的响声使我的头要炸开了。一长阵的痛楚之后，警察知道我们炼功人不喝酒，却用一瓶白酒从嘴里灌进我的肚里，又用烟猛吸一口后，用烟头烧我的整个后背，疼痛难忍使我昏迷过去。接着他们用凉水浇醒我，最后他们又点上蜡烛，用蜡烛烧我的后背，把我的肉烧焦后，再浇上蜡油，疼痛使我身体不停的颤抖跳动，我只听到老虎凳喀嚓喀嚓的被我摇响。由于我身上已没有一块好皮肤，警察就开始电击我的小便，把小便给击穿了，紧接着拿起铁棍把我的小便头给砸碎了，我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昏昏醒来。经过一夜的酷刑折磨，我的脸肿的比原来大了几倍，整个身体血肉模糊，已经完全不成样子了。因身体疼痛地扭动使铁环把脚腕处的皮和肉磨烂了，露出了骨头和筋。但他们看我醒来，又把我拖到屋外，屋外零下十多度，在我光着的身上浇上凉水，把我扔在屋外，他们进屋半小时后，出来看我是否还活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天亮了，我已经奄奄一息，被警察抬回到市局。市局里面有很多小屋，我看到每个小屋都有一个老虎凳，老虎凳上都是女大法弟子，很多都已昏死过去，都赤裸著下身，下身只搭著一件衣服。市局给招远打电话说：‘我们抓了一条你们想要的大鱼，恭喜你们。’最后把我送到铁北看守所，在铁北看守所继续折磨我，我开始绝食五天了，他们才停止。在看守所住了四十天，又把我送到朝阳区劳教所五大队，我继续绝食，有十几个大法弟子与我一起绝食，这一个五大队里就关押著500名大法弟子，

大队长见我们绝食，领着劳教犯来大打出手，那种打人的场面让人恐怖。最后把我们绝食的大法弟子带到一大队，一大队是该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最凶狠的，犯人许辉经常虐待大法弟子，有一名六十多岁的大法弟子是一名处级干部，由于不穿囚衣被打的奄奄一息，还不罢手。由于我伤势严重，他们当时没有动我，当我身体稍微恢复一点，又开始折磨我，每天早晨3时起床，必须静悄悄的拿着衣服到走廊站着，每个大法弟子都有犯人承包，大法弟子之间不能讲话，如讲话就像发生了天大的事一样，被打翻在地，开始坐板，一上午都得仰著头，身子不许动，许辉和手下几个犯人每天吃早饭后，就换上硬底鞋，就开始打我们，大法弟子一动，他们就下来往死里打。我萌生过死亡的念头，长期承受着无法形容的痛苦，下午是这样，晚上是这样！深夜还是这样。当大法弟子睡着了，出一点声，就又要招来一顿毒打，整的大法弟子不敢睡，我晚上咳嗽不止，他们就整晚上的打我，根本不让咳嗽，晚上不敢喝水，因为根本不让大法弟子上厕所。有一个大法弟子隋福涛20几岁，在衣服里夹着师父的经文，被犯人用扳子在身上砍了五十多板，没过多长时间这位大法弟子就被打死了。有一次我实在憋不住了去了厕所，回来后许辉把我打了个半死，用脚踹我的肾，把肾踹的挪位，我全身无法动弹了很多天。我的大妹张淑琴被判刑10年，妹夫被判3年，9岁的小孩因父母修炼法轮功被“610”勒令学校开除。跟我往来的大法弟子中有八、九个大法弟子都被活活打死了，比如王守慧 刘博扬 刘海波 刘承军 徐树香 王克飞 于丽新邓世英，有些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的名字已记不起来啦！真是惨绝人伦呢！

我35岁的二妹张淑春，公安抓她时她从楼上跳下，摔断的肋骨穿进内脏，腿和胳膊全被摔断，当场昏死过去。当时围观的群众很多，有人问是什么事？‘610’的警察说：‘他们俩口子吵架闹离婚。’由于她是所谓的‘要犯’，被公安拖至公安医院准备抢救，结果医院认为没有必要强救，法轮功分子扔了算了，结果那些警察还真将她抛弃在野外，后被好心人救活后，公安现在又到处通缉她。”

王玉环，又一个在六年里被长春警方非法关押、劳教过九次的女人，“说来你们不一定信，在劳教所里，管教为了自己赚钱，卖我们睡的铺位，一个铺位2000元，一旦买到铺位的犯人就可以享受到平躺，不用‘立刀鱼’式的受罪了，同时享受平躺的犯人也拥有了打我们的权利。大法弟子决不花2000元买一个铺位，买到一个铺位使用权一个月，买的犯人越多，大法弟子睡的位置就越少越遭罪。2000年8月我被送到黑嘴子劳教所。在这里采取强制转化我的办法，每天超负荷18小时做出口国外的活，劳动之外还要我写思想汇报，不写就会被犯人打骂。六大队的管教孙明燕，为了转化我骑在我头上，用电棍电我的头、脸一个多小时，头发焦了，脸和脖子都糊了。她把我打的脸、身上都是肿的。快到元旦时我又被调到二大队，超强的劳动抱电机，使我的肌肉拉伤。2001年11月释放时，我的手还端不起饭碗。“610”在释放我的时候还要了我2000块钱。

2002年3月5日，因电视被大法弟子插播真相，中央“610”下令在长春大搜捕，我是被警察抓捕的对象，当时共抓了5000多个大法弟子，看守所每个号至少有50多个人，号子里厕所里关的都是大法弟子。3月11日，我被长春公安一处抓走，我被关在南关区财神庙附近的一个派出所的1.3米高的铁笼子里，直不起腰。3月12日晚，刑警大队一处的高鹏和张恒等人开始审问我，他们把我的手反拷在我的后背，把一个帆布雨衣的袋子套在我的头上和脖子上，袋子的绳把脖子勒紧，使我什么也看不到，呼吸非常困难。他们又用绳子将我五花大绑全身勒紧，放在车后备箱里，然后开到净月的一个山里。这里是专为迫害大法弟子用大刑的地方，在这里，好多大法弟子因大刑被折磨死，大法弟子刘海波就在这个魔窟里被

扒光衣服跪着，警察用最长的电棍从肛门一直插进去电到他的五脏被当场电死，刘海波是大学毕业生。

绿园区医院大夫刘义，30多岁，也被酷刑折磨死在这里。在这里因大刑被折磨死的大法弟子有23名，名字我都能叫上来不少，被打死的大法弟子就地埋在那里挖的坑里。一个比较漂亮的女大法弟子项敏被抬回来后告诉我，在这里警察一边电她一边侮辱她的阴部，在这次长春的大搜捕中被酷刑折磨死的有近30名大法弟子。

当我被警察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送到这个山里的魔窟时，只听停下了车，几个警察连拖带打，跌跌撞撞的，我被不停地撞到树上，警察不停的骂着说今天定要整死我。走了大约十多分钟，进了一个楼里，又上上下下走了一段时间，到了一个屋子，把包着头的帆布雨衣袋子取下，警察说：‘今天看你怎么个死法，没有谁能走出这里！’我看到我在大约六平方米大的小屋里，有个小桌子，放着三根带爪子的长电棍，还有一根绳子，一张床，床是给警察打累我们时躺在床上骂我们用的。还有老虎凳，很多个警察在屋里开始做准备工作。只听山风在忽忽凄叫，紧接着几个警察把我推到老虎凳上，狠狠地把我按在老虎凳；手上戴着手铐反绑在背后。然后双臂架在老虎凳的后背，胸前和腹部被横跨在老虎凳两边的铁棍紧紧地固定住，脚腕套上两个大铁环固定住之后，警察开始每隔五分钟给我上一次大刑。每次把我反绑的胳膊往前摇再往后摇，只听到骨头卡嚓脱臼的响声，撕心裂肺的疼痛使我几乎昏厥，顿时汗水、泪水涌出。紧接着他们再狠命地按着我的头往胯处，因胸和腹部被铁棍固定在老虎凳上，这样来自警察的力量和固定我铁棍的力量，使我的脖子欲断裂的感觉，胸部和腹部被铁棍顶的异常痛苦和疼痛，每一秒钟我都感到我即将窒息。他们还用绳子绑在固定在脚腕上的铁环，然后猛力往后拉铁环，使脚腕被拉扯得钻心的痛，同时另外的警察用力按住我的头部往胯处，痛苦和疼痛使我全身不停地颤抖。在每五分钟一次重复这样的大刑中，汗水、泪水和从伤口里流出来的鲜血浸透了我的头发和衣裤，后来难以承受的疼痛和痛苦使我一次次的昏死过去，他们一次次的用凉水和滚烫的热水把我浇醒，热水把我本已受伤的皮肤烫得更破了，我真的不想承受这漫漫的痛苦，我希望他们能用枪子打死我。

在对我4个多小时的老虎凳折磨后，又用铁桶套在奄奄一息的我的头上，七个警察每人抽三只烟，往桶里喷了一个多小时，我一阵阵被呛得昏迷，又一次次用凉水浇我，我没有完全清醒他们又用抽的三只烟，猛抽一口，用烟头扒开我的眼烤，烤痛了，我挣扎着动一下。这样折腾够了，又用拳头打我的头、脸，鼻子、牙都被打出血了，把我的门牙打掉了两颗，我的脸肿起来了，变成了紫黑色。他们还用细竹棍往我两耳里扎，扎的我的耳朵半个月什么也听不到。对我大刑到后半夜两点钟他们累的睡着了。

2002年3月，在17天中我被三次送去魔窟上大刑，一次比一次严重，后两次都是半夜，每次都是由七、八个警察直接进号里强行架走。每次我都是奄奄一息的被送回来。其中一次警察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我被折磨的血肉模糊、鲜血淋漓，给我穿了很厚的毛衣裤，鲜血很快渗透了衣裤，警察又给加了一层更厚的毛衣裤，但渗透出来的鲜血还是把毛衣裤湿透了。那时恐怖和对功夫的担心使关押在这里的大法弟子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凡在“610”上了黑名单的人天天被所谓的‘提审’，每次都是五花大绑，头上套上帆布套，双手反绑在后面，放在汽车的后背箱，在山路转来转去，后送去山里的魔窟上大刑迫害。

我在上大刑之后，身体已经完全不行了，第三看守所被欺骗才收下我，第二天送省医院和军大三院检查，

说我全身没有合格的地方。下午我和郭帅帅被送到监狱医院继续迫害，一进医院就把我和她背绑在床上，给我打一种无名药物。到今天我的双腿都是麻木的，掐一下没有感觉，脚长期冰凉。在这里郭帅帅被强制灌食两个多月，管子天天插著，郭帅帅极其痛苦。大法弟子姜勇和我们一起进来，到六、七月份，在这里被迫害致死，姜勇被打了一种无名针，天天被抽去一大管子血，使姜勇极度虚弱，奄奄一息，后在野蛮灌食下姜勇死亡。我们亲眼看到一个人被折磨致死的过程触目惊心！郭帅帅感到灌食太痛苦就把1米半的胶皮管全吞下去，肚子痛的在床上滚来滚去，狱医怕郭帅帅出去有证据，便更加残酷的整郭帅帅。警察和男犯天天看着郭帅帅和我一丝不挂的裸体，还把迫害过郭帅帅的手段用在我身上，其中一个狱医，还用手向郭帅帅的小便处掏，在极其痛苦的折磨下郭帅帅又吞下一个小杓，肚子更加疼痛得在床上翻来覆去，狱医用刀划开郭帅帅的肚子取出，从胸口一直开到小腹底下，开完肚后缝上，就把生命垂危的郭帅帅送回家，导致郭帅帅身心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

和我一起住进监狱医院的赵小琴，‘610’刑警把赵小琴打昏后从楼上扔下，她至今不能说话，痴呆，脑袋上有碗那么大的包，左胳膊断了，扔下楼后，又送到监狱医院继续迫害。在医院里狱医给断胳膊的赵小琴打了石膏，一个夏天只打了一次石膏，致使赵小琴的胳膊烂的生蛆，被迫害致痴呆的赵小琴只是傻傻的笑和哭。我亲眼看到了那一起起惨绝人寰的暴行，我们作为女人都被抓的一丝不挂的大字型绑在什么都不铺的硬板床上，就这样被光着身子绑了26天，受尽了警察、监医和男犯的侮辱！

由于我不转化，他们决定送我回第三看守所，结果三所说我随时可能死亡就不收，他们气急败坏的打踢我，把我吊在三所的铁门上五、六个小时，后警察再次把我送回监狱医院迫害。回到医院我仍绝食五十天，狱医用刀把我的静脉切开，把切开的血管一头打上结，然后系上绳，另外一头埋上针，血不停的流出来，地上床上到处都是血，狱医和警察已习惯了到处都是血的环境。腿肿得老粗老粗，脚开始坏死，狱医都说我左腿一定残废。每天要打10多瓶不知名的液体，没人护理，大小便都在床上，几十天身体一直浸泡在尿液里，痛苦难耐。打奶液时，因绝食血管已干瘪不通，外科主任把输液管在手中摇几下硬挤进血管，在挤压下痛的使我多次昏厥。”

长春市法轮功修炼者杨光的境遇更是让人触目惊心！我在一封知情者写给我的信中摘出以下一段，我们诚恳的向您反映一个真实情况：

杨光，吉林省长春市人，因修炼法轮功，2000年1月被非法抓捕，直到2002年3月间，受到了长春市公安局一处梁处长及其手下的十几个人十几次的酷刑摧残逼供，电棍电、老虎凳、约束衣、上大挂、塑料袋蒙头窒息、强行灌酒等等，有时审讯三十至四十小时。左耳被打聋，当时右腿被打折，致使股骨头坏死。后被非法判刑15年。杨光当时是被抬进吉林监狱的，关押在吉林监狱老残监狱区。杨光现腿残疾，脚趾溃烂后变形，手臂失去功能，胸积水，肾衰竭，下身瘫痪，随时有生命危险。

杨光被关在吉林监狱的“裸体区”后，下身常年被禁止穿裤子，赤身裸体。由于下身瘫痪，为了大小便方便，犯人给他“特制”了一个简易的小车。小车四周是铁管焊成的，周围是木板，臀部坐的地方是一个圆洞，下面是四个小轮。每当杨光大小便时，犯人就推著这个特制的小车，把他送到厕所里自己方便，就没人管了。因车的四周都是木板，杨光的手又不好使，根本够不着臀部，所以每次大便后，也不能擦，

终年生活在充满异味、肮脏无比的屎尿中。他和监狱的精神病犯人、被打残的刑事犯人、生活失去自理能力的犯人，在冬冷夏热、终年不见阳光的裸体区内度日如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睡觉的地方不足60厘米，伙食极差，菜里根本没有油。洗澡时，把他扔在水房，用水管子猛冲全身，用带钉子的拖布擦身，还美其名曰‘美容洗澡’，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吉林监狱还逼迫杨光‘转化’，杨光仍不放弃信仰，被关‘小号’迫害，致使生命垂危。才于2004年12月转移到长春铁北监狱特殊监区，不给任何治疗，每月还要家属交一千多元的床费。

杨光家只有一位八十六岁的老母，至今不知道自己的儿子被迫害成了这个样子，见到人就凄惨的问：‘小光是个好人啊，他到底在哪里？我要见儿子！’杨光的妻子被迫与之离婚，家中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杨光承受着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痛苦。现杨光的亲属要求释放杨光，被吉林监狱和省司法厅、监狱管理局以种种借口推开。”

大连的常学霞是位非常文静的姑娘，她低着头向我们讲述了她被劳教时被迫害经历：“第一次被抓是因上访，送到大连的戒毒所，关了39天后释放，什么手续都没有。2003年1月，他们对我再次进行强制转化，把我关到小号里，小号里有各种各样的刑具，大约十几平方，里面有铁笼子，主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队长万雅琳，指使刑事犯几个人把我关在铁笼里，把手吊起来，脚刚点地，万雅琳对刑事犯说：‘给我一齐上，好好收拾她。’刑事犯蜂涌而上，拳打脚踢，不分头脚，我被打的昏死过去，昏死之后他们把我放下，然后脚踩着脸，踩着用手劲碾，还说，看她是不是装的。当我醒来后，左胳膊已经不能动啦，胳膊已被踩脱臼，不折磨我的犯人，管教万雅琳就调走他们，而且给他们加刑期。后来又再次被吊起来，把师父像放在我内裤里，往我脸上写一些骂师父骂大法的话，用木板打我，出来一年后还能看到当时被打得青紫色还没褪去。后来我还不转化，就把衣服脱光，一丝不挂，刑事犯几个人开始用手掐我的乳头，揪阴毛，嘴里不断地说下流的话，后来看我还不转化，就拿那用来刷水槽的刷子，然后，往我阴道里捅，下面放一盆水，捅一会看看刷子上有没有血滴在盆里，看没出血又换成大的鞋刷子疯狂捅我的阴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被迫答应在劳教期间不再炼功。

在教养院我受到的迫害还不是最严重的，一个叫王丽君的女大法弟子，曾经3次在小号里受刑，刑事犯用系上扣的绳子在她的身下阴部来回的使劲拉，整个阴部都肿起来，刑事犯在大队长的指使下，用拖把折断后带刺的一头往阴道里捅，导致大出血，后整个小腹和阴部都肿起来，像放了一个球一样，裤子提不上，上厕所蹲不下，排不出尿，两个月后还不敢坐，腿也瘸了，另外我看到还有一个未婚女孩也被用了这种酷刑。在后来出来的法轮大法弟子还讲，管教把捉来的毒虫放在大法弟子身上咬。”

“我叫魏纯（隐去真名），今年35岁，住大连，1998年我开始炼法轮功，由于法轮大法让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做人，所以在修炼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的心里和身体上都有很大的改善，能够宽容地对待别人，同时提升自己的道德。1999年7月，开始镇压法轮功，政府对法轮功的诬蔑和造谣全面展开，我不能无视这种对人类最基本道德的践踏，2000年3月份我到北京上访，想替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当我上火车的时候，警察拦住了我，让我骂一句李洪志先生的话，我拒绝了，于是我被扣下了，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只要是去北京，无论是火车还是汽车，都必须骂一句李先生或法轮大法的话，否则不准予上车。我被带到了大连戒毒所，拘留了7天后，被释放，回到单位，单位停止了我的工作，让我上午在厂

区打扫卫生，下午思过，最后改变信仰，写揭批法轮功的资料，我拒绝了，一个月后我被迫辞职。2000年4月份我又找到一份工作，2001年3月15日，大连公安一处的陈欣等到单位强行把我带走，5天5夜不让睡觉，我的手被反铐，把烟点着强行插进我的鼻孔，同时把我的嘴里也塞满烟。有一次一个警察走进来，拿一根铁棍，击我头部，后来我被送进大连看守所，判劳动教养两年。5月18日，我被送进大连教养院5大队。6月4日我和刘永来、曲飞、黄文忠被带到4楼，逼我们骂李老师，骂法轮功，骂法轮大法，如果不骂，就对我们进行电刑，如果骂就下去写“三书”（揭批书、反省书、保证书），首先把我和刘永来面对面坐着全身衣服扒光。我的左手和他的右手铐在一起，我的右手，和他的左手铐在一起，两个人的身后各有六根电棍，分别从头上、后背、大腿、阴部、两肋、脖子进行电击，我俩咬紧牙，不停的扭动身体，躲避电击，以至手铐越来越紧，最后勒进肉里，碰到骨头，钻心的疼，流了很多血。这种电击大约持续1个小时，又把我们分开，把刘永来双手反铐住，匍匐在草甸子上，再来两把椅子压在身上，上面坐两个犯人，周围六个犯人提着刚充完电的电棍在后背、臀部、脖子、腿肚子、脚心、阴部进行反复电击，甚至把阴部扯出来单独电击。我则被绑在一个椅子上，这个椅子两个椅子腿被绑上两根电棍，然后把我的腿绑上，椅子靠背绑上三根电棍，然后用绳子把我紧紧绑在靠背上，头上一个犯人提着一根电棍，6根电棍一起放电，我当时全身痉挛，生不如死，绝望的惨叫声充斥整个楼，二楼、三楼有很多法轮功学员，据说他们当时听到我的惨叫时都哭了。这样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和刘永来调换位置，他去坐电椅，我来到了草甸子上，这种六根电棍同时放电，又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我觉得自己要撑不住了，但是就是死我也不愿背叛我的信仰，违背良心骂师父和大法，于是我开始用头撞击地面，以求撞昏，我什么都不知道，每一次的同时放电都犹万箭同时穿心。我觉得自己死过多回，没电又换来新的电棍、电击强度越来越强，我开始变的恐惧，最后我屈服了，一会刘永来也承受不住，屈服了。带领犯人对我们实行电击得警察是：乔伟、朱凤山、景殿科等，犯人我都不记得了，后来得知：黄文忠当时被电击，满脸是血，曲飞脸被板鞋打得脸肿得像个馒头。下来后，我们写了保证书。回到班里之后，从此每天都要写三句话，内容是骂李老师，骂大法，骂法轮功，写满一张纸。同时每天还要喊三句话，这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扼杀灵魂，它给我带来的痛苦远胜于肉体的摧残。如果反抗和拒绝，就会被带到四楼进行电击，时间长度不等，直到屈服。后来3班一位姓李的法轮功学员不堪忍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选择了上吊自杀，被救下。那时候的每一天我都不想活，太屈辱，但我不愿再承受一次电击，我怕自己承受不住，可我不能在这做着罪恶的事情，有一次我和刘永来交流：如果有学员敢于献出生命，他们就不敢这样迫害我们了。他说，为了大家他想先走一步。有一次到户外打扫卫生，刘永来从楼后的台阶走上了三楼，从三楼头朝下跳下，当场死亡。不久很多法轮功学员写了声明，声明在强制迫害下所写、所说的一切违背良知、违背事实的话作废，并且坚定的维护信仰和真理。于是他们就把这些写了声明的学员聚到一个班，强制劳动，早五点起床，干到晚上十一点，同时他们9个学员送到关山教养院，进行新一轮迫害。我意识到不能再配合他们的迫害，于是我开始不穿囚服，不走步，不唱歌。绝食抗议对我的迫害。马上我们班全部绝食抗议迫害。后来我们被分开，我被分到3大队，在3大队我继续绝食，当一个检察长和我谈话时，问我为什么要绝食，我说：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没有人敢接受我的诉讼，到处都是江泽民的法官、法院，没有人敢替我们说话，我只能用我的生命进行抗议，抗议对我本人的迫害，抗议江泽民和政府非法轮大法的迫害。我有儿子，当将来我儿子问我时：在那场最严厉的对正义迫害中，你做了什么，我不想告诉他：我屈服了。我想做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生命。在我绝食的第十五天，他们怕我死在教养院，10月24日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释放了我。”

我们窒息般地听取了一个个在这场迫害中死里逃生,有的是多次从死里逃生的受害同胞口述真相的过程,其情其景,纵使魔鬼亦会为之动容。旷古、旷世的血腥场面,凶残的人性,惨绝人寰的折磨手段。面对一个个平静述说他(她)们被野蛮迫害过程的同胞,我们不禁要质问:那些头顶国徽,身着制服的人,在六年里,在近六十年里,你们究竟见证并掩盖了多少起这样的灭绝人性的真实?我们的制度,为什么竟能培育出这样一群对居住在自己周围的、并且是养活了自己的、同样具有自己的父母、妻儿、子女、兄弟姊妹的同胞如此凶残、如此缺乏人情、缺乏道德的公职人员!那些同胞的悲惨经历表明,在我们的社会里,一群具有公职身份者,长期地是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惘顾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共识,持续地以完全远离人类道德及人性的方式,干着几乎是彻底摧毁人性,摧毁基本道德、摧毁人类善良及良知的肮脏勾当。含糊、温二位在内的所有同胞必须承认,至少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我们的制度在持续的,以积极的行为制造著这种令文明社会不耻的存在,同时它又持续地昭示着我们制度的彻底的不道德性。

胡、温及全体中国同胞,是到了我们民族成员全体必须反思的时候啦!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为了心灵中的信仰,会在有政府的和平时期经历著如此规模的、如此持久的、如此惨烈的灾难。这种仍在继续著的和平的今天的灾难,使数以千计的无辜同胞丧失了宝贵的生命,数以十万计的人民被剥夺了自由。我们看到的真相表明,所有被非法剥夺自由期间的同胞,都遭到了令文明社会难以置信的对肉体的摧残过程和对精神的野蛮杀戮煎熬。这场完全丧失人的理性的迫害过程,还使的一亿多的法轮功信仰者,一亿多个家庭的数亿人遭受了传讯和恐吓,剥夺就业资格、工作机会、收入,被抢劫财产的不同程度的、不同性质的迫害和打压,这是多么的愚蠢、危险和不道德的恶举。这是在持续地与全体中国人民、与人性文明及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为敌啊!这个制度怎么会需要这样的价值呢!我们还有何理由、有何道德条件拒绝反思呢?

我的律师事务所及全家正在经历的严酷事态表明,在今天的中国,坚持说出真相者是要付出代价的,国家以持续的公开的恐怖手法警告人们,欲了解真相、说出真相是十分危险的。在制度文明国家里,对一个掌握著政权资源的集团而言,真相就在它的手中。对真相的价值的取舍态度,不仅仅是衡量一个政权的文明程度及有无道德基础的问题。但在我们的社会里,政府获取真实的能力则完全不同。我痛心地看到,与这个体制同时伴生且已完全臻于成熟的则是它掩盖真实的机制,使得体制本身已完全丧失了获取真相的能力,因为它已完全丧失了获取真相的道德条件,这样的条件已被这个体制所完全灭绝,诸如:王玉环等被劳教者在劳教所亲眼目睹的、一次次的、上级领导来劳教所检查工作时,所有的劳教所铁定的规律是:将仍有类王玉环般可能的讲真相者集中关押在一个领导找不到的处所,其时,还必要做上一顿被关押者想都不敢想的饭菜。每每的规律是:来参观检查的领导心里揣着他们亲眼“看到”、“听到”的真实而去,当检查者离去的铁门被关上时,铁门的背后针对那群无辜同胞的罪恶又迅速复展活力。而事实表明,这是检查者、与被检查者配合较为默契的一套骗术,各自心知肚明且心照不宣。旨在给被迫害者一种影响——这里发生的是瞒着上级的罪恶。也使得为被“瞒着”的上级逃避掉不久即将要到来的历史审判留下可能!

既然政权已完全丧失了获取真相的能力,民间的真相调查行为就完全具有了正当性及必要性,因为真相的价值事涉我们民族的前途问题,与我们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个体休戚相关。我们有权利了解,这个制度的权力是如何和我们的人民发生著关系?我们有权利知道,这场始于六年前的镇压是怎么发生

的？国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不道德的决定？六年来，国家在执行这种决定的过程中是怎么做的？做了些什么？六年里，被非法关押在高墙后面的我们的无辜同胞到底有多少？在那高墙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仍在发生着甚么？澄清这些问题，是人民针对国家的最低道德要求。在这里我不得不特别强调的是：国家和政府对真相的继续掩盖、隐瞒已完全没有了价值，这不再仅仅是一个不道德的问题。那些见证了真相发生过程者终究是要走入社会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走在人民中间，已经是在不知疲倦地向人们讲述著那已发生了的真相。因为谁都知道，在那高墙的里面与被迫害者打交道的是只有你政府，那里被高墙隔断的罪恶真相，被一个个有幸能活着走出那里的同胞不断地陈述著，掩盖真相的价值只能加深相互之间的心理隔阂！

中国的政府，你们必须有自己是政府的心态，只有这样，你们才有可能从政府的角度，以政府的心态和政府可有的思路去面对灾难性的现实问题。才不致会发生像“六、四”屠杀、虐杀自由信仰者的镇压法轮功运动及新近在广州枪杀手无寸铁同胞这样的冷血事件！但我们时常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那就是：长久以来，中国的政府，类似这样莫名其妙的针对无辜人民的罪恶屡屡发生，面对灾难中人民绝望的呻吟、呼喊永远是无赖般的沉寂或张牙舞爪施以流氓打压手段。在这里，作为一个不断地纳著税的公民，我再次要求中国的政府回答一个公民的质问：你们承不承认这个制度的完全不道德？承不承认我们的制度已没有了面对并解决这种问题的诚意和能力？何以应对？今天控制着这个政权的这些同胞们，你们承不承认这些问题已到了我们民族必须共同面对的时候啦？当这样的问题实在已发生了时，你们应向全民族明确，或者说你们有没有道德和勇气向全民族保证说：这样的罪恶会立即停止并永远不再发生？你们将何以保证它不再发生？要知道，人民仅仅的是要求政府立即停止犯罪！这实在是人世间最奇特的政府！

我们的调查证明著，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真实完全表明，承担具体“转化”任务者面对几乎个个都是“顽固不化”的信仰者时是变得完全地丧失了人性，而对被转化者丧心病狂至无恶不施。而整个体制面对持续了六年疯狂镇压的彻底失败而表现出接近绝望般的疯狂及完全绝望前的最后失态。最近发生在河北涿州市的警察何雪健当着同事的面强奸法轮功女弟子的恶劣事件即是一种最鲜活的例证。

几次的调查我发现，由于变态的镇压需求，致警察可以以任何变态的犯罪手法以达到“转化”目的，对信仰者远离人性的迫害过程产生了这个制度的“正果”，即是中国的警察完全彻底的流氓化，他们不再有任何法律和职业正义意识，视鱼肉人民为当然的工作职责。在他们主导的高墙内，一根黄瓜可以卖到25元，一只烧鸡可以卖几百元，牢房里本属公共资源的睡觉的铺位，在人民警察那里也成了可出售的商品，每个铺位每月售价高达2000元，许多没有钱的被劳教者夜间持续遭受着非人的待遇，中国警察不仅没有了道德，连普通人应有的廉耻也荡然难寻！

在我们的这次真相调查中，另一个我们社会中的令人不耻的罪恶源即是在半个多世纪里，给我们的民族造成历数不尽灾难的劳教制度。劳教制度，作为中国国务院赤裸裸地侮辱和粗暴践踏国家宪法原则的丑行，在中国国家有宪法的日子一直被坚持着。人类历史上，没有那个国家的政府能像中国的国务院这样，完全不把自己国家的宪法当回事，劳教制度从这个国家有宪法之日起即使国家宪法始终处于尴尬境地，它表明中国政府的无法无天及所谓依法治国的骗局。对于剥夺公民自由的宪法原则及程序，不仅仅

是中国的宪法原则，后来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一系列基本法律都有明确排除国务院可制定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法规资格的可能性原则。即上述法律颁布后，劳教制度被中国国务院继续恶劣持有，其作为一个持续的无处不在的、最为恶劣的、践踏宪法的坏榜样，不仅仅成了非法剥夺公民宪法、法律权益的野蛮道具。其根本上，是中国国家走向法治的最为反动的制度弊端。劳教制度，是中国宪法、基本法律原则及中国人民追求法治明天的最大敌人。我们这次的调查不仅表明，劳教制度对中国依法治国价值的反动，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它非法剥夺公民法律权益方面被彻底滥用的超乎常人想像的随意性、广泛性，及它在基层政府那里完成打压人民基本权利方面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王玉环老人、孙淑香女士，六年里均被抓捕九次，办理劳教手续还比不上幼儿园里孩子的游戏那么当回事！实实在在地让人看到我们权力的被肮脏滥用和完全的不道德！今天，是到了一个必须向我们民族有一个总的交待的时候啦！

我须特别强调：这样的罪恶一日不停止，类高智晟般的我们的民族的拷问即不会止灭，中国社会的稳定及和谐之日即不会到来，国家和多灾多难的人民一样将永无宁日。人民对凶残、无知的滥权者昼夜不停的心灵抛弃及已丧失耐心的和平反抗风暴，正在不断地撼动着人们已习惯了几十年的国家的存在基础，岂容任何人小窥！

持续地与那些信仰意志坚如磐石的同胞打交道的经历，我们真确看到了今日我们民族中最为有价值的存在，那群一个个微笑着，用平和的语气讲述令人惊魂动魄的被迫害过程者，常常感动的我热泪汩汩。我们看到了我们民族中的为了保全心灵中的美好价值而不屈和不死的精神，六年里的磨难中成就了一大批具有无与伦比的高贵人格者群体，他们对信仰的执著，对野蛮打压的蔑视及对我们民族美好未来的乐观向上心态无不令人仰视的境界。调查中我们发现的另一个绝对的规律是，每一个走出关押场所的法轮功学员，无论他们被关押的时间长短，在被关押期间说了些或做了些什么，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对信仰变的更加坚定。最典型如曾被关押多次的辽宁阜新市韩大姐，几年的野蛮关押解除后，所在派出所所长来找她谈话，让她保证不再修炼，她语气平静却坚定地告诉代表人民政府的人民警察：“再抓我一百次，我还是要修炼，我们修炼没有错，更没有罪，我被解除了非法关押后回到家，我的家人，我的周围通过我不停的讲真相，又有三十多人加入了修炼者的行列！”

在这次的与法轮功修炼者群体的持续的接触，我发现了另一个使人欣喜的真相是，较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整个社会的人性、良知、道德、仁爱及责任方面颓废的现状比，这些修炼者在含上述几个方面在内的，整个心灵、精神和道德方面完全给人以是从旧民族中脱胎换骨出的新群体的全新影响！让人感到一种信仰对人心灵世界改造的强大功能，确让我真正看到了拯救我们民族颓废现状的希望及现实出路。

在与这些修炼者的接触过程中，他们面对这场空前惨烈灾难回述时规律性的平静心态，对迫害者的宽容襟怀及对我们民族美好明天的乐观心态使人持久的震撼不已。他们淡薄名利，对因野蛮迫害而持续处于生存危势的困难者的、或父母被非法关押者及被致死者的、或已完全丧失抚养能力者的孩子及无以赡养的老人，那一个个持续地悄声无息的济助及耐心令常人难以想像，更不用说理解。信仰对人心灵及道德的快速改变令常人难以置信。最明显如：今年33岁的朱晓光告诉我，他刚到监狱，犯人之间的野蛮及冷血以待成了那里的单一人际关系生态，每个人都想以凶残及心狠手辣来驯服身边的其他犯人，没有任

何人自愿被驯服，更没想到要自我驯服。后来是法轮功修炼者神奇地涤荡了他们的灵魂及心理，用他的话是：“我是彻底地通过心灵改造驯服了我自己。”后来他们那里又有一百人开始修炼法轮功，以至过去每有新犯人到即必遇“杀威棒”的境遇变成了对新来者施以关怀的援手，竟至把很多新犯人惊的目瞪口呆。原公主岭监狱的警察张林有的经历更让人刮目相看，他告诉我，修炼法轮功使他变成了那座庞大监狱里唯一不再虐待犯人和不再收犯人钱财的警察。他说他决心不再虐待犯人尤其是不再收取钱财后的一年里，他始终和自己进行着斗争，尤其是自己缺钱刚巧又遇到别人送钱时及看到别的同事照旧收钱时，心理矛盾极了！他自豪的告诉我，他的修炼彻底地改造了他的心灵！后来他管的60多名犯人感激不已，以致希望中国的警察都去修炼，犯人们都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警察会变成世界上最文明的警察，他最后却被非法劳教及开除警察队伍。

但我们痛心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公开的政治压力加利诱，摧毁了警察最后的一丝善良本性，人性恶的一面迅速发酵膨胀，做人最基本的良知底线不再被顾及，警察实际上也是这次丧失人性的疯狂运动的受害者。“文革”后，我们民族得以稍许复苏的人性、道德、良知、正义、仁爱等基本价值理念，再一次被彻底的摧毁。国家公职人员的正气，正义及先进性只成了官控媒体中取之不尽的令人民唾骂的谎言！而灭绝正气，正义、良知及道德却成了公职者的职责，被要求提至“讲政治”的高度去执行。

信仰和道德是一个民族保持持久及向上生命力的最重要保证。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们的另一方面即是，他们会什么都相信，同时，他们又会什么都不信。我们的民族中几十年来最缺乏的，即是我们缺乏保守及滋养我们民族道德价值的信仰根基，这是我们民族几十年来持续动荡的乱源。长远改造我们民族的问题即是倡导并保护人民的自由信仰，通过改变人心来改变了的世界才是有希望的世界。我们的政府过去六年里所做的，即是以野蛮的血腥暴力来阻挠我们民族向这样的希望迈进。仅有群体的反思是不够的，在这封公开信中，我们还是要向政府提出一些必须的要求，那就是立即停止针对自由信仰者的血腥镇压，立即释放杨光，立即释放所有的被关押者，赔偿他们的损失！但我们却不会提出给法轮功信仰者平反的要求，因为在那些信仰者心目中，在我们民族尚有良知的成员心里，人们从来就没有说过这个信仰团体是“反”的概念。让凶残折磨了一个民族半个世纪者再玩出平反的把戏，一方面，平反者根本不再有这种道德和道义资格，另一方面，这本身即是对被折磨者的一种侮辱！现政权的残暴，愚蠢及无法无天的时间与它存在的历史一样的长，在此我特别正告那些至今不思悔改的、仍迷信暴力者，绝不允许再发生对说出真相者的野蛮迫害恶举，停止一切针对这个民族的伤害行为，这是你们的最后出路！

最后，我想敬告胡锦涛、温家宝两位同胞，我们必须以勇气和道德承认，这部凶残折磨了我们民族半世纪的政权机器，它的每个部位都沾满了善良人民的血和泪水；必须以勇气和道德承认，在几千年里，一直被专制、独裁、暴政裹胁著的中国民族的悲惨命运，今日仍被看不到尽头地延续著；必须有勇气和道德承认，一个机制性的追求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的民意政权从未在我们广袤的土地上存在过；必须有勇气和道德承认，我们民族，我们的人民具有追求一个民主、自由、法治及人权的民本政权的权利；必须有勇气和道德承认，我们民族对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的热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炽烈；必须有勇气和道德承认，在今日的中国，任何力量企图继续阻挠人民对上述权利价值的追求都必将遭致迅速失败的下场。恕我直言，我们无法否认，所有的债债都被人民的眼睛、经历及带血的记忆所记录。最后我想敬告胡、温二位，只有我们的心里真正装着那些灾难中同胞的安全，我们才会获得真正的安全。只

有两位真正关心起我们民族的前途！两位才会像这个民族一样具有了美好的前程！

祝胡锦涛 温家宝二位同胞在即至的新年里平安！健康！

祝我的全体中国同胞在新的一年里能获得生存的新天地！

愿神保佑中国人民！

你们的同胞：高智晟

2005年12月12日于吉林省长春市